

# 仰天長嘯

一個單監十一年的

紅衛兵 獄中鸞天錄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q.info>

魯禮安 著 • 王紹光 校

印  
王  
長  
庚



# 仰天長嘯

一個單監十一年的紅衛兵獄中籲天錄

魯禮安 著

王紹光 校



中文大學出版社

鳴謝：李正天（封面及扉頁題字）

《仰天長嘯：一個單監十一年的紅衛兵獄中顧天錄》

魯禮安 著

王紹光 校

© 香港中文大學 2005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 962-996-250-0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 • 香港中文大學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電子郵件：cup@cuhk.edu.hk

網 址：[www.chineseupress.com](http://www.chineseupress.com)

*Outcry from a Red Guard Imprisone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ese)*

By Lu Li'an

Edited by Wang Shaoguang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5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62-996-250-0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http://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獻 紿  
我們那一代人被埋葬的青春歲月



攝於2000年，時年54歲

回頭再看那滔天的巨浪  
我依然魂魄未安  
——《神曲·地獄篇》

# 目 錄

序一：一個人的文革史 .....	方 方	ix
序二：我也有過這樣的青春 .....	姜 弘	xv
圖 片 .....		xix

## 上卷 狂飆為誰從天落

第一章：請給我以火 ——代序 .....	3
第二章：少年心事當拏雲 .....	15
第三章：大學，1966 .....	41
第四章：槍打出頭鳥 .....	67
第五章：正西風落葉下長安 .....	93
第六章：從韶山到南昌 .....	117
第七章：一九六七年春夏 .....	143
第八章：七二〇事件前後 .....	169
第九章：北斗星學會始末 .....	195
第十章：「決派」和巴河一司 .....	221
第十一章：驚變，逃出華工園 .....	245
第十二章：沉入黑暗的深淵 .....	271

## 下卷 十年一覺囧圖夢

第十三章：逮捕與批鬥 .....	301
第十四章：民主路415號信箱 .....	325
第十五章：形形色色的「同犯」 .....	349

第十六章：達摩克利斯之劍 .....	377
第十七章：五雷轟頂「九·二七」 .....	403
第十八章：覆巢之下復有完卵 .....	429
第十九章：煉獄三日冥想 .....	453
第二十章：活下去，與命運抗爭 .....	475
第二十一章：轉監漢口的日子 .....	501
第二十二章：三十形銷而骨立 .....	529
第二十三章：夜如何其？夜未央 .....	553
第二十四章：黎明的腳步聲 .....	581
後記：走出「失憶」的叢林 .....	609
附錄	
一、武漢地區紅衛兵運動大事記 .....	611
二、重要名詞解釋 .....	619
三、書中有關人物索引 .....	627
四、「北決揚」涉案人員索引 .....	629

# 序一

## 一個人的文革史

方 方  
湖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

文革開始時，我上著小學四年級，正處於那種有記憶能力而無行為能力的年齡段。整個文革，我幾乎都只是一個看客。我所居住的樓房，有一個頗為寬大的半敞開式走廊。樓上四家人，除去正處於飽受衝擊的大人（全是工程師）外，共有十一個學生，九男二女，年齡相差九歲。最大的是我大哥，他已上大學，最小的便是我。九個男生中的七個中學生，均被捲入了文革，幾乎每個人都參加了相應的組織。他們白天出門，晚上便坐在走廊上高談闊論。我則是一個忠實的聽眾，像聽故事一樣，聽他們講述外面發生的事情。所有的武漢文革中出現的大事件以及著名的人物，我都清清楚楚。因我的兄長和我的鄰居都屬成份不好的人，他們參加的組織，幾乎都是造反派。為此，對於當時造反派的一些領軍人物，我亦瞭若指掌，魯禮安便是其中的一個。兄長們在七嘴八舌講述魯禮安以及他書中多次提到的馮天艾等人的故事時，都帶著崇敬的口吻。關於他們叱咤風雲的文章，他們口若懸河的演講，他們振臂高呼的激情，都彷彿令我親眼所見。如此這般，魯禮安這些老紅衛兵便自然而然地成了這個少年聽眾的偶像。蓋因為有此經歷，當我得知魯禮安寫了一本回憶錄，希望我能為他寫序的時候，竟是嚇一大跳。我的第一反應便是：我怎麼敢？我來為他寫序豈不是太狂妄了？

但是最終我還是決定要寫。不是為了別的，而是因為對於文革實在是有太多的話要說。

## 二

關於文革的被人遺忘，三年前，我曾經在我主持的雜誌上寫過這樣一篇「社評」：

文化大革命已經遠去我們二十五年了。突然之間，原本近在眼前的它、清晰可見並且帶著鮮血的它，竟成了遙遠遙遠的往事。那些受傷至深的人都已然老去，許多的他們業已或是正在告別這個帶給他們無限傷感和痛楚的世界；跌跌撞撞地與這段歲月共同進退的中年人們則努力地想要忘卻，因為他們的生命時日無多，只有向前才能看到希望，而回過頭去則總是只能看到自己廢掉的一截青春，徒增傷悲又有何益？至於那些年輕的人們，記憶裏幾乎沒有文革。無數殘酷的歲月在他們童年的記憶中淡得幾乎沒有痕跡，倒是許多天真無邪的歡樂卻鮮活鮮活地存在於腦海。更小更小的人兒，文革的一切對他們只是傳說中的傳奇，有如一部金庸小說，雖然充滿悲歡離合和刀光劍影，卻只是讓人津津樂道，無論如何也引發不了一絲痛苦的感覺。

十年慘烈的浩劫，十年幾乎讓中國人民崩潰的災難，在紙醉金迷的今天，彷彿只是一段陳舊的歷史故事，是逝去的老人們墳前的一疊錢紙，是無數飯店酒館的餐桌上的一杯老酒，是年輕的白領們的幾聲俏笑。連對它的牢騷，人們都快聽不見了。

但是，它卻是實實在在地存在過。它是那樣深刻地影響過我們的生活，它甚至顛倒了我們的思維，扭曲了我們的眼光，改變了歷史的進程，重塑了民族的靈魂。它走得是那樣深那樣遠，其實直到今天，它的陰影也沒有完全地消失，它的毒素滲透在我們的骨髓之中，只是我們都不想承認罷了。

無論如何，文革是一段不該也不能忘卻的歷史。只是人們（包括歷史學家）對它的研究還遠遠談不上深度。簡單地控訴它清算它以及批判它，在二十五前雖然必要，在二十五年中也還可以，但在二十五年後的今天顯然就不夠了。對於它的成因，

它的根源，它的偶然，它的必然，它的背景，它的時況，它的初衷，它的走向，它的失控，它的專制，它的個人恩怨，它的民間情緒，它的體制問題，它的宣傳導向，它的文化程度，它的封閉視野，諸如此類，在今天都應該重新思過。否則，我們的後代甚至連我們自己也不好理解，怎麼幾億人一夜之間都跟瘋了一樣，而且一瘋就是十年，瘋得沒個譜。

那麼理智地冷靜地看待文革，並分析它反思它徹底清算它，以便將來不再發生這樣的事件就實在是太有必要了。

我們編輯部一直想要做一組稿子，來深入地探討文革，但這樣的事，顯然不是幾個人或是一個小小編輯部所能擔負得了的。因此，我們覺得這樣的事情還是交由專家們來做，而我們則索性開設一個史料性的欄目，請各方人士尤其是文革中一些事件的相關人士來談文革中他們的所為，或許這樣的原始史料，對於我們瞭解文革，對於專家們研究文革，對於讀者們看清文革，會有好處。

這本雜誌終於也為此付出了被勒令停刊的沉重代價。

我將之引用在此，是因為事隔三年，我突然覺得，文革式的做法，文革式的思維，文革式的專制，文革式的人治依然在許多的地方左右著我們的生活，干擾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而那些不該遺忘的內容，卻以加速度的方式被實施遺忘。

### 三

現在我要說魯禮安和他的這本書了。

在文革中，大多大眾的都只是芸芸眾生，他們的個人行為只與他們自己相干。而魯禮安卻不是。應該說，魯禮安是文革中的特殊人物之一，因為他在這場浩蕩的大革命中，不僅是追隨，還有製造。他暢快淋漓的文章、唇槍舌劍的辯才、揮斥方遒的意氣、俠肝義膽的豪情，曾經成為武漢三鎮的傳奇。正因為此，當傳出他被抓獲的消息，竟引發一場規模不小的「營救」運動。無論今天我們如何評價當年，無

論事情的發生發展是對是錯，對於魯禮安而言，那都是他個人最轟轟烈烈也最風光無限的年月。

只是好景不長，魯禮安最終被投入了牢房。雖然關他入獄的理由現在說起來像個笑話，但他卻因為這個笑話，在不時轉換但全都黑暗的小屋中度過了近十二年的時光。21歲到33歲，一個人幾乎全部的青春都被永遠塵封在此並且永遠也索取不回。曾經與魯禮安一起「革命」並也坐牢的諸多戰友或死亡或崩潰，但魯禮安卻沒有。這應該是個奇跡，連魯禮安自己也認為是個奇跡。或許是他的充滿自信的性格幫助了他。他在獄中一遍遍回憶自己的往事，以致那些事情爛熟於心，睜眼閉眼都清晰可見。那時候，他就下決心要將自己的經歷寫成一本書。

這一天終於到來。雖然這時候，距他走出監獄的那天業已又過去二十五年。

這是一本重要的書，重要的不僅是內容本身，而是魯禮安所做的這件事。十年的文革時間，實在是太漫長了，漫長得我們無法看清它的真相。隨著二十八年時間的推移，這原本就不清晰的真相更是越來越色澤模糊，越來越眾說紛紜，越來越是非難分，越來越錯綜複雜。究竟是什麼原因令中國產生如此之大的浩劫？是什麼理由使中國精英們一夜之間以排山倒海的姿態崩潰？是什麼力量讓陽光一般的紅衛兵突然成為人們眼裏的惡魔？……這樣的問題可以提出成百上千，但答案卻總是吞吞吐吐含含糊糊。

當然，這樣的問題，魯禮安一個人的回憶錄不可能解答，就算有其他更重要人的回憶錄也無法解答，它需要千千萬萬過來人最真實的記憶。文革若是暗夜裏的一塊巨石，渾然不見它的真實面目，而魯禮安的回憶錄便是一隻射向它的手電筒。雖然它只能讓我們看到巨石的一個點，但如果有一無數無數的魯禮安將自己的文革經歷寫出來，尤其是那些在文革中身分地位相對特殊的人寫出自己的文革歷程，那麼，這就如同手電筒從各個角度向這塊看不清的巨石投射去光照。聚光之下，就算最本質的東西無法觸及，但它的輪廓卻已然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或許這樣，我們方能以最快捷的方式接近真相。

其實，對於文革，我個人以為，真相比結論更加重要。這就是三年前我非常希望看到回憶文革的原始文本的原因。

這樣，魯禮安的回憶錄應該是開了一個好頭。這是他一個人的文革史，畢竟他真正投身這場運動只有區區兩年時間，餘下的日子他都在單人牢房裏度過。那是他最黑暗最艱難的時光。縱是歷經了如此沉重的苦難，在魯禮安長達幾十萬字的行文間，我們竟然仍能看到他革命浪漫主義的情懷，竟仍然能感觸到他當年的激情和亢奮。或許他字裏行間激昂有餘，沉重不足；或許他對自己的寬容和諒解多了些，自責和反思少了些；或許他在描述有些人時帶有個人感情色彩，而缺少一點通達和客觀，諸如此類。但不管怎麼樣，他將一個人在文革中最真實的經歷和最真實的心態都展示在我們的面前；他讓我們看到一個時代的風雲動盪與荒唐不堪；他讓我們為一個年輕人曾有過的命運、為許多年輕人曾有過的命運、為我們國家和民族曾有過的命運扼腕歎息。他的曲折而痛苦的經歷，喚起了我們以及更多人想要透徹瞭解文革真相的欲望，也將會喚起那些文革過來人願將自己的見聞和經歷寫出來的勇氣。

應該說，這就是魯禮安這本書的意義所在。



## 序二

# 我也有過這樣的青春

姜弘

武漢市江漢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

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了近三十年，我才讀到第一本完整的個人回憶錄，而且這樣真實生動，把人帶到了在今天看來簡直不可思議的那個瘋狂的年代。我原來曾想，文化大革命是無法如實描述的，因為那一切太離譜，太不正常了，真實的不正常有可能成為漫畫，使人感到荒誕。然而，讀了魯禮安的這本書，我改變了看法。也許因為我是過來人，而且曾參與過有關活動，所以讀時如同回到了當年，一切都重現眼前，感到真實而親切。這種真實感來自作者的真誠，他不加矯飾地把當年那種無限崇拜、無限忠誠照原樣再現了出來。說幼稚也好，說愚昧也好，或者乾脆說奴性也好，當年確實就是那樣——魯禮安給了我們一塊「文革」的活化石。

「文革」中武鬥頻繁，死傷無數，實際上已經演化為一場「武化大革命」。魯禮安的獨特之處，在於他自始至終是「君子動口不動手」。雖號稱「敢死隊」，實際上他一直沉浸在邏輯和激情之中，所進行的是思想理論上的戰鬥。他那種理想主義傾向，他的辯才和勇氣，吸引了許多右派。我和我的右派朋友常在私下裏議論他，稱讚他，因為我們從他身上彷彿看到了自己當年的影子。

在「文革」之初「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時，我和我周圍的幾乎所有右派，包括老作家姚雪垠、李蕤，詩人徐遲、白樺、王采、秦敢，翻譯家章其，著名法學家韓德培，著名記者趙鎔、劉若等等，都受到了猛烈衝擊，成為游離於鬥爭旋渦邊緣的「死老虎」。事實上，當時我們都已成為俎上之肉，隨時隨地任人侮辱摧殘。是爭取生存權和對民主的渴望，使得一些右派利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機會，介入了「造

反有理」的活動。最突出的是公開站出來造反的詩人白樺，他在1967年夏天以「一個解放軍戰士」的名義創作和散發的組詩《迎著鐵矛散發的傳單》，充分反映了造反派群眾那種追求民主、反抗暴政的意願和激情。這些詩被抄成大字報貼遍武漢三鎮，傳頌一時，膾炙人口。徐遲對這些詩評價很高，他伸出拇指說：「全國文藝界頭一份！」

老作家姚雪垠也並未完全置身事外，而是以曲折隱蔽的方式表示對造反派的支持。1967年春天，造反派被鎮壓，軍區發佈《三·二一通告》，取締工人造反組織，把學生從《長江日報》的紅旗大樓趕走。一時間，武漢三鎮一片沉寂。對此，姚雪垠懷著悲憤的心情，一連寫下了二三十首七言律詩，並加了一個小序，油印成小冊子，偷偷散發出去。小序稱：「三·二一」以後，紅旗大樓前人迹寥寥，大字報全被撕毀，紙屑飛揚，一片淒涼。他於無意間發現海關大樓旁有一組小字報，直行書寫，雖已殘破，尚可辨認，竟是一組七言律詩，而且格律謹嚴，對仗工穩，因而不忍任其湮沒，擇可識者抄下云云。記得第一首裏有一聯是「武漢關前月色冷，鐘聲寂奏東方紅」。中間有一首更把這一年的三月二十一日稱為「新馬日」（指1927年5月21日湖南軍閥何健在長沙鎮壓革命工農群眾的「馬日事變」）。由此可以看出我們這些人當時的思想感情傾向。

當年有一種說法，說右派「人還在，心不死」，這話其實並沒有錯。他們所說的「心不死」無非是講嚮往「民主、自由、人權」之心不死，而這正是五七年的右派和「文革」中有「異端」傾向的那部分造反派所追求所夢想的。我和我的朋友們注意並讚賞魯禮安和他的《揚子江評論》、《北斗星學會宣言》，是發現他們抓住了當代中國的兩個最重要也最敏感的問題，這兩個問題正是1957年「鳴放」中的關鍵問題，這就是實行民主和解放農民。當年在武漢大學的大字報欄上就有這樣的醒目大標題：「爭民主，爭人權！」、「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魯禮安他們呼喚巴黎公社原則，關心農民的現實處境，把這兩個問題聯繫起來了。

當時對於他們的這些思想和主張，我和我的朋友們是贊成和佩服的。但同時又為他們擔心，感到他們已闖入了禁區。他們不知道，我們當年就是在這些問題上犯禁而罹難的。魯禮安不知道，巴黎公社式

的民主，是只可以說而不可以做的。當時，姚雪垠就看出了這一點，說他的思想很危險，會吃大虧的，要我千萬不要介入他們的活動。儘管如此，包括姚雪垠在內的我們這些人，還是非常同情、讚賞魯禮安並為他的命運擔心。如前所述，因為我們從他身上看到了我們當年的影子。面對魯禮安們的「書生意氣，揮斥方遒」，像我們這些歷盡滄桑的「右派分子」，自然都會在内心裏產生感應，聯想起過往的歲月——從心裏產生「我也有過這樣的青春」的感慨！

1957年的「鳴放」，是一次夭折了的思想解放運動，是五四精神的一次回光反照。當時提出的問題既深且廣，與「文革」中那場造反運動的不同是很明顯的：一是性質不同，二是思想資源不同。表面看來，「鳴放」與「造反」都是「響應號召」，又都是中了毛澤東的「陽謀」。但二者有重要區別：右派是有自己的獨立見解和主張而為毛所不容，才「因勢利導，聚而殲之」的。造反派則不同，他們對毛無限崇拜、無限忠誠，是被愚弄、利用之後又被拋棄的犧牲品。說到思想資源的不同，主要是歷史環境的不同造成的。右派的思想裏不僅有社會民主主義，而且有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觀念，這與他們早年所受的教育、所受五四精神的熏陶有關。造反派就沒有這種精神資源，他們生長在嚴格封閉的單一思想文化環境中，所能接受的只有一種意識形態，就是「毛主席的教導」，就是林彪為《毛主席語錄》題詞時所書寫的那幾句雷鋒日記：「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一句話，就是聽話，效忠！人們當年就是愚蠢地唱著「忠字歌」、跳著「忠字舞」，滑進那個瘋狂的年代的。

我們對魯禮安們的讚賞，歸根結底，就在於他們在那個全民瘋狂的年代裏，保持了一份難得的相對清醒。這正是他們與一般造反派的不同之處，也是他們難能可貴之處——因受壓而反抗，而獨立思考，從而衝破思想禁錮，從毛澤東走向馬克思，反過來質疑現存制度，而且不顧偉大領袖的戰略部署，自己組織起來去探索新的革命之路——走向民主之路。他們當然沒有想到，這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就是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就是反革命。然而，正是在這裏，他們遇上了1957年的右派，他們之間的思想觀點相近，精神上相通，而且這種相近、相通的東西一直延續到1989年。可惜的是，這種相近、相通之處

未能相互傳承，積累發展，並上溯到五四源頭，進行認真的研究總結。

如今，這一切都過去了，成為歷史了，但是「文革」中有許多的真假是非問題並未弄清楚，人們還沒有把「文革」中的施暴者與受害者區分開來，魯禮安的這本書有助於解決這一歷史公案。書裏有一個附錄，注明了有關人物的基本情況，那些曾經為武漢人所熟悉所關注的活躍人物，那些造反派頭頭，不是悲慘的死去，就是淪落到了底層。——前兩年我曾在街頭遇見當年和我一起辦報的「中學紅聯」的小劉，那個精明活潑的中學生，如今已是個形容憔悴的中年人，正在為下崗後的生活而奔忙。是他認出了我，我卻認不出他了。當時，我不由得聯想到魯迅筆下的潤土，心裏戚戚然無言以對……

這樣的人很多很多——「八九點鐘的太陽」，火樣的青春，被愚弄、被利用、被毀滅了，反轉來又要承擔沉重的歷史罪責，這也未免太不公平了。當然，問題不僅僅在於此，歷史的發展總是要有人付出代價，作出犧牲的；問題在於，是用這沉重的代價掩蓋歷史真相，還是用以換取真正的歷史教訓？魯禮安的這本書既是不平之鳴，更是揭示歷史真相，提供第一手可靠資料。至於反思、懲悔、評判，那是以後的事。

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像魯禮安這樣，將自己曾經參予其中的那段歷史，認真地回憶並如實地記錄下來，留給後人。讓我們的子孫知道他們的前輩，曾經生活在一個怎樣黑暗恐怖、虛偽荒唐的時代。這件事是要抓緊做的，不能以人老了，記性不好了，容易「健忘」來敷衍。歷史不能遺忘，也不准許遺忘。忘記了過去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忘本和背叛。那樣我們將愧對歷史，愧對我們的子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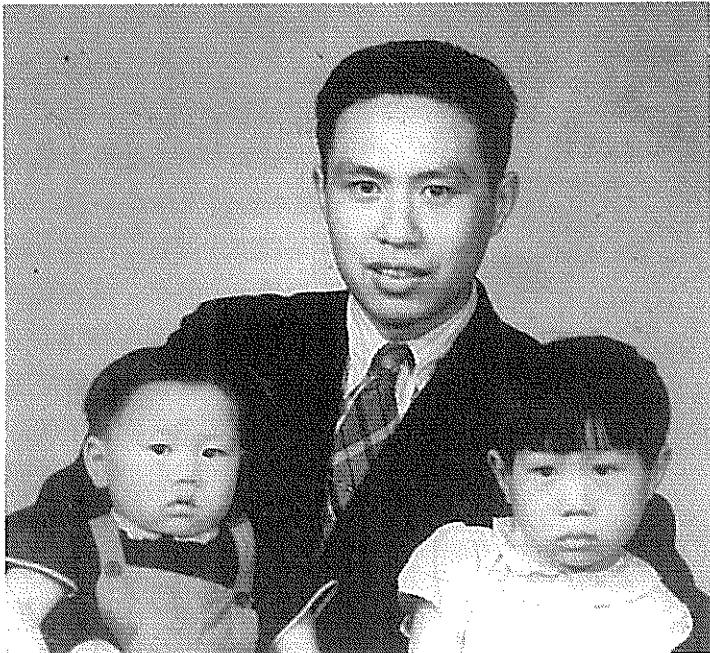
二零零四年中秋之夜於武昌東湖



1. 護士手中的新生兒 (1946  
年)



2. 父親母親、姐姐與我 (1947  
年，攝於漢口海關宿舍住宅  
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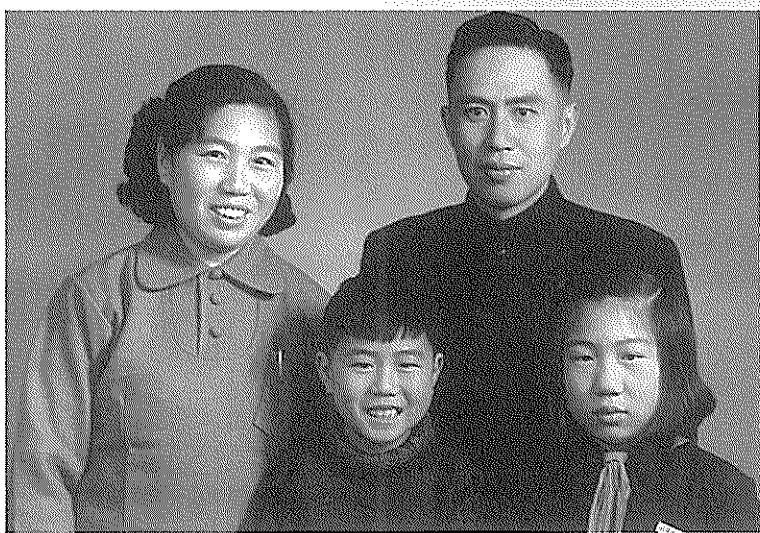
3. 父親與我們姐弟倆 (1949年)



4. 母親與我們姐弟倆 (1951年，攝於漢口海關宿舍花園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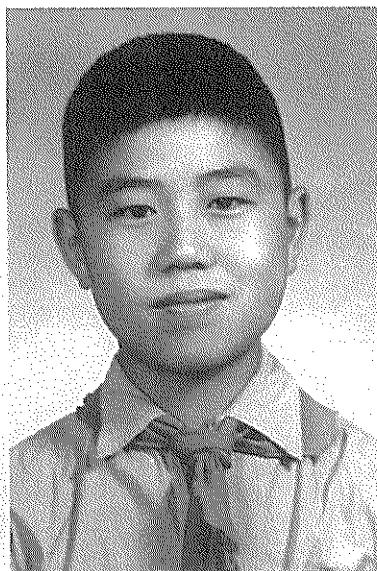
5. 姐弟倆(1953年，我剛進小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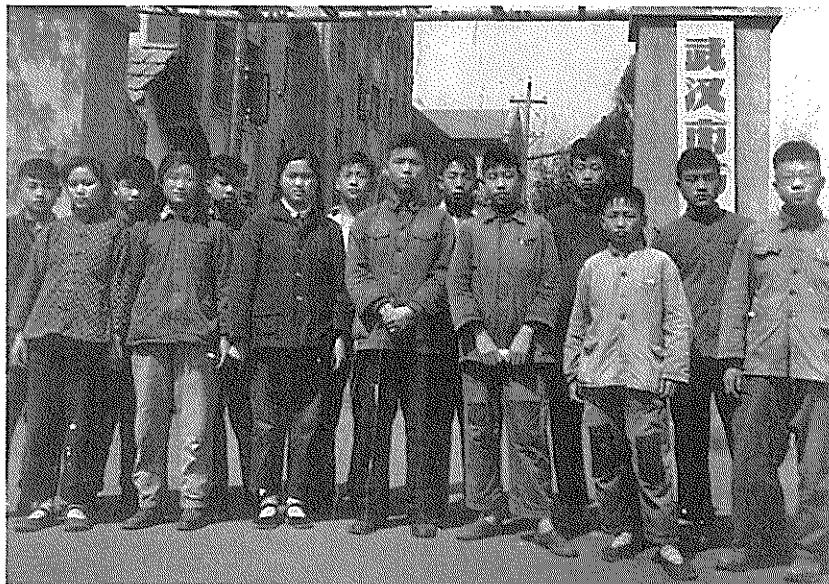
6. 全家福(1955年，念小學三年級)



7. 鄰居的小伙伴 ((1957年，右二是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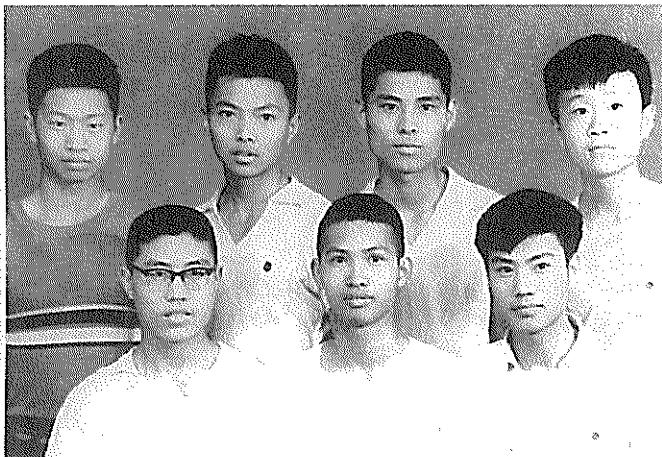
8. 小學畢業照 (1959年6月)



9. 初中畢業前留影 (1962年，右起第五是我，右一是曾和我合演雙簧的張言公同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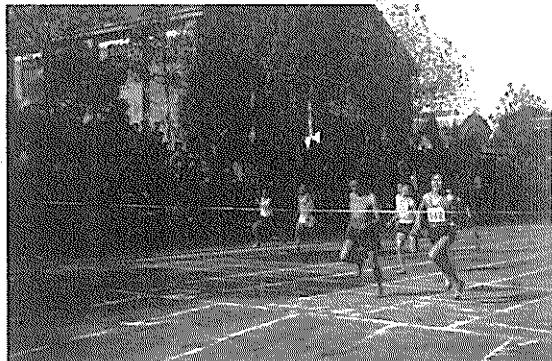
10. 高中時在校田徑運動會上與班上參加400米接力賽的隊友合影 (1965年5月，右一是我，左二即和我同寢室上下鋪的將軍之子王小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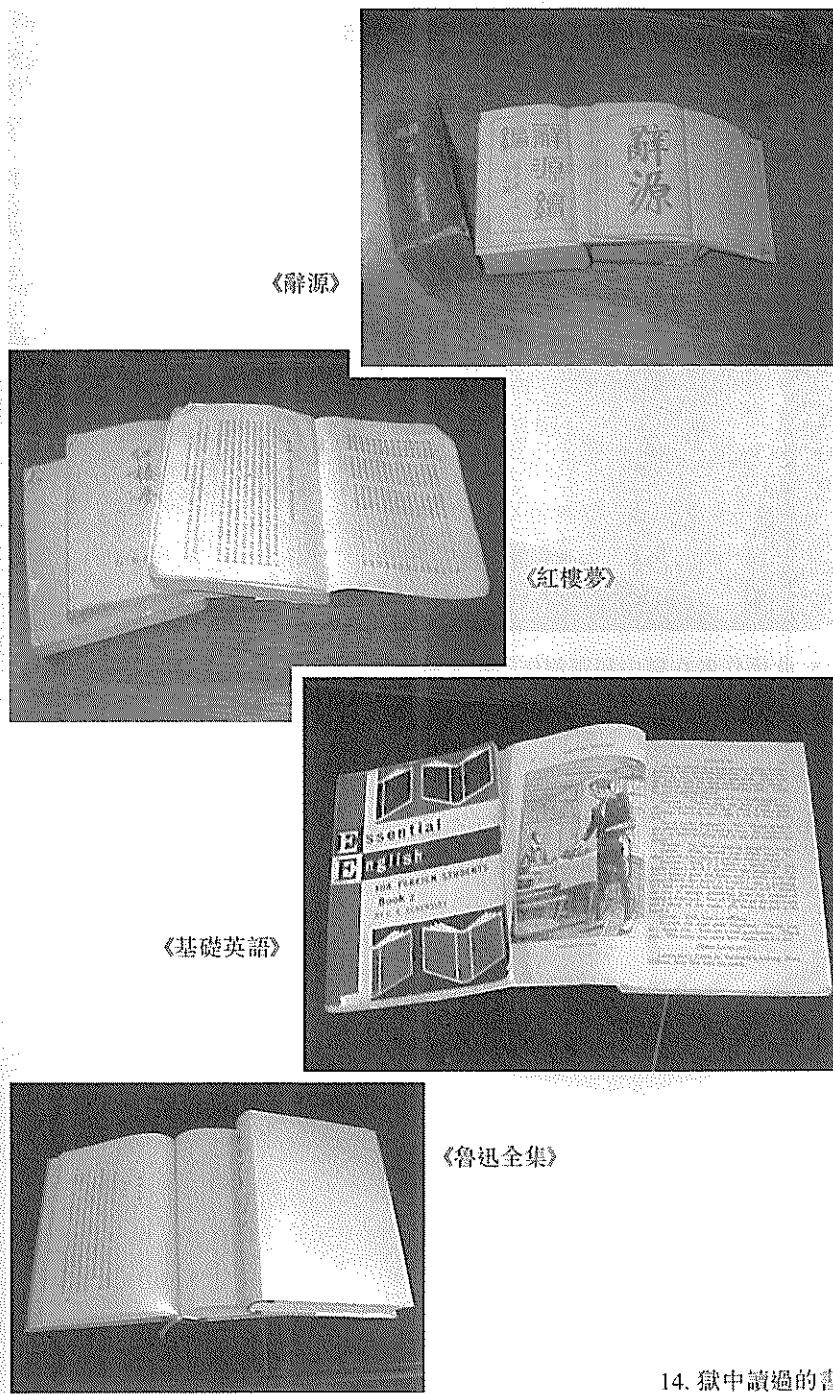
11. 高中畢業前與班上的好友合影留念 (1965年夏，前排左起一是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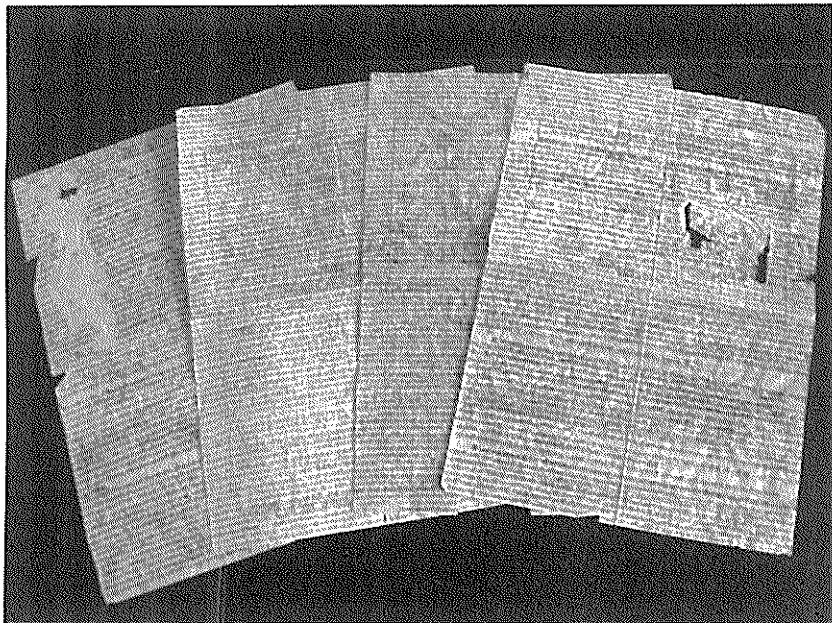
12. 大學時與校田徑隊隊友們的一張合影照 (1966年春，第三排左起第四是我)



13. 在武漢市大學生春季運動會百米複賽中作最後的衝刺 (1966年4月，右一是我)。時隔不久，我們就將衝進一場萬劫不復的政治風暴之中。



14. 獄中讀過的書



15. 此係作者在獄中秘密創作的紀實體小說《狂飆曲——紅衛兵之歌》的手稿的一部分，寫作時間為1970年夏天。

## 上卷

# 狂飆為誰從天落

我的青春之旅本應伴隨  
鮮花、醇酒與愛情！  
誰曾料路途上竟佈滿了  
鹿砦、荊棘與陷阱；  
號角聲召喚我衝鋒陷陣，  
硝煙彌漫、百合凋零，  
啊，我們這一代人！  
命定要與撒旦一同啟程。

在通往地獄的路口，  
請讓我回頭再看一眼，  
我曾經走過的  
二十年絢麗人生：  
你真美啊！請停一停，  
這段生命原本如此純真。  
我可以無悔地去了，  
誰願與我同行？

——唱給逝去的歲月  
(摘自1980年出獄後的詩)



## 第一章

# 請給我以火 —— 代序

「從門到窗子是七步，從窗子到門是七步」，捷克作家伏契克描寫龐格拉茨蓋世太保監獄牢房的這句話，我十歲時就從姐姐學的初中《文學》課本中讀到過。

後來，命運安排我自己來閱讀監獄這部「大書」，在這本書裏我又讀到了這句話——我所在的囚室，從門到窗子，不多不少也恰好是七步。

七步，在人類歷史的漫長進程中，實在是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人還需要經過多少世紀才能洞察一切呢？」伏契克在他寫的那本名叫《絞刑架下的報告》的書中問道：「在人類走向進步的路上已經經歷了幾千座牢房，還要再經歷幾千座牢房呢？」

這位堅強的反法西斯戰士在絞索即將套上脖子時，仍然沒有放棄對人類命運的深切關注。

可他是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在法西斯的監獄裏提出這個問題的，而現在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那末我所在的這間牢房，算不算得上這幾千座牢房中的一座呢？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走過去是七步，走回來也是七步，在武昌民主路76號省監獄看守所的這間狹小囚室的木頭地板上，我不知踱過了多少個來回。據說古希臘有個犬儒派學者第歐根尼，是蝸居在木桶裏生活和思考哲學與人生的，那麼這間鋪著木頭地板七步來回的斗室，也足夠我思考各種問題。何況思想是不受空間限制的，思想可以衝破牢籠。正像外面的有些同胞，儘管享有十分的自由，甚至自由到可以

隨心所欲地草菅人命或人的政治生命，但是他們的思想早已被鎖上了鐐鏹。然而身體的自由畢竟也是我所渴求的，倘若身體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二者不可兼得時，我究竟應該選擇哪一個呢？

這個問題很長時間都深深地困擾著我。我有時覺得自己就像布利丹筆下那頭可憐的驢子，在兩堆同樣十分誘人的乾草之間無法作出選擇，結果是活活地餓死了。我當然不至於餓死，我還有足夠的力氣在這間囚籠裏七步來七步去地一面苟延殘喘，一面思考關於自由的擾人的問題。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在我看來，也絕不亞於令那位丹麥王子頭痛的問題：生存，還是死亡？

一千七百多年前有個叫曹子建的，是在七步之內一勞永逸地解決了這個生與死的問題。他那首「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的詩，不但救了他的才子命，並且使他享有了家喻戶曉的千古詩名。但我有時覺得他還是生不逢時，假如他能趕上我們今天這個偉大的革命年代，面對舉國上下都在「煮豆燃箕，同根相煎」的大好形勢，將會吟誦出多少足以傳世的七步詩來。但有時又覺得未必如此，因為無論是苦悶出詩人還是憤怒出詩人，我們這個時代都出不了詩人。你苦悶嗎？你憤怒嗎？那就意味著你有自己的思想，而在現實社會中這是絕不容許的。那怕你脆弱得如同一根葦草，但只要你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你就不能見容於這個社會。你必定會落進那個繞著「忠」字轉動的磨盤裏，被碾成一堆粉末。粉末在磨盤裏還能作詩嗎？它頂多只能吱吱地叫喚。

我常常覺得我和落在磨盤中的葦草也差不多，在被磨盤磨成粉末之前，也就只能吱吱地叫喚幾聲而已。事實上我在牢房裏最初那段時間，就很少有過詩的靈感。我所能做的，不過是在每天的晚飯開過之後，對著牆壁上夕照的餘輝，唱幾支憂傷的歌。

那是我剛進監獄的一段日子，被單獨關押在監獄角落一個用兩道門與外界完全隔絕的地方。每天晚飯之後，那個看管我的年老耳背的看守就不再露面。我聽見第一道門上了鎖，接著第二道門也上了鎖。然後是腳步遠去，萬籟俱寂，靜得幾乎可以聽見牆角的螞蟻飽食了我吃剩的饅頭屑後打嗝的聲音，但也許是螞蟻勞作時的杭育聲，我無法深入微觀世界去作仔細的考證。除了忠實的永不會出賣我的「蟻民」之外，沒有誰會聽見我歌唱，也不會有誰來阻止我歌唱，我盡可以自由

地放心大膽地唱那些連監獄外都不許唱的「封資修」的歌。我唱中國的民歌，唱古典的、也唱現代的；我還唱五十年代流行的蘇聯歌曲，唱「喀秋莎」、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也唱俄羅斯的民歌，唱「三套車」：

冰雪遮蓋著伏爾加河，冰河上跑著三套車，有人在唱著憂鬱的歌。小夥子你為什麼憂愁？為什麼低著你的頭……

你為什麼憂愁？是啊，我為什麼不憂愁呢？像這樣自由地歌唱的日子已經不多了，我被通知將正式轉移到監獄隔壁的看守所去，那麼就讓我在這個地方再盡情地唱一次吧：

小夥子你為什麼憂愁，為什麼低著你的頭，是誰叫你這樣傷心……這匹可憐的老馬，苦難在等著它。

而我已經開始的苦難將是愈來愈深重，我的命運還不及那匹可憐的老馬。

看守所森嚴壁壘，有著無數的清規戒律，我從入監的第一天起，就被告誡不得高聲喧嘩，不得與人交頭接耳。總而言之，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而像過去那樣無拘無束地歌唱，自然更是根本不可能了。你嗓子真憋得慌嗎？那就在外出放風時，扯起嗓子和全體犯人一道，唱那首監獄當局特准的語錄歌吧：

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

唱這種歌使我感到屈辱，幸好不久以後我這粒「灰塵」，就被掃進了一間單人牢房。我不再和其他犯人一道放風，自然也就不用再和犯人們一道唱「凡是反動的東西」。但別的歌在牢房中也不能唱，我只能把歌放在肚子裏唱，或者放在唇邊輕輕地唱。「沒有歌聲就沒有生活，猶如沒有太陽就沒有生命一樣」，那個叫伏契克的捷克人說得多好啊。歌聲是我在孤寂淒苦的監禁生活中的一點可憐的慰藉，是照耀我日漸枯涸的生命之泉的一縷陽光。那些剝奪了我的一切權利、一切自由、一切幸福的人呀，你們為什麼要扼殺我這最後的一點歡樂呢？

我是與歌聲一起來到這個世界的。

當我還在娘胎裏時，我就貼著肚皮聽過母親美妙的歌聲，那是對主耶穌誕生的讚美：

平安夜，聖善夜，萬暗中，光華射，照著聖母也照著聖嬰，多少慈祥又多少天真，靜享天賜安眠。

平安夜，聖善夜，牧羊人，在曠野……

那是何等悅耳、何等聖潔、何等超凡脫俗、又何等溫馨安詳的歌聲呀，我隨著歌聲在娘胎裏快樂地蠕動。

當我終於呱呱落地時，父母在給我取的名字中，用了「平安夜」中的「安」；而在我之前出生的姐姐，則是名字中用了個「平」字。在我的父母把「平安」二字分別用在我姐弟倆的名字中時，這兩位虔誠的基督徒，一定是祈求了上帝，保祐我們姐弟一生平安。

淙淙的琴聲從母親靈巧的指頭下流出來，伴隨那悠揚的風琴聲，是母親悅耳柔美的歌聲。母親念書時曾是一所教會中學唱詩班的女高音，又能彈一手動聽的風琴，於是搖籃中的我有福了。我聽母親自彈自唱，唱《平安夜》、唱《聖母頌》、唱《漁光曲》、唱《畢業歌》。稍大，蹣跚學步時，我已會咿咿呀呀學唱歌了。到上學時，我從來都是一路跑著上學，一路歌聲飛揚，我是一個快樂的「小小少年」。

母親教給我的歌中，有幾首古曲我尤其喜歡，其中岳飛的《滿江紅》，是我最愛引吭高歌的一首。「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那是何等的慷慨激昂；「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那份壯士情懷，直叫少年的我為之熱血沸騰，憧憬著長大後也要為國家為民族赴湯蹈火，建功立業。「我們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會的棟樑」，恐怕就是我們那一代人共同的心聲。

後來就漸漸地長大了。十九歲那年從省裏一所重點中學畢業，考進一所著名的工科大學，學習水下艦艇專業。我之所以選擇了這個專業，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說是受了影片《甲午風雲》的影響：在銀幕上目睹了滿清政府的腐敗、北洋水師的覆滅、鄧世昌等一批愛國官兵的英勇殉國，便在胸中升騰起獻身海軍事業，造出最好的戰艦為祖國雪恥

的願望。然而進大學還不到一年，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爆發了。既是偉大領袖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革命運動，我和千百萬青少年一樣，義無反顧地投入到這場據說是「反修防修」、「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觸及人的靈魂」的革命之中。從「五一六通知」※1(見附錄二：「重要名詞解釋」，後同)、「炮打司命部」、「反工作組」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2、到「一月革命」、「反二月逆流」、「七二〇事件」，直到所謂「全國山河一片紅」，革命激烈動盪了一年。其間武鬥不斷，內亂不止，我從自身的體驗中得到教訓，已不再那麼迷信所謂「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的神話。我和幾位能夠肝膽相照、生死與共的紅衛兵戰友聚在一起，打算認真地研究一下這場革命的來龍去脈，想用自己的腦袋來探求這場革命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我們組織了一個學會。

然而誰會料到這是犯忌的呢？省革委會的黨政軍一把手發話了，說這是一個反革命的裴多菲俱樂部。大人物手下的鷹犬們於是紛紛上陣，用政治嗅覺靈敏的鼻子，在我們周圍嗅來嗅去：「你們這些狂妄的小子，心懷不滿的年輕人，你們究竟要搞什麼呀？你們的後面又有什麼人在指示呢？」必須挖出我的後臺。於是首先拿我開刀，大禍遂從天降，一夜之間，我從一名紅衛兵小將，淪為「新生紅色政權的敵人」。我惶惶然幾成喪家之犬，東奔西突，欲尋一安身之地亦不可得，終於在一天深夜在去黃石路過鐵山時被劫持。在投入幾百米深的礦井遭嚴刑拷打後，我被「革命群眾」送進了監獄。有誰體驗過從天之驕子而一落千丈為籠中囚徒的滋味麼？我頓時有如失去林中自由的困獸。我狂暴地抗爭，我激烈地申辯，我想拉斷囚籠的鐵檻，我用頭撞囚室的圍牆，甚至想用褲帶結束自己年輕的生命。然而一切都試過了，一切都無濟於事，除了認罪服法，我別無他路可走。

「假使他從前昂首反抗過創世主，現在就該感受一切的痛苦，這都是當然的道理。」我也無可抱怨，還是記住刻在地獄之門的那句銘文吧：

你們走進來的，把一切的希望都要拋在後面。

在那間狹小的暗無天日的單人牢房裏，我年復一年抱過一線重獲自由的希望，又年復一年地把這種希望拋在了後面。

偶爾，還會想起少年時作過的夢，想起那首曾使我熱血沸騰的《滿江紅》。

只是再莫說「三十功名塵與土」，我如今已是戴罪之身，人人皆可口誅筆伐；也再莫提「八千里路雲和月」，我的全部天地就是這狹窄如斗的囚籠，外面的世界只能偶爾在夢中出現。最後剩下的，就只能是眼睜睜「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上帝，我不就只是長了顆略微能獨立思考的腦袋麼？這樣可怕的懲罰，對我這樣一個年輕的學生娃娃，是不是也過於沉重了一些呢？我對偉大領袖當初其實還是一片赤子之心呀。

天主，我的天主，你為什麼捨棄了我？

沒有人回答我。監獄的高牆隔斷了我的微弱的呼聲，整個世界都似乎早已把我忘掉。

漫長的十年過去了，我的命運就在幾個大人物控制的「專案組」的手中像麵團一樣揉搓。一時有主張落實政策放我回校分配工作的，一時有主張判處死刑以證明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的。而其間最兇險的一次，是主管政法的某大人物提出判我以死刑，說非如此不能平我反對偉大領袖的「民憤」。後來雖因幾位老政法的力執異議而改判為無期，總算免我一死，但我仍必須以服刑一輩子來贖我的罪孽。自然，所有這些我當時都毫無知曉，而我在外頭的親人卻已經得知了即將判我無期徒刑的消息。然而就在一些人處心積慮地謀劃、策算、爭執究竟以何種罪名、何種方式置我於死地或准死地時，大牆之外，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變。百川沸騰，山塚卒崩，唐山地震，巨星隕落，「四人幫」垮臺，鄧小平復出。而黨內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的重炮，終於一舉轟坍了思想專制和現代迷信的頑固堡壘。

於是有一天，我出獄了，那一天距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生效，還只差十天。我自由了，但同時也失去了上法庭辯論的權力和機會，我等待這個機會已等了快十二年。

八十年代的第一個春天姍姍而來。冰雪正在消融，河流開始解凍，屋樑上已能聽見呢喃的燕語。我整天坐在南京路市圖書館的閱覽室裏讀書。那年我已經三十四歲，是考研的最後年限，這也許是我重

返大學的最後機會。只是，學業荒廢多年，我能夠闖過考試這一關嗎？而況人雖放了，但沒人給我平反，政審這一關過得了嗎？我多麼羨慕坐在我桌子對面的那位年輕的女孩子啊，這位大學中文系的研究生，一連好多天都在這裏埋頭在故紙堆裏，尋找有關中國最早的一批無政府主義者的資料。那專心致志、目無旁騖的用功神態，禁不住就會把我的思緒引回到遙遠的恍若隔世的大學年代，我人生最美好的那段時光。

我魂牽夢繞的大學校園喲。

我和她也偶有交談，談過幾句什麼那是全然記不得了。我也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甚至已忘記了她是什麼模樣，只依稀還有一點圓臉、短髮、微胖的印象。我那時絕不會想到她會是中國現代史上那位著名的愛國將領唐生智的外孫女。但是唐生智的這位外孫女卻沒有忘記我，十四年後這位叫艾曉明的女孩在她寫的一本紀實作品《血統》中，談到了在圖書館邂逅我時，對我的最初的印象：「我覺得他的眼睛在鏡片後閃爍，不像領袖，不像才子，倒像剛睜開眼睛的新生兒，是陌生的好奇的神情，他的臉色白皙，實在是過於白了，他不見太陽已經有很多年。」

她說她從她母親的文革筆記中知道了許多有關我的官方記載——「華工學生，所謂魯克思，是一個惡毒攻擊毛主席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而現在她從讀者登記冊上，知道坐在她面前的就是那個當年被口誅筆伐的華工學生時，她的驚訝自然是可想而知的了。在書中她說她文革時在漢口最熱鬧的地段看過我寫的大字報，還記得其中的一句：

北斗北斗，未來幾十年的中國和世界，將誰主沉浮？！

這其實是我那年起草的《北斗星學會宣言》的結尾，是後來被批得最厲害，被說成是「反革命復辟的公開宣言」的一句。而這位當年才十幾歲的女學生卻說，「那般激揚的文字一下子就把我的魂都勾起來了。」

接著她寫道：「有時歷史人物就坐在我們對面，今天看到媽媽筆記本上的形勢報告，我就想起了閱覽室裏的那個下午，怎麼沒有問問他，你被關了幾年？在裏面你都想了些什麼呢？」

我從什麼時候開始在人們眼裏變成了「歷史人物」呢？這究竟是可笑還是可悲？其實我是承擔不起「歷史人物」這個稱謂的，我不過是現代迷信祭臺上一個微不足道的祭品而已。只是，她當時如果真的問起我來，我大概是不會諱莫如深的，事實上我那時正有一種向人傾訴的欲望：

我很早就想向你講述那遙遠的往事，  
那時人與人像狼一樣彼此撕咬吞食；  
但我又耽心你那汪潔如明鏡的心泉，  
是否適於迴盪那段血腥恐怖的歷史。

我很早就想向你傾訴我內心的苦難，  
我的青春一直是在地獄的深淵輾轉；  
但我又耽心你那根柔若游絲的心弦，  
是否能夠經受得了那種靈魂的震顫。

後來我寫給一位女孩子的詩的這前兩段，也多少代表了我那時的一些心態。

這位唐大將軍的外孫女在她的書中，還引用了不少她母親的文革筆記中有關我的片段：「刹住妖風，現行反革命分子魯禮安逮捕了……受到深刻教育。飛雪迎春到，70年代來到了……」

七十年代？在我的生命中，是無所謂七十年代不七十年代的；飛雪迎春？但我一點也感覺不到春天的到來。雖然詩人雪萊說，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但對我來說春天實在是過於遙遠，整個七十年代我都是在嚴寒中度過的。陰冷黑暗的單人牢房中，不可能聞到春天的氣息。近十二年的光陰，牢籠成了埋葬我青春歲月的墳場。

在這座青春的墳場裏，我常常會想到死，無數次地想過如何結束自己的生命。在那無窮無盡的沒有任何希望和光明的時間隧道裏，死或許是擺脫孤寂、痛苦和絕望的一種選擇。但死真的就能一了百了麼？我不能想像我的父母一旦得知我在獄中「畏罪自殺」後，精神上如何能承受得了，他們如何有力量背負著無法擺脫的沉重感情枷鎖去度過殘生。古希臘哲人伊壁鳩魯說，「死並非死者之不幸，而是生者之不

幸。」我給我的親人招惹的災難已經夠多夠沉重了，我不能、也沒有權利再給他們添加新的不幸。我的父母、親人，還有許多的朋友、同學，都希望我活出來，我怎能輕視自己的生命呢？「這世上只要還有一個人為我好，希望我活下去，我就要活下去。」魯迅先生的這句話，給絕望彷徨中的我怎樣巨大的活下去的勇氣啊！

支撐我活下去的另一個力量，是我漸漸恢復了對自己的信心。我從最初入獄時的自認罪孽深重、死有餘辜的誠惶誠恐中慢慢清醒過來。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我終於相信自己其實並沒有犯什麼罪，這實在是一個漫長艱難的蘇醒過程。人生應享有思想和言論的自由，一個國家的公民怎能僅僅因為對另一個公民，那怕是這個國家最偉大最優秀的公民有所議論，便要被剝奪掉應享有的一切公民權利而宣判有罪呢？黨的幹部是人民的勤務員，黨的領導人如他們自己所聲稱的，都是普通勞動者，除了分工的不同，本身並沒有任何與眾不同的特權。那末黨的最高領袖也應當與黨的其他領導人等同視之，也不應享有任何與眾不同的特權，為什麼就絲毫不能批評呢？不准批評，是不是正是一種特權呢？過去羅馬教廷的教條中，曾有一條稱「教皇永無謬誤」，難道也打算在「無產階級的領袖」的身上，貼上「永無謬誤」的標籤麼？

但問題還不僅如此。權勢者在以惡毒攻擊偉大領袖的罪名將我投入監獄後，仍不甘休。因為他們比誰都明白，其實並不存在什麼「惡攻」的確鑿證據，於是進一步落井下石，製造罪證，竟黑了良心要在我頭上挖出一個「反革命地下組織」。他們將幾個所謂的「國民黨反動將領」、「國民黨老牌特務」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強加到我的頭上，誣告我是受這些「黑後臺」的操縱控制。這些權勢者和中央的某些人沆瀣一氣，炮製出一份所謂的「中央指示」，然後以此作為尚方寶劍，刑訊逼供，屈打成招，把省內成千上萬的無辜群眾打成這個「反革命地下組織」的成員，喪心病狂地製造了一起駭人聽聞的大冤案。

後來，也就是七一年，距「反革命地下組織」案炮製出籠僅兩年，隨著林彪反革命集團被揭露，那個一手遮天製造這個「反革命地下組織」的林彪死黨也下了臺，事情似乎有了某種轉機。然而曾由林彪死黨一手控制的那個「專案組」，卻仍然頑固地堅持他們舊主子的立場，聲

稱「你們這個案子不是一兩個人定的，是經過了毛主席黨中央批准的，誰也休想推翻！」。其實我哪敢去想「推翻」什麼呢？一個身陷囹圄被剝奪了一切權利和自由的囚徒，又能去「推翻」什麼呢？但我從曾經權傾朝野、翻雲覆雨的林彪及其死黨的覆滅中，看到了歷史的辯證法的力量。我寄希望於歷史，堅信總有一天歷史將宣判我無罪。我就是靠著這個信念活下來。

中學時候讀過一本詩集，依稀記得其中有這樣一句：

歷史很忍耐地傾聽著受迫害者的呼聲。

武昌民主路監獄看守所的牢牆呀，你該記得我，記得我這個當年書生氣十足戴眼睛的學生。你該記得我是怎樣在這裏消磨掉了我全部的青春年華，埋葬了我年輕時曾懷抱過的理想和抱負；記得我在漫長歲月裏對我父母親人的徹骨的思念和牽掛；記得我枯坐終日的愁苦、徹夜不眠的長歎；你還該記得我在看守淫威下的顫慄和恐懼、記得我在橫遭毒打時淒厲而無告的呼號。

牢牆呀，你還應該記得我入獄第八年的除夕深夜，我跪在地上，面向蒼天和大地發過的一個誓言。我發誓今生今世，只要能活著走出這口活的棺材，就要說出這些年來所遭遇的不公正，說出這樁大冤案的真相。雖然漫長的獄中歲月毀滅了我學生時代曾有過的夢想——把自己造就為國家棟樑之材的夢想，但活埋在地底多年，經受了巨大苦難的煎熬與磨練，我可以成為一塊煤、一塊能燃燒的煤。用煤的火焰去洞照那一段暗無天日的歷史，讓後人知道我們這一代人曾經遭受過怎樣慘烈的苦難，不也是一件有意義的工作麼？

有一位詩人在一首題為「煤的對話」的詩中寫道：

你從什麼時候開始沉默的？  
——從恐龍統治了森林的時代，  
從地殼第一次震動的年代。

你已死在過深的怨憤裏了麼？  
——死？不、不，我還活著；  
請給我以火，請給我以火。

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沉默的？是在埋入鐵山深井的那一個夜裏，還是在入獄的那個傍晚？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沒有死在過深的怨憤裏，我還活著。依然沸騰的一腔熱血和少年時懷抱過的夢想是一粒火種，它能夠使我燃燒，做那件我在獄中發誓要做的事。

我不再沉默。

畢竟恐龍統治森林的年代已經過去了。



## 第二章

# 少年心事當拏雲

我一向認為自己「生不逢時」。倘早生一年，我就能以「抗戰勝利的果實」自誇，而要是晚生兩三年呢，又可以「和新中國一起誕生」自誇，反正我是生得不早不晚，一頭都夠不著。我唯一能聊以自慰的，就是我也算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人——不是有句話說「新舊社會兩重天」嗎？我似乎有資格向解放後出生的幸福一代，講一講「舊社會的痛苦」和「新社會的幸福」。只可惜我在舊社會才呆了三年，就稀裏糊塗從一重天跳到了另一重天，對於舊社會的感受，幾乎是一片空白。就說流行歌曲吧，我連「何日君再來」或「毛毛雨」、「夜上海」這些舊社會裏紅遍半邊天的歌子，都全無印象，至於像如今的小青年個個成天掛在嘴邊上的那些港臺「靡靡之音」，我那時當然就更是聞所未聞。等我能記事時，滿世界唱的，就都是「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樣的革命「流行曲」。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參戰的次年，我還不滿五歲，讀幼稚園的小班，曾參加過一次在市委大禮堂舉行的慰問志願軍傷員的文藝演出。那次我們幼稚園合唱隊上臺演唱的歌曲，就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還有一首「你是燈塔，照耀著黎明前的黑暗」，當然也是歌頌共產黨的，而我非常榮幸地擔任了我們幼稚園合唱隊的小指揮。

那是五一年的六一兒童節，慰問演出在市府禮堂舉行，省市黨政要員，各界人士，還有許多從抗美援朝戰場回國的志願軍叔叔，觀看我們的演出。我們幼稚園的節目表演完後，輪到別的幼稚園的小朋友上臺。但是糟糕了，他們的小指揮臨場怯陣，渾身顫抖，手都舉不起

來。稀泥巴糊不上牆，兄弟幼稚園的老師急得團團轉，無奈中只好向我們幼稚園求救。救場如救火，我又一次登臺指揮。演出結束後，我受到大家的稱讚，誇我指揮得不錯。其實那種指揮再簡單不過了，無非兩手交叉著揮動而已，關鍵是看你有沒有膽量，敢當著一禮堂人的面站出來。而我最不缺的，恰好就是膽量。

我在小朋友中的真本事其實是畫畫，我特別喜歡到處信筆塗鴉，用彩色粉筆描繪我心目中的大千世界。我家的地板和幼稚園的教室裏的黑板，便是我練筆的畫板。汽車飛機、坦克大炮；山川河流、房屋樹木；以及花草蟲鳥、人物肖像，我什麼都畫，就連毛澤東和斯大林的肖像，都要試著畫它一回。斯大林的嘴唇上，兩邊翹起八字形的小鬍子；毛澤東則是特別的髮型，加上下巴上一點痣，特徵大抵如此，畫起來總不會離太大的譜，反正也不會有誰挑剔，更不會有人打小報告說我醜化領袖。那時的「創作環境」很寬鬆很自由，而我的畫技也就「日臻完善」，有一幅作品甚至被幼稚園推薦到北京，參加全國少兒繪畫展覽，很出了一陣風頭。

除了繪畫之外，我還是幼稚園中有名的飛毛腿。那時小朋友中興玩一種遊戲，叫「官兵捉強盜」。我最愛扮逃避「官兵」追捕的「強盜」，逃起命來飛一樣快，「官兵」們要捉住我可不那麼簡單。後來短跑就成了我學生時代的運動強項，我在大小各種比賽中頻頻奪冠。但我這個靠當「強盜」起家的快腿，最後終於沒能逃脫「官兵」的追捕，不過那已是另一種政治遊戲了，我對那種不夠「費厄泼賴」的遊戲並不擅長。

我學生時代擅長的除了體育、繪畫外，也許還有歌唱。我讀小學時，學校馬路對面是市裏的廣播電臺，電臺裏有一個少年兒童廣播合唱團，我對這個合唱團一直心馳神往。近水樓臺先得月，我們學校裏好些同學，都被老師推薦進了這個合唱團，我卻一直得不到推薦的機會。我們的音樂老師姓郭，一個非常端莊文靜的麗人，她稱我母親師母，因為解放前這位漂亮的富家小姐，曾經是我父親補習過的學生。郭老師與我母親都在這所學校任教，關係自然不錯，之所以不推薦我，自有她的理由。何況我為什麼為這點小事怨她呢？她的日子過得並不輕鬆。她的原來同在學校教書的丈夫，因歷史問題被抓走，判了二十年徒刑。她孤苦一人，還得拉扯四個半大不小的子女，其艱難

可知。聽母親說，她丈夫判刑後，便不斷有人勸她與丈夫離婚改嫁，以示與當過反動軍官的丈夫徹底劃清界線。但郭老師不為所動，堅決要等她的丈夫刑滿回來，其對丈夫忠貞不渝的感情，實在令人欽佩。

少兒廣播合唱團的門檻雖然進不去，卻另有地方向我敞開了大門。那一年省戲曲學校京漢楚三劇種聯合招生，專從小學四年級學生中挑選學員，我以出色的嗓音被戲校來我們學校招生的老師挑中。一個年級這麼多學生，連少兒廣播合唱團的團員都沒被挑上，卻挑中了我一個人，我自然十分得意。但父母思想守舊得很，特別是父親，受所謂「世上有三醜：王八戲子吹鼓手」的偏見的影響頗深，從他工作地深圳打回電報，堅決反對我去戲校學戲。我自然是聽大人的話的，便斷了學戲的念頭。

我就一門心思好好讀書，但一門心思讀書也不合潮流。那正是大躍進的年代，全國人民都在鼓幹勁、爭上游，「超英趕美」和時間賽跑，連我們小學生都走出課堂，到龜山挖觀音土，到江邊挑鐵礦石。街道兩旁一座接一座的小土爐、小洋爐，則把從各家各戶收來的破銅爛鐵都吞進去「大辦鋼鐵」。一到晚上，大街小巷到處爐火熊熊、鐵水滾滾，遠遠看去，頗像「三國演義」中陸遜的「火燒連營」，煞是壯觀。我母親作為學校的老師，和學生一樣廢寢忘食地投入「大辦鋼鐵」中，後因勞累過度，舊病復發，吐血不止，卧床休息了一年。

父親惦念母親的身體，通過在武漢工作的以前的老同事幫忙，從深圳調回了武漢。父親解放前是江漢關的職員，武漢解放那年，隨大軍南下參與接管廣州粵海關，不久又赴深圳參與接管九龍海關。以後十年的時間，父親都在九龍海關工作，只是每年過年時才回家一趟。父親當年隨軍奔赴深圳時，深圳還只不過是個南方的邊陲小鎮，生活條件非常艱苦。從父親當年在深圳拍攝的照片上看，那地方偏僻荒野，大海石山之間，散佈著一些小小的漁村。父親工作兼住宿的鯊魚湧支關——那是內地物資運往香港的必經之地——就設在一個簡陋的民房之中，誰能想到新中國的九龍海關正是濫觴於此呢？

許多年後我出差深圳，面對巍峨的九龍海關大廈，就會想到父親當年拍攝的那些照片，那記載的其實是共和國一頁珍貴的歷史，是時代變遷的生動記錄。文革之初我被打成「狗崽子」，飽受欺凌，我的家

也被「紅五類」們一次次地查抄，但這些珍貴的照片卻居然有幸保存了下來。文革後在落實幹部政策時，正是這些無可置疑的「歷史照片」，促使父親單位的人事幹部前往廣東，從原粵海關的老檔案中，查到了我父親當年隨軍南下的原始資料，從而確定了我父親的「革命幹部」身份。我那時就想，倘文革中我就有這樣一位「革幹」的老子，我豈不也將混跡於「革幹子弟」之列，以「紅五類」自居麼？我會不會也披套舊軍裝在身上，手裏揮動帶銅頭的軍用皮帶，狂叫「老子英雄兒好漢」，在「狗崽子」面前耀武揚威呢？

其實說實在的，我既不是什麼「狗崽子」，也算不得什麼「革幹子弟」，我不過是出生在一個極普通的小知識份子家庭的「平民弟子」，出生時全家就住在漢陽鄖家大巷貧民窟的一間小屋子裏。父親倒是大家庭出生的「少爺」，祖輩是當官的，但家道中落。父親高中畢業時已無力再進大學，靠當小學教員為生，後來就與也是在小學教書的母親結了婚。母親生我那年，我上面已有了個大我三歲的姐姐，上頭還有兩個老人須贍養，一大家人的生活，就靠我父母微薄的薪水維持。本來就生計艱難，父母親又同時失了業，為維持生計，父母便在家裏給有錢人家的子女教補習。教補習的收入甚少，三餐亦難以為繼，頭髮鬍子老長的父親，要等從漢川鄉下趕來的岳母，也就是我的外祖母，我們武漢人叫家家的塞兩毛錢，才能去剃頭鋪理個髮。理完髮父親在經過城門洞時，在城牆上貼的一則破爛殘缺的報屁股頭上，看到一則江漢關招收兩名辦事員的廣告，父親想碰碰運氣就去報了考。考試由洋人親自主持，要求很嚴，無「後門」可走。筆試之後是面試，與洋人直接對話，結果父親因在教會中學讀書時英文功底扎實，從二百多名考生中脫穎而出，成為海關的一名職員。

父親考進海關後，仍和過去一樣謹小慎微，少言寡語，從不招惹是非。父親生性膽小怕事，一生與世無爭，不管到什麼地方，父親都是公認的老實人、大好人，可以說有口皆碑。但是與父親一母所生的叔父卻與父親的性格正好相反，頑皮好動，從小就不安分，當學生時就常在舊武漢的報紙上發表褒貶時事的「豆腐塊」。解放後叔父經過短期培訓，去一個叫鐘祥的縣裏當了一名「稅官」。叔父在那裏仍不安分，在舉國上下都在發高燒、害熱昏症搞「超英趕美」的大躍進時，公

然跳出來與革命人民唱反調，結果被打成了右派。叔父小名「鶴子」，三十多歲了還未成家，自參加工作後，每月必按時給他的娘也就是我的祖母寫封平安家信，並匯筆贍養費。但是自打右派後，叔父就再無贍養費寄給他的娘了。祖母就罵叔父不講孝順，說人家是娶了媳婦忘了娘，鶴子不娶媳婦也忘娘，祖母要到鐘祥去找鶴子算賬，但是被我父母勸阻了。父母對祖母說鶴子是響應政府的號召下鄉支農，下鄉期間單位只發生活費，所以暫時寄不回錢來。但祖母還是想不通，說下鄉支農難道連薪水也不發了？祖母自然不知道，鶴子其實是被單位開除公職，送到鄉下勞動改造去了。

據姑媽說，叔父被打成右派是因為他從鄉下收稅回單位後，竟敢散佈反動言論，胡說鄉下的收成並不像報上宣傳的那樣好，說到處都在搞浮誇，高估高徵，農民很苦，許多地方餓死了人……叔父為什麼要說這些胡話呢？像我們這樣一個社會制度無比優越的國家，又怎麼可能有餓死人的事發生呢？叔父散佈這樣的右派言論，不明擺著是給黨和政府臉上抹黑麼？被打右派實在是罪有應得。這一點連叔父自己在打成右派後也認識到了，他在鄉下的茅棚裏寫給我正念初中的姐姐的一封信中說，「我不該說鄉下餓死了人，不該誣衊農村的大好形勢。我一貫都好自作聰明，說話不顧後果，才墮落為可恥的右派，我好悔呀！」然而大錯已經鑄成，叔父再怎麼後悔也遲了。下鄉不到一年，叔父患上水腫，窮鄉僻壤無醫無藥，誰管一個右派的死活呢？叔父自然只能等死。叔父在鄉下的茅棚裏咽下最後一口氣時，他還懷有對生的眷顧，對親人的思念嗎？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叔父死時還不滿三十五歲。

叔父已不在世上了，叔父的信，哪怕是隻言片語，祖母也永遠收不到了。白髮人送黑髮人，這是怎樣悲痛的事，我們全家人只能向祖母封鎖叔父的死訊。但叔父久無音訊這件事卻瞞不了祖母，她每天都癱瘓地等在家門口，看郵差有沒有送叔父的信來。父母也曾模仿叔父的口氣，寫了封信託郵差送給祖母，大字不識一個的祖母把信顛來倒去地看了又看，搖頭說這信不是鶴子寫的。祖母後來就望著遠處發呆，不斷地囁嚅說鶴子怎麼了？鶴子怎麼了？鶴子怕是不在了……那神情淒慘慘的，就像祥林嫂在叨念她被狼叼去了的阿毛。再後來祖母

就不吃不喝，說是要跟鶴子一起去，要去照顧鶴子。不久祖母就駕鶴而去了，死時骨瘦如柴但神色異常安詳，祖母終於可以去黃泉路上追尋她愛子的亡靈。

後來在牢房裏我常常會想起這段辛酸的往事，從叔父當年的下場，想到我自己的遭遇，並因此黯然神傷。叔父一生未娶，把我們姐弟倆視為自己的兒女，每月都要寄些「少年文藝」、「中學生」和「連環畫報」之類的期刊給我們閱讀。我對文學的愛好，可以說最初就是從這些雜誌中滋生出來的。叔父好說話，喜歡議論天下大事，而我也是特別好說話、好議論，而且還要辦什麼報紙，對政治說三道四，和叔父一樣，全不懂「禍從口出」的道理，我當然只能步叔父的後塵。我懷疑這是否就是一種在劫難逃的宿命。然而在當時，我對叔父和祖母的死卻並無特別的傷感，我還不太懂事。叔父直言賈禍之時，我正隨同學校的紅領巾宣傳隊，在大街上高唱那首《社會主義好》的歌曲呢：「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江山人民保。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而從來就不曾要去「反」什麼，卻照樣被打右派不誤的叔父，此時正躺在他棲身的那間茅棚裏奄奄一息。叔父咽氣前未必會想到我會在大街上唱什麼社會主義好，他也許會想到我這個一直受他關愛的侄子該進初中念書了。

我進的初中是離家不遠的市十二中。入學不到一個月就是國慶十周年的大典，校文工隊在著手排練一個大型的詩歌朗誦。詩朗誦需要一批群眾演員，我自告奮勇報名參加演出。一首題為《祖國頌歌》的長詩，油印了許多份，分發給我們每一個隊員，要求一周之內必須背熟。我於是課前背、課後背、路上背、回到家裏也背：「從昆侖山到東海之濱，從五指山到萬里長城，我們偉大的祖國，到處都在激蕩著大躍進的歌聲……」然後是澎湃的激情：「啊，我的一顆心呀……」這時正在燈下批改作業的母親，忽然注意到我的朗誦了，她掉過頭來瞥了我一眼：「你念些什麼？我的一顆心呀……下面還有呢？是不是還有我的一顆肝呀？」「這又不是我寫的，」我臉漲得通紅，「媽媽，這是我們學校迎國慶要演出的詩朗誦。」「嗯，你念吧。」母親不再說什麼，仍然批改她的作業，但我卻像迎頭被潑了一瓢冷水似的，再也提不起興致。

但是詩朗誦突然宣佈取消，文工隊將縮編為話劇隊。我們這些群

眾演員各自遣散回班，排練自己班上的節目，準備參加學校的國慶會演，我於是離開了文工隊。準備多時的詩朗誦尚未上臺就夭折了，這多少有些讓我失望，但我並不氣餒，和班上幾位男生決定自己排演一幕活報劇。劇本由我執筆，題材取自國際時事，是諷刺抨擊美英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那幾年為聲援埃及人民收復蘇伊士運河的鬥爭，街頭常有這類活報劇演出。我們貼上紙糊的高鼻子，戴著英國式的甲殼蟲禮帽、法國式的圓型帽和美國式的高帽子，套件從家裏翻出來的舊西服，揮舞著文明杖，口中念誦著我編寫的快板詩，發出狂妄的戰爭叫囂。一時群魔亂舞，張牙舞爪，當然結局是在世界人民的打擊下灰溜溜地滾下了歷史舞臺。

這是我頭一次嘗試文藝創作，我相信這個活報劇還是編得很吸引人的。就在我們在學校的小禮堂裏彩排時，一群也在小禮堂排演節目的高中同學，被我們的表演吸引了過來，說：「才初一的學生就編劇本了，真是了不起！」得到大哥哥大姐姐們的稱讚，我們真的很高興。但是且不要高興得太早，教我們語文的黃老師，是學校會演組委會負責把關的，她說我們這種活報劇街頭演演還是蠻可以的，上舞臺演就不大合適，一句話就把我們的作品給斃了。「胳膊扭不過大腿」，我們只好聽老師的安排，極不情願而又萬般無奈地去跳由黃老師親自輔導的一個俄羅斯民間舞蹈。這個俄羅斯民間舞蹈自然是不錯的，可惜難度太大，我們完全是「趕著鴨子上架」，當然就更談不上跳出「俄羅斯」的味來，在會演中只能是名落孫山。我們私下抱怨說：要是讓我們自己創作的活報劇上臺，沒准會給班上拿個大獎呢！

我們不久就等來了一次機會，這年的年底，學校又組織了一次迎新年的文藝演出。我這回又創作了一個「雙簧」，就是一人坐在椅子上做動作，另一人躲在椅子背後說臺詞，動作與臺詞必須配合一致，要讓人感覺到是前面的人一人在邊說邊做。我們這個雙簧表現的是美帝國主義妄圖稱霸世界的狂妄野心，及妄想破滅時的無奈。班上一位叫張言公的同學，生就一付以前有名的笑星關宏達似的體形，十足的大人物一個，就在台前表演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我則躲在椅子後頭學美國總統說話。我們苦苦練習了半個月，配合十分默契。那時那位教語文的黃老師已經不再任我們班上的課了，而班主任和其他老師，都

支持我們上臺「試一烙鐵」(湖北方言：試一傢伙的意思)。於是新年晚會上，我們倆就上臺試了一烙鐵。

晚會那天臺上臺下氣氛極好，張同學發揮超常，將一個美國總統的醜態，表演得淋漓盡致。他那極誇張的動作，令人捧腹的面部表情，再配上我摹仿美國佬的洋腔洋調，傾倒了全場師生。叫好聲、喝彩聲、鼓掌聲不斷，幾乎掀動了禮堂的屋頂，演出的成功實在出乎我們意料。最後經評委評定，我們這個雙簧，和另一個由校話劇隊演出的話劇「群猴」，作為我校的推薦節目，參加春節期間在武漢劇院舉行的全市中學生文藝匯演。謝天謝地，我們總算為我們班級，也為我們自己爭得了一份殊榮。

我們代表學校參加過匯演後，像英雄般凱旋回到班上。我學習成績一向拔尖，品行端正，是學校少先隊大隊部的大隊委，這次又為班級爭得了榮譽，不但很受老師和同學青睞，年級的團組織也主動找上門來，要我填寫入團申請書。我受寵若驚，趕緊填好入團申請遞上去。然而遞上去後便如打水漂似的，再也見不到下文。向班主任打聽，是叔父的右派問題，卡住了我的「進步」。我對此也無可奈何，叔父當年打不打右派，豈是我能左右的？不過班主任對我倒是一點都不歧視，這位教體育的年輕女教師剛參加工作不久，正需要一幫子像我這樣的學生，來支援她的班主任工作。有時一些屬於她分內的工作，她也要我幫她做，我自然也樂意效力。

記得有個星期六的下午，輪到她在學校圖書室值班，要登記一大堆新書，並且給書一一貼上標籤，她便喊我去給她幫忙。我們在圖書室一直忙到下午四點，工作還沒有做完。她開始焦急起來，不時地看錶，顯然是有個週末的約會。「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眼看黃昏就快到了，女教師坐立不安是很自然的。窗外日頭步步西沉，圖書室的光線漸漸黯淡下來。老師就說有點急事先走一步，把圖書室的鑰匙留給了我，要我把書全部登記完後再鎖門回家。承蒙老師如此信任，我自然無二話可說，就一個人聚精會神地工作起來。

不久大功告成，看牆上的鐘還不到五點，我就開始瀏覽書架上的圖書。與後來我到過的圖書館相比，這所中學的圖書室的藏書，實在是微不足道，但在我卻是第一次感到自己走進了書的世界。我一架書

一架書地看過去，就像《一千零一夜》中的那個阿里巴巴走進了藏寶的石窟一樣，在寶藏面前眼花繚亂了。高爾基形容他對書的渴求時說：「我撲在書本上，像饑餓的人撲在麵包上一樣」，而現在是麵包太多了，我卻不知道究竟撲在哪塊麵包上好，而把每一塊麵包都抓起來啃一口也是不可能的，我只好進行選擇，最後我的目光落到了《牛虻》這本書上。

我是從蘇聯英雄卓婭的母親寫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中知道《牛虻》這本書的。卓婭問她的母親：

「我什麼時候可以讀這本書呢？」

——「等你到了十四歲的時候。」

現在我也快到這個年齡了，也應該看看這本曾經讓那位蘇聯英雄和她的母親都為之流淚的書，於是我就從書架上抽出一本讀起來：

「亞瑟坐在比薩神學院的圖書館裏，正在翻查一大疊講道的文稿。這是六月裏一個炎熱的傍晚，所有窗戶都敞開在那裏……水果販子在街道上大聲喊叫，草莓子啊，草莓子啊……」我很快就沉浸在《牛虻》所講述的故事之中。時間在不知不覺地過去，我幾乎忘記了時間和周圍的一切。從這天起，在盧嘉川、江姐、斯巴達克斯、保爾·柯察金和丹娘這些英雄之後，我又認識了一個叫亞瑟—雷瓦士—牛虻的英雄鬥士。那個歷盡苦難而堅韌頑強的亞瑟，那個病著一條腿臉上有刀疤的勇敢的牛虻，在我少年的心裏留下了極深的永難磨滅的印象。那天走出圖書室時，頭頂上已是一片星漢燦爛，但我突然覺得那浩瀚的天穹裏，是人類的群星在閃耀。

我課餘時間開始頻繁地去圖書室借書，初中三年裏，我從這個小小的圖書室裏借閱了不少的中外名著，在精神食糧方面從未感到過欠缺。我那時欠缺的是填肚子的物質食糧——我畢竟是個大俗人，又正是長身體的時候，飯量奇大。雖說政府特殊照顧我們學生，給我們每月的口糧有36斤，這個定量比我在航道局機關工作的父親整整多了9斤，但我仍然成天覺得餓。究其原因是菜蔬太少，而且菜裏見不到油水，肉更是難得有，常常是「三月不知肉味」。據政府說肉豬都運往蘇聯還債去了，連豬尾巴都是整車皮整車皮地往「老修」那邊拖。政府還說國家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然災害，莊稼欠收，糧食減產，所以老百

姓要捆緊腰帶，準備過幾年苦日子。政府的話自然總是不會錯的，日子苦點就苦點唄，何況聽說連偉大領袖毛主席都不再吃肉，正與人民群眾「共患難」呢，像我們這種平頭百姓還有什麼好抱怨的呢？

後來副食店裏有「高級點心」擺上玻璃櫃檯了，餐館裏也有了所謂「高級肉絲麵」。可是這類「高級食品」的價格也高級得很，只是供給少數「高級人」比如當官的、當大教授的解饑，像我們這種家大口闊收入又不多的小百姓哪能問津？荷包稍微鼓點的家庭，雖然也吃不起「高級點心」或「高級肉絲麵」，但是可以晚上偶爾上街去，喝一碗小攤子上賣的蘿蔔湯。蘿蔔湯三毛錢一碗，雖說貴是貴了點，但碗裏不但有蘿蔔，還能撈到一兩片肉，也算是物有所值了。然而有一天據說有人在撈蘿蔔湯裏的肉片時，竟然從湯裏撈出了人的指甲和毛髮，就是說有些湯販子賣的竟是「蘿蔔人肉湯」——那個大饑荒的年頭，「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悄悄搞點把死人肉來熬蘿蔔湯，還真不算什麼難事——進一步的消息傳來說，賣人肉湯的小販已經被公安局逮捕了，而且被抓的還不止一個。言之鑿鑿有鼻子有眼的，在居民中引起了一陣不小的恐慌。特別是那些在小攤子上喝過蘿蔔湯的人頓時感到噁心極了，有的一聽到這個消息就嘔吐起來，還有些人就趕快跑到醫院去洗腸。

母親本來答應我，只要期末考試考了年級的前三名，就帶我去街上喝一碗蘿蔔湯的，此時也只好免了。雖說後來獎賞了我一個荷包蛋，但小小一個荷包蛋，怎麼能和一碗能撈出肉片的蘿蔔湯相比呢？我就很失望。我甚至懷疑那些關於「人肉蘿蔔湯」的傳聞，都是一些別有用心的傢伙造出來的。不是有個寓言說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說葡萄是酸的麼？有人吃不起蘿蔔湯，就造謠說蘿蔔湯有問題，多半是這樣。只可惜流言所至，手裏就是握有幾毛錢，也滿大街都找不到賣蘿蔔湯的了。「三年困難時期」沒能喝上一碗蘿蔔湯，成為我心中一個永遠的遺憾。

這不能怪我嘴饑，我讀初中的那幾年裏實在是太差營養了，叫我一個十三四歲正長身體的半槽子仔如何不饑？那時父母一早就出門上班，中午都在單位吃食堂，照例是不回家的。上班前給我預留的午飯，除一鉢四兩的蒸飯外，就是一大罐子醃菜。我通常是把鉢子裏的

飯吃一半後就拌醃菜，將半鉢飯拌得滿滿的又是一整鉢，再吃一半後就再拌一次，這樣我中午就等於吃了三鉢飯。但醃菜在肚子裏刮油水，完全不經餓，甚至吃得越多餓得越快。

我就很羨慕鄰居家的孩子，他們的大人在進出口公司做事，從倉庫裏可以弄些花生餅回家當副糧。花生餅本來是供軍馬場喂馬的飼料，但困難時期也不管它是馬料還是豬料了，能填肚子的就是好料。花生餅是花生榨過油後壓成的餅渣，吃一點點到肚裏就會發脹，所以也不能多吃，但有的人家的小孩不知道厲害，見了花生餅像見了寶，一頓猛吃就脹死了。那時農村裏也有脹死人的事，那是吃了觀音土拉不出來脹的，但更多的農民是餓死，整村整村的人死光了都不稀罕，也不知道餓死和脹死究竟哪種更難受。後來有學者著文說，我們中國的農民的「社會主義覺悟」很高，困難時期「以大局為重」，寧可餓死，也不去搶國家戰備糧庫的糧食，云云。學者的話自然是不錯，但是我想這種「學者」要不就是三年自然災害過後才出生的幸運兒，要不就是困難時期能在「內部特供商店」買進口罐頭，或上高級餐廳吃「高級肉絲麵」的權貴。他肯定不知道饑餓是什麼滋味，馬上不知馬下苦，飽漢不知餓漢饑，所以站著說話不怕腰疼。

再說我那個時候，儘管總是欠吃，但學習上可從來沒有落過人後。班上就不用說了，我的成績就是在年級裏也是數一數二的。但我在課堂上並不很用功，時間多用在讀課本外的「閒書」去了。學校的校長余正銘，聽我的班主任說到我的情況很有興趣，要班主任瞭解一下我這個學生，為什麼不很用功卻成績拔尖，要總結總結經驗。其實我哪有什麼經驗，我不過是肯動腦筋，摸索出一些學習的「竅門」罷了。

比如在記憶基本知識方面，我很少死記硬背，總是儘量想法將枯燥的內容轉變為生動的形象來記。像門捷列夫的「化學元素週期表」，同學們一般要背好久才記得熟，我用我的辦法一下子就能記住。我把週期表中排列的元素，編成了諧音的五言詩，例如「鈉鉀鈣鎂鋁，鉻錳鐵鈷鎳」這順序排列的十個元素，在我這裏就變成了「那家皆美女，岳母貼姑爺」，當然好記了。再比方地理中珠穆臘瑪峰海拔8848米，這8848米高不可攀，於是在我這裏就成了「爬爬死爬」。長江全長6300公里，我就想像長江邊有座廬山，老是下雨，成天雨濛濛的，也就是「廬

山淋漓」了。再比如歷史中的年代記憶，我幾乎全用諧音。秦始皇統一中國是在西元前221年，秦王朝苛捐雜稅，搜刮民脂民膏一點都不放過，我就將221諧音作「兩兩要」；秦末大澤鄉起義是發生在西元前209年，我就記作「二領九」，陳勝吳廣兩個人領導九百個戍卒起義，不正是二個領導九百個嗎？還有昭君出塞是在西元33年，我就記姍姍來遲一詞中的「姍姍」二字就行了。這種記憶法可以讓人輕而易舉地記住要記憶的內容，且恆久難忘，也就難怪我在學習上能事半功倍。

初中畢業時，學校動員我第一志願就報十二中，並且許諾升入高中部後，讓我當什麼「學宣部長」。但我並不領情，我想去所離家遠點的學校住讀。早就聽說武昌那邊有所省重點叫武昌實驗中學，師資雄厚，英才薈萃，是全國都排得上號的名牌中學，素有大學搖籃之稱，我遂在第一自願填報了這所「實驗」的高中。

中考結束後我隨母親去漢川，在外婆家逍遙自在了一個月。不久接到父親的信，說我已被實驗中學錄取，於是我們又趕快趕回武漢，回十二中取錄取通知書。通知書中還附帶一份署名學生會的「致新同學」的歡迎詞，什麼「這裏將綻放你十六歲的花季，開墾你稚嫩的心田，將你送上人生的起跑線」；什麼「紅石道上，將會響起你朗朗的讀書聲；運動場上，將騰躍起你矯健身影」，寫得精彩極了，真不知是出自哪位才子之手，而最後一句更是熱情洋溢的呼喚：「來吧，讓我們攜手同剪西窗燭，共做鳳凰山下的小主人。」我就極想馬上去實驗中學報到，去看看那紅石道、那鳳凰山、那運動場，那裏的宿舍、教室和圖書館，自然，還有新的老師和同學。

上學的日子終於盼到了，我背一副簡單的行李過江，找到武昌解放路一個叫「西卷棚」的小巷，聞名遐邇的武昌實驗中學，就藏在這個小巷內。西卷棚前清時是設科舉考場的地方，巷內一塊石坊上鐫刻的「唯楚有才」幾個字，還依稀可見，讓人想像當年學子如雲、科場爭雄的盛況。如今昔日的考棚早已蕩然無存，我所看到的是一座已有五十年歷史的寬敞幽雅、靜謐安詳的校園。從校門進去，迎面是一條寬十來步長近百米的小道，全部由紅石鋪成。道路兩旁林木森森，遮天蔽日，路邊還有老井一口，井水清可鑒人——這就是學校有名的紅石小道。那被腳步磨得鋥亮的紅石，那搖曳的參天古樹，讓人想到歷年

來曾有過多少學子在這裏漫步與晨讀。紅石小道至一山坡而盡，拾級而上是學校的禮堂兼健身房，其背後是學生宿舍以及運動場。運動場不算大，二百五十米的環行跑道，環抱著一片橢圓形的草地，一座雖不巍峨但還別致的鳳凰山就在一旁俯瞰著這片草地。草場的另一端是學校的教學區，幾排青磚紅瓦的老式校舍和一棟琉璃頂的辦公大樓交相輝映。此外還有一座實驗樓，是專供學生做物理化學和生物實驗的。實驗樓的樓頂還有一架大口徑的高倍天文望遠鏡，供愛好天文的同學探測星空的奧秘。

我對這個新學校的印象好極了，在校住讀更使我興奮。離開父母正好給了我鍛煉自己獨立生活能力的機會，我要努力錘煉自己，讓稚嫩的翅膀變得堅強，將來能向遠大的目標展翅高飛。

開學後不久，我就被抽到校學生會學宣部工作，還是任副部長什麼的。「同事」中有一位叫施婷婷的女孩子，高我一屆，是學校黑板報的主編。聽頂頭上司艾部長介紹，施婷婷的父親是一所師範大學教古漢語的教授，實驗中學許多語文教師都出自其父親的門下。施深得其父家傳，筆頭十分了得，那封文采飛揚的「致新同學」的歡迎辭，就是施婷婷寫的。後來又漸漸知道，這位實驗中學公認的漂亮才女，在語言文字方面有著特殊的天賦。每學期她那年級的作文競賽和外語競賽，只要有她參加，兩項桂冠必定非其莫屬。在她橫溢的才華面前，我因考上「實驗」而自以為了不得的一點傲氣，全都付之東流。然而施婷婷在我面前一點傲慢都沒有，只是興奮地對我說：「早就聽說學校這學期要來一個能寫會畫還會編劇本的新生，我們學宣部正缺人才，就硬是把你來了。」她說這話時一付又得意又快活的樣子，臉上紅撲撲的，眼睛格外的亮，無處不透露著一種少女的慧黠與嫋媚，而且通體有種逼人的青春氣息向你撲來。直覺告訴我，那位總是笑眯眯的艾部長，在施婷婷面前似乎有點神魂顛倒。

這以後我就和施婷婷一起負責每週一期的校黑板報的出版工作。施婷婷經常在下午下課後，來喊我一道去各班約稿，然後抽時間一道審稿，每週六的下午又和我一起出黑板報。辦黑板報通常是她抄寫文章，我負責插圖，將版報辦得漂漂亮亮的，展現在下週一返校上課的同學面前。有一段時間，幾乎每天下午下了最後一節自習課，她就會

到我班上來找我，自然每次都是來談有關版報的「公事」的。久而久之，只要她的身影在我班教室的窗外一出現，班上的一些男同學就會拉長聲音，故意怪叫道：「魯禮安，找你的一來了」，就像過去戲院裏頭跑堂的吆喝「熱毛巾——來了」。施婷婷先還不大介意，後來就紅了臉，忿忿地對我說：「你們班上的那幾位男同學怎麼那樣壞，我再不去你們那裏找你了，以後我們約好每天下午第二節自習課後，就都到學生會去，有工作就在那裏談。還有，你現在功課累不累？」

我說還好，不太累。她就說要在課餘的時間教我學俄語。

學俄語？我楞了楞，感到有點突兀，於是說，「好是好，就怕學不好，我蠻笨的。」我說的是真心話，在她面前我覺得我不過是個笨蛋。

「你還笨？那天下就沒有聰明人。」施婷婷笑起來，一邊笑一邊從書包裏拿出一本俄語課本，還有練習冊、鉛筆和橡皮，非常鄭重地說：「明天就開始吧，包在我身上了。」就這樣，一段時間裏我成了施婷婷的學生。施婷婷教課非常用心，而能夠天天面對面地聽這位美麗的才女單獨對我「授業解惑」，也真是一件快意的事情。

有一天傍晚，施婷婷教我學完了新的一課，小屋裏的光線正在黯淡下來。施婷婷整理好她的書包準備離去，忽然見她又從包裹抽出一本書來，是一本裝潢精美的《拜倫抒情詩選》。

「你讀過拜倫的詩嗎？」她問我，我搖搖頭說沒有。

「那真是太遺憾了！」施婷婷搖頭說，「拜倫可是英國文學史上最好的抒情詩人啦，他的抒情短詩含蓄、凝煉，意境極為優美。」她邊說邊打開拜倫的詩集放在桌子上，和我挨著一起，身子撲在桌邊上看起來。「我看過你哭——一滴明亮的淚湧上了你藍色的眼珠；那時候，我心想，這豈不是就是一朵紫羅蘭上垂著的露……」，施婷婷邊念邊讚歎說，怎麼樣，好詩吧！還有更好的呢。說著又翻過幾頁，翻到一首《雅典的少女》，便又輕聲地念起來：我要憑那鬆開的捲髮/每陣愛琴海的風都追逐著它/我要憑那長睫毛的眼睛/睫毛直吻著你頰上的桃紅/我要憑那野鹿似的眼睛誓言/你是我的生命，我愛你。還有我久欲一嘗的紅唇……這時施婷婷的聲音突然沉寂下來，眼睛似乎是在看詩，又似乎不是。我此刻正和她並肩俯在桌邊聽她朗誦，忽然預感到要發生什麼事情了。

在一陣長長的令人窒息的沉寂之後，我感到她的右肩極緩慢地在朝我的左肩靠近，她的頭也慢慢地挨近了我的頭，我甚至已經能夠聞到她頭髮散發出的清香了。我緊張得一動也不敢動，氣都不敢出一聲，心臟怦怦地跳動著，像是要蹦出了胸腔。一個女孩子的頭和身子，與我靠得如此之近，這種甜蜜的感覺，是我這個十六歲的少年從來都沒有經驗過的；而與我耳鬢廝磨的，又是這樣一位美麗高雅的女孩子，我真想時間就在這裏凝固不動，讓這一瞬變成永恆。我渾身躁動發熱，血液彷彿在血管裏已經凝固，腦子裏一片空白，滿耳都在反復迴旋著拜倫那誘人的詩句：還有我久欲一嘗的紅唇，還有我久欲一嘗的紅唇……但是我鼓不起勇氣，我的手和腳彷彿被什麼東西捆綁死了。我想掙扎出來，然而施婷婷已經把身子挪開了，她攏了攏頭髮，背過身，反著手把詩集遞給我說，「你拿去看吧，天快黑了，我得馬上回家了。」說完，她提起書包，飛快地走出小屋，逃一般地跑遠了。

從此施婷婷只要遇見我老遠就會臉紅，她也不再單獨和我處一起教我學俄語了。我們都還太小，我們都害怕單獨處一起時會把持不住自己，鑄成大錯，而況學校的一位副校長已經在一次全校師生大會上向全體學生約法三章：

- 一個男同學和幾個女同學在一起是可以的；
- 一個女同學和幾個男同學在一起也是可以的；
- 一個男同學和一個女同學單獨在一起是絕對不可以的。

這位曾經是全國三八紅旗手的易校長說這叫防患於未然，所以施婷婷自然也就不可以再一對一地教我學俄語了。易校長的話當然與我和施婷婷無關，但也絕不是空穴來風，無的放矢。事實上有一個關係到「男女之大防」的《十日談》式的故事，已經在我們學生中廣泛流傳。據說不久前的一個星期六的晚上，易校長在女生宿舍查留校學生的鋪時，在一間只有一位女生留宿的寢室裏，發現了《十日談》裏描述的故事，正在那名女生的床上上演。易校長怒不可遏卻又無可奈何，因為床上的一對少男少女，都是從印尼歸國的華僑學生，享有一定的「治外法權」。我所在的高一(五)班共有五名印尼華僑學生，而這個偷吃禁果

的女孩子，就是這五名學生中的一個。她和別班的那個男孩子在床上赤裸裸地被校長逮住的故事，經我們班那幾位華僑同學的口，被渲染得繪聲繪色。但這位女學生根本就不在乎，照樣穿著屁股崩得緊巴緊巴，中縫彷彿一放屁就會崩開的緊腿褲，在校園裏與她那位油頭粉面的奶油小生勾肩搭背地逛蕩。幸好像她這樣的前衛人物，在華僑學生中只是極少數，否則真要弄得校將不校，世風日下了。

我們這所省重點中學，除了集中招有一些從印尼歸國的華僑學生外，高幹子女多也是一大特色，光是我們班上，就有一名將軍之子和一名市委書記的女兒。但這兩位高幹子女一點架子都沒有，特別是那位和我一個寢室上下鋪的將軍的兒子，比我們中好多人都還要樸素。他唯一讓我們眼羨的，是一塊日本產的全自動手錶，據說是他父親在抗日戰場上繳獲的戰利品。在我們讀中學的那個年代，誰見過戴在手腕上擺一擺就能自動上緊發條的錶呀？真正是讓人羨慕死了。其他方面這位將軍的兒子和我們也都差不多，每個星期一樣從家裏帶炒粉來學校充饑。所謂「炒粉」，就是大麥粉子炒熟了裏面拌一點糖，那是我們唯一的「副食」。學校食堂裏按定量供應的一日三餐，根本就填不飽我們的肚子。我們這些正處在發育期的少年的腸胃裏，實在是太欠缺油水，只好用大麥粉子充饑，而這點糧食還是大人從口縫裏好不容易擠出來的呢。

提起學校的食堂，我便會想起一件軼事。那時我們在食堂吃飯都是吃的四兩一鉢的鉢飯，十個人圍一桌，菜是裝在個大臉盆裏端上來。菜上來後由一位同學掌瓢，將菜均勻地打在各人的飯鉢子裏。自然，都只是些青菜蘿蔔，偶爾菜裏有點肉皮子或豬油渣什麼的，大家就大喜過望了。但是有一天在菜盆裏竟一勺子舀出了個一指長的小老鼠來，見菜裏有這麼個毛茸茸的東西，一桌人都恨不得要吐。我們就「罷餐」，頂著那盆「青菜燒老鼠」在食堂裏遊行以示抗議。學校負責學生食堂的一位副主任出面解釋說，已經調查過了，那隻小老鼠大概是從燒菜時做佐料的豆醬的醬缸裏舀出來的，而小老鼠失足掉進醬缸裏應該不是一天兩天，估計已經醃過一段時間了。醃過的老鼠是沒有毒的，大家盡可放心，人家廣東人還專門用老鼠做菜呢。聽這位副主任的言下之意，大概是說那只醃過的小老鼠不但沒有毒，而且是一道難

得的美味，話雖是這樣說，學校醫務室還是給每個人發了兩片什麼藥吃，算是一種心理安慰吧！

說到心理問題，還真鬧過一個笑話呢。有回大冷天的晚上，寢室已經熄燈了，我睡下後無意中碰了一下枕頭旁邊裝大麥粉子的鐵盒子的蓋子，蓋子「砰」的響了一下，很像是放屁的聲音，有人就說誰在打屁？我暗自好笑，就把盒蓋又按了一下，寢室的人就說哪個吃多了粉子，老打屁，臭死了。我於是又連按了盒蓋子兩下，寢室裏的人就都睡不著了，紛紛坐起來用手蒙著鼻子，說臭死了，臭死了，趕快把窗子打開。等知道是我搞的惡作劇後，大家哈哈大笑，罵了我幾句，關上窗子繼續睡，也沒有人再覺得屋子裏有什麼屁臭了，虛驚一場。

後來我就想，這世界上其實有許多事情，都是心理因素在作怪。就說文革中我那個案子吧，哪有什麼「反動綱領」，哪有什麼「黑後臺」？可辦案子的人憑他們的主觀想像，捕風捉影，就是認為有。結果呢，還不是和那幾個「臭屁」一樣，根本上是子虛烏有。

唉，不提那個案子罷，還是回到實驗中學來，那段永不再有的歡樂時光，我如何能忘懷。

我有一陣子迷上了寫詩，於是又成了半瓶醋的「詩人」，班上和學校的壁報上常常登有我的「大作」。例如念高一那年，全校去新洲支農，我便賦詩一首曰《壟上行》，而且是數拾行的長詩。我在詩中唱道：細雨浴地塵不揚/微風拂道道路寬/笑聲一片隔林響/登壘過坡進村莊/鄉村好/兩眼觀景嫌眼少/山色青葱惹人愛/湖光瀲灩竟嬌嬈/家家門扉為我開/戶戶雞歡狗又跳/卸下行裝擦把汗/到家了……自然，打油詩而已，但那時頗以為得意。

說到那次去新洲勞動鍛煉，那真是聲勢浩大，全校停課半個月，大隊人馬旌旗飛揚地開赴農村。每學期一次的這種下鄉支農，是實驗中學的傳統。我們在農村與貧下中農實行「三同」，就是同吃同住同勞動，農民的勤勞、節儉、樸實和善良，給我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只是在農民家吃飯老是吃不飽，卻叫人惱火。我們在農戶家搭夥，是按每人每天一斤半的定量和三毛錢的伙食費付了賬的，照說吃飽應無問題，但常常是只吃了一碗乾的，就得和東家一起喝稀飯。稀飯又不經

餓，白天幹活無力，晚上則起夜數次。雖說農村是個廣闊的天地，可以隨地大小便，但畢竟睡不安神。我們就暗中抱怨，一斤半的定量啦，未必就是些清湯寡水。我們頂羨慕班上的幾位幸運兒了，他們被安排住在生產隊長的家裏，不但碗碗是乾飯，而且餐餐不是烘魚，就是臘肉。烘魚臘肉哇，簡直是地主資產階級的享受。

不過抱怨歸抱怨，牢騷歸牢騷，與農民三同，畢竟只是半個月的時間，不比後來文革中的上山下鄉，學生們是把整個青春都賠進去了。這就像細米白麵吃膩了，偶爾烤個把紅薯什麼的換換口味，會覺得「味道好極了」，但若是成年累月拿紅薯當飯，那是什麼滋味？那滋味是叫你見了紅薯就想哭，所以那心情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何況我們在鄉下勞動中還有勞有逸、有張有弛，臨走前還和當地縣城一所師範學校的學生聯歡了一次。

那次聯歡是在師範學校的操場上進行的。節目演出前雙方互相拉歌，班主任侯老師站起來大聲領唱道：「師範學校——」，我們就接著唱：「來一個喲」；侯老師再唱：「來一個喲」，我們就唱「師範學校。」唱完後侯老師團團轉身一周，用手掌合攏作喇叭放在嘴上故意問道，師範學校在哪裏呀？我們就一齊指著師範的同學叫道在那裏囉！然後一齊鼓掌。師範學校的同學們也就大大方方地唱起來：「正月裏是新年喲，咿喲，妹娃子要過河喲……」他們唱罷又是我們唱，此起彼伏，煞是熱鬧，等到正式聯歡時，氣氛已經非常活躍了。

在那次聯歡中，我們班表演了湖北民歌「蛤蟆調」。十個男同學一順溜排起，從一個蛤蟆子龍燈，一張嘴呀鳳龍燈，兩隻眼睛龍燈龍燈鳳龍燈，四條腿呀撲通一聲跳下水呀玩花燈，一直唱到十個蛤蟆子十張嘴，二十隻眼睛四十條腿。當唱到撲通的跳水聲時，前一個同學將手搭在下一位同學的肩上，依次撲通下去，一隻隻手也就依次搭下去，搭到最後一位同學肩上時，這位同學便「撲通」一聲伸手伸腳作蛤蟆狀，朝前一躍撲伏到地上，這時十位表演者就一齊唱道「跳下水呀玩花燈」。當撲通撲通一聲一聲連接下去時，那真是維妙維肖，情趣盎然。那天師範學校的操場上圍觀的農民中，笑得頂歡咯咯直響老母雞似的，是那些抱娃娃的婦女，當地人稱她們叫「婦聯」(沒有出嫁的女孩則叫蠻子，因為可以嫁出去換幾蠻酒喝)。後來村子裏的這些「婦聯」一

碰見我們，就要叫幾聲「撲通、撲通」，做一個蛤蟆跳水的動作，然後格格格地笑得直不起腰來。

這些「婦聯」們不但大方，而且潑辣，我們就親眼見過她們和灣子裏的男青年開玩笑，幾個人一窩蜂圍上去，七手八腳便是把那個男青年的褲子垮下來，然後一哄而散跑得遠遠的，又是拍手又是跺腳又是大笑。我們這些學生仔就都生怕這些潑皮似的「婦聯」來垮我們的褲子，見一夥「婦聯」老遠過來了，就趕緊避得遠遠的。但「婦聯」們似乎兔子專啃窩邊草，灣子裏的男青年就是她們的窩邊草，我們這些外來的學生仔，好像還不屬於她們啃的範圍。

從新洲返校後，我們學宣部要做的頭一件事，就是編寫「下鄉專輯」的版報。編版報時我把那些「婦聯」的惡作劇講給施婷婷聽，她也笑得樂不可支，說農村婦女的生活太貧乏太枯燥，文化程度又低，鬧鬧這種事在她們就是最開心的娛樂了。施婷婷一邊說一邊就把我為版報寫的「序」與「跋」用粉筆抄寫在黑板上：

《序》云：三十裏水路有多長？／八百里楚天有多寬？／立船頭，問江帆，／新洲的棉田有多廣？／我們來了，／來到貧下中農中間，／尋找最新最好的答案。

《跋》曰：水路長，／沒有我們與貧下中農的友情長；／楚天寬，／沒有貧下中農的胸懷寬。／那綿延萬頃的棉田啊，／是貧下中農的汗水來澆灌。／留連，留連，／走不倦的鄉間的小路；／留連，留連，／看不厭的壟上的明月。／我們磨出了手上的硬繭，／學會了生產的技能；／我們穿爛了腳下的草鞋，／經受了勞動的考驗。／我們要更加發奮地學習，／為建設城鄉美好的明天。

施婷婷邊抄邊笑，說：「你這跋中的什麼留連、留連啊，不是從柯仲平的那首『延安與中國青年』中學來的嗎？我看你詩裏的整個句式都是從柯詩中脫胎，只是還不算生吞活剝就是了。」一番話說得我面紅耳赤，只有點頭的份，打心眼裏佩服她博識強記。施婷婷見我難堪，便轉個話題說，小時候你特頑皮搗亂，你媽媽用尺打你手心，規定打

滿十下就算了。你一邊挨打還要一邊數數，數十下就不打了，要是一哭數錯了，就要重新開頭再從一打起，有沒有這回事？我就笑了，又奇怪她怎麼會知道我兒時的這樁「秘史」。施婷婷卻又說，「有一次你媽媽要你把水桶拎過來，你奶奶先過去拎過來了，你就高低不依，非要你奶奶把桶再還原，然後再讓你去把桶拎過來，有沒有這回事呢？」我只好仍然傻笑。「還有一次，你家家帶你上街，你左右反穿著鞋，過鞋匠鋪時鞋匠說，看這個小伢兩隻鞋左右穿反了，你家家就幫你掉過來。但一過了鞋匠鋪，你又非要把鞋子重新反過來穿，又有沒有這回事呢？」奇怪了，穿開襠褲時這些丟人現眼的事，怎麼就都讓施婷婷知道了呢？再講下去還不知要講出些什麼更丟臉的事來。但施婷婷已經就此打住，只是說：「可見你從小就特別好強，又特別的固執，還真是看不出來呢！」

我就問她，這些事你怎麼知道的？施婷婷笑著說：「昨天我上漢口辦點事，就順便到你家去玩了玩，見到你媽媽和你家家了，還幫你家家剝了豆子。你小時候的故事，都是剝豆子時從你家家那裏聽到的。你家家說，你是一畝田一個的大苕。」我於是恍然大悟，難怪施婷婷前兩天問我家住哪裏？原來是要去我家「私訪」，把我的老底子摸了個一清二楚，我這回算是在她面前把底子掉光了。我就想來而不往非禮也，哪天也想辦法對她搞一次回訪才好，特別是想拜訪一下她那位滿腹詩書的教授父親，但一直苦於沒有機會。

後來機會終於來了。施婷婷一連好幾天沒來上學，聽說是病了。我的頂頭上司艾部長，就約我和學生會體育部部長劉運采一起，去施婷婷家裏探病。我們沿一條僻靜的小巷找到華中村的宿舍區。內中一棟爬滿青藤的二層小樓房，就是施教授的住屋。小樓青磚紅瓦、苔蘚掩壁，年代已經有些久了。春天的陽光灑過嫩芽初綻的槐樹，碎金似的在樓頂的紅瓦上跳躍。我們扶著扶手從窄窄的樓道爬上二樓，進了施教授的家。

施教授和他的夫人非常熱情地迎接我們。施教授湖南口音，身材碩長，頭大額寬，穿一件布衫，蹬一雙布鞋，仙風道骨，智大若愚，一付典型的學者文人相。施夫人則是下江人，身材嬌小，嫋淑可親，聽說是學過音樂的，為了哺育四個兒女，放棄專業做了家庭主婦。施

夫人對我們極為客氣，一口吳越軟語，叫人聽得格外舒服親切。我們先是瀏覽了施教授房中整壁書櫃中的各種線裝古籍，欣賞了一回，就去施婷婷的閨房看她。施婷婷懶慵慵地半靠著躺在床上，手裏拿著一本書，雙目無光，面容消瘦，聽施夫人說她好幾天沒正經吃過飯了。施婷婷見我們來看她，高興極了，硬撐著下了床，拿點心給我們吃，把她讀過的許多文學書籍翻出來給我們看，還讓我們看了她小時候寫的日記。原來她從五歲起就記日記了，儘管日記的內容很簡單，所記的事情也頗引人發笑，如哪天吃了顆糖，哪天穿了件花衣啦，哪天打破了隻碗，哪天摔了隻杯啦，或者哪天和哪個小朋友吵了嘴，哪天跟媽媽上了趟街啦，但我們卻從這些稚嫩的文字中看到了天才的萌芽。

我在施婷婷的書桌上還看見了一幅字，大約是她寫下來作為座右銘的，上面寫著：

讀一切好的書，就是和許多高尚的人談話。

這是我第一次讀到笛卡兒的這句名言。

笛卡兒說得多好啊！從那天起，我就牢牢地記住了這句話。後來在監獄的單人牢房裏，我就是通過這種「和許多高尚的人談話」的辦法，來抵禦孤獨和黑暗，度過漫長的歲月。

那天施教授請我們一道共進晚餐。飯桌上施婷婷說她病基本上好了，明天就可以上學。施教授見女兒精神狀況復原了，非常高興，引經據典道：「小女喚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豁然汗出，霍然病已」。後來從施婷婷那裏知道，她父親引誦的這句話，出自漢代枚乘的《七發》。

第二天我就在學校碰見了施婷婷。她向我點點頭，忽然從荷包裏掏出個紙條塞給我，就跑開了。我打開看，紙條上寫的是：「我媽媽說你真是好，你們三個人中她最喜歡你。」我就一陣發呆，覺得有點飄飄然，好像接到施婷婷拋來的繡球似的，傻乎乎地興奮了一陣。

高一下學期開學不久，有天學生會開會傳達上級指示說，軍隊裏出了個叫雷鋒的標兵，已經「因公殉職」了，要在全國青年中宣傳他的先進事蹟。幾天後報紙上果然就開始大張旗鼓地宣傳起「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雷鋒來，偉大領袖毛主席還親自題詞，號召全國人民「向雷

鋒同志學習」，其他中央主要領導人也都紛紛題詞，一時聲勢造得很大。

那一陣我們版報的內容，自然也以報導雷鋒的事蹟、學習雷鋒精神為主。「共產主義戰士」雷鋒助人為樂的事蹟確實感人，雷鋒對偉大領袖的無限忠誠尤其令人敬佩。但我私下對學習「雷鋒同志」卻有所保留，我認為一個人堅持做好事固然可貴，但也不必一點一滴都要記在日記之中；記在日記中倒也罷了，似乎用不著抱著日記到處作報告。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是很私人性的東西，所以叫「私人日記」。但「雷鋒日記」不大像是私人日記，它更像是一本刻意寫給人家看的宣傳品，全都是閃光的語言，而閃光的不一定就都是作者的真實思想。但這些想法我當然只敢悶在肚子裏，連施婷婷面前都不敢吐露半句對學雷鋒的「腹誹」。

在開展「學雷鋒」活動的同時，我們還被組織觀看了話劇《雷鋒》和《千萬不要忘記》。後一部話劇當時在全國上演得火熱，風頭甚至蓋過了前者。這部話劇的主題，是批判「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劇中一個姓丁的年輕人，沉湎於新婚後的小家庭生活，忘記了天下還有三分之二的勞苦大眾在受苦受難，在小商販出身的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岳母的唆使下，下班後熱衷於打野鴨子去自由市場賣，好攢錢去買180塊錢一條的毛料褲。這個姓丁的年輕人自然是「修」了，與雷鋒同志更是「兩股道上的車」。可據後來的資料披露，雷鋒也有一條時髦的毛料褲，甚至還有一塊英格納的名貴手錶，但是我們那時是不可能知道這些幕後「機密」的。我們只知道雷鋒節儉得連牙刷都捨不得買，總是撿人家丟掉的舊牙刷用開水燙過後用。既然攢錢買毛料褲就有「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之嫌，那「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雷鋒同志的那條毛料褲，自然必須壓在箱底，永遠拿出來曬太陽了。

那一年的夏天，我到我父親暫時調去工作的九江度暑假。施婷婷則和她的弟妹們隨她母親去無錫老家，以及上海、蘇州一帶玩了一趟。這期間我和施婷婷通過好多封信，施婷婷在她的信中，向我盡興講述了她這一趟回老家省親的所見所聞。施婷婷說她母親娘家是當地有名的望族，深宅大院，有眾多僕役。頭天她剛一進門，就有丫頭端茶上來，開口便稱「小姐」，把她嚇了一跳。我讀施婷婷的信感到新鮮

極了，六十年代了，居然還有如巴金的《家》中描述的大家族、大宅院，居然還有「小姐」、「丫頭」，簡直是匪夷所思。我一面哈哈大笑，一面繼續往下看她用優美的筆觸描述的那一幅幅江南水鄉的美麗圖畫。無論是「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的揚州、是「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的蘇州、還是那「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的南京城，還有那「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的秦淮河畔，都在她的筆下化作了美不勝收的文字，使我讀起來如醉如癡。只可惜這十來封我視為極珍貴的遊記體的書信，都在文革抄家時煙飛灰滅了。

新的學年開始了，施婷婷已是畢業班的學生，按規定不再擔任學生會的工作，我們見面的機會也就很少。施婷婷畢業後考進了北京大學中文系，離校前她在和我告別時說，希望一年後能在未名湖畔與我重逢。但我還有一點自知之明，自知以我的語文水準，在班上不過是「猴子稱霸王」罷了，哪敢問津北大這樣的頂尖學府呢？而況我也無意涉足文科，認為文科不過尋章摘句之類的雕蟲小技，「壯夫不為也」，好男兒應在工程數理方面有一番建樹，才能對國家有較大的貢獻。所以到畢業時執意報考了工科院校。我的幾任語文老師洪家森、魏其巍和吳嶠，都對此頗抱遺憾，而我也覺得頗辜負了語文老師們的一份厚望。

說到這些老師們，我永遠都對他們滿懷著敬意和感激之情。我自恃語文方面成績拔尖一點，從沒少過頑皮搗蛋。記得有一次洪老師在我的一篇寫字練習上批評說，字寫退步了。我居然就在老師的批語下反批道：「何謂此也，殊不知吾前此乃臨帖習字，此次乃脫帖而書，焉有不差之理歟？」而曰：退步了，夫是之謂主觀矣。嗚呼，吾非發憤無以謝天下！」半文不白地強辭奪理了一番。但後來竟發現老師在我胡謔之後寫道：你的批評是對的，接受你的意見。我那時是大受感動，感歎我們的老師真正是虛懷若谷，從善如流，我是無地自容了。還有一次我的一篇作文中，錯別字竟達十八個之多，魏老師批評道，「錯字太多了！」而我居然恬不知恥地引魯迅筆下那個孔乙己數茴香豆的話說：「多乎哉？不多也！」並赫赫然就寫在老師的批語之下。老師後來知道了，也沒有怎麼責怪我，只是在一次作文評講課上，提到有的同學錯

字連篇，還好意思說什麼多乎哉？不多也！引得全班一陣哄堂大笑。有一位小胖子竟笑得前仰後翻，不料老師槍頭一晃，直指小胖子說，「你也不用笑，你看你作文上都寫些什麼？花兒在叫，鳥兒在笑，你見過鳥兒笑，聽過花兒叫麼？簡直是狗屁不通。」班上自然又是一陣大笑。

後來這位「狗屁不通」的小胖子聽說對園藝很有興趣，也不知道他是否已經培養出會叫的花、會笑的鳥以證明當年所言不謬？而我在大獄裏十年八年地蹲下去時，面對綿綿無期的監禁，倒是真的再不敢妄談什麼「多乎哉，不多也」了。

轉眼已是五月，高考已經臨近，我們都在緊張地複習功課，而一年一度的市中學生運動會也正當其時。我是學校的短跑冠軍，自然負有為學校衝鋒陷陣的義務，於是報名參加高中男子組一百和兩百米兩個單項以及四乘一百米接力。儘管從外校傳來消息，說人家學校百米跑的最好成績比我快了整整零點三秒，我也不洩氣，是驃子是馬，拉上場遛遛才算。我決心全力以赴，在畢業之前為母校爭取一份榮譽。

市中學生運動會安排在五月的第一周的星期六和星期天兩天舉行。第一天的預賽中，我一百米和兩百米兩項短跑成績，均列分賽場榜首。特別是一百米，我跑出了11秒5的好成績，大大刷新了實驗中學保持了多年的11秒8的校紀錄，並平了市中學生田徑運動會高中男子百米紀錄。第二天前往漢口新華路體育場主賽場，參加百米二百米跑的復賽。我再接再厲，在百米復賽中跑出了11秒2的優異成績，將市中學生田徑運動會男子百米紀錄足足縮短了0.3秒。這個成績距百米一級運動員的標準僅0.1秒之差哪，我興奮得一夜沒有睡好。更糟糕的是由於興奮過度，我完全沒有了食欲，算起來有一天一夜竟有二十多個小時粒米未進，再加上二百米決賽中又消耗了許多體力，臨到百米決賽時，我已經感到體力下降得厲害。然而正如乒乓國手容國團所說，人生能有幾次搏！此時不搏，更待何時？發令槍一響，我就決心和對手拼了！

我奮力地奔跑，耳邊是嗖嗖的風聲和震耳欲聾的歡呼聲加油聲，但我感到明顯的體力不支，兩隻腿不能像復賽時那樣隨心所欲地「飛」起來。我跑在最中間，但卻是最末的一個——也許我從起跑時那一剎那，就已經落後了對手一步。我現在只能拼出我每一寸筋腱、每一塊

肌肉的力量，以我自呱呱落地以來所聚積的全部能量，來「搏」它一回了。在跑到五六十米處時，我的兩腿終於「瘋」了起來，與兩邊對手的差距一點點在縮短，但我仍與衝在最前面的幾個有半步之差。時間已不容我遲疑，終點近在咫尺，我一咬牙搶先壓胸撞線，雖然險些撲倒，但終點的那根白線，畢竟是飄在了我的胸前。

在這次比賽中，我除了奪得百米第一外，還奪得了二百米跑第三名。與我同班的隊友王小民（就是那個將軍的兒子），則取得了跳高亞軍。當他用最原始最落後的跨越式躍過一米七八的橫竿時，沙坑旁的對手和裁判們全都驚得目瞪口呆。

運動場上的戰鬥算是結束了，考場上的戰鬥又將打響，我抓緊點滴時間，與同學們一起投入緊張的總復習中。在填報高校自願時，我填報了省內一所叫華中工學院的學校，這所學校特有的艦船設計專業，早就令我神往。當時受電影《甲午風雲》的影響，我渴望投身於祖國的艦船事業，為國家建造第一流的艦艇，以抵禦外侮，雪百年之恥。我將我的想法寫在信中告訴了在北大求學的施婷婷，同時告訴她我這次在市中學生田徑運動會上奪得了百米冠軍。不久收到她的回信，也沒多說什麼，只是對我舍文擇工表示惋惜，然後是祝賀我的百米奪冠，並附小詩一首：

發令槍響、如箭離弦、山呼海嘯，為健兒揚威……  
銀線一根撞斷，化作張張笑臉。

這首詩我其實很熟悉，進實驗那年學校舉行秋季運動會時，我親眼見她寫了送宣傳組廣播過，如今她又將這篇舊作送給我了。從此我再也沒有和她通過信，僅僅在文革初期與她見過一面。出獄後倒是陸陸續續聽說過一些有關她的消息：畢業後分到湖北一個縣裏的中學教書，文革後又考回北大念研究生，以後又到一所大學教古漢語，最近幾年常以訪問學者身份到歐洲講學，一年中倒有半年的時間不在國內等等。她的先生也是北大出身，搞空間物理學研究的，他們有個女兒，也早已大學畢業赴美留學去了。看見過她的人說她如今位居要津，且已發福，非常的富態，但在我的記憶裏，她永遠都是那個美麗、聰慧而多情的女孩。

在施婷婷和我通過信之後不久，我收到劉運采的一封信。這位原來在學生會時與我共過事的體育部長，早一年已經進了華工動力系。他告訴我華工已經知道我在市中學生運動會上的表現，他所在的院田徑隊的教練極希望我能報考華工，加盟他們的隊伍。劉還說華工在搜羅文體人才方面，是不遺餘力的，我如報考華工，可穩操勝算，一番話說得我為之心動。而此時體院的老師也親自上門，找到體育教研室的蔡老師，希望能動員我報考體院。但我是從來也沒有考慮過這輩子以體育為專業，我也不認為我在田徑運動方面真的能有好大的造詣，我對運動的興趣僅僅在業餘。這樣，如同十年前不曾跨進戲校的門檻一樣，我這一次也沒有去跨體院的門檻。我在高考志願表的第一志願中，填報了華工的船舶工程系。

高考總算過去了，比考試更緊張的是等候放榜，一個月後終於接到了入學通知書，我如願以償地被華工錄取進了船舶系。陸陸續續，就聽到班上同學分別錄取到各個院校的消息。其中有錄取到清華的、錄取到武大的，以及北外、北航、上海交大的，幾位華僑同學則都錄取到了暨南大學，大家都高興地奔走相告。同學們分手之前，又回到實驗中學團聚了一次。同窗三載，此刻依依惜別，大家都非常激動，儘管夜已深了，大家仍流連在校園裏不忍離去。我坐在教室旁的臺階上，聽著離別的驪歌從遠處傳來，心潮隨之起伏。在這靜靜的夏夜裏，仰望星空，感到天地是那樣闊大無垠，人生是那樣絢麗多彩，我想起歌德的詩句：

遼闊的宇宙，宏偉的人生/長年累月，真誠勤奮/不斷探索，不斷創新……心情舒暢，目標純正/啊，就這樣我們又向前邁進了一程。

我生命的小舟已經在人生的長河裏行駛了十九個春秋了，現在就將進入入海之前的主航道。在未來幾年的學子生涯裏，是清風明月、水波不興，還是雷鳴電閃、驚濤裂岸，那都不是我那時所能預料得到的。我只是想到航道將會是愈來愈開闊，風光將會是愈來愈綺麗，我甚至彷彿就已經聽見了大海的呼喚。對美好未來的嚮往，對新的生活的憧憬，就像夏夜裏溫煦的和風，鼓漲著我年輕生命的風帆。

### 第三章

## 大學，1966

我進的這所大學，建於五十年代初，坐落在武昌東郊的喻家山下，濱臨美麗的東湖，與湖對面珞珈山下那所著名的「國立武漢大學」遙遙相對。除武漢大學外，與我們學校比鄰而居的大學還有不少，比如水利學院啦、水運學院啦、測繪學院啦、郵電學院啦，還有什麼地質學院啦、體育學院啦，林林總總不下十數所，環繞東湖，形成一片大學群落。東湖碧波蕩漾，沿湖群山蜿蜒，湖光山色與這一所所高等學府相映，構成一幅幅美麗壯觀的風景。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學子競折腰，我就將在這風景如畫的東湖之畔，用五年的時間完成大學學業，從一個幼稚無知的少年，成長為一名祖國國防工業戰線的「紅色工程師」，這真是太令我心曠神怡，浮想聯翩了。

我本來最愛好的是文學，同學和老師也都認為我應當走文學這條道路，但是我卻放棄了，毅然選擇了學工。其實除了我自己的選擇外，父母的願望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父親當年因抗戰爆發，家道中落，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後來海關也好、長航也好，父親對單位裏那些上過大學的工程師們，總是羨慕不已，十分敬畏。他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在我的身上，實現他曾懷抱過的夢想。父母不贊成我學文的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家中已有我叔父的前車之鑒。叔父也是喜好文學，愛舞文弄墨，結果如何呢？冤死異鄉，連個收屍的人都沒有。所以父母希望我遠離文禍，平平穩穩地做一份技術工作。現在好了，我總算如願以償，進了工科大學的門，也讓父母放了心。

我的宿舍在學校東頭的東二舍，一間十來平米的寢室。上下鋪共

住六個同學，來自五個省份，有廣東的、福建的、河南的、湖南的，只有一位來自湖北松滋的，算是我的「老鄉」。而全班32位同學更是來自天南地北，正像許多同學引毛主席的話說的：「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的，走到一起來了。」我們走到一起來的目的是明確的——為祖國建造出最好的艦艇。在我們系的教學樓的門廳內，就懸掛著一幅毛主席的題詞：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我們必須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造船系又稱五系，屬軍工性質，是全院唯一的保密系。我們學習專業課的教學樓叫東二樓，門前有部隊的戰士把守，師生進樓必須持有專門的通行證。我們的聽課筆記本，也由系裏統一發給，只能在樓內使用，不得帶到外面。這一切都給我們系塗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

由於我們系的保密性質，對生源的要求就特別嚴格，多是從工農革幹子女中選拔。像我這樣出身職員的，已屈指可數，出身地主資本家的，更是鳳毛麟角。「你們都是經過了嚴格的審查，才錄取到我們五系的。你們應該充分認識到自己的價值，認識到自己所肩負的重大責任。」系主任在給我們一年級新生作報告時語重心長地說。「你們在這裏學習五年之後，將成為潛艇設計和建造方面的專門人才。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將加入海軍的行列。你們任重而道遠，前程無比輝煌。希望同學們都能好好學習，在政治和學業上都不斷進步，不辜負黨和人民對你們的厚望。」說到這裏，系主任頓了頓又道，「為了保證你們在大學期間專心致志地學好功課，我代表學校，向大家宣佈一條兩不准的紀律。就是在校期間，一不准談戀愛，二不准結婚。發現有談戀愛的，要教育；教育不聽的，要處分。至於結婚，那是絕對不容許的，一經發現，立即勸其退學，對於未婚同居的也照此辦理。現在你們剛進大學，就給你們宣佈這兩條，是給你們打預防針，免得以後出了問題，又怪我們是不教而誅。這個兩不准，請各位同學牢記在心上，務必自覺遵守，不要到時候後悔都來不及。」

系主任宣佈的這個「兩不准」，高年級的老同學已經跟我們說過，但我們還是心存疑惑：不准結婚不准同居，這很明確很具體，但不准戀愛就規定得太抽象了，很不好掌握。比如先進分子約異性的同學談心，鬼才曉得他們是在談思想還是在談愛情。所以我覺得真要不准談

戀愛，恐怕還得去我讀過的實驗中學，向那位曾向學生「約法三章」的全國三八紅旗手易校長取經，徹底杜絕男女學生單獨相處的機會。就像教會裏的修士和修女一樣，根本不准單獨相處，庶幾可以奏效。然而要是談戀愛的學生跑到校外去談去戀，那又怎樣辦呢？學校總不能一個學生背後跟一個包打聽。

後來聽高年級同學說，什麼不准談戀愛，根本是鬼話糊塗，行不通的。要真行得通的話，那怎麼每到畢業時，就會一對對戀人突然雨後的蘑菇一樣冒出來，要求分配時照顧到一起呢？可見早都在暗渡陳倉了。不信呀，高年級同學指著我們班上幾位女生說，你們幾個到畢業時，負責個個名花有主。說得班上的女生頓時花容失色，但其實又巴不得高年級同學繼續講下去。但這位輔導員同志偏偏適可而止，掉了話題說：「不過大家還是一心讀書的好，要集中精力多學些本領。帝國主義欺負我們你知道有多厲害呀？你造了條萬噸級的『東風號』，他們馬上就搞了條十萬噸級的『西風號』和你作對。他的艦艇侵犯了你的領海，你的艦艇開上去，他早掉頭溜得老遠進公海了，你根本追不上。怪誰呀？不就怪自己的造船技術落後嗎？我們現在的造船水準，差人家西方發達國家至少三十年。」

這些話就使我們都很激動、很憤慨，一個個摩拳擦掌。但憤慨激動之後，摩拳擦掌之後，那句「名花有主」的話又浮上來了。班上有「五朵金花」之稱的五位女生，以後五年中都會落到哪幾位主兒手裏，真讓全班的男生揪心呢。其實我們班的女生還算是多的，像機械系有的班，就個把兩個女生撐門面，或者乾脆一個都沒有，成了和尚廟。男多女少，這恐怕是工科院校的通病。而物以稀為貴，所以女同學無論妍醜，個個皇帝的女兒不怕沒人要。而我們班上的五位女生，個個長得水靈靈的。特別是來自河北邯鄲的叫阿秀的那位，身材修長，膚色白皙，鳳眼流波，柳腰輕擺。正像古詩上說的：「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難怪那位擔任我們班輔導員的高班生，老是有事無事往她那裏跑。另一位江西來的叫阿玲的九江妹，也是非常的文靜秀美，一米七四的高挑個子，亭亭玉立，烏黑的一雙大眼睛，總是羞答答地盯著自己的鞋尖，而兩隻手老是盤弄自己搭在胸前的那條又黑又粗的大辮子，一副靦腆而不勝嬌羞的模樣。聽說她那一米七四的個子，已經引

起院籃球隊教練的注意，準備將她收入麾下。還有那位阿秀，個子雖然沒有阿玲高，但動作靈活，彈跳力強，還會兩手三步上籃什麼的，也被教練看中。不久兩個人一起都成了院籃球隊的候補隊員，並且按照院裏的規定，搬到了文體大隊的女生宿舍西三舍。而在她們搬去之前，我早已經搬出原來的東二舍，住進文體大隊男生住的西二舍有一個禮拜了。

從東二舍搬至西二舍，可算是一次長途遷移，兩舍之間，相距足有兩里路，而這還不是學校東西兩端之間的最大距離。校園如此之大，就在東西兩頭，各建了一座田徑場。如果從飛機上往下鳥瞰，這兩個橢圓的場子，大概就像一副眼鏡，擋在學校這片闊臉上。西田徑場旁邊，是我們所住的西二舍，又稱文體大樓，集中居住著全院的文體精英。無論是唱的舞的彈的吹的，還是跑的跳的投的踢的，全是能為學院爭名次奪錦標的人材。特別是我去的田徑隊，在每年省裏舉辦的大學生運動會上都是所向披靡，幾乎在所有的田徑項目上，都保持壓倒的優勢，甚至令比賽中不計名次的省體院隊，也不得不望其項背。學院裏有一個說法，說文體大隊是院黨委書記朱九思頭上的一頂王冠，而田徑隊則是這頂王冠上一顆最耀眼的寶石。

這個說法證明了我們田徑隊在文體大隊中的地位，但可惜這顆寶石卻總是只能在文體大樓的最下面的一樓閃耀。我們學校的宿舍樓一般都建有五層，按慣例是一年級新生住一樓，升二年級後就調至二樓，一年一年按部就班地爬樓梯，到五年級畢業時，就可以以五樓的主人的身份俯視後學者了。這種住房分配方式倒也合情合理，機會均等，誰也不會有意見。所以我入學後，雖住在東二舍的底層，也十分心安理得，好歹只需等上一年，就可以換房喬遷。不曾料搬到田徑隊來，卻是一樓一直要住到畢業，因為文體大隊是按文體種類而非按年級來分配宿舍的。像我們田徑隊，就是從一年級到五年級的隊員都混住在一起，所以不存在按年級換樓層的問題，至於哪個隊住哪一層樓，當初是用拈鬮的方式來決定的。聽說田徑隊本來是拈的五樓，但拈到一樓的舞功隊不幹，揚言如果不換個樓層，他們就會鬧風濕、關節痛，就不能參加那一年的大學生會演。鬧得文體大隊的頭頭們頭

疼，緊急磋商怎麼辦？結果是身兼文體大隊隊長的田徑隊隊長發揚風格，主動提出讓出五樓。

這件軼事是劉運采在幫我搬家時，在路上告訴我的。他說聽老隊員講，當時舞功隊的哥兒姐兒一聽說田徑隊願意換樓，一個個高興瘋了，跑到樓頂上又唱又跳，在平臺上一面用腳尖打旋子，一面放眼世界，唱起「盼天下勞苦人民得解放」的高調。劉還告訴我，田徑隊讓出的五樓舞功隊又住不滿，曲藝隊和歌詠隊就趁機「半個月亮爬上來」，也擠進了五樓。而四樓是籃、排、足球和乒乓羽毛球隊，三樓是游泳、體操和划艇隊，二樓是管弦樂隊和民族樂隊。每天晚飯後晚自習前，就數五樓和二樓最熱鬧，吹拉彈唱無所不有，鬧得耳朵不得清靜。

從劉運采的嘴裏我還知道，田徑隊隊員每月都可享受一斤紅糖和十斤飯票的補貼，這在那個年代已是非常的特殊化了。但劉說這點補貼也算不得什麼特殊化，因為田徑隊每天都要進行大運動量的訓練，如果沒有足夠的能量補充，體力根本吃不消，弄不好還會弄出肝炎什麼的，所以這點糧食補貼只嫌少不嫌多。我相信劉的話絕非虛言，因為我很快就領教到什麼是大運動量訓練，以及這種大運動量訓練所帶來的飯量的劇增，以致食堂裏賣飯的女工，不久就當著我的面揶揄說，飯廳裏又新添了一個「飯桶」。

我們田徑隊的隊員雖然個個飯量大，但沒有一個顯得臃腫，都很精悍的。我們的教練更是瀟灑得很，比方負責我們短跑的肖清雲教練，個子魁梧而勻稱，相貌堂堂，頗有莊則棟、李富榮等體壇明星的風采。這位畢業於北京體育學院運動系，曾在河南田徑隊執教過兩年的體育老師，年齡也不過二十七八歲。在訓練場上第一次見面時，他將我上下打量了一番，問道，「聽說你跑過11秒2，是嗎？」問過之後便要我做一分鐘原地高抬腿跑和三十米的變速跑，然後說，「你步子的頻率很快，但是跑動的姿式不怎麼好，身子兩邊搖擺不說，還是個八字腳，不改過來怎麼行？我現在還要看看你的耐力，你繞著跑道先跑兩圈再說。」我就跑，等八百米跑完時我已經累得夠嗆，而這位肖教練又拿出跑錶要測我的百米，結果是可想而知了。「13秒1嘛。」肖教練搖搖頭說，「怎麼能相信你跑過11秒2？不過沒關係，我會替你制定一套訓練方案，幫助你儘快恢復狀況。你潛力不錯，通過系統訓練，突破

11秒應無問題，大學期間爭取達到健將標準，這是我給你定的目標。怎麼樣？」我當然高興啦，「百米健將」這個目標太誘人了。健將標準是10秒7，我想我是有可能達到的，我中學時未經任何系統的正規訓練，不也跑出11秒2的好成績嗎？我對自己很有信心。

就這樣我成了肖教練麾下的一員，和田徑隊的老隊員一起投入了緊張而艱苦的訓練。每天清晨學校的起床號尚未響起，我們田徑隊就一聲哨響全體起床，集合列隊，迎著晨曦跑向西操場開始早鍛煉。做操、壓腿、長跑，然後才回宿舍洗臉漱口，去食堂吃早飯，而這時文體大隊的其他隊員才剛剛起床。下午文體活動時間的訓練更是緊張，1500米跑、100米跑5組、200米跑2組，還有變速跑、跳遠、跨欄，有時還要到健身房壓杆鈴，以增強腿部肌肉的力量。每週還有一次越野跑，從華工順著公路一直跑到5公里以外的體院再往返，加起來就是一個萬米跑了。經過一個多月這種大運動量的訓練，我的體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十月份的中越田徑對抗賽上跑出了11秒4的好成績。而我們的隊長王際和更是跑出了10秒9的個人最好成績，刷新了華工的百米校紀錄。

那次參賽的主要是湖北田徑隊和越南國家田徑隊，我們華工田徑隊是去給他們當陪襯。那天有少數在漢的國家田徑隊隊員也參加了比賽。當國家隊的跳高選手世界紀錄創造者倪志欽連外衣也不脫，上前幾步兩腿一縮，輕而易舉就「蹦」過了1米95的橫杆時，正在這個高度前愁眉不展的那幾個越南國家隊的隊員，驚得目瞪口呆，算是大開了一回眼界。那一次湖北隊的短跑選手殷正德，在預賽中以10秒3破了當年的國家紀錄。殷比賽時，我就坐在起跑線旁觀摩他的起跑動作，目睹殷在發令槍響之前就已經衝出去了，但發令的裁判居然容忍了殷明顯的搶跑，送給了他一個破紀錄的機會。但省隊的另一名短跑好手李必華不服這口氣，在百米決賽中不顧一切使用起「搶跑」戰術。但裁判偏不買李的賬，吹起哨子判李犯規。讓人弄不明白的是李竟能肆意搶跑達七八次之多而不被罰下場，而按比賽規則，兩次搶跑就要取消比賽資格。聽省隊的人說李品質不好，因流氓習氣屢受處分並被勞教過。文革開始後橫掃「牛鬼蛇神」，李必華被揭發糟蹋過許多女孩子，竟被體育系統的「紅體兵」亂棍打死。

這次中越田徑對抗賽之後沒多久，就要舉行市大學生運動會了，對抗賽正好為我們熱身。從運動會之前的一個月起，我們田徑運動員就享受起了特殊的待遇。我們每天的中餐和晚餐，除了和一般同學一樣在食堂打一份菜之外，還到另一個專門的窗口去加一大勺子的葷菜。紅燒肉呀、回鍋肉呀、肉丸子呀、炸枯魚呀、天天換花樣，搞得在食堂打飯的其他同學口水直流。我們吃飽了喝足了，就精神抖擻地奔赴田徑賽場為學校爭光。院黨委的書記委員們紛紛親臨前線督戰，大家自然是士氣高漲，賽場上捷報頻傳，獎牌數在統計表上直線上升。我們學校以絕對優勢，奪取了男團女團兩項總分第一，以及絕大多數單項的前三名，令黨委書記朱九思笑得嘴都合不攏，在慶功宴會上連喝了三杯茅台。

這次比賽過後，肖教練告訴我們，明年暑假時華工將要代表湖北省高校，參加在廣州舉行的全國大學生田徑運動會。教練要我們通過冬訓把體能提高到一個新的水準，為來年進軍羊城作好準備。我那時聽了感到非常興奮，能趕上一次全國性的大學生運動會，那該是何等的幸運，我就盼望六六年的暑假快一點到來。廣東是父親工作生活過十年的地方，我早就想去那南國見見世面了。

大學裏的時間過得很快，一晃就到年底。正值「一二·九」學生運動三十周年紀念日，學校準備隆重慶祝一番。三十年前，北平的學生為反對國民黨當局的賣國政策，推動抗日救亡運動，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上街頭進行示威遊行。學生的愛國行動遭到國民黨當局的殘酷鎮壓，許多學生被捕。國民黨的倒行逆施不得人心，「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迅速推向全國，成為抗日救亡運動的一面光榮的旗幟。

紀念日的那天晚上，各系都在田徑場上舉行傳統的火炬接力，我們田徑隊的同學也都回到自己所屬的系裏，參加接力長跑活動。我一回到班上就接到通知，要我擔當年級接力隊的最後一棒——接力隊的前三名隊員在圍繞四百米跑道跑圈時，手裏的火炬都是沒有點燃的，直到最後一棒才將火炬點燃——所以我擔當的是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一棒。其實我雖然是院田徑隊的隊員，但我是跑百米和兩百米的，四百米跑雖然也屬於短跑，但不是我的強項。可任務既然交給我了，我還能打退堂鼓嗎？當然只能全力以赴。儘管那天晚上天很冷，寒氣

逼人，我還是脫得只穿了件運動隊的秋衣秋褲，披件棉大衣哈著氣不斷地在原地跳動著取暖，等著接那最後的一棒。終於輪到我了，火炬被年級輔導員點燃，差不多的時候，其他年級的火炬也都燃燒了起來。熊熊的火焰，照亮校園的夜空，同學們激動地唱起當年抗日救亡的歌曲，整個校園裏都沸騰了。雖然不是計名次的正式比賽，我還是盡了全力向前猛衝。同學們都擁擠在跑道旁，不斷地為我們加油。當我跑到終點，將火炬交到系領導的手中時，已經精疲力竭，快要癱倒在地。但我為自己能在大學裏第一次參加這種活動並擔當「火炬手」而感到非常光榮和自豪，同時我又非常羨慕那些親歷過「一二·九運動」的革命前輩，他們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惜拋頭顱、灑熱血，和國民黨反動當局作英勇的鬥爭——就像小說《青春之歌》裏所描寫的那樣——他們所經歷的戰鬥裏的青春是多麼有意義啊！

真的，我多想像盧嘉川、江華、林道靜那樣，為了民族的利益，人民的解放，為了實現自由和民主的理想，迎著刺刀和水龍頭，與法西斯蒂勇敢地搏鬥。唉，我生也晚，「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幸福得像是生長在蜜罐子裏一樣。我永遠也不可能有機會投身到那種如火如荼的革命鬥爭中，這是多麼遺憾的事情！那種暴風驟雨的年代啊，至多只能出現在我的夢中了。

六六年一晃眼就來到了。但這年的春季，卻流行起了可怕的「腦炎」。面對流腦在社會上暴虐，學校如臨大敵，破例放假一個月。放假期間停止上課，全體師生一律靜心休養，且不得越出校門一步，以避免流腦病毒的傳染。我們田徑隊也停止了大運動量的訓練，大家像放了鴨子似的在校園裏閒逛。也有日上三竿不起床的，還有些人不知從哪裏學來了一手「甩手療法」，就是兩臂向前伸直，然後向後一甩，再伸直再後甩，每天甩它一陣，據說足以驅邪祛病、健體強身，百病都可以從手掌心裏給「甩」出去，什麼流腦病毒，那更是不足為懼，於是學校裏早晚就都出現了一排排的「甩手掌櫃」。

我不好閒逛，也不好睡懶覺，更不想加盟「甩手掌櫃」，就跑到圖書館的閱覽室裏翻看書報雜誌。我憑五系的學生證借了一些國外原版的艦船雜誌來瀏覽，那些印刷得異常精美的各種艦船的照片，讓我讚歎不已。我一面翻看雜誌，一面翻查手中的英文詞典，記住了不少艦

船方面的英語辭彙，我覺得這對我以後學習專業，一定會大有好處。在我翻閱的原版雜誌中，有不少是日文的。日本造船業的發達舉世公認，他們的造船技術，有許多地方都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可惜我除了從電影《地道戰》、《平原遊擊隊》中知道幾句「八格牙魯」、「米西米西」、「撕拉撕拉的有」之外，對日語一竅不通。等「流腦」危機解除後，我就報名參加系裏開辦的「日語講習班」，每週一、三、五的晚上去東二樓聽課。慢慢就入了點門，在搞清了什麼是平假名片假名後，成天嘴裏就卡霍哭開可、沙西蘇賽索的念念有詞。同在文體大隊每天去系裏上課必從我窗下經過並約我同行的阿秀阿玲，聽我念得新鮮，便也一起報名學日語。這樣晚上有這兩位女同學同去同回，一路上也就不寂寞了。

我那陣子正迷戀上了詩與歌，常常在路上唱歌給她們聽，有時就背誦一些詩。像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爐中煤」呀，徐志摩的「再別康橋」，戴望舒的「雨巷」呀，都是她們最喜歡聽的。我也對她倆背誦過雪萊的「雅典的少女」，這首詩浸淫著我那段朦朧的初戀，所以我特別珍視。我覺得那句「你是我的生命，我愛你」，堪稱經典中的經典。儘管身邊的這兩位女孩子都很可愛，但我覺得她們中誰也不會成為「我的生命」。像阿玲她對我很親近，似乎有那麼一點意思，但是那1米74的個子與我不相上下，和我走在一起時，甚至顯得還高出我一截，那還成什麼體統？所以是堅決不能考慮的。而阿秀雖然成天笑盈盈的，但對我一點那個意思也沒有，我就用不著想入非非了。俗話說：女追男一張紙，男追女一堵牆，我是不想去撞那一堵牆的。我寧可做那一張紙，等哪天有個喜歡我的女孩子把這張紙捅破就行了。反正我還年輕，對這件事我一點也不著急。我要一心一意用心讀書，珍惜這大學五年的學習時間，不能讓光陰虛度。

我熱愛我所學的專業，熱愛我們的學校，熱愛我學習生活在其中的美麗的校園。我特別喜歡校園的夜晚，每次學過日語或從圖書館上完晚自習回宿舍，一路上我總是看不夠校園裏迷人的夜色：遠處黑黝黝的喻家山早已熟睡了，校園裏的一幢幢宿舍樓仍燈火通明，天上的星星在快活地眨著眼睛，路旁的湖水在星光的照耀下波光瀲灩。湖畔的梧桐和菩提的枝葉在夜風的吹拂下沙沙作響，楊絮隨風

飛舞，攬和著槐花、茉莉、紫丁香的芬芳，彷彿要把這暖薰薰的溫馨氣息灑遍每一個角落。春色滿園關不住，校園的春天真是令人陶醉。然而有天晚上我從圖書館回宿舍時，忽然聽見路旁的池塘裏響起了一陣蛙叫，呱呱呱的煞是熱鬧——原來夏天已經腳步匆匆地臨近了。

但是肖教練再也沒有提到過暑假去廣州參加全國大學生田徑運動會的事。那彷彿不過是子虛烏有的揣想，在我們田徑隊裏誰也沒有再談它，現在大家關心的是報上的消息。從五月份起，北京的《解放軍報》、《光明日報》，上海的《文匯報》、《解放日報》相繼在顯著位置發表了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別真偽》和姚文元的長文《評「三家村」》※3。《紅旗》雜誌則發表了戚本禹的一篇《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的長文，矛頭直指北京市委。聯想到半年前對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4的批判，一些政治嗅覺比較敏感的老同學和老師就說，看來要有一場大的政治運動了。於是一些人就很興奮，還有些人就很不安。我們則只有興奮而沒有不安，剛進大學的學生娃娃嘛，管他什麼運動，大概也整不到我們頭上。

談到搞「運動」，曾經下鄉參加過「四清」※5的高年級隊友老董就特別來勁，說那些生產大隊的隊幹部個個不清不白，沒有不多吃多拿多佔的，偷雞摸狗、搞皮綁(湖北方言：指不正當的男女關係)，全爛掉了。「不過你莫看他們平日裏在社員面前神氣五六揚，在我們工作組面前嚇得像乖乖兒。有一次查一個生產隊長的四不清問題，我一拍桌子，那狗日的竟嚇得尿了褲子。社員們見隊長都這樣子怕我，就問我在城裏當好大個官？我當然不會說我是在念大學，就轉個彎說我老婆是市裏公安局的副局長。那些鄉里人就都只伸舌頭，再不敢問我是好大個官了。所以說鄉里人最好唬，誰的官大他就信誰的。你們以後要是有機會下鄉搞四清的話，也千萬不要說自己是學生，你要是說是學生他們就不會那樣怕你了。」聽老董說得眉飛色舞，頭頭是道，我們就向他請教對這回報上大批「三家村」的看法。董說，批三家村就是批吳晗、鄧拓、廖沫沙這三家嘛，吳晗是北京市的副市長，鄧拓是北京市委書記兼副市長，廖沫沙是北京市委統戰部長、市委委員，這三個人

一倒，你們想想再會搞到哪個頭上嘛，這是順藤摸瓜的事情。我們想了想，就都想到這個「瓜」恐怕就是彭真了。

形勢發展得迅猛異常，不久在北京大學發生了轟動全國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事件※6。記得那是六月一日晚八點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各地人民廣播電臺新聞聯播的節目裏，頭條播送了北大聶元梓等七人題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大字報。大字報措詞強硬地批評北大黨委書記陸平等破壞文化大革命，壓制革命群眾的革命積極性，聲稱「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團結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圍，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制和一切陰謀詭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重要時間裏廣播一張群眾的大字報，而這張大字報又是矛頭直指北大黨委這樣一級黨組織，這件事情本身就是極其非同尋常，非常耐人尋味及發人深思的。但誰也不知道這件事的背景，事情來得太突然、太緊急，不容我們作出自己的思考和判斷。同學們只是莫名其妙地興奮和激動，許多人夜不能眠，通宵達旦地談論著這張大字報。誰也不知道大字報的作者聶元梓等是些什麼人，是誰在支持他們寫出這種「反黨委」的大字報。還有是誰在指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廣播這張完全稱得上是「反黨」的「右派」大字報，而大字報中所說的「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又是暗示的誰呢？大家私下議論、猜測、揣摸，連聶元梓這個名字究竟怎樣寫，也讓大家爭論了一番。因為從廣播裏聽，聶元梓和捏圓子都是一個音（湖北人稱「丸子」為「圓子」），我們就笑著說，這一回還不知有哪些人又要給捏進圓子裏一鍋煮了。

好不容易等到第二天，一面仍然聽廣播裏反復播送聶元梓的大字報，一面就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通欄標題《北京大學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穿了一個大陰謀》之下，讀到了聶元梓大字報的全文。《人民日報》還同時發表了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文章稱陸平、彭佩雲領導下的北京大學，已成了三家村黑幫的一個重要據點，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並說陸平等所代表的組織是「反黨集團」，號召無產階級革命派無條件接受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

與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黑幫堅決鬥爭。不論他們打著什麼旗號，有多高的職位，多老的資格，也要「徹底摧毀」。《人民日報》在同版還發表了《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的社論，告誡人們要抓意識形態、上層建築中與資產階級的鬥爭。號召人們「做徹底的革命派，不當動搖派，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北大聶元梓等人的一張大字報，連同《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和社論，無異於是一隻隻衝鋒的號角，在全國大地上吹響了。全國範圍內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就是從這個不平常的夏天哄然而起的，而各高等院校又是最早最迅速地聞風而動。《過秦論》中說陳勝揭竿而起，「天下雲合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並起而亡秦族矣」，現在聶元梓就是陳勝了，她也是「揭竿而起」，同樣是「天下雲合響應」。無數的敬慕者跑到北大，為的是一睹聶的「風采」，聆聽這位一夜間成名的傳奇性人物對文化大革命的見解，不也是「贏糧而景從嗎？」只是隨之並起的並非什麼「山東豪傑」，而是北京的幾個「學生領袖」和各地的「造反闖將」。而倒楣的自然也不是什麼「秦族」，而是各個學校的黨委了。北大的陸平垮了，接著就是清華的蔣南翔，再隨後是南大的匡亞明、復旦的楊西光……一種典型的多米諾牌效應。

但遭殃的豈止是各個大學的黨委，距北大那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公開廣播不過三天，就傳出了北京市委改組的消息：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擔任了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吉林省委第一書記吳德擔任第二書記，彭真真的靠邊站了。後來又傳來小道消息，說毛主席批評彭真領導下的原北京市委，是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黨中央所在地北京市竟然是個「獨立王國」，真是叫我們感到又吃驚、又新鮮、又激動。黨內鬥爭竟會有這樣嚴重、這樣複雜，簡直不可思議。而不可思議的事情，又豈止是一個北京市委的「獨立王國」。有確鑿的消息說，中央政治局已經召開擴大會議，討論彭真、陸定一、羅瑞卿和楊尚昆的「反革命集團」的問題。古語說一葉落而知天下秋，而今已經是無邊落木蕭蕭下。滿地都是聲討「反革命三家村」的檄文，漫天都是飛的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出了赫魯曉夫式的人物的傳聞。其聲也凶、其勢也猛，就連政治上最遲鈍的人也開始感覺到，國家將有異常

重大的事情發生。但這個異常重大的事情究竟是什麼事情，我們那時還是猜不到的，除了傳播小道消息，也沒有誰敢公開胡說八道。革命的義憤，還是首先發在三家村這樣已經人人喊打的「反黨黑幫」身上最保險。

但是吳晗、鄧拓、廖沫沙三人合寫的《三家村札記》也好，鄧拓一個人以馬南屯的筆名出的那本《燕山夜話》也好，憑我們那時的思想水準和政治水準，要從中讀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東西還很困難。我們只能通過姚文元們的《評三家村》之類的批判文章，來解讀《三家村札記》和《燕山夜話》中的「黑話」。例如「一個雞蛋的家當」這篇文章，說的是諷刺「用空想代替現實」的財迷本色，提出只有勞動才能產生財富的道理，應該說沒有什麼不對的嘛，但是姚文元卻看出了文章的背後，是挖苦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建立在只有一個雞蛋的家當的基礎之上」。又如「兩座廟的興廢」，是比較了同一地點兩座廟的興廢後，對文物的保存問題發出了一些感歎；但是姚文元卻「獨具慧眼」地看出了文中所「興」的那座廟，是暗示資本主義制度，而所「廢」的那座廟，是暗示社會主義制度，文章是在煽動「興資滅無」。一篇談「陳緯和王耿的案件」的文章，被說成是借古諷今，攻擊共產黨政治腐敗，階級鬥爭擴大化；一篇「白開水最好喝」的科普小品，則是配合蘇修，挖苦我們老百姓窮得只有水喝，「長髮的奇跡」，則是赤裸裸地鼓吹封建階級資產階級腐朽沒落的生活方式；而「說大話的故事」和「兩則外國寓言」，則是公然誹謗「大躍進」是誇海口吹牛皮，「在實際的事物面前碰得頭破血流」。至於一篇純知識性的「三十六計」，據姚文元說，三十六計，走為上計，這是「三家村」見大勢不好，發出撤退的號令了。

姚文元不愧是個嗅覺靈敏的刀筆吏，用穿鑿附會的方法，把「三家村」的文章剖析一番，便將鄧拓、吳晗等「反黨分子」的「反動面目」，完全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按照姚文元定下的調調，我們雖然都沒有讀過鄧拓吳晗寫的那些「夜話」和「札記」的原文，照樣對其大批沒商量。我也在班上召開的批判會上，慷慨激昂地念了一首「臘鼓鳴，春草生，狼子野心三家村……」的打油詩來湊熱鬧。自己「積極」不說，還在一次團組織生活中，批評不愛開口的阿玲不積極在批判會上發言，「哪像個共青團員？」阿玲突然就哭了，雙手蒙著臉跑出了教室。我意識到

自己的話說重了，想找阿玲解釋解釋，阿玲就是不見我。倒是那位阿秀訓斥我說：「你知不知道阿玲原來對你的印象有多好？想不到你會這樣搞她，好傷她的心哦，你裝的什麼假積極呀？」

我聽了這話也無話可說，因為話雖不中聽，事實的確如此。自己好出風頭，好表現好說話，好自以為了不起，又有什麼資格去對老實本分不喜歡張揚的阿玲說三道四呢？不是假積極又是什麼？但鴨子死了嘴巴硬，還要找班上的團支部書記那位松滋的湖北老鄉訴委屈，「你看，一點意見都提不得，提了就哭鼻子，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嘛……」團支書就說：「過組織生活嘛，提倡批評與自我批評，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不過提意見最好還是注意點方式和場合，要注意分寸。有些同學不善於表達，可以慢慢提高自己的能力。像你這樣能說會寫的，可以多寫些大批判的文章嘛。你可以仔細讀讀《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搞點有分析有份量擊中要害的批判稿嘛。」

聽了支書的話，我就真的找來了「夜話」和「札記」來讀，但讀來讀去，竟讀出了興趣，那些既有趣又富知識性的雜文，倒真說得上是文情並茂，何來的反動？我也許是不自覺地在「中毒」了，但若是什麼文章都像姚文元那樣雞蛋裏面挑骨頭，人家說有顆樹被蟲蛀了，就說人家是影射革命事業，說太陽落山了，就說是暗示社會主義已是日薄西山，那豈不是從任何不起眼的「微言」中，都可以引伸出反革命的「大義」來麼？按照這種批法，就是明明白白的正面文章還可以從反面來看。就好像看電影一樣，從銀幕正面看人家是在向左轉，從銀幕背面看這個人就是在向右轉嘛。再比如從鏡子裏看東西，也是左右反過來了的。也許姚文元他們使用的批判武器，就是一種無產階級的「照妖鏡」，專門將左照成右，將正照成反吧。這種招數真是厲害得很，可以任意置人於死地而又使人百口難辯，我等後學之輩若非十分的厚顏無恥，如何學得來？我雖可算是厚顏，但還不至於無恥，所以對批三家村不再抱有熱情，寫什麼「有分析有份量能擊中要害」的狗屁文章哇。我也懶得看那些「積極分子」們寫的那種鸚鵡學舌、千篇一律的批判文章，還是老老實實的上我的課好了。

然而華工之大，已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我們學校的院黨委，也同樣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這股「造反潮流」的衝擊。華工校園裏開始出

現了矛頭指向院黨委的大字報，而身為院黨委書記的朱九思，則成了首當其衝的人物。大字報有的說他十七年來推行的是修正主義的教育路線，有的說他一貫重用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有的說他對抗破壞文化大革命，還有篇大字報的標題乾脆就是「朱九思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可算是聶元梓大字報的翻版。除朱九思外，院黨委的其他幾名成員，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一時間華工園內貼滿了大字報，氣勢洶洶的全是針對院黨委領導而來。朱九思倒也十分沉得住氣，背著手到處轉悠，看那些批判他的大字報，時不時還掏出枝筆和本子，抄錄一些大字報中的內容。於是有人在大字報說朱九思是在收集材料，準備對革命群眾反攻倒算，有人就在校園裏刷出了「朱九思不投降，堅決消滅他」的大幅標語。貼這些大字報和刷這種大標語的學生和老師，多是各系的一些工農兵學員和出身工農的幹部與教師，他們據說一直都受到「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壓制，所以反抗最烈，鬥爭性最強，早就想造朱九思的反，這回自然是首先響應聶元梓大字報的號召，「捨得一身剛，敢把皇帝拉下馬」了。

但是田徑隊的一些高年級同學說，這些工農兵學員多是調幹生，文化基礎較差，學習常常趕不上趟，有的不等畢業就會被「勸退」，只能拿到肄業證，自然認為校方是排斥他們，是打擊工農兵學員。有的出身工農幹部的教師水準較低，能力較差，表達方面又不行，只好做些實驗室內的輔助教學工作，上不了講臺。這些人也容易牢騷滿腹，遷怒於院領導，其實是怪自己水準低了，怨不得什麼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不路線的。院體育教研室的黨支部書記、一位部隊幹部的夫人，更是以過來人的身份告誡我們說：「眼下和五七年反右前的氣氛差不多呢，恐怕又是中央在引蛇出洞，好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引出來聚而殲之。你們最好多留個心眼，在黨領導這個大是非問題上，一定要站穩立場。」

和我們一個寢室的老董說他搞過四清有經驗，像朱九思這樣的領導幹部，主流還是不錯的，大不了也就算個二類幹部嘛。老董一開口，田徑隊的老同就都紛紛給朱九思評功擺好起來：華工建校以來的成績呀、學科研究方面的成果呀、向國家輸送了多少技術人材呀。評來擺去，田徑隊意見趨於一致，遂召集了文體大隊各路諸侯，前來田

徑隊議事。頭頭們議過之後，決定以文體大隊全體隊員的名義寫一張大字報，給學院裏正甚囂塵上的「反黨」濁流以迎頭痛擊。當夜一篇署名院文體大隊的《告全院同學書》，便抄成十數份大字報，張貼到了學校各主要教學樓和各個學生食堂和教工食堂的牆上。……

這篇《告全院同學書》，次日一早便在全校師生中引起轟動。一時支持者眾，不少貼大字報反對過朱九思和院黨委的，紛紛陣前倒戈，轉入擁護院黨委的行列。教我們年級英語課的一位四川籍的年輕漂亮的女教師，頭天才湊熱鬧貼過一張「向院黨委問一個為什麼？」的大字報，見勢不妙，風向似乎一夜間變了，趕快趁人不注意時將自己的那張大字報扯掉。驚惶不安了好一陣後，又貼出張「朱九思書記就是好」的大字報，以將功補過。我是文體大隊的一員，唯大隊之馬首是瞻，且又有叔父當年因向黨提了意見被打成右派的前鑒，自然不會像那位女教師一樣，稀裏糊塗去貼院黨委的大字報。何況朱書記生活樸素，平易近人，治校有方，求賢若渴，都是高教界有口皆碑的。再說華工又不是北大，與三家村也毫不相干，憑什麼和陸平等「黑幫分子」一鍋煮呢？所以我從心裏反對將矛頭指向朱九思書記。雖然沒寫過保朱的文章，但也在班上做過老董的傳聲筒，散佈過「朱九思問題不大，了不起是二類幹部」之類的言論。

然而就在保朱的力量佔了上風，倒朱的力量落荒而逃之際，由省委派遣的工作組進校了，組長是一位名叫王躍的地委副書記。王躍組長下車伊始，在全校師生歡迎工作組的大會上，宣佈由他們工作組代行院黨委的職權，負責領導華工的文化大革命。接著我們又從黨員同學那裏，知道了王躍傳達的有關運動的「中央八條」：大字報不要上街，內外有別，不搞大規模的聲討會……「要搞好這次運動，首先要統一思想！」王躍組長在一次大會上說，「用什麼來統一思想呢？用毛主席著作。首先要讀好老三篇。我在這裏建議全校師生先用三天時間，集中學習老三篇，改造好世界觀，然後再投入一鬥二批三改，鬥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臭他們庇護的那些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改革舊的修正主義教育制度，這就是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務。」在王躍講話的鼓勵下，以朱九思為首的院黨委再次成為眾矢之的，批判院黨委「執行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大字報，一時在

華工園內鋪天蓋地。可憐的院文體大隊，因了一張不合時宜的《告全院同學書》而輸光了面子。而有朱九思「王冠上的寶石」之稱的院田徑隊，作為《告全院同學書》的始作俑者，更是威風掃地。現在所有的人都相信，院文體大隊是「走資派」朱九思豢養的一支御林軍了。

終於有一天院文體大隊接到工作組關於立即解散大隊，讓隊員各回各班參加運動的通知，我們於是收拾起各人的行李書籍，準備打道回府。然而也有不甘寂寞的如管弦樂隊，就在撤離西二舍的頭一天晚上，在二樓的走廊裏搞了一場「告別演出」性的排練——各種樂器一起演奏起電影《冰山上的來客》中的插曲「懷念戰友」，真正是如泣如訴，動人心弦。但是工作組派人來干預了，說管弦樂隊是在發洩對解散的不滿，是在和工作組搞對抗，必須馬上停止排練。而管弦樂隊又偏不買工作組的賬，拉的拉得更入神，吹的吹得更起勁。工作組拿這班「走資派的吹鼓手」們毫無辦法，於是「打水找提壺的」，將負責管理管弦樂隊的一位搞音樂的老師找來問罪。這位小個而禿頂的廣東人嚇壞了，抱起拳頭朝著管弦樂隊的同學們又是作揖又是鞠躬，請求大家趕快散夥。工作組這一著倒是管用，管弦樂隊的同學們怕老師遭殃，只好偃旗息鼓，作鳥獸散。

但工作組仍不就此甘休，幾天後，王躍組長在全院運動骨幹分子會議上，將這次的排練活動，定性為一次向工作組示威的性質極為嚴重的「政治事件」。因為工作組是省裏派的，是到學校來代表黨的領導的，向工作組示威，自然也就是向黨的領導示威，性質當然也就「極為嚴重」。聽參加過會議的骨幹分子透露，王躍組長在會上講話時聲色俱厲，措詞也十分尖銳，說現在就是有少數師生，企圖干擾運動的正常進行，不服從工作組的領導。一些人還偷偷地搞地下串聯，課也不上，遊魚般地到處串來串去，想幹什麼呀？要警惕。王組長還說不但要抓「遊魚」，還要揪「右派學生」，「不要以為現在就沒有右派了，學生中有右派，教師中也有，大學裏歷來就是右派分子成堆的地方。哪個這回想跳出來，就讓他跳出來好了，正好一網打盡。」

王躍組長還傳達了「上頭」的指示，說運動要抓緊，爭取七月底掃尾，八月份結束。然後放暑假，九月份照常開學上課，恢復正常的教學秩序。王躍組長講這番話是在六月初，我們那時是一邊搞運動，

一邊還在堅持上課，但哪個還有心思認認真真地聽課呢？老師在上面講課，我們學生就在底下辯論，在學生和老師中究竟該不該抓右派，哪些人算得上右派，以及八月份是否能夠結束運動，是否會放暑假的問題上爭論不休。

有一天正在教室裏上英語課，大家把那位年輕的女教師撇在一邊，為一個什麼問題正爭得「大弦嘈嘈如急雨」，忽然聽見教室外面有人大喊，不上課了！大家快出來！中央決定停課鬧革命啦，快出來吧！大夥兒一聽，哄地一下全放了鴨子，爭先恐後往教室外頭跑。教室外面的走廊上，已經擠滿了從各教室湧出來的學生，人人都興高采烈得很，似乎都有一種被解放了的感覺。在中國近代史上，只有大敵當前，民族危亡之際，才有過學生放下書本，走出課堂，投入革命鬥爭的壯舉。而現在黨中央號召全體大學生放下書本，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運動之中，也就可以看出這場文化大革命對黨和國家的命運和前途，有著何等重要的意義。我們深感肩上責任的重大，摩拳擦掌、躍躍欲試，都想在革命鬥爭中一顯身手。

校園裏的運動進展很快，有如燎原之勢。以黨委書記朱九思為首的院黨委的成員紛紛落馬，都成了陸平、彭佩雲之類的「黑幫分子」自不必說，就連各系各教研室的黨總支書記，乃至團委書記、團支部書記也難逃厄運，統統被打成了朱九思的「黑爪牙」或「小黑幫分子」。我們文體大隊和動力系住的宿舍樓是鄰居，我們就目睹了動力系的學生是如何整他們系的一位團委書記的。那位團委書記是個女的，平時大家都叫她小霍。小霍也不過二十多歲，剛剛結婚，還沒有分宿舍，就暫時借用了動力系宿舍一樓的一間屋做新房。學生們在走廊裏貼出大字報，說她是修正主義共青團的反動路線的吹鼓手，是修正主義分子，證據就是她結婚的新房裏的佈置，沒有按照「革命化」的要求，完全是「資產階級」的一套。比如床上鋪的是鴛鴦戲水的床單，蓋的是繡有大紅牡丹的緞子被，枕的是刺有並蒂蓮的枕頭等等。此外還抄出了繡花的拖鞋、折褶裙、毛料褲等東西。這已經是非常的「修」了且不說，有人揭發說這位團委書記談戀愛時，每次外出約會居然還偷偷擦胭脂塗口紅，甚至還戴過一串珍珠項鏈呢。那靈魂裏的骯髒是可想而知的了——難道無產階級會去迷戀這些資產階級的小姐太太才享用的

東西嗎？所以非造她的反，讓這個小女人觸及觸及自己醜惡的靈魂不可。

學生們在她的新房的房門的門框離地不到一米的地方，攔腰扯起一張批判她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革命大字報」。「革命大字報」當然是不能撕壞的，可憐這位剛結婚不久的新娘子，每天只好像狗一樣從大字報下面鑽出鑽進。我當時也跑去看過熱鬧，看來看去愈看愈不明白，心想這些也算是「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生活方式麼？這樣子亂搞也算是「革命」麼？純粹是惡作劇而已。但是惡作劇又豈止這些呢？多得很哩，數不勝數，而且一個比一個荒唐。像高跟鞋當然是不准穿了，要穿就得把高跟敲掉。這且不說，女同志連燙頭髮都不准，也不准留長辮子，據說那都是「封建階級」、「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東西，統統要破掉。大街上還真有那麼些吃飽了沒事幹的中學生，操把大剪刀滿街轉悠，專與女同胞頭上的辮子過不去。一時間清兵入關那陣「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架勢，似乎又捲土重來。但報紙上居然把這些莫名其妙的惡作劇說成是什麼「破四舊」而大加讚揚。

文化革命的深入發展還真叫人思想愈來愈落後於形勢，這不，北京剛揪出個以鄧拓為首的「三家村」，武大也就跟著挖出了一個「武大三家村」※7，包括武大的幹部、教師和工人，竟多達280多名之眾，總頭目就是大名鼎鼎的校長李達。說李達大名鼎鼎那一點也不過份，毛主席來武漢住東湖客舍，他是唯一可隨時求見主席而不會被擋駕的。他可以和主席稱兄道弟，當面叫主席潤之兄；和主席深夜長談後，可以四腳八岔地躺在主席床上一覺睡到天亮。與主席關係親密如此者，中國能有幾個？但他竟被揭發出是「反黨集團」的大頭目，怎不令人震驚。於是在省委的號召下，全市掀起揭批武大「三家村」的狂潮，十幾萬人被組織到武大，憤怒聲討李達黑幫。我們華工自是不落人後，由工作組召集全院師生，在露天電影場狠批「武大三家村」。然後組織了一支數十人的隊伍，由王躍組長親自帶隊，前往珞珈山聲援武大的革命師生。同時一批揭發批判李達「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滔天罪行的大字報，也貼上了學校的大字報專欄。

從大字報內容看，李達不但是「地主分子」、「叛徒」、「逃兵」——那已經是鐵證如山了的——而且一貫地反毛澤東思想，首要罪狀就是

公然反對林彪同志提出的「頂峰論」。林彪說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李達卻說什麼頂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還要不要發展？大字報就說李達是「毛澤東思想最兇惡的敵人」，是「披著羊皮的狼」。所有的批判文章自然都是照例引用了大量的毛主席語錄的，例如「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氾濫」之類。有了「語錄」就有了武器，就有了克敵制勝的法寶，批判起李達之流也就自然不在話下，李達縱是理論界的龐然大物，在革命的大批判面前，也只能是潰不成軍。但是聽參加過武大批鬥李達大會的人說，李達在挨鬥時還頑固得很呢，他居然敢冷笑說革命群眾對他的揭發「全是造謠！造得真像！」，竟敢在批鬥大會上堅持自己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不是叛徒、逃兵。他還說把他拿出來鬥是省委的一個大陰謀，揚言要到北京找毛主席去「告御狀」。

李達的又臭又硬，自然是不必說了，但是他說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還要不要發展，倒真正還是一個理論和現實的問題。我們那時對馬列的書讀得甚少，對毛主席的書卻都讀得很熟，按照毛主席的說法：「客觀現實世界的變化運動永遠沒有完結，人們在實踐中對於真理的認識也就永遠沒有完結，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闢認識真理的道路。」那末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到毛澤東思想這一階段，是否就已經結束了真理，人們對於真理的認識，是否就已經到達終極，到達「頂峰」了呢？答案本來顯而易見只能是否定的，這在哲學上只是一個常識性的問題。但既然「頂峰論」是林彪同志提出來的，而林彪同志又是毛主席最好的學生、最親密的戰友、最優秀的接班人，那麼林彪的話還會有錯嗎？如果林彪在馬列主義的常識性的問題上也會犯錯誤，毛主席又怎麼會選定他做接班人呢？所以林彪加在偉大領袖身上的「頂峰論」是不容置疑的，就像安徒生童話中那件「皇帝的新裝」一樣不容置疑。誰置疑了，誰就不只是暴露出自己的「愚蠢」，而且暴露出自己的「反動」。當安徒生童話中那個天真的小孩終於叫出皇帝可是什麼也沒有穿呀時，老百姓會把這孩子的話悄聲地四處傳播。但我們中間卻誰也不敢揭破「頂峰」的騙局，而對於一位終於敢站出來說真話的老人，大家是一齊撲上前去把他當瘋子往死裏整，這時代真是「進步」得叫人乍舌。

說句實在話，我那時對以否定「頂峰論」為由而定李達以「反毛澤東思想」的罪名，是不以為然的。我一個簡單的想法是：如果馬列主義已經發展到了「頂峰」，那「頂峰」之後豈不是要開始走下坡路了麼？可見「頂峰」之說，貌似馬列其實是反馬列的。但誰敢這樣講呢？我也只是朦朧有些想法，而不敢深入去想，更不敢訴諸舌端。但是聽說武漢大學裏倒是有人敢想敢說，在為李達鳴冤叫屈。而這些不識時務的人，管他老師還是學生，一律被打成李達「三家村黑幫」的殘渣餘孽。揪出這些殘渣餘孽，自然是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而且戰果日益擴大，各個院校都在清查是否還有漏網的「李達分子」或「准李達分子」。

有探馬探得武大化學系有一查姓教授，是我們華工院長查謙之子。於是積極分子們內查外調，想查出查姓教授是否與李達分子有染，以便進而順藤摸瓜，摸出查謙與李達三家村黑幫的關連，希圖以此為突破口，挖出武大「三家村」在華工的分店。但是結果不遂人願，沒有任何線索證明查謙是武大「三家村」在華工的代理人。出師不利愈發激起了革命群眾的怒火，查謙這位一向深居簡出的老物理學家的住宅樓，被狂熱的學生們包圍了，「打倒寄生蟲、打倒吸血鬼！」「揪出反動學術權威查謙」以及「查謙有罪、罪該萬死」的口號此起彼伏。查謙一家龜縮在所住的小樓裏不敢露面，學生們令其滾出來接受批判，否則不但要「打倒」，而且要「火燒」。查謙不怕打倒、就怕火燒，以為學生將如五四時的火燒趙家樓一般，將火燒到他的府上，也顧不得老邁年高，就趕緊由其夫人攙扶著出來，向革命群眾低頭認罪。查夫人很心疼她的老頭子，一手攙著丈夫，一手將一把蒲扇不停地替丈夫扇風，還不時停下扇子，摸出塊手帕替丈夫臉上擦汗，嘴裏不停地咁嚕說，我們查謙王躍組長說了還是要保護的嘛。學生們其實也搞不清楚查謙究竟有什麼問題，只知道他在院裏什麼事都不做，一個月的薪水卻有二三百塊，這不是「寄生蟲」、「吸血鬼」又是什麼？於是就大喊口號以示討伐。多數人自然是在看熱鬧，但也有極少數人不但看熱鬧，而且「看門道」，冷不防就一兩人、兩三人偷偷溜進查謙的書房裏去，翻看那些外面看不到的「內部讀物」。這個拿一本《金陵春夢》，那個取一本《侍衛官雜記》，就津津有味地看起來，看過之後也都放回書架，順手

牽羊摸本書帶走的書耗子似乎還沒有。但後來聽說查夫人背地裏抱怨，說他先生收藏多年的一部珍本書，不知道被誰偷走了。

查夫人的抱怨當然無損於革命群眾的半根毫毛，廣大群眾的革命鬥志日益高漲。像查院長這樣工作組點名要重點保護的一級教授都批鬥了，華工園內還有哪個「學術權威」不能批、不敢鬥？什麼鳥專家、鳥教授，一個個掃地出門，遊街示眾，各系教學樓的走道和教室都扯起了一排排的繩子，繩子上掛滿了大字報，四周的牆壁更不用說是大字報的一統天下了。專家、教授們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罪惡的家庭出身」，乃至各種「醜行」和隱私，都被群眾毫不留情地揭發出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們造船系有一位叫劉穎的教授，是柴油機方面的專家，行業內極有權威的。但大字報說他在柴油機設計上的諸多重大成果，都是從具有實踐經驗的第一線工人和技術員那裏「剽竊」來的。據說有一次為了和外地一所大學的一名同行爭搶一份專利權，竟不惜用公款拍了一份長達5000字的電報，完全是一個不學無術而又熱衷於爭名奪利的「騙子」。機械系一位姓干的教授就更不得了了，曾留學五國，獲英國劍橋大學碩士學位，並曾就讀於英美兩所著名軍事學院，解放前擔任過國民黨臺灣訓練司令部孫立人麾下的少將參謀長，「雙手沾滿革命人民的鮮血」。機械系教學樓專辟了一間教室，來陳列此人為國民黨軍隊設計的大量戰車和火炮的圖紙和照片，作為他反共反人民的鐵證。而這樣一個「罪行累累」的國民黨將領，居然也被朱九思拉進了華工的教師隊伍，可見「走資派」朱九思是怎樣一貫地招降納叛了。

我也曾前往機械系教學樓，參觀過「國民黨反動將領干毅的罪行展覽」。在展覽室的門口，我看見這位頭髮花白的老頭子，脖子上掛著塊寫著「國民黨反動將領干毅」的木牌子，正戰戰慄慄地低著腦袋站著示眾。聽機械系的同學說，每天從早上8點一直到下午5點，這個老頭子都必須老老實實站在這個地方「上班」，接受革命群眾的批判。他的兩個讀中學的兒子，可以在中午給他送一次飯，他也只有趁吃中飯的功夫，才能稍稍活動一下手腳。看著這個木樁似站在那裏一動不動的老人，我心裏覺得很不是滋味。他為國民黨的軍隊服過務不假，但既然能在解放後留在大學任教，必定是得到上級組織認可的，並非朱九

思就能擅自「招降納叛」。而且每天將一個年過半百的老人罰站八九個鐘點，也實在不怎麼人道。我後來被打成反革命時是有過罰站的體驗的，僅僅站上兩三個鐘頭就夠我受的了，我就很詫異當年這位姓干的老人如何就能堅持站上一整天呢？

幾年之後我在轉監到漢口寶豐路監獄時，曾在放風時見過這位干老頭——其時這位「前國民黨反動將領」，已經莫名其妙地被欽定為我這個「前紅衛兵小將」的反革命黑後臺之一，而與我一樣锒鐐入獄了——這位老人雖然老在背時，卻總是一付超然世外與世無爭的樣子。他這輩子歷經滄桑，也許把一切都看得很透，聽之任之，逆來順受。只有這樣，庶幾可以苟全性命於亂世，不然「士可殺，不可辱」，就只好去投湖、去上吊、去刎頸，落個「自絕於人民」的下場。

有一位教過我高中英語的葛老師，不知為什麼，突然悄悄地把自己關在宿舍裏剖腹自殺了。這位已有五十多歲的葛老師，解放前是上海海關的職員，和我父親算是同行，嘰哩呱啦說得一口流利的帶上海腔的英語。大概是出身不好或別的什麼原因吧，解放後就調離了海關。後來就在中學裏當了一名英語教師。六四年不知怎的，葛老師離開上海的家，隻身一人來到武漢教書，就帶我們高中畢業班的課。葛老師的課還是教得挺好的，和學生的關係也處得不錯，我們聽到葛老師自殺的消息時，還當真大吃了一驚。實驗中學的領導曾把我們這些在武漢上大學的校友請回學校，瞭解葛的情況，因為誰也弄不清楚葛為什麼突然自殺。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文化教育系統「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聲勢確實很大，但並沒有人對平素只顧埋頭教學，從不惹是生非的「阿拉上海人」葛老頭懷疑過什麼，豈料葛老頭卻任何預兆都沒有，突然間就「自絕於人民」了。

據實驗的學生說，那天是個禮拜天，都中午了，葛還沒有起床。有同事找他，敲他的房門，卻怎麼也敲不開。第二天到了他上課的時間，仍不見葛的蹤影，這可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教研組的同事把葛的房門撞開，見葛早已經死在床上。葛是用隻刮臉的刀片自殺的，肚子上劃有好幾道很深的刀口，腸子都流出來了。學校就懷疑葛有隱瞞很深的歷史問題，屬於「畏罪自殺」。學校想從我們這些葛教過的學生嘴裏，找到一些有助於揭開謎底的蛛絲馬跡，但我們哪裏能提供什麼有

價值的線索。我們只知道葛老師在我們學生面前表現得很「進步」，每次開主題班會或搞其他活動請任課老師參加時，葛老師總要站起來長篇大論一通，也不管扣不扣題，更不管大家想不想聽，總之是一大套頌揚共產黨偉大英明的「進步話」。千篇一律的「進步話」講得多了，就難免令人生厭，而且給人以做作的感覺。但他講的全是「進步話」，誰又好不讓他講。不過後來想起來，葛的那些「進步話」顯然是故作姿態，是用「進步」的偽裝來掩蓋內心的「反動」，不然為什麼運動一來他就自殺？問題大得很哩。可已經是「死老虎」了，誰搞得清楚究竟是何方神聖？葛的問題只好作為懸案掛起來。

但死罪不問了活罪難逃，學校中五七年的幾個老右派，可是正正經經地要當「活老虎」打。其實「老右派」們平素哪個不是乖乖地夾著尾巴做人，可學生們整治起「落水狗」來，照樣毫不心慈手軟。我們在實驗的校園裏就見識了一些初中生是怎樣整治教工中的「老右派」的，這些楞頭青們手裏提著軍用皮帶，監督那幾個年老體衰的老師幹些最累最髒的體力活，比如掏陰溝哇、背垃圾哇等等。有個眼睛高度近視的女右派，是學校總務室管雜務的。這個年近花甲，頭髮被剪得陰一塊、陽一塊像狗啃了似的老女人，被幾個楞頭青強迫著跪在地上掏陰溝，掏出一堆垃圾後便用簸箕端著，到另一個地方去倒。來回都必須彎腰低頭一路小跑，一點歇息的時間都不給。稍微跑得慢了一點或腰彎得不夠低，楞頭青們手上的皮帶，就會沒頭沒腦地朝老女人的頭上身上抽下來。我遠遠地看那個彎腰扛背在操場上來回跑著的老女人，她哪裏還算個老師，她連人都不是，連隻狗都不如啊。(不久就聽說這位老師不堪凌辱而上吊自殺了)

我禁不住想到我淒零地冤死在外鄉的叔叔，他當年在那遠離親人的地方，也是這樣人不人鬼不鬼地被人驅使嗎？而況我對折磨人的行為一向反感，就問身邊實驗的學生，為什麼要這樣折磨人？他們說那都是學校初中部一些高幹子弟搞的，他們的頭頭是王任重的兒子王三寶。王任重現在是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誰敢說他的寶貝兒子半個不是。這些學生說的大概是事實。王三寶雖然只是個初三的學生，卻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據說五九年「大躍進」時有次毛澤東來武漢，曾當著他父親的面要他改名「超英」(取「超英趕美」之義)。當時還不滿十

歲的王三寶居然頂撞說「超英」是女伢的名字，「抗旨」不改，比後來那位「奉旨改名」的宋彬彬傲氣多了。文革開始後他在學校率先貼出一張題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大字報，矛頭直指學校的一些老師。湖北省委的機關刊物《支部生活》還兩次發表王三寶鼓吹鬥爭「牛鬼蛇神」的文章，可見其了得。

實驗的學生還告訴我鄧小平的弟弟、時任武漢市副市長的鄧鑑也被一夥學生搞到學校來關著，不過對他還算客氣。聽說鄧小平的弟弟被關在這裏，我倒有點好奇，讓學生們帶我去學生宿舍隔著窗子望了望鄧鑑。只見鄧鑑很老實地坐在房間裏一動都不動，真是「虎落平川」只好任人擺佈。像鄧鑑這樣的老幹部如今都左右不了自己的命運，那些「右派」、「歷史反革命」或歷史上有這樣那樣「污點」的人自然更是在劫難逃。兔死狐悲，物傷其類，葛老師一定是不甘也落到這些「污點同事」一樣悲慘的處境而選擇了輕生。不久我從母親那裏得知，我念小學六年級時的班主任張志任老師也自殺了。張老師是教語文的，因解放前在國民黨軍隊做過文書，被七鬥八鬥終於鬥得跳了樓。我聽了後又傷感了一陣。

只是諸如此類的「畏罪自殺」事件，文化大革命中實在是太多了。每每聽到哪個熟人自殺了，哪個名人跳樓了，就免不得讓人一陣心驚肉跳。但階級敵人的窮途末路，卻只是更加堅定了偉大領袖將文化大革命繼續深入下去的決心。事實上偉大領袖那時候早已在他的湖南老家一個叫滴水洞的山溝溝裏，完成了對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偉大戰略部署」，現在他要輕鬆輕鬆一下了。七月十六日，偉大領袖在我們武漢暢遊了長江，游程近三十華里，歷時一個小時。與十年前一樣，依然是「萬里長江橫渡，極目楚天舒」，但偉大領袖所看見的，豈止是頭頂的風雲變化；依然是「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閒庭信步」，但在偉大領袖那運籌帷幄的胸中，豈有片刻的平靜和休閒。當偉大領袖站在快艇甲板上，向著江面上五千游泳健兒喊出「人民萬歲」時，他知道這些無限忠於他老人家的人民群眾，只要一聲號令，就會奮不顧身地為他赴湯蹈火；當他慈祥的目光掃向正在江中歡躍騰挪的青年學生方陣時，他相信這些不諳世事的初生牛犢在即將到來的決戰中，正是一支不惜粉身碎骨，也要為他衝鋒陷陣的馬前卒。他現在就要召喚這些年輕的學生

去投入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大江大海，讓他們「在游泳中學會游泳、革命中學會革命」，去接受一場史無前例的暴風雨的洗禮。至於他們會不會被險惡的風浪所吞噬，至於這場洗禮是把他們變成天使還是魔鬼，這都不是我們的偉大領袖要去考慮的。為了完成偉大的歷史使命，你們「到中流擊水」去吧。

我們就都爭先恐後地跳進去了。

## 第四章

# 槍打出頭鳥

偉大領袖毛主席在漢暢遊長江的消息不脛而走，迅速傳遍大江南北，長城內外，舉國上下一片歡騰。至於這一消息為什麼事隔十天才見諸報端，那是沒有必要去妄加猜測的，因為這當然也是主席「偉大戰略部署」的一部分。但無論怎樣，主席以73歲高齡暢遊長江，則是明白無誤地向全世界證明了他的身體是非同尋常的健康。主席有如此強健的體魄，不但是中國人民的最大幸福，而且是世界人民的極大幸福。想一想這世界上據說還有三分之二在水深火熱中掙扎的勞苦大眾，正盼望著我們在毛主席的率領下去解救他們，就不由得我們要從内心深處，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了。

於是大家在各種集體活動中，就都高呼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高呼敬祝偉大領袖萬壽無疆。還有一首歌叫《萬歲毛主席》，也是革命群眾集會時必唱不可的。歌曲共三段，每段都有八個「萬歲」和一個「萬萬歲」，加起來共是二十四個「萬歲」和三個「萬萬歲」。什麼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在這二十四個萬歲和三個萬萬歲面前，都只好「稍遜風騷」。

我也許是出於天性的緣故吧，從運動一開始就對山呼萬歲、萬壽無疆之類有一種本能的反感。明擺著是封建帝王的一套麼，怎麼會用到無產階級的領袖頭上來了？但我絕不敢將這種念頭表露出來，因為在鬥倒朱九思等一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臭干毅、劉穎等一批「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之後，我們學院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已經深入發展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8的階段了。這「一切牛鬼蛇神」就包

含了所有被認為有問題的老師和學生，當此之時，誰還敢伸出個腦袋接棒子？只要橫掃不到我的頭上，我就樂得優哉遊哉地在校園裏到處看那些橫掃「牛鬼蛇神」的大字報，而這種大字報在學校裏早已是鋪天蓋地，成燎原之勢。

我們造船系三年級有個姓張的同學，出身方面有點不清不白，其生父是國民黨的軍官，但早已在和「共軍」作戰時被擊斃，其母則改嫁了共產黨一位高級將領。這個「國民黨反動軍官的狗崽子」，則隨之有了一個革軍革幹的繼父，雖然因此可勉強躋身於紅五類了，但骨子裏似乎還是流淌著黑五類的血液。張同學平時裏胡言亂語甚多，這一回被班上同學一揭發，遂成工作組手中的黑典型。看看那些大字報揭發出的材料，倒也大開眼界。例如吹捧蔣介石，胡說蔣介石領導抗戰有功，說蔣是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還說要不是日本人打進來，蔣早已把共產黨圍剿光了。張竟敢在他班上的同學中散佈如此反動的言論，真使我們這些一年級的學生心驚肉跳。大字報還揭發說在張同學的一個上鎖的皮箱裏，搜出了一把刻有「中正劍」三字的匕首，幾發子彈，還有一幅國民黨的青天白日的旗幟。不得了，真想變天啦！但是張同學辯解說，那是他後父從國民黨軍隊手中繳獲的戰利品。

張同學的思想意識據說也十分腐朽，竟在同學中公開鼓吹大學生談戀愛甚至結婚都不犯法。而據知情人揭發說，他早在念高中時，就和班上一個富農的閨女好上了。但是張同學大呼冤枉，說念高中時和他要好的女同學，是下中農而不是富農出身，他的階級立場還是沒有搞錯的。但是工作組哪裏聽他詭辯，指示他班上的同學把他軟禁在寢室裏反省。然而有一天張同學趁晚上寢室裏的同學都睡熟時，偷偷溜掉了。第二天工作組佈置他班上的學生，到市內各車站碼頭圍追堵截，但仍然被他金蟬逃殼，一時鬧得沸沸揚揚。

像張同學這樣被工作組重點批判的「典型」，各系似乎都有，比如電機系五年級就有一個女生，其言行也夠觸目驚心，其言論似較我們系的張同學更大膽更反動矣。她曾私下對同學說，毛主席在楊開慧被國民黨抓去後，又在井岡山和賀子珍結婚，後來賀子珍從延安去蘇聯治病，毛又和江青同居，毛是一犯再犯「重婚」罪。她還說平生最崇拜的是作家丁玲，而丁玲是個眾所周知的大右派。她有時又說他最崇拜

的是居里夫人，她將來要做中國的居里夫人。說西方的民主制度不錯，中國也應該搞個議會，搞競選、搞兩黨制，完全是一派「右派言論」。這位女生班上的一些女同學還在大字報中揭發她「品行不端」，說她常常突然鑽進別的女生的被子裏，要和人家親熱親熱，嚇得寢室裏的女生們人人自危。這些材料引得男生們大感興趣，有人甚至專門找到這個女生的寢室登門拜訪，但一律吃了閉門羹。

我們系在校園北面，電機系則在校園南端。一段時間裏兩個系揭批這兩個學生的大字報鋪天蓋地，鬧得犁耙水響，其他系自然也不甘落後，相繼揭出「右派學生」、「壞分子」多人。與此同時，在教職員工隊伍中也挖出不少「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歷史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我們系食堂門口一個十分面熟的三十多歲的女裁縫，也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風暴中露出原形。聽知情者說，那個女裁縫專好勾引大學生，「板栗燉仔雞」，不少找她縫衣服的大學生被她拉下水「燉」過，講得繪聲繪色的，也不知他就怎麼搞得那樣清楚，說不定他本人也被「燉」過呢。但那個「求賢若渴」的半老徐娘肯定不是什麼好東西，因為不久她就被公安機關抓走了。

不過由公安機關出面抓的只是極個別觸犯了刑律的「壞分子」，更多的「牛鬼蛇神」是留在校園裏監督改造，充當革命師生的「反面教員」。那些一般的「右派分子」、「歷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就不用說了，連黨委書記朱九思都被戴上高帽，胸前掛個寫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黑牌，被「革命群眾」押著，在校園裏四處遊街。往日威風凜凜的黨委書記，被迫一邊赤著足在被烈日烤得滾燙的石子路上走，一邊自己敲著個破面盆，聲嘶力竭不停地喊「我是黑幫分子朱九思！我是頭號走資派朱九思！」的口號。其他一些院系的領導也都跟隨其後，各敲各的破面盆，各報各自的家門。

我對工作組縱容學生們這樣搞不是很感冒（湖北方言：不感興趣、不贊同的意思），我仍然堅持認為朱九思是個好幹部。對於逼迫人赤足「遊街」的體罰行為，我也有點反感，從不去湊這個熱鬧。我尤其不贊成在老師和學生中今天批這個，明天鬥那個，搞得校園裏人人自危。和我有類似想法的學生似乎還不少，認為「鬥、批、改」不應該是這樣的搞法，對工作組的不滿情緒在校園裏有蔓延的苗頭。工作組有

所察覺，似乎也緊張得很，指揮手下的積極分子到處搜集情報，以圖加強對運動的控制。

然而有消息傳來，說北京一些大中學校已經在驅趕工作組了，要自己起來鬧革命。我們學校也開始有人秘密串聯，準備抱起團來造工作組的反。為首者姓聶，叫聶年生，是無線電系四年級的學生，出身鐵路工人。此人黑瘦而善辯，人稱聶牛皮。聶牛皮自稱小學不曾入隊，中學不曾入團，大學也不想入黨，乃非隊非團非黨人士。這種大言不慚的「三非分子」自然是性好搗亂，工作組進校後跑不脫是挨整的貨。而壓迫愈深，反抗愈烈，聶便成了造工作組反的閻將。而聶等的消息也真是靈通，不知從哪裏打聽到向學校派工作組的事主席並不知道，是中央幾個領導人趁主席南巡之際背著主席搞的；還說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在北京大學的辯論會上，是站在反對工作組的學生一邊的，說得有頭有腦的讓你不曉得是信還是不信好。諸如此類的小道消息就像長了翅膀似的在華工園內漫天飛，每天直到深夜，學生們還在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就這些消息爭論不休。

階級鬥爭的新動向理所當然引起了工作組的注意，便指使聽命於他們的院文革籌委會，在一塊被稱作三角地帶的地方搭起臨時的辯論臺，擺了桌椅，裝了喇叭，讓同學們就運動中的問題暢所欲言、各抒己見，目的大概是像五七年那樣「引蛇出洞」，然後好聚而殲之。但學生在《人民日報》支援群眾造反的一些社論和從北京傳來的各種對工作組不利的小道消息的鼓舞下，哪裏還把工作組放在眼裏。許多人都上臺去指責工作組犯了壓制群眾革命的錯誤，自然也有不少人為工作組評功擺好。雙方爭辯得耳紅脖子粗，辯急了時簡直就要拳腳相見。

一天晚飯後，我邀了阿玲阿秀去三角地帶看兩派辯論，阿秀突然就鼓勵我說，你不是能言好辯嗎？怎麼不敢上去放幾炮？所謂請將不如激將，我身體裏不安分的那幾顆細胞一下子被啟動了，就真的跳上臺去放了一炮。在照例的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之後，我發言說工作組進我院後，的確是給運動劃了許多框框定了許多調調，感覺上和《人民日報》近一段時間提出的要大膽發動群眾起來鬧革命的精神不一致，對運動的大方向好像也把握得不大準，倒是用了大量精力在普通的學生老師中抓右派、抓壞人。在領導運動方面有些提法也是莫

名其妙，比如王躍組長在一次大會上要求大家先坐下來，用三天時間學習「老三篇」，改造好世界觀再投入鬥批改。「老三篇」當然要學，但是說學三天就可以改造好世界觀，那不是活見鬼嗎……

我話音未落，臺下擁護工作組的一派人就一呼隆起哄來。有人遞上條子說，不准誣衊學習毛主席著作，還有條子說你竟敢說學習老三篇是見鬼嗎？小心砸爛你的狗頭！署名是教務處革命職工。但是也有條子說，你是說學老三篇三天改造好世界觀是活見鬼，並沒有錯，不用慌。我就沉住氣，對著麥克風大聲說，我並不是說學老三篇活見鬼，我是說通過學習老三篇三天改造好世界觀是活見鬼，因為世界觀的改造是個長期的過程，不是三兩天就能奏效的……但是下面一些人根本不聽我的解釋，拼命地起哄，要我滾下來，甚至有一隻破球鞋直朝我飛了過來，我只好逃離會場。跟在我後面的阿玲阿秀，一路上勸我不用怕，說我確實沒有說學老三篇是活見鬼，她們可以做證明的。其實我並不怕什麼，我是氣憤一些人就敢當面歪曲你的意思，然後進行攻擊，實在是太不光明正大，居心叵測得很。

三角地帶的辯論仍然是劍拔弩張，誰也說服不了誰，但工作組的材料庫裏，早已塞滿了各個發言人的發言記錄，錄以備考，那是要派用場的。果然就有一個和我要好而又為工作組信任的班上的同學偷偷告訴我說，工作組按照對工作組的態度劃線，已對各班的學生秘密劃分為左中右三派——擁護工作組的是左派，反對工作組的是右派，態度不明朗的則是歸中間派。據這位同學透露，我是被定為中間偏右。我聽了非常惱火，不就是辯論會上給工作組提了點意見嗎？根本就沒有反對過工作組，怎麼就中間偏右了？越想越氣憤。而從北京源源不斷傳來的小道消息，則說毛主席認為工作組起了阻礙運動的壞作用，一不會批、二不會改，主張「統統驅逐之」。我相信這些傳聞絕不會是空穴來風。而工作組不倒，我這種「中間偏右」的，以後也肯定不會有好日子過，我當然贊成把工作組「統統驅逐之」。

七月底，北京市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有萬人參加的大中學校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宣佈撤銷所有的工作組。毛主席親自到會與群眾見面，劉少奇、鄧小平和周總理在會上講了話。我們武漢各大專院校的師生，也都收聽了這次大會的錄音。我們聽見劉少奇在講話中

說，文化大革命怎麼搞，你們不曉得來問我們，我老實告訴你們，我也不曉得。鄧小平則坦率地承認「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中央的主要負責人在上萬群眾面前如此表態，令我們這些學生感到十分吃驚，又覺得實在難以理解，只有一點是明白無誤的：北京的工作組前腳走，武漢的工作組後腳就得跑。人走茶涼，我們這些右也好中間偏右的學生也好，從此可以高枕無憂。

八月五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公佈了一張題為《炮打司令部》※9的大字報，說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在五十多天的時間裏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隨後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10，首次明確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十六條」的公佈，使反工作組的一派學生受到很大的鼓舞，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更加使這些受到工作組壓制的學生勇氣倍增。造反的學生堅定地認為，偉大領袖毛主席是站在自己這一邊的，有毛主席做後盾，他們還有什麼可懼怕的呢？

不久武漢各大專院校的工作組果然陸續撤走。工作組撤離之前，按照「十六條」的要求，各校都建立了「文化革命委員會」的籌備委員會或「臨時委員會」來領導運動。在我們武漢，這類「籌委會」、「臨委會」無一例外是由省委工作組扶植起來的，儘管「十六條」規定基層革命委員會應該「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選舉產生，但事實上有資格進入「籌委會」、「臨委會」的，都是原來的那些所謂聽黨的話的「好學生」。像我們華工的「革籌會」的主任，就是一名黨員學生，原學生會主席黃某。黃同時還是武漢學聯的執行主席，全國學聯委員。學校的文革籌委會在露天電影場召開全院師生大會歡送工作組離校時，就是由這位黃同學以院文革籌委會主任的身份，在臺上代表全體師生致歡送辭。

那天黃同學在高度評價了工作組進校以來在領導全校文化大革命運動方面的積極作用後，用一種哭兮兮的腔調唱道，敬愛的工作組的同志們啊，我們是多麼想挽留住你們，不讓你們走呀！然而你們已經

完成了自己的任務，還是要走了，我們也實在留不住你們。那你們就走吧、走吧。無論你們走到哪裏，我們的心永遠是連在一起的……黃同學說到此處，已是泣不成聲。然而台下已經騷動起來，只見聶年生率領一支隊伍突然衝上主席臺，搶過黃手上的話筒，大聲宣佈剛才黃的講話不能代表我們廣大革命學生。聶轉過身對坐在臺上驚惶失措的工作組組長王躍說，莫看你今天溜走了，我們會有辦法叫你有一天回來作檢討的。聶手下的人則一齊跺著腳，高舉雙臂大叫「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保工作組的一派人這時也衝上臺來，撲向聶搶話筒。兩支人馬短兵相接，扭作一團，會場頓時大亂。王躍組長趁亂帶著工作組的一干人馬狼狽撤出，全沒了半點昔日的威風。

工作組是撤出了華工了，但工作組長王躍不久又返回來，以觀察員的身份，繼續指導學校的運動。反對工作組的一部分學生，當然不能容忍這種垂簾聽政式的指導，刷出了「王躍滾回去」、「不要沒有工作組的工作組」的大幅標語。工作組原先扶植的院文革籌委會，對這些搗亂分子一籌莫展，校園內一片混亂，而其他兄弟院校也莫不如此，汲汲乎殆哉。於是代理省委第一書記兼省長張體學同志親自出馬，前往各高校巡迴演說，向各個學校的師生宣佈工作組確實犯了壓制群眾的方向性路線性錯誤。張體學並且代表工作組向受過壓制的革命師生賠禮道歉，號召大家團結起來，共同對敵，投入鬥批改。張體學同志姿態如此之高，所到之處，無不化干戈為玉帛，受到大家熱烈的歡迎。

八月二十五日下午，張體學同志巡迴演說到了我們華工這一站。在學校露天電影場的主席臺上，張把他在其他學校演講過的一番話，又重複了一遍。在談到學院保工作組和反工作組的兩派之間的衝突時，張說這完全是一場誤會。他舉了戰爭年代中他親身經歷過的一個例子：有一天晚上他所在的部隊，在一個村口和另一支部隊遭遇上了。天黑互相都看不清，都以為是碰上了敵人，乒乓兵地對打了半個夜晚。等天亮時才發現彼此是友軍，打錯了。張於是說，你們現在兩派的衝突，實際上也就是友軍之間打了一場誤會戰。現在應當消除誤會，共同對敵了。而敵者，就是學院裏像朱九思那樣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干毅之類的反動學術權威。「你們應當把力量集中在他們頭上」，張號召說，「要抱緊拳頭，打出去才有力量！」張省長最後高

呼口號：「全體三老（指老革命、老幹部、老工人）子女團結起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張體學同志的講話不時被暴風雨般的掌聲打斷。反工作組的一派同學們都高興極了，工作組是省委派出的，現在連省委主要領導人都承認工作組犯了壓制群眾的方向性路線性錯誤，並且向受過壓制的師生公開賠禮道歉，那還不是反工作組一派的大勝利嗎？而保工作組的一派，從來都是乖乖聽命於上級領導的，既然省裏的主要領導人都說工作組犯了錯誤，那他們還會說三道四麼？所以也表態堅決擁護張體學同志的講話。大會是下午四點鐘結束的，傍晚擦黑以前，原先針鋒相對誓不兩立的兩種觀點的大字報，統統被擁護張體學同志講話的大字報覆蓋了，揭批學校裏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反動學術權威」的大字報又成了主流。張體學同志一番講話，成功地化解了兩派之間圍繞工作組問題展開的爭鬥，將運動重新引上了鬥和批的預定軌道。

張體學同志的講話應當說無可厚非。他當然知道毛主席否定了工作組，而且早已得到在北京的王任重的「要爭取主動」的指示，所以為了工作組體面地下臺，由他這位省委主要領導人來宣佈工作組犯了錯誤不失為上策：既爭取了主動，也避免了下面揪住工作組不放，順藤摸瓜搞不好連省委也一窩端。而作為一名省委的主要負責人，能公開向一部份群眾賠禮道歉，應當說也難能可貴。這部份群眾不管曾經在工作組的壓制下受過多少委屈，心中的怨結都可以化解了。想想五七年那些因向黨組織或上級領導提了意見而被打成右派的人的遭遇，這一回真是皇恩浩蕩。我這個被工作組劃為「中間偏右」的「准右派」，當然也應該舉雙手擁護張體學同志的講話。

但是我只舉了一隻手，就是舉手贊成張體學同志宣佈工作組犯了方向性路線性錯誤這句話，而不贊成他關於圍繞工作組問題的兩派之間的衝突是一場友軍遭遇打了誤會戰的觀點，我覺得張的這種提法與中央的有關精神是相違背的。《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上宣傳《十六條》精神的社評文章，在談到「革與保」的問題時一再強調說：「一個要革，一個要保，這是關係到兩條路線的鬥爭的重大原則分歧」，怎麼能簡單籠統地說成是友軍之間打了一場誤會仗呢？我對照《十六條》伏案

疾書，以《十六條》為武器，將張體學同志的「友軍誤會論」淋漓盡致地批了個痛快。《十六條》上說，「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裏」，我駁張體學同志的「誤會論」時，就有真理就是在我的手裏的感覺。真理在胸筆在手，似乎有一股浩然之氣在胸中湧動，洋洋千多字的一篇文章連夜就趕了出來。班上幾位同學包括阿玲阿秀，連夜幫我把稿子抄成一張張大字報。他們也都覺得我這篇文章有道理，有說服力，但是當我希望他們也在大字報上簽名時，卻誰也沒那個膽量。畢竟事關省委主要領導人，他們不想冒那個險。我只好署上我自己一個人的名字，讓幾位同學幫忙，把這份長達八張紙的大字報，趁天亮之前，貼到了學院大字報最集中最顯眼的位置——三角地帶一棟校舍的西牆上，然後就回寢室睡覺。

不一會天已大亮，是吃早飯的時候了，我被同學叫醒。他們說貼我那張大字報的地方已經被擠得水泄不通了，全校轟動。我趕緊起床，往三角地帶跑去，果然那兒裏三層外三層人潮湧動，人們都在爭相觀看我貼在牆上的那張題為《省委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大暴露——評張體學同志8月25日在華工萬人大會上的講話》的大字報。我擠到大字報前，只見大字報的空白處已寫滿諸如「完全贊同你的觀點」、「剖析得太深刻了，向你學習、向你致敬」、「我們站在你一邊」等等字句，而周圍的議論也都是好得不得了，所有的人都在談論這個署名船舶系一年級6556班學生魯禮安的「高度的路線鬥爭覺悟」，人們甚至互相在打聽誰是魯禮安？老實說我那會兒得意極了，飄飄然不知道自己的骨頭的份量，感到自己的一份虛榮心得到了極大的滿足。在全院師生一致看好張體學同志的講話時，我卻「獨具慧眼」，看出了其中的大問題，這不是《十六條》學得好，「路線鬥爭覺悟高」又是什麼呢？《十六條》上說：「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他們有魄力、有智慧。他們用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大鳴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堅決地向那些公開的、隱蔽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舉行了進攻。」這段話在我聽來真是太受用了。事實上像我們這樣十七八歲、二十來歲的青少年學生，又有誰不希望自己在這場大革命中，成為一名勇敢的闖將呢？而我因了這樣一張揭露省委領導「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大字報，也就一夜之間在師生們眼裏成了「勇敢的闖將」。

當天上午，學校裏就出現了一邊倒支持我的觀點的大字報。一些高年級同學貼出了「向革命小將學習、向革命小將致敬」的大幅標語，對我表示聲援，許多同學在我的大字報上署上自己的名字，還有不少人跑到我的宿舍來向我學習、取經。其實我哪裏有什麼「經」可取，要說有，也就是那個《十六條》了。只要吃透《十六條》的精神，把運動中的一切現象，都提到兩條路線鬥爭的高度來認識來分析，自然就所向披靡，管他哪一級領導、哪一級權威，都是不在話下的。報上不是天天都在鼓吹「學習十六條、熟悉十六條、運用十六條」嗎？《十六條》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從《十六條》的角度來看，我這張大字報還真符合《十六條》的精神，有理有據，無懈可擊，事實上當時華工園內居然就沒有任何人出面反駁我的觀點。然而《十六條》本身又算什麼呢？它不過是在一個荒唐的年代，憑一種荒唐的臆斷而產生出的一份荒唐的文件，那麼我的「符合十六條精神」的那篇大字報的「革命精神」究竟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我們那時的確是以學習、宣傳、捍衛十六條為榮的。我們在車站、碼頭、街道、公汽上到處宣傳《十六條》，狂熱鼓吹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的「偉大意義」。我們真心實意地以為，我們是在投身於一場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運動。我們現在再不必為自己只能從小說和電影中去追尋那暴風驟雨的革命鬥爭歲月而遺憾，因為暴風驟雨的年代，又已實實在在地來到我們面前。在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生死鬥爭」中，我們責無旁貸，都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忠誠士兵。我們渴望著戰鬥，我們呼喚「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

是的，暴風雨、暴風雨就要來臨了。「在灰濛濛的蒼茫大海上，風聚集著烏雲，在烏雲和大海之間，海燕像黑色的閃電高傲地飛翔。」我們革命青少年就是高爾基的詩中那擊風搏浪高傲飛翔的海燕。北京清華附中首先出現了一支「紅衛兵」※11，不久，紅衛兵遍佈了北京各個中學，成為偉大領袖御用的一支青年近衛軍。毛主席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中寫道：「你們的行動……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採取同樣革命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

八月十八日，毛主席登上天安門城樓，檢閱了北京地區和來自全國各地的數十萬紅衛兵小將。北京師大女附中的一位叫宋彬彬的紅衛兵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當毛主席得知女學生的名字中的彬字是文質彬彬的彬時，便順口說了一句「要武嘛」。這位出身「封疆大臣」的紅衛兵小將也當真機靈得很，像領了聖旨似的宣佈從此按御意改名「要武」，很出了一陣風頭。不久這位「宋要武」風塵撲撲南下武漢，亮出御賜大名的王牌，幫助湖北省委上演了一曲大抓首都「南下一小撮」的鬧劇。

毛主席接見紅衛兵並戴上紅衛兵的袖標後，毛主席便被公認為是紅衛兵的紅司令了。紅衛兵起初主要是由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工人和貧下中農出身的子女組成。這些子女被稱為「紅五類」，而「紅五類」中又以「革幹」、「革軍」的子女的血統最高貴。戴一頂釘有紅五星的綠軍帽，穿一身父輩洗得發白的舊軍裝，紮一條寬寬的軍用皮帶，再配上紅衛兵的袖標，那時是比後來的穿什麼「皮爾卡丹」、戴什麼「金利來」的領帶，都更為榮耀、時尚。北京師院附中紅衛兵在給毛主席的決心書中說，「革命的家譜，就是要通過『革命』二字續下去。」所以在這些時代寵兒寫的大字報裏，動輒便是什麼「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未來者，我們的未來！」之類的豪言壯語，那是一點都不奇怪的。在高貴的「紅五類」腳下瑟瑟發抖的，是那些出身地富反壞右的「黑五類」。「黑五類」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自然是與紅衛兵組織無緣。夾在「紅」與「黑」之間的是家庭出身教師、店員、小業主、小職員和中農等的子女，雖說灰不溜秋的，但總比黑漆麻糊的「黑五類」強一篾片。不過在光芒萬丈的「紅五類」面前，就只好自慚形穢了。

所以當紅衛兵組織從北京向全國幅射時，我這個小職員的後代（那時父親尚未升格為「革幹」）是不敢做加入紅衛兵的夢的。然而未料到班上那位曾任團支部書記時任班文革領導小組組長的湖北老鄉，笑咪咪地發了一個紅衛兵袖標給我，說我在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中表現積極，所以根據黨的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的原則，第一批發展我加入紅衛兵組織。這樣我居然就成為班上第一批六名紅衛兵中的一個，因此也就很神氣活現了一陣。我佩著紅衛兵

袖標上大街宣傳「十六條」，雄糾糾氣昂昂地上臺和人辯論。週末我又佩著紅衛兵袖標趾高氣揚地回家，鄰居們全用驚奇而羨慕的目光看我，我也就愈發飄飄然，像阿Q樣「舒服得如六月裏喝了雪水」。但阿Q在飄飄然地舒服一陣之後，只能回到他的土穀祠裏倒頭睡他的覺，頂多再做一回和吳媽困覺的夢，而我們這些紅衛兵小將可是得到消息，將免費上京接受偉大統帥毛主席的檢閱。說真的，當時我們在學校突然聽到這個破天荒的喜訊時，一個個都快喜瘋了。免費上京，這可真是八輩子都沒有聽說過的事情呀！

我就一心準備戴著「紅衛兵」袖標上北京見毛主席，班上其他同學自然也是一樣的心情。但是上面第一批發下來的紅衛兵袖標只有六個，而其中的一個就套在我這個非紅五類的臂膀上了，沒有得到紅衛兵袖標的「紅五類」們自然不滿。他們是怎樣就這件事詰難我的那位湖北老鄉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湖北老鄉垂頭喪氣地找到我，向我做工作，希望我把袖標交出來。

「班上幾個紅五類出身的同學意見很大，」湖北老鄉愁眉苦臉地說，「認為我不該第一批就發展你為紅衛兵，你能不能暫時委屈一下……」

「沒有什麼，我理解。」我二話不說就摘下了臂上的袖標，儘管一肚皮的不情願。「你還是可以作為第一批紅衛兵上北京的。」湖北老鄉安慰說，但我去北京的熱情已經降到了零點。臂上的「紅衛兵」袖標戴上沒幾天又給交了出去，簡直就是奇恥大辱！你是紅五類，還是黑五類，聽說北京人是很講究這個「血統」的，我何必去那個地方湊熱鬧。至於說接受毛主席的檢閱，我其實並不相信站在廣場上老遠老遠的，能看到天安門城樓上的人影是什麼模樣。何況聽說北京早已人滿為患，吃住都成大問題，何苦一窩蜂湧進去湊熱鬧呢？要去也等以後再去，我就沒有要已經發到手上的那張車票。聽說我放棄了免費上京串聯的機會，全班同學大跌眼鏡。驚訝之後，同學們便三五一夥地爭相趕車而去，只剩下我一人在空蕩蕩的宿舍裏留守。

我就到市內各個大專院校轉悠，看各種各樣的大字報，去得最多的地方是湖北大學。湖大在武昌最熱鬧的閱馬場一帶，有一支號稱「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隊」的紅衛兵，就駐紮在這所學校裏。來自天子腳下

的紅衛兵小將戴著「北航紅旗」、「地院東方紅」等聲名顯赫的袖標，一個個神氣五六揚地招搖過市，引得我們這些土著欣羨不已。這幫子首都紅衛兵懷裏揣著中央文革首長的指令，包裹兜著各種各樣有關兩條路線鬥爭的文件和材料，手持尚方寶劍，自然是以欽差大臣自居。下車伊始，哇哩哇啦，在武漢市內四處轉了一轉，走馬觀花乎？蜻蜓點水乎？反正一下子就憑他們那副充滿路線鬥爭覺悟的鼻子，嗅出湖北省的問題大極了：路線鬥爭的蓋子還根本沒有揭開呢，省市委內肯定有隱藏得極深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還沒有挖出來呢。湖北武漢之所以運動搞得冷冷清清，萬馬齊喑，就是那些黑幫人物在背後搗鬼吧。

面對這批來者不善的首都紅衛兵，湖北省委的大小頭兒們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你好魚好肉地招待這些人吧，他說你是搞經濟主義腐蝕拉攏他；你不招呼好這些人吧，他說你是排擠打擊他，反正是動輒得咎。但不管怎麼說，省委對這些首都紅衛兵，還是不敢有半點怠慢。不但安排他們吃好住好，供給他們筆墨紙張油印機等等，還特別撥了一輛麵包車供他們專用。而首都紅衛兵卻不識好歹，吃飽喝足了，瞌睡睡醒了，就開著那輛架上了高音喇叭的麵包車，耗子似的滿世界亂竄。他們狂呼「炮轟張體學、火燒省市委」，並且一夜之間就將這個「炮轟」、「火燒」的口號刷滿了武漢三鎮，驚得老百姓們像看全日蝕似的，紛紛跑出來看熱鬧。

身為一省之長的張體學同志，幾時受過這口鳥氣，拒不接見要求和他見面的一千多名外地紅衛兵，聲稱「只見左派，不見右派」。被指為右派的首都紅衛兵怒不可遏，會集武漢本地和其他地方串連來漢的學生共兩千多人，就坐在水果湖湖北省委的大院外絕食抗議。省委也不甘示弱，公開號召全省人民行動起來，大抓「南下一小撮」右派學生。張體學抖狠說：「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我就是湖北佬，還怕你們幾個搗亂的娃娃。」娃娃們卻說張體學根本不是湖北佬，是河南佬；不是什麼九頭鳥，是黑幫頭子。張體學又反擊說老子不是黑幫，是紅幫！娃娃們又說黑幫紅幫，都是流氓幫會，張體學是不打自招。張體學急了，在一次會上聲淚俱下地「代表湖北3,200萬人民」控訴北京南下串連的紅衛兵。

北京的紅衛兵娃娃們將省長大人的控訴當作笑料而樂不可支，樂

過之後卻發現自己已經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街頭巷尾，車站碼頭，市民們有組織地三人一夥，五人一群，將戴著首都紅衛兵袖標的學生娃娃們分割包圍，進行辯論。市民們歷數湖北省委建國十七年來革命建設方面之豐功偉績，痛斥「南下一小撮」右派學生的種種謬論。什麼「炮打司令部」、「火燒省市委」，統統是狗屁胡說，右派翻天。北京來的紅衛兵小將縱有三頭六臂，渾身是嘴，在「九頭鳥」們的凌厲攻勢下，也只能是一籌莫展。特別是那些居委會的婆婆爹爹，根本就不管你什麼「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什麼「無產階級司令部」、「資產階級司令部」，什麼「十六條」、「十七條」，反正把你這些「右派娃娃」圍起來再說。胡攬蠻纏，車輪大戰，讓你「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唯抱頭鼠竄而已。而當駐紮在湖北大學的幾百名北京學生竄回自己的駐地時，發現自己的老巢已經被湖大臨革會掀了，同時一篇以湖北大學全體革命師生的名義發出的《緊急呼籲》也貼滿了湖大校園。這篇《緊急呼籲》其實是湖北省委組織人起草的，它稱那些北京南下學生是一股破壞武漢文化革命運動發展的「逆流」，號召全市人民團結起來，與這「南下一小撮人」作堅決的鬥爭。這份《緊急呼籲》很快就散發到了社會上，市民們紛紛回應，「南下一小撮」一時陷於空前的孤立。

幾淪為喪家之犬的首都紅衛兵小將們，卻受到我們這些站在同一壕溝裏的「少數派」戰友的同情和聲援。九月二日，也就是那個《緊急呼籲》公開發表的第三天，我在湖北大學47號平房西側牆上，貼出了一張題為「為南下革命師生呼籲——揭穿『緊急呼籲』的騙局」的大字報，大聲呼喊「中南學生危急！湖北左派學生危急！華北南下革命學生危急！」稱此北京南下紅衛兵為一股強大的真理的洪流，呼籲全市革命群眾站出來支持他們、保護他們，和湖北省委內的一小撮「黑幫」作鬥爭。我在大字報中指責要將南下學生趕出湖大的湖大臨時文革會「只能代表一小部份人」，是「虛假的多數」。我說「少數現階段就是可以不服從多數，道理很簡單，因為真理就是掌握在我們少數人手裏。」我還在文章中挖苦北京南下學生中幾個為自身父母的利益所驅使，曾寫出大字報將其他造反的北京紅衛兵罵為「反革命右派」的高幹子弟為「保皇派」，我在文中對這類「保皇黨」進行了猛烈的炮轟。我的這篇「呼籲」自然是受到了南下造反的北京學生的歡迎，而與北京學生對立的那些人

則不高興了，兩邊的人就在我的大字報上用筆展開了論戰。看人家在我的大字報上槍來刀往地幹仗實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但我承認我的這篇呼籲也脆弱得很，不過像一顆石子扔進池塘，激起幾圈漣漪也就無聲無息了。「南下一小撮」仍然是孤軍作戰，老百姓們看他們就像看一群危險的外星人一樣。

然而「南下一小撮」畢竟是外來的和尚，雖然受到圍攻，也沒有人敢把他們怎麼樣，倒是我這個支持「南下一小撮」的本地學生，被人緊緊地盯上了。同寢室裏有一位姓朱的同學，很注意地記錄下我的一言一行，一時間和院教務處的幾位老爺過從甚密，鬼鬼祟祟地不知咕嚕些什麼。終於有一天這位臉上滿是麻子的朱同學十分詭秘地向我訕笑著說：「你不去東二樓門口去看看麼？那裏好像有一份關於你的大字報……」我見他說得蹊蹺，就跑到東二教學樓門口去看，只見門前的大字報欄裏，赫赫醒目地新貼了一長排大字報，題目是：「揭穿魯禮安的反革命陰謀，捉拿這個政治扒手！」，我一下子驚呆了，但還能沉住氣看完大字報的內容。只見大字報開頭在《前言》中寫道：「華中工學院船舶系6556班學生魯禮安，九月二日在湖北大學47號平房西側牆上，貼出了『為南下革命師生呼籲』的大字報。這是一株大毒草。通篇全是惡毒謾罵歇斯底里的發洩他這個汪偽漢奸的孝子賢孫對黨對社會主義的刻骨仇恨……妄圖在武漢一哄而起，推翻湖北省委，追至中南局，直指黨中央，達到復辟國民黨統治的罪惡目的。」是誰如此惡毒地給我上綱上線我不知道，我對上綱上線也不十分在意，因為運動中這類東西也實在看得多了，只是那句「汪偽漢奸的孝子賢孫」從何提起？於是再看下文：

「魯禮安是個什麼東西呢？其父魯松茂在抗日戰爭時期跟隨汪精衛，投降日寇，當了漢奸，於1942年加入汪記國民黨，成了反共反人民的民族敗類。其母馬淑芳與他的父親是同樣的貨色，同時加入汪記國民黨，一道幹了許多反共反人民的罪惡活動，是人民的死敵，民族的死敵。其外祖母王冬梅是基督教傳教士，其母親十一歲也成了基督教徒，是一條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反華的應聲蟲。」

大字報說，「魯禮安這條沒有凍僵的小蛇清楚地知道，像汪偽漢奸的父母那樣為所欲為，作威作福地騎在人民頭上當老爺是辦不到

了。但又不甘心，就妄圖利用暫時存在的資產階級教育制度向上爬，走個人奮鬥、成名成家的自專道路。長期以來，他『不過問政治』，埋頭讀書，苦攻外文，貪圖混個『教授』、『專家』當當，也夠舒適優裕，名利雙收。說不定還可以撈點政治資本，大小把住點權，也好和平演變，重新上臺，依然故我，光宗耀祖。這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之前，魯禮安的反動的醜惡嘴臉的寫照。

魯禮安萬萬沒有想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紅色巨流，會迅猛異常地衝擊著舊世界，迅雷不及掩耳地震動著舊世界留下來的殘渣餘孽。舊的教育制度就要砸個稀爛，眼看美夢黃梁，好不悲傷！於是一反常態，突然歇斯底里地關心起『政治』來了。頸伸一尺，舌長五寸，發出一聲聲噪叫，射出一股股毒焰，妄圖孤注一擲，挑起一場混戰。一舉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

大字報還說「魯禮安這個漢奸的孝子賢孫，在中學時期就埋下了復仇的種子，妄圖等待時機，捲土重來，繼續爬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認為時機已到，便赤膊上陣，在我院大打出手，極力為主子朱九思鳴冤叫屈……在全院大辯論會上，公然誣衊我院廣大革命師生員工在鬥爭中活學活用『老三篇』是『見鬼去吧』！明目張膽地攻擊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惡毒誣衊活學活用最高指示；他借工作組整風之機，大肆攻擊省委，攻擊張體學同志……把我院運動搞的烏煙瘴氣。」

這張署名「紅衛兵華中工學院教務處八一戰鬥隊」的大字報，除了誣我出身於「汪偽國民黨漢奸」家庭，給我扣上「汪偽漢奸的孝子賢孫」的帽子，通篇大罵我「烏龜王八蛋」之外，實在沒有任何道理可講，有的只是「辱罵」和「恐嚇」。大字報揚言魯禮安之流「若反動到底，堅決與人民為敵，我們就要剝你們的皮、挖你們的心，你們的狗頭就得落地。」然後狂叫黨的階級路線萬歲：「什麼藤結什麼瓜、什麼階級說什麼話，龍生龍，鳳生鳳，烏龜只能生王八，這是顛撲不了的真理。我們還要查你們的祖宗三代……」云云。大字報語氣及文字之惡毒、兇狠、橫蠻及下流，是我自文化大革命以來從未見過的。我所見過的批判文章，火藥味最濃者也僅止於「砸爛狗頭」之類，像「剝皮挖心」這種血腥的語言尚不多見。二戰時德國法西斯納粹是剝過猶太人的皮做燈

罩的，日本鬼子也挖過中國老百姓的心肝去喂他們的狗。但德國納粹日本鬼子那是屬於畜生之類的，我們堂堂高校教務處的衣冠楚楚的老爺們莫非也畜生一般，性好吸血麼？後來知道文革中的確有將冤死者活人取腎以供某位高幹子弟治病之用的事，方知「剝皮挖心」也並不是句空話。

那麼教務處一幫自稱「紅衛兵」的老爺，究竟為什麼對我懷有如此深仇大恨呢？據大字報說：「你們父母當政之時，對我們的父母是何等兇殘狠毒，剝削壓榨、任意殺戮，特別是對我們革幹子弟，更是斬草除根，一個不留。這血海深仇，我們一定要報，一筆一筆進行清算！」原來如此。但是「冤有頭、債有主」，解放前我的父母只不過是倆貧困潦倒的小學教員（父親也只是在解放前三年才考進海關作了一名頂小的職員），無權無勢，幾時「當政」過？又剝削壓榨誰了？任意殺戮誰了？從來老實巴交，連螞蟻都不忍心踩死的父母又對誰個「斬草除根，一個不留」？「血海深仇」縱有天一樣大，似乎也不應該「報」到我們這樣清白無辜的平民百姓頭上來。

從我用大字報抨擊了張體學省長在華工的那篇講話之後，我就等著有人用事實和道理來與我辯論，然而沒有。我在湖大貼出「為南下革命師生呼籲」的大字報，也沒有引出誰來和我面對面地交鋒，這是很令人寂寞和無奈的。我相信真理就像燧石，只有通過敲打才能發出光芒。現在對手總算雄赳赳地打上門來了，長達十幾張的大字報也似乎很有氣勢，然而一上來劈頭就是「揭穿反革命陰謀」、「捉拿政治扒手」，就是「汪偽漢奸的孝子賢孫」、「烏龜王八蛋」的破口大罵，哪裏有一絲一毫辯論的氣味？對於挨罵我其實是有準備的，上綱上線也不足懼，但像教務處的老爺們這樣子祖宗三代地濫罵，以至於恨不得拿我「剝皮挖心」，確實完全超出了我的想像。好在身正不怕影邪，教務處的老爺們一跳三丈高地潑婦罵街，只能表明他們虛弱。只是這幫人口聲咬定我的父母是汪記國民黨員，那倒是需要認真對待，不可不弄個明白，否則華工園內將無我的立足之地。於是我也掏出鋼筆和本子，準備抄下這張大字報的主要內容。

「你用不著抄了。」忽然有人靠近我說，掉頭一看是不認識的一個中年幹部。只見他虛胖的柿餅臉上掛滿油汗，一雙鼓泡浮腫的金魚

眼，不懷好意地在我身上溜轉。「文章就是我們寫的，已經拿去付排，馬上就可以印好，印出來後可以送給你一份的。」

「你們寫的？」我打量了一下金魚眼，好像有點印象。

「不認識麼？哈哈，那次在全院辯論大會上，你說革命群眾活學活用老三篇是活見鬼時，第一個遞條子警告你的就是鄙人呀，我們早就交過火的嘛。」金魚眼頗得意地炫耀說，一邊轉著腦袋環視圍上來的眾多學生。

「你……你們怎麼敢在大字報上公然造謠？」我指著那張大字報怒不可遏地質問道。

「造謠？造什麼謠？」金魚眼頭歪了歪，眉頭皺著反問說：「我們哪一句造謠了，嗯哼？」

「你們怎麼敢無中生有，誣篾我的父母參加過汪記國民黨？你說，你們有什麼證據？」我指著金魚眼的鼻子大聲說。這時越來越多的師生都圍了過來，我們班那個姓朱的同學也混在其中，非常幸災樂禍的樣子，連一臉的醬油麻子都興奮得一跳一跳的。

「哼哼，證據麼？自然是有的，」金魚眼冷笑說，「老實告訴你吧，我們不但查過你的檔案，而且查了你父母的檔案，我們還要查你祖宗三代。你父母四二年參加汪偽國民黨投靠日本人充當漢奸，是一個確鑿無誤的鐵的事實。聽著，確鑿無誤！歷史是篡改不了的，醜惡的家史永遠是醜惡的家史。俗話說，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狗崽子永遠只能是狗崽子，你記清楚好了。」

「哈哈哈，原來是個狗崽子呢！」我聽見我們班上的那位姓朱的同學故意怪叫了一聲。自小到大頭一回憑白無故地被人罵為「狗崽子」，我感到奇恥大辱，眼淚都快出來了，簡直就恨不得撲上去和金魚眼們拼命。這時班文革領導小組組長那位湖北老鄉突然出現在我面前，他一把抓住我的手就往外走，一邊說，「莫要跟這些人頂了，大字報上那些侮辱人的話不用理它，但是你必須馬上回家一趟，向你父母問清楚大字報上說的參加汪偽國民黨的事究竟是麼回事？無風不起浪，這裏面肯定有什麼名堂的，你只有把事情弄清楚了才好辯護。如果教務處的人真的紅口白牙亂咬人，我和你一起去找他們算賬。」我覺得湖北老鄉說得很在理，就趕緊出了校門乘車回家。一路上怎麼也不會想

到，教務處那幫人的爪子，竟已先我一步伸到我在漢口的家中——我的家被抄了。

我們住的樓房的大門口的牆上貼上了一張告示，告示上照搬了幾句教務處那張大字報的內容，並宣佈對「汪偽國民黨漢奸魯松茂馬淑芳的住宅實行抄家的革命行動」。落款除了那個紅衛兵教務處八一戰鬥隊，還加上一個動力系中南海紅衛兵戰鬥隊，而這個「中南海紅衛兵」我是知道的，在華工是死保工作組的「鐵杆」，而此刻居然勾結教務處的老爺，幹起破門抄家的事來。我不知道抄家是從哪個朝代就有了的，只知道歷代抄家的對象，好像都只限於那些大貪官大豪紳，平頭百姓倘非犯下謀反的大罪，似乎是不在被抄之列的。像這樣隨便哪個烏組織的人，只要掛上一個什麼袖章，就可以擅入民宅大抄其家，全然無法無天的勾當，恐怕只有希特勒的黨衛軍對猶太人幹過。

但我也是一名紅衛兵，我家也不是什麼黑五類，我不能容忍一些自稱紅衛兵的暴徒在我家中為所欲為。我衝上二樓，只見家中滿地都是翻過的書籍、紙片和橫七豎八的衣物，還有幾個踩碎的鏡框，打破的玻璃杯的碎塊，一片狼藉，慘不忍睹。而幾個戴紅衛兵袖標的男男女女，還在手忙腳亂地翻七翻八。我的父母親則並排站在窗子旁邊，默默無言地看著這些穿靴戴帽的強盜翻箱倒櫃。「住手！」我站在門口大喝一聲說：「你們是些什麼人？憑什麼抄我的家？誰允許你們抄的？」

那幾個男男女女，幾乎是同時掉過頭來看我。其中一個紮羊角辮的女學生揚揚手臂，顯了顯臂膀上的「紅衛兵」袖標說，我們是動力系中南海紅衛兵，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指示，對你們這個汪偽國民黨實行抄家的革命行動。這個紮羊角辮的丫頭片子似乎是這一夥人的頭，尖下巴、小眼睛，五官擠在一起讓人怎麼看怎麼不舒服，說話卻十分放肆，搞得我火冒三丈，直想衝上去扇她一個嘴巴。但是貼窗站在屋裏面的父母直朝我搖頭擺手，生怕我惹事。母親並且說，他們要抄就抄好了，反正我們家沒得什麼見不得人的東西。那羊角辮娥眉一揚冷笑道，真沒有見不得人的東西嗎，那這張照片算什麼？說著從翻出的一冊照片簿中，抽出一張揚了揚。「你說你們歷史清白，歷史清白怎麼和國民黨反動軍官坐在一張凳子上照相呀？」羊角

辮抖動著手裏的照片，對我的母親譏諷道。又轉身對我說：「你不妨也過來見識見識嘛，看看你的母親當年是和些什麼樣的人打得火熱——國民黨反動軍官呀，這就叫臭味相投嘛。」羊角辮邊說邊打開毛主席語錄念道：「毛主席語錄第13頁第二段。」屋子裏那幾個同夥便齊刷刷地打開語錄本子大聲念起來：「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什麼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麼人站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但是母親平靜地說：「照片裏穿軍裝的是我讀漢陽訓女中學時的高班同學，叫楊主愛，和我合照時是當時南京國立體育專科學校的學生……」

「體育學校的學生？那為麼事披一身國民黨的軍裝，有沒有搞錯哇？」羊角辮小眼一翻說，「你用不著替她打掩護。」

「我只是實事求是，」母親繼續說，「那是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時，楊主愛報名參加國民革命軍26路軍31師戰地服務團，隨有名的抗日鐵血將軍池峰城開赴徐州前線……」「住嘴！」羊角辮叫起來，「什麼鐵血將軍，國民黨只有逃跑將軍、投降將軍、打敗仗的將軍……」母親不理會她，繼續說：「台兒莊一役，她出生入死，積極救護傷患，是戰場上唯一的一名女大學生。台兒莊大捷後，主愛回到武漢，母校訓女邀她報告前線情況。我們許多師生紛紛與她合影留念，視她為抗戰的明星，訓女的驕傲……」「不聽了，不聽了，」羊角辮揮手打斷說，「沒得哪個想聽你替國民黨軍官評功擺好，我們也從來沒有聽說過什麼抬兒莊抬爹莊，誰知道你是不是在瞎編。」「怎麼是瞎編呢？」母親搖頭說，「台兒莊大捷是抗戰中震驚中外的一次大勝利，殲滅日寇近萬人哪……」「近萬人算什麼？」羊角辮一臉的不屑，「我們敬愛的林副統帥親自指揮的平型關戰役，一仗就殲敵好幾萬呢，那才叫大勝仗！」「你恐怕搞錯了，」母親笑一笑糾正說，「平型關一仗殲敵一千多人，我教過歷史的……」羊角辮當場獻醜，氣急敗壞地打斷說：「你這個國民黨死硬分子就是專門美化國民黨，和革命人民作對。」也許是自知對歷史一竅不通，出了洋相，羊角辮無心戀戰，急忙指揮手下的一夥嘍羅，把查抄的一堆舊書舊報紙、筆記本和舊照片裝進一個大口袋，就準備開溜了。

我站在門口兩手撐住門框大聲道：「哪個敢把東西帶走？先拿公

安局的搜查證來！」羊角辮一夥人擠在門裏面，叫嚷說：「闖你個鬼去，還要什麼搜查證呢。我們是向街道和派出所打了招呼的，這包書報照片我們要帶回去好生檢查檢查，要查出你們搞資本主義復辟的罪證。」這時母親走過來讓我放他們出門，說就讓他們查好了，查一查放心些。為人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心不驚，怕什麼呢？就推開我到一邊放這夥人出了門。我氣得要命，突然就想起來問母親，「學校教務處的人貼了大字報說你和爸爸四二年參加過汪偽國民黨，究竟怎麼回事呢？如果你們真的參加了，那我是要和你們劃清界線的。如果沒有，我非找教務處的人算賬不可」。

母親聽了歎口氣說：「說來話長，那是四二年淪陷時期我在漢陽三小當教員時，曾聽見校長說過大家都要集體參加國民黨。但一沒有寫過申請、二沒有辦過手續、三沒有參加過任何活動。當時是聽說漢陽縣政府內政科長張定修曾擬籌辦國民黨漢陽縣黨部，但後來就沒了下文，集體參加國民黨一事也就沒再聽人提起。你爸爸那時在漢陽二小教書，也聽說過這事，但也是不了了之，我和你爸爸參加國民黨的問題就是這樣一回事。解放後登記敵偽黨團分子我們是向政府登記過的，但政府的人說像這種由上級口頭宣佈大家集體入黨那是不能算數的，不用登記。55年政審組織上也就這個問題作過審查，結論是我和你爸爸都是政治上無問題，這些檔案裏都是記得一清二楚的。你們學校教務處的人身為國家幹部卻信口雌黃，簡直不是東西！這種人絕非善類，你千萬莫要去碰他們，也不要去找他們算什麼賬。」但是我血氣方剛，豈能忍辱，就咆哮說：「這幫狗東西歪曲事實，造謠惑眾，我饒不過他們！」說完我就要回學校去。但是母親死死揪住了我，接著父親過來拉了母親的手，兩個人一起忽然跪在了我的面前，我一下子驚得不知所措。只見老實巴交的父親流著淚說：「早就知道你會闖禍的，果然就闖下禍來了。共產黨的官都是何等厲害的人物，你敢反他們，豈會饒得過你，這不就抄到家裏來了嗎？當年你叔叔不過說了一句實話，就被打成右派含恨至死，這教訓你如何就不記得，你還想去找誰算賬？忍口氣趕快向教務處作檢討，我和你媽媽就求你這一回了。」

我也流下淚來，連忙把父母親扶起，說：「現在不是反右那時候了，現在是黨內有一部分人當官作老爺搞修正主義，成了走資本主義

道路的當權派。是毛主席號召我們革命學生，炮轟這些黨內的修正主義分子，保證我們的黨和國家永不改變顏色啦。爸爸媽媽從來都最聽黨和毛主席的話，應當支持我才是。」一番大道理說得父母也無話可說。

那天晚上，我向父母親講述了我所知道的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情況，特別講了毛主席寫的那張「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我說劉少奇可能就是主席指的那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睡在毛主席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他們妄圖開歷史的倒車，使勞動人民吃二遍苦、遭二禱罪，這是關係到黨和國家以及人民的前途和命運的一場生死鬥爭呀！」我非常激動地對父母說，「像我們學校教務處的那幾個老爺，就是黨內那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社會基礎。他們如喪考妣地罵娘，證明我的大字報擊中了他們的痛處，觸犯了他們的既得利益。我絕不能屈服於這些人的淫威，只能和他們鬥爭到底。等明天回校後，我就馬上寫大字報澄清『汪偽國民黨』問題的真相，讓他們的陰謀破產。」

那天晚上我還聽母親詳細地講述了她那個同學楊主愛的故事。母親說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愛國學生運動發生後，國民黨當局封鎖了長江江面，以阻擋武昌學生過江會合漢口學生遊行示威。當時身為訓女中學生會主席的楊主愛在操場上振臂一呼，不願做亡國奴的跟我來！率領大批學生直奔國民黨漢口市政府，迫使當局答應開江通航。那時上海《申報》還專門報導過楊的事蹟，讚揚楊的愛國主義精神。母親當時便是楊麾下的一員大將，至今仍以此為自豪。那些攻擊母親與楊姨媽是「臭味相投」的人算是說對了，都曾是愛國的熱血青年，「臭味」怎麼會不「相投」呢？母親那天晚上還念了一首當年訓女校刊上刊登的送主愛畢業的小詩：中國人的身材，外國人的氣概，雄雄糾糾，慷慨慷慨，楊府英才。此去莫徘徊，國事人事多關懷，主愛人愛我也愛。聽了母親的介紹，我對這位楊姨媽敬佩得五體投地，心嚮往之，很想什麼時候能拜會這位女中的大丈夫。我想無論什麼時代，國家和社會總是要有一批血性的青年，作它的中堅。沒有一批敢於直面人生、追求崇高的青年，國家民族斷無希望。不是說青年人是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嗎？如果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都無力發出耀眼的光芒，

這個民族的前途，不是很要讓人憂慮嗎？我願以楊姨媽為楷模，作推動時代前進的前驅者。現在文化大革命才開始，我就受到了許多的挫折和打擊，我能挺住嗎？我想我是能夠的，我必須學會堅強。

一夜就這樣過去了。第二天上午，打算吃過早飯就告別父母回華工去的，不料又來了一批抄家的「紅衛兵」，一個個半老不小的女同胞，竟是母親學校的老師。也不知道誰通報學校我家被華工學生抄了，大約是想「汪偽國民黨漢奸」的家，人家抄得我們為什麼就抄不得，總之阿Q的一套理論，於是就有六七個學校的同事戴了「紅衛兵」的袖標，鬼頭鬼腦地抄上門來。大概是礙著點「同事」的面子，不像華工的「紅衛兵」直說「抄家」，而是換了個花樣，聲稱是來幫助我們家「掃四舊」。「四舊」誰家沒有，然而諸君不掃門前雪，專管他人瓦上霜，莫名其妙得可以。而尤其莫名其妙的，是這些三四十歲的「紅衛兵」女將專門對珠寶首飾、黃金美鈔感興趣，翻箱倒櫃，挖地三尺，一心想要找出點財喜來。

可惜我家美鈔是沒有的，只找出幾枚小面值的港幣，是父親從九龍帶回的。金銀首飾也甚少，僅抄出一根 22K 的金項鏈和一隻小小的戒指，幾位女教師遂十分的失望。但是有一位姓唐的胖子斷定說我們家的「黃貨」絕不止這一點點，「我曉得這些東西是藏得很隱蔽的，土改時鄉裏挖地主的浮財我見過，我知道這些東西通常藏在哪裏。」唐胖子一邊說一邊扭動其碩大無比的磨盤似的屁股，走近我母親用的京櫃，就是馬桶，打開蓋子，一手捂鼻一手就拿支棍子在馬桶裏攪動。母親站在一邊好笑說，唐胖子，那馬桶裏真的是一桶的金子呢，你們都不妨上來攪一攪。眾人一條心，糞土攪成金嘛，你說是也不是？唐胖子臉上臊得紅一陣白一陣的下不了臺，就恨恨地說：「你這個汪偽國民黨還不放老實一點！」母親冷笑一聲說，什麼汪偽國民黨？我還真不夠那個格。可學校裏誰不知道你唐胖子，倒是個貨真價實的國民黨三青團員呢？怎麼不就著馬桶湊過去，把自己也照一照。幾句話漲得唐胖子倒憋了一口氣，半天說不出話來。

這時領頭的一位老師走過來，遞給母親一張清單，上有金項鏈一條、金戒指一枚、袁大頭兩個，以及港幣若干，一律「充公」。金銀首飾和袁大頭說是屬於「四舊」之列必須沒收，還有個說頭，那幾枚港幣

呢？據說是涉了「裏通外國」的嫌。嗚呼，吾何言哉？但是母親很想得開，她說珠寶首飾，都是身外之物，抄就抄走了，只當是那年病重時，全變賣換成雞蛋吃進了肚裏。只是那枚戒指有些可惜，因為是結婚時父親送的信物，再困難時都沒有捨得變賣的，邊說邊唏噓了一陣。「捨財免災唄。」一直垂頭喪氣的父親冷不丁也咕噥了一句，以作自我安慰。

然而捨財也未必就能免災。就在我返校的第二天，家中又遭到了再一次的洗劫。我家所在的那個居委會，派了一群街道積極分子，也上我家來幫助清了一回「四舊」。家中還有幾本殘存的舊書舊報，積極分子們不感興趣。積極分子們感興趣的「金銀細軟」，又被母親學校的那幾個老師們先一步悉數充公，積極分子們便來了個撒網式的竭澤而漁，將我家中的棉襖皮襖毛衣綢褂乃至緞面被褥凡值錢一點的衣物悉數搜刮一空。四川有句民諺說：賊來如梳，兵來如篦，官來如剃，現在我們家算是梳過一遍篦過一遍最後又剃過一遍，一室半空，真正是「夾皮溝遭劫」了。父親又心痛又著急，說連過冬的衣被都抄走了，這日子還怎麼過？

我自然是忍無可忍了，我家之所以成了各路土匪輪番踐踏的「夾皮溝」，不就是因了教務處那張大字報嗎？我就寫了篇「十萬火急闢謠，最最嚴正聲明」的大字報，澄清所謂「汪偽國民黨問題」的真相。我說「我父母在政治上是清白的，審幹時組織上早已有過結論……對於解放前國民黨的一套卑鄙手法，教務處的老爺們應該清楚。」就是這一句「教務處的老爺」，竟引得那個教務處「八一」戰鬥隊的老爺一蹦三丈高的暴跳如雷和更加竭斯底里的狂罵，他們馬上發表了一篇叫做「揭穿魯禮安的又一個新陰謀」的大字報。他們在大字報中窮兇惡極地罵道：「告訴你這個混帳王八蛋，『國民黨的一套卑鄙手法』你要繼承，就去請教你的烏龜父母。汪偽漢奸國民黨為什麼偏偏要拉你父母，而不拉勞動人民？為什麼國民黨的大小小偽軍官要和你的父母親媚、合照，如魚得水、如膠似漆，打得火熱，真是魯家得天獨厚！小子魯禮安，你想翻天嗎？去見你的乾爹蔣該死去吧！」

針對教務處老爺們的瘋狂謾罵，我又貼出一張題為「辱罵和恐嚇絕不是戰鬥」的大字報，但是我的大字報貼出不到一個鐘頭，就被針對

我的「揪出」、「砸爛」之類的標語覆蓋了。教務處的老爺並且利用手中的權力，指示學校印刷廠將他們攻擊我的三篇文章，付印一萬份，裝訂成冊，在全校廣為散發和張貼，並且郵寄至市內和全國各個大專院校，一時「汪偽漢奸」、「政治扒手」的帽子滿天亂飛。周圍的同學們見了我，就像避瘟疫似的唯恐避之不及。我頓時成了不可接觸的賤民，如魯迅先生說的那樣，「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

我很沮喪，百無聊賴，就在校園裏到處轉悠，看兩派的大字報，看北京方面傳來的消息。

有天大字報欄裏出現了北京一個叫譚力夫的大學生在一次辯論會上的講話。這個高幹子弟口才真個了得，似乎頗有點將稻草說成金條的本事，竟能振振有詞地將當時流傳甚廣的一副混帳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上升到政策理論的高度來闡述。說應把這副對聯中的觀點，作為「全面的、策略的黨的路線來推行，要提升為政策、上升為本本」。聽說譚力夫的這個講話，很受到一些省市領導人的欣賞，有的省市甚至把譚的講話作為文件印發到基層。一些地方還出現了《力夫語錄》、力夫論什麼什麼的，差不多可以和偉大領袖平起平坐了。東南有個省份，不但印發了幾十萬份譚的講話，而且不少單位還規定，每天要有半天時間學習譚的講話。譚力夫的這套東西一時大行其運，似乎真的要「提升為政策，上升為本本」，變成黨的基本階級路線來推行了。

但是這樣一來還有「黑五類」子女的出路嗎？

我這個正被人視為「黑五類」的「狗崽子」，自然對這副對聯極為反感。這不是明目張膽地鼓吹封建地主階級的那套「血統論」※12麼？簡直就是我們學校教務處的老爺們那套「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謬論的翻版。一套破亂垃圾，什麼時候竟變成無產階級的「革命理論」了？還要「提升為政策，上升為本本」，豈不荒唐！但在這個問題上哪裏有我們這種「狗崽子」的發言權。有一天在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看抄有譚力夫講話的大字報時，倒是聽見旁邊有人反對這副對聯。他說毛主席還不是出身「富農」然而……但他尚來不及「然而」下去，就被旁邊的「紅五類」學生扯到一邊，一陣拳打腳踢幾乎揍了個半死。這些自稱

「自來紅」的「紅五類」們既能動口，口若懸河；又能動手，手辣心狠，我們這些所謂出身不好的，哪個還敢伸出腦殼挨棒棒？

不久，各大院校赴北京接受偉大領袖檢閱的各路人馬，開始一撥一撥地殺回武漢來。這些在北大清華的校園裏取得了造反真經的學生，哪怕原先是傾向保守觀點的，也都扛起了「造反有理」的大旗，向省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地開起火來。造反派學生雖然在各個學校裏人數上仍處於劣勢，但能量很大，與革籌會或臨革會控制的保守派紅衛兵（即工作組扶植起來的所謂老紅衛兵）形成瓶角相持之勢。我們學校教務處的老爺們，現在忙於和教務處的造反派廝殺，無暇也無精力追打我這個「落水狗」。周圍的同學見到我也不再那麼回避了，有的人碰了面還會主動和我打個招呼。

形勢似乎正在悄悄地發生變化。

但「血統論」仍然很有市場，許多人儘管並不贊成「血統論」那一套，可少有人敢公開說出自己的觀點。「黑五類」出身的，更是噤若寒蟬。

環視周圍，大狗在叫，小狗也在叫，但它們大都是所謂血統高貴或血統純正的狗。

血統卑賤的狗為什麼就不能也叫一叫呢？我也想叫一叫。

什麼時候才能輪到我們也能叫呢？

## 第五章

# 正西風落葉下長安

學校裏想叫幾聲的「狗崽子」或「喪家之犬」，又何止我一人。

我們系有位老師，據說多年前曾犯過「作風」方面的錯誤，文革中被同事們以「壞分子」視之，自然也被剝奪了參加「革命」即「叫幾聲」的資格。這位老師面對如火如荼的革命鬥爭形勢，忍受不了被人冷落一旁的孤獨，在校園裏像熱鍋上的螞蟻似的到處轉悠，向每一個他熟識的或並不熟識的人訴苦。我就見過他攔住幾個他教過的學生，申辯自己的「作風問題」。似乎是說多年前發生的那件事，主要責任不在他，而在女方，而且事情是早已經組織處理了的，不應該至今還要抓著不放。他抱怨說，現在大家都在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起來造反，為什麼就獨獨剝奪他造反的權力？聽他嘮叨不厭其煩把這些話翻來覆去地講，我覺得這個人快變成祥林嫂了。或者也有點像那個阿Q，他急著要革命，但是人家卻不准他革命，於是他就再沒有別的路可走。我真的很擔心時間長了他會不會急成神經。

還有一個學生，記不得是哪個系的了，只知道他是地主家庭出身。他的出身問題我是在大字報上看到的，而寫這張大字報的正是他本人。大約也是因為出身不好，這個同學在班上受到了「革命群眾」也就是「紅五類」出身的學生的排斥或打擊。他大概想黨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以選擇」，「重在表現」，於是趕快「表現」一番——貼出一張題為「站穩階級立場，和反動家庭徹底決裂」的「革命大字報」，用最惡毒、最難聽的語言，將自己所出自的家庭和自己的「地主老子」臭

罵了一通。大字報最後的署名也很有點意思，稱自己為「一個反動透頂的地主家庭出身的該千刀萬剮的狗崽子」。

為了取得「革命」的資格，便如此作踐自己和自己的生身父母，何苦呢？魯迅先生說，一個人竟乏到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就難免被別人打嘴巴了。不過話是這樣說，想想自己剛一看見教務處的大字報指我父母參加過「汪偽國民黨」時，還不是趕快跑回家質問父母，對父母說倘真有這種事，就要和他們「劃清界限」麼？是什麼東西將我們都變得六親不認了呢？

我就非常羨慕那些出身「紅五類」的學生，他們頭上沒有辮子，可以無所顧忌地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像無線電系那位鐵路工人的兒子聶年生，他就什麼事都敢幹——敢想敢說敢做敢革命敢造反。比如前幾天華工臨革會召開全校師生大會批鬥原校黨委書記「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朱九思時，老聶就帶領他的一幫人衝了會場。他們不但把朱九思帶出會場保護起來，並且就利用這個現成的講壇，揭露臨革會是用「打死老虎」來轉移批判省委工作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方向，把批鬥朱九思的大會，變成了譴責臨革會和控訴省委工作組的大會。臨革會一班人狼狽不堪，卻把老聶他們一點辦法都沒有。

這件事發生後不久的一天早上，我在學校的「三角地帶」看大字報時，碰到了聶年生。他很關心地問我教務處整的那些有關我父母歷史的材料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將情況如實地告訴了他。他嗯嗯兩聲，點點頭說，原來是這樣，原來是這樣。他要我不用怕教務處的那些人。

「他們那些人，秋後的螞蚱——蹦躄不了多久了，這是可以肯定的！」老聶揮動著一支手，非常自信地說，「毛主席支持我們學生造反，號召我們『造反有理』，有毛主席撐腰，我們還怕什麼？一切阻礙革命的人，不管他是誰，是怎樣的龐然大物，都統統不在話下！但是沒有自己的隊伍不行，我們首先要組織起自己的隊伍。」

我知道老聶這樣對我說的時候，他其實已經在做這件事了。去北京串聯之前，他就在招兵買馬拉隊伍，到北京接受檢閱後，他們就在天安門廣場上宣佈成立了一支名叫「紅色造反團」的戰鬥隊。「紅反團」中有位叫李琳琳的女生，是我讀「實驗」高中時的老同學，這件事就是

她告訴我的。我實在很想加入老聶的隊伍和他一起幹，於是支支吾吾地把自己的想法提了提。老聶並不正面回答我，只是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說，「我知道你現在的處境不太好，比較孤立。沒關係，事情慢慢會好起來的。毛主席說過嘛，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你是我們學校第一個用大字報批判張體學同志的人嘛，聽說中央有精神，凡貼第一張大字報的人，都要保護。你在反對工作組、批判省委錯誤路線鬥爭中的表現，是有目共睹的，誰也否認不了。至於父母的歷史問題，不管是真的還是假的——就算是真有那麼回事吧，也是父母那輩人的事。出身不由己，道路可以選擇，我們總不能因為父輩的問題，就不許人革命吧？那不符合黨的一貫政策。」

到底不愧是老聶，一套一套地吹起來，的確很「牛」很有「水準」的，但他就是不明確表態，究竟我能不能夠加入他的隊伍。後來聽李琳琳透露說，老聶拉的這支隊伍，對隊員的「成分」要求很嚴，必須是「紅五類」的出身。李琳琳說老聶這樣做也是不得已，造反派還處於弱勢地位，為了不讓對立面抓辯子，只能以「紅五類」對「紅五類」，老聶認為這樣做至少在隊伍的純潔性方面不會輸給對方。老聶既然是這種想法，像我這種出身被人塗得烏漆墨黑的人，自然不符合他的標準，他當然不會考慮吸收我加入他的隊伍了。

老聶不談我加入他隊伍的事，卻問我看過昨天的晚報上的一篇文章沒有？我說看過。

原來頭天報社發了個短訊，對華工臨革會召開的那個被「紅反團」衝得流了產的批鬥「走資派」朱九思的大會，作了個百把多字的報導。報導說華中工學院全體革命師生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以「十六條」為武器，懷著極大的革命義憤，對原黨委書記、那個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對抗歪曲篡改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方針，忠實推行劉少奇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長期重用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打擊壓制工農幹部，迫害工農子弟的罪行進行了揭露和批判。批鬥大會開得很成功，大長了無產階級的志氣、大滅了資產階級的威風等等。這篇署名「本報記者」的報導，顯然是歪曲了我們學校那天召開的大會的真實情況，聶年生告訴我他們準備去報社一趟，向報社找個說法。

「我能不能跟你們一起去報社呢？」我突然問他。他略微想了想，竟點頭答應了。

那天下午，我跟著老聶等一共四、五個人，乘公汽過江，來到漢口江漢路的報社大樓，找報社的領導說事。報社情知理虧，只好讓撰寫這篇報導的記者來接待室硬著頭皮擋駕。

「我們堅決要求報社對這篇歪曲性的報導作出糾正，並公開承認錯誤，向華工廣大無產階級革命派道歉！」聶年生向那個姓賈的記者鄭重提出要求。但是賈記者堅持他的這篇報導的內容「基本上是符合實際情況的」，不存在什麼糾正的問題。當然，賈記者說，會場上是出現過一些意外的情況，有少數人有過一些過激的行動，但這並不能改變大會的主要議程嘛！會場上方的橫幅上那麼大的字不是寫的批鬥走資派朱九思嗎？大會的主持人不是鄭重宣佈了大會的鬥爭目標，是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嗎？學校絕大多數革命師生，不都是衝著批鬥走資派去的嗎？革命群眾代表不也在大會上發了言嗎？這些難道不是客觀事實？我們怎麼能夠因為會上有極少數人持不同意見，就認為整個大會的性質也改變了呢？賈記者攤開兩手，委屈地說。實際上這番話他已經在我們面前重複了無數遍了，反正死豬不怕開水燙，任我們怎麼講，他就是這個理。

老聶見他蠻不講理，譏笑說你們報社所在的這棟大樓，外面掛的還是省紡織品進出口公司的招牌呢！可省紡織早就搬出大樓了，你能說這樓裏面還有這個單位麼？如果說打什麼招牌就必然是什麼內容，那天底下就沒有掛羊頭賣狗肉這一說了。我們學校前幾天的那個所謂批鬥會，受到革命群眾的堅決抵制，根本就沒有按原定的計畫開成。革命群眾是在大會上發了言，但批的不是朱九思，而是工作組，這才是客觀事實。你們怎麼連這個基本的事實都不承認呢？你們還講不講新聞的真實性？

賈記者躲不過，便說我們當然講新聞的真實性啦，但我們講的是無產階級的真實性，不是資產階級的那種「有聞必錄」。真實性必須服從無產階級黨性，黨性是第一位的，這個原則絕對不能違反。老聶便問他他所說的黨性連真實性都可以不顧，那究竟算是什麼黨性呢？賈記者說黨性就是一切都要服從黨的利益。老聶說黨的利益不也就是代

表廣大群眾的利益麼？難道弄虛作假會是為了廣大群眾的利益？「你是歪曲黨性吧？我們懷疑你究竟懂不懂什麼叫黨性？請你們領導來談！」眼看一上午都過去了也磨不出什麼名堂，早不耐煩了的老聶故意激將說。賈記者臉頓時通紅了，硬著脖子說：「領導沒空，領導很忙的，我可以全權代表報社。」老聶說；「你這個水準怎麼能代表報社呢？你對新聞工作根本是擀麵杖吹火——一竅不通嘛。」老聶一起的人也都你一言我一語地挖苦說。賈記者見氣氛不對，點顆煙刁起，任我們怎樣挖苦都不再吭一聲。我們沒了對手也沒了脾氣，等了一會兒肚子也咕咕叫了，便自己搭了梯子下臺，丟一句「過幾天等你們領導有空了，我們再來算賬」就收兵回朝。

出報社後，有的人抱怨說這些記者怎麼專門扭筋拌筋，只會胡攬蠻纏，還有的人很想不通，說報社明明報導不客觀，怎麼就是不認賬？老聶說上面要他們只能搞正面報導，他們當然不能說批鬥會鬧砸了，不批走資派批起工作組來。新聞報導都不是按領導的意思寫嗎？誰敢自作主張？我們國家的新聞報導歷來就是這麼回事，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據李琳琳說，那天聶年生一行從報社回到華工，便召集骨幹分子開會，將去報社討說法無功而返的經過，講給大家聽了一遍。老聶說報紙已經成了省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御用工具，找他們談沒有用，必須丟掉幻想，準備鬥爭！李琳琳還告訴我，他們「紅反團」裏有人對老聶帶上我這樣一個「家庭歷史有問題」的人一道去報社談判有意見，說「紅反團」剛剛舉旗不久，不能讓人抓辯子。李琳琳說的大概沒有假，後來我見到老聶與他談什麼，他總是閃爍其辭不願多談。我自然也用不著「剃頭的挑子——一頭熱」，就乾脆到別的院校去看大字報。那些學校裏沒有人認識我，沒有人會用歧視的眼光看我，在那裏我覺得比在自己的學校自在一些。

一天我來到湖北大學，看見我曾經貼出那張《為南下革命師生呼籲》的大字報的47號樓的牆上，有一張鼓吹「懷疑一切的革命精神萬歲」的大字報。大字報說「懷疑一切」這句話是偉大革命導師馬克思作為座右銘提出來的。作者認為，「懷疑一切」的實質，就是革命的批判精神，在今天仍具有現實意義，應當將它作為我們造反派的行動指南。

這張大字報的旁邊，還貼了好幾張相關的大字報。其中有擁護「懷疑一切」的，也有反對「懷疑一切」的，針鋒相對地爭論得很熱鬧。看那些文章都是你說你的，我說我的，各持一端。似乎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爭不出個名堂來。

對於「懷疑一切」這句話，我並不生疏。這句話出自一本有關馬克思的回憶錄，是馬克思回答他的小女兒蘿拉的一次書面問卷時說到的。原文記不准了，大抵有下面這些：

- 你最珍貴的品質？——對一般人而言是純樸。
- 對男人而言是剛強，對女人而言是柔弱。
- 你最能原諒的缺點？——輕信。
- 你最不能原諒的缺點？——逢迎。
- 你最感痛苦的事？——屈服。
- 你最感幸福的事？——鬥爭。
- 你最喜歡的顏色？——紅色。
- 你喜愛的英雄？——斯巴達克。
- 你喜歡的格言？——人所固有的，我無不具有。
- 你的座右銘？——懷疑一切。

主張「懷疑一切」的人（主要是反工作組反省委的），就是將馬克思這個座右銘，拿來作為立論的依據。反對這個口號的人（主要是保工作組保省委的），也不好說馬克思沒有說過這句話，於是說那不過是馬克思的一句戲言，作不得數的，或者說馬克思所懷疑的只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他們理直氣壯地質問說，難道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優越性也能夠懷疑嗎？難道對階級敵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也能夠懷疑嗎？難道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也能夠懷疑嗎？特別是對於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也能夠懷疑嗎？振振有詞地自然也非常雄辯。

但是主張「懷疑一切」的人也同樣理直氣壯。除了這句話是出自偉大革命導師馬克思之口外，還有一條過硬的根據，就是毛澤東著作裏的一段話：「共產黨員對於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麼，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真有道理。絕對不應盲從，絕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這裏既然說的是「對於任何事情」，那

就是「一切」的意思了；而「都要問一個為什麼」，那就是都要「懷疑」了。所以毛的這段語錄，正好做「懷疑一切」這句話的註腳。至於「毛澤東思想」本身，在不在懷疑的範圍之內呢？主張「懷疑一切」的人，當然不敢說他們所懷疑的「一切」，連「毛澤東思想」也要一起「切」進去——那豈不伸出腦殼準備當「反革命」——於是「懷疑一切」論者玩了一個文字遊戲，說他們是用毛澤東思想來「懷疑一切」的。言下之意毛澤東思想是個例外。反對派就說，既然有例外，那就證明「懷疑一切」是錯誤的。雙方就這樣在文字上辯來辯去的，誰也說服不了誰。

其實，既然說「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麼」，那從邏輯上講，就是沒有所謂例外的。對於毛澤東本人的話，當然也應該問一問是否都有道理。如果不能問，豈不是與「任何」有了矛盾嗎？如果也該問，誰又敢說出來？反對「懷疑一切」的一派，正是抓住了對方的這個「軟肋」，而贊成「懷疑一切」的人，又必須小心翼翼地避開這處「要害」，不敢將自己的主張的外延真正延伸到「一切」的範圍。對於這個問題的大膽探索，需要等上十年才有可能——十年後，黨內關於檢驗真理標準的那場大論戰，可以說正是那個圍繞「懷疑一切」發生過的爭論的延續。正是從「懷疑一切」出發，人們才終於推翻了那些貌似強大、不容懷疑的條條框框，從而宣告了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派即「實踐派」在黨內的勝利，並且在理論戰線上發動了一場意義極為深遠的偉大的思想革命。但無論如何，那些最初就敢大膽地提出「懷疑一切」論點的人，正是魯迅先生所說的那種「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說到「懷疑一切」，不能不提到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後來被稱之為「劉鄧司令部第三號人物」的陶鑄。陶鑄曾多次表示他是贊成「懷疑一切」這個口號的，「除了毛主席之外，一切都可以懷疑。原來好的，懷疑一下就行了。如果是不好的，懷疑下去，就把他打倒……對於領導機關，我是主張普遍轟一下的。」連軍隊的元老葉劍英也說，「要允許人家懷疑，大膽懷疑，懷疑一切」。可悲的是他們自己後來也成了「懷疑、打倒」的對象，特別是陶鑄，被江青康生等誣為「中國最大的保皇黨」而被打倒直至整死。我們武漢的學生聽到陶鑄下臺的消息是六七年一月的頭幾天，當時武漢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紅水院」正印好一期小報，上面刊登有陶鑄在京接見「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戰鬥隊」

時「支持造反派紅衛兵造反」的講話，正準備拿上街去賣的，突然傳來了陶鑄垮臺的消息。這期報紙只好作廢，全部銷毀。文革中風雲人物的升降沉浮，瞬息萬變，實在非一般人所能想像的。該擁護誰，該反對誰，往往就像是押寶。

在湖北大學裏，我又見到前些時被「革命群眾」趕回了北京的那些南下學生。他們在他們的頭頭、一個叫趙桂林的大學生的率領下，又「殺」回武漢來了。在前些時湖北省委號召全省人民圍剿「南下一小撮」時，張體學省長「代表湖北3,200萬人民」控訴的，正是這個趙桂林。但是現在情況已經變了，據說王任重從北京打來電話，指示湖北省委領導人給趙桂林恢復名譽，承認趙是一名「革命闖將」。這下子原來那批曾被掃地出門的「南下一小撮」就神氣了，他們殺回武漢後，以「先知先覺者」自居，到處講形勢，談路線，傳經送寶，很出了一陣風頭。

北京紅衛兵在武漢走紅，更多的北京和外地的紅衛兵便蜂湧而至，地處鬧市的幾所大專院校裏，駐滿了北京和外地來漢串聯的紅衛兵。林子大了，自然什麼樣的鳥兒都有，其中一支據說是來自北航附中的「自來紅」的戰鬥隊，其隊員清一色的是革軍革幹子女，個個將校呢的軍裝，腰束寬皮帶，足登黃皮靴，真個是八面威風。據說這些出身高貴的「自來紅」，從娘胎裏帶出來的，就是紅色的血統，是當然的「紅色接班人」。這些「自來紅」們對「懷疑一切」的口號，自然是堅決反對的，至少他們身上的高貴血統就是不能懷疑的。他們對「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副對聯，則是堅決擁護。他們稱這副據說將要流芳百世的對聯為「鬼見愁」——那意思就是牛鬼蛇神們見了它就要頭痛的。這些出身高貴的「自來紅」們聽說在北京並不吃香，人們甚至對這些養尊處優，鐘鳴鼎食，無惡不作的權貴少爺非常鄙視，稱他們為「八旗子弟」。在北京城裏呆得不自在了，「自來紅」們就全國各地到處跑，跑到哪裏，就把那副「鬼見愁」的對聯帶到哪裏，哪裏的「黑五類」子弟就要遭一陣子殃。

我從一些大字報上得知，所謂「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副對聯，早在七八月份就出現了，正是北京航空學院附中的那些穿將校呢軍裝的高幹子弟的發明。這副對聯一出現，就引起許多人的

反感，圍繞這副對聯觀點對立的兩派辯論得十分激烈。大字報上還披露說，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早有講話，表示不同意這副對聯的提法，建議將對聯改為「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說「應當如此」。那意思「血統」問題還是存在的，仍然肯定只有「父母革命」，兒女才有「接班」的資格，不過對於「父母反動」的，也還留了一條「背叛」父母的路給走，總算不至於趕盡殺絕。

但陳伯達的建議，並沒有得到「自來紅」們的回應。北京工業大學的那個譚力夫，倒是取折中的態度，說可以把陳伯達建議的那副對聯，作為原來的對聯的補充。說原來的那副符合唯物論，改過的那副則符合辯證法，兩副對聯結合起來，就是「辯證唯物主義」。由於譚力夫巧舌如簧，能說會道，又是第一個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副對聯，提到「階級路線」、「黨的政策」的高度來認識。因此儘管「對聯」的發明權不屬於他，他卻成了北京的紅衛兵中主張「血統論」的那些貴族子弟的「理論權威」。

但是據大字報上說，譚力夫在北京的大專院校裏並沒有多少市場，除少數高幹子女外，多數學生都反對他的講話。一些大學的紅衛兵組織，還聯合起來召開大會，批判譚的講話是「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這些消息使我受到鼓舞，我覺得這副對聯在理論上是絕對站不住腳的，也根本不符合黨的「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的階級路線，註定是「兔子的尾巴——長不了」。我就希望我們武漢的大專院校裏，哪天也有紅衛兵站出來帶頭批判對聯和「血統論」——這件事是只有「紅五類」們才能做的，「黑五類」在出身問題上根本沒有發言權。

可是武漢本地的紅衛兵，在這個問題上遲遲按兵不動，倒是那些南下武漢的北京紅衛兵們，把針對對聯的辯論帶到武漢來了。觀點對立的兩派，到處找場子開辯論會，唇槍舌劍地辯得個不亦樂乎。北京學生開了頭，我們本地的一些學生，自然，都是些出身「過硬」的，也就躍躍欲試，試著跳上臺去辯論一通。我既然頭上還頂著個「狗崽子」的辮子，自然沒有參加辯論的資格，但聽人家辯論還是可以的，我就到各個學校去聽。聽辯論也會聽出癮來的，就像聽戲一樣，看人家在臺上「你方唱罷我登場」，也挺有意思。那時候兩派觀點的人開辯論

會，連上場時的開場白都有講究，幾成一種固定的程式，那就是上場辯論的人，首先得自報家門。

是像舊戲中的人物出場時那樣，叫一聲「吾乃常山趙子龍也！」或「燕人張翼德來也！」麼？非也。辯論會上要報的是自己的出身，至於你是何方人士，姓甚名誰倒在其次。你若報的是革軍革幹或工人貧下中農出身，你就會搏得個滿堂彩；倘若你報的是地主富農資本家出身呢？對不起，下面的人不但要喝個倒彩，十之八九還要轟你下臺。

報過出身供臺下的「革命群眾」檢驗是否合格之後，下一道程式也是必不可少的，就是要用右手揮動《毛主席語錄》，高喊「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敬祝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這時臺下的聽眾就會報以熱烈的掌聲。無論贊不贊成臺上發言人的觀點，這個掌是不能不鼓的，否則有你的倒楣。

有一回開辯論會時主持人換了個花樣，在對立的雙方各自闡述過己方的觀點後，要求雙方就在臺子上進行面對面的短兵相接，針鋒相對地互相辯駁，有點類似文革後一度風行的那種大學生們玩的專題辯論中最後階段的「自由辯論」。這當然不錯，激烈、緊張，最能試出參辯者的真實水準。但是辯論一開始就出了個問題，本來雙方在上臺時都已經喊過那兩個「敬祝」了，但有一方在進入第二輪發言時，又習慣性地首先「敬祝」了一遍。等另一方再發言時，自然也不能不學對方那樣，也先來上一個「敬祝」再說。這倒也罷了，可是在此後的辯論中，不管哪一方發言，都不忘先來一番「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敬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於是出現了下面這樣的鬧劇：

甲方：讓我們共同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敬祝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我堅持對聯的觀點是唯物主義觀點。紅色江山是我們的老子拋頭顱、灑熱血打下來的，我們不接班誰接班？

乙方：讓我們共同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我不同意老子打下了江山，就一定該兒子來接班，兒子如果不爭氣變了質，變成八旗子弟了，敗家子了，他也配接班嗎？

甲方：讓我們共同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我們革幹子弟在娘胎

裏就接受了革命的家教，我們身上的血天生就是紅的。我們的免疫力最強，怎麼會變質？

乙方：讓我們共同敬祝偉大領袖……那可不一定。幹部子弟養尊處優，還真容易變質呢！

甲方：(忘記說「讓我們共同敬祝……」)你這是胡說八道，是對我們革幹子弟的誣衊！

乙方：(終於抓住對方辯子了)我說「讓我們共同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敬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你吃了豹子膽，竟敢說我是「胡說八道」，你反動透頂不是？你還不給老子滾下去！

這位倒楣的「革幹子弟」被對方打了個措手不及，一時語塞，欲辯不能，只好在台下的一片咒罵聲中灰溜溜地「滾」了下去。

當然，這位「革幹子弟」不過是被對方鑽了個空子，輸掉一場辯論。要是一個出身不好的在這種場合被人抓住了什麼，輕者挨頓拳腳落個鼻青臉腫，重者送專政機關大牢伺候。所以出身不好的最好識相一點，不要去辯論臺上出什麼風頭。那臺子上沒有他們的地位。

也有辯論會上辯得有水準的，我在武漢大學就見識過一次。雖是幾十年前的事了，至今記憶猶新，歷歷在目。

那天聽說北京南下來漢的紅衛兵要在武大開關於對聯的辯論會，我吃過晚飯後，便急急忙忙地趕到武大去看熱鬧。到了珞珈山下的武大校園，只見校園裏一處燈光球場上果然燈火通明，辯論台周圍，早就被學生們擠得水泄不通。我好不容易擠到台前，聽臺上的一個武漢大學的學生正在講他的觀點。「我是堅決反對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種提法的，」這位學生揮著手說，「因為……」話剛開頭就被下面一片喊聲打斷。「出身！出身！報你的出身！」「我貧下中農出身。」那位學生拍拍胸大聲說。下面安靜了一些，他便繼續講他的觀點：「為什麼我不贊成這個提法呢？因為它只論血統，完全不顧客觀環境對一個人的影響才是決定性的，是一種機械唯物論的觀點。這種觀點正是一部印度電影《流浪者》中那個法官的觀點的翻版，他認為好人的兒子永遠是好人，賊的兒子永遠是賊……」正講著台下忽然有人用手指著那個同學喊道，「別聽他的鬼話！他根本不是貧下中農出身，他家裏其實是破落地主！早年置過地雇過工，後來才破落下來。他在我們

學校就專和我們紅五類的老紅衛兵過不去，是個典型的老子反動兒混蛋呢！」「誣衊！根本不是那回事……」那個被指為破落地主出身的同學正要爭辯，就被一些人轟下了臺。

臺下有人帶頭喊起「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口號來。口號聲中只見一位戴軍帽，紮短辮，穿身早已洗得發白的舊軍裝的北方小妞，緊了緊腰間的軍皮帶，撥開眾人跳上辯論台。臺下顯然有不少北京的學生認識她，紛紛指點說，孫來紅，孫來紅。我就問旁邊的一個北京學生，這個孫來紅是個什麼人呀？那個北京學生瞥我一眼說，名人嘛，某某某（一個地位顯赫的中央首長）的姑娘，和宋要武一個學校的。

對孫來紅這個「名人」，我孤陋寡聞，還真的沒有聽說過。不過說到宋要武，那可是武漢三鎮家喻戶曉的大名鼎鼎的人物。豈止武漢，全國人民都知道北京有個給毛主席獻過袖章的女紅衛兵叫「宋要武」。「八一八」後這位宋要武曾經受當時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王任重的委託，風塵僕僕來到武漢，給正被北京南下學生搞得焦頭爛額的湖北省委委救駕。

宋要武和她的戰友們來到武漢，對北京那些學生公然提出什麼「炮打張體學、火燒省市委」的口號非常氣憤，於是和她的戰友們到各大專院校轉了一圈之後，寫了篇題為「首都紅衛兵在武漢致北京、武漢革命同學的公開信」的大文章。文章讚揚湖北省委十幾年來始終是緊跟偉大領袖的，是高舉了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的。對「混在北京南下紅衛兵中的一小撮」打著紅旗反紅旗，大肆散佈流言蜚語，惡毒詆毀湖北省委的罪行進行了揭露和批判，警告這一小撮「混蛋、王八蛋」「革命群眾饒不了你們！」呼籲「革命的團結起來，不革命的滾開！」文章自然是雄辯極了，精彩極了，可謂義正詞嚴，擲地有聲，足以叫「南下一小撮」亂臣賊子魂飛魄散。革命小將宋要武真是不辱使命。

且說這篇《公開信》付印十幾萬份，隨省報一起發送到千家萬戶，同時還有大量同樣內容的傳單在大街小巷散發。這一天真正的首都紅衛兵代表宋要武，在武漢三鎮出足了風頭。街頭巷尾，人人都在談論宋要武和她的文章，所有的機關學校工廠街道的高音喇叭，都在一遍又一遍地播送這篇文章。許多單位都在組織群眾學習和討論這篇《公開

信》，學習怎樣把「南下一小撮」和真正的北京紅衛兵區別開。學習和討論極大地擦亮了廣大革命群眾的眼睛，大家紛紛走上街頭，將任何膽敢說省委壞話的「南下一小撮」團團包圍起來，並與之進行辯論。武漢三鎮掀起了全民圍剿「南下一小撮」的紅色風暴，「南下一小撮」四面楚歌，汲汲乎殆哉。正如《公開信》所預言的，這「南下一小撮」完全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湖北省委能打贏那場圍剿「南下一小撮」的戰鬥，宋要武和她的戰友們功不可沒。

現在不說宋要武，單說這位孫來紅。只見她跳上辯論台來，手舉紅寶書，首先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敬祝林副統帥永遠健康了一通，然後自報家門出身革幹。下面響起一陣熱烈的掌聲。孫來紅很得意，開口就罵起「混蛋」們來：「誰說不是老子反動兒混蛋呢，剛才下去的那位不正是一個這樣的混蛋麼？」台下一些人大聲叫好，又跺腳又鼓掌，孫來紅也就愈發地得意了。

「同學們！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戰友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地主階級的狗崽子越是拼命反對老子英雄兒好漢這副對聯，我們就越是要堅決的擁護。」孫來紅一手叉腰，一手揮動著小紅書激昂地說：「這就是我們的階級立場！這就是我們的階級態度！有什麼不服氣的呢？狗崽子們居然也會談環境對人的影響，好吧，我們還是看看偉大領袖是怎樣講。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在階級社會裏，每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主席的這段教導是什麼意思？就是說的階級地位對人的影響是最重要的嘛。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就是肯定了階級出身的影響是第一位的，是像打了烙印一樣不可磨滅的，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鐵的規律。狗崽子們想否認，想翻案，見鬼去吧！要革命的站過來，不革命的滾他媽的蛋！誰要反革命我們就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老子英雄兒好漢，我們的革命江山就是要父傳子、子傳孫，一代一代往下傳！」在長時間的激烈掌聲和口號聲中，孫來紅昂首挺胸地走下臺，神氣得就像個打了勝仗凱旋的將軍。

形勢似乎對主張「血統論」的一派有利，此刻出身不好的人誰敢上臺去找罵挨？出身壓死人，這話一點都不錯。但就在「血統論」一派準

備鳴金收兵時，一位來自北京的持與「血統論」相反觀點的紅衛兵上臺了。認識他的人說他叫彭江南，是人大歷史系研究生，「首都紅衛兵南下造反大隊」副大隊長，辯才十分了得，此人上臺必定有好戲看了。

姓彭的學生當然首先也要自報家門，是工人出身，下面一陣掌聲，接著再報是中共預備黨員，下面的掌聲更加熱烈。彭直截了當地指出那副對聯所表述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與封建階級的血統論是一脈相承。彭說早在一千八百多年前的大澤鄉農民起義中，陳勝吳廣就已經響亮地提出「王侯將相甯有種乎！」，向血統論發出了有力的挑戰。可現在居然有人提出什麼「老子英雄兒好漢」，這是歷史的倒退，是反動封建意識的死灰復燃。有的人千方百計想把這個反動的、封建形態的東西打扮成無產階級的東西，像北工大的那位譚力夫甚至想給它披上某種理論的外衣，把它提煉為某種政策、上升為條條本本。對不起，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正如革命導師馬克思所辛辣揭露的，這種貌似革命的假東西，臀部帶有舊的封建紋章。彭的講話開門見山，一針見血，尖銳潑辣，雄辯有力，贏得下面一陣又一陣熱烈的掌聲。

彭接著針對一段「對聯」的擁護者經常引用的毛主席語錄進行了分析：有些人不是總好用「在階級社會中，每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這段話，來證明血統對人的影響是決定性的嗎？毛主席的話當然是革命的真理，但它不是用來證明封建主義的血統論的，不是用來證明「對聯」的正確性的。我們知道剝削階級的成員由於他們自身階級地位的影響，決定了他們的思想不可避免會打上剝削階級的烙印。但這能證明什麼呢？能證明剝削階級的子女也必然和他們的老子一樣嗎？特別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青少年，他們早已不存在剝削階級的地位和生活環境。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憑什麼說打在他們思想上的烙印就是剝削階級的？新社會的環境，革命思想的教育，尤其是毛澤東思想的雨露陽光，難道就不會在他們的思想上打上烙印，難道竟還抵不上他們家庭的影響，抵不上他們娘老子的影響？死抱著「血統論」不放的好漢們，你們也未免太小看新社會的力量，太小看無產階級革命政策的力量、太小看毛澤東思想的巨大威力了吧！你們算哪門子好漢？！

臺下再一次響起暴風雨般的掌聲。彭繼續他的演講說：出身無法選擇，道路卻是自己走出來的。倘若家庭出身就決定了一個人革命、不革命甚至反革命，那我們就永遠無法解釋中外歷史上，為什麼就有那麼多的革命家都是出身反動的家庭。以俄國的十二月黨人為例，其中的精英幾乎無不是沙俄貴族出身，但他們卻義無反顧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革命失敗後許多人寧願被處以絞刑，或坐牢、或流放，拒絕沙皇的赦免。如果按照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說法，對這麼多的十二月黨人，該如何去作解釋？反過來，如果說老子英雄兒就必然好漢的話，我們又怎麼解釋當初金戈鐵馬橫掃中原的滿民族的那些雄才略主，卻衍生出一大堆昏庸無能的八旗子弟？有人說那些資產階級、封建階級的英雄好漢不算數，我們講的是無產階級的英雄，是有階級性的。好吧，無產階級就無產階級，道理都是一樣。馬克思恩格斯出身什麼階級？大概不是無產階級吧，可他們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導師。列寧也是如此。就說我們中國的許多無產階級革命家，大都不是勞動人民家庭出身。如果家庭出身就是一個人意識形態的根源，就決定了他一生的道路，如果論出身就可以判斷人之善惡、追血緣就足以恩澤後世或禍及子孫，那豈不是和過去地主階級宣傳的那套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的反動理論一模一樣了嗎？說到這裏，下面人群裏響起了一陣又一陣熱烈的掌聲和呼喊聲，群情沸騰。場上形勢向著反對血統論的一邊倒，血統論的擁護者潰不成軍。

孫來紅見自己的觀點被臺上的對頭駁得體無完膚，使她顏面掃地，恨得牙癢癢的卻又無可奈何。然而有「援兵」殺到，一個學生突然跳上了臺子，向話猶未盡的彭發難。這個自稱出身城市貧民名叫舒向東的測繪學院的學生上得臺來，指著彭的鼻子就掃了一通機關槍。說彭的講話要害，是反對黨的階級路線，而無產階級的階級路線，就是講成分講出身。他激動地說，古今中外，哪個階級不講成分不講出身，不貫徹自己的階級路線？封建地主階級的政權是一代一代往下傳，我們無產階級為什麼就不應該這樣做？難道就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真他媽的反動透頂！我們就是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就是要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就是黨的階級路線！就是最最徹底的唯物主義！舒奉勸彭江南屁股不要坐偏了。

仍留在臺上的彭江南大度地笑了笑，對舒向東說按照你的說法，只有擁護「對聯」上的提法，才是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囉。那我問你，幾千年來封建地主階級傳宗接代維持統治靠的是家傳，所以我們無產階級也要照章辦理，也要靠家傳把革命事業繼承下去，是不是？舒說那當然啦，他們能家傳，我們為什麼就不能？彭說這麼講你是主張按封建地主階級的一套來改造無產階級了？舒趕忙說不是，不是。彭江南又進一步問道，那又怎麼理解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共產主義革命在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的同時，還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呢？

舒不知如何回答，手足無措，囁嚅說那、那兩碼事嘛……我們是說的革命傳統代代傳嘛，我們說的老子是無產階級的老子，和封建老兒怎麼能相提並論。彭江南說不錯，你說的革命老子和封建老兒可能不是一碼事兒，但那種靠血統來傳宗接代的本質是一致的，這絕不是無產階級的東西。我倒想問問，「老子英雄兒好漢」這句話，你知道是從誰的嘴裏說出來的嗎？「不……不知道」，舒狼狽地說，「不就是你們北京的紅衛兵說出來的嗎？」彭江南哈哈一笑，說北京紅衛兵哪有這個水準，這句「老子英雄兒好漢」是從一曲舊戲裏一個叫竇爾敦的山大王那裏借來的。彭江南問道，難道我們「血統論」的好漢們竟墮落到要到封建主義的山大王那裏去尋求思想武器的地步了麼？

下面哄堂大笑。舒向東面紅耳赤，汗流浹背，仍困獸猶鬥，辯解說我們不知道什麼舊……舊戲裏的什麼山大王，我們只知道江青同志親自培育的革命樣板戲。革命樣板戲《紅燈記》裏就有這樣的話，栽什麼樹苗結什麼果，撒什麼種子開什麼花。這就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人人都知道的，顛撲不破的，黑種子開黑花、紅種子開紅花……彭江南臉上露出狡黠的笑來，問舒同學知不知道黑色的鬱金香的種子是什麼顏色？舒搖頭。彭又問那紅色的杜鵑花的種子又是什麼顏色呢？舒自然還是不知道。彭江南於是告訴他，黑色鬱金香種子的顏色是紅的，紅色杜鵑花種子的顏色卻是黑的。他問舒同學那你说是黑的開紅花呢，還是紅的開紅花呢？天才知道彭江南說的那些紅種子、黑種子的話究竟有沒有根據，但是舒向東卻慌了神，語無倫次起來。「黑的……自然紅花，不，黑花。不對，是紅的，開黑花。

不，也不對……」昏頭昏腦地亂說一氣，臺底下轟然大笑，要舒向東趕快滾下來。可憐的舒向東中了彭江南的招，狼狽不堪地滾下臺來，在大家的嘲笑聲中落荒而逃。

那位叫孫來紅的北京學生，終於沒能看到這個瘦猴似的傢伙替她挽回敗局，反倒讓她這一邊輸得更慘。她拉著她的同伴氣呼呼地擠出人叢，頭也不回地打道回府。

後來就不大見到孫來紅在各校的辯論會上出現了。

再後來就聽說北京的一些大學的「少數派」紅衛兵組織，聯合起來連續召開了三次批判譚力夫的講話的大會。大會還向全國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發出公開信，號召肅清以譚力夫的講話為代表的「血統論」的流毒。而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人也先後明確表態，不贊成「對聯」中的觀點。「對聯」在學生中越來越沒有了市場，一直抱著對聯觀點不放的，最後只剩下北京極少數出身高幹的「聯動」分子。

「對聯」終於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但「對聯」這隻過街老鼠所催生的那場「鼠疫」卻流毒甚劇，我們這種被稱作「狗崽子」的，在學校裏仍然抬不起頭。國慶之前，武漢各大專院校已經陸續出現了一些「少數派」的紅衛兵造反組織，但它們無一不是「紅五類」的一統天下。當然，這種「紅五類」主要是指一般的工農家庭出身，門第方面的欄檻是大大降低了。雖然「黑五類」出身的還是被這些紅衛兵組織排斥在外，但是紅衛兵組織被高幹子弟壟斷的局面畢竟被打破了。

武漢大專院校裏的這些「少數派」的紅衛兵組織，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叫做「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其中組織得最早、勢力最大的，當屬我們華工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其中聶年生的「紅色造反團」是最先起來造反的，在學生中威信也高。但他的親信部隊就是那麼二三十個人。學校中還有位叫郭保安的造反派學生，河南人，是學生中的黨員，身後也有支人馬，人稱「郭司令」。郭司令立足校內，不斷壯大自己的勢力，而與此同時，老聶的隊伍一直裹足不前，沒有抓住時機擴大地盤。

後來聽紅反團裏一個叫王永紅的附中學生說，當初老聶是一心想把「紅反團」打造成像越戰中美軍的「綠色貝雷帽」那樣的「特種部隊」。個個身懷絕技，本事超強，獨當一面，以一當十，所以對成員的選拔

特嚴。但也正是由於老聶用人過於挑剔，作繭自縛，所以雖然校內校外鬧得轟轟烈烈，「紅反團」卻始終未能有大的發展。

但誰都不否認，聶年生和他的「紅反團」，確是造反派紅衛兵中一支最能戰鬥的突擊隊。「紅反團」在援助各個兄弟院校的造反派搶奪「黑材料」的行動中，尤其淋漓盡致地展示出自己「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戰鬥力。據王永紅說，武昌這邊的好幾所大學，像湖北醫學院、湖北財經學院的「黑材料」，都是他們「紅反團」去幫著搶出來的。他譏笑這些學校的學生都是些迂夫子，典型的「書生」，一個個前怕狼後怕虎的，一點膽量都沒有。「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只好向我們求援。我們一上陣，三下五除二就給擺平了。」王永紅得意地說。

所謂「黑材料」，是指工作組在校期間，為準備對學生將來「秋後算賬」而整理的那些秘密材料。這種「黑材料」往往還包括一份將學生劃為左、中、右的「黑名單」。工作組從各個高校撤出後，學校各系的檔案室裏還留有大量「黑材料」的消息傳出，學生們怒不可遏，要求學校的革籌會公佈這些「黑材料」和「黑名單」，但是遭到革籌會的拒絕。造反派學生自己的紅衛兵組織成立後，他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從檔案室搶出這些「黑材料」。但是各校的革籌會都組織自己控制的一部分紅衛兵，來防止造反派紅衛兵「搶檔案」。由於造反派紅衛兵在多數院校裏人數上還暫時處於劣勢，搶「黑材料」的行動往往被革籌會控制的紅衛兵挫敗，這時候老聶的「紅反團」就來「馳援」。而在「紅反團」的眼裏，沒有哪個學校的「黑材料」是搶不到手的，問題只是看你敢不敢上。「兩軍相遇，勇者勝」，而老聶的「紅反團」永遠都是勇者一方。

「前線態勢」通常是這樣的：造反派紅衛兵調兵遣將前往藏有「黑材料」的地方，準備動手搶出材料。但是藏「黑材料」的地方（比如檔案室、機要室之類）早有重兵把守，讓你根本無法靠近，於是雙方推推聳聳地發生衝突。守方憑藉人多勢眾，將檔案室圍得鐵桶一般堅固，往往令攻方無法越雷池一步。但是老聶的「紅反團」卻有辦法攻城掠地，令守方潰不成軍。

他們發明了一種類似古代用雲梯攻城的「人頭戰術」，來對付最頑強的對手。

他們的「雲梯」就是自己的腦袋。他們將自己的隊伍貼近對方，一

直貼近到雙方成為一個整體。然後讓特別不要命的「突擊隊員」(都是附中的學生，王永紅便是突擊隊長)爬上己方的腦殼，在人頭上匍匐爬行，一直爬過對方的人頭再下來，對方的防線就算是被攻破了。據突擊隊長王永紅說，這個辦法非常有效，但不輕易用。一般情況下，他們一爬上對方的腦殼，對方不勝重負，馬上就潰散了。但有一次遇到對方的頑強抵抗，下面的人用手又撕又打，王永紅和突擊隊員們個個身上傷痕累累。「狗日養的！」王永紅抱怨說，「老子身上穿的一件嶄新的軍襯衣，那次硬是被那些狗日的撕了個稀爛。」

我沒有親眼見過王永紅他們使用「人頭戰術」——這種戰術有點野蠻，頗遭非議，老聶也不讓他們再搞。後來「紅反團」搶佔學校廣播站的一次行動，就動作得比較文明，且部署周密，用突然襲擊的方式，打了廣播站一個措手不及。

在一個單位裏，廣播站之類黨的重要宣傳陣地，向來只傳達一種聲音。由華工臨革會控制的校廣播站，當然不會替造反派學生說話，而且還經常對造反派學生大肆攻擊，造反派學生早就對此窩了一肚子的氣。聽王永紅說，本來他早就建議把廣播站的喇叭統統砸扁它的，或者乾脆把廣播室給一窩端了，但老聶遲遲不下決心。廣播站歷來是被視作黨的喉舌，砸廣播站可不是個小事，他這個頭頭得前思後想。王永紅怪老聶怎麼變得婆婆媽媽了？學校辦公樓的機要室，前些時說衝還不是衝了，還捨出那麼多的黑材料。現在砸它個區區廣播站，什麼大不了的事，倒前怕狼後怕虎起來！老聶冷靜地說倒不是什麼前怕狼後怕虎，這事畢竟非同一般，必然會在各個兄弟院校引起連鎖反應，他不得不考慮後果。

「不過我也想了，既然學校的機要室都衝過，這廣播站也就不再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但凡事總得有個理由方才師出有名，像前些時衝機要室，是因為機要室裏藏了學生的黑材料，搶黑材料得人心。心急吃不得熱湯圓，現在就是決定端廣播站，也得先造輿論，端它之前先要把它搞臭！」老聶還說端廣播站還不是根本目的，根本上我們是要取而代之，佔領學校的廣播陣地！下一步還要準備接管校刊編輯部。要革命，要造反，沒有自己的輿論宣傳陣地是不行的！國外發生革命也好，政變也好，鬧起事來首先就是佔領廣播電臺和軍火庫。一

文一武，哪樣都不能少！老聶不說則已，說起來就是一套套很有見地。

「紅反團」的人於是七嘴八舌出謀劃策，然後分頭行動，搜集廣播站文革以來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搖旗吶喊、推波助瀾的種種劣跡，將聲討廣播站的大字報貼滿了校園。一時諸如「校廣播站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吹鼓手」、「校廣播站是工作組的黑工具」，還有什麼「校廣播站有罪！罪該萬死！」、「校廣播站該砸！砸爛有理！」的標語和傳單在校園裏滿天飛。

校臨革會和保守派的老紅衛兵們終於意識到造反派要對廣播室採取行動了，慌忙調兵遣將，對廣播室所在的辦公大樓，一天24小時全天候重兵把守。大樓所有的大門都從裏面鎖死了，僅僅留下東門可供廣播室工作人員出入。到風聲最緊張時東門也不輕易打開，由外面定時向裏頭送「糧草」。但是有一天趁天未亮開門送「糧草」進去的人，被埋伏在東門附近的幾個紅反團的附中學生打了伏擊，有五六個人跟著送「糧草」的衝進了東門。老聶隨即火速派出隊伍增援，迅速佔領了頂樓一層的廣播站，乾脆俐落地結束了戰鬥，這時全校的師生都還在床上做夢呢。等大家一夢醒來，驚訝地聽見校廣播站破天荒播放起「造反有理」的毛主席語錄歌，接著又聽見播音員(就是李琳琳)報出「新華工革命造反廣播站」幾個字，方才醒悟到學校的廣播站已經易主。大家紛紛議論說，老聶的「紅反團」硬是吃了豹子膽，真的連「黨的喉舌」廣播站都敢佔，這世道看來真的要變了。

在聶年生們勝利地奪取了校廣播站後，其他院校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也紛紛起而效之，各校的廣播站很快便一個個落到了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的手中。輿論陣地的佔有，使得造反派學生如虎添翼，士氣大振。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的勢力迅速壯大，已然成為各個學校的主導力量。在十月的最後的十幾天時間裏，全市各個大專院校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開始張羅聯合，籌備成立統一的「武漢市大專院校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司令部」。我們學校和湖北大學是市裏率先組織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的高等院校，造反派的勢力也最為強大，特別是老聶的「紅反團」，自認資格最老、功勞最大，當然覺得自己應在這個全市性紅衛兵組織中佔有「核心」地位。但其他學校的頭頭們卻商量好，這個司令部的「一號

勤務員」的位置，要由學生中的「中共黨員」來擔任，才名正言順。這無疑使得「非黨分子」老聶極為惱怒，認為這種做法就跟當年武昌起義時，硬要找個像黎元洪那樣帶「銜」的來當鄂軍大都督一樣荒唐。

老聶一怒之下宣佈退出聯合，回華工與郭保安的隊伍聯合起來，另外成立自己單獨的紅衛兵司令部，於是便有了「新華工紅色造反司令部」，對外簡稱「紅司新華工」。這個「新華工」還有「新湖大」和「新華農」，便是後來所謂的「三新」，都是獨立於那個全市性組織「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司令部」即後來所謂的「鋼二司」的。幾個月後圍繞「一月奪權」的權力分配問題，在造反派內部發生的一場「內訌」，此時即已埋下了伏筆。而在「新華工」內，「郭派」早已坐大，郭保安名正言順地坐上了「紅司」司令的寶座，老聶只能屈居其後。後來在「新華工」內部聶郭兩派的明爭暗鬥中，「聶派」始終處於下風。

各校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挾聯合之雄風，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潮中一路狂飆突進，勢如破竹。湖北省委對這些造反派的學生愈來愈窮於應付。而十月初王任重在中央的突然失勢，更是給了省委領導班子致命的一擊。失去了保護傘的省委領導人，變得脆弱不堪。正當省委領導人焦頭爛額之時，曾經為湖北省委大唱讚歌，在省委號召大抓「南下一小撮」時立下過汗馬功勞的宋要武，又來了武漢一趟。宋發表文章說，她當時是受了王任重和前湖北省委一些負責人的欺騙和蒙蔽，被他們這些「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當了槍使。據宋要武揭露說，那篇《公開信》。其實根本就不是她自己寫的，是省委的人寫好後讓她簽了個名。宋要武的反戈一擊使省委的領導人愈發狼狽，他們內外交困，幾陷於四面楚歌的境地。

聶年生這時不失時機地帶著他的「紅反團」進駐了省委13號樓安營紮寨，面對面地與省委領導人展開「馬拉松」式的談判。他們不斷地拋出手中掌握的「黑材料」，要求省委領導公開檢討他們「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壓制群眾運動」的錯誤，省委則用「蘑菇戰術」來應對。老聶將他們與省委的「談判紀要」逐日公佈出來，每天都引起許多人的圍觀。

曾經對我造謠中傷，必欲置我於死地的教務處的老爺們的日子自然也不大好過。但他們負隅頑抗，仍然拒絕澄清強加在我頭上的那些罪名，頑固地堅持戴在我頭上的那頂「汪偽漢奸狗崽子」的帽子沒有戴

錯。同學們似乎寧可信其無，不如信其有，對我仍取「敬而遠之」的態度。學校裏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除了「紅司新華工」外，還出現了個「東方紅紅衛兵」，又稱「紅三司」。但無論是「紅司」，還是「紅三司」，都只吸收「勞動人民」的子女。我這個「黑五類」的「狗崽子」，仍然被排斥於紅衛兵組織的門外，我仍然只能是個「散兵游勇」。被敵人謾罵是無所懼的，被同一壕溝的戰友輕侮和疏遠足以令人心寒，我深深地感到了孤獨。

我於是想去北京走一趟，但是拿不到學校紅衛兵組織的介紹信，看來我這個「黑五類」狗崽子，是連「朝聖」的資格也沒有的。但是有一天《人民日報》上發表的一則消息使我精神為之一振，消息說大連海運學院的一隊紅衛兵步行兩千里，從大連走到了北京，報紙並且為此發了一篇社論《紅衛兵不怕遠征難》，說「不坐火車汽車，徒步行軍進行大串連，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創舉。」我於是想，沒有資格坐火車去北京，難道徒步走去也不准許麼？正好華工園內有一部分同學，在組織這樣一支紅衛兵長征隊，擬沿著當年工農紅軍的足跡，從江西革命老根據地出發，步行二萬五千里，一直走到延安。這個計畫是非常具有誘惑力的，吸引了幾十名各系的學生報名參加。我也極想加入這支隊伍，便去報名，然而未獲批准，「狗崽子」的陰影堵塞著我面前所有的路。

我失望至極，在力陳我父母的政治歷史是清白的仍遭婉拒時，情急之下，破指用血寫了「請准許我長征」幾個字。我的誠意和決心感動了長征隊的負責人，擔任政委的一位叫黃湘蘭的機械系的高年級黨員學生，在與隊長朱海雲磋商後，終於接納了我，我於是成了這支名為「新華工新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隊」中的一名戰士。和其他四十多名隊友一樣，我也領到了一頂灰布的八角帽，一個軍用水壺，還有一副綁腿布。當我戴上八角帽、紮緊皮帶、打好綁腿時，我在鏡子裏看見了一副當年的紅軍戰士的模樣。

母親給我準備了100塊錢的盤纏，分成幾處縫進棉衣的內襯裏，又給我準備了幾套換洗的內外衣裳，然後叮囑說：「這是你第一次出遠門，父母親再不能照顧你了，你得學會自己照顧好自己，有困難要依靠長征隊這個集體。最重要的是不管路上有多麼艱難，也一定要和大家一起走到目的地，絕不准半路當逃兵！」母親還讓姐姐把藏在單位上

的父親的一架舊相機拿給我帶上，要我用相機多拍些照片隨時寄回家。那架德國產的「蔡司」相機可真是夠「菜」的——可折疊的暗箱已經破損透光，裂縫用橡皮膏粘著——聊勝於無，勉強湊合著用吧。

十一月的一個早上，「紅司新華工」的一些紅衛兵們開了個歡送會，為我們長征隊餞行。紅司司令郭保安在會上講話，說我們這次長征是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號召，是非常有意義的革命壯舉；還說我們這支長征隊一路上應該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宣傳隊，要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向所過之處的人民群眾作廣泛的宣傳。郭司令表態說：「長征隊的同志們先走一步，我們大隊人馬將隨後跟上。」話雖如此，頭兒們其實極少有「隨後跟上」的。事實上過不了多久，頭頭們的精力，就要全部耗在「向走資派奪權」上面了，哪裏還有心思和時間去徒步長征？但當時頭頭們的表態，是很讓人歡欣鼓舞的，贏得了大家熱烈的掌聲。郭司令講話後，還有幾位同學也上臺發言，鼓勵我們將長征進行到底，「不到長城非好漢！」九點，我們一行45人在同學們的夾道歡送中踏上征程。是日秋風蕭瑟，寒氣森森，血紅的太陽透過薄薄的晨霧，飄逸著溫和的光芒。我們舉著長征隊的大旗唱著歌曲，精神抖擻地沿公路東行。

隨著隊伍的行進，我越走心裏越踏實。我感到興奮、充實而滿足，覺得自己終於又融入了一個生氣勃勃的集體之中，重新獲得了參加革命的資格。

我的「長征日記」中記載著我們出發的這一天是十一月九號，一個秋高氣爽的日子。

就在這一天，二司的紅衛兵佔領了省委的機關報《湖北日報》。

此後的兩個月裏，武漢三鎮還會有許多大事要發生。

但這一切都與我們這支隊伍無關了，我們只是不停歇地往前走。

空曠的大路上，飄揚著我們「新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隊」的旗幟；

藍天之下，迴盪著「紅軍不怕遠征難」的歌聲。

身後，喻家山已漸漸淡漠，城市的喧囂離我們愈來愈遠。

文化大革命的喧囂也離我們愈來愈遠了……



## 第六章

# 從韶山到南昌

我們的步行串聯，實際上始於江西萍鄉，此之前是乘火車「長征」的。之所以這樣安排，據頭頭們解釋是為了爭取時間，趕在明年十一之前到達北京。大連海運學院的長征隊，因開徒步串聯風氣之先，他們的頭頭是被邀請上了天安門城樓的，我們的頭頭則想以「二萬五千里長征」之舉，在國慶大典上，也能在天安門城樓上佔有一席之地。其實「二萬五千里」只是號稱，實際上走不了那麼多路，因為當年的工農紅軍為作戰方面的需要，是常常要作大規模的迂回行軍，也就是與敵人繞圈子，比如「四渡赤水」之類。我們就大可不必，估算一下，至多走上兩萬里就足夠了。至於雪山草地，倒是個大難題，但是聽人說早有部隊守候在那裏，專門護送串聯的紅衛兵通過，絕無性命之虞，大家可以放心大膽地「沿著紅軍的足跡前進」。

我們出發前的準備工作，應該說還是做得不錯的。除了八角帽、皮帶、綁腿之外，每人還配備有一隻軍用水壺、一枝電筒和一張防雨的塑膠布，後來在長沙每個人又購置了一個篾製的斗笠。此外每個人還配置了一枚匕首，全隊則配備了兩支小口徑氣槍，還有一口行軍鍋，一把衝鋒號。擔任號手的那位同學，本來就是學校文工團吹小號的，一把衝鋒號不僅可以吹得嘀嘀噠噠的響，甚至還可以吹出《義勇軍進行曲》的音調來，惹得大家都想試一試。但能吹響已屬不易，吹出個調調就更難了，像我就是用盡吃奶的力氣，脹得臉紅脖子粗，也吹不出個獨來米發來。好在我的兼職是攝影記者，吹不吹得響喇叭無所謂。攝影這差事也比較輕鬆，不像兼炊事員的那位，天天挑著行軍鍋

和油鹽米麵行軍，辛苦得不得了。隊裏倒是缺一位醫生，正好有位到武漢串聯的新疆醫學院的學生碰上我們要出發，要求和我們一起長征，他於是背隻急救箱，成了隨隊的「軍醫」。其實這位「軍醫」，只是個剛進大學一年的學生，什麼病他都治不了。但既是學醫的，醫藥方面的知識他總比我們要知道得多一點，起碼還懂得「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不至於肚子痛的時候，給你肚皮上塗紅汞。

我們傍晚到達長沙。車將至長沙時，從隔壁車廂過來一位戴紅衛兵袖章的大學生，一交談原來是「保皇派」，我們馬上劍拔弩張地和他辯論起革與保的問題來。辯論中少不了集體朗誦毛主席語錄，什麼「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啦，什麼「什麼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麼人站在反革命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麼人口頭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實際上站在反革命方面他就是口頭革命派」啦，還有《紅旗》雜誌有關社論中的一些段落。火力之猛，當然是所向披靡，那位「保皇黨」哪裏招架得住，只好落荒而逃。這大概也算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吧，但這還僅僅是第一回合，小試牛刀而已，以後一路上這種「兩條路線的鬥爭」還不少呢。只是，這些真算得上是路線鬥爭麼？

當天夜宿湖南醫學院，次日按計劃在長沙參觀訪問了湖南省立第一師範、長沙清水塘這些主席青年時期開展革命活動的舊址。在橘子洲頭我們佇立良久，望著腳下滾滾北去的湘江水，緬懷主席當年投身革命大潮，組織《新民學會》，創辦《湘江評論》的革命實踐，無不為主席年輕時那種「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擊水三千里」的豪邁氣概激勵得心潮澎湃。

告別長沙後，我們乘船沿湘江直取湘潭，晚上便住宿在湘潭市人民銀行的招待所裏。銀行的造反派戰友極熱情地接待了我們。豐盛的晚餐之後是聯歡晚會，聯歡會上雙方又跳又唱，自然跳的唱的，都是歡呼頌揚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銀行戰友集體演唱了一曲《瀏陽河》，高歌瀏陽河「五十里水路到湘江，江邊有個湘潭縣，出了個毛主席領導人民得解放啦」。銀行方面表演這類的節目自然拿手，但最受歡迎的似乎還是我們長征隊的看家節目沔陽漁鼓，由隊裏幾個原校文工團曲藝隊的隊員連袂表演，內容是批判三家村的「反革命宣傳」迎合了

帝修反的需要。其中一人唱道：美帝喜得嘴只歪咧，另一人伸出拇指怪叫：OK、OK。又一人念道：蘇修樂得打哆嗦咧，第四人一手前伸作怪狀並用俄語叫嚷：哈達那索、哈達那索。然後第一人再唱道：你們這些可愛的小乖乖呀，等到復辟成功了，把頂烏紗你們戴喲。其餘三人搖頭擺尾，手舞足蹈，醜態畢現。這之後當然是革命人民一聲怒吼，將這些「丑類」統統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這種「活報劇」似的演出因演員的表演活靈活現，惟妙惟肖，引得大家笑得前倒後仰。湘潭一個曲藝團體馬上找到表演的同學，要求學習這個節目。我們的同學自然是和盤托出，毫無保留，也不怕人「偷伎」，奪了他們的飯碗。看見節目如此大受歡迎，我禁不住就回想起我念初一時創作的那個活報劇，當時如果獲准上臺演出，效果當不在此活報劇之下，可惜生生被那個黃老師斷送了。想著這些心裏就不免有些忿忿的，又勾起對往事的許多回憶，一晚都沒有睡踏實。天快亮時剛剛入眠，就聽見起床號響，連忙起床集合，趕早直奔韶山。途中不斷有載滿紅衛兵的大卡車和大客車從身邊駛過，而我們的一杆「新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隊」的大旗一路上也格外醒目，加上我們一身「紅軍」的裝束，引起各路「朝聖者」的注目。

我們終於來到了嚮往已久的韶山沖。一到達便首先參觀介紹毛主席生平的韶山陳列館，進了陳列館的門，迎面便是毛主席五九年六月回到故鄉時寫下的那首著名的《七律·到韶山》的手跡的巨幅複製品：

別夢依稀咒逝川，故園三十二年前。  
紅旗捲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

念著這首詩，我不禁想到在學校裏看過的一張揭批王任重的大字報。大字報說當年王任重陪同毛主席去韶山時，曾寫過一首詩，曰：「韶山風光依舊，人世幾經滄桑。壯志已成大業，何須衣錦還鄉？」一讀之下，分明「謗詩」。記得似乎是項羽說過一句話，「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誰知之者！」當時有人挖苦他「楚人沐猴而冠耳」，結果是

被項羽給「烹」了。王任重的這首詩主席不知知否，倘知，不將王任重打入「另冊」才怪。

我們順次參觀了韶山陳列館和毛主席舊居，時間久遠，參觀的具體過程也早已「別夢依稀」了，但有幾點仍是印象十分深刻。

一是主席的出身。按韶山陳列館的介紹，主席出身於勞動人民家庭，祖祖代代都是農民。祖父是貧農，父親青年時期也是貧農，到後來才發展成為一個比較富裕的中農。但是據毛本人在延安對美國記者斯諾講話時的回憶，他父親到盛年時已置下22畝地，年收成84擔穀，雇有長工和短工。連主席自己都承認他父親是個「富農」，陳列館卻「為尊者諱」，偏只肯認定為「中農」。

二是主席的家庭。主席的家庭出了六位革命烈士：毛的大弟毛澤民、小弟毛澤覃、妹妹毛澤建、妻子楊開慧、長子毛岸英、侄子毛楚雄。領袖一家為革命貢獻出這麼多的親人，這在中外革命史上都是罕見的。瞻仰陳列館內懸掛的六位烈士的遺像，我們內心的崇敬之情，只可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這句話來形容。

在參觀毛主席舊居時，我仰望主席青年時的肖像，「無限敬仰、無限崇拜」的心情油然而生，真正變成了一個「朝聖者」。後來在獄中我秘密創作紀實小說《狂飆曲——紅衛兵之歌》，寫到「瞻仰韶山」一節時，是這樣來描述我那時心中的領袖形象的：

照片中的主席，也不過十七八歲的年齡，那寬廣的胸襟裏，就已經裝下了一個遼闊的世界。緊鎖的眉間，是在思索著革命的道理；深邃的目光，正關注著苦難的人間。這是天生的革命導師的目光，這目光裏包容著一個浩瀚的大海，它將沖刷出一個嶄新的世界來。

晚上我們與毛主席舊居陳列館的工作人員進行座談，詳細瞭解主席青少年時期的生活、學習和革命活動情況，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啟迪。我就想到頭天晚上，自己為念初中時創作的一個節目被老師否定過，還在耿耿於懷。和偉大領袖青少年時就「心懷天下」的博大胸懷相比，我豈不是太小肚雞腸了嗎？我感到很慚愧。

第二天是雨天，我們冒著雨在韶山主席舊居附近的田地裏勞動了

半天，晚上與老貧農毛髮生座談。毛髮生給我們念了一首解放前韶山的民謠：韶山村連村，十家九家窮。有女莫嫁韶山沖，柴火紅薯度一生。然後從舊社會講起，一直講到當年主席回韶山的情況。座談將結束時，發現有武漢大學一支叫「九一二」長征隊的同學也在場旁聽。「九一二」是所謂「保守派組織」紅衛兵，我們當即大唱《資產階級保皇派》一歌將他們臭罵一頓。這幾位同學很尷尬，說，「是革命的不應該這樣對待同志」，我們說如聽得不受用歡迎辯論，他們說不和你們辯論，我們就將他們轟了出去。我們人多勢大，又是「響噹噹、硬梆梆」的「革命造反派」，自然是非常的盛氣凌人。但是後來每想到他們說的那句話「是革命的不應該這樣對待同志」，心裏就不是滋味。同為紅旗下長大的青年學生，你革命，人家就不革命麼？觀點上的不同，就真的能成為革命不革命的分水嶺麼？可惜我們當時頭腦發熱得很，還決定第二天臨走之前，用大標語和大字報把這些「保皇狗」再臭罵一頓，還說這叫做「宜將剩勇追窮寇。」

次日是十一月十三日，仍下雨。俗話說「人不留客天留客」，但我們在韶山已整整逗留了三天，要趕路了，誰留也不中。於是依依不捨告別韶山，臨走之時興之所至，仿水調歌頭形式填詞一首；曰《訪韶山》：

久有凌雲志，今日到湘潭。瞻仰主席舊居，豈畏征途難。昔日烏雲密佈，霹靂一聲震響，東方升太陽。金光銷冰雪，敢叫天地換。秋風爽，上韶山，悲歌壯。主席一家，六位英烈獻肝腸，熱血染紅山川。革命後代跟上，揮淚別湘江。而今遠征去，誓到長城還。

在韶山時原確定要正式開始徒步長征的，但頭兒們臨時改變主意，說因雨在韶山多呆了兩天，為奪回這兩天的時間，須乘車前往下一站江西萍鄉，大家遂趕往韶山車站。在韶山車站候車時，遇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第七大隊也在車站等車，馬上又與這支北京的「保皇組織」接上了火，仍然是用《資產階級保皇派》之類的歌將他們挖苦了一通。這支紅衛兵遭此突襲，狼狽不堪，幸好有一輛大客車來了，也不問方向，趕緊上車落荒而逃。我們自然是得意極了，不斷地高唱造

反歌曲。候車室裏圍觀的革命群眾又拍手要求我們跳「忠字舞」，我們隊裏有十幾位能歌善舞的男女學生便非常爽快地翩翩起舞，倒還真的跳得有模有樣，周圍群眾掌聲如潮。

我從來都缺少舞蹈細胞，「資產階級的」交誼舞自然是不會跳，「無產階級的」忠字舞同樣是跳不會，在那些會跳的同學面前不免自慚形穢。以後見到街上一些七老八十歲的老太太，也能扯著紅綢帶用小腳顫巍地扭「忠」字舞，就愈發覺得自己落後於「時代潮流」。《二十四孝圖》中那位老萊子「行年七十，言不稱老，常著五色斑斕之衣，為嬰兒戲於親側」，真是孝順得可愛。如今不提倡孝而提倡忠了，我想以後有機會的話，不妨編一部《二十四忠圖》，像這些扭忠字舞的婆婆奶奶，便可以作為典型編選入圖，注明「行年七十，忠心不減，常著五色斑斕之綢，上大街舞於領袖畫像之側。」但是也有人挖苦這些本應在家含飴弄孫的小腳婆婆，不像是跳舞倒像是在「跳神」——當然只敢在背地裏偷偷地挖苦。

那天在韶山車站乘上了開往萍鄉的汽車，次日凌晨三點到達萍鄉，宿萍鄉二中。一間教室的地上鋪滿了乾稻草，大家打開行李，倒頭就睡，好等天亮後趕去安源煤礦參觀。安源煤礦這個地方，我們最早是在讀小學時從語文課本中知道的，課本中有一課是講劉少奇領導安源煤礦工人罷工，說劉少奇與礦上的反動派談判時「一身是膽」。但是文革中又揭露出劉少奇是工賊，在安源煤礦是搞投降主義的，那「一身是膽」自然也就變成了「一身老鼠膽」。而真正到安源領導工人階級對敵鬥爭的，是偉大領袖毛主席，還有那時的民謠出來作證：直到一九二一年，忽然霧散見青天，有個能人毛潤芝，打從湖南來安源。後來更有一幅油畫，畫的是毛主席手持一把雨傘，神采奕奕來安源的情景：主席腳下是萬山千嶺，主席頭上是光芒萬丈，端的是「忽然霧散見青天」，救星降臨了人間，來拯救受苦受難的勞苦大眾。誰說「從來就沒有救世主」呢？那真是不懂我們中國的國情。

我們在安源參觀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的舊址，參觀路礦工人鬥爭陳列館，發現這個地方中「劉賊」的流毒或曰「劉毒」很深，是個「重災區」，俱樂部舊址和陳列館中處處都還有為劉少奇「塗脂抹粉」的痕跡。把劉少奇從領導工人罷工鬥爭的英雄，一下子變成破壞工人運動的狗

熊，這裏的工人似乎一時半點腦子還轉不過彎來。例如俱樂部院子裏的兩棵又粗又高的大槐樹，據說就是劉少奇某年某月某日親手和工人們一道栽種的，早已是枝密葉茂，冠大如蓋。如今劉是「工賊」了，豈能留下這兩棵槐樹為他樹碑立傳。聽說紅衛兵們早已強烈要求砍樹，安源的工人就是不砍，頑冥不化得很。

當然革命靠自己，還是得等工人們自己覺悟，我們也不便越俎代庖，只是和安源工人進行了一次懇談。一位姓譚的退休老人二二年參加過安源大罷工，住在安源煤礦老工人敬老院裏。譚老人先是給我們憶苦，唱起當年安源流傳的一些歌謠，「聽說安源好賺錢，一來不覺兩三年。身上衣服無良片，思鄉難把家鄉見。想要回家看母親，身無盤纏半毫分。」還有「少年進炭棚，老來背竹筒。病了趕你走，死了不如狗。」為什麼「老來背竹筒」呢？就是背個竹筒子四出討飯。工人進礦山做活工資少得可憐，一個強勞力只有三十多個銅板一天。而工頭最少三四百吊錢一個月，多的到千把吊，官僚和美英德的技術人員，是兩三千大洋的月工資。工人工資太少，只能省吃儉用，一條毛巾都要派三樣用——腰帶、頭布、洗澡巾。礦山向地主買發了黴的玉米，賣給工人從中進行盤剝。礦井裏缺少安全設備，通風不好空氣混濁，容易發生瓦斯爆炸，一旦出了事故，工頭就把礦井關閉，根本不管工人的死活。礦井還經常塌頂，發生井崩。工人大部分娶不起媳婦，娶了也養不活，小伢只好送進育嬰堂，或賣給有錢人做丫頭、做小，工人的日子過得比牛馬還不如。但是工人們講迷信，以為是命苦，祖宗造了孽，該晚輩來還債。

譚老人說，是毛主席共產黨教給了我們革命的道理，還派了人來礦山組織我們辦起工人俱樂部，鬧罷工，抱起團來和資本家作鬥爭。說到這裏，老工人的話就開始走板，說起劉少奇當年「渾身是膽」領導工人罷工的英雄事蹟來。又不好阻擋他，把我們的頭頭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借送水給老人喝的機會勸其休息休息。然後馬上總結說，聽了譚老的報告我們受到一次深刻的階級教育，等等，隨即宣佈散會。

這使我不禁想到文革中流傳的一則笑話，有貧下中農被邀請上臺，批判中國赫魯曉夫在農村復辟資本主義的罪行。那貧下中農滿懷

階級義憤回憶說，就是這個中國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路線，搞得那幾年我們農村飯都沒得吃，到處餓死人。幸虧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號召我們搞三自一包，包產到戶，種自留地，才救了我們一條命。這個傢伙顛倒黑白，混淆是非，胡說八道，美化中國的赫魯曉夫，簡直是階級敵人的代言人。但他是三代的貧下中農，你拿他有什麼整？轟下去拉倒。只是有個問題，怎麼這些老貧農、老工人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覺悟都這樣低呢？所以必須大力肅清中國赫魯曉夫的「流毒」。只是談何容易？懶得管了，明天要開始真正的徒步長征了，我在這天晚上的日記中寫道：「準備迎接嚴峻的考驗。」

十一月十六日，是我20歲生日。沒有鮮花、沒有蛋糕，我這一天收到的生日禮物，是行軍一天走出來的滿腳板的血泡。清晨，在嘹亮的號聲中我們踏上征途，第一目標是一百五十里外的蓮花縣城。這一百五十里路我們整整走了兩天，兩天的行軍對我們這些從未走過遠路的學生們，真正是「嚴峻的考驗」。同學們的腳底大都打了血泡，走起路來腳板像針錐似的疼痛，背上的背包也感到愈來愈重，兩隻腿沉甸甸的像灌了鉛似的。但我們毫不氣餒，萬事開頭難嘛，沒有一個人打退堂鼓，相反，我們一路上歌聲不斷，情緒極為高昂。行軍的確是想像不到的艱苦，但是也有一種過去在校園裏未曾體驗過的愉快。這江西境內沿途全是山，翻越一座大山時，以為前面就是一馬平川了，但翻過後才知道，還有更加險峻的山峰聳立在我們面前。於是再翻，翻山越嶺啦，我們走進了茫茫雲海之中。雲霧像海浪一樣在我們的腳下翻騰，我們似乎進入了世外仙境，那種奇妙飄逸的感受，實在是非親歷不能體味。

我們頭天行軍後是在山腳下一所小學住宿的，學校中有幾個小學生就住在學校教室裏，晚上我們就和他們並頭睡在一起。我們問一個小學生，讀過紅軍的故事嗎？他說沒有，但是又說看見你們還不是一樣，令我們大受感動。第二天早上我們和小學生依依惜別，這些山村的娃娃平時很少與外界往來，見我們這些「紅軍哥哥」要走，追著送了一程又一程。

又是一天艱苦的行軍，我們於傍晚時分到達了蓮花縣城。因首次行軍，大家累得東倒西歪，有的同學還生了病，頭頭們商量後決定在

蓮花住下來休整兩天。我們住在縣委給我們安排的接待站裏，燒了滾燙的熱水泡腳，然後美美地躺在鋪了草墊的通鋪上，讓那位新疆醫學院的學生給我們用消了毒的針挑腳板上打的泡。泡子挑破後再擦上碘酒，腳就輕鬆了。但是據內行說弄不好以後還會再打泡，就得再挑，等泡子磨泡子磨出一道硬硬的老繭，那才算是磨出一雙鐵腳板來了。但那恐非一日之工，得經過多少艱苦的磨煉。

恢復行軍疲勞的辦法，除了宿營時用熱水泡腳之外，睡覺也有講究，便是將雙腳墊高一些，這樣有利於血液循環。我試了一晚，果然效果不錯。但是覺還是睡不好。當初隊伍到達長沙時，為了輕裝上陣，有許多人是把墊的蓋的兩床鋪蓋留了一床，集中寄存在一個長沙籍的同學家裏。我的倒沒精簡，但是分了一床給那位新疆學生。我們各背一床，晚上宿營時兩人共睡一套鋪蓋，（其他人有一大半也是這樣）。頭幾天沒怎麼走路，兩人合睡鋪蓋倒還相安無事，可是一行起軍來，那兩隻腿酸痛得不得了，晚上睡在船上，非烙大餅似的不斷地左右翻滾才行。兩人蓋一床鋪蓋，那簡直就是名符其實的「窩裏鬥」，根本睡不安逸，只好還是一個人睡。雖然兩床鋪蓋白天行軍時要一個人背在背上，沉重了不少，但晚上畢竟可以睡安穩了，左翻右滾在被窩裏烙燒餅也礙不著別人，而那位新疆學生又找了位晚上睡得沉實不打滾的同學共鋪蓋。

在接待站我們休息了一晚，緩了口氣，體力也恢復了一些，第二天又不急著趕路，便三三兩兩約在一起上街觀光，順便滿街的「掃四舊」。蓮花算是個老蘇區了，在毛澤東寫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鬥爭》等文章中均有提及。但是老蘇區的「四舊」也不少，這個店的招牌是「封資修」的啊，那個鋪裏還在供財神菩薩啦。還有哪堵牆上貼的毛主席語錄掉了一隻角啦，哪座樓頂上的紅旗破了一個洞啦，都在「勒令整改」之列。有幾個同學在參觀了縣裏辦的老人幸福院後，更徑直闖進縣委，指三道四，說縣裏對幸福院的革命老人極不尊重，生活上簡直是虐待，揚言要造縣委的反。小地方的領導當慣了「小國之君」，哪受得了這口惡氣，一時怒起讓人把這幾位同學扣了起來。

消息傳來，頓時大本營裏炸了窩，於是全隊集合，舉起「二萬五

千里長征隊」的大旗，前往營救。趕到縣委，大門外早已擠滿了當地群眾，正議論紛紛。有說抓的是幾個搞破壞、煽陰風點邪火，要造縣委反的反動大學生。但有一個小孩子馬上否定說不是大學生，因為大學生是要戴眼鏡的，而這幾個同學並沒有戴眼鏡。這時圍觀群眾見我們到了而我們中不少同學都戴眼鏡，於是大家驚呼道「大學生真的來了。」但也有人指我們臂上的袖章說，不是大學生是新紅軍。縣委一見我們這支大軍「兵臨城下」，情知勢頭不對，趕緊放人。我們和被扣了一陣子的同學們「勝利會師」後，便去幸福院內各個地方轉了轉，發現果然問題不少：快入冬了，老人們的被褥還薄得像張紙，食堂的飯菜也很差，衣衫單薄的孤寡老人們龜縮在玻璃都不全的屋子裏凍得直發抖，而這些老人們有的還是當年的紅軍戰士呢！當然要造縣委那些老爺們的反了。

見我們大隊人馬動作起來，縣裏知道不可小視，第一把手劉縣長親自跑來向我們賠禮道歉，又是作檢查又是做保證，應准馬上撥款修繕幸福院房屋，添加被褥冬衣，改善伙食，態度頗為誠懇，我們也就放了他們一馬。隨即全體動手幫這些革命老人打掃室內衛生，女同學還替老人們拆洗衣被，感動得這些曾為中國革命流血流汗出生入死而今卻晚景淒涼的前輩們熱淚盈眶，拉著我們的手親熱得不得了。打掃拆洗完畢，同學們又為老人們表演歌舞，之後又列隊前往蓮花革命烈士紀念館參觀。從參觀中知道，這個小小的縣城，在革命時期竟有三千五百多名烈士把鮮血灑在這片土地上。紀念館的烈士壁上，密密麻麻地刻滿了烈士的姓名和年齡，其中年齡最小的僅九歲。真是滿城革命忠烈，願他們的英魂在天安息。

是夜，我們特別邀請一位當年的紅軍女戰士，給我們講傳統。這位老婆婆倒是好口才，給我們講了不少當地流傳的革命故事。其中有一故事給我印象尤深，是說一位從蓮花參加紅軍離開家鄉幾十年的紅軍戰士，到解放戰爭時已是人民解放軍的一位高級指揮員。渡江作戰重新踏上故鄉土地時，這位指揮員悄悄回了一趟家，見著了闔別多年的老母。而老母因思子過度，早哭瞎了雙眼。兒子什麼話也沒說，把幾枚銀元和一張字條放在母親身邊的凳子上，就追他的部隊去了。老母後來終於知道兒子回來過，當場激動得昏厥過去。直到戰爭在全國

勝利後，這位母親才和兒子團聚。故事是否真實，我們無從證實，但無數革命志士為了人民的利益和新中國的建立而犧牲了自己的家庭、親情、甚至生命，卻是不爭的事實，所以這個故事令我們非常感動。

也許是我們這支長征隊大鬧蓮花，連一縣之長都屈尊向我們賠不是，一夜之間，蓮花城內竟出現了不少關於新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隊的傳聞。說我們一行人一色的紅軍軍裝，人人帶短槍，個個有一手飛簷走壁、百步穿楊的絕活，且能歌善舞，演的節目比縣文工團演出的還精彩。

說來也巧，在蓮花縣城，我們又遭遇了一支由武漢一個保守派學生組成的「硬骨頭長征隊」。對「保皇派」我們是冤家路窄，決不放過的，於是在城裏貼滿了大標語：「硬骨頭長征隊是湖北省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御林軍」之類，搞得這支長征隊的同學灰溜溜的。

二十號，我們離開了蓮花，行軍大半天，到達永新縣境內著名革命遺址三灣，參觀了「三灣改編」的舊址楓樹坪。站在枝繁葉茂的楓樹之下，毛主席當年在樹下給紅軍作改編動員的講話猶在耳邊：「……賀龍兩把菜刀起家，現在當了軍長。我們有幾百條槍，上千號人，難道還怕打不過白狗子嗎？」然而物是人非，兩把菜刀起家的紅軍創始人之一的賀龍元帥，竟已淪為毛澤東的階下囚。據說賀龍本來就是大土匪、大軍閥，那他當年為何不去投靠國民黨，當高官發大財，偏要跟著犯殺頭罪的共產黨走呢？真是叫人不大明白。

次日離開三灣，向南行軍七八十里路，到達寧岡礮市，這裏是當年毛澤東和朱德兩支紅軍隊伍會師的地點。我們參觀了「紅軍會師廣場」。廣場上樹立的碑文曰：

一九二七年十月，毛澤東同志率領的工農革命軍來到井岡山建立了革命根據地。朱德等同志為了走毛澤東同志的道路，於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八日率領「八一」起義部隊和湖南暴動農民來到礮市，與毛澤東同志率領的工農革命軍會師。五月四日，在這裏舉行了慶祝紅軍會師大會。大會宣佈成立中國紅軍第四軍，毛澤東同志為黨代表，朱德同志任軍長。

碑文所言，當屬歷史的真實記載。然而朱總司令不也是「右傾機

會主義分子」、是「軍閥」出身麼？似乎也得靠邊站了。而副統帥林彪雖當時僅為朱德帳下一區區連長，但作為毛澤東最親密的戰友，說當年的紅軍會師是毛和林的會師，也是說得過去的。後來有幅畫還真把這次紅軍會師，畫成了毛澤東和林彪在井岡山上握手，算是深得個中三昧。於是一首隊列歌曲也就唱變了調：巍巍井岡山養育了鋼一連，毛代表就在我們的身邊，林連長走在隊伍的前面，嘿，走在前面。而這首歌原來是說朱軍長走在隊伍的前面的。時過境遷，朱軍長落後了，林連長也就是如今的林副統帥當然要「走在前面」了。但「連長」一職太微不足道了，他應當是副軍長或至少是正師一級，連長只是下連臨時掛個職而已。只是這一點還需要黨史工作者用心地去考證。

我們這支新紅軍長征隊，在井岡山就是大唱「林連長走在隊伍的前面」的歌子翻山越嶺。歷史變成了一個任人打扮的婢女，我們這些「毛主席的紅衛兵」，在這中間又起了什麼作用呢？我們愧對歷史。

離開紅軍會師廣場，下午來到茅坪，參觀烈士墓、紅軍醫院、八角樓、湘贛特委辦公處、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舊址。二十三日又參觀步雲山紅軍練兵場舊址，然後全隊隊員精神抖擻地攀登井岡山五大哨口之一的黃洋界。出茨坪沿蜿蜒曲折的山路前進，沿途谷深壑絕，岩峭石奇，林濤洶湧，飛瀑成群。巍巍五百里井岡嵯峨萬木生機勃發，一片綠色的海洋。山路兩旁修竹森森，松柏參天，鳥雀鳴叫其間，彷彿天籟之音；前方隱隱傳來水擊之聲，漸漸聲響愈來愈近、愈來愈響，彷彿聽見洪鐘在轟鳴。遙望遠處，一匹皓皓白練垂懸於流碧滴翠的峻嶺之中，恰似一幅幽美的山水畫懸掛於天地之間。陽光照射在落差近百米，噴雲堆雪般的瀑布之上，一道七色彩虹銜山結水，橫貫長空。長長一條峽谷中峰巒高聳，奇石嶙峋，一步一景，氣象萬千。

離黃洋界愈近，海拔愈高。盤山公路一面是高高的壁崖，一面是萬丈深淵。臨淵的一側有鐵鏈作保障，山澗中雲海翻滾，白茫茫一片，人似在天宮中行走，沿途不斷會見到「南天門」、「九重天」之類的牌坊，更增添了一種神秘的感覺。中午時分，我們全體終於攀上了黃洋界主峰。峰上立有紀念碑一座，正面有主席手書「黃洋界」三個金色的大字，背面則是那首著名的主席詩詞《西江月·井岡山》。站在黃洋

界哨口上，舉目四望，蒼山如海，白雲似浪。遙想紅軍當年，以不足一營之兵力，借助黃洋界險要的地勢，打垮敵人四個團的進攻，真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啊，我們情不自禁一齊高唱起「山下旌旗在望，山頭鼓角相聞……」的歌曲來。沉寂的山巒伴以低沉的回音，林濤呼嘯似浩瀚的和聲，彷彿讓人又聽見了當年黃洋界上隆隆的炮響。

從黃洋界下山我們幾乎是一路小跑。途中經過當年紅軍挑糧上山走過的小道，小道上有一荷樹，是當年軍民挑糧歇息處。據說毛澤東朱德當年與軍民們一道挑糧上山，往返100多里，中途就常在這棵荷樹下歇腳拭汗。小學課本上那篇膾炙人口的《朱德的扁擔》的故事，就是以此為背景，見到這棵樹我們自然是倍感親切。但是下山後在參觀井岡山博物館時，卻再也見不到那根著名的「朱德記」扁擔了。我們在描述紅軍挑糧上山的油畫中，看到的是林彪與毛委員並肩站在一起，赫然一根扁擔在手，看來井岡山上說不定將有一根「林彪的扁擔」快出土了。

歷史可以因政治上的需要而捏成圓的或捏成扁的，看來已無庸置疑，但我們這些在「十七年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薰陶或說毒害下長成的青年學生，也許是中毒太深，還是不能完全接受這種捏造事實的「政治」，我個人甚至由此而對這種歪曲歷史真相的「政治」產生極度的反感。後來我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韙為「六十一大叛徒集團」翻案，正是出於這種義憤。但是在井岡山上串連時，我卻還沒有膽量去喊一聲「還我朱德的扁擔」。

次日即二十四日，參觀大井毛澤東舊居。舊居曾遭國民黨火焚，房屋盡毀，僅存一堵殘牆及屋後兩株燒枯的大樹——一株海羅杉和一株鑿樹。令人稱奇的是兩株枯樹解放那年竟重新吐芽，且越長越茂盛，正所謂枯木逢春。而到一九六五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時，這兩棵樹竟又重新開花結籽了，似乎樹也有情、「天人感應」。言者鑿鑿、聽者藐藐，但誰來證實呢？也許這兩株樹根本就沒有燒枯過，一直都在開花結籽，但是為了某種也是政治上的需要的原因，創造出這種「枯木逢春」的神話。我們實在是假話聽得太多太多，而不得不對這類可以說是唯心主義的「奧跡」表示懷疑。

但是大井確實是個風光秀麗、民風古樸的高山田園之鄉。周圍翠

林環繞，遠處山巒縹渺，梯田層層，溪水清清。一幢幢古樸的村舍民居，座落在翠林清溪之間，別具風味。難怪有民謠唱道：「行洲府、茨坪縣，大小五井金鑾殿」了。大井和小井、中井、上井、下井一起，為層巒疊嶂的群山所環抱，故而得名。獨特的地理位置，也就使大井小井成為當年紅軍在井岡山上活動的中心，紅軍領袖們的舊居大都在此。解放後井岡山烈士墓也建於此，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五烈士墓」，墓中葬有王佐與袁佑才等井岡山本地的農民領袖。王佐早年投身綠林，劫富濟貧，後參加革命，歷任湘贛邊界防務委員會主任、紅四軍第三縱隊司令員等要職，後來卻被彭德懷所殺。彭為何要殺王佐？沒有人說得清楚，但既尊為「烈士」且墓前立碑紀念，那肯定當初是殺錯了。我們站在王佐墓前，心裏只感到一陣淒涼。

二十五日，正值井岡山人民隆重紀念毛主席《井岡山的鬥爭》一文發表三十八周年，我們應邀參加了紀念大會。此時會場內來自全國各地的長征隊已有好多支，各舉各的旗幟，什麼「毛澤東思想長征隊」，「紅色接班人長征隊」等等，甚至還有一支「學紅軍長征隊」，但是唯有我們的「新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隊」獨樹一幟，格外醒目。開會之前，臺上宣佈請來自毛主席就讀過的母校湖南長沙第一師範學校長征隊的同學上主席臺，下面頓時用熱烈的掌聲送這支長征隊上臺。接著，出乎我們意料，臺上宣佈請華中工學院新紅軍二萬千里長征隊四十五名戰士上主席臺。我們在全場掌聲中，高唱「紅軍不怕遠征難」的歌曲，昂首走上台去。在全體與會者的注目中，我們感到非常驕傲。

或許是由於我們的隊風、隊貌、形象和裝束，都特別給人留下好的印象，當時正在井岡山拍攝反映紅衛兵大串連紀錄片的「八一」電影製片廠的攝影組，提出要給我們這支長征隊拍攝一些鏡頭，作為紅衛兵沿著老紅軍的足跡前進的新聞片。消息傳來，全隊一片歡騰，大家摩拳擦掌，準備以最雄壯威武的形象亮相於攝影機前。不料一連幾天烏雲密佈，能見度不夠，攝影組無法開機。好不容易等到了能見度轉好，可以拍攝了，大家都高興得不得了時，我和幾位同學，卻被政委黃湘蘭堵在了屋裏面。

「這部影片作為新聞片是要在全國放映的，」黃湘蘭說，「攝影組要求我們這支隊伍一定要一律是紅五類出身，以免公映以後產生不好

的政治影響。考慮到這一點，經隊裏幾個領導研究決定，你們幾個同學這次就不參加拍攝了，就在家裏學習毛主席著作，這也同樣是一項嚴肅的政治任務。大家對這個決定有沒有什麼意見？」意見？還能有什麼意見，當然是「沒有意見」。我們幾個人就悻悻地留下來，眼睜睜地望著同學們拍電影去了。

說實在的，自決定參加長征以來，就只想到經受艱苦的考驗。長征本來就是吃苦受累的事，跋山涉水準備磨掉一層皮，並不曾有其他的奢想。一路上風餐露宿、翻山越嶺固然是艱苦，但一路上社會和群眾給我們的榮譽，也是我們沒有想到的，至於拍攝電影，更是作夢都沒想過。但事情臨到頭上，還是想不通，感到非常委屈。在學校裏被視為「黑五類」備受歧視，因而要求長征，希望通過艱苦的鍛煉，重新取得「革命」的資格，卻未曾想到在長征隊中，仍然是個矮人一截的「異類」。出身問題就真的像個夢魘，要壓迫自己一輩子麼？我什麼時候才能擺脫出身的桎梏，走出「黑五類」的陰影呢？我忽然想起大井烈士墓裏那個叫王佐的人的冤魂，他是不是也是因為「綠林」出身而終於不能見容於革命隊伍呢？我不寒而慄。

和我一起被剝奪了拍電影資格的同學中，有一位叫馮天艾的，是無線電系四年級的學生，長我兩歲，一臉的絡腮鬍子，相貌堂堂頗有美髯公的氣派。文革前馮是無線電系的文體部長，據他對我說，一年前招新生時，我這個市中學生運動會的百米冠軍，本來是準備分給他們系的，他就一直盼著我來報到，卻不料我被船舶系挖走了。我說不是挖走了，而是我本來志願中第一專業就是填報的船舶系，第二專業才是無線電系。大概是我出身不是太過硬，才準備分給無線電系，後來不知怎麼還是分給了船舶系，所以與你們系是失之交臂，有緣無份。

我和馮天艾談話甚為投機，從談話中知道，馮的父親是一位建築工程師，曾主持設計過武漢市有名的那座標誌性建築中蘇友好宮；母親是市裏一所重點中學的校長，特級數學教師。自然，文革中他的父母親都被打成了「反動學術權威」，馮自然也就成了同我一樣的「黑五類」。兩個「黑五類」相視一笑，從此竟結為了生死之交，此是後話。

這一天彷彿過得特別長。學習毛主席著作這個「嚴肅的政治任務」

也不知道究竟完成得怎樣，反正沒有人來檢查。而傍晚時從拍攝地返回長征隊的同學，也沒有了出發時的激情和興奮，灰溜溜地掉了魂似的。一問原來山上的能見度仍然不好，等了整整一天，天公仍不作美。攝影組只好取消了拍攝計畫，讓同學們打道回府。看見回來的同學們那付垂頭喪氣的樣子，我和馮艾天相視無言。說什麼好呢？老天爺似乎並不特別垂青「紅五類」。

這天晚上，不知怎的我突然病倒，經檢查是患化膿性扁桃腺發炎。新疆醫學院的那位同學是絕對的束手無策了，我被送進井岡山人民醫院，住院治療了兩天。隊長朱海濱和一些同學到醫院來看我，還買來一些營養品，這使我很感動。朱海濱還送來一枚井岡山紀念章和一本毛主席詩詞袖珍本，我對此愛不釋手，身上病似乎一下子好了大半。

在井岡山地區我們搜集到不少當年的紅軍歌謠，什麼「三灣降了北斗星，漫山遍野通透明。一九二七那一年，三灣來了毛司令」啦，什麼「朱毛會師在井岡，紅軍力量堅又強。不費紅軍三分力，打垮江西兩隻羊（指兩個姓楊的國民黨軍閥）」啦，什麼「紅米飯，南瓜湯，秋茄子，味道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啦。此外我們還在這兒搜集到一些輾轉傳抄的據說是未發表的「毛澤東詩詞」，但真偽難辨。比如下面這首七律「答友人」：

問君何日喜重逢，笑指沙場火正熊。  
庭院豈生千里馬，花盆難養萬年松。  
志存胸內躍紅日，樂在天涯戰惡風。  
似水柔情何足道，堂堂鐵打是英雄。

後來知道詩是一個叫陳明遠的年輕人寫的，為此據說還冒出個「偽造毛主席詩詞案」。

我們在井岡山的活動一直持續到十一月底，才踏上新的征程。有兩位《民族畫報》社的攝影記者，主動要求與我們同行，打算對我們這支長征隊作跟蹤報導。但同行幾天之後兩人又不知了去向，聽說是改變主意，跟蹤另一支清一色由革軍革幹子弟組成的長征隊去了。

隊伍在高山峻嶺中前進。我們唱起在井岡山學會的一首革命歌曲：

雄偉井岡山八一軍旗紅，開天闢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從無到有靠誰人？偉大的共產黨，偉大的毛澤東，偉大的毛澤東。

經過井岡山一段時間的修整，我們的精力異常的旺盛，又有了前一段時期行軍的磨煉，隊伍的行軍速度大大提高，有時一天之中要跋涉近百里路。我有田徑訓練的功底，行軍走路不是大問題，但也累得夠嗆。但更夠嗆的是我從小丟三拉四的壞毛病總是改不了，就像這天一早，緊急集合出發，朱海濱就在檢查房間時清出好幾個被遺漏的小物件：杯子呀、毛巾呀、水壺呀，其中就又有我的一份。當著隊員們的面被點名出列領「失物」，那滋味真是不大好受。我的綁腿也老是打不結實，常常走著走著就鬆垮了，只得在路上停下來重新打，很耽誤時間。長征中的困難和艱苦，我都在井岡山休整期間寫信告訴了母親，我希望從母親那裏得到教誨和幫助。我讓母親將回信寄到瑞金一個郵局，這是事先就聯繫好了的一個通訊地點。我真想一步就能跨到瑞金，同學們的心情似乎也都差不多，人人爭著趕路。

彎曲蜿蜒的盤山道走過一程又是一程，懸崖深澗，一一被我們踩在了腳下。所過之處，滿目蒼松翠柏，耳邊林濤怒吼，蒼勁沉鬱的羅霄山脈，激起我們萬丈的豪情。獵獵飄飛的長征隊紅旗，像一團火球，在崇山峻嶺中滾動。太陽攀上了山巔，溫暖的氣流在山谷中湧動，蒸騰的霧嵐浮動著金色的光茫，顫動於一片雀鳴禽噪之中。但我們無心欣賞這大自然的造化，只想早點趕到一處有人煙的地方。我們從清晨出發，馬不停蹄地整整走了已有七八個小時，下午都兩點了，還粒米未沾。許多人已經落後得很遠，我和幾位同學成了「尖兵」，遙遙領先走在隊伍的最前面。

忽然，從山凹的背面，慌慌張張閃出一個中年婦女來。她六神無主，毛焦火辣地用雙臂擋住我們的去路，語無倫次地大喊大叫。但土音太重，又像是急昏了頭，哇哩哇啦根本聽不出這位江西嫂子到底在說些什麼。

「慢點，等等！」我仔細辨認聲音，半天聽出了一個「火」字。  
「火？」我對江西嫂子大聲說。「火！火！火！」江西嫂子一聽就趕

忙應答，一邊雞啄米似的拼命點頭。不得了，森林地區一旦失火，意味著極其可怕的災難，特別是這種人跡罕至的地方。不容遲疑，我們幾個人馬上卸下背包，朝山的背面飛奔。

不知轉了幾個彎子，也不知繞過了幾個山坡，跑了多遠，什麼都沒有發現。我們停下腳步，四處張望，必須當機立斷，火到底在哪裏？

「那邊好像有煙。」我指了指一個方向，大家趕緊朝那方向奔跑。繞過一個山坡，只見一棟新蓋的茅房，正在騰起沖天大火，幾位婦女坐在房子旁邊的石頭上，抱著小孩痛哭流涕。

火呀火，你這個凶神，我們要制服你！我們向著火屋衝上去。我們冒著滾滾的濃煙一頭扎進茅屋，搬搶屋內一切可能搶出來的東西。屋裏煙霧瀰漫，熏得人睜不開眼透不過氣，我們摸索著抱起一些家什被褥跑出屋來。回頭一看不好了，火已從後屋竄上了山林，國家和人民的大片綠色寶藏，將被這火魔吞噬。必須迅速撲滅山火，這火光就是命令呀！這時大隊的同學已經全部趕到了火場，我們拼命向著著火的山上爬去。但是火苗比我們跑得快呀，呼啦呼啦一陣響聲，大火摧枯拉朽一下子又將山林燒去了一大片。

我們的人太少，又缺少工具，單靠我們這幾十人是撲不滅這場大火的，得喊公社的社員來。隊長命我和馮天艾下山求援，我們急忙下山，一出山凹便見兩匹狗迎面而來，後面是急急的腳步聲，大批的山民已經聞訊趕來。後來知道，後面的同學一聽見有火情，就已派了一位同學跑往公社求援。這位同學跑到半路上，遇見一位騎自行車的老表，不容分說，奪過自行車，跨上就直奔公社。聽說發生了火情，公社當即組織了四輛卡車的壯勞力，帶上救火工具飛駛火場。我們帶著援兵向山裏跑，跑過一道水溝時，我就勢在溝裏滾了一把，讓全身浸個透濕，好上山與火魔搏鬥。大火仍在山林中燃燒，我們向山上拼命地爬，用手中的樹枝、襯衣使勁撲火。有時風向突然一變，火焰撲面而來，我們又得避開火頭趕緊轉移方向否則就會陷入火海。我們和大火搏鬥了一個多小時，畢竟人多勢大，山火終於在我們面前低下了氣焰囂張的魔頭。但是餘火未盡，樹樁草叢下已熄滅的死火忽然又會冒出火苗，於是再打，不讓任何一個地方死灰復燃。突然山下早已撲滅

了火的地方又熊熊燃燒起來，我們都已爬到半山腰了，一急，也顧不得滿山的野刺，就坐在地上往下滑，手掌都掛出血來。

……火，終於撲滅了。我們一個個都變成了戲曲裏面的「黑臉」，身上的毛衣，頭上的軍帽都被火苗燒得百孔千瘡，有的同學連眉毛都給火燒焦了。再回頭看看火場，那剛剛撲滅的大火真是厲害呀，煙霧彌漫，熱浪逼人，人在火的面前就像是貼著一個無形的火爐。我們身臨其境地體會到了32111英雄鑽井隊血戰火海(文革初期，四川某油田的一支編號32111的鑽井隊，在撲滅一場因井噴引起的大火的行動中表現英勇，以六死二十一傷的代價，制服了井噴，保住了油井。該鑽井隊因此被石油部授予「英雄鑽井隊」的稱號)，是多麼英勇壯烈可歌可泣，與他們相比，我們真是算不了什麼。

事後得知，這場火災是遂川大坑公社的貧農社員余畢玉家裏人，因用火不慎而引起。他們家的房屋和財產，差不多都付之一炬，而屋後面的山林因搶救及時，避免了大面積的山火蔓延，將損失減少到了最大限度。

在大坑公社所在地歇息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天一亮，我們便出發前往遂川縣城。臨行前，大坑公社社員們敲鑼打鼓送來一面錦旗，上題：

送給32111式的  
華中工學院新紅軍長征隊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大坑公社

我們接過錦旗，與貧下中農依依握別，社員們將我們送出老遠。

又是整整一天的急行軍，我們到達了遂川。

前頭的兩名「尖兵」傳回來消息，說是遂川縣城內，已到處貼滿了向新華工新紅軍長征隊學習、致敬等歡迎標語。我們沒有料到縣裏早有準備，既感到意外又感到興奮。隊伍進城，街道兩邊夾道歡迎的人群，早已在等候我們，我們唱著「紅軍不怕遠征難」的歌曲走向招待所。剛一住下，遂川縣縣長便登門看望我們，與我們一一握手，親切問候。縣長又邀請我們晚上參加縣委舉辦的毛澤東思想宣傳演出大

會。晚會後縣領導又留我們在遂川再呆上一天，但是按計劃我們是不能逗留過久的，還得加緊趕路。次日黎明，軍號聲響，我們又登上征程。招待所的兩位工作人員見我們要走，慌忙極力阻攔，說是按縣委指示，一定要我們留下一天。我們堅持要走，拔腿就跑，兩人攔也攔不住，只好拉住我們的隊長和政委，找縣委有個交待。

隊長朱海濱和政委黃湘蘭直到晚上才趕到我們的宿營地。他們告訴大家，原來縣領導準備與我們長征隊全體隊員合個影，中午再一起會個餐，晚上還要和大家一起觀看縣文工團緊急排練出來的歌舞「血戰火海」。但我們執意要走，他們留也留不住，一再表示深感遺憾。我們每人得到縣委的一份慰問信，全隊得到一本縣委贈予的《毛澤東選集》精裝合訂本，書的扉頁題有幾個字：

為人民，闖火海

我們逐個地傳看這本當時十分罕見的毛選精裝合訂本，大家撫摸著紅色的軟塑書皮，都愛不釋手。

也許是遂川人民對我們的高度的評價鼓舞了我們，也許是挾大坑救火之餘威，我們這一日連續行軍走了整整一百零八里，創長征以來日行程里數之最。但腳又酸又痛也是真的，腳板又打了泡子，走起路來像針在錐。我們咬緊牙關堅持走下去，等走到宿營地時，人就像癱了似的倒下就不想動。但是不行，還得挑腳板上的泡，用熱水燙腳，然後捂在被子裏學毛著，記日記，讀著寫著，人就酣然入睡了。

就這樣行進了幾日，我們到達了贛江附近，這是我們告別湘江之後，遇到的第一條大江，只見平靜的江水在我們面前緩緩地流過。因為是冬季，流量並不大，據當地人說河床也很淺，但過河仍靠木船擺渡，我們就在渡口等船過來。但有幾位水性好的同學等不及了，躍躍欲試想冬泳過江。隊長不同意，天寒水冷，情況不明，怕出危險。那幾個同學興致上來了，哪還顧得許多，三下兩下脫掉衣服，穿著件褲衩就要往水裏撲。同學們趕緊弄了瓶燒酒，讓幾位好漢各喝上幾口使身體發熱。這幾位同學灌了幾口酒後，就跳到水中游了起來。這時船已擺岸，我們紛紛上船，大家站在行駛的船上，爭相為水中的游泳健兒吶喊助威。

水中這幾個同學，都是參加過橫渡長江游泳比賽的，大風大浪都見過，水性自然不成問題，渡此區區贛江可以說是如履平地。只見他們在水中上下沉浮，怡然自得，真是羨煞了我這樣的旱鴨子。突然，游在最前面的一位在水中陡然立起，原來水已淺過膝頭，無法再割水了，只好一個旱地拔蔥站起來，慢慢地趟過去。其他幾位也先後站了起來，我們於是都朝他們使勁地鼓掌喝彩。

上岸後，幾位「浪裏白條」披上衣服，嘴唇都凍烏了。我問其中一人冷不冷？回答是水裏面並不覺得冷，但站起來趟水時，身上冷得發抖，只怪水太淺了。這幾位冬泳渡江的同學，一時間自然成了我們中間的英雄，他們中就有馮天艾一個，沒想到這位「美髯公」竟有這麼好的水性。

渡過贛江之後隊伍到達于都。于都是當年中央工農紅軍開始長征的地方，出于都北門，有條寬大湍急的河流，河水滾滾嗚咽流過，彷彿在吹奏當年紅軍從這裏出征的號角。一輪太陽正在下沉，蕭瑟的寒風之中，遙想當年紅軍告別蘇區踏上長征征途的情景，該是何等的悲壯：紅旗獵獵，戰馬嘶鳴，于都河畔，紅軍的隊伍前不見頭後不見尾，大路兩邊是依依不捨的送別群眾……正像一首歌中唱的：一送哩格紅軍下了山，秋風哩格細雨纏綿綿。山上哩格野鹿聲聲號，樹樹哩格梧桐葉落光。問一聲親人紅軍啊，幾時哩格人馬再回山？我們佇立於于都河畔，一種歷史的滄桑感襲上心頭，同時又有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我們來了，我們新紅軍長征隊不正是當年紅軍的繼承者嗎？我們正在繼承紅軍的革命傳統，踏著革命前輩的足跡前進。

這一天正是十二月九日，是「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三十一周年紀念日。深夜，躺在一間茅草屋的草堆上，數破漏的屋頂上稀疏可見的星星。回想起一年前進大學後不久，參加系裏主辦的那次紀念「一二九運動」三十周年活動的情形。那天晚上滿操場沸騰的人群、燃燒的火把、高昂的歌聲……一幕幕浮現在眼前。誰會想到不久就有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有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而今又踏上了當年紅軍長征的路途，這一切在一年前還是根本不可能想像的。看來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是註定要經受革命鬥爭考驗的一代人。任重而道遠，我們

要努力向前。冥想中倦意襲來，迷迷糊糊中白天學會的一首紅軍歌曲猶在耳畔：戰士們高舉著鮮紅的旗幟奮勇向前進，配合那全國紅軍要實行總的反攻。創造新的革命根據地，大家要努力……努力……，漸漸便沉入夢鄉之中。

正酣睡時突然被一陣尖銳的哨聲驚醒，隊長在喊「緊急集合！」忙翻身下床穿衣疊被打綁腿，一看錶才凌晨三點。隊長作出發前的動員說，「這裏距瑞金僅一百八十里路程，今天提前出發，爭取擦黑時到達瑞金，在瑞金將休整三天。」於是立即開拔。夜空無月，稀星可數，漆黑一片伸手難見五指。田埂的小路很窄、很難走，於是都將電筒打亮照路。走著走著回頭一看，一隻隻手電筒的亮光，像夜明珠一樣連成了串。燈光倒映在田埂兩旁的水田裏，上下輝映，波光漣漪，真是美妙壯觀極了，大家不禁都興奮得「哦，哦」地叫起來。

天大亮時已趕了三十里路，在一個接待站吃了早飯後又上路。走不多久又是一座大山，翻過這座山時已經是下午四點，破天荒一連走了一百幾十里路，實在是再也走不動了，於是在山腳下一個臨時接待站宿營。接待站設在一座破舊的古廟裏，聽接待人員說，此處離瑞金尚有五十里路。有幾位男同學一聽又興奮起來，要連夜趕到瑞金。隊長不同意，但這幾位同學哪裏聽得進，稍事休整，補充了水和乾糧便急急出發。有兩位女同學巾幘不讓鬚眉，也加入了這個「先遣隊」。我心嚮往之而力不足，只好和大隊明天再走。

夜已深了，我躺在古廟的草堆上，久久不能入睡。山脚下寒氣逼人，墊的蓋的被子都嫌薄了，難以禦寒，只得把身子蜷成一團以求保暖。寂靜的夜晚裏，耳邊總能聽到一些不可捉摸的聲響從大山裏傳來，我忽然想到了初中語文課本中《老山界》那篇課文中描述過的那種聲響：「極遠的又是極近的，極洪大的又是極細切的，像春蠶在咀嚼桑葉，像野馬在平原上奔馳，像山泉在鳴咽，像波濤在澎湃。」描寫得真是太逼真、太傳神了。《老山界》這篇文章，是寫紅軍長征翻越城嶺時的一段經歷，作者原中宣部部長陸定一，是文革初就被打成閻王殿的閻王，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陸定一究竟是不是「閻王」，是不是「三反分子」，我也不清楚，但他的《老山界》確實寫得不錯，而且是長征時寫的，不能因人廢言。想著想著，反正凍得

睡不著，索性坐起身來披上衣服，借手電筒的亮光，把《老山界》中的這段話寫到日記上，管他作者有沒有問題。

第二天趕早起床，急行軍半天，於下午一點到達瑞金。「先遣隊」的幾位同學，還橫七豎八地躺在接待站的草鋪上呼呼睡大覺。昨天連夜趕路，一天一夜行軍一百八十里，把他們累得夠嗆。兩位女將聽說半路上就歪在地上爬都爬不動了，找個人家歇了大半夜，才踉踉蹌蹌地走到了瑞金。人雖累慘了，但那頑強堅毅的精神，著實可圈可點。

在接待站住下不久，隊長朱海濱從郵局取來了許多家信，分發給同學。其中有四封信是我母親寫給我的，母親在信中鼓勵我「活學活用老三篇改造人生觀，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光明。」告誡我「只准前進，不准後退，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離開武漢一個多月了，頭一次收到母親的信，倍感親切倍受鼓舞，一股暖流在心中蕩漾。當母親的誰不心疼自己的兒女，但我的母親從不對我嬌生慣養，總是鼓勵我在艱苦的環境中磨煉自己。於是想到在井岡山抄錄的兩句詩：「庭院豈生千里馬，花盆難養萬年松」，像我們這些在溫室裏長大的一代人，若非經過艱苦的磨練，很難擔當起繼承革命事業的重任。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多吃點苦算不了什麼，就是要自找苦吃。這次長征，對我是一次極大的鍛煉，我相信今後一生都將從中受益無窮。所謂「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長征的路都走過了，還有什麼路不能走？

瑞金作為當年革命根據地的「紅都」，大串聯中也是個熱點，來這裏參觀訪問的紅衛兵多，各種消息也多。我們就聽說打我們離開井岡山後，井岡山尤其是茨坪那塊彈丸之地，日漸人滿為患。數十萬紅衛兵擠在那芝麻大的地盤裏，吃住都成了大問題。前些日子一場大雪突降，寒風凜冽，冰雪封山，糧食衣褲皆運不進來。滯留在山中的紅衛兵們，產生了饑寒交迫的大恐慌。不少學生得了感冒，接著又發生了急性腦膜炎，部隊只得動直升飛機空投糧食、衣物和藥品，但還是死了一些人。我們就想到在井岡山時，有位老表就勸過我們入冬了最好早點離開茨坪，不然遇見大雪封山就有麻煩，想不到還真的出了事。但沒能親歷那種困境中的磨難，卻又未免是一種遺憾。

在瑞金我們一連幾天先後參觀了葉坪、沙洲壩等地的革命遺址。沙洲壩那口有名的「紅井」，特別引起了我們的興趣。這口井據說是毛

主席到沙洲壩後才提議挖掘的，而此前沙洲壩人從未想到過挖井，只是從塘裏挑髒水喝。所以井邊還立有一石碑，上刻「吃水不忘挖井人，時刻想念毛主席」幾個大字。我們站在井邊，都爭相從井裏打水上來喝上一口，井水涼津津的沁人肺腑，真是應當「吃水不忘挖井人。」但是又一想，中國農村許多地方的農民，祖祖輩輩都是靠打井解決人畜飲水和澆地灌溉的問題，怎麼偏偏這個沙洲壩的老百姓就從不知道打井取水，而要等待「大救星」來指導，才有了開天闢地第一口井呢？的確不太明白。

在瑞金參觀訪問，休整了三四天，該是繼續上路的時候。但是從南昌傳來了十萬火急的消息，說是江西省委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繼續挑動工人鬥學生，雙方均有人在武鬥中喪生，事態極為嚴重。又說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的戰士，正在與當地紅衛兵共同戰鬥，而南昌的保守組織工人赤衛隊、八一戰鬥團則直接充當了鎮壓學生運動的打手。聞此消息，一部分同學提出，應立即馳援南昌正在和「反動路線」浴血奮戰的紅衛兵戰友。但以隊長朱海濱為首的少數人，堅持繼續長征，以在明年國慶之前趕到北京。兩種意見爭執得異常激烈，最後「馳援南昌」的一派佔了上鋒。於是決定先去南昌，待南昌局勢明朗後，再作長征的計畫，至於能不能在國慶之前到達北京並不重要。

主意既已拿定，遂立即出發，先奔贛州，從贛州連夜乘車，於第二天上午即達南昌。然而南昌城內一次大型武鬥正告結束，我們趕上的只是一片武鬥後的狼藉，只好面對南昌城，感歎「當年鏖戰激，彈洞前村壁」。於是決定先找一個地方駐下，然後觀察局勢的變化再作定奪。有同學打聽到江西棉紡織印染廠就在南昌市郊，我們決定進駐江紡，一邊和工人們一起勞動，一邊參預工廠的文革運動，作為一種社會實踐。幾經交涉，江紡終於同意我們進駐。我當晚在江紡的宿舍裏，寫下如下一段日記：我們千方百計進駐了江紡，我們這是響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號召，走與工人群眾相結合的道路。不知為什麼，長征中的日記至此戛然中斷。

由於日記中斷，有關我們這支長征隊在江紡是如何支持廠內的少數造反派與「走資派」和保守派鬥爭，並幫助他們從弱轉強的情況，沒

能留下任何可供回憶的記錄。現在能記得的，只是我當時是被分配在輕紡車間做擺梭工，帶我的師父是一位中年的女工，屬保守派組織，但對我非常照顧。我們這個工種是三班倒，每隔一星期就要輪一次夜班，就是凌晨一點到早上八點。正值寒冬臘月，室外大雪紛飛，朔風刺骨，在宿舍暖和和地睡得正甜時，卻被喊醒要上班了，半天都捨不得從被子裏鑽出來。而做到清晨四五點鐘時，人就撐不住了，眼皮子直打架，這時候師父就會叫我到旁邊打個小盹，由她兼顧我那一份擺梭的「生活」。「生活」真的是不容易做，但夜班工人也有個好處，就是到深夜兩點時有一餐夜宵，發了餐票由我們自己到車間食堂去買，什麼粉蒸肉哇、青椒炒肉絲哇、三鮮麵哇、醬肉包子哇應有盡有，真是大飽口福。但師父們好像都是檢便宜的吃一點，省下餐票平時貼補家用。在江紡差不多有一個月的時間，不管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工人們和我們的關係都處得不錯，而工人師父的勤勞、儉樸、厚道與良善，也給我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給我留下很深刻印象的還有南昌市郊的農民。有一天工休時我和一位同學結伴進城，在路過江西醫學院時，正好目睹了一次農民進城造反的「壯舉」。那一次成千上萬被省裏的當權派雇佣的「貧下中農」，十人一排，手挽著手，肩並著肩，鼓著血紅的眼珠，喊著血腥的口號，以海嘯一般的聲勢，衝進江西醫學院這個造反派學生的「老巢」進行「革命」。

這些「貧下中農」們迅速跑進大學校園裏革誰的命呢？他們揮動手中的鋤頭和扁擔，不分青紅皂白，向他們所碰到的所有來不及逃跑的「右派師生」猛殺猛砍。我和同學因是外地串連學生，得以溜進了江西醫學院院內，親眼見到那些農民是如何用鋤頭和扁擔追打手無寸鐵的老師和學生。校園裏到處是血，貧下中農們真正是殺出了個「紅彤彤的新世界」。然後農民們從頭破血流的「右派師生」身上，搜查鋼筆和手錶，一切值點錢的東西乃至腳上的皮鞋均成為農民們的「勝利果實」。膽子大的農民並且闖進教學樓和實驗室，將一切貴重物品如相機掛鐘之類洗劫一空，而將那些不便劫去的教學儀器和書籍，盡數撕毀砸爛。

說實在話，那一天我所目睹的這一切，讓我真正瞠目結舌了一回。難道這就是主席筆下盛讚過的那種在大革命年代建立過豐功偉業

的「革命先鋒」、「革命元勳」的革命子孫麼？「革命先鋒」們怎麼竟繁衍出這樣一些阿Q式的野蠻殘暴的群氓來？

我們在江西棉紡廠呆了近一個月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裏，上海發生了轟動全國的「一月奪權」事件。許多同學陸續接到學校裏同學的來信，說是運動將進入像上海那樣的「奪權」階段，急需同學們回校參加「奪權鬥爭」。而中央也正有指示傳下來，要求全國各地的大串聯一律暫停，統統回原學校參加本校的文化大革命，於是我們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也就命中註定要半途而廢了。

這當中最沮喪的，大概是我們長征隊的隊長朱海濱同學，他終於不能圓那個上天安門城樓的夢。但是大部分隊員都歡喜雀躍，準備「殺」回學校大幹一場。我倒是對「奪權鬥爭」無所謂，那不是我這種「狗崽子」考慮的事。不能走完長征的全程，親歷一回橫渡金沙江、大渡河，翻雪山、過草地，倒是一件憾事。不過無論如何，長征這一段經歷，給我留下的美好的記憶還是太多了，走過的許多地方，都刻骨銘心永生難忘。以至於在後來那極端痛苦和孤寂的漫長歲月裏，井岡山綺麗而雄偉的山川林海，曾無數次進入我的夢境，那是自由之神給予我的心靈的慰藉。

啊，我兩千里迢迢長征路。

啊，我五百里巍巍井岡山。

## 第七章

# 一九六七年春夏

我們長征隊從南昌趕回武漢後，隊伍便自行解散。我回到班上，同學們對我都很友好，無論是「紅司」還是「紅三司」的，都不但不再歧視我，而且主動地邀請我參加他們的組織。「血統論」早已受到嚴厲的批判，沒有人再信奉什麼「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或者「龍生龍、鳳生鳳」的謬論了。教務處的那個「八一戰鬥隊」和動力系的那個「中南海紅衛兵」已經名譽掃地，他們不得不公開承認，指我的父母為「汪偽國民黨漢奸」，純屬捕風捉影的誣陷。兩個組織的前負責人還上我家，當面向我的父母賠禮道歉，我的母親毫不留情地狠狠訓斥了教務處的幾個老爺一頓，但也並沒有過多地與他們為難。但是這幾位老爺在教務處的日子就沒有那麼好過了，他們被造反派的同事們勒令不停地作檢查，交待其忠實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殘酷迫害革命小將」的錯誤——我那時不但被稱作「革命小將」，而且被稱作「革命闖將」了。

我被邀請參加了一次教務處造反派召開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會議，會上見到了教務處那幾個曾不惜顛倒黑白，混淆是非，指鹿為馬，造謠惑眾，必欲置我於死地的老爺，同時還見識了在這幾位老爺的指令下，連篇累牘炮製出洋洋數萬言的文章，對我和我的父母瘋狂咒罵、惡毒中傷的那位刀筆吏的尊容：戴一付寬邊的玳瑁眼鏡，溫文爾雅的模樣，很「正人君子」的。而就是這位歇斯底里地大罵我「汪偽漢奸的孝子賢孫」、「狗崽子」乃至「烏龜王八蛋」而自稱為「苦大仇深的工農革幹子弟、毛澤東思想哺育長大的青年」，原來自己就是出身地主

家庭，真不知他那些字眼是如何罵得出口。但他也自有難言的苦衷，「出身不由自己，道路可以選擇」，他於是選擇了昧著良心為虎作倀，給「根紅苗正」的老爺們作炮筒的道路。我覺得這種人既可恨，又可憐。

但可憐的自然也不只是這一位。在學校的造反派紅衛兵主持的一次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上，我見到了久違的張體學省長。他很服帖地低垂著頭，脖子上掛著一塊很大的牌子，可憐兮兮地接受紅衛兵的批鬥。紅色造反團的頭頭聶年生，已經是新華工紅色造反司令部的副司令，他負責將張體學妥善地押進會場，在批鬥之後，又很小心地將張轉移出學校。他命令他的部下保護好這位被說成是「黑幫頭子」的代理省委第一書記，使其免受皮肉之苦，據說他因此舉而與這位省裏的大人物，建立了很默契的私人友誼。

後來我從王永紅那裏得知，老聶對張體學是有意進行保護的。他私下認為，張體學本質是好的，在領導幹部中，算得上是不可多得的好幹部，所以要保。老聶還認為，學生們別看一時鬧得凶，最後還是要服從畢業分配，離開學校的，領導權最終還是要掌握在那批老幹部手中。所以對張體學這種能替老百姓做點實事的老幹部，不能一棍子打死，要盡量保護他們順利過關。

老聶當時的這種想法，屬於「紅反團」的核心機密，只有極少數幾個「心腹」知曉。須知這些想法倘不慎洩露了出去，老聶是要被造反派的戰友們以「叛徒」、「內奸」看待的。

看來老聶的政治眼光的確比我們一般人要長遠。

在另一次更大規模的批鬥會上，我第一次見到了前湖北省委書記，文革中曾一度被提升為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的王任重。這位據說頗受主席賞識的「才子」，戴著一頂寫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幾個字的高帽子，佝僂著腰，被兩名紅衛兵反剪著胳膊「坐飛機」，全沒有了昔日省委第一書記或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威風。王任重如何修正主義、如何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實在不甚了然，我對他的印象，其實是緣於大字報披露的那首據說是出自王的筆下的「謗詩」，即「韶山風光依舊，人世幾經滄桑……」那首詩。那時毛主席在我們心目中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我從來都沒有想像過像王任重這樣為主席所器重的

近臣，竟會對主席如此諷嘲。偉大領袖回到闔別三十二年的故土，「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體現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偉大情懷，怎麼能和舊時代的帝王將相的「衣錦還鄉」相提並論呢？王任重真是用意惡毒。但這位當省委書記的也真是個人物，佛爺頭上敢點屎，在我看來膽量是遠在吳晗鄧拓廖沫沙之上的，我對這位王任重私下就有了幾分刮目相看。

在學校露天電影場裏召開的一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上，我被學校造反派紅衛兵「紅司新華工」的頭頭邀請上臺，用自己的親身經歷，揭露控訴「反動路線」對我的殘酷迫害。控訴到激動處，我熱淚盈眶，高呼「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和「毛主席萬歲！萬歲！萬歲！」的口號。下面的同學們也都激動地和我一起喊口號。有人還帶領大家高喊「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覺毛主席親！」氣氛熱烈得不得了。就在這個「誓師大會」後，我被吸收進「紅司新華工」，成為新華工「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中的一員。不久，「紅司」司令部調我到「新華工報編輯部」當編輯，為《新華工報》撰寫文章。

在王任重、張體學這些黨政一把手二把手相繼被拖上臺批鬥後，便刮起了後來被稱作「一月革命」※13的「奪權」風暴。省市的廣播電臺、電視臺和各級黨報已相繼落到了造反派手裏。元月十九日，武漢地區四十一個造反派組織，聯合在「新生的」的《湖北日報》上，發表了題為「一切權力歸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告全省人民書」，鼓吹向走資派「奪權」，「建立無產階級自己的權力機構」。那時各個群眾組織如雨後的蘑菇一樣冒了出來，大家都狂熱地希望在這個體現了權力和財產再分配的「奪權」鬥爭中分一杯羹。在這些組織中，勢力最為強盛的，有「工人戰鬥隊總部」、「工人造反總司令部」和「武綱九一三戰鬥隊」等產業工人的組織和「二司」(即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總司令部)、「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等學生組織，在這些造反派的群眾組織之間，不久就將圍繞權力的分配問題，展開一場「兄弟鬭於牆」的爭鬥。

在報紙上，我們現在經常能夠看到朱鴻霞、胡厚民、吳焱金和李湘玉這些工人運動的「領袖」的名字，他們已經是武漢地區政治舞臺上炙手可熱的人物。這些政治明星，文革前似乎都不屬於一帆風順的那類人，有的甚至曾被單位領導打入「另冊」，文革的發生，自然是給這

些「懷才不遇」者提供了一次翻身的絕好機會。所有曾經在單位和社會上飽受壓制的遭受歧視的「落後群眾」，當然都爭先恐後別無選擇地投到了這些「工人領袖」的隊伍之中。保守派攻擊造反派的組織是「牛鬼蛇神」的庇護所，恐怕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然而「壓迫愈深、反抗愈烈」卻也的確是一個客觀的規律，而當這種反抗是以「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名義進行時，那麼無論這支造反的隊伍，是怎樣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它都必然是所向披靡的。

的確只能用「所向披靡」或「勢如破竹」來形容造反派組織的突飛猛進。曾經號稱擁有40萬之眾，企圖與造反派分庭抗禮的一個叫「革命職工聯合會」的保守派組織，在造反浪潮的衝擊下，早已奄奄一息而終至土崩瓦解。大中學校中那個以「紅五類」為核心的早期「紅衛兵」組織，也已經是秋後的螞蚱蹦不起來了，靠造反起家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乾脆稱其為「三字兵」，何其輕蔑乃爾，而「三字兵」們也只能忍氣吞聲。到一月中旬，在各個大中學校和各大廠礦，已基本上見不到保守派組織的影子，造反派說這叫「風景這邊獨好」。

在上海「一月奪權」的鼓舞下，武漢地區的造反派組織的頭頭們聚集在一起，策劃武漢奪權的具體措施。「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我們學校新華工紅司司令部的「勤務員」們，坐著小車頻頻進城，回來，又進城，一個個忙得不亦樂乎。聽說各個組織已經達成協定，將發表一封「致全市人民的公開信」，但很快又聽說協議破裂了，「公開信」也始終未見公開。不過聽說各方仍在尋求妥協，終於在無數次的爭執和談判之後，決定奪權將於二十六日下午三點舉行。於是學校組織全體師生集會，準備大張旗鼓慶祝一番。然而「權力交接」僅五個小時不到，工總、二司和九一三那一派便宣佈奪權無效，由於利益分配不均的原因，「奪權」流產。

在各派組織的「勤務員」(這是那些司令、常委們給自己取的一個謙卑的名字——因為據說馬克思說過，各級官吏在新的民主政權形式裏，應是人民的公僕而不是人民的老爺)在為權力分配而鬧得不可開交時，我作為紅司新華工的一名普通的紅衛兵戰士，正坐在《新華工報》編輯部裏，履行一名編輯的職責。我遵照總編的旨意，寫一點符合勤務員們意圖的評論。至於勤務員們在權力的問題上，是如何蠅營狗

苟，如何勾心鬥角，我是不大清楚也不想去弄清楚的。我只是覺得我不太習慣按照頭頭們的意志，去寫那種小心翼翼的「遵命文章」，我喜歡按照自己的思路，去為革命「吶喊」。

但，如魯迅先生所說，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只是我那時以為須聽的應是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將令，學校裏的那幾個勤務員，雖然「司令」、「副司令」的叫得響噠噠的，但在我的眼裏，似乎還「將」不起來。這些「司令」、「副司令」們照例是「外戰外行，內戰內行」，在權力的分配問題上，堅持「祖國的好山河寸土不讓」，並且從互不相讓發展為公開的分裂。二月八日，工總、二司和另外10個組織，在《長江日報》上發表了一個聲明，攻擊工造、新華工和新湖大等是「托派」、「分裂主義組織」和「湖北黑省委的第五縱隊」。這個「二八聲明」引發了造反派內部一場空前的大論戰或者說是大混戰。

工造和新華工新湖大等一派，指責這個聲明是製造分裂的一株大毒草，而工總二司這一派則稱它是一朵「香花」。「毒草派」和「香花派」的辯論，深入到了每一個組織、每一個組織的基層、每一個基層的成員之中，從早到晚，大街小巷都擠滿了辯論的人群。我們學校則派出不計其數的兩三人一組的「辯論小分隊」，走上街頭與「香花派」辯論。這些小分隊的人手裏舉著大書「辯論」二字的小木牌，在人群裏像作布朗運動似的轉來轉去尋找對手。如果尋找到的對手是一名屬於「二司」的大學生，那就會爆發一場激烈的爭辯；但如果對手是一名普通的群眾呢，那恐怕就只能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因為「香花派」的一般群眾，多數連「二八聲明」的內容究竟是什麼，都未必清楚。他們之所以堅持「香花派」的觀點，僅僅是因為他們的頭頭說這個聲明「好得很」。他們很賣力地在每一堵牆上刷上「二八聲明就是好」的標語，而「毒草派」就緊跟其後，在「就是好」的後面添上兩個字，使它變成「好個屁」，這使人想到了南京的「好派」和「屁派」。

然而，造反派的自相殘殺，實際上是給保守派的捲土重來創造機會。正像《紅樓夢》裏面探春說的：必須先從家裏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塗地呢！對造反派的無法無天早已忍無可忍的武漢軍區，於二月十八日發表「嚴正聲明」，對「二八聲明」進行了嚴厲的譴責，軍隊隨即在市區內進行了武裝遊行，以對造反派顯示自己強大的力量。由於軍

區的表態，「二八聲明」的擁護者很快就失去了對反對派的優勢。接著傳來更糟的消息，說是中央文革都已表態，指責「二八聲明」是毒草，原來還企圖負隅頑抗的「香花派」，頓時偃旗息鼓。

工總的勤務員們開始前往武漢軍區司令部，承認錯誤請求寬恕。二司的學生們則成群接隊地舉著標語牌在街上亂轉，不過標語牌上書寫的不再是「辯論」二字而是「有錯就改」、「重新革命」之類的話語。「香花派」一時惶惶然如喪家之犬。武漢軍區抓住戰機乘勝追擊，除了在報紙和電臺上繼續接連發表文章，猛烈抨擊「二八聲明」外，還派遣軍隊接管了刊登過聲明的《長江日報》，拔掉了工總及其他造反派在市區交通幹線上所有的據點，如紅旗大樓、井岡山大樓、武昌紅樓、中南旅社和民眾樂園等。同時，通過對長途電信局的軍管，切斷了造反派和外地的聯繫。

三月十七日深夜，工總區一級分部以上的頭目近500人全部被捕。幾天後，工總被宣佈為反革命組織，並被命令立即解散。二司被譴責犯了嚴重的錯誤，其普通成員被要求站出來揪出內部的「暗藏的階級敵人」和「壞頭頭」。所有這些嚴厲的措施，開始時都是針對「二八聲明」及其擁護者即「香花派」的。「奪權」對手的逐步被消滅，使得「二八聲明」的反對派歡欣鼓舞，但是「毒草派」很快就發現，火已經向自己燒了過來。「新華工」等「毒草派」的頭頭們，被指控與原工總的壞頭頭們有過勾結而受到公開的批判，而保守派在軍區的支持下，利用批判「二八聲明」正在東山再起，氣焰日熾。武漢軍區支左辦公室的一個負責人甚至說，這次運動就是要整你們這些牛鬼蛇神。你們現在表演夠了，該我們表演了。如果你們不老老實實，就殺你們的頭肥田，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現在是專你們政的時候了！

作為「紅司(新華工)」的一員，我對「二八聲明」也是持否定態度的，而站在造反派的立場上，我感到對「二八聲明」的批判，已經超出了批判的範圍，演變為了對造反派的全面否定。從軍區領導人那些殺氣騰騰的話中，我感覺出對造反派的一次大規模的鎮壓已經開始了，於是我又想到了「十六條」，「十六條」上說：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我想站出來為造反派吶喊。這時正好從北京傳來了「主將」的聲

音，說黨內有一股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逆流」，接著又傳來消息，說北京已經揪出了搞復辟的頭面人物譚震林。但都是一些「小道消息」，形勢並不明朗，頭頭們都像驚弓之鳥，唯恐步工總頭頭的後塵。而我在《新華工報》編輯部裏，也處處受到頭頭的鉗制，不准許按照自己的想法發表文章。李白詩云：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我於是離開了編輯部。

三月十七日武漢軍區對工總領導成員的大逮捕強烈震撼了我，當塞滿了「犯人」的軍車的警笛聲呼嘯在江城的夜空之時，我開始奮筆疾書。第二天是法國巴黎公社起義96周年紀念日，我的一篇《論巴黎公社的啟示》的大字報，貼到了華工園內最醒目的地方，這是我在沉寂了半年之後重新拿起筆，以自己的名字發表的第一張大字報。

在這篇文章中，我熱烈地謳歌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以及巴黎公社革命中人民群眾的革命首創精神。然後我將文化大革命與巴黎公社革命作了機械的類比，對於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群眾的過激的行動，我借用了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的一句話：「它是正在誕生的新社會對正在崩潰的舊社會所進行的規模巨大的鬥爭中不可避免和比較不關緊要的事情」，我說如果借此而否定他們，甚至鎮壓他們，就會滑到文化大革命的對立面，成為歷史的罪人。

這張大字報發表在工總頭頭大遭逮捕之時，立即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接著我又發表了一篇題為《論二司的功與過》的大字報，為當時因「二八聲明」而被壓得灰溜溜的二司辯護，力陳二司在文化大革命兩條路線的鬥爭中「功」大於「過」，其負責人也絕不是「暗藏的階級敵人」和「壞頭頭」。他們的錯誤只是前進中的錯誤，其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我的文章自然受到二司紅衛兵的熱烈歡迎，他們將我的大字報傳抄、貼滿了各個大中學校的校園。

我這條早就想「叫」的「鬥狗」，終於又開始叫起來。

我素有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再次發作。

我寫文章是從不知道顧忌的，贊成什麼、反對什麼，只看有無道理，別的很少考慮。太歲頭上也敢動土，自然免不了惹禍上身。比方當時有份題為《天津延安中學以教學班為基礎實現全校大聯合和整頓鞏固發展紅衛兵的體會》的材料，是毛主席肯定了的。毛還就這份材料作

過批示，指出「軍隊應分期分批對大學、中學和小學高年級實行軍訓，並且參與關於開學、整頓組織、建立三結合領導機關和實行鬥、批、改的工作」。三月八日，中共中央轉發了毛主席的這個「三七指示」以及天津延安中學的材料，要求各地參照執行。對於毛主席關於軍隊對學生實行軍訓的指示，我自然不會去說三道四，但是這份「體會」稱延安中學學生通過學習毛主席著作，在軍訓團的幫助下，僅用一天時間，就實現了以教學班為基礎的全校大聯合，我則表示懷疑。理由是顯然的，一年來由於政見不同而導致的思想分歧、精神隔膜和相互仇視的情緒，絕不是「通過學習毛主席著作」，就能在短短一兩天裏消弭得了的，「大聯合」從何談起？基於這一認識，我斷定此「體會」是一份虛假的材料。我認為有人炮製了假材料欺騙偉大領袖，偏激地將這篇材料上綱為「一株抽掉兩條路線鬥爭實質的大毒草」，並斷言這種形式上的匆匆忙忙的大聯合只能是短命的，「一個星期也維持不了」。我很激動，決定把自己的看法寫成文章公諸於眾。

聶年生的「紅反團」有位叫程林的同學，是無線電系的，和我時有來往。他得知我的想法後，力勸我要慎重。他說這篇材料是毛主席親自批發全國參照執行的，豈能反對。我說毛主席批示也只是說「此件似可轉發全國，參照執行」，並未對「材料」作正式的肯定。程說主席批示的是「此件擬可轉發全國，參照執行」，我說不對，我看得清清楚楚是「似可」而非「擬可」。程林仍堅持「擬可」，於是找來原件查對，果然是「似可」而非「擬可」。

但畢竟事關重大，我躊躇再三，確信反對天津延安中學的「體會」，並不就是反對毛主席的「三七」指示。大約是在三月末的一天，終於斗膽將大字報貼了出去，結果是引來一場軒然大波。我的大字報被認為是直接針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理由是天津延中的材料既是毛主席肯定了的，那就是金科玉律，誰也不准說三道四。說有人製造假材料「欺騙」毛主席也不行，因為偉大領袖從來都是高瞻遠矚，明察秋毫，是不可能被任何人或事所欺騙的。說主席會受欺騙，本身就是對主席的大不恭，難道你比主席還高明麼？儘管不久就有消息傳來，說天津延安中學那個以教學班為基礎實現的全校大聯合，不到一個星期就分崩離析，徹底瓦解，但我仍然被人看作是對主席「不忠」。罪莫大

焉，新華工的頭頭們緊急開會，討論是否應當對我這個膽大包天的危險人物，進行組織處理。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接著又捅了一個更大的亂子。當時為了證明我對天津延安中學的那份大聯合的材料的判斷，我委託華工附中的幾名學生，去天津作一番實地調查。這幾個學生日來時，除了帶給我天津延中的大聯合已經垮臺的消息外，還帶回了一批天津南開大學的紅衛兵組織在全國各地大抓「叛徒」的材料。據南開大學一個叫「八一八」的紅衛兵組織稱，他們派出幾十個抓叛徒的小分隊、幾百個專案調查組，出動了幾萬人次，對除臺灣西藏外全國28個省的幾百個城市進行了調查，挖出了成千上萬的「叛徒」，乃至一個又一個的「叛徒集團」。僅據這個自稱「敢下五洋捉鱉」的南開大學「八一八」和南開另一個叫「衛東」的紅衛兵組織宣佈，經他們之手揪出的行政12級以上的混在高幹之中的「叛徒」，即達1,200人之多。

黨內有這麼多的「叛徒」被揪了出來，自然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但是細看叛徒名單，不禁疑竇頓生：因為在一大冊一大冊的名單裏，按年齡推算，竟有不少當年僅八九歲的「叛徒」，叫人莫名其妙。我從我的父母運動初期被誣為「汪偽國民黨漢奸」一事，聯想到這回的大揪「叛徒」，必使大批無辜者遭殃，便覺得天津的學生未免多事。先是有個通過學習毛主席著作一天實現全校大聯合的「體會」，接著又是一個在全國大抓叛徒網的「經驗」，譁眾取寵，總想一鳴驚人，實不足為訓。但不久就看到中共中央印發了一份《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人的自首叛變材料》，「材料」稱1936至1937年間，薄一波等六十人在國民黨的「北平軍人反省分院」中，接受劉少奇、張聞天的「中央指示」，自首出獄。以後大都竊據了黨和國家的要職，是「黨內一大隱患」。而「在這次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挖出了這個叛徒集團，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云云。我在認真仔細地研究了這份據說是由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批發的材料後，得出結論這個「六十人叛徒集團案」※15實屬一大冤案。

第一，1936年至1937年間，張聞天是中央的總書記，他的意見是可以視為代表黨中央的。無論「自首出獄」的指示當時是否正

確，責任主要應在中央，而非指示的執行者。黨的組織原則之一，是個人服從組織、全黨服從中央。在中央一級組織已經作出決定的情況下，不應過多追究個人的責任。

第二，對於在中央指示下達之前，未經組織同意而自行自首出獄的，和經中央指示自首出獄的，應分別對待，不應一律視為叛徒。對於後者，亦應根據他們出獄後在革命鬥爭中的表現而區別對待。

第三，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人突然拋出「叛徒網」的問題，不分青紅皂白到處亂抓叛徒，是企圖披著合法的外衣，「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即保護隱藏在黨內的一小撮真正的叛徒特務走資派，這是幹部問題上的新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我舉出以上三點理由後說，我並不是贊成有了「中央指示」就可以「自首出獄」，「自首出獄」畢竟是「放棄了原則」。但是我將這歸咎於這些人是中了劉少奇《修養》的毒而盲目服從上級的指示，是奴隸主義馴服工具論的受害者。我在這篇題為《「大抓叛徒網、保護一小撮」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新的組成部分》的文章中寫道：「他們中的一些人，出獄後在黨中央和毛主席以及周圍革命同志的熱情耐心幫助下，正視了自己的錯誤，痛改前非，而終於在今後殘酷的階級鬥爭的考驗中改造了自己，徹底擺脫了黑《修養》的束縛，清除了黑《修養》對自己的毒害，成為自覺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我們必須把這些人與『叛徒』嚴格地區分開來，這部分同志中間不就有最後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而英勇犧牲的嗎？」

……經過長期革命戰爭的考驗，現在又能夠堅定地站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的，即使曾經有過那麼一段歷史，基本上仍應屬於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們沒有理由在今天把他們仍稱為變節自首分子，硬將他們塞進『叛徒』之列，這樣做，實際上就是要打擊革命幹部，就是挑撥革命幹部與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關係，把革命幹部推向資產階級司令部中去。這是一個大陰謀，必須徹底揭穿。」

我最後說，「一個真正站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上而又被人列入『叛徒網』的幹部應該牢記毛主席的教導，正視自己歷史上的錯誤，在兩條路線的鬥爭中繼續改造自己、徹底批判劉氏《修養》，站在群眾運動的前列而不要背上歷史包袱、上了『大抓叛徒網，保護一小撮』提出者的當。」(以上內容引自1968年6月15日出版的第95期《新華工》報刊登的「關於魯禮安的一批材料」，並見上海市委寫作班子1970年2月編發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各種反動思潮資料彙編」)

正如康生後來所說，「為什麼要將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團的材料那時發下去呢？那是為了證明劉、鄧不但有一條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而且還有一條招降納叛的組織路線。」而毛澤東在明知中共中央已對此事作出過嚴格審查並已有結論的情況下，仍然同意將此案定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則只能看作是借此來徹底摧毀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昔日荊軻欲刺秦王，不是要借用秦將樊於期的腦袋嗎？現在薄一波安子文等人，就是為打倒劉少奇要借用的腦袋，總之一切都是服從政治上的需要。然而我輩並非「政治家」，如何有政治家們那麼一付彎彎肚腸，我只是覺得那六十一人「自首出獄」的責任主要不在他們身上，我只是隱隱嗅出了這個案子的背後，有一個大陰謀。我只是敢想敢說，脖子上撲了顆自己的腦袋而已，並不曾顧忌過這個「材料」、那個「批示」，是否出自偉大領袖、偉大導師之手，我當然是犯大忌了。

「新華工」的頭頭們決定將我開除出「紅司」。

像當初我被打成「國民黨汪偽漢奸的狗崽子」而遭唾棄一樣，我現在又因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受到紅衛兵組織的最嚴厲的「組織處理」。而上述關於「天津延安中學大聯合的體會」和「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的兩篇文章，則在一年之後，成為我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為劉少奇叛徒集團翻案的「鐵證」。

我又一次孤立了。一般說來被組織「清理門戶」之後，倘無其他組織接納，會有惶惶然不知所歸的感覺，但我似乎沒有。因我從來就不大把新華工的那幾個頭頭放在眼裏，什麼「司令」、「政委」，不過是「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罷了，算什麼呢？何況天下大亂，諸侯混戰，我也不妨獨樹一幟。不是就有光杆司令一人而扯上一面旗幟，美其名曰

「獨立寒秋」戰鬥隊的麼？我也來個「獨立寒秋」好了。但是學校附屬中學的一群學生找到我，說他們願意同我一道戰鬥。

這是一些十六七歲、十八九歲的初中生和高中生，其中多為我們學校教授和講師的子女。他們欣賞我的文鋒犀利，敢想敢說，而並不忌諱我的「離經叛道」。他們中一些人的父母，就是院裏的「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而我的招兵買馬是不問出身和成分的，我只問他們各人有何特長。於是在他們填報的「有何特長」一欄中五花八門，無奇不有，除稱自己會刻鋼板、會印傳單、會潑墨作畫、會刻石雕章之外，還有稱自己會打架、會翻牆的，甚而還有人自稱能偷會搶。所有報名的附中學生，哪怕是自稱雞鳴狗盜之徒，我統統照收。如魯迅先生言，自稱盜賊的無須防，得其反倒是好人。

其實這些奔我而來的中學生們，都是附中品學兼優的好學生。數十年後他們中或作家、或老總、或學者、或教授，都已成大器。其中一位叫李同寧的讀初中的女孩子，後來已成為我國光纖技術方面的專家，並受聘於美國矽谷某大集團公司任總裁職。另一位叫干小雄的初中生，多年後已是美國馬里蘭州摩爾根大學數學系的終身教授。

但是當時正是這個叫干小雄的附中學生，卻讓我在要與不要之間躊躇再三，因其父係院裏最「臭名昭著」的「反動學術權威」干毅也，但實在欣賞他那一手鉛字般的鋼板字，終不忍拒之於門外。如此英雄不問來路的「招降納叛」幾日之後，便拉起了一支二十多人的隊伍，還有幾名大學生也加盟進來。其中無線電系的馮天艾，是我長征串聯時的隊友。他當過系裏的體育部長，組織能力比我強，又能寫，日後在我們這支隊伍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我們決定將我們的隊伍命名為「新華工敢死隊」，取在革命中率先衝鋒陷陣，為革命準備拋頭顱灑熱血之意。當時工人戰鬥隊已遭取締，大批戰鬥隊頭頭慘遭逮捕，造反派處境艱難，我們站在造反派的立場上，認為是「白色恐怖」籠罩江城，決心從「白色恐怖」中殺出一條血路。那時北京的造反派學生，正在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支持下，展開對「二月逆流」※14的「急先鋒」譚震林的鬥爭，這對我們武漢的造反派，無疑是一個極大的鼓舞。我們一致認定，對武漢的造反派進行鎮壓的武漢軍區的陳再道司令員，就是「武漢的譚震林」，而關於陳再道

「生活糜爛」的種種傳言，更堅定了我們打倒這個「修正主義分子」的決心。

四月六日，我們以一篇題為「敢死隊向武漢部隊支左辦公室一小撮混蛋挑戰」的大字報在華工校園裏亮相。這張大字報，在歷數了武漢部隊支左辦公室「支保不支左」，「鎮壓革命造反派」的大量事實之後，指其「又想做娘子，又想立牌坊」、「打支左之名，行支保之實」、「為武漢譚震林張目」，語言極其尖銳，情緒極其激昂，最後說：

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

今日雄文四卷在手，何日縛住武漢譚震林遊街示眾？！

敢死隊向武漢部隊支左辦公室中一小撮混蛋挑戰！

敢死隊向全世界的混蛋們挑戰！

口氣是夠大了，大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併吞八荒之意。然而世界上的「混蛋」多矣，究有誰在乎我們的「挑戰」呢？但文革中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學生的文章，就是這樣寫的，這也算是文革中特有的一種「文風」吧——癩蛤蟆打哈欠的文風。

這張大字報矛頭直指武漢部隊「支左辦公室」和陳再道司令員，用辭又極為激烈、尖銳，寫好後在發不發表這個問題上，是有過爭論的。最後我說了一句話，我說眼前的形勢是乾柴已經堆好了，油也澆上了，就只差一把火。這張大字報，我們不寫或不發表，過不了兩天，同樣的大字報，也會有人寫有人發表的。我的這句話使一部分還在猶豫不決的人不再猶豫，全體「敢死隊」員都在大字報上簽了名。

除我和馮天艾之外，跟在我後面簽名的，還有李跟東、張國梁、駱益民、袁震、周炳生幾個大學生和周叔渝、孫彥章、趙應恆、孔憲明、柳申林、鮑志明、干小雄、李同寧、吳江錦、孫忠勝、易會琦、鐘克路等二十來個附中學生。

大字報貼出後，立即在華工園內引起轟動，大字報前的三角地帶，一時擠得水泄不通。從女生宿舍樓南三舍的六樓的一扇窗口，垂下了一副長達十幾米的巨幅標語，上書「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從與南三舍相鄰的男生宿舍樓南一舍六樓的一扇窗口，很快也垂下了一副同樣巨幅的標語，寫的是「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還有十幾名女大

學生，從她們的寢室的窗口吊下一副標語說，「我們也要參加敢死隊」。至於「向敢死隊學習」、「向敢死隊致敬」之類的標語更是不計其數。

「挑戰書」極大地宣泄了久被壓抑的造反派學生的鬱悶不平的心情，呼出了大家想喊而不敢喊出的聲音，所以反響極大，一時「挑戰書」不脛而走，迅即傳遍武漢三鎮。在漢口最熱鬧的六渡橋江漢路一帶，甚至出現了每間隔三五步，就貼有一份「挑戰書」的「盛況」。可以說武漢地區自文革以來，還沒有一張大字報像「挑戰書」這樣廣泛地被輾轉傳抄的。儘管由於「挑戰書」的出現，激出了一批言詞更激烈、觀點更急進的大字報，卻沒有一篇能有「挑戰書」這樣的轟動效應。

但是這張「挑戰書」極大地激怒了武漢軍區的領導，大字報貼出的當天深夜，有人看見一輛軍用吉普車駛進了華工，幾名軍人用大鏡頭的帶閃光燈的相機，攝下了「挑戰書」全文。三個月後(七二〇事件之後)，造反派在搜查軍區整理的造反派的「黑材料」時，發現了一張針對我的「逮捕令」。但是不知為什麼，這份四月上旬即已簽發的逮捕令，並沒有付諸實施——是因為軍區領導發了善心，決定對我這個學生「網開一面」，還是因我在群眾中「名聲鵠起」而不便下手呢，我不得而知。但「挑戰書」貼出後不到兩天，被解散的工人戰鬥隊的一些戰鬥隊員，就上街舉行了火炬遊行，無疑是對「挑戰書」的一種直接的反應。而為工總翻案的呼聲也愈來愈強烈，要求恢復工總組織並釋放其被捕頭目的標語和大字報，開始在街頭出現。軍區的領導這時也許無暇也無心思甚至也無能力去實行對我的逮捕，他們也許也想到了，如果因為一篇「挑戰書」而將我這樣一名學生打入監獄，只會引起全市造反派的更激烈的抗議，而使他們處於被動。

且說針對武漢部隊支左辦公室的這個「挑戰書」使「敢死隊」一舉成名，我和我們「敢死隊」成了造反派群眾眼中的「英雄」。曾經將我開除出紅司的新華工的頭頭們，又在考慮恢復我的「司籍」了。我也懶得管他們恢不恢復我的「司籍」，只顧帶著我的隊伍大鬧天宮。有一次武昌這邊的大專院校各個造反派紅衛兵組織，相約將隊伍開拔到武漢部隊「支左辦公室」所在地武昌洪山賓館前的廣場上「請願」，要求「支左辦公室」的負責人出面接見廣場上的紅衛兵，回答有關「支左辦」應如何對待

「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等問題。但是儘管請願的學生在烈日暴曬下在廣場上坐了一整天，「支左辦」的負責人就是不出面接見。學生們就不斷地唱歌和喊口號，許多學生並且在廣場上發表演說，斥責「支左辦」「支保不支左，鎮壓造反派」。「支左辦」便打開賓館門前一根電線杆上的高音喇叭，反復播放武漢軍區那個針對造反派的「二一八聲明」和毛主席語錄歌，對學生們進行干擾。高音喇叭的功率特別大，發出的聲音震耳欲聾，廣場上的學生們面對頭頂上的高音喇叭，怒火中燒卻又無可奈何。這時我們「新華工敢死隊」拍馬趕到，當「敢死隊」的大旗一出現在廣場上時，正在靜坐的學生們全都熱烈地向我們鼓起掌來。

我們向他們的組織人瞭解了情況，決定首先拿掉頭頂上那個高音喇叭，打下「支左辦」的威風。我讓附中一個外號「易老八」的初中生爬上電杆去割斷喇叭線。「易老八」領命而去，不到兩分鐘時間，這個比猴子還機靈的中學生手腳並用，三把兩把就攀上了電杆。在一片歡呼聲中，「易老八」用刀子將連接喇叭的電線掐斷，高音喇叭頓時變成無聲的「啞巴」。而「支左辦」的一些工作人員就站在賓館的門口乾瞪眼。

夜幕降臨了，從漢口那邊，忽然傳來一所中學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請求支援的消息。原來這所中學的造反派學生，正在市委大院「絕食請願」，但設在市委的由軍區控制的市「抓革命促生產辦公室」，拒絕出面回答學生們的問題。學生們整整「絕食」了三天兩夜，已經精疲力竭，極待支援。我和馮天艾幾個大學生商量了一下，決定「星夜馳援」。

已經是晚上十一點多鐘了，我們離開洪山賓館，整隊步行前往一江之隔的市委大院。「敢死隊」近三十名隊員排成兩列，步伐整齊地向市委進發。一路上我們唱著「造反有理」等歌曲，喊著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的口令，沿著空無一人の大馬路，精神抖擻地前進。路途很遠，我們差不多用了四個多小時才到達目的地。這時天已快要亮了，「敢死隊」的隊員們一屁股坐到市委大院裏的水泥地坪上，互相背靠背地就打起瞌睡來。然而接下來還要參加那些中學生們的「絕食」行動以示「聲援」，我們一個個「絕食」絕得東倒西歪，但還要打起精神來唱「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歌確是首好歌，很感人、很動情的。特別是唱到那句「革命戰士懷念你，偉大的領袖毛澤東」時，

我們這些餓得肚皮貼了脊背的「紅衛兵小將」，早已經淚流滿面，傷心得不得了了。

但是不管我們這些革命「小將」抬頭望見了什麼，「心中想念」著哪個，當權的革命「老將」們照樣罵我們這些革命「小將」的娘。武漢軍區有個叫韓東山的副司令員，在黃石一個群眾大會上說，造反，造什麼反？造個屌反！造到老子頭上來了！黃石的紅衛兵小將指責韓的講話是公開對抗偉大領袖毛主席關於「造反有理」的指示，說由於韓的講話，導致了黃石革命造反派的處境困難，強烈要求韓收回自己的講話，並向黃石的革命造反派賠禮道歉。這些中學生找到新華工，向大學的「紅衛兵哥哥」們尋求支援，並點名要我們新華工敢死隊出面和他們共同戰鬥。新華工的頭頭們便徵求我的意見，我二話不說拉出隊伍，和黃石中學紅衛兵「揪韓敢死隊」一起，進駐了武漢軍區支左辦公室所在地武昌洪山賓館。

在賓館的一間大會議室裏，我們和韓東山本人面對面的就這個「造個屌反」的問題，一連辯論了整整十天。韓副司令乃行伍出身，對於辯論並不在行，只能靠支左辦公室的幾位部長替他左抵右擋。最後經不住我們的蘑菇戰術，被辯論攬得疲憊不堪的韓副司令，終於承認他在黃石的那個講話有錯誤，並寫下了一張承認錯誤的字條。黃石的紅衛兵小將們如獲至寶，拿著這張字條就打道回府，準備慶祝勝利了。但學生們回到黃石卻傻了眼，只見滿街都貼的是武漢軍區黨委的聲明，稱韓東山的表態未經黨組同意，是無效的。正在興頭上的紅衛兵小將們，眼見經過艱苦談判才取得的勝利成果瞬間化為烏有，不覺氣急敗壞怒不可遏，打算重新殺回武漢，找韓東山和武漢軍區算賬。然而正所謂「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終於未能就是否殺回武漢作出決定，這件事也就此作罷。

看來「薑還是老的辣」，紅衛兵小將哪裏鬥得過老謀深算的軍區老將。但老將們的出爾反爾、言而無信，卻也是出乎我們這些小將意料之外的。也許政治鬥爭本來就是無信用可言罷，我們這些小將哪裏真懂什麼政治呢？但黃石的中學生紅衛兵們卻和我們「新華工敢死隊」的隊員們，特別是和我本人結下了很深的友誼。另一方面我因為曾率領新華工敢死隊向武漢部隊支左辦公室的「混蛋」挑過戰，早就被軍區一

些人視為「眼中釘、肉中刺」，這次又幫助黃石的紅衛兵們辯贏了軍區的大人物，將他們置於十分狼狽的境地，從此我和軍區一些人的「梁子」就結得深了。以後一旦有了機會，這些人的報復將是十分殘酷而無情的。但我當時並沒有充分意識到這一點，仍然只顧寫自己的得意文章。所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自以為是在「為真理而鬥爭」，哪裏想到過一絲一毫的收斂。

針對一個以造反派自居，而又和「造反派的錯誤」或「錯誤的造反派」劃清了界線的「紅三司」紅衛兵，我指出其負責人在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態度曖昧，貌似革命，實則騎牆，必為組織內之真正革命的那部分紅衛兵所唾棄。我在這篇題為《三司在十字街頭》的大字報中斷言：「三司在十字街頭。或者向左，或者向右。但無論是向左或者向右的力量，都已無法左右三司。分裂，是三司必將面臨的命運。」此言一出，引起三司大本營內一片譁然。三司司令部號召屬下對我這篇大字報全面批駁，將我的大字報，上綱為又一張「二八聲明」式的「大毒草」。

然而就在一片討伐聲中，從三司的陣營中，殺出了一支人馬，宣佈與「機會主義」的原三司徹底決裂，另行成立「三司革聯」。三司的分裂，距我的「預言」不過一個星期。事實勝於雄辯，「紅三司」對我的討伐自然中止，轉而與「三司革聯」這支叛軍廝殺去了。而我因為準確地預言了「紅三司」的命運，更加名聲大噪。無論是造反派、是保守派、還是「紅三司」這類「機會主義」的「康派」（康有為派改良派也），都十分注意我和我們敢死隊的聲音了。

我當時正在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為被軍區鎮壓的「工總」翻案。

所有的造反派組織都在為工總的問題呼喊。但在工總是否應當「徹底翻案」這一點上，「三鋼」與「三新」※16的立場並不一樣。「三鋼」作為「二八聲明」時的「香花派」，自然力主為工總徹底翻案，即不但要恢復工總，宣佈其為革命組織，而且要釋放工總的全部在押的頭頭。而「二八聲明」時的「毒草派」，則僅僅否認工總為反革命組織，但無意承認其為革命組織，也不贊成恢復之；對於被逮捕的工總成員，則主張在逐案審查後，釋放其中被錯捕的那部分好人。我所在的「新華

工」，是這種觀點的主要代表。各派在工總問題上的分歧，實際上源於各自的利益，他們彼此攻訐，無法在這個重大問題上，達成一致的認識。

作為「二八聲明」問題上的「毒草派」，我對這個挑起造反派內戰的聲明，是持堅決的反對態度的。但是面對造反派受到全面壓制的現實，為了擊退「二月逆流」，打垮保守派的進攻，我覺得必須將為工總翻案的問題，提到一個重要的地位。工總的那些在押的頭頭，我一個也不熟悉，也從未有過接觸。我對他們毫無瞭解，也不懷疑他們中間難免混雜有一些不良分子。但我認為頭頭們的個人品質，對整個組織並不是最重要的，關鍵在於這個組織在革命中所處的地位如何。而工總這個擁有數十萬產業工人的組織，在武漢地區文革中的地位，是任何其他群眾組織都無法替代的。基於這一認識，我決定鼓吹必須為工總翻案。我拿阿基米德的一句話「給我一個支點，我可以把地球翻轉過來」做文章，寫下了一論——《從阿基米德的一句話談起》，二論——《從阿基米德的一句話繼續談》，以及三論——《鋼八司是工總翻案不徹底的畸形產物》三篇翻案文章。

我在《從阿基米德的一句話談起》中指出：在人類歷史的天平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正在較量。就武漢地區而言，可以毫不誇大的認為，工人總部的恢復，將成為這一天平的支點。廣大工人戰鬥隊員將和其他革命造反派一起，以強大的力量壓倒一切，使天平迅速的左轉，取得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最後勝利。

在駁斥了各種反對為工總翻案的論調之後，我引用革命導師的話說，不要把我們認為過了時的東西，當作是階級也認為過時了，群眾也認為過時的東西。對於那些企圖阻擋工總的恢復，企圖攔斷歷史潮流的人，恩格斯說得好：可是，世界歷史是沿著自己的道路前進的，它不會理會這些聰明的溫和的庸人……正如一個支點，在普通人看來不過是一個支點而已，可是天才的科學家阿基米德，卻因之而提出了「將地球翻過來」的驚人設想。工總恢復，在某些人看來僅僅只是一個普通工人組織的個別問題，可是在真正無產階級革命者眼裏，卻是「翻轉整個武漢地區工人運動」的強大杠桿。

「二論」是「一論」觀點的延伸，而「三論」則是通過對一個叫「鋼八

司」的「組織」的剖析，來論證為工總翻案的必要性。所謂「鋼八司」，其實並不是一個有形的組織，其成員基本上都是原屬於工總的戰鬥隊員，在工總被取締後，他們不願加入其他組織，便以「八小時工作制司令部」自居。由於無固定的組織和統一的指揮，這些人成為造反派中最富攻擊性也最富破壞性的一股力量，這個「鋼八司」也因此受到造反派群眾的讚賞，溢美之詞甚多。

但是我在文章中說：人們盡可以千百遍的讚揚「鋼八司」的革命熱情、革命精神和革命行動，但是倘有人竟想把鋼八司推崇為先進的集體，把「鋼八司」的自流推崇為美德，甚至想為自己盲從和崇拜自發性的態度尋找理論根據，那將給武漢地區工人運動帶來極大的危險。

我指出：離開工人階級自己的革命造反組織，鼓吹運動中的「無政府主義」思潮，根本上是要把工人運動交給機會主義分子領導……而崇拜自發性的理論，是反對使自發運動帶上覺悟的和有組織的性質，反對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權威對革命群眾運動的領導。這些人認為似乎愈沒有領導愈好，愈沒有組織愈好，他們不顧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而企圖採取「阻力最小的路線」去完成革命。

然後我在文章中分析了「鋼八司」的成員情況，引用了1927年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時，利用一些自發性的落後組織作為破壞勞動人民團結和破壞革命的工具的事例，並考察了「鋼八司」的來歷，是與「被取締的工人總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我指出「他們中絕大多數人，就是原來的工人戰鬥隊員，工總被非法取締後，他們失去了自己的組織，於是便成為一支龐大的游離力量。他們自發地走上街頭進行鬥爭，這種鬥爭是太有局限性了，它終究多半是盲目反抗與報復的表現，極易被人引入歧途，很難代表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對武老譚作有效的鬥爭。他們需要一個真正強大的自己的革命組織。為工總翻案的鬥爭，也就更加急迫地提到了我們的議事日程」。

我最後說，「鋼八司」作為武漢地區一種獨特的組織形式，在全國恐怕也是絕無僅有。嚴格的分析起來，它應該是武漢地區工人總部未能得到徹底翻案的一種畸形產物，而這種產物是遠遠落後於當前運動的需要的。隨著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力量的盛大興起，廣大工人戰鬥隊員必將自己奮起為自己的革命組織工總翻案。而工總一旦得到翻

案，「鋼八司」便將完全失掉它的存在價值，其特殊的歷史地位必將隨著工總的重新崛起而宣告結束。

我這三篇論述必須為工總翻案的文章，因觀點鮮明、角度新穎，被各個造反派組織以大字報和傳單的形式，在武漢三鎮廣為傳抄，並被《新華師報》全文轉載。此後我更是一發不可收拾，或以「敢死隊」或以個人名義，接連發表了多篇鼓吹為工總翻案和反對「武漢譚震林」的文章。工總的問題究竟將如何解決，很長時間都一直是個懸案，直到六月四日，武漢軍區仍重申其一貫立場：工總不能恢復。而北京的譚震林，則在五月一日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了慶祝五一節的群眾大會。這些信號似乎都表明，反對「武漢譚震林」的鬥爭，只能是勞而無功。但「敢死隊」在江城已是赫赫有名，家喻戶曉，而我也被公認是造反派的代言人，甚至被人戴上了「魯克思」的桂冠。

其實這真是個天大的笑話！我哪裏會是什麼「克思」呢？我連馬克思主義的門都沒有摸著。我充其量不過是「初生牛犢不怕虎」，憑著一股年輕人的盛氣和銳氣，比較地敢想敢說一點罷了。但我那時確實相信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一場空前偉大的革命，也一心想做一名鄒容那樣的「革命軍中馬前卒」，後來在獄中憶及這一段經歷時寫道：

平地霹靂響，風雲多變幻；造反浪滔天，革命雷電閃。

自謂肝膽壯，挺身鬥兇頑；援筆批劉鄧，挽弓射狂瀾。

佼佼弄潮兒，生愛濤頭站；赫赫敢死隊，威名震四方。

——《獄中自述五百壹拾字》

身陷囹圄，已然戴罪之身，仍對這場「革命」情有所鐘，蠢則蠢矣，但那時也只能如此。從「人類浩劫」的角度來看這場由「偉大領袖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革命運動」，那是要等許多年而且必須是在領袖「萬歲」之後，才有可能。我們那時在領袖的「偉大號令」的指揮和驅使下，「為王前驅」，是十分自覺自願而又歡欣鼓舞的，絕不會有「人類浩劫」或「青春浩劫」之類的感覺。我們中間流傳的一句口號是「只要中國不變色，獻出青春也值得」，對於虛擲的青春歲月毫不吝惜，還自以為是在經歷一種「戰鬥裏的青春」。我們對革命的嚮往是純潔的，我們對領袖

的崇拜也是真誠的。我們真正以為我們投身的，是一場反修防修，保證中國永不變色的史無前例的「聖戰」。唯如此，才能明白我們那時的吶喊為什麼能那樣激昂慷慨，我們的文章為什麼能那樣大氣磅礴，真所謂「橫掃千軍如捲席」——自然，我們那時其實並不清楚自己究竟「橫掃」了些什麼，反正不分青紅皂白一杆子掃過去就是。

就我自己而言，無論是最初那篇《為南下革命師生呼籲》，還是後來諸如《論二司的功與過》、《敢死隊向武漢部隊支左辦公室一小撮混蛋挑戰》、《三論必須為工總翻案》，乃至關於「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翻案文章，都只能是出自那個混沌不分、大霧彌天的時代，也只能出自我那樣血氣方剛、少年氣盛的年齡。對於這些「少作」，借用魯迅先生的話，是「愧則有之，悔卻從來沒有過。」當首都南下串連的學生受到圍攻時，我為他們呼籲；當二司的紅衛兵小將遭到迫害時，我為他們吶喊；當工人戰鬥隊員紛紛下獄時，我為他們鳴冤；當大批革命老幹部被無端打成叛徒集團時，我為他們翻案，所有這些，在我不過是出於一種「伸張正義」的初衷罷了。

而且正是因為我曾經提著腦袋「為民請命」，在後來我在招下彌天大禍身陷「文字獄」時，才有那麼多的群眾組織聯名為我請願，造出極大的聲勢對我進行營救。儘管明知我是犯下了「不忠」這種不可赦的大罪，仍然堅持認為我是「犯錯誤的革命小將」。

蒼天在上，在為那些被侮辱被損害的弱小者說話這一點上，也僅僅是在這一點上，我敢說我問心無愧。

但這並不是說我認為我在文革初期沒有做過荒唐事。我雖然老是挨整，但我也確曾傷害過人。比如張體學同志那次在我們學校所作的講話，那個關於「友軍相遇，打了誤會戰」的觀點，實質上正確的。在人民群眾中間，本來就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麼，張體學的話有什麼錯？可是我憑藉那個「十六條」中的條條本本，無來由地就將其大批特批了一通，並且將問題上升到「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高度來批，還自鳴得意，沾沾自喜，以「路線鬥爭覺悟高」自詡呢。所以我雖在「為民請命」，替受迫害受侮辱者伸張正義這點上，自問無愧於心，但我也傷害過像張體學這樣的好幹部，深夜捫心，是要內疚的。

不過我當時並不曾意識到這一點，當我和戰友們集合在「炮打司

令部」的旗幟下，用猛烈的炮火轟向所謂「帶槍」的和「不帶槍」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我們其實是不大分得清楚我們面對的目標，究竟是朋友還是敵人，反正「造反有理」，轟過去再說。

當然，所謂「炮火」，在我們來說，不過是要筆桿子而已，而分屬造反派和保守派兩大營壘的工人群眾，則已經從「批判的武器」轉向了「武器的批判」，就是說已經開始互相訴諸武力。由保守派組織聯盟而成立的一個叫「百萬雄師」※17的龐大組織（其前身就是那個早已垮掉的職工聯合會），在部隊的暗中支持下，控制了多數工廠，並將這些工廠的造反派驅趕到城裏的幾個據點，然後「百萬雄師」以武力對這些據點進行兇猛的攻擊。造反派則在各據點中建起防禦工事，攻與守之間的武鬥時有發生。「局部戰爭」雖尚未發展為「全面內戰」，但已不斷有人在武鬥中喪生。和主要由以前的民兵和退伍軍人組成的「百萬雄師」的准軍事組織「紅武兵」相比，造反派的武鬥班子簡直就只是一群「烏合之眾」。而況在戰爭中進攻的一方通常佔有主動，於是損失慘重的只能是造反派方面了。

從力量分佈上看，漢陽區早已是「百萬雄師」的一統天下，造反派稱之為「敵佔區」；武昌這一邊作為武漢高校的所在地，及武重武鍋和武鋼等產業工人造反派的根據地，則是「解放區」；漢口則呈兩派勢力犬牙交錯的格局，為「遊擊區」。但「百萬雄師」不斷地用武力對造反派的地盤進行「蠶食」，漢口這邊的造反派漸漸只能集中龜縮到南洋大樓、民眾樂園等幾個主要的據點之中持守勢，美其名曰「文攻武衛」※18。文攻者，輿論宣傳大字報也；武衛者，木棒刀槍柳藤帽也——實質上就是武鬥。刀光劍影，血肉橫飛，文化大革命將蛻變為「武化大革命」乎？於是在造反派方面圍繞「文攻武衛」的提法曾有過一場辯論。

辯論主要是在大專院校的學生中進行。一部份學生認為，「文攻武衛」順應了形勢發展的要求，是一個創造性的革命口號。這個口號提得非常之及時、非常之好，「大長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志氣、大滅了資產階級保皇派的威風。」另一部分學生則認為，這個提法背離了偉大領袖關於運動中「要用文鬥，不用武鬥」的「最高指示」，所以是一個反毛澤東思想的錯誤口號，必須堅決摒棄。

在水利電力學院由「鋼二司」負責人丁家顯主持召開的一次辯論會

上，來自華中師範學院數學系的一位大學生，在發言中集中代表了這後一種人的觀點。他說：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要用文鬥，不用武鬥，而現在一些人卻提出了文攻武衛的口號，與毛主席的指示背道而馳，這顯然是完全錯誤的。毛主席的指示就是最高指示，是我們一切行動的指南，我們只有不折不扣的去執行。像林副主席說過的那樣，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所以執行毛主席的指示是無條件的，不能藉口形勢變化了就不去執行，甚至別出心裁的另搞一套。忠不忠，看行動，誰違背主席的教導另搞一套，誰就是對主席不忠。

就在這位讀師範的迂夫子誇誇其談「忠」與「不忠」之時，台下有人詰難道，照你這樣說，難道敵人把刀子架到你的脖子上了，你也堅持文鬥而拒絕武衛麼？此夫子斷然回答說，我當然仍堅持文鬥到最後。為了捍衛毛澤東思想的純潔性，為了宣傳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最高指示，我甘願獻出我的一腔熱血。

我那天受丁家顯的邀請，參加了這個辯論會，丁說他極想聽聽我對「文攻武衛」這個口號的意見。在恭聽了華師這位迂夫子的高論或者不如說謬論之後，我覺得我必須說幾句什麼。我站到了辯論臺上說，大家都知道我曾經以古希臘數學家阿基米德的一句話為題，寫過幾篇為工總翻案的文章。剛才聽了華師這位同學的發言，我不禁又想到阿基米德的一件軼事。就是當羅馬的軍隊攻陷了敘拉古城，羅馬士兵的屠刀已經舉到了他的頭頂時，這位仍在癡迷地畫他的圓圈的大數學家，並不曾想到要抵抗，卻說不要動我的圓。看來我們這位華師的數學系的未來的數學家，是很得到一點他的前輩的師傳的。在敵人屠刀將砍下來時，他還在念念不忘，當然不是不要動那個圓，而是念念不忘忠於毛主席不用武鬥的教導。這位同學對偉大領袖的忠貞真令我們感動。

說到這裏，台下的聽眾全都笑了起來。我接著說，這位同學對偉大領袖的忠心固然使我們感動，但是照他的話去做卻絕對不行，因為他的話實際上違背了毛澤東思想的最本質的東西，那就是對於具體情況要作具體的分析。列寧說過，對於具體情況作具體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我們現在就來對要

文鬥不要武鬥這個提法，作一點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大家知道，偉大領袖毛主席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制定的「十六條」中，首先提出「在進行辯論的時候，要用文鬥，不用武鬥」的，後來針對運動中一些人批鬥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時搞體罰，就進一步提出要用文鬥，不用武鬥，指出文鬥才能觸及靈魂，武鬥只能觸及皮肉。就是說，不但對持不同觀點的群眾，在辯論時要以理服人，不能揮拳頭，就是對於批判的對象，也要擺事實、講道理，不能搞體罰。但現在的情況是怎樣呢？是保守派群眾在黨內和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支持和鼓動下，舉起屠刀對造反派的群眾實行血腥屠殺了。這些人早已把自己武裝到了牙齒，早已把「要用文鬥、不用武鬥」的指示踐踏得乾乾淨淨了。當反革命對革命人民無情殺戮的時候，難道我們竟愚蠢到遞過脖子去任人砍殺，而不是遵循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去武裝自衛，堅決抗暴嗎？很明顯，如果我們放棄自衛的原則，我們就要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台下響起暴風雨般的掌聲。有人在喊「文攻武衛萬歲！」但是，我話鋒一轉，聲明我並不贊成文攻武衛萬歲。我說至於文攻武衛這個口號，也只能說是在當前這樣一種特定形勢下，一個不得已的應變口號。因為文化大革命畢竟是在毛主席領導下的一場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革命，武鬥畢竟不得人心，畢竟只是走資派垂死掙扎的最後一招，所謂「圖窮而匕首見」。武鬥必定只能是暫時的現象，註定是短命的，所以文攻武衛也只能是一時的策略，絕不可能萬歲。列寧說過，真理如果再向前走一步，就可能變成謬誤。

我繼續說，目前的情況，恰恰是一些人儘管口裏也叫喊著文攻，實際上是武衛高於一切。他們成天忙於佔據點、修工事，熱衷於一屋一樓之得失，把自己困在高樓厚牆之中，作繭自縛，準備人家來打，這就是完全將自己置於了被動的境地。因為說到武鬥，我們並不是武裝到牙齒並且得到軍隊支持的百萬雄師的對手。我們必須盡量避免武鬥，減少不必要的犧牲，武衛應當限制在最小的範圍之內。我們應當發揚我們的優勢。我們的優勢在哪裏呢？就是宣傳群眾、動員群眾，用毛澤東思想武裝群眾、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去喚起群眾，幫助全體人民包括目前還受到走資派蒙蔽的那部分群眾都覺

悟起來。這樣才能真正有力地打擊敵人、孤立敵人，使他們陷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我愈說愈激昂，我的每一句話都幾乎被狂熱的掌聲和歡呼聲打斷。而每一陣掌聲和歡呼聲，都使我產生出一種幻覺——彷彿自己是置身在一個已經成為歷史的大革命的年代，正在與革命隊伍中的機會主義分子作面對面的論爭；又彷彿自己正站在硝煙瀰漫的街壘中，對浴血奮戰的武裝群眾進行動員演說。不過這種奇特的感覺，以後在我身上再也沒有出現過。我最後說，道路必將開拓，堅冰必將打破，我們新華工敢死隊決心要作開路的先鋒。我們已經準備走出校園，殺向社會，用毛澤東思想宣傳群眾、動員群眾、喚起群眾，共同奮起與武老譚作一次殊死的戰鬥。

許多人跑上前來同我握手。二司司令丁家顯離開主持人的位置，上前來與我擁抱。有一位短髮圓臉的湘妹子，自我介紹說是武大中文系二年級的學生，她希望我把辯論會上的發言整理出來，交給她在二司的報紙上發表。後來我知道她叫李婉芝，是二司總部的文字秘書。在這次辯論會上，我還認識了湖北藝術學院的幾位學音樂的女學生，她們十分熱情地邀請我們進駐她們學校。她們說她們湖藝就在武昌解放路，環境幽雅，鬧中取靜，而且全校師生幾乎都是造反派觀點，是造反派的一統天下，我們的人身安全絕對有保證。一位叫汪麗珠的湖藝附中的女學生鼓噪得最起勁，她說，到我們湖藝來吧，我們用貝多芬的《熱情奏鳴曲》來歡迎你們。我的朋友馮天艾眨眨眼笑道，我們要聽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樂》。汪說那也沒問題，《英雄交響樂》就《英雄交響樂》，我們學校有四十架鋼琴，彈起來驚天動地。《英雄交響樂》，四十架鋼琴，那真是太誘人了，我和馮天艾當即拍板，把隊伍拉到湖藝去。

三天後，我們新華工敢死隊進駐了湖北藝術學院。



## 第八章

# 七二〇事件前後

湖藝堪稱是一座音樂的殿堂，美麗、寧靜而典雅。當夏夜的微風從幽深的校園拂過時，你會聽見從綠葉掩映的琴室的窗口，飄出陣陣悠揚的琴聲。然而你是不可能聽見貝多芬的《熱情》或《英雄》了，那不過是汪麗珠一時的戲言，你能聽見的只能是「時代的最強音」——對偉大領袖的頌歌。西方的古典音樂大師們，不是曾經把一首首讚美詩，奉獻給他們的上帝嗎？那麼中國的革命的音樂工作者，為什麼就不應當把頌歌獻給革命人民的偉大救星呢？有人卻說這宏偉輝煌的頌歌，其實正是摹仿教堂裏的讚美詩的旋律。說這種話的人當然是別有用心，獻給無產階級偉大領袖的頌歌，和唱給上帝的讚美詩，怎能有任何相通之處呢？而況中國革命的音樂工作者，有著怎樣非凡的創造呀，他們創造出了前所未有的，或者說是空前絕後的「語錄歌」。

《聖經》洋洋百數十萬言，記錄了基督大量的言行和奧跡，但誰曾聽說過基督的「語錄歌」呢？而我們偉大領袖的每一條語錄，都已經或將要譜寫成歌曲，讓世界傳唱。革命人民有福了，革命的音樂工作者，可以大有作為。而蘇修的廣播電臺，竟敢攻擊「語錄歌」是「鴉噪」，還在對華廣播中，播放什麼「二泉映月」、「漁舟唱晚」之類的封建餘韻，真正是反動透頂。

蘇修的廣播電臺，自然是早已劃在敵臺之列了，吃了豹子膽偷聽敵臺的小子，是附中的初中生小周。小周淺淺的小平頭，圓頭圓腦的落了個小和尚的綽號。他說他聽過汪麗珠用揚琴彈奏的「漁舟唱晚」，那是真正的妙不可言，好聽極了。小汪尖尖的下巴、薄薄的嘴唇、蒼

白的臉，鼻樑上架著一付近視眼鏡，頗有點像英國小說《簡愛》中描寫的那種教會寄宿學校裏面的清寒的女學生。聽說汪揚琴彈得十分漂亮，「漁舟唱晚」這樣的舊曲子，她從來不曾在我們面前彈過，小和尚卻能獨飽耳福，於是附中的其他學生，就放出話說小汪和小和尚好上了。

想當年的初三學生小和尚，是極規矩極靦腆，連和女生說句話，都要打幾個結巴。所以就難怪他激動地瞪大眼睛，指天發誓說狗日的……才有那……那個事，可……可以賭咒的，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但是另一位姓孫的附中初中生頗不以為然地撇撇嘴說，有那事又麼樣？要是我就敢認賬。孫君個子矮矮的但十分壯實，五大三粗、濃眉大眼，活脫脫「矮腳虎」一個。「矮腳虎」膽子特粗，且天生的情種，據說讀初一時，就敢給同桌的女生寫「情書」，結果被不領情的同桌，將「情書」曝了光，引得全班同學群起而哄之。他先還悶著不作聲，後來惱羞成怒，突然拔出把水果刀朝桌子上一插，叫道：哪個再嚼舌頭，先吃老子一刀！

不過像孫君這樣好勇鬥狠的，在我們這個敢死隊還真不多，倒是文質彬彬的，在隊裏佔了絕對的多數，其中不乏舞文弄墨的高手。所以我常說我們敢死隊，是用文字向「反動路線」宣戰的敢死隊，所謂「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是用文而非用武。打砸搶之類的事情從來與我們無緣，了不得爬爬電線杆，掐斷根把高音喇叭線，夠「文明」的了。

以敢寫文章出名的敢死隊的名氣，在社會上是愈來愈大，自然有外校的學生慕名而來。不過我們控制極嚴，並不打算對外招兵買馬。但是有一天一男一女，來自一所師範附中的高一學生，卻被我們破例接收。男生姓蕭，矮個子，細眯眼，但神態自若氣質不凡；女生姓曾，高挑而貌美，舉止優雅有大家閨秀之風韻。他們自稱是一支紅衛兵宣傳隊的隊員，一個編節目，一個搞舞蹈，但是厭倦了成天的唱唱跳跳，於是慕名投奔我們。

「我們拜讀過你的不少文章，」蕭笑咪咪地眯著眼說，「很欽佩你的文筆和膽識。前些時候，又在水院聽了你在那場關於文攻武衛辯論會上的發言，覺得你的觀點總是與眾不同，高屋建瓴、獨具一格，我們

就有了投到你的麾下的念頭。」而和他一起的姓曾的女孩子則介紹說，蕭也是很會寫文章的，文思敏捷，筆頭極快，可以助我一臂之力。

我和馮天艾商量了一下，決定接納他們。我的直覺告訴我，這兩位中學生絕非等閒之輩，後來的事實證明果然如此。只說當時，不管我的文章如何被吹為「筆力雄健、橫掃千軍」，但論起文學的功底，無論是我、是馮天艾、還是其他同學，統統只能在這兩位外來的中學生面前甘拜下風。

記得有一天蕭和曾與我談天時，隨便問我說：「你覺得雨果的那本《九三年》如何？」

我沒有讀過《九三年》，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我只是念中學時讀過他的《笑面人》。」

「應該讀一讀《九三年》。這本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的雨果晚年的代表作品，豈可不讀？」蕭很認真地說，「雨果在小說中提出，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曾趕緊插話說這提法是錯誤的。蕭搖頭說那未必，又問道「那麼狄更斯的《雙城記》呢？也是以法國大革命為題材的。」「沒有，」我再一次搖頭，「不過他那本《遠大前程》我倒是讀過。」蕭不無遺憾地說，沒讀過《雙城記》太可惜了，接著他又談到斯湯達的《紅與黑》，巴爾扎克的《高老頭》和《歐也妮葛朗台》、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以及高爾基的自傳三部曲。很慚愧，除了巴爾扎克的那兩本書，以及高爾基的《童年》和《在人間》，其他幾本，我幾乎翻都沒有翻過。

「那麼《靜靜的頓河》呢？你多半也沒有讀過了，」蕭惋惜地說，「那是絕無僅有的真正的史詩式的文學巨著。思想深刻，氣勢宏偉，極有藝術感染力，征服了全世界的讀者。作者蕭洛霍夫，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那是當之無愧的。」但是在旁邊聽我們談話的一個附中的學生打斷他的話說：「蕭洛霍夫是修正主義作家，那部蘇聯的反動影片『一個人的遭遇』就是根據他的小說改編的。蕭洛霍夫這傢伙專好宣染戰爭的恐怖，鼓吹活命哲學，寫的都是些大毒草。」「我不管什麼毒草不毒草，反正蕭洛霍夫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蕭堅定地說，「你們只要讀一遍《靜靜的頓河》就知道了。」

讀一讀《靜靜的頓河》那當然很好，但是要找這種「封資修」的書談

何容易？「你要是想看，我幫你去搞。」蕭熱情地說，「我母親是我們附中圖書館的管理員，我可以搞到許多別人看不到的書——比方《日瓦戈醫生》、《解凍》，還有《一個人的遭遇》。」說到《一個人的遭遇》，蕭的話就格外出格，他否認這是一本壞書，他說：「這怎麼會是反面教材？不錯，蕭洛霍夫是在書中渲染了死亡和恐怖，但戰爭本來就是非常殘酷和恐怖的，充滿流血、殺戮和死亡。哎，人類究竟為什麼要熱衷於自相殘殺呢？」這個十八歲的高中生憂鬱地歎息說，「其實，文化大革命又何嘗不是一場自相殘殺。」蕭說的這話是有見地的，後來他的上高三的跛腿的哥哥，就硬是被一群「紅五類」出身的同學活活打死了。

據蕭告訴我（那時他已經被我們戲稱為「蕭洛霍夫」了），他的父親是一名建築工程師，早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而入了「另冊」。他和他的哥哥在學校裏都受到「紅五類」的歧視，誰會替資產階級的「狗崽子」說話呢？在我們這個講究血統的社會裏，出身不好的人，是沒有社會地位的，屬於「賤民」一類。蕭說和他同來的姓曾的女孩子也是，因為她的生父，一位著名的「七月派」詩人，是一名「胡風分子」。

聽蕭說到姓曾的漂亮女孩子竟是一名「胡風分子」的女兒，我當時確實大吃一驚。那時在我們眼裏，所謂「胡風分子」，是遠比「右派分子」還要可怕得多的一種「反革命分子」。《人民日報》在公佈「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三批材料」時所發的「編者按」中，這樣說到胡風及其分子：「胡風集團在全國解放前狂熱地把希望寄託在蔣介石反人民內戰的勝利和人民革命力量的失敗上，而當蔣匪潰敗，全國解放以後，他們就潛伏在大陸上以更加陰險的兩面派手法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他們對解放戰爭後的新社會、對人民革命政權，表現了刻骨的仇恨。」而這個「編者按」據說是出自最高領袖之手。

既然最高領袖已經親自將胡風及其分子定性為十惡不赦的反革命集團，那誰還敢為這個集團的反動分子張目呢？所以儘管這位姓曾的女孩子後來曾幾次向我說，她父親的案子是冤案，甚至辯稱她的父親根本不能算是胡風分子，我仍然想不明白，如此美好的一個女孩子，怎麼偏偏有一個可怕的「胡風分子」的父親。

平心而論，我對「胡風反革命集團」毫無瞭解，也從來沒有見過胡

風那份據說是反黨反人民的三十萬言書。我對胡風的唯一印象，來自念小學三年級時，在一本《連環畫報》上看到的一組關於胡風的漫畫。其中一幅，畫的是胡風和他的分子們，抱著一桿捲有「三十萬言書」的投槍似的如椽大筆，正在向黨進攻。還有一幅，畫的是胡風站在一個插有革命和反革命標誌牌的岔路口，一面鼓吹「哪裏有生活，哪裏就有鬥爭」，一面張開雙臂，阻攔進步青年投奔革命。漫畫中的胡風，碩大的一個光頭，頭上稀稀拉拉的幾根禿毛，活像一顆發了芽的土豆，形象十分醜陋。這也很符合大批判的模式，反面人物，有幾個不是七醜八怪呢？君不見被打倒後的「劉大鼻子」劉少奇、「鄧小矮子」鄧小平、「陳大麻子」陳再道等人的漫畫形象麼？但劉鄧明顯是被醜化了的，這一點人人心中有數，而胡風分子究竟是怎樣一些人，我們卻隔膜得很。真是青面獠牙，面目可憎麼？我無法想像。

十幾年後，我從監獄裏放出來，曾有幸由蕭君引見，拜會了曾的父親。這位已獲平反恢復了名譽的「胡風分子」，其實是一位非常慈祥、和藹而可親的善良的老人。他在文革中暗地裏創作的一篇題為「懸崖邊的樹」的詩，使他重新飲譽詩壇：

不知道是什麼奇異的風，將一棵樹吹到了那邊  
它的彎曲的身體，留下了風的形狀，  
它似乎即將跌進深谷裏，卻又像是要展翅飛翔……

這首詩無疑是詩人的自況，但又不僅如此，它無疑也是全體七月派受難作家的寫照，甚至也可以说，是所有被建國以來一陣接一陣的政治上的「奇異的風」所扭曲，但仍然挺立著掙扎著的苦難者的集體形象。面對這位白髮蒼蒼然而精神矍鑠的和藹老人，心目中胡風分子的猙獰形象頓時崩塌，倒是詫異偉大領袖當年怎麼就偏聽偏信，大加撻伐，將這些曾經為著新中國的誕生而向黑暗勢力鬥爭的進步詩人一網打盡。

當蕭君將我引見給曾的父親時，他已經是曾家的女婿，正在一所大學攻讀經濟學方面的博士研究生。蕭滿嘴的凱恩斯、熊彼得，再不大談托爾斯泰蕭洛霍夫了。蕭夫人也不談，這位在另一所大學攻讀歐洲文學研究生的才女，喜歡談的是薩特、卡夫卡和加繆，只是那小鳥

依人般偎依在夫君身邊的姿態，會使我想起當年在湖藝時那一對相濡以沫的少男少女。

也許是因了類似家庭悲劇，也許是出於對文學的共同愛好，總之，這一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那時就已經同病相憐。我不知道他們倆在一起時，是如何互訴衷腸的，但倆人的親密無間，卻是一目了然。敢死隊的中學生們甚至報告說，晚上發現他倆並肩坐在湖藝附近的江堤上竊竊私語，親熱得很哪，乖乖龍的龍。他們大驚小怪地叫嚷說。不過我知道這種大驚小怪，其實是出乎一種忌妒：曾是出眾的美貌優雅，而蕭矮墩墩的似乎其貌不揚，癩蛤蟆怎麼就偏偏啃到了天鵝肉？惹得一班自認不癩的蛤蟆呱呱地亂叫。

不過「蕭洛霍夫」也確實豔福不淺，有了他溫柔可人的「阿克西妮婭」，這件事不能不使我們豔羨不已，比方我就被弄得想入非非。但是我的「阿克西妮婭」在哪裏呢？

也許，武漢大學中文系的那位叫李婉芝的湘妹子，就是我的「阿克西妮婭」吧。我已經數次到她那裏作客，而對我的每次造訪，她都顯得興奮異常，在我面前喋喋不休的特別有話講，稱我是最能談得來的人。她老是奇怪我為什麼是個工科學生，幾次問我中學畢業時為什麼不報文科。她特別看不起二司的一些頭頭，連大名鼎鼎的楊司令楊道遠都全不放在眼裏。作為二司司令的文秘，她大概是太瞭解她的頂頭上司們的底蘊了，正應了「沒有人會被他的侍僕視為偉人」的說法，雖然李並非那些司令的「侍僕」。

李與我之間談話投機，相處愉快，直覺告訴我李對我有好感。湘女多情，一點都不錯，我等待著有一天，多情的湘妹子向我拋出繡球。然而不久很偶然的聽人說，二司外語學校的頭頭是李的男朋友，原來如此。君子不掠人之美，我只當什麼都不知道好了，何況天涯何處無芳草，豈只有一株「婉芝」？

六月末的一天，我回了華工一趟，見寢室內我的抽屜裏，有一封從華師寄來的信。信封上字跡娟秀，似乎是出自女孩子之手。拆開一看，來信的是一位姓莫的華師數學系的四年級女生。信中首先對我那幾篇轉載在《新華師報》上的論述必須為工總翻案的文章大加讚賞，然後說到她和她的同學們，常在一起議論我的文筆如何如何，傾慕之情

躍然紙上。原來桂子山下，還有此紅顏知己，令我竊喜不已，遂回信一封，並請她以後將信件直接寄往湖藝。不幾天後莫的回信便又飛到了湖藝。如此幾番鴻雁傳書，在我心目中便有了一個溫柔漂亮、嬌淑多情的女孩子的模糊的倩影，但畢竟不識其廬山真面目。終於有一天，莫來信邀我週末前往華師，看一部內部電影，於是心急火燎地等到星期六，欣然赴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馬上就能見到心中的「窈窕淑女」了，那份喜悅自不待言。

東彎西拐，好不容易按地址找到了莫的宿舍。敲開門，屋裏好幾位女孩子一齊朝我望過來，其中一位正在床上鋪整理被褥的女學生正是我要找的莫姑娘。百聞不如一見，眼前這位莫姑娘的形象，與我所想像的相去甚遠，未免使我失望。但我還是盡量不露在表面，既然如約來了，如何好讓對方難堪。莫姑娘卻十分熱情大方，幫我打來晚飯請我吃了，然後陪我前往大操場看電影。放映的影片是蘇聯的「第四十一」，講述蘇俄內戰時期一名紅軍女戰士在執行任務中，如何在荒島上愛上了被她押送的一名白匪軍官的故事。蔚藍的大海、洶湧的海浪、深邃而澄碧的天空、荒涼而寂靜的海島，還有美麗而多情的紅軍女戰士、有著一雙藍眼珠的英俊而有教養的白匪軍官——他們分屬不同的階級、敵對的陣營，他們之間真的能夠產生超階級的愛情嗎？老實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這場電影散場後，我和莫姑娘的故事也就差不多劇終了。

莫一定感覺到了我無可掩飾的失望。她在送我出華師時說：「我不指望我們之間的關係會有進一步的發展。我比你年長好幾歲，長得也不漂亮，又是農村來的，畢業後多半是分配回縣裏做一個數學教師，在窮鄉僻壤度過一生。而你自有遠大的前程，你也不會看得起我。今天約你來，是想親眼見見你這個能寫出『從阿基米德的一句話談起』這樣漂亮的篇章，和敢向堂堂支左辦公室發出挑戰的人究竟是個什麼樣子。現在看到了，也就滿足了。但我看你年輕氣盛，似乎有點目空一切，是不是太驕傲了一點？你的一些文章也鋒芒太露，過於咄咄逼人。常言說出頭的椽子容易爛，你要當心日後摔大跟斗。」

對於莫姑娘的這番真誠的告誡，我那時是頗不以為然的，自然也不會放在心上，但後來的事實證明了她的遠見。所謂當局者迷，旁觀

者清，而我正是典型的當局者迷。我和我們敢死隊的名氣，在江城正與日俱增，我不可能迷途知返。而況有一首名為「鷹與雞」的寓言詩正在造反派中流傳：

鷹擊長空、雞棲於埘。  
 鷹目光遠大，扶搖直上九千里；  
 雞目光短淺，只注意鼻尖下的米粒。  
 鷹胸懷坦蕩、磊落光明、不懼風雨；  
 雞熱衷於「雞鬥」，窩子裏互相扯皮。  
 鷹的性格是戰鬥，雞的性格是投機。  
 雞說：鷹有時也會飛得比我低，  
     ——恬不知恥；  
 鷹說：雞永遠也飛不了我那麼高，  
     ——肅然起敬。

我們這樣的紅衛兵小將，自然無不以鷹自詡，誰願意作抱殘守缺的雞呢？我們寧願像鷹一樣，在搏擊長空的戰鬥中折斷翅膀，也不願像雞一樣，碌碌無為，安於現狀。當時「新華農」的一名學生在一首題為「放開我，媽媽！」的詩裏寫道：放開我，媽媽！/別為孩子擔心受怕。/我不作尋覓殘食的家雀，/終日徘徊在屋簷下；/我要作搏擊長空的雄鷹，/去迎接急風暴雨的沖刷！/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百萬獅]的鐵矛又算得了啥？！……這首詩很能代表我們這些年輕學生的心情，道出了我們的心聲。

的確如此，我們那時個個都是胸懷壯志，豪情萬丈。所謂「活著緊跟毛澤東，死了去見馬克思！」，「只要中國不變色，獻出青春也值得！」就是我們的戰鬥誓言。我們堅定地認為，我們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即使獻出了生命，也是雖死猶生，必將「名垂青史」；而保皇派則必定和他們的走資派主子一起「遺臭萬年」。

記得六月的一個晚上，我們在教室外的涼臺上乘涼時，就曾興致勃勃地議論過這個「青史留名」的問題。我們談到了法國大革命中的雅各賓派和吉特倫派，俄國革命中的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乃至辛亥革命中的革命黨人和保皇黨人。馮天艾十分動情地說，等幾十年後，

如果我們的子孫問起我們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是站在哪一邊時，我們可以自豪地說，我們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是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在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的鬥爭中，我們是帶頭衝鋒陷陣的尖兵。我們無愧於時代，無愧於歷史，我們將贏得子孫後代的尊敬。

當我們說得眉飛色舞、忘乎所以時，附中的高三學生孫彥章用一隻帶了碘鎢燈的135相機，拍下了我們意氣風發的身影。孫的相機是新華工紅司司令部發給他的，學校且供應他膠卷，條件是孫必須定期向學校提供第一手的前線新聞照片。孫對此十分樂意為之，於是我們敢死隊也就有了一名戰地記者。六七月份武漢街頭的武鬥進行得最激烈時，孫彥章深入前線，用他的相機拍攝了大量武鬥的照片：百萬雄師手持長矛向造反派的據點進攻啦，百萬雄師用卡車改裝的裝甲車在六渡橋、江漢路一帶橫衝直撞的場面啦，可惜這些照片日後均已失散，否則都將是彌足珍貴的歷史資料。

說起文革中的武鬥，完全稱得上是一種局部戰爭。在武鬥最激烈的城市如哈爾濱、成都、保定，各種武器包括步槍、輕重機槍、迫擊炮、火箭筒，乃至坦克車、高射炮都使用上了。武鬥中死傷無數，血流成河。六七年的夏天裏，武漢的武鬥也空前激烈，但現代化的武器尚未登場。武鬥雙方持有的武器，大抵是鐵矛和匕首。雖武鬥規模不斷升級，但交戰的武器，始終以此類「冷兵器」為主。

據《武漢市志(大事記)》載，1967年6月17日，漢口六渡橋發生兩派組織的大規模武鬥。6月24日，漢陽軋鋼廠、武漢水運學院和漢口友誼街等處，連續發生大規模武鬥。

六月十七日所發生的武鬥，又稱「六一七血案」。是日百萬雄師為形成對造反派的據點「民眾樂園」的包圍，與造反派在「民眾樂園」附近的財貿大廈，進行了一場空前激烈的武鬥。百萬雄師出動了數千名全副武裝的戰鬥人員，形成對數百名造反派的絕對優勢，百萬雄師一方且受到部隊實際上的支援。武鬥從十七日傍晚，一直持續到次日上午九點，長達12小時。造反派死十數人(一說數十人)，傷者不計其數。

六月二十四日，二司控制的武漢水運學院，遭到百萬雄師的攻打。百萬雄師在攻打中，首次使用了由卡車改制的裝甲和投擲了大量

汽油彈。這一天造反派在漢陽的唯一據點漢陽軋鋼廠，也被百萬雄師包圍，數名漢軋造反派工人喪生在百萬雄師的長矛之下。同日，百萬雄師血洗位於友誼街的工造司令部所在的大樓，使用了噴火器和汽油彈，多名工造成員被殺。始終處於攻擊地位的百萬雄師在武鬥中幾無傷亡可言。

在百萬雄師對造反派發動全面進攻，血洗造反派各個據點的這段時間裏，我們敢死隊從湖藝發出過若干篇關於武漢形勢的評述。其中馮天文撰寫的一篇題為「武老譚再打下去……」的文章，對局勢的分析頗具代表性。文章說：

再打下去，陳再道就陷得更深了，套在他脖子上的絞索就會勒得更緊。再打下去，更多的人會在血的事實中認識陳再道的真面目。他們或遲或早會從各個方面支持造反派，整個社會輿論會越來越對造反派有利。再打下去，將會出現暫時的割據狀態，市內的交通肯定要中斷，商店自然要停業。而一旦造反派也像百匪一樣武裝起來，百萬雄師就會將武器升級而動用軍火，這樣一來，四川的局面就會局部在武漢出現。

再打下去，武漢就要鬧大了！一旦「九一三」被迫全面停產，全國重工業基礎之一的武鋼就會癱瘓。鐵路上的戰鬥隊員將被迫舉行二七時代那樣的大罷工，整個京廣線就會癱瘓。長辦聯司與工總水上分部如被迫停航，長江全線航運將會中斷——貫穿祖國東西南北的兩大交通樞紐——長江、京廣線一旦中斷，勢必造成全國性的影響。武老譚膽敢走到這一步，就必然自取滅亡。

撇開馮氏所持的立場不說，文章多少點出了武漢問題的要害。武鬥繼續擴大下去的嚴重後果是明擺著的，為了穩定大局，中央必須對武漢的問題表態。六月二十六日，即「六一七」和「六二四」血案發生之後不到幾天，以中央文革辦事組和全軍文革辦公室的名義發給武漢軍區的一份電報指出：「最近，武漢市發生的大規模武鬥，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漢軍區立即採取有力措施制止武鬥。百萬雄師一些人對若干院校和工廠的圍攻應立即停止。殺害革命群眾的兇手應按照中央『六六通

令」嚴肅處理。不久之後，中央將請武漢軍區和各派群眾組織的代表來京彙報。」這封中央來電拯救了武漢造反派，此後二十來天江城無戰事，造反派逃脫了因百萬雄師的血腥殺戮而全軍覆沒的命運。

百萬雄師在受到中央批評後萎靡了幾天。但百萬雄師也真有辦法，他們反面文章正面做，在全市刷滿標語，稱「六二六通電是中央文革對百萬雄師的最大關心、最大愛護。」為了證明這種「關心」和「愛護」的合理性，他們公然造出謠言，說毛主席有一最新指示，說「百萬雄師大、好、純，是個創造」，而軍區也居然睜隻眼閉隻眼，聽任百萬雄師造謠。不過這也是可以理解的：軍區所屬的一支獨立師8201部隊，本身就是百萬雄師的一部分，它當然愛聽「大、好、純」這種話了。其實「大、好、純」是沒有的，「是個創造」倒有點像：以部隊指戰員身份，整體加入某一群眾組織，在文革中倒也是絕無僅有的一個創造。

中央「六二六」來電之後，造反派保守派和軍隊方面都在積極準備材料，以便赴京彙報，也就是準備在談判桌上一決雌雄。但是在七月十三日這天的深夜，湖北大學的學生在大字報欄前，看見了謝富治副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王力的身影，於是「中央代表到達武漢並在湖大觀看大字報」的消息，一夜之間傳遍全城。

七月十四日，各路造反派開始上街遊行，歡迎中央代表的到來，同時也是借此向百萬雄師示威。七月十五日，「新華工」大隊人馬從學校所在地關山口出發，徒步遊行數十里，經武昌、漢陽直達漢口。我和我們敢死隊的隊員等在武昌閱馬場路口，歡迎學校的隊伍經過。只見同學們意氣風發昂首闊步，行進在大街上，其中一部分作為戰鬥部隊的同學頭戴鋼盔，肩扛長矛，威風凜凜，神氣十足，特別引人注目。我們敢死隊有幾名附中學生按捺不住，也舉著敢死隊的旗幟，插進了遊行行列。

然而這天傍晚就傳來了可怕的消息：「新華工」的這支遊行隊伍，在行進至漢口武勝路電車公司大門附近時，突遭埋伏在電車公司院內全副武裝的百萬雄師的襲擊，學生們傷亡慘重，據說至少已有十人斃命。

我聞此噩耗驚得目瞪口呆。百萬雄師的兇殘狠毒，我是早有所聞的，但居然如此殘忍地向遊行的學生大開殺戒，還是遠出於我意料之

外。據事後百萬雄師方面解釋，他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華工的學生們在遊行經過電車公司大門時，喊了「打倒陳再道」、「打倒保皇派」、「解散百匪」等挑釁性的口號。那末就算是這樣吧，難道就可以成為百萬雄師向稚嫩的學生們下毒手的口實？何況百萬雄師的殺手們，是早已埋伏在遊行隊伍必經之路的電車公司大門之內的，可見是預謀。

中學時讀過魯迅先生的文章《紀念劉和珍君》，文中說：「可是我實在無話可說。我只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四十多個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圍，使我艱於呼吸視聽，那裏還能有什麼言語？」原以為先生所說的「並非人間」已是永遠過去了的歷史，哪裏會料到歷史竟會重現。我就特別擔心我們敢死隊那幾個中途加入了遊行隊伍的附中學生的安危。好在那天晚上那幾名附中學生，都毫髮無損地返回了湖藝，只是他們帶去的那桿敢死隊的旗幟，早已不知所終。

「七一五血案」後，就聽說周總理、謝富治副總理，以及王力、余立金等人，在軍區接連召開會議，討論武漢局勢，總理在會議上作了重要講話，傳達了毛主席對武漢問題的重要指示。然後又聽說王力、謝富治在武漢空軍副司令員劉豐的陪同下，前往水利電力學院視察，並向教職員工和造反派學生，發表了公開演說。王謝在演說中代表毛主席黨中央表示，「堅定不移地支持武漢地區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指出「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同志受壓抑、受打擊的現象是不允許存在的，這種現象要叫它一去不復返！」，旗幟鮮明地站在造反派一邊。

王謝的講話很快就傳遍了武漢三鎮。而造反派翻身的一個明顯的信號，是自三月以來就被囚禁的工總負責人朱鴻霞、胡厚民等人已經放出來了。由於中央的介入，形勢迅速向有利於造反派的方向逆轉，造反派個個忘乎所以，準備彈冠相慶。然而百萬雄師又豈是省油的燈，他們針對造反派滿街貼的擁護王謝講話的標語，貼出諸如「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反對欽差大臣下車伊始哇哩哇喇」以及「強烈要求王力、謝富治到工農群眾中去」、「強烈要求王、謝首長下連當兵」等大標語，矛頭直指王謝二位「欽差大臣」。不過我們當時對這些標語並不怎麼在意，僅僅視為保守派方面的困獸猶鬥，泥鰍翻不起大浪。然而我們這回估計錯了，一場駭人的政治風暴，正暗中拔地而起。

西元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

武漢三鎮一早就像開了鍋似的鬧騰起來，幾百輛大卡車滿載著「百萬雄師」、「公檢法」和軍區的戰士，排成四路，沿街進行武裝遊行示威。其聲勢之浩大，為建國以來所罕見。車上的高音喇叭，不斷地狂呼「王力的四點指示是大毒草」、「王力滾出中央文革小組」、「打倒王力」、「王力滾出武漢」等口號。百萬雄師的宣傳車在照例反復播放毛主席詩詞「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時，還破天荒地播放起「造反有理」的語錄歌。看來以「百萬雄師」自稱的保守派，這回是要大造一回反了。

但保守派造反，畢竟底氣不足，需得依託一點什麼才好，於是除了早已炮製好的那則「百萬雄師大、好、純，是個創造」的「最新最高指示」外，又造出了一條更新的「最高指示」，稱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四大發現：一、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二、紅衛兵；三、上海一月革命；四、武漢的百萬雄師。前後兩條「最高指示」，編排得有鼻子有眼的，自然令廣大百萬雄師的群眾備受鼓舞，而鬧騰得越發的起勁。但百萬雄師的核心領導層則並不樂觀，他們比誰都清楚，這二條「聖旨」純屬子虛烏有。此次孤注一擲，倘擲不成功，免不了要背上「欺君」的罪名。所以他們背地裏的佈置是：必須揪住王力以取得主動，迫使總理親自出面和百萬雄師談判，同時牢牢控制住局勢，保證每天有20萬以上的百萬雄師群眾上街示威，以迫使中央對武漢問題重新表態。據不完全統計，百萬雄師在20日那天，出動卡車計482輛，21日出動計900餘輛，22日出動的車輛更多達1500輛。這中間「公檢法」表現突出，連續出動了大批警車和消防車，車上的警報器尖銳而刺耳，營造出一種特別恐怖的氣氛。

七二〇那天，我們躲在湖藝整天不敢上街。外面太亂，形勢不明，只聽說百萬雄師在街上到處殺人，還聽說百萬雄師和8201部隊包圍了軍區，正在四處搜索王力。所有的車站碼頭，都有百萬雄師的重兵把守，通往各專縣的公路要道，都已被百萬雄師封鎖，就連機場也都為百萬雄師所控制——所有這些傳言，都使我們斷定百萬雄師和8201部隊在武漢正在實施一次「叛亂」。好不容易捱過一夜，第二天形勢愈加嚴峻，百萬雄師在遊行示威經過閱馬場時，再次血洗了新湖大。新湖大校園的牆壁上滿布彈痕，有五六個造反派群眾，倒在百萬

雄師的長矛之下，近二百名學生，被百萬雄師抓走。百萬雄師還揚言要拿下造反派的最後據點新華工，有消息說8201轄下的一支工兵部隊已接到命令，將前往華工掃雷，因為新華工紅司司令部早已宣佈在校園大門內，已佈置了「雷區」，以阻擋「百匪」的進攻。據說華工園內正在堅壁清野，除留下一支數十人的基幹民兵死守大本營外，全體師生都將疏散出校，以減少傷亡。總之，形勢萬分危急。

我們敢死隊在湖藝全面地分析了已收集到的各種情報，認為百萬雄師已是最後的瘋狂，眼下不過是「黎明前的黑暗」，目前最重要的事，是收集取證「叛亂」的第一手材料。敢死隊隊員應當化整為零，走出湖藝，人自為戰，分頭取證，然後回湖藝匯總，設法直接報告中央。而就在我們連夜籌畫佈置下一步的行動時，駐紮在湖藝隔壁的一支屬於公安部門的消防中隊的「百萬雄師」的小頭目，突然派人來，請我們去幾個人跟他們談談形勢。這個消防中隊，是「老保」的一個窩子，作為近鄰，與我們倒也一向彼此相安無事。七二〇這天，消防中隊自然也少不了開著消防車，上街遊行示威，搖旗吶喊一番。但畢竟知道是在與中央對抗，眼見事態鬧大了，不可收拾，「老保」們自不免心裏發虛，不少人都想給自己留一條後路。這個消防中隊的頭頭突然找我們去談，無非就是出於這種考慮。而我們中間對於過不過去談，卻也是有爭議的。反對過去談的，主要是擔心對方有陰謀，是擺「鴻門宴」，人去了會回不來。但我和馮天艾等幾個主要負責人則認為，對方請我們去談，是想瞭解形勢，決定自己的去向，目的是替自己尋出路。扣人的可能性有，但不大。權衡一番利害之後，還是決定去談。為防不測，也作了些應變的準備：如果一小時不見人回，留在湖藝的隊伍就要到隔壁要人。為保證我們的安全，同住在湖藝的一位叫吳昌青的機床附件廠的造反派頭頭，腰中暗插了一把匕首，陪同我們前往。

我們一行四五個人，來到消防隊的頭頭的辦公室。對方幾名頭頭腦腦已在恭候，客氣一番後便開談。我們自然是向對方「曉以大義」，說王謝是中央派來解決武漢問題的，當然就是代表中央。而周總理在武漢軍區高級幹部會議上的表態，和王謝的表態是一致的，應該是代表了中央的意見。因此將矛頭指向王謝也就是指向周總理、指向毛主席。

席、指向黨中央。至於想用武裝遊行示威的方式，來逼迫中央改變對武漢問題的表態，那更是癡人說夢。歷史上的張國濤曾經擁有重兵，也未能鬥得過中央，百萬雄師這樣的烏合之眾，又怎麼可能逼中央就範？現在武漢問題既然鬧得如此驚天動地，中央必然很快就會公開表態。像百萬雄師這樣矛頭直指中央的武裝遊行示威，文革以來全國都尚未有過，性質極為嚴重，就是定為武裝叛亂，也絕不過份。一番話說得消防隊的「老保」們目瞪口呆，連連點頭。

我們最後奉勸他們，趕緊懸崖勒馬、反戈一擊，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上來。切勿執迷不悟，愈滑愈深，到頭來給陳再道當殉葬品。在我們說話時，辦公室不時有人出出進進，有幾個人對著我們橫眉怒目，嘴裏還罵罵咧咧，估計是幾個「鐵杆」。為防不測，那幾個頭頭趕緊送我們出門，我們也就連忙開溜。出門後，擔負保衛重任的吳昌青師傅說，他一見屋子裏氣氛不對，就靠牆摸了根鐵棍，作好了準備。一旦有人動手，他便要掄起鐵棍，來掩護我們撤退。吳師傅據說練過武功，平時喜好舞槍弄棍，至於是真有兩下子功夫，還是花拳繡腿空有一付架子，我們可是弄不清楚。好在此番深入虎穴，有驚無險，吳師傅也可惜沒有機會施展他的好手段。

第二天也就是21號，我們敢死隊按計劃全體出動上了街。我自己也帶上長征時用過的那架「蔡司」相機，在兩位附中學生的保護下，深入一線，抓拍「百匪叛亂」的實況。我們先後在大東門、閱馬場、司門口一帶，躲在馬路邊的建築物旁或通過臨街的窗子，攝下一張張百萬雄師武裝遊行特別是武裝攻打湖北大學的照片，將成百上千的百萬雄師武鬥隊員頭戴柳藤帽手持長矛，吶喊著在改裝的裝甲車的掩護下衝向湖大的大門，刀光劍影中忽地又殺向湖大對門的湖北圖書館等等血腥場景，一一攝進鏡頭之內。

拍過一卷膠卷後，我換上一卷膠卷，又和附中學生一起轉移到武昌橋頭，拍攝百萬雄師車隊開過引橋的「浩蕩場面」：一輛接一輛的卡車緩慢地行進著，手持長矛的「百萬雄師」們站在車上一面高呼口號，一面揮舞著部隊發給的槍支耀武揚威。一些掛有軍牌的軍車上，則擠滿了全副武裝的8201部隊的士兵，好些士兵胳膊上還佩戴著「百萬雄師」的袖標。我擠在圍觀的人群裏，用相機對準這支隊伍不斷地按動快

門，很快就照完了一卷。正待換膠卷時，隨我一道的一名附中學生突然擠過來，用胳膊猛碰我一下，緊張地說：「快走，暴露了。」我掉頭一望，不遠處一個頭戴鴨舌帽、罩一付墨鏡的「密探」，正在招手招呼幾名手持長矛的「柳藤帽」，悄悄向我逼過來。我來不及多想，拔腿就跑，身後幾名「柳藤帽」揮舞著長矛，緊追不捨，情勢萬分危急。好在我是跑「百米」的出身，區區幾個毛腳腿子，哪裏是我的對手。但是不好了，我慌忙中急不擇路（其實也無路可擇），跑到了大橋引橋旁一段陡峭的崖坡邊。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吾命休矣！就在「柳藤帽」們將要追上我時，我一咬牙閉上眼睛抱緊相機，順著陡崖滾下幾丈高的引橋。橋下是一小巷，我忍著全身劇痛，也顧不得懷裏的相機已經摔得四分五裂，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頭闖進巷內的一家民宅，就撲倒在地上，一動也動不得了。

關於「七二〇事件」※19，其實無非是「百萬雄師」不滿於中央將其定性為「保守組織」而非「革命組織」，為改變自己所處的不利地位而進行的一次不計後果的反抗。這一事件在當時是被中央林彪、江青等幾個人，定性為「反革命暴亂」或「反革命兵變」的，公開的提法則是一次「嚴重的政治事件」（見《紅旗》雜誌1967年第12期社論）。陳再道自然是「叛將」，但毛主席對他手下留情，在處理「七二〇事件」的諸多文件中，凡提陳再道名字處，毛主席均親筆加上「同志」二字，並且說：「陳再道要保護起來，留下人頭好辦事。」（見權延赤《微行——楊成武在1967》一書）。按照陳再道多年後對這一事件的回憶，他並不是事件的策劃和操縱者，他只是無力阻擋百萬雄師的過激行動罷了。他甚至因不贊成下面的行動方式，而被保守派視為「投降派」。在「七二〇事件」已被平反並受到「高度評價」的情況下，陳並不以功臣自居，而如實回憶事件的真相及自己當時的實際想法，的確難能可貴。而在二十多年後北京的「六四」風波中，在一份由張愛萍等七名高級將領簽署的與決策者意見相左的條呈上，赫然就有陳再道的名字，倒使我頗感意外。

現在還是回到七月二十一日那天我死裏逃生的「之後」來吧。我那時滾下陡坡，一頭闖進的那戶人家，正是一家子的造反派，我於是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和照料。這家人很快就跑到湖藝，帶來了敢死隊的幾名隊員。大家的意見是此地不好久留，須馬上將我轉移，以避開百萬

雄師可能進行的搜捕。但是往哪裏去最方便最安全呢？大家一籌莫展。我忽然靈機一動說，抬我去曇華林，找施教授。敢死隊的同學們於是找來了輛自行車，將我扶坐在車後的支架上，揀僻靜的小街小巷走。左拐右拐，我被送到了曇華林的華中村。

正是傍晚時分，依然是那座爬滿青藤的小樓，依然是青磚紅瓦，苔蘚掩壁，屋後的天空火燒雲燃得正旺。但是如此危險的境況下，施教授一家還敢接納我麼？忐忑不安之中，見屋前一位正搖著芭扇納涼的長者顫巍地立起身來，驚訝地打量我們這一行不速之客，終於目光落在我的臉上。我定睛一看，這位長者正是施教授，只見施教授輕輕地「啊」了一聲，然後將芭扇向樓內一揮，說快進屋。我於是同伴攙扶著，上了施教授一家居住的二樓——其時居室已有一半被瓜分給了「革命群眾」，留給施教授的僅有兩室一廚。但是施教授及夫人不管居室是如何狹窄擁擠(除大女兒上北大讀書外，家中尚有一子二女)，更不管收留我可能帶來什麼麻煩，慨然將我留下。

我整天就躺在施教授的床上，施夫人親自為我熬藥煮湯、端水送飯。施家幾個讀中學的子女，更是視我為「英雄」，成天圍著我打轉。施教授一家如此古道熱腸，恩重如山，古人云：「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可我能報答他們什麼呢？一年後我被打成反革命下獄後，施教授一家竟以「窩藏反革命」的罪名橫遭迫害，幾個子女亦因此在下放農村後長期不能返回。嗚呼，如此殃及無辜，也實在是非我所能預料的。我那時只是對施教授一家對我的厚愛，心存萬分的感激和不安，同時也有些提心吊膽。因為距華中村不遠處，就有百萬雄師的一個據點，據點裏的「柳藤帽」們倘若進村「掃蕩」，掃出了我這個「傷兵」，那可如何是好？

但施教授似乎並不擔憂這些，他照樣若無其事地與我說古論今，談家常。通過深談才知道，施教授早年在湖南念大學時的恩師暨岳父，乃是國內文學界的泰斗，大舅子更是才高八斗，年輕時寫的一本小說《圍城》，曾風靡海內外，可惜解放後已成絕版。施夫人那一姓乃無錫望族，族中出過不少名人，中共黨史上的那位領袖人物博古就是施婷婷的表舅。談及家世，施教授忽然笑問道：「不久前在街上見過一份傳單，說你母親是外國人，是搞間諜的，究竟怎樣回事？」

我一聽就笑了，這份傳單我也見過，說我這個造反派的黑筆桿子出身大地主大資本家的家庭，父親是國民黨的高級軍官。母親更邪乎，高鼻子黃頭髮，是國外派遣的高級間諜。還說我家有一部可從事間諜活動的袖珍相機，只有粒麻將大，可以從褲襠裏往外偷拍照片……云云。謠言自然是造得過於拙劣，不值一駁，但我家的一些親戚朋友甚至鄰居都忿忿不平地替我四處闢謠，連我的一個在漢陽一家商店工作的鐵杆老保的姑爹都氣憤不過，罵那些印傳單的人，是狗咬雞巴瞎扯蛋。不過也有一些不太熟識的「戰友」，見到我時十分認真地問我，你母親真是外國人麼？是哪一國的？還問我能不能把那架可以從褲襠裏往外拍照的袖珍相機拿出來，給他們見識見識，弄得人簡直哭笑不得。施教授聽我說後直是搖頭，感慨「曾參殺人」，「三人成虎」，著實人言可畏。我們又談到中央派到武漢來的幾位大員，怎麼就音訊全無了呢？莫非都已遭了「百匪」的暗算？局勢究竟將如何發展，心裏也實在沒有底。

然而到了23日這天，一清早氣氛就與往常不一樣。首先就是窗對面遠遠高掛在電線桿上的百萬雄師的高音喇叭，到了六點鐘竟不照例播放「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的語錄歌了。不但不放，連一點聲音都沒有，令人十分詫異。更令人吃驚的是百萬雄師據點所在的那棟樓頂上，那面耀武揚威不可一世的旗幟，竟然也不知何時降下來了。施教授說這倒是有點像抗戰勝利那年，日本人投降的味道。正叫人費解之時，從遠處隱隱約約傳來一陣廣播聲，好像是說謝副總理、王力同志什麼的。忙打開收音機，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正在播送一篇消息，說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黨中央派來處理武漢問題的代表謝副總理、王力同志等，已於七月二十二日下午由武漢乘專機光榮地回到北京。中央領導同志周恩來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同志，以及三軍指戰員和數萬革命群眾到機場熱烈歡迎，等等。原來如此，難怪百萬雄師突然偃旗息鼓，是風向大變了。

不久就聽見窗外鑼鼓大作，造反派群眾都上街載歌載舞地狂歡起來，還有不知從哪裏突然冒出來的陸海空三軍指戰員，也舉著和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團結在一起勝利在一起戰鬥在一起的旗幟，匯進了遊行的洪流。這之後便是北京舉行熱烈歡迎謝富治、王力「從武漢勝利

地、光榮地回到北京、回到毛主席身邊，最堅決地支援武漢地區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有百萬軍民參加的盛大集會。然後就是全國各地的造反派戰友和革命群眾，串連到武漢來「取經」和表示「聲援」。

武漢事件的解決一時受到極高的評價，被稱為可與上海「一月革命」風暴媲美的「七月革命」或「七月風暴」。7月25日，馮天艾寫了篇題為《論劉少奇的中原失守》的文章，竭力渲染解決這一事件的戰略意義：

九省通衢的極端重要的地理位置，決定了武漢問題的解決，將馬上打斷湘渝蜀各省軍內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在交通上的聯繫。武漢控制在革命造反派手中，無疑於在階級敵人心臟插上了幾把尖刀，動脈血管馬上因心臟的破裂而癱瘓。反革命陣線的互相接應現在已經十分不容易了。

從奪權史上看，上海「一月風暴」還僅僅只是揭開奪權鬥爭的序幕。從「政權的根本問題是軍權」這一點來說，只有現在在武漢地區由七二〇事件所引起的「七月風暴」，才是奪權鬥爭的真正展開。將軍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一點決定了一切。

馮氏的這篇文章，不妨說是對他自己六月份寫的那篇題為《武老譚再打下去……》的文章的呼應，都是格外強調了武漢地區在全國舉足輕重的「戰略地位」。新一點的提法就是「七二〇事件」證明了「軍權」絕不能落在「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手裏，一定要奪過來。事實上「七二〇事件」後，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揪軍內一小撮」的高潮。八月初出版的一期《紅旗》雜誌，發表了題為《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的社論，無疑是對「揪軍內一小撮」的潮流推波助瀾。武漢作為「七月革命」的誕生地，成千上萬的學生和工人被派往全國各地傳經送寶；各地的造反派也蜂擁而至，前來「取經」，一時頗為熱鬧。

施婷婷也從北大返回了武漢，她屬北大與聶元梓掌舵的「新北大公社」對立的「井岡山」一派。施婷婷說北大師生都戲稱聶元梓「老佛爺」，據說聶元梓也正像「老佛爺」慈禧太后一般，深居簡出，難得在群眾中露一次面。偶爾出來一下，也是前呼後擁，八面威風。施還說聶元梓整起對立面來惡毒得很，心狠手辣，毫不留情，比慈禧太后還厲

害。反正從施婷婷那裏聽來的「聶元梓」，與我們印象中的那個「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對不上號。在我們眼裏，聶元梓可是北京五大「學生領袖」中的「首腦」啊，怎麼會變成「老佛爺」了呢？

但施家住的地方本來就狹小，施婷婷一回來就更顯小，我是不好再呆下去了。好在身體已復原大半，於是告辭，回湖藝繼續養傷。回到湖藝，只見學校裏住滿了各地來漢聲援和取經的學生。所謂「聲援」、「取經」，其實也無非是各地的學生借此機會，免費來武漢吃喝玩樂一趟罷了。我相信那時倘有免費去國外「聲援」資本主義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機會，大家也都是要爭相出國去聲援的。其實這種「聲援」毫無意義，有些「登徒子」還趁此機會到處沾花惹草。例如到湖藝來搞所謂「聲援」的一名上海音樂學院的大學生，不到兩天，就將湖藝一名拉小提琴的女學生「聲援」上了床。結果是這個大學生挨了一頓合力的痛打後，被驅逐回了上海。不過湖藝的學生也未必是嫉惡如仇，維護風化，他們只是惱火肥水灌了外人田。

回湖藝養傷的這段時間裏，我特別地輕鬆自在。在湖藝那些「鋼二司」的學生眼裏，我這個走路一拐一拐的跛腿，似乎成了「七二〇」中的「抗暴英雄」。這當然是高看了我，我何曾「抗暴」過了？又能「英雄」到哪裏？但我還是有點飄飄然，常常對慕名而來的學生，吹噓「七二〇事件」時，我是如何「深入敵後」，拍攝「百匪叛亂」的鏡頭，以及如何在被「百匪」發現後拼命狂逃，急不擇路地從大橋幾丈高的護坡上滾下去，總算免於一死的「驚險」故事，吹得那些毛娃娃們眼睛一眨一眨的直伸舌頭。

閑得無聊時，我就和馮天艾一起去湖藝的排演室，看湖藝的學生排練節目。湖藝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是很有名的，「七二〇」前就常常深入「抗暴前線」表演歌舞，宣傳「文攻武衛」，我就曾經在漢口六渡橋「民眾樂園」前，見過他們的演出。那天湖藝宣傳隊的一位身著草綠色軍裝的女孩子，英姿颯爽地站在街頭，指揮宣傳隊的隊員，高唱一首威武雄壯的戰鬥動員曲——「在需要犧牲的時候」：

在需要犧牲的時候，要敢於犧牲，包括犧牲自己在內，完蛋就完蛋。上戰場，槍一響，老子下定決心：今天就死在戰場上了！

據說這支歌的歌詞，是解放戰爭期間林彪在東北戰場上一次戰前動員會上的一段講話。林彪這段話自然氣概非凡，湖藝學生的譜曲也極其慷慨激昂。歌曲一下子就在造反派中流傳開來，從武漢一直傳遍全國，成為文革中流傳甚廣的一首「林彪語錄」歌。

在湖藝住了一陣，我的腿傷漸漸好轉，但走路仍不利索。有天下午我正在住處看份小報，「敢死隊」一個初中生忽然來到我跟前，用嘴貼著我的耳朵，很神秘地問我想不想弄幾本好書看？我問他書在哪裏？他說湖藝的圖書館裏頭儘是好書。我說他們學校的圖書館不是早就閉了館，連門都封死了麼？他說圖書館背面有扇窗子，沒有關牢，可以撬開翻進去。我正愁沒有書看，就跛著個腿跟著他出門。

到了圖書館後面；那個初中生撬開窗子，幫我翻了進去，然後自己也翻將進來。進得館內，只見裏頭果然藏書十分豐富，叫人目不暇接。書太多了，我們就專門在堆「舊書」的幾排書架裏頭翻，發現有排書架的最下面，有本16開大小的硬殼書，用牛皮紙包得嚴嚴實實的。我們就好奇地打開來看，原來是本外文版的人體攝影畫冊，精美極了，上面全是千姿百態的金髮女郎的全身裸照。我們幾時見過這種東西，眼睛都看直了。一頁一頁地翻過去，還沒翻過一半，就聽見大門外人聲大作。從窗子裏頭望出去，外頭有幾十個湖藝的學生，手裏拿著棍子之類的東西，堵在大門口大聲叫嚷著「抓小偷！」

我知道事情搞糟了，被人當成了偷書賊。想從後面的窗子再翻出去，腿不利索，何況就是翻出去了，也仍會被當做偷書賊給逮住。我橫下心，乾脆就若無其事地拿本書在手裏看。門從外面被打開了，學生們正要衝進來「拿賊」，一看是我在裏面，都很意外，放下手裏的棍棒，苦笑說原來是敢死隊的魯隊長，誤會了、誤會了！然後紛紛散去。湖藝的紅衛兵頭頭彭水清走過來說，下面的學生報告說有人翻圖書館的窗子，我們還以為是外面的小偷呢！不好意思。我說是不好意思。彭笑著拍拍我的肩膀說，魯克思，要看什麼書，只管給我打招呼，我讓下面人給你開門就是。你腿是受了傷的，翻窗子太危險！說得我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簡直恨不能有個地縫可鑽。

我這個「魯克思」在湖藝學生面前丢了回大臉，湖藝這地方，是不好意思再呆下去了。過了幾天，我便帶著敢死隊撤出了湖藝。有一段

時間，我就住在原田徑隊教練蕭老師的宿舍裏養傷。蕭老師不知從哪裏弄來了一瓶虎骨酒，要我每晚一杯喝了治病，還請了一位懂氣功的師傅，對著我的骨折處比劃了一通。那氣功師「發功」之後，將我肩膀一拍，說「沒有問題，包好。」「包好」那是自然的，年輕骨嫩，還愁好不了嗎？氣不氣功一下，其實無所謂的。閒時倒是愛聽蕭老師講學校裏發生的事情，其中最驚心動魄的，就是他們體育教研室的青年教師黃興漢，在七一五那天遊行至電車公司門口時，被「百萬雄師」七八個打手圍起來殺害的慘事。「真是慘哪！」蕭老師歎息說，「四五根矛子把他的上身都捅得蜂窩似的儘是洞洞，擋了一天，人沒斷氣就被百匪活埋了。可憐他新婚不久，妻子就是學校醫院的齊醫生，她現在提不得丈夫，一提起來就痛不欲生，弄不弄就昏了過去，叫人不忍目睹。」「聽說院裏準備給小黃他們幾位七一五事件中的死難者立一座紀念碑。」旁邊另一位老師說，大家也就感歎唏噓了一番。我則不但傷感，而且後怕。我很清楚七二一那天，我若不是冒險從大橋護坡上滾下，也必死在百萬雄師的矛下無疑，此刻也早已是黃泉路上的冤魂。

不久我的傷病痊癒，我又回到我們敢死隊中。敢死隊從湖藝搬出後，又另找了個位於武昌首義路的「省委幹校」駐紮下來。其間馮天艾已結識了工總宣傳部長田國漢，由田引見我們與已釋放出來的工總主要負責人朱鴻霞、胡厚民，以及先期出獄的夏邦銀等見了面。這些被稱為「工人運動領袖」的頭頭們，此時已是萬眾矚目的大人物，受到重重保護，普通群眾想見上一面也不易，但我與馮卻是他們的座上客。朱鴻霞等人早已從田國漢那裏，看到我的那篇向武漢部隊支左辦公室挑戰的大字報，讀過我為他們工人戰鬥隊翻案的文章。他們知道有我們這樣一些學生，在他們身陷囹圄時為他們翻案、為他們吶喊，自然是感動不已。他們稱我們是同生死共患難的戰友。

「我們各革命造反派組織，準備發起成立一個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朱鴻霞對我說，「邀請你們新華工敢死隊也派兩名代表參加，希望你本人前來參加籌備工作。這件事至關重要，請放在第一位考慮。」

我們很快就從田國漢那裏知道，這個擬議中的「聯合指揮部」，將是未來的省市權力機構的雛形，而我的位置，似乎就在「宣傳部」這一

檔裏。我所在的「新華工」，還有「新華農」、「新湖大」以及「工造總司」等「新派」組織，也都由工總在其中安排了一定的位置。但「新派」對這個以「鋼派」為核心的「指揮部」反應冷淡，而且好像也在籌畫成立另一個以他們為中心的什麼指揮部。我於是有一種預感，「一月奪權」時的權力之爭將重演，同室操戈將再現。而我此刻作為已被新華工紅司司令部逐出，又因力主為工總翻案而受到「鋼派」青睞的所謂「新華工中的鋼派」，在將要爆發的「鋼新之爭」中，恐怕只能是站在「鋼派」一邊。所謂「嘂其鳴矣，求其友聲」，大抵如此。

然而我畢竟又是新華工的學生，而況新華工的頭頭們在七二〇後，已經向我伸出了橄欖枝，準備重新接納我為紅司的一員。並且有口信說在未來的院革委會中，將留我一個常委的位置。我雖然對進不進紅司新華工無所謂，對什麼常委不常委也無多大的興趣，但無論如何，我都不想和學校裏的同學搞「窩裏鬥」，所以並不熱心進那個「聯合指揮部」。

其實工總搞的那個「聯合指揮部」，我清楚也多半是個空中樓閣。不要說「新派」不與之合作，就是「革命幹部」和「軍隊代表」有一方不與之配合，它就永遠只能是吊在天上。我自然不便對朱鴻霞胡厚民說破這一點，只是派了隊裏一名姓張的大學生和兩個中學生，去這個指揮部的籌委會當觀察員。

朱鴻霞和胡厚民對我不去「聯指」頗感失望，但仍對我禮遇有加。八月份在歡送首都南下造反大隊的紅衛兵戰友返京的大會上，他們邀請我登上武漢劇院的舞臺，代表新華工「敢死隊」致歡送詞。七年前也正是在這個舞臺上，我曾代表學校，參加過中學生文藝匯演，和同學表演過一段「雙簧」。而這一次我在臺上的「表演」更神氣了，而且中央一家新聞單位還現場進行了錄相。「三鋼」、「三新」各路造反派的代表也紛紛上臺致辭，然後照例是文藝界造反派的歌舞表演。演員們在舞臺上是如何歌、如何舞、如何頌揚偉大領袖及其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如何歌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實在都已無甚印象了，唯有一位漂亮的舞蹈女演員令我怦然心動，許久不能忘懷。

我那時致完辭後，是站在舞臺一側的幕後，距這位女演員很近，驚歎這世上竟有如此絕色的美人，真所謂翩若驚鴻、婉如游龍，不像

是塵世中人。記得文革初期有一則揭發王任重「思想腐朽」的材料，說的是王在一次和南京部隊某歌舞團的一位女演員跳過舞後，感慨說能娶上這樣漂亮的女子為妻，則此生足矣。王「好色」自然是無疑的，但並沒有材料證明他淫亂，似屬「好色而不淫」一類。他的那番感慨，也只能說是愛美之心人皆有之的自然流露，比起那種滿口仁義道德而骨子裏荒淫無度的人，不知「君子」到哪裏去了。我那天癡癡地盯著那位美人胚子，也暗自感慨，哪一天若能有如此美貌的女子「紅袖添香夜讀書」，那也可謂不枉此生。

也許正是因為心存奢想志在天鵝肉，我對我身邊一些對我頗具好感的女孩子都不屑一顧，統統視之為醜小鴨。她們中有一位姓劉的中學生，對我尤其鍾情，但我一點都沒有把她放在心上。這位女學生剛滿十八歲，父親是市裏的一名局級幹部。既是局級，自然是「走資派」或「准走資派」，而這位「走資派」的女兒，偏偏又喜歡看我寫的造反文章。不僅愛看，她還下功夫把我文革中寫的文章盡數搜集，並且手抄了一大本，這倒使我有點感動。

後來有一天，小劉帶了本她的私人相冊給我看。我在相冊中發現好幾張她在田徑場上訓練和比賽的照片，還有她和一群男女中學生選手和省田徑隊的短跑名將殷正德的合影照。一問才知道，這個貌似文弱一臉羞答答的漂亮女孩子，竟是市中學生業餘體校的短跑運動員，殷正德便是她們的教練。再問得知她還是六五年市中學生運動會初中女子組百米的冠軍。就是說，我們兩年前在新華路體育場的田徑跑道上遇見過，只是互不認識罷了。誰曾料到那次比賽中初中女子組和高中男子組的百米冠軍，竟會走到一起來了呢？有此前緣，我和她之間的距離，頓時拉近了一大截。

這之後我們之間的談話就比較輕鬆無拘束。有一次我不知怎麼說起，等運動搞得差不多了，我就去找一個圖書館，靜靜地坐下來讀點書。她就說那我跟你一道去圖書館讀書。我又說這種好日子恐怕不會多，最後我還是得回華工去上課的。她幾乎不假思索就說那我也跟你去華工。我有點詫異，但她竟十分堅決地說，反正你去什麼地方，我就也去什麼地方。我便開玩笑說，那萬一有一天我坐牢了呢？她頗意外地望望我，半天不能做聲，忽然咬著嘴唇發狠說，那我給你送飯。

話說到這個地步了，我有點不知所措，只好裝糊塗把話題岔開。我不過是隨便說說而已，卻不料會引起她如此絕決的話語，這使我深感不安。

其實我並不認為我身上會發生什麼「萬一」，勝利早已蒙蔽了我的理智。我甚至認為我未必還會回華工讀書——從學校傳來十分確切的消息，說北京方面有人點名我去《人民日報》社「任立新寫作小組」工作。我不知道是誰向北京方面推薦了我，只知道這個以「任立新」署名的寫作班子，是由北京紅衛兵中的一些筆桿子組成，直接聽命於中央文革領導小組。能躋身於這個寫作班子，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們這些外省的學生，能被它挑上更可謂一種「殊榮」。而況文化大革命已經進行了一年半了，我連北京都沒有去過，也實在想去看一看，我就一心等待調令。我那時自以為在我腳下，已是鋪滿鮮花的坦途。我躊躇滿志，做起「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的白日夢來。



## 第九章

# 北斗星學會始末

我所嚮往的北京之行，到底沒有行成，商調函被卡在學校「一號勤務員」張立國的口袋裏了。張為什麼這樣做我不得而知，不過沒去成也好，因為不久就聽說我要去的那個「任立新」寫作小組，和中央文革領導小組那位大名鼎鼎的秀才王力很有些干係。這個王力因鼓吹「反軍」、「亂軍」而一夜之間遭到廢黜，淪為階下囚。我倘與「任立新」掛上了鉤，豈不是自尋麻煩？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老子說得真是一點都不錯。

北京固然是沒有去成，但我和我們「敢死隊」的名氣是愈來愈大了，有的單位還請我們前往「指導」。有一次省歌劇團邀請我們派人去他們那裏，協助他們對一位文革前因反革命罪被判刑入獄的演員的材料進行甄別。我派了小劉和另外兩名女生去幫忙。有天晚上，我抽空去了歌劇團一趟，瞭解她們甄別材料的情況。

在省歌為我準備的一間單身宿舍裏，我與她們談話並翻閱了有關這名演員的案卷。演員姓陳，曾在歌劇《洪湖赤衛隊》中扮演彭霸天一角。陳在劇中把彭霸天這個反角，倒是演得活靈活現，令人擊掌叫絕，以致後來有人就說，此人本來骨子裏就是個反革命，當然演反派演得心應手了。文革前給陳立案的重要一條依據，就是說他反對過彭真，彭真既已打成反黨分子，就證明陳並非反革命。但從材料中看，此公除了反對過彭真之外，對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反右鬥爭、三面紅旗等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似乎都有自己的一套見解，腦殼後頭硬是像長了幾根「反骨」似的。對這樣的人該不該「甄別」、「平

反」，老實說我是一點底都沒有，便對她們說，單憑反對過彭真這一點，恐怕很難把這個人的案子翻過來。我要她們過兩天就撤回敢死隊。大家又談了一陣話，就各自準備回房休息，但是小劉卻說她想留在我的屋子裏再看看書。那兩位女孩子頗感意外地互相望了望，就回去了。屋子裏只剩下了小劉和我，我拿出帶來的一本美國記者約翰·里德報導俄國十月革命的書看起來。

小劉坐在桌子的對面也在看一本書，但眼睛漸漸就不在書上了，她分明心不在焉。我很快就感覺到了，我不用抬頭也能感覺到她那一雙灼人的目光。我偶一抬頭，她便羞澀地低下頭，滿臉緋紅。這種少女的情懷，曾經撥動過詩人徐志摩的心弦，使他唱出那甜美的歌來：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而我面對這樣一位情竇初開的花朵般的少女，竟然不知如何是好。對於這個後來讓我在獄中魂牽夢繞的女孩子，我那時沒有任何非份之想，只是把她看成一個什麼都不懂的小妹妹。壁上的鐘敲響了，已是深夜十二點，我站起身走到她旁邊，輕輕地但堅決地對她說，該回房睡覺了。小劉低著頭，好久都不作聲，咬著嘴唇終於站起身來，幽幽地望了我一眼，將搭在胸前的長辮子朝後猛地一甩，便朝門外跑去。

多年之後我曾邂逅早已遠嫁香港的小劉，她不無怨恨地問道：你那時難道是根木頭？我無話可說。是啊，我那時為什麼就那麼傻呢？是什麼蒙蔽了我的眼睛？其實那時在大學校園中，談情說愛已成時尚，我為什麼就竟然拒絕掉送到我眼前的這份少女之愛呢？也許，真像毛澤東在他的一篇回憶錄中談到他在湖南第一師範讀書時所說的那樣，「沒有時間來談情說愛」。「學問的需要是太迫切了，我和我的朋友只高興談論大事情——中國人、人類的本性和人類社會、世界、宇宙」。這本由美國記者斯諾紀錄的毛在延安窯洞中的談話，正在我們學生中廣泛地流傳，「青年毛澤東」成了我們許多年輕學生效法的榜樣。而我們高興談論的大事情，便是我們正在經歷的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這場革命將把中國、世界引至何處的這類「大課題」。

要回答這樣的問題，我們感到自己的知識實在是太欠缺了。我們於是大量地讀書，空前勤奮地讀書，哪裏還顧得上兒女情長。我們所要做的是從馬克思主義的ABC開始，如李菊克內西在他那篇《馬克思

回憶錄》中所說的，「努力積累知識，為未來的戰鬥準備彈藥和武器」。但李葛克內西他們可以坐在大英博物館寬大的閱覽室裏積累知識，而我們卻只能冒險潛入一些學校的圖書館，去竊取我們所需要的書籍——所有的圖書館都封閉著，逼迫我們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淪為「樑上君子」。於是在我們借住的省委幹校的房間裏，不但有了馬列，而且有了費爾巴哈、有了普列漢諾夫、有了《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史》和約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說起來很臉紅，都是從我們借住的省委幹校的圖書館裏偷來的。

我們醉心於閱讀之中，在書籍的海洋裏樂此不疲。偶爾也回學校去看看，曾經是硝煙彌漫的校園，如今似乎已刀槍入庫、馬放南山。花前月下，到處是熱戀中的情侶——據說這是每一次大革命之後，必不可免的伴生現象：勝利者要從愛情中品嘗革命果實的甘甜蜜汁，而失敗者也要從愛情中得到慰藉和渲泄自己的失意。學生中已經出現了不止一對的自稱如「王克思」和「張燕妮」這類的「革命情侶」，也有不少人重新鑽進了象牙之塔，一外之外忙二外。這也很符合馬克思的教導：「外國語是人生鬥爭中的一門武器」，潛心外語也實在無可厚非。但令人詫異的是，校園裏常常碰到一些學生和老師，懷裏抱著個大公雞來去匆匆，莫非懷抱公雞已成為「繼續革命」的新標誌？然而有內行指點說，這些「雞派」是在推行一種雞血療法——據說定期注射公雞的血液可以祛病去邪，延年益壽，並且據說已有不少人從中受益，返老還童了，所以引得莘莘學子趨之若驚。可歎一場「觸及人的靈魂」的大革命，硝煙尚未散盡，曾經被批判得體無完膚的「活命哲學」，就已經飛快地復辟，實在未免讓人啼笑皆非。

世事的變化快得令人咋舌。這不，我回到學校還不到一天，堂堂紅司司令郭保安已經盡棄前嫌，登門拜訪，和我討論起聯合的問題。據保安司令的意思，只要我解散「敢死隊」，回校參加大聯合，未來的校革委會中，可以有我的一個席位。他哪裏知道自七二〇後，我早就想將「敢死隊」解散，根本不必以「席位」作誘餌。而「敢死隊」之所以遲遲未作解散，一大原因是「三鋼」方面特別是工總的頭頭，極力主張我保留「敢死隊」這面在江城造反派中頗具影響和號召力的旗幟，以在即將到來的「鋼新」權力之爭中，為他們搖旗吶喊。而「新華工」方面以席

位為餌，動員我們回校參加大聯合，恐怕也正是擔憂我們這支隊伍的存在將會對他們不利。

其實我自從被「紅司新華工」清理門戶之後，就已經與之分道揚鑣。在是否為工總翻案這個問題上的分歧，更使我認定「新華工」的掌門人是一群「機會主義分子」，我與他們無所謂聯合不聯合。我也不稀罕革委會中那頂弼馬瘟的帽子，根本就不理會「新華工」頭頭的「招安」。

在我們「敢死隊」的駐紮地省委幹校裏，有「工總」辦的一個「工人運動講習所」，是專門為「工總」培訓基礎幹部的。「講習所」的負責人叫張一凡，常常和我們談論「文革大事」。有天他請我就武漢的工人運動寫篇文章，我當時恰好正在考慮這方面的問題，便一口應允下來。我比較了北京和上海兩大城市在文革中的異同，發現北京作為文革的發源地，儘管學生運動搞得轟轟烈烈，但幾乎聽不到工人這個「主力軍」的聲音——在北京學生運動太強大了，工人運動相形見绌。另一方面，上海作為「一月革命」的發祥地，工人運動又太強大了，幾乎就沒有容許學生運動獨立發展的條件。

反觀武漢，文革首先由學生運動而起，學生發動工人，工人階級逐步走向舞臺中心，擔當起主力軍的角色。但學生運動並未退居配角的地位，而是和工人運動緊密地結合成一體，將武漢的文化大革命進行得波瀾壯闊、有聲有色。這是武漢文革運動的一個極其突出的特點，也是它的一個極其難得的優點。從這點上說，武漢的文革運動是走在北京和上海的前面的。

繼續堅持與學生運動相結合，在充分發揮學生組織的作用的基礎上，以產業工人為主體，實現武漢地區的革命大聯合，我認為就是武漢工人運動發展的必由之路。

但是張一凡對我的想法興趣不大，他希望我的文章要著力論述「鋼工總」在武漢工人運動中的權威地位，要大樹「鋼工總」的革命權威，特別強調在未來的大聯合中必須以「鋼工總」為核心。我也就按照張的意思，寫了這麼一篇。這篇題為《論武漢工運道路》的文章，經張一凡推薦，以「新華工敢死隊」的名義，發表在八月十八號的《長江日報》上——這份報紙，當時是傾向於「鋼派」的觀點的。

但是「新派」對這篇文章顯然不高興，文章中關於「以鋼工總為核心，實現武漢地區的革命大聯合」的提法，是「新派」所不能接受的。他們主張「三鋼」「三新」，都應當平起平坐，無所謂以誰為核心，也反對大樹特樹那個組織的權威。

不能說「新派」的觀點沒有道理。我的文章中的提法，確實是帶有明顯的派性，對大聯合也只能起到離心的反作用。說實在話，「鋼派」中那些已經大權在握的造反派頭頭，其實並不具備擔當「核心」的素質。這些昔日的造反英雄們的全部興趣，現在都集中在如何攫取更多的權力上面，在如何分配未來省市權力機構席位的問題上，彼此之間爭得劍拔弩張。我甚至想一旦這些昔日的戰友真正掌握了各級政權，其對權力和利益的貪婪，是否會使他們比以前的「走資派」「官僚」得更快？盲目地給「工總」的頭頭吹喇叭、抬轎子，不是幫他們，而是害了他們。

一個使我特別不安的眼前的事實，就是掌權的造反派對前保守派群眾的報復非常殘酷，私設公堂，嚴刑拷打，致使成千上萬的「老保」被打傷、打殘、打死（據不完全統計，單武漢一地保守派方面被打傷打殘的，就多達六萬多人，被打死的有六百多。全省範圍內被打傷打殘打死的更是不計其數）。我那位漢陽的姑爹就被當作「鐵杆老保」被打癱在床，很長時間不能動彈。而屬於工總的一個自稱「群眾專政」的組織「江城前哨」，更是橫行一時，為所欲為，將他們佔據的武漢體育館，變成了讓「老保」們聞之色變的鬼門關。我對強權和霸道向來心存反感，「造反英雄」既已強大到如此霸道，我們敢死隊還有必要為他們的強霸「再立新功」嗎？我對前段時間鼓吹大樹「工總」的權威漸生悔意。我那時的心情，正如魯迅先生所言：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敢死隊」這根戟，不要它也罷！

但是我還不能下這個決心，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一封來自華師的信。寫信的人姓童名斌，是華師政教系二年級的學生，自稱與我神交已久，並且用「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這句有名的套話，來表示對我的尊重。他在信中說，革與保的鬥爭已告一段落，是對文革一年來的鬥爭進行總結及反思的時候了，現在最緊要的事情是提高自己的理論水準，以迎接更偉大的革命風暴。他說「君何不利用自己在前期鬥爭中樹立起來的聲望，團結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來共同做這

項工作呢？」他建議我解散敢死隊，另行組織一馬列主義學會，以學習馬列為號召，聚集起一批真正有頭腦、有思想的優秀青年。他引用了魯迅先生的話：近來很通行說青年；開口青年，閉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論？有醒著的、有睡著的、有昏著的、有玩著的，此外還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進的。童當然稱自己是要前進的，他願引我為同道。

童斌的信我立即給馮天艾看了，馮又傳給了和他一個系的同學、原「紅反團」的程林，還有敢死隊的其他幾個大學生，信中的觀點得到大家的共鳴。我於是給童斌回信，請他來省委幹校，共商組織學會事宜。不幾天童便飄然而至，仍一白面書生耳，和我握手時還是那句「生不用封萬戶侯」，但不說「但願一識韓荊州」，而說「但願一識魯禮安」了，恭維得叫人有點肉麻。但此君確實不愧是學政治的，談天說地倒是頭頭是道。什麼黑格爾、費爾巴哈、亞當·斯密、李嘉圖的，學問夠大的了。至於學習毛主席著作，這位童同學的學法也頗高明一籌，他認為不但要學習已經公開出版發行的，而且要研究未公開出版的著作，包括毛的早期著作。就是已經公開出版的著作，也還有個正式版本與原始版本的分別。

他舉毛那篇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為例，說它最初發表時的內容，和後來收集在《選集》中的內容，就有很大的不同。比方說在原始版本中，農村中的地痞、流氓、無賴，都是被列為解放運動的先鋒力量，來大加頌揚的，連這些「痞子」的聚賭、嫖娼行為，也都捧為是「思想解放」的體現，後來這類文字卻不見於選集之中。就是五七年發表的那篇有名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倘和文章的藍本即毛在反右運動前夕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那篇講話的內容相比較，也是多有不同之處，將二者的不同之處，細細加以對比，就非常有趣。而同一時間主席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實質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家爭鳴，這就已經是反右的前奏。所以主席提出雙百方針，動員大家清除顧慮大膽向黨提意見，其實是在引蛇出洞，是非常高明的策略。如不瞭解主席那一段時間的各種內部講話，就不可能懂得主席鬥爭藝術的高超，就不能真正認識主席的偉大。

對於童的一番誇誇其談，我並不怎麼以為然，什麼「高明的策略」，我叔叔不就是冤死在這殺人不見血的「策略」之下麼？至於像《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樣的歷史文獻，按照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員宣言》「德文版序言」中的說法，是沒有權利來加以修改的，但主席卻似乎特別擅長與熱衷於這種修改。據說毛主席的講話或文稿，在編進「選集」之前，總是要經過仔細的修訂，凡有被實際情況證明不妥之處，都要給「修訂」得羚羊掛角，不留痕跡。「正確」當然是貫徹的了，但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麼？

但不管怎麼說，我對童提出的不但要學習主席公開發表的著作，而且要研究主席那些未公開發表的著作，以及主席的早期著作的意見，還是非常感興趣。我那時和許多青年學生一樣，一心想要弄清毛澤東思想發展的真實脈絡。一篇短短的由斯諾記錄的毛口述的回憶錄，已不能滿足我們的欲望，我們要全面地閱讀主席從青年時代開始的各個歷史時期的「原著」。感謝天子腳下的紅衛兵戰友，給我們編印了一本較能真實紀錄毛澤東思想原貌的「非官方文選」《毛澤東思想萬歲》。這厚厚的上下兩冊書，使我們大飽眼福。我們從中讀到了一批毛的早期文稿如《講堂錄》、《體育之研究》、《民眾的大聯合》、《湘江評論創刊宣言》等等，這些毛的早期文稿，向我們展示了大量極新穎的以前從未知曉過的思想和資訊。

比如毛曾經對宋明理學推崇備至，曾經反對以強權打倒強權的「炸彈革命」、「有血革命」。毛在他的《回憶錄》中關於自己曾經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觀念的大雜燴」的自述，也通過這些文章得到了印證。這使我們感到非常的興奮。毛澤東這位從韶山沖走出來的農民的兒子，這位曾經想當警察、當商人、當法官、當京官、當肥皂製造商，充滿五花八門的理想青年學子，這位自稱「曾是一名唯心主義者」、「贊同許多無政府主義的主張」的讀書人，原來也並不是生來就一貫正確，從未有過謬誤的「完人」啊！原來也和我們一樣，有過過失，犯過錯誤，產生過認識上的迷惘。原來偉大領袖的無比偉大，無比正確也並非與生俱來，也有一個從無知到有知、從幼稚到成熟、從迷惘到清醒、從謬誤到真理的過程。

這一認識，對於我們來說極其重要。因為像我這樣的青年學生，

在運動中或多或少都犯有這樣那樣的錯誤，甚至犯過嚴重的錯誤。既然主席本人年輕時都會有那麼多的錯誤想法，那我們這些年輕人又怎麼可能不犯錯誤呢？還有，主席既然年輕時會犯錯誤，就不能說他是天生的「聖人」，也就不能擔保後來就再不會犯錯誤了，一直到老都永遠「絕對正確」。像對於「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這個問題，我就堅持認為他處理得並無道理。

但是平心而論，儘管我對毛的崇拜已不是那樣盲目，但我仍然是他的忠誠的崇拜者。我和我的朋友們，常以「青年毛澤東派」自居且自豪。我們那時的想法是：如果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和五四運動的爆發，引導毛開始了他造舊社會的反的鬥爭生涯，那末由他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必將引領我們走上革命的道路，以完成「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歷史重任。我們特別為主席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結尾那段豪邁的吶喊所激動所振奮：「時機到了，世界的大潮捲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閘門動了，且開了！浩浩蕩蕩的新思潮業已奔騰澎湃於湘江兩岸了！順他的生，逆他的死」。何等高昂的激情、何等偉大的氣魄啊！我們深為青年毛澤東的風範與豪情所折服。走毛澤東的道路，就是我們那時所得出的結論。

也就是在這篇《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我第一次接觸到了「新思潮」這個名詞。

我們決定採納童斌的建議，發起組織一個以大學生為主體的馬列主義學會，系統地學習研究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研究中國的歷史和現狀。通過與童的交談以及我本人的觀察，我認為我們國家的文科大學，實行的基本上是一套僵化落後的教學體制和方法，培養不出具有獨立思考精神的優秀人才。因此我們的學會在推動教育革命，特別是文科的教育革命方面，應該有所作為。我們學會，應該成為一部分有志於社會改革的工科學生打進文科領域亦即社會科學領域的一個基地。我們決定找一個時間、找一個地方，就這些問題作實質性的討論，並就組建學會一事，作出具體的安排。

十月底的一天，我們一行十餘人在東湖聚會，除我、馮天文、程林和原敢死隊的另幾位華工的大學生張國梁、駱益民、袁震等人之外，還有華師的童斌、武大的李婉芝、以及由程林介紹來的一名東湖

中學的學生。另外還有原敢死隊的幾名中學生，包括那個隨時願追隨我左右的小劉。在東湖長廊，我們高談闊論、各抒己見。在組建學會這一問題上，大家並無異議，具體問題上不免有些分歧。經過爭論和交流，大致達成以下幾點共識：

- 一、學會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以研究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發展進程為課題。
- 二、重點研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探索文革發生的根源、文革的目標和文革的實踐。
- 三、廣泛搜集第一手資料，在適當的時候著手編纂武漢地區的文化大革命史。
- 四、探討教育革命的方向，尤其是文科改革方向。學會要辦成文科改革的一個實驗基地。

至於學會的名稱，大家皆不贊成童斌提議的「新新民學會」，而泛稱「馬列主義學會」又太一般化，而且據悉外地已經有了叫馬列主義學會的，於是我就提議起名為「北斗星學會」。「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北斗」即象徵偉大領袖，有寓意，表明我們學會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名正則言順，對我們今後開展活動會有益處。同時「北斗星學會」這個名稱也不落俗套，叫起來響亮。我的這番話，說服了在場的所有人，大家一致同意就叫「北斗星學會」，並一致推舉我為學會宣言起草人，並分管理論研究。程林負責總務，馮天艾以組織能力較強，被推選為學會的會長。馮提出學會須有一份自己的刊物，大家都很贊成，刊名呢？不是有過《湘江評論》嗎？我們的就叫《揚子江評論》好了。

十月的東湖，秋高氣爽、清新宜人，暖暖的陽光柔和得像綢緞一樣。我們聚集在這東湖之濱，談笑風生，樂而忘返。我們自以為是天之驕子、時代的弄潮兒，高唱「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我們哪裏會料到我們的這一次東湖之行，將會被定性為「東湖黑會」，而被我們視為糞土的「萬戶侯」們，則很快就要拿我們這些天真的年輕學子開刀了。

從東湖返回幹校後，我就開始著手起草宣言，手眼通天神通廣大的童斌，不知從哪裏弄來了一份上海《反復辟學會創立宣言》供我參考。這個「反復辟學會」聽說是由上海參加過炮打張春橋的紅衛兵中的一些人組成，其骨幹是復旦大學的幾個學生。但縱觀這份「宣言」，除了有幾句較別致的提法，如「德國出現了馬克思主義，學得最好的是俄國，不是德國；俄國出了列寧主義，學得最好的是中國，不是俄國；中國出了毛澤東思想，我們怎麼辦？」之外，洋洋數千言套話與空話太多，諸如毛澤東思想是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第三個里程碑，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還有什麼無限熱愛無限忠誠之類的陳辭濫調，幾充斥全篇。響亮是非常之響亮了，但炒這類報紙上的「現飯」有什麼意思？我們的宣言絕不這樣寫。

我們的宣言不但要有自己的觀點，而且要有自己的語言特色。而我喜歡的語言是這樣的：布魯諾被判處了死刑，但是別的勇士已經在參加戰鬥了。伽利略已經在準備新的、無可辯駁的證據來保護科學。能工巧匠們已經在琢磨不久將被裝入顯微鏡和望遠鏡的玻璃片了，臆想和推測的時代就要結束了，無可辯駁的證據的時代就要來臨了。不久，人們將親眼看見從前只有理性的目光才能看見的事物……這些句子見於一本名叫《人是怎樣變成巨人的》的科普著作，我那時正全身心都沉浸在這本出自蘇聯作家伊林筆下的名著之中。伊林以極富魅力的表述，帶著讀者穿過深邃的時間隧道，回到久遠的過去，彷彿親臨其境地與歷史上那些為了科學和真理而獻身的勇士們一道呼吸、一道探索、一道受難、一道忍受火焰在腳下騰起時的痛苦。

人應該敢於打破僧侶的塔頂，像布魯諾所做過的那樣，把目光投向那浩瀚無垠的天空。「於是不再有圍牆了，也沒有石頭的修道院的圓拱頂了」，伊林在書中寫道，「周圍是無邊無際的天空，無論向哪邊看，到處都是恆星，它們多得無數。」在這種科學的先驅面前，是無所謂「無限崇拜」、「無限信仰」的，也無所謂「句句是真理」、「絕對權威」的。他們信仰的是科學，也僅僅是科學。我敬仰哥白尼、伽利略、布魯諾這樣的科學鬥士，在打破傳統追求真理這一點上，我覺得他們正

是我精神上的導師。在讀伊林的這本書時，許多地方我都很容易產生共鳴。

我覺得與中世紀一樣，在我們的周圍也有著各種有形的和無形的「圍牆」，約束著人們的思想和行動；有著無數的清規戒律，禁錮著人的頭腦。人群中稍具獨立思考能力者，就會被人視為「異端」。而尤其糟糕的是，社會風氣已經被空前地毒化了，人們已經普遍習慣於唯上唯書，而這書又不過僅僅是那一本小小的「紅寶書」而已。人們困在圍牆之內坐井觀天，只知道頭上有個「紅太陽」，卻忘記了無邊無際的天空中，還有數不清的星辰。人們的視野變得愈來愈窄小，愈來愈可憐。而一旦有誰企圖打破這堵圍牆，開闊自己的視野，大家就會一起撲上去，把他扭送進瘋人院，或者乾脆把他撕成碎片。

我想在這堵「圍牆」上試著打一個小洞。但我還只能用一種隱蔽的方式，在《宣言》裏表述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不能不有所顧忌。然而如何給《宣言》開頭呢？我找不到感覺，我一連幾天都進不了角色。苦思冥想中，忽然記起與新結識的一位姓周的朋友的一次談話。這位某職業學校的代課教師說你注意過一種自然現象沒有？自然界中大凡礦植物，總是成片成片生成在一個地方的。比如鐵礦、煤礦、石油、天然氣等，一發現就是很大很大的一片，這大概就是通常所說的「物以類聚」。想到這番話，如電光火石般靈感有了，是了，就這樣開頭吧。於是幾乎未作任何修改，一氣呵成了下面這篇《北斗星學會創立宣言》的草稿：

### 北斗星學會創立宣言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我們試看礦岩的分佈，鐵礦煤礦和雲母，各自雲集在一起。這是自然界千百萬年變化的結果，是大自然的威力；且看我們的隊伍，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廢、有人叛變，但更有人集結在一起，奮勇地前行。這是一年多來運動的結果，是大革命的威力，這種威力是任何人都無法抗拒的。

學者們寫史，十有八九無血無肉，不是歷史的創造者的呼聲。為什麼？就因為他們是名家、是黃鶴樓上的秀才，不像長江水裏的弄潮兒，懂得江濤是如何洶湧、浪潮是怎樣澎湃，回

流是何等險惡。一個普通的工人、巴黎公社社員筆下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就遠遠勝過了好多歷史學家關於公社的論述。震撼世界的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如何總結它，如何承受它，難道還需要等著那些黃鶴樓上看翻船的大人先生去進行，而不是由我們這些多少在運動的泥巴裏滾了半天的毛小子和工農大眾一起來完成嗎？讓世界、讓人類、讓那些在文化大革命的怒濤中嗆得頭昏腦脹的先生們，以及那些在大革命的海岸邊徘徊了年把的逍遙派們，聽聽革命的海浪曾經是怎樣呼嘯，是我們的責任。

敢於打破僧侶的塔頂，去探求無際天空秘密的勇敢者，便成了哥白尼或者布魯諾；勇於闖進人間這所大學去的，便成了高爾基。儘管歷史的墮力是巨大的，但總有那麼一些亡命之徒，不顧火刑與十字架的威脅，衝破歷史的墮力，去開拓新的道路。從小學、中學到大學這漫長的三部曲，也不知是哪位大人先生造的，已催眠我們許多年了，而且還在繼續催眠下去，好讓我們昏昏然地被送進修正主義的棺材。打破這三部曲，再不作凱洛夫的奴隸，是當代青年的使命。

想當官的，就讓他爭席位去罷；要保命的，就讓他搞什麼雞血療法養雞去罷，自有一批自強不息的革命小人物努力武裝自己，為未來的鬥爭準備彈藥和武器。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我們從來都只把這場空前偉大的中國無產階級文大革命，看作是更為偉大的世界革命的引子和序幕。毛澤東同志青年時代就說得好：「必須有大群志同道合的人，才能有所作為」，我們於是集結在一起，成立了北斗星學會。

至於北斗，乃宇宙間七顆排列似斗的星辰。古奴隸的歌裏說：我仰望北斗，嚮往著自由。但這人類希望與光明的象徵，只是當著人類的天才舵手誕生到地上，人們唱起「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的時候，才被賦予了最新最美的時代內容。我們的學會取名於此，就是要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大風大浪中永不迷失航向。

北斗，北斗，未來幾十年的中國、世界，將誰主沉浮！

以上就是我起草的「北斗星學會創立宣言」的初稿的全部內容。不錯，有點幼稚可笑，例如那段關於打破「三部曲」的設想，那段中國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引子和序幕」的預測；也很有一點狂妄，如「北斗、北斗……誰主沉浮」之類。但那個時候的青年學生哪個沒有一點狂氣？而況我們都以主席青年時代的一段話自勉：「老先生最不喜歡的是狂妄。豈不知古今真確的學理、偉大的事業，都是那些被人稱作狂妄的狂妄者發明創造出來的。」所以沒有人會怕被人指為狂妄，武漢文藝界有部分造反派，甚至就以「狂妄師」命名自己的隊伍。所以我把起草好的這篇帶點狂氣的《宣言》手稿拿給大家看時，並沒有人提出什麼不同的意見。我又將手稿拿出去，徵求圈外新結識的一些朋友的意見，也是讚賞者多。例如軍區勝利文工團的創作員白樺，就認為《宣言》寫得很有生氣，有一股「初生牛犢不怕虎」和「說大人而藐之」的氣勢。

白樺乃一行伍出身的詩人，聽說五七年被打過右派，但早已摘帽且恢復了軍籍。白樺在文革初期持造反派觀點，他以武漢部隊一戰士的名義發表的詩歌，曾風行一時，傳遍大街小巷。詩中的句子，我至今還記得一些。其中一首《一個解放軍戰士的公開答話》這樣寫到：

當我走近革命小將的屍體，看到灘灘血跡，／ 你們走近我，問我：／ 解放軍同志，這是為什麼？為什麼？！／ 當我站在「百萬雄師」的包圍圈外，看到革命者被綁架，被捕捉。／ 你們走近我，問我：／ 解放軍同志，這是為什麼？為什麼？！……

還有一首，是以一名母親的名義，回答「新華農」學生寫的那首詩《放開我，媽媽！》。題目就叫「孩子，去吧！」。兩首詩一唱一合，在武漢三鎮不脛而走，萬人爭誦。白樺在詩中寫到：

孩子，去吧！我不是一個糊塗的媽媽。  
雀籠，怎鎖得住雄鷹，羊欄，怎關得住駿馬？  
胡蘭子有戀女的親娘，董存瑞也有疼兒的媽媽。  
她們為革命能獻出自己的親骨肉，  
我怎麼能有這麼多的顧慮和牽掛？  
.....

這位部隊詩人七二〇後與我有所接觸，在我們籌建北斗星學會時，曾應我之約，為我們寫過一首詩稿。記得是十月底的一天，他如約而至，就在我們住的省委幹校的一棟樓的走道上，來回踱了一陣子，便將一首題為「我們時代的列寧」的詩稿，寫在一張拆開的香煙紙盒上交給了我。那首詩以歌頌毛澤東為主題，將毛喻為「我們時代的列寧」讚頌了一通。但不久學會挨批，白樺恐受牽連，便托人取回了這首詩，並在別一個紅衛兵小報上發表了。但白樺後來因這點事仍受牽累不淺，此乃後話。

另一位對宣言草稿稱讚不已的，是一位叫周翼南的中學代課教師，也擅長寫詩。那時他和他的幾位詩友，正在籌辦一張名為《五千里狂瀾》的文藝小報。周之所以欣賞我的宣言，大約是因為宣言帶了幾分詩意，合他詩人的味口。他也把他們剛出版的報紙的創刊號拿給我看：「五千里狂瀾」幾個字飛逸奔放，極有氣派，且配有一幅紅日下狂瀾奔流的刊圖。刊圖與報名全部套紅，報頭還印有一段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這是大海的怒濤，一切妖魔鬼怪都被沖走了。社會上各種人物的嘴臉，都被區別得清清楚楚。

所引這段毛主席語錄，實在是大氣磅礴，與那刊圖那報名相得益彰。但尤其新穎的是報紙的發刊詞，那是一首題為「回答」的詩歌：

你從哪裏來？——我從喜馬拉雅山來。

你到哪裏去？——我到大海去。

你的年齡？——四萬萬年。

你的名字？——五千里狂瀾，五千里狂瀾！

你的朋友？——五湖四海。

你的性格？——坦蕩豪放。

.....

你的目標——東方！東方！東方！

你的導師——毛澤東——，

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太陽！太陽！太陽！

這種寫法是我們以前沒有見過的。我們那時也不知道這種問答式的詩歌，其實是摹仿艾青的歷史名篇《煤的對話》，我們只是非常欣賞這位中學代課教師的才華。而這位青年教師和他們的朋友也真有辦法，在他們報紙的第二期上，刊登了一張不知從何處搞來的毛主席和江青四十年代在陝北窯洞前的合影照。這張不可多得的珍貴照片，使得他們的報紙在兩三天內便銷售一空。周翼南說他們辦這份報也就兩人，另一個是歌舞劇院的創作員叫王振武，毛和江青的合影照就是他的這位搭檔弄來的。而現在他們正準備趁熱打鐵，推出這張報紙的第三期，其中將刊載他的一首長詩的序詩和第一章《十月》。長詩的題目是「1917——毛澤東時代」，他向我展示了「序詩」的手稿：

地球/在整個宇宙中/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星體；  
世紀/在時間的洪流裏/也不過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單元  
我要/站到未來/回顧/二十世紀……

詩寫得非常之大氣，高屋建瓴、氣勢磅礴，有馬雅可夫斯基的長詩《列寧》的風格。周認為隨著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在中國將出現一次偉大的「文藝復興」，一批無產階級的、偉大的、不朽的文學藝術作品，將在這次「復興」中湧現出來。而他和他的文藝戰線上的戰友們，正是在為這個「文藝復興」運動的來臨搖旗吶喊。他們辦這份報紙的初衷，就是要刊載一批高品質的能代表無產階級氣派和水準的文藝作品。他對於我們發起組織北斗星學會的創意表示欣賞，還說他將在他們的報紙上專門登一篇文章，向社會介紹我們學會的宗旨，同時刊登《北斗星學會創立宣言》，以幫助我們擴大影響。他還說他們的這份報紙也並非純文藝性的，在第三期上就有一篇出自他搭檔之手，對人類自有文字以來的意識形態進行宏觀的革命批判的長文，此外還將登載一張可以通排兩版的出於北京一位理論秀才之手的題為《馬列主義三個里程碑》的大表格。他歡迎我們以後向他的報紙投稿。我們交談甚歡，我邀請他和他的朋友十一月七日參加我們學會的成立儀式，地點就在漢口璽宮飯店的一個小會議室裏。

十一月七號這一天，周翼南和他的朋友王振武果然欣然而至。白

樺和勝利文工團的另一位創作員、劇作家所雲平也連袂而來。此外還有一位業餘學校代課教師叫周凝淳的，是馮天艾中學時的同學，聽說圍棋下得十分了得，曾獲市青少年圍棋亞軍。周和我早已認識，我起草的《北斗星學會創立宣言》的開頭那段話，就是受他的關於礦植物分佈規律的講話的啟發寫成。周此次還帶來了他的兩位朋友，一位叫張志揚，是武鋼一所中學的代課教師，另一位叫童丹，一所小學的代課教師，此二人在文學和哲學方面的修養，據周介紹不是一般的水準。張與童學富五車，滿腹經綸，但又只能在中小學代代課，連個正式職業都沒有。究其原因，似乎幾個人的出身都不怎麼好，而出身不好就註定了你哪怕有天大的本事，也只能是個「二等公民」。如果說這些人都自然傾向於改變現狀、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在我看來也非常合情合理，非常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而僅僅因為出身不好，因為有著改變自己命運的願望，哪怕他們並沒有任何越軌的行動，甚至連越軌的言論都沒有，只是因為與我有所交往，後來也都未能逃脫牢獄之災。

那天到會的來賓中，還有曾和我們一起在湖藝住過的機床附件廠工人吳昌青、黃石鐵山的工人馬業成、江漢關小學的教師張光宇，此外還有「工總」和「九一三」的幾位我認識或不認識的師傅。湖北大學「紅八月戰鬥隊」的頭頭梅子惠和雷志茂（雷就是當年「二八聲明」的起草人）也應邀來了，但是朱鴻霞、胡厚民、李湘玉、夏邦銀以及二司的楊道遠、丁家顯這幾位我們特別邀請的「首腦級」人物，一個也沒有來。倒是警備司令部的一名「探子」，不知從何處得到消息不請而至，執意要求「旁聽」。這位「不速之客」進門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抄去了那天與會者的簽到名單，而我們自以為光明磊落竟對此毫無警惕。記得當時那位武漢關小學教師張光宇，就提醒我說恐怕會有麻煩。我卻不以為然，又不是開黑會還怕他抄名單不成？但事實上那天入會的人，就個個上了黑名單，而招惹上天大的麻煩，果然被張光宇不幸而言中。

現在還是來說當時。待入會者落座之後，馮天艾首先發言，向入會者報告了我們發起組織這個學會的宗旨，介紹了會員的組成情況。然後由我宣讀學會創立宣言，並將印好的宣言草案分發給所有的與會

者，也給了那個警司的「探子」一份。然後我們請入會的來賓對宣言提意見，並希望大家對學會如何工作也提出寶貴的建議。也許因為有警司的不速之客坐鎮，會場上一時竟氣氛十分壓抑而冷清，倒是工總一位自稱是搞宣傳工作的師傅站起來發言，打破了僵局。

此人聲稱自己是個工人老大粗，說話不會繞圈子，巷子裏趕豬，只會直來直去，然後便毫不客氣的對「宣言」批判一通。他說你們這個宣言左一個哥白尼右一個高爾基，怎麼就不見提馬克思恩格斯毛主席魯迅，這些都是打破舊傳統開闢新道路的偉人嘛！還有，毛主席最近視察三大區，指出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還有其他最高指示，是對文化大革命最科學最全面最深刻最精闢的總結。你們卻說文化大革命還有待於你們來總結，而人家都是躲在黃鶴樓上看翻船，這又是什麼意思？置偉大領袖於何處？你們說的大人先生又是指誰？而且你們那句話也有問題，你們說毛澤東同志說得好，那意思是不是說偉大領袖毛主席還有哪句話說得不夠好？何況你們開口閉口毛澤東同志這算什麼態度？偉大領袖是由著你們直呼名字的麼？另外還有，你們挖苦說要當官的就讓他爭席位去，這是什麼話？誰不知道在與走資派的生死鬥爭中，革命造反派就是要奪權、要掌權、要領導一切。這不是什麼想不想當官、爭不爭席位的問題，這是歷史賦予我們的重任。天經地義，當仁不讓，有什麼不對？

這個工人說，總而言之，統而言之，這篇宣言暴露了你們這些大學生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思想意識，好像別人都不行，只有你們這些半瓢水的知識份子行，最革命、最清高、最了不起。其實你們嘴裏說不爭席位，不想當官那是假的，你們其實比誰都爭得厲害、想得厲害，不然你們怎麼會提出未來幾十年的中國世界誰主沉浮的問題呢？那就是說你們是打算幾十年後掌權、當官、主沉浮的。你們的野心實際上比哪個都大，可見是假清高。這位「工人老大粗」如此劈頭蓋腦地對我這個「宣言」猛批一氣，那真是半點面子都不給，也真叫我著實領教了「工人老大粗」的「批判的武器」的厲害。我對這種「批判」也毫無思想準備，根本就不曾想到自己苦心構思的宣言，在「工人同志」的眼中近乎毒草。

我對這位「工人同志」雞蛋裏面挑骨頭式的批判，當然無法接受。

但此刻我又無法和他爭辯，倘若爭辯起來，豈不成立會開成了辯論會？我那陣的臉色，必定已漲得通紅，但仍硬著脖子，感謝工人同志的批評。並應允對宣言作一番修改，拿出一個令工人同志們滿意的宣言。說罷我將手中的宣言草稿撕了個粉碎。於是又有幾個人發言，大抵是讚揚我的「自我批評」精神。什麼容許小將犯錯誤，也容許小將改正錯誤，犯錯誤不要緊，改了就好，都很熱心地幫助我。我自然非常感動，但還是不明白宣言到底壞在哪裏？我究竟犯了什麼錯誤？難道非得言必稱馬列才算革命？非得言必稱「無限熱愛」、「無限信仰」才算忠誠？非得給官迷們吹喇叭抬轎子才叫合潮流？道不同不相與謀，我便不再說話，洗耳恭聽就是。工總「工人運動講習所」的負責人張一凡，與我們一起在省委幹校相處過一段時間，算是老熟人，那天也來了。只見他站起來打圓場說，魯禮安這篇文章可能沒有寫好，但魯禮安文革以來是寫過許多好文章的，在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我們工總翻案的鬥爭中，是立了大功的，我們不應該忘了這一點。要全面地評價革命小將，愛護革命小將，不能攻其一點不及其餘。至於這篇宣言，主要是帶了一點小資產階級的情調。學生娃娃嘛，總是難免有點把的，以後只要進一步與工人階級結合，這點毛病也是不難改掉的。張一凡這麼一說，附和的人也就不少，場上的氣氛也輕鬆了一些。

後來白樺也講了話。他說他本來覺得這篇宣言寫得還是不錯的，有朝氣、有激情，立意也比較高遠。但是聽了各位工人師傅的發言，才悟出文章的缺點與不足，這是應當引以為訓的。但對紅衛兵小將的革命銳氣，還是應當保護等等。白樺說話很委婉、很小心，字斟句酌，而且帶韻，聽起來像是在吟詩。白樺能站起來講上幾句，哪怕是小心翼翼的，我以為也很不容易，須知警司派來的那位「探子」就坐在門邊，目不轉睛地死死盯著這位「右派詩人」，並用筆在記錄他的發言呢。由於有警司「探子」在場，第一個發言的「工人同志」又開口便對宣言發難，搞得這個成立會，從頭到尾都非常之晦氣。這位「工人同志」真是開了個好頭，替後來的權勢者的圍剿作了開路先鋒。

總之正如小學教員張光宇說的，會有大麻煩，眼下「自家人」就已經先殺將過來，不是什麼好兆頭。頭昏腦脹中，忽然聽見馮天艾在向與會者解釋說，魯之所以將宣言寫成這種格調，是受了一本叫《人是怎

樣變成巨人的》書的影響，所以滿紙的哥白尼、布魯諾、火刑與十字架等等。馮氏並非是要責難我，其本意是要掩護我幫我開脫。不過我自文革以來經的風浪多了，皮子也磨得夠厚夠韌，警司的「探子」也好，「工人同志」的批判也罷，我其實都並非十分在乎。但其他人就不同了，武大的那位李婉芝首先就膽怯起來，向我表示不想加入這個學會了。打退堂鼓的還有原敢死隊的幾位大學生，最後只剩下我、馮天艾、程林、張國梁（以上均為華工學生）、童斌（華師學生）以及一位中學生，六七個人而已。但那天散會後，與我們一道合影留念的人倒不少，而這張照片從照相館洗印出來後，不知怎的竟也有張落到了警司的手裏，成了長官們按圖索驥、追查「危險份子」的好證據。

而就在官府對照著名單和照片，到處嗅來嗅去，想嗅出點什麼名堂的時候，我和馮氏則在忙著對《宣言》進行修改。刪去了不少被認為「不合時宜」的內容。特別是對第四段作了大的改動，將「毛澤東同志青年時代就說得好……」去掉，加上了如下內容：那些不讀書不看報、不接觸群眾，什麼學問也沒有，而又專好以勢壓人，進入官場的人，管他司令也好，佛爺也好，在歷史的長河中終究混不了多久，大浪淘沙，決少不了他一份。「真正有希望的是那些善於思考問題的人」。歷史證明了：未來不是屬於陳獨秀、瞿秋白曾經大喊大叫一時的風雲人物。歷史還將證明下去：只有那些永遠善於思考、善於學習，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的，方是將來歷史舞臺上的主將。最後一段保留，結尾一句仍是「北斗、北斗、未來幾十年的中國、世界，將誰主沉浮？！」在這個修改稿裏，「哥白尼」、「布魯諾」沒有了，「高爾基」、「凱洛夫」也沒有了，也不再說「毛澤東同志說得好」了，但仍保留並加重了對熱衷於進入官場的「司令」、「佛爺」的譴責和嘲諷，不知道喜歡挑剔的「工人同志」是否滿意。

但圈子中的許多知識份子朋友都認為，宣言還是初稿最出色，流暢、精練、不枝不蔓，而且意境不俗。事實上這個初稿已經流向了社會，在大中學生中間產生了不小的影響。聽說華師一附中有學生甚至把宣言中的某些句子譜上曲子傳唱，這使我感到十分的欣慰和鼓舞。青年學生中的一些人，如此喜歡這個宣言，我想也無非是宣言從思想到語言，都與當時流行的「文革八股」不大一樣，有某種離經叛道的傾

向，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然而可惜這種感覺在進入官場的那些「新貴」們那裏並沒有，聽說朱鴻霞在看到我們送給他的宣言草案時，只是笑了一聲說「很浪漫嘛！」我們宣言中那句「想當官的就讓他爭席位去罷」，可能讓他和他的親密戰友們不太舒服。但也僅此而已，他們至多只是認為我們標新立異罷了。

但軍區的首長們就不一樣了，他們在接到警司的密報後，便立即命令對十一月七號那天參加了學會成立儀式的所有人，進行秘密調查。這個內部消息，是工總一個基層單位的頭頭私下透露給我們的，這位頭頭被要求配合軍區，調查單位一名參加了學會成立會的工人的情況。另外有消息說白樺和所雲平在回到文工團後，也因此事受到了審查。「麻煩」果然就來了，但沒有料到會來得如此之快。審查不審查倒無所謂，我們這些人文革中沒有審查過一百遍，也有九十九遍了，反革命都當過好幾次，還在乎什麼審查？令我們困惑不解的是，文革中成立的各種群眾組織何止成千上萬，連討飯搶荒貨的，都紛紛組織自己的「兵團」、「總部」，其餘烏合之眾的組織，更是多如牛毛，從來也沒有聽說有誰大驚小怪過。各個群眾組織之間不斷地爭鬥、火拼、打內戰，打得屍橫遍野，血流漂杵，也都不覺有什麼稀罕。為什麼偏偏我們幾個閱歷不深的學生娃娃想組織起來學習理論研究文革，就犯了大忌，引得「首長」們坐卧不安了？

我們很想弄清楚這個問題，但馮天艾已經在20號離開武漢，前往上海考察去了，有些事無法和他商量。我的想法倒簡單，就是學會首先要拿出一批研究成果，用文章向社會表明我們學會的研究方向。身正不怕影邪，讓文章說話好了。我於是首先寫了篇題為「只有馬列主義能夠救中國」的急就章，是特別寫給「首長」們看的，以表明自己信奉馬列主義，並非要搞「異端邪說」。然後我真正下了點工夫，寫出篇論文題為《工科學生論文科的改造》。

關於文科的改造問題，是我文革中一直在思考的一個題目，我在文章中通過對文化大革命中工科學生和文科學生在筆戰中的不同表現，對文科的歷史和現狀作了一番分析。認為文科培養出來的學生，脫離實際，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勇氣，無力獨立擔當起文科改造的重任。我在文中斷言，經過文革風暴的洗禮，必將有一批在運動中嶄

露頭角的工科學生轉入文科領域，發揮其思維縝密、邏輯推理能力強的特點，成為今後文科改造的一支攻擊力量。

我那時寫這篇文章未免有點夫子自道。因為我雖未去成北京，卻早已萌生了棄工學文的念頭。我以為在時代處於大變革之際，這種志向的轉變是非常自然的。當年魯迅先生不就是棄醫從文，立志要用文字來改造中國民眾的精神麼？郭沫若似乎也是如此。而我當初之所以選擇學工，是因為認定文科不過是尋章摘句之類的雕蟲小技，「壯夫不為也」。但文革的發生，卻使我感到人文科學這一領域其實波譎雲詭，高深無比，是可以讓人大有作為的。至於其間的兇險，我不是不知道，但文革中我屢屢面臨困境卻都能化險為夷的經歷，麻木了我對兇險的感覺。我只是渴望——像《國際歌》中所說的——「為真理而鬥爭」罷了。

然而正如《聖經》裏那位猶太總督問耶穌的：「真理是什麼呢？」我承認我並不清楚，但我願意並且有勇氣去探索，至少我是不大相信有什麼人的話「句句是真理」。「句句是真理」這句話，我在但丁的那本《神曲》中的《地獄篇》倒是見到過，可這種話怎麼可以用到革命領袖頭上呢？但是沒有辦法，人們不但相信偉大領袖「句句是真理」，而且相信偉大領袖的親密戰友也差不多「句句是真理」，就連「無產階級司令部」派到武漢來掌管黨政軍大權的所謂「曾劉首長」的每句話，也都被大家奉為圭臬，而不管這對「首長」的話是不是在胡說八道。而「曾劉首長」又恰好喜歡胡言亂語地發指示，這就苦壞了我們。因為「曾劉首長」在派人將參加過北斗星學會成立儀式的人的情況一一密查過後，仍不甘休，一直瞪著二郎神似的那隻鳳眼，死死盯著我們這幾個學生娃娃呢。

在十二月四日省革委會召開的一次常委會上，曾思玉點了北斗星學會的名，稱學會是一個「稀奇古怪的組織」。他特別指出出席北斗星學會成立儀式的人中，有「老右派分子」白樺。他說像這樣的一些人搞在一起，他們到底是想幹什麼呢？曾思玉一邊說一邊抖動手中的一張紙：這就是這個北斗星學會的宣言。這個宣言非常反動，每一個字都是反動的！對這個反動宣言，要逐字逐句地進行批判！

曾劉首長的上述胡言亂語，我自然是並無資格親臨現場恭聽得到

的，是工總的宣傳部長田國漢轉告給我，我才知道。田非常忐忑不安地問我，這究竟是怎麼回事？說朱鴻霞胡厚民對此也很關心，很奇怪我們為什麼要把好端端的「敢死隊」解散，而另起爐灶搞什麼「學會」？我說其實什麼事都沒有，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我們幾個學生自願組織在一起學習馬列，探討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招惹誰了？又犯了什麼忌了？怎麼就搞得滿城風雨。說我的那份宣言有缺點，我不否認，說宣言非常反動，我堅決不承認。至於說宣言中的每個字都是反動的，那更是無稽之談。誰要是有興趣有本事對宣言逐字逐句地批判，我倒十分願意領教。我還真想看看，誰有這種將我宣言中的每個字都批出「反動」的本事呢。

不過話雖如此，我還是感到了某種壓力。我實在未曾料到一篇不過千字的短文，竟會掀起如此軒然大波。而作為湖北黨政軍新任一二把手的「曾劉首長」在常委擴大會上的表態，如此輕率、如此橫蠻、如此不講道理和不負責任，卻也是我始料不及的。我從此對這兩位「大人先生」從骨子裏瞧不起。我懷疑這兩個龐然大物，連小學生的判斷力都沒有，不然怎麼會說出宣言中每個字都是反動的這樣的混賬話呢？看來所謂「曾劉首長」，正是那種「不讀書、不看報、不接觸群眾、什麼學問也沒有、專靠武斷和以勢壓人、竊取黨的名義的大黨閥。」黨閥既然是並不讀書也不看報，什麼學問也沒有，那他又怎麼知道北斗星學會的宣言每個字都反動呢？自然也就如魯迅先生說的，是「靠叭兒們喫，靠後補叭兒們吠」。我就等著這些由「首長」豢養的叭兒和後補叭兒跳出來和我論戰。我敢說一旦論戰起來，那些「叭兒」們絕非我的對手。

不久我就見到了叭兒們的批判文章，署名湖北大學「前進兵團」。此「前進兵團」，據湖大一些學生說，就有文革初期他們學校臨時文革委員會的一幫人。我當初那篇「為南下革命師生呼籲」的大字報，就是針對他們和他們的主子的，可見早就有過過節，是冤家路窄了。這批早先的「保保」們，後來也隨了大潮流，「咸與維新」，搖身一變為造反派。這些哲學系和法律系的教師，自然是通曉刀筆的師爺，得了「首長」的號令，便氣勢洶洶地殺上陣來。然而令人遺憾得很，這個「前進兵團」的批判文章，實在是寫得差勁，其水準與北斗星學會成立儀式上那位「工人同志」相差無幾，批判的內容，也幾乎如出一轍。較新鮮

一點的提法，是指我為「向風車挑戰的堂吉訶德」。但也僅此而已，並不曾將宣言上綱為「每個字都反動」，我也就不屑對他們的批判作什麼反擊。

而出乎我的意料，在我的母校華工，居然連一張批判宣言的文章都沒有出現。僅個別好事者轉抄了一份湖大「前進兵團」的大字報，連同我那篇宣言，一同貼在校園裏。看來華工的師生，對我還相當寬容。有的人對我文革中老是「運交華蓋」，似乎頗為不平，有張大字報乾脆就稱我為「稻草人魯禮安」——大概是說誰都可以從我身上「撈稻草」的意思。

再說我雖然不在乎誰想在我身上「撈稻草」，想撈嘛撈就是了，但因了「曾劉首長」在常委會上的一派胡言，社會上關於「北斗星學會」的流言，一時竟然滿天飛舞。除「老右派分子」白樺之外，還有一個叫梅白的「老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也被說成是我們學會成員，而實際上梅白何許人也，我們都毫無所知（後來才聽人說乃前省委秘書長）。

針對「曾劉」的講話以及社會上的種種流言，我倒覺得有必要澄清一些事實的真相，遂與程林等人商量，是不是召開一次「記者招待會」，以正視聽。程林等均贊成，便借用湖北大學內的一間階梯式大教室，開「記者招待會」。是日不出所料，整個教室都被聞訊而來的「記者」們擠了個迫迫滿滿。所謂「記者」也者，無非是各個大中學校的對「學會」感興趣的學生而已，所提問題雖五花八門，但也都在我們預料之中。所以我幽其一默，稱下面遞上來的提問條子，尚未發現有超水準的問題。下面大嘩，且有人吹口哨起哄。我忙解釋說，所謂沒有發現超水準的問題，並非說各位沒有水準，而是說大家提出的問題，尚未超出我們準備的範圍。這樣一解釋，才總算讓「記者」們安靜下來。我和程林等人就將學會發起之初衷，所奉之宗旨以及學會成員情況，向大家一一作了介紹。程林頗激動地站起來說，我們北斗星學會不過幾個學生而已，魯禮安、馮天文，都是響噹噹的老紅衛兵，硬梆梆的老造反派，行得正、站得穩，不怕那些流言蜚語。我們學會中沒有什麼「老右派分子」，也沒有什麼人叫梅白，梅白是誰呀？請認識的人給我們介紹一下。程林的話引起下面一片笑聲，我隨後回答了有關「宣言」的各種問題。

「記者」們對宣言的內容也很少挑刺，只是有不少人要求我對宣言結尾的那句話即「北斗北斗，未來幾十年的中國世界，將誰主沉浮？」作一解釋。我便解釋說這句話無非是表達我們對未來的一種關注。正像毛主席青年時代寫的《沁園春·長沙》詞中有一句「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一樣，其實那答案是有的，只是未直白而已。我們說未來幾十年誰主沉浮，那答案也是不言而喻，那就是未來是掌握在我們年輕一代的手中。文化大革命以來，不是大家都在說世界是我們的嗎？為什麼我在宣言中將同樣的意思換了種提法，就引起一些人的非議和猜測呢？至於有人挖苦我們是「堂吉訶德向風車挑戰」，那我們可以明確地告訴他們，我們並不是什麼堂吉訶德，我們也不知道他們所謂的風車是指的什麼，但我們確實是挑戰過一些貌似龐然大物的「風車」的——工作組啦、舊省委啦、支左辦公室啦，可惜都是些紙糊的風車。

「招待會」開了一個多小時，我們覺得把我們北斗星學會的來龍去脈都講清楚了，把各種流言都澄清了。該說的都說了，我們沒有什麼好隱瞞的，我們的一切言行都非常光明正大。我相信「曾劉首長」通過他們的「密探」深知所有這一切後，從此不再對我們疑神疑鬼，橫加指責；而「前進兵團」之類的叭兒和候補叭兒們，也一定會從此偃旗息鼓，不再狺狺地亂叫。

然而我們又一次估計錯了。「首長」非但不認為我們清白無辜，反而認為我們是在放煙幕彈、玩花招，並且斷言有所謂「花白鬍子」在我們背後搖著鵝毛扇指揮「應變」。一位軍區領導在一次會議上，甚至明確指責我們學會就是「裴多菲俱樂部」，以致工總一些曾與我以「親密戰友」相稱的頭頭們，都對我敬而遠之，唯恐沾了火星。懾於「首長」的淫威，我們學會的幾個成員也大都惴惴不安，一切預定的計畫都無法實施，會刊《揚子江評論》也暫無出版可能。不久有消息說，北京的一個「馬列主義學會」正在取締之中，而上海復旦大學的「反復辟學會」的日子，也很不好過。看來無論用的是什麼名義，學會也好、自修大學也好，只要是企圖在思想理論上作獨立思考，自主研究，你就是離經叛道，就是心懷不軌，非將你鎮壓下去不可。

學會這條路看來是堵死了，但我們又為什麼非吊死在一棵樹上呢？我們為什麼就不能以群眾組織的合法身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呢？自然，我不會再去樹那面「敢死隊」的旗幟了，「敢死隊」早已完成了它的使命。我也不會去拉什麼「戰鬥隊」或「戰鬥兵團」，要搞就搞一個別具一格而又切合潮流的。這時那位業校代課教師周凝淳，向我提到了毛主席不久前的一段「最高指示」：「進行無產階級教育革命，要依靠學校中廣大革命的學生，革命的教員，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們中間的積極分子，即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周建議說何不就以這個「決心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命名呢？我說非常之好，言正而名順，正好「拉大旗作虎皮」。只是名稱太長，不妨簡稱「決派」。周說不錯，可以就叫做「決派聯絡站」，聯絡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完成學會未竟之事。「決派聯絡站」成立之後辦份報紙也就不困難了，但不一定要叫「揚子江評論」，不妨就直稱「新思潮」的好。他所說的「新思潮」，自然是從毛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那段話中提取而來。他認為「決派」首先應以傳播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新思潮」為己任。

關於這一點周君自有一番高超的理論，他說每一次大的革命運動中，必有新思潮隨之產生：法國大革命之後，有自由、平等、人權觀念的深入人心；巴黎公社之後，有馬克思主義的空前發展；俄國十月革命之後，則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廣泛傳播；在我們中國，則有五四運動後民主與科學思想的大啟蒙。而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後，也必有新的思想、新的思潮湧現出來，問題只是誰能站在新思潮的前沿罷了。我聽得如醉如癡，自認遇見了高人。但周君莞爾一笑，說他才疏學淺，實在算不了什麼，比他高明的人多的是。他說他曾經引我們見過的張志揚、童丹才是真正高人，在他們面前他不過是個小學生而已。他說他們在哲學、歷史和藝術方面都有極深的造詣。不要看他們似乎都游離於運動之外，其實他們無時無刻不在密切關注著這場革命的進程，只是現在還不到他們說話的時候。

他還說他們早就預見到了北斗星學會的結局。這是一個不容許有自由思想存在的時代，所以每一種爭取思想自由的嘗試，都會遭到無情的鎮壓。但是文革中的「大民主」，又確實給了某種言論自由的契機，而言論是思想的外殼，就看你怎樣將它表達出來。後來周告訴我張與童均贊成我打「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

命派」這面旗幟，認為這面旗幟比較能夠團結群眾，而不像北斗星學會那樣，一亮相就鬧得議論紛紛，嚇跑了許多的人。他們認為我那篇學會宣言倒是寫得頗有特色。周君還說他們建議我可以研究一下法國大革命史。

我自然也十分想讀一讀他們推薦的書，但是那時要弄到這樣一本書談何容易，而且我也沒有時間讀這本書。當時有一件突發事件正在引起我的注意，我正打算深入事件的漩渦中心，去作進一步的瞭解。這事件便是有一支來自浠水的號稱「巴河一司」的農民隊伍，佔據了《湖北日報》所在的紅旗大樓。其理由據說是該報在一篇社論中，支持了他們在浠水對立的一派，從而使他們遭致了對立面的殺戮。他們抬著在武鬥中喪生的六具屍體進城遊行，並對《湖北日報》採取了堅決的「革命行動」。指揮這支隊伍進城鬧事的，是一位年約30歲的浠水農民，名叫王仁舟。但王仁舟並非一名普通的農民，他早幾年曾是北京外語學院的學生，因政治問題被開除了學籍。文革開始後北外給他平了反，並給他分配了工作。但他拒絕了學校的分配，寧願和當地的農民一起「造反」，「巴河一司」便是他拉起的造反隊伍。據說此人文韜武略，十分了得，在他的農民隊伍中有著絕對的權威。關於王仁舟的這些傳聞引起了我的興趣，莫非《過秦論》中所說的「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阡陌之中」的農民領袖就是此類人乎？我於是想去紅旗大樓拜訪他一下。

原敢死隊隊員附中學生綽號「小和尚」的周君聽說後，便引了位外校的中學生來見我。這位中學生叫蘭憲生，戴一付深度的近視眼鏡，模樣狡黠而詭譎，人稱「眼鏡蛇」。「眼鏡蛇」說他有辦法帶我去見王仁舟，我便和「小和尚」一道隨他去江漢路。到了那裏只見紅旗大樓前的一段馬路，早已是人山人海，被堵了個水泄不通。在紅旗大樓最高一層的一個窗口，飄出一面旗幟，旗幟上「巴河一司」幾個金黃的大字在陽光下慘澹地閃爍。樓頂的高音喇叭，正在播放那首關於「造反有理」的毛主席語錄歌。聽著「……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的歌子，我禁不住就想起大串聯時在南昌目睹的那次農民暴動。這個王仁舟率領的農民隊伍，和那群烏合之眾有什麼不同呢？我極想探出個究竟。

我們擠過熙攘的人群，越過馬路，走向紅旗大樓。

## 第十章

# 「決派」和巴河一司

被「巴河一司」佔據的紅旗大樓戒備森嚴，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儼然已成為一群造反農民的「水泊梁山」。由於有藺憲生的引路，我們一行才能順利進入大樓，並在一間密室裏會見了這支農民隊伍的領袖王仁舟。

農民問題在中國社會中所佔有的重要地位自不待言，中國革命本質上便是農民造反。從兩千年前的陳勝吳廣起義，到近代的太平天國革命，無不是農民在唱主角。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其主力軍也是農民。毛澤東這位農民的兒子對農民運動的情有獨鍾，那是上了革命經典的。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就十分看好農民運動，稱讚「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毛澤東尤其看重「鄉村一向苦戰奮鬥的主要力量貧下中農」，稱其為「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的元勳」。指出「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

毛澤東對貧下中農以及農民運動的如許評價，對我們這些青年學生思想上的影響至深。文革串聯中，就有女中學生串聯至某窮鄉僻壤，聽說村子裏有某貧下中農一直在打光棍，而想起毛主席的教導，急貧下中農之所急，毅然嫁給那位急不可待的光棍做了媳婦；而河北一位女大學生，為響應毛主席與貧下中農相結合的號召，主動下嫁給一位目不識丁的貧下中農的事蹟，則是上了報的。但不管是這位「與貧下中農相結合」的女大學生，還是那位「急貧下中農之所急的」女中

學生，都不過是現代愚昧的犧牲品而已，在不久的將來必定大後其悔。

然而痰迷心竅的，又何止是這幾位稀裏糊塗就將自己「生米煮成熟飯」的女學生，將貧下中農及其革命性抬到至高位置的大有人在。例如我自己，就對毛的那套農民革命「大元勳」的理論，曾經深信不疑，直到在長征串聯途經南昌時，目睹過那一次「農民運動」之後，才有所動搖——成千上萬名被當地的當權派們雇傭來的郊區的貧下中農，十人一排，肩並著肩手挽著手，鼓著眼睛喊著口號，以排山倒海之勢，衝進江西醫學院血洗校園的「革命」場景，這一輩子恐怕都會讓我刻骨銘心。那真正是稱得上「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呀！但這些「革命先鋒」、「革命元勳」們「迅跑」進大學校園裏的所作所為，除了證明他們是一群不折不扣的「痞子」、「暴徒」之外，還能證明什麼呢？

我當然不能以偏概全，依據那次在江西偶然的「目睹」，就懷疑早經偉大領袖認定的農民兄弟的革命性。但眼見為實，總不免想到，像這種被當權派用一點錢收買來大搞打砸搶的農民的「革命」，和魯迅筆下阿Q兄的「革命」，本質上似無兩樣。只要「用一支竹筷將辮子盤在頭頂上」充革命黨，便「要什麼就是什麼」，「直走進去打開箱子，元寶、洋錢、洋紗衫……」。當然時代不同了，革命的標誌，也早已不是「將辮子盤在頭頂」而是將「語錄」舉在頭頂上，但我仍以為這些「革命先鋒」骨子裏的血型，還是「阿Q」型的。例如毛澤東當年推崇備至的「痞子」們，既然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也要「踏上去滾一滾」，那「痞子氣」也就與垂涎秀才娘娘那張寧式床的阿Q，差不到哪裏去。

不過雖然因為有了在江西那回「目睹」的經驗，使我對農民兄弟的革命性有所置疑，但當我拜會巴河一司的領袖王仁舟時，毛的關於農民運動的經典之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仍是指導我如何看待農民運動的「聖經」。書中那段「革命不是請客喫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的著名論述，更是我們支援一切「矯枉過正」行為的理論根據。

我總是想，像我遇見過的那些江西的農民血洗江醫的行動確實是野蠻的，但那是農民受了「走資派」的蒙蔽和操縱，是農民運動中的逆

流。一旦農民們將運動的矛頭，真正指向了農村中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指向了一貫騎在他們頭上作威作福的公社和大隊的老爺，那麼農村文化大革命運動就是真正興起來了。而那時我堅信文化大革命必遵循學生運動、工人運動、然後農民運動這一規律發展。在我眼裏，王仁舟的巴河一司正是貨真價實的農民造反組織，其進城造反的行動，正是湖北農村文化大革命高潮將至的一個信號。但是在與王仁舟交談後才知道，王仁舟對他們巴河一司進城造反的意義的評估，遠不止於此。

「我們農民造反才是文化大革命的真正開始。」王仁舟雙手捧著一隻裝滿開水的瓷杯子站在我面前，十分自信地說，那口氣簡直就像教皇佈道般不容置疑。「你們城裏人先前鬧的學生運動、工人運動，統統都不過是給我們農民運動打前站。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力量不是學生，也不是工人，而是我們農民，是貧下中農。我們貧下中農不僅是革命的主要力量，而且是革命的領導力量。」見我臉上流露出困惑不解，這位披著一身洗白了的軍用緊身棉襖的「農民領袖」解釋說，這並不是他的標新立異，而是根據毛主席的階級分析法，必然得出的結論。

王仁舟說，按照毛主席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的理論，階級的革命性由階級在社會中所處的經濟地位決定。解放十八年來，經濟地位最低、生活最苦的就是農村中的貧下中農。而城裏的幹部、工人和知識份子生活有保障，經濟地位提高了很多，已是屬於既得利益階級，他們已經不再有繼續革命的要求。農民則不一樣，面朝黃土背朝天地辛苦一年，許多人還是連起碼的溫飽都不能解決，所以最迫切要求改變現狀。王據此斷定，中國社會最進步的階級，已經不是工人階級而是農民階級。

王仁舟的一番高論著實讓我吃驚不小，我對「農民階級是中國社會最進步的階級」一說實在不敢恭維。因為階級的進步性，並不只是由階級所處的經濟地位所決定，否則城裏的乞丐和鄉下的叫化子也即所謂「丐幫」，就是當今最進步的階級了。我後來對程林提到王仁舟的「理論」時，程也不屑地說王仁舟的觀點純粹是謬論。階級的進步與否主要是看它是否與先進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相聯結，王仁舟連這一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都沒有，還奢談什麼「理論」？程林的話自然不錯，

但是我想曾經用大力氣研究過馬克思主義的王仁舟，未必真的連這點常識都沒有，他不過是用一針「先進階級」、「領導階級」的嗎啡，來調動他的農民隊伍的積極性罷了。毛澤東同志當年不也稱讚農村中的「痞子」為「革命先鋒」，斷言貧農領袖中百分之八十五人都變得很好、很能幹、很努力嗎？也無非是給農民帶高帽子罷了。王仁舟看來是深諳此道，不然豈能將手下的幾千人馬帶得服服帖帖。

其實王的相貌十分平常，個頭不高，一米六幾而已，精瘦、黝黑，但強悍而精明，一雙小而有神的眼珠，像裝了軸承似的在也許是因過於疲勞而深陷的眼眶裏，咕碌碌地不停地轉動。而當那雙眼珠把你盯死時，你會感到那眼珠裏像「福爾摩斯探案」中的那頭巴斯克維爾的獵犬一樣，閃著可怕的磷光。據藺憲生說，王仁舟曾是北外西語系的學生，攻西班牙語，常自稱是毛澤東的侄女王海蓉的同學。王仁舟在大學裏即醉心於政治，專業學習並不努力，卻一頭埋在對政治理論的研究中。據說他很早就對彭真的「修正主義」思想提出批評，對黨的諸多方針政策也常妄加評論，並因此而受到記過的處分，直至被開除學籍。據說在年級輔導員將他遣送回鄉時，他對輔導員說「歷史將證明我是正確的。」文革中彭真率先被打倒，歷史果然證明了他的「正確」，學校給他平了反，並且按畢業生資格分配他前往一所中學教書。但是這位「反修鬥士」哪裏還把區區教書先生放在眼裏，他借此文革大潮，就地拉起一支農民隊伍造反，成了巴河一帶乃至浠水地區遠近聞名的「農民領袖」，且以「農民階級是最先進的階級」的理論名噪一方。

對於王仁舟的這套理論，他手下的那幫農民人人深信不疑，個個背得滾瓜爛熟，可見其理論之深入人心。但他這套理論說服不了我們，我們也不想和他們去爭論這個問題。在和王仁舟的幹部們會面時，我避開這個問題不談，而是強調毛主席的一段話：「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份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表示願意和農民兄弟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我說我們青年學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起過先鋒作用、帶頭作用，但我們青年學生只是革命的一支生力軍，而不是主力軍，主力軍是工農大眾。只有依靠這支主力軍才能奪取文化大革命的最後的勝利。文化大革命中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還

不夠，還需要有農民運動的配合。農村中落後的習俗、反動的宗族勢力、為非作歹的貪官污吏，以及劉少奇在農村中推行的一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都必須通過一場浩大的農民運動來予以摧毀。我讚揚巴河一司擔當了這場鬥爭的先鋒部隊的重任，稱巴河一司的崛起是農民運動在湖北乃至全國興起的一個標誌，表示對巴河一司的鬥爭精神和革命行動予以堅決的支持，總之是信口開河了一大通。

王仁舟站在我的旁邊，大約是見我通篇沒有提及他的農民階級是「最先進的階級」和「領導階級」的創造性理論，頗有點不快。於是在我講完話後，王又再次鼓吹了一通他的「先進階級」和「領導階級」論，並且特別強調不承認這一點，就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從不敢奢想我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也談不上——如三十年後海外的文革研究者所稱——是什麼「馬克思主義的不同政見者」。但在我眼裏，王仁舟也絕不是什麼「馬克思主義者」，充其量他大約有點像個「民粹主義」分子——否認無產階級是最先進最革命的階級，雖以農民的代表自居，實際上蔑視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熱衷於採取個人恐怖手段等等。王仁舟後來的所作所為表明，農民群眾在他眼裏其實是一群供其驅使的愚氓而已，而王仁舟操縱他的農民部下的手段則陰險狡詐而又兇狠。但我剛接觸王仁舟時並不清楚這些，我們只是從藺憲生那裏來瞭解王仁舟的，而藺憲生對王仁舟簡直崇拜得五體投地。

「王仁舟不能跟一般的造反派頭頭比，王仁舟是天才。」藺憲生用極其虔誠的口氣對我說。藺下巴尖尖腦門突鼓，頭成個倒三角形，鼻樑上又架了副深度的近視眼鏡。加上目光閃爍，行為詭詐，所以得了「眼鏡蛇」這麼個雅號。「眼鏡蛇」無論在什麼場合，總是一付神神秘秘、鬼鬼祟祟的樣子，有點像一部丹麥影片《瞎子的領路人》裏那個古怪教士的模樣。藺憲生雖然只是個中學生，但膽大妄為，腦子裏怪點子也多。他父母怕他闖禍，將他鎖在家裏不准出來。但「眼鏡蛇」哪裏是鎖得住的，一下子就從窗子裏溜了出來，父母也拿他無可奈何。

「我是不喜歡讀死書、死讀書的，」藺憲生曾一本正經，振振有詞地對我說，「也沒有時間讀那麼許多的書。我喜歡聽人家講話，聽學問多的人講話。從這些人的講話中，我就得到了他們用很多時間，花費很多工夫，才從書本中淘出的精華。取其精華——這才是獲取知識的

捷徑。」現在他成天跟著王仁舟轉，一心要從「天才」口中取其精華，好提升自己的「內功」。

有一次藺憲生告訴我，巴河一司在他們的地盤裏是不賣公糧，也不繳稅的。我說這樣做不是犯法嗎？藺嘻嘻一笑，說「犯法？犯什麼法？王仁舟這樣做是有理論依據的。」他說王仁舟仔細研究過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發現其中有一條理論叫做「貨幣不外流」。「你看，王仁舟對馬克思的經濟學研究得多麼深刻，這才真正叫做活學活用。」

儘管藺憲生說得眉飛色舞，口沫直飛，我還是如入五里霧中，一點都弄不明白。

我讀馬克思的書甚少，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更是不摸門，也從未聽說過什麼「貨幣不外流」的理論，自然也看不懂這種理論和「拒交公糧」有什麼關係。我就搖頭說我搞不懂。

藺憲生說我們當然是搞不懂囉，搞不懂才證明人家有學問。

儘管對有學問的「農民領袖」王仁舟的一些做法搞不懂，我對他領導的「巴河一司」仍推崇備至。我很有一陣子都認為「巴河一司」的崛起，是文革中湖北乃至中國農民運動高潮將要來臨的預兆。我在《決派宣言》第一稿中宣稱：

決派以最大的熱忱準備迎接中國農民運動高潮的到來。

中國最大的戰爭，無不是農民的戰爭，中國最大的運動，無不是農民的運動。震撼世界的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倘離開了五億農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從學生運動到工人運動，最後發展到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這是中國近代革命的一般規律，是歷史的必然。是站在農民運動的前頭領導他們，還是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劃腳地批評他們，還是站在他們的對立面反對他們，將區分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小資產階級革命派。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今天，最徹底地蕩滌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一切污泥濁水，清洗中國農村幾千年堆積起來的垃圾髒物，在我國農村大樹特樹起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已經成為一項重要的歷史使命擺在我們每一個人面前。

這份起草於六七年底的《決派宣言》草稿，從頭至尾都是使用的「毛語言」，似乎並不犯忌，而在支持農民運動的這桿大旗之下，前來紅旗大樓報名參加「決派」的人愈來愈多（其實主要也就是中學生），而王仁舟這時便與我發生了公開的衝突。他也許認為，「決派」的領導權，應當掌握在他這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手中，而不是旁落在我們這些「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手裏，但衝突的導火線卻只是幾冊「內部讀物」。

原來這紅旗大樓的最高一層，有幾間屬於報社的圖書室，藺憲生有天發現內藏大量社會上不易見到的「內部讀物」。「眼鏡蛇」的這一發現使我興奮不已，因為所謂的「內部讀物」，也就是不讓一般百姓接觸的「禁書」，而偷嘗「禁果」，正是亞當夏娃的子孫們的天性。對一班書生來說，「雪夜閉門讀禁書」，更是一種最令人神往的享受。文革以來廢黜百書獨尊毛著，一般百姓能讀到普通的「封資修」書籍已屬不易，何況「禁書」！現在機會來了，豈能坐失？

一連幾個晚上，我都和「眼鏡蛇」、「小和尚」一道，悄悄潛入圖書室偷書。我在那幾間書屋裏，順著書架一架架地瀏覽過去。彷彿又找回了剛進中學那年第一次進入學校圖書室的感覺。我從書架上抽出美國作家威廉·夏伊勒那本論述希特勒法西斯從崛起到覆滅的名著《第三帝國的興亡》，抽出描述美蘇兩國在冷戰期間互搞間諜活動的《秘密戰》，還有那本關於以色列特工活動的《摩薩德》。我還選中戴高樂的《戰爭回憶錄》、托洛茨基的《第四國際》，以及蘇聯作家愛倫堡的《解凍》，林林總總，總有一二十本吧，都搬到我們暫住的小房子裏。但我還不滿足，恨不得將所有「禁書」都攬入懷中。

於是每天晚上等到夜深人靜時，我便潛進書室看書，有時看得累了，便翻過書室的一扇窗子，爬上樓頂俯視下面的街道。江漢路上偶爾路過的螞蟻般的夜行客、甲殼蟲似的小汽車悉收眼底。街道一角，賣夜宵的小販間或喊的一聲「桂花茶葉蛋……」餘韻未盡，馬路斜對面，雄踞一方的江漢關的大鐘已敲點報時。聽著飄蕩迴響在寒冷的夜空中的鐘聲，我忽然全身一陣寒顫。在整個江城都已沉入夢鄉之時，我卻蹲在這座大樓的二十層頂樓上，窺視這個世界，不禁有一種夜半時分因扮演「樑上君子」而「高處不勝寒」的感覺。

說到「偷書」的問題，很慚愧，我文革中不止一次扮演過「樑上君子」的角色。之所以「偷書」，固然與那時買不到書、也借不到書有關，但恐怕還是骨子裏認為「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麼？」總之是孔乙己的一套歪理，上不得臺盤的。

我們自以為十分隱密的夜間行動，不久就被王仁舟的耳目所察覺。一天我從外面回到紅旗大樓，發現住室內一片狼藉，所有的「內部讀物」都被王仁舟的部下搜走，堆在他們的指揮部裏。我便去找王仁舟，但王仁舟睬也不睬我一眼，只顧向他的部下痛斥學生的「偷盜行為」。他痛心疾首地說：「鄉親們吶，這些堂堂的大學生白天喊革命，半夜裏卻躲在大樓裏偷公家的書哇。你看他們偷的都是些麼事書嘛，希特勒的、托派的、蘇修的，還有什麼搞間諜戰的，儘是些烏七八糟的東西。這些學生伢們好書不讀，專讀壞的，思想硬是有問題呀……」王仁舟義正辭嚴的一番話，還真叫我們耳紅面赤，羞愧難當，只聽他不依不饒地繼續說道：「蒸飯隔炊皮，人心隔肚皮，真是應了一句老話，知人知面不知心哪。我們還真以為這些小將是來幫助我們貧下中農鬧革命的呢，其實都是些偷書賊，還有臉稱自己是麼小將。麼事小將不小將，芝麻醬、豆瓣醬，我們要不要把他們統統攆出去呀？」王仁舟的部下們於是一片含糊不清的應和聲。

我當時一下子被搞懵了，王仁舟居然為這幾本書的事，突然翻臉不認人，實出我意料之外。批評一通也就夠了，怎麼竟還要趕人，是不是做得也太絕了一點。倒是王仁舟手下的農民厚道得多，他們押送我們捲鋪蓋走人時，客客氣氣一臉的無奈，很難為情的樣子，大概也覺得他們的頭兒做得有點過份。但據「眼鏡蛇」說王仁舟對我還算是客氣的，倘是他的部下冒犯了他，他弄不對就一聲令下將人吊將起來。

據藺憲生說，書的事其實不過是個藉口，翻臉的根本原因，是王仁舟懷疑我進紅旗大樓後，在他的內部搞「策反」。原來我這一陣子在大樓裏，找了些巴河一司的農民談話，瞭解農村的情況，都被王的耳目報告了上去，使王產生了疑心。藺憲生說王仁舟一直就對我抱有警惕，懷疑我進紅旗大樓的真實目的，是要控制他的這支隊伍。我恍然大悟，連呼冤乎枉哉。王仁舟真是高抬了我，我哪有如此深的城府，我又哪有如此大的本事？何況我從來都不曾想過取王仁舟的草頭王的

地位而代之，我為什麼要去「策反」他的隊伍？莊子上說，有一隻貓頭鷹抓到了一隻腐鼠，有「腕鱉過亡，仰面視之曰：嚇！」王仁舟的胸襟，大概和那隻貓頭鷹差不多，但他既然對我「嚇！」了，那也只好分道揚鑣。王仁舟卻並不就此甘休，就在我們撤出紅旗大樓的第二天，武漢三鎮忽然到處出現了斗大的告示，王仁舟居然以「決派聯絡站」的名義，將我這個「陰謀家、野心家」開除出「決派」。此佈告真令我有點哭笑不得，我發現我第一次碰見了一個懂權術，工心計，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權欲極強而疑心極重的「政治家」了。王仁舟究竟何許人也，王仁舟的「巴河一司」究竟何許司也？我倒想要探個究竟了。

我決定前往浠水巴河作一次調查。我手下有十多名學生願與我同往，我班上有兩位同學一位叫李廣一位叫梁克家的，也聞訊趕來參加了我們的考察隊伍。於是一行共18人，浩浩蕩蕩從水路直奔浠水。在浠水縣城呆了一日，瞭解了一些「巴河一司」對立面的觀點後，便去巴河。巴河方面已得知我們要來，早已森嚴壁壘，嚴陣以待。但我們聲明此行只是「考察」而已，不帶觀點，請他們提供方便，並保證一行人的安全。巴河方面似乎很快便與王仁舟取得了聯繫，並接到了王的指令，遂放我們一行「入境」。

一踏進巴河地界，便有「巴河一司五洲總部」一張佈告赫然入目，佈告稱「當此決戰緊張階段，凡是在巴河五洲境內從事陰謀破壞、肆意搗亂、勾引煽動、武鬥暗殺等破壞中共中央六六通令的行為，經當地人民告發，就地查處，一經證實，嚴懲不貸」。見此佈告的行文口氣，彷彿是到了抗日時期的八路軍根據地，特別是那句「一經證實，嚴懲不貸」，使人不敢輕慢。

到達巴河一司五州總部，一位姓張的頭目接待了我們。據悉張曾是華工學生，反右時因有右派言論，被學校開除了學籍，文革中成為巴河地區五州公社內與王仁舟對立的一派的首領。在一次武鬥中張被王仁舟生擒，結果為王仁舟招降，成為王的副手。也算是兩個同被大學開除過的「同類項」，彼此惺惺惜惺惺吧，在巴河一司中，王仁舟稱「統帥」，張則稱「副統帥」。我們在文革中，只知有毛澤東和林彪這一對「統帥」和「副統帥」，何曾知道在此小小巴河，也有這麼一對。但全

國上下造反組織多矣，有幾人敢自稱「統帥」、「副統帥」，也可見王仁舟一夥草頭王膽子之大了。

不過接觸中這位「副統帥」人倒也還謙和，不像王仁舟那樣跋扈。他詳細地重點向我們介紹了他們在五州公社正建設中的「新農村」，並派人帶領我們進行參觀。所謂「新農村」，似乎較「人民公社」更為「一大二公」。農民們在村子的一角，集中蓋起一棟棟整齊劃一的平房，作為村民的統一住宅，而打破傳統的一家一戶分散居住的格局，以便於管理和指揮。村民們以班、排、連為單位，平時生產，戰時打仗（武鬥），以這種半准軍事化的組織，代替了原先的生產隊和黨支部。王仁舟還將各類工匠集中管理，不許像以往一樣隨意走村串戶，其收入全部上交，然後返還一部分作為工匠們的工分，說這就叫「割資本主義的尾巴」。中小學生也實行統一住宿、統一行動，以利於培養訓練「後備隊伍」。大的規劃則是在巴河逐步廢除私有財產，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統一服裝，共同聚餐；設工廠與作坊，滿足村民日常生活之需要。其實質大約類似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或中國革命蘇維埃政權時期的「戰時共產主義」。但時代已大不同，這種「戰時共產主義」，其實是違反歷史潮流，在實際中也根本行不通。但當時在我們這些學生眼裏，卻以為乃「革命的創舉」。

我在返漢後發表的《浠水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對巴河的「新農村」作了充分的肯定：

在巴河五州地區，使工匠集中，辦合作社，搞綜合廠，是群眾早有的願望。歷來因為公社黨委內一小撮走資派的阻撓而不能成功。五州總部成立之後，立即撥款八百多元，加上匠人自動籌款共一仟多元，建成了一棟房子，匠人集中（在內）管理，深受當地貧下中農歡迎。「新農村」拆除了原有的房屋，集中地蓋了平房便於管理，方便生產，而且首先照顧了最困難的貧下中農。當地的貧下中農高興地對我們說，社會主義道路人人都要走的，不過我們先走了一步。

我在《報告》中還熱烈讚揚巴河一司的各項「革命創舉」，稱讚這些所謂的創舉乃「共產主義的萌芽」。我說：「是仍然依照第三個五年計劃

那樣按調整政策慢慢地推動農業的發展，還是隨著生產力的提高，造成一個五八年似的大的革命熱潮，向二級甚至一級所有制進軍呢？貧下中農迫切地希望著後者。」

但事實上果真如此麼？其實這只不過是我在浮光掠影地觀察了一些表面的現象，參加了一些由巴河一司的頭頭們主持操縱的座談會後，得出的主觀臆斷罷了。特別是由於我缺乏對歷史的瞭解，不懂得王仁舟所有這些「革命創舉」，其實早在「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時期，就已被毛澤東在全國範圍內大力推行過。「一平二調」、「共產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等的極左政策，曾經將中國農村推向苦難的深淵。而眼下集黨政軍權於一身的王仁舟，將此極左政策更加變本加厲地在巴河地區他所控制的範圍內強制推行，其後果將不堪設想（我後來曾設想過，王仁舟大概是柬埔寨波爾布特一類的人物，幸好他沒成氣候）。

而我僅僅以在「革命群眾運動」來臨之時，只能站在前面引導之，而不能「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劃腳地批評他們」，更不能「站在他們的對立面反對他們」為由，不加分析地對所謂「新農村」作盲目的吹噓與讚頌。而對當地一些不同的聲音，如反映巴河一司拒交公糧、武裝抗稅、私設監牢、刑訊逼供、草菅人命之類的反面材料，卻主觀地認為是不實之辭。

我後來由此得出教訓，凡帶著框框進行某種調查，必難以得出正確的結論。即使是偉大如毛澤東，在其早期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也有諸多因帶主觀色彩而下的斷語經不起推敲。例如毛說「據衡山的調查，貧農領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變得很好、很能幹、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習氣」。此「百分之八十五」的比例毛是如何得出來的？又如毛說「農民的眼睛，全然沒有錯的，誰個劣，誰個不劣，誰個最甚，誰個稍次，誰個懲辦要嚴，誰個處罰從輕，農民都有極明白的計算，罰不當罪的極少」，這個評判其實也大可商榷。事實上作為小農經濟產物的中國農民，根本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就因「革命」變成了聖賢。毛對農民的「革命覺悟」的高度評價，其實無非是出於毛要利用這支可以形成「暴風驟雨」的破壞力量而已。至於我的這篇「東施效顰」的《考察報告》，當然更是只能留下一個笑柄。

後來我想我在浠水巴河一個星期的「考察」中，也許只有一句話可謂實事求是經得起考驗。這句話是有一天我在田野裏小解之後脫口而出的，我說「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可以隨地大小便。」這句話當然是從偉大領袖那句「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語錄生吞活剝而來。按照文革中的上綱上線法，這種對主席語錄的「惡意篡改」，無疑夠資格上綱上線為反革命行為，但和我同行的一行人只是報以哄堂大笑。「小和尚」並且開玩笑地宣佈，此為魯氏最新最低指示。入獄之後，老實說我一直都擔心，那一行人中如有誰揭發我那句「反動言論」，那我是要「罪加一等」的。幸而誰也不曾揭發，都非常的夠意思。

在浠水「考察」一周後，我們一行人返回了武漢，途中就聽說盤踞在紅旗大樓上的那些農民，遭到「三新」的血洗。雄赳赳率先殺上大樓的是工造總司的「鐵軍」，「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等學生組織，則作為偏師搖旗吶喊為「鐵軍」助陣。「三鋼」方面則在一旁按兵不動，作壁上觀。據悉巴河一司所封之《湖北日報》，乃「新派」之陣地，故「新派」必不能對巴河一司之舉動放手不管，遂在軍區首長的授意下，對巴河一司的農民演了一場全武行。孤軍進城的鄉里人哪裏是他們的對手，當然是被打得落花流水。

我們進到紅旗大樓，只見那些農民們三三倆倆，在大樓的過道裏或坐或躺。不少人被打得頭破血流，捂著包紮過的傷口，望著牆壁發呆。他們大概怎麼也不曾想到，同是「造反」，城裏的工人老大哥，怎麼就會對他們大打出手。這一點恐怕他們的「統帥」王仁舟也說不清楚。而這位「統帥」的頭上，此時也纏上了厚厚幾圈紗布，紗布上滲有斑斑血跡，煞是嚇人。但我總疑心他是裝的，因為他在這方面的本領，已讓我不止一次地大開眼界。比如我親眼見過他將「鋼九一三」支援他們的大米白飯，讓給部下食用，而自己寧願啃家鄉帶來的紅薯，他的這一舉動，使他的部眾們感動得熱淚盈眶。然而聽「眼鏡蛇」說，其實背地裏有他的女秘書從外頭買了牛奶點心肉罐頭，悄悄供他享用，其虛偽一至如此！

又比如他當著他的部眾的面，義正辭嚴地訓斥我們偷看「禁書」，而這次我們重返紅旗大樓時，卻發現這些「禁書」，全被他留在自己的

密室裏翻閱。還有，王仁舟熱忱地號召青年學生去他們農村「與貧下中農相結合」，可是真有學生投奔而去，他又視若草芥，而女學生則成為他獵豔的對象。有一位高中女學生，就險遭王仁舟的侮辱。這位體態豐滿的漂亮女學生「虎穴脫險」後，淚流滿面地說，「什麼農民領袖，活整的一個大騙子、大流氓！」也許這就是王仁舟的本來面目吧，但農村中的權貴們有幾個不是這樣？後來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中，又有多少女知青慘遭農村基層幹部的蹂躪和糟蹋，王仁舟不過是他們的一個代表罷了。

王仁舟的偽裝也並沒有能維持多久，他不久便倒了瓦（湖北方言：倒楣的意思）。牆倒眾人推，其部眾紛紛上臺面對面地控訴這位昔日的「英明統帥」，連他那位貼身女秘書，也反戈一擊，控訴到淚流滿面，而當初為王出謀劃策且自薦枕席者，也正是其人。這位浠水的女學生，因在倒戈後抖出大量人所不知的王仁舟的醞釀事，有立功表現，而倖免於牢獄之災，但也從此一蹶不振。許多年後，有人見過她帶著一個女娃，在漢口某浠水長途汽車站賣車票。這位曾叱吒風雲能說會道的嘹亮的女將（嘹亮：湖北方言，指能幹、潑辣、叫得響的意思），已是滿頭白髮滿臉滄桑，當年之風采早就蕩然無存。

至於王仁舟，聽說後來是病死於獄中。

據我對王仁舟的觀察和瞭解，王其實是文化大革命中真正具備所謂「領袖素質」之一人。如若他不是囿於農村，而是在城市中為「工人造反派」之一員，以他的手腕和權術，所有的工人造反領袖，都將非其對手。至於我們這些乳臭未乾的學生娃娃，就更不能望其項背了。王仁舟的政治上的成熟和老練是顯而易見的，他很早就深諳了政治鬥爭的本質，他的一句名言是「政治就是騙」。王仁舟對政治的這種理解，曾經使我們感到憤怒，程林就引過列寧的話來駁斥王的謬說——列寧說政治上的誠實是有力量的表現，而不誠實則是虛弱的表現。

列寧的話當然不會錯，但是事實證明王仁舟的說法也並非妄談。從王仁舟在文革政治舞臺上臺前臺後的表演來看，此人的確是以騙術來駕馭他的部眾。但是中國歷來的「農民領袖」又有幾個不是行騙的高手呢？從農民起義的那位老前輩陳涉「丹書帛曰陳勝王置入所罾魚腹中，又間令吳廣之次所旁叢祠，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

王」，到近代史上太平天國起義的領袖洪秀全稱：「病死七日而蘇，能知未來事」、「通天語」，自稱乃上帝耶和華的小兒子，哪個領袖不靠一個「騙」字來威懾民眾？成者為王，騙是革命必需的策略；敗則為寇，不過一江湖騙子而已。數不清的農民起義的山大王，不管是「為王」還是「為寇」，本質上都差不多，王仁舟不過是他們中不幸淪為「寇」的一個。但信奉「政治就是騙」哲學的，似乎也不只是「農民領袖」，林彪這位「無產階級革命領袖」，不就揚言「不說謊話辦不成大事」嗎？當然林彪後來是叛逃了，他的話不足為訓。那麼約瑟夫·斯大林呢？他可是蓋棺論定的「無產階級偉大革命導師、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啊，他不是在不擇手段剷除異己以達到權力最高峰方面，將騙術使用到了極致嗎？無怪乎「眼鏡蛇」告訴我，王仁舟說他最崇拜的人就是斯大林。我對王仁舟之崇拜斯大林頗不以為然，那時斯大林在我們許多學生眼裏，早已光芒褪盡。王仁舟崇拜斯大林什麼呢？無非是崇拜他的鐵腕暴政、兇惡冷酷、狡詐和偽善。但是我那時又認為王仁舟的個人品質，並不能改變巴河農民運動興起的意義，正如太平天國的領袖們的一些卑劣的個人品質，並不能改變太平天國革命的進步意義一樣。

我在《考察報告》中說：無論王仁舟這個人應當怎樣評價——這乃是巴河一司農民自己的事——以巴河一司為代表的浠水農民運動預示著一場偉大的農村革命風暴正在掀起卻是沒有疑義的。過去時期的整個文化大革命運動，可以說都是對農民運動的一個發動。左右中國革命全局的問題是農民運動，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運動，正以無限的生命力磅礴全中國。不僅在浠水，而且在廣濟、麻城、當陽，更遠一點，湖南、江西、福建、廣西等具有革命傳統的地區，據我們所知農民運動都在蓬蓬勃勃地開展。《人民日報》社論說：群眾運動的動向，決定事物的本質。各地農民運動的蓬勃興起，決定了一場更大規模的狂風暴雨不可避免的到來。從學生運動開始，發展為工人運動，最後走向波瀾壯闊的農民運動，我國現代史上的革命運動的這一般規律，畢竟全部地在我們面前展示了。

我那時在《考察報告》中如是說，既是以所謂「革命的一般規律」為依據，也是對中央發佈的一個《關於今冬明春農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的文件產生了誤解。將文件中旨在逐步恢復城市秩序的同時，避免農

村因效法城市造反而產生混亂的精神，誤認為是中央準備利用農閒之機，在農村掀起一次文化革命高潮的預告。我認為中央將以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動員組織廣大農民對農村中傳統的宗法制度、家族統治、封建迷信，以及各級壓在農民頭上作威作福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來一次徹底的掃蕩。

但我的認識實際上完全是一種主觀的猜想，事實上中央已對城市運動的失控深感不安，豈能將「造當權派的反」這把火燒到農村。建國以來城鄉之間事實上的嚴重差別，早已引起農民的不滿和憤懣。所謂「滿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不滿的心理經長年的積聚，最終是會從怨自己命苦走向怨城裏人、怨現行體制直至政府和整個制度。這種心理隨時都在搜尋釋放的途徑和宣洩的標的，一旦得到有效的動員和調動，將演化成反社會的群體行動，直接威脅到社會的穩定。像王仁舟領導的巴河一司，就是借文革中「造反」的名義，有效地動員起了農民的仇富心理，已形成一股對現存社會秩序破壞性極大的力量。而農村中類似的力量遭遇一起時，因利害關係或融合一起或勢不兩立，則武鬥勢必成為這些力量彼此較量的主要方式。

事實證明，「革」與「保」的矛盾在農村中是次要的，重要的問題是對權力的爭奪。所以農村文化革命一開始就是兵戎相見，形同舊社會的械鬥，但規模則巨大得多，一旦任其發展，後果難以想像。所以與我們預期的相反，《人民日報》、《紅旗》、《解放軍報》聯合發表的1968年的「元旦社論」，隻字未提開展農村文化大革命的問題，這無疑昭示中央並無「今冬明春」在農村掀起農民運動高潮的意思。這樣在王仁舟帶著他的隊伍悄然撤出武漢後，我們也逐漸放棄了對農民運動的宣傳。而王仁舟在退守巴河後不久，便弄到眾叛親離，直至被扭送至監獄，結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在對農民運動高潮到來的預期落空之後，《決派宣言》一稿中所謂「決派以最大的熱忱準備迎接中國農民運動高潮的到來」無疑成了一句廢話。決派中許多中學生都就此向我提出了質問，並要求我重新起草一份宣言。他們希望我在新的宣言中，能對臨時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成立後文革運動的走向，作出一定的分析和預測。大家都認為既然革命委員會僅僅只是一個奪權鬥爭中產生的「臨時權力機構」，那麼將由

一個什麼樣的正式權力機構來取而代之呢？大家都希望對革委會這種權力機構形式作出實質性的解剖。不斷地反復討論的結果，表現為《決派宣言（第二稿）》中的如下內容：

革命委員會的成立並沒有消滅兩大派的對立，它不過是用新的兩大派別代替了過去的革與保之爭，鋼與新之爭，用新的鬥爭形式代替了舊的。它實質上不過是一個各派派性被大力壓縮了的一個臨時的同一體，而即使就是這樣一個同一體也是極不鞏固的。這種臨時權力機構中的各派政治勢力，決不可能長期的和平共處下去，而必須由一派通過鬥爭取得統治地位。

由於革命委員會本身實際上都是捏合起來的，是一個典型的折衷主義的產物，我對革命委員會的分析不能說沒有道理。我在宣言中還認為，這個臨時權力機構中的那部分「決心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將通過鬥爭，最終取得統治地位。我特別提到其中的知識份子，我認為這些多半已掌權的知識份子，正面臨一個改造自己，使自己真正取得工人階級的代表資格的過程，否則必將成為曇花一現的人物。此外我特別提到「過去受過蒙蔽的曾是保守派的工農群眾」，認為這些群眾「一經改正，也可以成為決心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我對「過去受過蒙蔽的工農群眾」的倚重，是出於我對一部分掌權的造反派的失望，感到要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最終還得依靠較少私心雜念的「受蒙蔽群眾」。這種觀點自然和那時的一班造反派領袖的觀點大相徑庭，這也是我後來受到一些造反領袖非議的原因之一。

我在「宣言」這一稿中，雖然指出「革委會」這個「由革命群眾自己創造出來的新事物」，最終還是會被「革命群眾」淘汰出歷史舞臺，但還沒有明確提出「革委會」將被一種什麼樣的新的國家形式來取而代之。湖南一個名叫「省無聯」的造反派組織，那時正在洞庭湖的那一邊探索同樣的問題。他們在一篇題為《我們的綱領》的文章中，提出湖南的「省革籌」實際上是舊政權的翻版，對它必須實行「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的原則」。而一位名叫楊曦光的中學生，則在一篇題為《中國向何處去？》的文章中認定，「現在90%以上的高幹已經形成了一個獨特的階

級，……這個紅色資本家階級已經完全成為阻礙歷史前進的一個腐朽的階級，他們與人民的關係已經由領導和被領導變成統治和被統治、剝削和被剝削，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關係變成壓迫和被壓迫的關係……」提出必須推翻這個「十七年來在中國形成的官僚主義者階級」，主張利用「革命的不平衡性，在一省或數省首先採取真正徹底的勝利，推翻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產物——革委會的統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權。」

省無聯的這些文章，雖被中央高層作為反面教材點名批判，但其中「官僚主義者階級」這個提法，其實在毛澤東文革前的文字中早已有之。毛在1965年1月對國務院農村辦公室副主任陳正人蹲點報告的批示中說，「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從毛澤東的這種思路來看，無論是「四清運動」，還是「文化大革命」運動，都似乎旨在發動群眾剷除這個正在產生的「官僚主義者階級」。

不過無論是「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好，或是這個「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的「官僚主義者階級」也好，儘管都是源於毛澤東本人的提法，但湖南「省無聯」的觀點實際上與毛還是有著很大的區別，毛所說的那個「官僚主義者階級」，在「省無聯」那裏被明確指為是黨內90%以上的高幹。也即幾乎所有的高級幹部，都被認為已變成赤裸裸的「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都必須打倒。這種觀點即使是在文革的大背景下也過於激進，不容易為多數人接受，就連像我這樣的激進分子，那時也並不完全認同「90%以上的高幹已經形成一個獨特的階級」的提法。對於楊曦光等人機械地借鑒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對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分析，將「一月奪權」後建立的「革命委員會」指為「資產階級篡權的政權形式」，我也不能贊同。我們認為問題並沒有這樣嚴重，因為不管怎樣說，革委會這個臨時權利機構中，畢竟有三分之一的席位是掌握在「革命群眾」手裏了，這就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

但十七年的階級關係的變動證明，如仍襲用以前那個舊的國家體制，而不是真正實行「巴黎公社的原則」，則「官僚主義者分子」在各級

權力機構的不斷產生，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這一點僅僅從一些造反派的領袖人物，在革委會這個臨時權力機構中迅速蛻化為新官僚的現象中，就已經得到了證實。如深究「官僚主義者階級」產生的根源，倒不妨提提王仁舟反復鼓吹的一個觀點，他一再對我們說，國家是個禍害。我們最初是把這種觀點視為「無政府主義」看待而加以摒棄的，但是周凝淳說，儘管王仁舟這樣說可能是別有用心，但這個觀點本身並不是「無政府主義」，而是「馬克思主義」的。他建議我仔細讀一讀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於是從書中看到馬克思是這樣論述的：

國家最多也不過是無產階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的鬥爭勝利以後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一樣，不得不立即盡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能夠把這全部國家廢物完全拋掉為止。

馬克思的意思是再明確不過了，他不是從國家的階級屬性，而是從國家這個擁有龐大的無孔不入極其複雜的軍事官僚和司法行政機構的中央集權國家機器本身，來揭示「國家」的弊病。正是因為在國家行政機構中，「擁有令人傾心的官職、金錢和權勢」，權力才成為一些人競相追逐的目標。國家之成為產生「官僚資產者階級」的「禍害」，其源正在於此。至於怎樣「盡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如何「把這全部國家廢物完全拋掉」，這是一個只能由歷史發展的實踐來解答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可供探討的理論問題。但像王仁舟那樣不作分析不作解釋，一味鼓吹「國家是個禍害」，必然引起群眾的誤解，且必然被當局指為「否定無產階級專政」。

事實上劉豐後來在批判「北決揚」時，就歪曲馬克思的話，說馬克思所說的「禍害」是指的「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則如毛澤東所說，「是一個很好的東西，是一個護身的法寶，一個傳家的法寶」(那些「令人傾心的官職、金錢和權勢」，在官僚們的眼裏，當然是一個護身的法寶、傳家的法寶，這一點也不奇怪)。而大多數沒有仔細鑽研過馬克思原著的群眾，也極易認同這一指責。所以我並不主張公開宣傳「國家是個禍害」的觀點，而主張宣傳建立巴黎公社

式的公社國家的觀點。這個觀點的核心，就是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所主張的，對一切公職人員無一例外地實行全面選舉制並可以隨時撤換，把他們的薪金減低到普通工人的工資水準。公職人員都要對選民負責，接受選民的監督，而且不享有任何的特權。

我認為這種提法較為科學。因為不但馬克思提出過以「公社」取代「國家」，而且毛澤東本人也曾在文革之初，「英明地天才地預見我們的國家機構，將出現嶄新的形式」。而在「一月革命」中，毛又曾明確提出「中華人民公社」的名稱。所以我認為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即進行到「公社式國家」的建立這一提法，至少從「提法」上是與毛本人保持一致的，也符合馬克思和列寧有關著作中的論述。事實上無論是康生、陳伯達還是周恩來，在批判「省無聯」的講話中，都完全避開了這個與「公社」有關的國家機器形式問題，而集全力於否認黨內存在特權階層即官僚主義者階級。如康生所說，省無聯「把我們無產階級專政說成是為資產階級特權階層服務的舊的國家機器，把我們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幹部隊伍絕大多數說成是走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了，因此那些自封為無產階級革命派的人要推翻所謂的特權階層，實際上就是要推翻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

康生等人指「省無聯」為「反革命組織」，「省無聯」思潮為「極右」思潮，將「省無聯」的《我們的綱領》，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革命反無產階級專政反毛主席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並且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對省無聯思潮的批判的同時，正式逮捕了楊曦光等人（楊是在躲到湖北後被抓獲的，聽說楊說過湖北的農民運動已經發動起來了，所以倉促之中亡命湖北）。「省無聯」的被取締、其思潮的被批判、其成員的被逮捕，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惕。我們的觀點雖說沒有「省無聯」那樣激進，但思想脈絡是一致的，而況「北斗星學會」早已是當局的眼中釘，「決派」繼續活動下去必有大麻煩。

當時參加「決派」活動的，還有武漢大學62、63級的兩個學生。一個叫楊秀林，學歷史的，一個叫郭仲藩，學經濟的，都是滿腹經綸、功底深厚，他們也和我持相同的想法。後來我入獄後，兩人都積極參加了營救我的活動。《揚子江評論》上曾登過一篇「魯媽媽訪問記」，就是出自楊秀林的手筆。楊還在一篇為我辯護的文章的結尾，引俄國詩

人普希金的詩句說：黑暗的牢門會倒塌，沉重的枷鎖會脫落，自由會來到門口迎接你。弟兄們將把利劍，交到你的手中！很煽情的。但楊當時最膾炙人口的文章，是一篇《對『文化大革命』中各政治團體的分析》的文章，寫於六月份，其時我已經被綁架關在鐵山的礦井下了。楊在文章中將文化大革命要解決的基本矛盾，概括為新的官僚資產階級和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這種「離經叛道」的文字自然為當局所深惡痛絕。當權者最忌諱說他們這些權貴已經變成新的「官僚資產階級」，因為這種說法無異於是把當權者放到了「革命的對象」的位置，這當然是他們不能容忍的。所以楊秀林這個貧農出身的土家族的大學生，後來也難逃牢獄之災。劉豐在揭批「北決揚的反革命班底」時，指楊秀林「文化大革命前，就因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咒罵社會主義制度，並企圖外逃投敵，清理階級隊伍中被定為現行反革命」。所謂「攻擊」之類的「莫須有」罪名就不用說了，「企圖外逃投敵」又是從何說起呢？七一年在漢口監獄的看守所裏，我曾在放風時找機會問過楊。楊說是62年的事，當時阿爾巴尼亞和我國友好，有本阿國的畫報在我國公開發行。有一次該畫報上登了一組有關該國的知識問答請讀者回答，應允參答的讀者有免費前往該國旅遊觀光的機會。他一時心動，就參加了答卷活動，這件事後來居然就成了他「企圖外逃投敵」的證據。

楊秀林的同學郭仲藩，也被劉豐說成是「惡毒攻擊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曾勞改十個月的『右派』學生」。真實情況根本不是這樣。據楊秀林告訴我，文革前武漢大學每天清晨都是要按時播放起床號和廣播體操音樂的。可是毛主席一到武漢來，學校的廣播就停放，說是怕影響住在學校附近的東湖賓館的毛的睡眠。對此郭頗有微詞，認為不應該為了一個人改變一個學校的正常秩序。郭因此受到批判，並且被剝奪了下鄉參加「四清運動」的資格，在學校的校辦農場裏勞動了幾個月。僅此而已，根本談不上什麼「惡毒攻擊」，更沒有勞改過，劉豐完全是信口雌黃。

已從上海返漢的馮天艾，對我擋下「學會」另行組織「決派」一直持反對態度，常和工總宣傳部的田國漢師傅來找我，極力勸我解散「決派」，回校復課。馮氏對我這一階段的作為多有批評，但是在我於鐵山出事後，社會上圍繞我的問題展開針鋒相對的論戰時，馮天艾又全力

為我辯護，反駁華工方面對我的攻擊。除了在「揚評」上發表大量的文章，如《千秋功罪，歷史曾與評說》為我辯護外，還把我在「決派」期間寫的《浠水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決派宣言》等都登出來，讓廣大群眾評判，好證明我寫的這些文章，並沒有什麼大錯，至少不是反黨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與此同時，馮天艾還參與組織了一場有幾十萬人參加的大規模的「營魯」行動。「營魯」失敗後，馮天艾自己也失去了自由，被「甄別教育」一年後，亦被逮捕入獄。

再說當時，就在我開始意識到「決派」繼續活動下去面臨的危險時，周凝淳帶來了張志揚和童丹兩人對當前局勢的意見：

一是文化大革命的重心仍然是在城市，目前並沒有向農村轉移的跡象。中央顯然並不希望農村也像城市那樣大亂一場，那將會破壞農業生產和農村社會的穩定從而動搖國民經濟的基礎。而且他們對農民的「革命性」也持懷疑的態度，認為農民的思想覺悟和文化程度，還遠沒有達到可以參與文化革命的水準，他們因此認為我現階段鼓吹農民運動是不合時宜的。

二是湖南「省無聯」的被取締應當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必須避開對一切敏感問題的討論。對「決派」中公開鼓吹「三反對、三重建」的個別極端分子，要採取堅決的組織措施。

周凝淳說他們建議我最好當機立斷，解散「決派」，避免蹈湖南「省無聯」的覆轍。

他們所說的「個別極端分子」是有所指的，便是那位曾引薦我拜見「農民領袖」王仁舟的中學生「眼鏡蛇」蘭憲生。蘭躊躇滿志，常以「職業革命家」自居，一度對王仁舟非常崇拜。王仁舟撤離武漢後，他似乎與湖南「省無聯」接上了關係，楊曦光於是又成為他所崇拜的偶像。但蘭憲生照例是要對偶像進行超越的，於是他擺出一副最激進的姿態，將「省無聯」的觀點更加引向極端，在各種場合肆無忌憚地鼓吹「重建黨、重建國家、重建軍隊」的主張。尤其糟糕的是他公然聲稱他就是我，或者向認識我的人宣稱他即是我的發言人，以我的名義四處招搖。對此我極為惱火，曾將此情況向周凝淳、張志揚和童丹等人提及。

張志揚、童丹都是有大智慧的人，他們「旁觀者清」，已經看出我的處境不妙。我決定急流勇退，於是緊急召集骨幹分子開會，向大家

說明當前形勢對我們不利，繼續鼓吹農民運動是不合時宜的。我還談到了湖南「省無聯」被中央點名批判，遭到取締的問題，提醒大家高度重視，千萬不能掉以輕心。我提出「決派宣言」除已發表的第一稿即闡述「農民運動問題」的那一稿外，其他幾篇草稿（討論稿）均作廢稿處理，束之高閣，以免授人以柄。然後我提議解散「決派」，並派幾個人前往警司，將解散「決派」的決定通知他們，並請他們轉告曾劉首長。我認為這樣可以去掉當局的心病，大家也都可以全身而退，避免落到「省無聯」一般的下場。不意我的建議，竟遭到大部分「決派」骨幹的反對。除了幾名大學生如楊秀林和郭仲藩較為冷靜地和我保持一致的立場外，「決派」中大部分中學生和青年工人，都沉醉在「革命！革命！還是革命！」的狂熱情緒中，完全看不到前面已是萬丈深淵，這使我感到非常不安。

水果湖中學一名叫黎奇遠的中學生，是這些激進的中學生的頭。他非常衝動地指著我的鼻子說，現在決派已是大家的決派，不是你魯禮安一個人的決派，憑你想解散就解散。另一位叫蔡萬寶的青年工人則激動地捶胸頓足說，「現在中央的鬥爭那樣激烈，右派勢力猖獗，毛主席都表示弄不好就和林彪一道重上井岡山打遊擊。可我們還一味考慮個人安危，怎麼對得起毛主席他老人家……」蔡萬寶對領袖的忠貞不二真可感天動地，但我總懷疑這位懷才不遇的青年工人，是否真的就相信毛主席在中央已經孤家寡人到要「重上井岡山」的地步？而黎奇遠似乎不願意在忠於領袖這一點上，讓蔡萬寶專美於前，遂再次慷慨激昂地站起來說，現在誰要是考慮個人的安危，誰就是革命的逃兵，就不是真正的革命派。真正的革命者為了捍衛偉大領袖毛主席，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拋頭顱、灑熱血，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黎奇遠和蔡萬寶這兩位「熱血青年」的慷慨陳辭，使與會者大受感動，但我怎麼聽怎麼覺得彆扭，我從此二人的豪言壯語中聽出的只是浮躁和做作。我決定斷然終止和他們的合作，於是說決派暫不解散也行，但必須純潔隊伍，將害群之馬蘭憲生予以開除，以免禍害整個組織，否則我將退出決派。由於我的態度堅決，蘭憲生終被開除出「決派」。

在蘭憲生氣沖沖地離開會場後，我遂藉口「七二〇」時跳橋造成的傷病復發，表示須回華工治療，此後將退出決派的一切活動。黎奇遠

輕蔑地說，不革命的一邊去好了，並挖苦說大學生也是既得利益者，他提議選舉真正的決心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的人來領導決派。結果革命口號喊得最響的黎奇遠得票最多，當選為一號勤務員，「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蔡萬寶當選為二號。我則名落孫山，而這正是我希望的。

後來聽說「決派」新的領導人上任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實際行動介入農村文化大革命，幫助農村的造反派建立鞏固的「紅色根據地」。此舉是否是為了有一天能與毛澤東的「重上井岡山」遙相呼應我不知道，也不敢妄猜，但據說他們已經決心仿效古巴那個叫格瓦拉的，不但要搞好中國的革命，而且要為世界革命作準備。這個想法，和我在《北斗星學會宣言》中提出的那個「我國的文化大革命，不過是未來的世界革命的引子和序幕」的觀點，倒是異曲同工。只是我未能「革命」到底，提前打了退堂鼓。

黎蔡等一行「格瓦拉」們深入農村之後，曾率領一派群眾對另一派群眾進行武鬥，結果就像堂吉訶德騎著瘦馬揮著長矛隻身匡復正義一樣，被人打得落花流水抱頭鼠竄。在逃跑時因不熟悉地形，曾被當地農民圍困在一個死角裏。走投無路之中，一個外號叫卞大頭的中學生竟點火燒了一個茅棚，據說是想趁農民趕去救火的混亂之機好逃命。可惜農民並不上當，黎蔡一行照樣沒能逃出農民布下的天羅地網。

在被農民打得頭破血流之後，黎蔡一行作為「俘虜」，被農民們用繩子牽著遊街。卞大頭的胸前還掛了塊寫有「縱火犯」三個字的木牌子，農民們讓他手裏拿著副銅鑼，一邊遊街一邊敲鑼，嘴裏不停地喊「我是卞大頭，我是縱火犯……」。黎奇遠和蔡萬寶等雖然不敲鑼，但嘴裏也要喊自己是「壞頭頭」，總之是狼狽不堪。幸好農民們還不敢把這一行不曉得是何來頭的城裏人怎麼樣，關了一陣子就把他們放回了武漢。元氣大傷的黎蔡一行，終於明白了「格瓦拉」也不是那麼好當的，很長時間裏都再不敢輕舉妄動。

就在黎蔡他們壯志未酬、英雄末路時，我這個英雄們眼裏的「逃兵」，正在踏上返回華工的歸途。我需要回學校休息一下疲憊的身體和精神，我思想的園地裏也需要有理論的甘泉來灌溉，它實在太枯涸了，不能結出真正賞心悅目的果實。

田園將蕪，胡不歸？



## 第十一章

# 驚變，逃出華工園

我是春節過後回到久違的華工校園的。學校已經復課，各門課程都陸續開講，我仍住在東二舍，重新開始宿舍——教室——飯堂這樣三點一線的生活。班上的同學對我都還不錯，一些人對我甚至有點敬畏。連運動開始時那位勾搭教務處的老爺處心積慮地整治我的姓朱的同學，也時不時找我搭訕，說我有本事，是個人物，而班上的那些頭兒們則連我個指頭都抵不上。朱同學聽說七二〇前和「百萬雄師」綁在了一起，是學校裏一個人數甚少的保守派組織「烏蘭牧旗」的一個小頭目，在班上如今是勢單力薄。他想打破孤立，居然找我來「統戰」，自然是枉費心機。我倒是不計前嫌，但太看不起他的為人。他出身貧民，一心要出人頭地，但又沒有什麼本事，就老是想踩在別人頭上往上爬，實在令人不齒。

班上的同學似乎也分成了幾個派別，派別中的頭面人物自然免不了明爭暗鬥，在位的和在野的都有各自的人馬，互不買賬那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不過我對他們的爭鬥毫無興趣，我上課之餘只是讀我要讀的書。附中圖書館裏的藏書就掌握在王永紅的手裏，可供我隨意借閱。另外我自己也藏有一些，其中一套四厚冊的《約翰·克里斯托夫》，是以前從省委幹校「竊」來的，有一陣子成了我壓枕的讀物。但我最喜愛的還是《牛虻》、《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之類的書。有一次還從學校圖書館借了一本捷克作家伏契克寫的《絞刑架下的報告》來看。小學時曾從姐姐

的初中文學課本中，讀到過這本書中的第四章「二六七號牢房」，現在得窺全豹，自然非常有興趣。

伏契克在死囚牢房裏與法西斯匪徒所作的面對面的鬥爭，寫得那樣鼓舞人心而又富有詩意。他的堅定、樂觀、從容而又機警，對敵人的蔑視，對親人的關愛，使人動容而淚下。他在書的結尾處說：人們呀，我愛你們。你們可要警惕！套在脖子上的絞索終於勒緊了，他留下了這樣一句語重心長的叮嚀。我在讀完這本書後在日記中寫道：《牛虻》、《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絞刑架下的報告》是我最喜愛的三本書。在我人生的征途中，這些書中的英雄的人物，將永遠照耀著我前進的道路。

除了這些書外，我開始有計劃地閱讀馬列。我發現我在馬列主義基礎理論方面的知識，實在是太欠缺了。我以往對於各種政治問題的認識，實際上膚淺之極，我其實並沒有足夠的根底在政黨、政權、軍隊、工人運動、農民問題上妄加評判。從社會舞臺上退回書齋，我正好——如恩格斯所比喻的一來一次「脫毛」。

我用心研讀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便是曾經讀過的《法蘭西內戰》。這本著作中對「公社」問題的詳細的論述，正是我那時關注的問題。馬克思在書中寫道：「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那麼什麼是「現成的國家機器」呢？馬克思說，「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及其遍佈各地的機關——常備軍、警察、官僚、僧侶和法庭」，這些按照系統的和等級的分工原則建立起來的機關，由於擁有令人傾心的官職、金錢和權勢，變成了統治階級中各個爭權奪利的黨派和冒險家彼此爭奪的對象」。而「公社」作為「國家」的直接對立物，是要「建立一種不僅應該消滅階級統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應該消滅階級統治本身的共和國形式……使行使各項社會職能的人再不能夠像在舊的國家機器裏面那樣使自己凌駕於現實社會之上」，而必須「總是處於切實的監督之下」。

我那時自然還不曾聽說過「不受監督的權力必然產生腐敗」這樣的至理名言，但從馬克思關於公社性質的論述中，已體味到「擁有令人傾心的官職、金錢和權勢」的國家權力對官員的腐蝕性；以及由普選產生、對選民負責、接受選民監督、隨時可以撤換，並只領取相當於工

人工資的薪金等措施，對防止權力「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必要性。這些體現「巴黎公社原則」的措施雖然看起來平常，但必須如此，才能保證掌握權力的公職人員「總是處於切實的監督之下」。

關於軍隊問題，我在日記中抄錄了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初稿中的一段話，「人民只要在全國規模內組織這種國民軍，就足以根除常備軍；這是一切社會進步在經濟方面的第一個必要條件，它立刻……可以使農民免納苛稅，而農民從此不再成為一切國家捐稅和公債最豐富的源泉了。」我認為馬克思的這一論述已經在今天由毛主席在他的「五七指示」中得到了解決。因為毛在「五七指示」中指出「軍隊應當是一所大學校……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同樣，工人也是這樣，農民、學生都是如此)，我認為這是毛主席在馬克思關於「根除常備軍」(即廢除僅僅執行軍事任務的軍隊)問題上在新條件下的重大貢獻。我並不認為我的這種理解(而且僅僅是出現在日記中)有什麼大錯，但是不久之後這段日記竟成為我「鼓吹要根除人民解放軍」的罪證，真是令人莫名其妙。

但是我在這些日記和筆記中也確實寫過一些大言不慚的大話，我在一本題為「站在最前線」的日記的「序言」中聲稱，「真理的軍艦是我的旗艦，我一生的根本任務是製造這艘旗艦。人們都在匆匆忙忙地製造自己的划子，我的同學們則在一心一意準備著製造鋼鐵的艦艇，我和我的同伴們則要製造真理的軍艦，去征服思想的海洋。」狂雖狂矣，還是沒有忘記在這之後添上一句時髦的套話：「指引它前進的燈塔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但是這句套話後來並沒有變成我的護身符。提審的軍代表聲色俱厲地問道：難道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還不是真理，還需要你們這些人來製造所謂的真理嗎？不過我在提審員面前自有「狡辯」的理由。

還有一段記於3月18日巴黎公社紀念日的日記，日記中說「一般認為，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是成功的，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一次劃時代的勝利。但如果從一個較長的歷史階段來看問題，我們也可以說俄國的十月革命在經過半個世紀後，最終還是失敗了。反過來，法國的巴黎公社，雖然僅僅只存在了七十二天，通常都認為是失敗了，但是我

認為從巴黎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這個角度來看，巴黎公社也可以說是勝利的。」後來這段日記就被說成是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的反動言論。其實我的意思無非是說俄國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雖然推翻了舊的沙皇統治，但它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問題，「新沙皇」代替了舊沙皇，所以革命最終還是失敗的。這和「十月革命的道路」即「暴力革命」的問題完全是兩碼事，為這段日記我後來與提審員還有過辯論。

除寫日記和筆記之外，我還是積習難改，喜歡在校園裏到處高談闊論。因為我已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自然隨時會有熟悉或不熟悉的同學將我圍起來，要我回答各種各樣的問題。例如「你對當前的形勢怎麼看？」、「你究竟是怎樣看待革委會的？」、「你是否認為革委會具有權威性？」、「對三結合的問題你怎樣看？」或者「北斗星學會宣言結尾說，北斗北斗，未來幾十年的中國世界，將是誰主沉浮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決派究竟是幹什麼的？巴河一司是什麼組織、王仁舟是個什麼樣的人？」等等。我也很樂意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

有一次有人問我，學校的革委會領導班子裏，應不應該結合原黨委書記朱九思？

我回答說當然應該。我還說朱九思不但應該結合，而且應當擔任革委會的一把手。

我的想法和聶年生是一樣的。聶年生那時已經是新華工革委會的副主任，他早就主張解放朱九思，並且讓朱擔任學校革委會的一把手，但老聶的建議孤掌難鳴，在「紅司新華工」的領導班子中少有人回應。許多人都不希望朱九思重新出山，那樣會威脅到他們的既得利益。其中一個是後來在新華工革委會中擔任副主任職的郭保安郭司令，另一個是紅司司令部中的教師代表趙文成，還有一個就是後來坐上了華工革委會主任寶座的張立國。

趙文成是教師中的黨員。他自知憑他的實力，是不可能能競爭到華工革委會主任一職的，便企圖憑藉自己的黨員身份，染指未來的院黨委書記的位置。但郭保安是學生中的黨員，也在覬覦黨委書記的寶座，他們之間的明爭暗鬥正在日益激烈化和表面化，但在對付原黨委書記朱九思這一點上又結成了同盟，堅決不讓朱重新上臺。為防止朱

的東山再起，他們堅持定朱為「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當然對老聶主張朱九思應當做華工的一把手極不安逸。

郭保安和聶年生一向矛盾頗深，「郭派」和「聶派」之間的爭鬥從來都沒有停止過。本來在一般人眼裏，校革委會的主任位置非聶即郭莫屬，但兩人互不買賬，互相拆台，結果「鶴蚌相爭，漁人得利」，讓「後起之秀」張立國從中撫了大便宜。坐上了革委會主任寶座的張立國，原是機械系的一名一年級學生，聶年生郭保安的隊伍在華工崛起時，張不過是造反派紅衛兵的基層組織中的一個小頭頭。無論是資歷還是功勞，張都遠不能與聶郭相比。但張自被推薦進入「紅司」司令部工作後，十分善於籠絡下面的群眾，人緣較好，久而久之，也就有了一定的群眾基礎。漢口六一七大武鬥那天，張立國正在「民眾樂園」看望「紅司（新華工）」駐紮在那裏的戰士。面對「百萬雄師」的重重包圍，張立國臨危不懼，沉著冷靜地指揮大家回擊「百萬雄師」的武裝進攻，張立國因此在群眾中獲得了很好的「印象分」。後來他能夠利用聶郭之爭，攫取學校的最高權力，固然是因他工於心計，會耍手腕，但也得力於他在「六一七事件」中建立起來的威信。

張立國當上新華工革委會主任後，又作為「三新」的代表被結合進省革委會，坐上省革委會副主任的交椅，成為炙手可熱的實權人物。對於華工內主張解放朱九思的人，張立國堅決打壓，指責這些在幹部問題上持不同意見者是「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穿一條褲子」。我自回校後就到處鼓吹解放朱九思，讓朱當革委會第一把手；張立國對我自然很不感冒（湖北方言：滿意、高興的意思）。

我不單主張解放朱九思，而且認為省裏的張體學、中央的鄧小平，也都是應當解放出來重新啟用的。因為在我看來，這幾個人雖然都執行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甚至戴過「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帽子，但都是正正派派能幹實事，不搞陰謀詭計，不搞腐化的人物。尤其是不搞腐化這一點，我認為對於身居高位的領導幹部非常難得。我文革中之所以堅決反對陳再道，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據傳他生活作風腐化。

我向來認定搞腐化者必定是修正主義，世界上哪有搞馬列主義而又生活上腐化墮落的？所以只要不腐化不墮落，作風正派，工作踏

實，生活樸素，在老百姓面前不擺架子，即使路線上錯了，改過來就一樣是好幹部。我認為這些應該是評判幹部好壞的一些最基本的標準。毛主席提出的考察接班人的「五條」標準似乎太籠統了，比如第一條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這馬列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究竟怎樣區分？第二條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你又如何弄得清楚他究竟是為大多數人民，還是在為少數人謀利益？概念太抽象，並不好掌握。所以我覺得對領導幹部，應當有幾條簡單實在、看得見摸得著的評判標準。

我回校後的高談闊論自然引起學校裏頭頭們的注意。郭保安幾次親自上門來拜訪我，要聽取我對當前形勢的意見。郭還要我有空就寫點分析局勢走向的文章，他很有興趣拜讀。我不知道郭是否真心要聽取我的意見，但郭的「禮賢下士」倒是早有所聞。聽說他曾去看望一個運動以來從未參加任何組織也不介入任何活動，「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背外文書」的呆子，那呆子竟然並不認識他。陪同郭的系裏的頭頭介紹說，來看你的這位就是郭保安司令呀。那呆子一臉茫然地問道：「什麼……保安司令？保安司令是誰呀？」令郭保安大窘。不過我並不願意向郭多談什麼，更不用說寫文章供他參考了。我記得伏契克的叮嚀，你們可要警惕！

但是在別的場合我是毫無禁忌的。有一次一位在西北上大學的原實驗中學的高中同班同學跑到華工來找我，要與我談論文化大革命的問題。談到當時的局勢時，我說文革到現在是諸侯割據，危機四伏，很難收場，最後恐怕只能以內戰結束。我們也談到了江青，這位同學問我對樹江青為文化革命的旗手有什麼看法？我說江青算什麼旗手？在中國只有魯迅是新文化的旗手。這位在西安讀書的同學叫徐吉武，一個公路建築工程師的兒子。徐在高中時與我就要好，亦熱愛文學。記得有一次我們兩個比賽背誦白居易的《長恨歌》，一個背出上句，一個就得背出下句，背到「花錉委地無人收」一句時，我就卡了殼，接不上了，只好認輸。徐記憶力極好，是我們班上唯一可以背英文詞典的人。三十年後在漢重逢，提及往事，徐笑曰當初你「攻擊江青」的言論我可是半句都不會揭發啊。誠哉其言，不然我的罪名中要是加上這一條，則更加罪不可赦了。但這類話我在學校中是不亂講的，對郭保安

等更不會推心置腹。我清楚學校中有些人是把我當作「異端」看待的，我必須小心謹慎，不讓人抓什麼把柄。

班上與我關係較好的同學中，有一個和我一起去巴河考察過的叫梁克家，他總是和我一道去上課並且坐在一起。我每逢週末回家，常常從家中帶些油炸花生米到學校來與之共用，偶爾也帶盒香煙給梁抽。梁和班上好幾個農村來的同學已成癮君子，但家境不好只能抽點劣質的低檔煙，我帶給他一盒好點的煙他便大喜過望了。在去課堂的路上我們無話不談。我從他那裏聽說到班上誰和誰要好了，誰和誰在為某個女同學爭風吃醋，誰又和誰在為班文革領導小組組長的位置明爭暗鬥，但我們談得最多的是關於教育改革的問題。

那時我們新開了高等物理、電工基礎、電子學等基礎課程。往常教授這幾門課的教授和講師，統統因家庭出身不好或別的什麼問題被趕下了講臺，一些原先只是在實驗室工作的教師，卻因出身過硬被請上講臺給我們講課。班上幾個左得可愛的左派為此在教室裏扯出一幅橫幅，上書「歡迎工農知識份子佔領講臺」。剝削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便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勞動人民出身的知識份子便是無產階級知識份子，黨的「階級路線」被左派們貫徹得真是沒有話說。左派們還請這些工農知識份子向我們作報告，控訴學校的走資派當初是如何排斥蔑視他們而重用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學術權威的。而現在由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顛倒的歷史終於又顛倒了過來，工農知識份子揚眉吐氣走上了大學的講臺。

揚眉吐氣自然是不錯，但是幾位工農知識份子的教學水準，實在教人不敢恭維。他們站在講臺上前言不搭後語，東扯西拉，不知所云，讓同學們聽得莫名其妙，如墮五里霧中。有同學實在聽不下去了，就悄悄溜出教室。有人帶了頭，中途離座者便愈來愈多，急得幾個左派大叫「革命的留下來，不革命的走開去」。但是「不革命」的愈來愈多，左派們無可奈何，於是想出高招，讓「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協助「工農知識份子」講課。就是每當後者雲裏霧裏講過一段之後，便由前者再將講授內容解釋、梳理一遍。這樣一來「工農知識份子」便如從國外請來的洋教授，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便好似這些洋教授的翻譯，

只是何苦脫了褲子放屁多此一舉。「工農知識份子」似乎也終於沒有能夠佔領大學講臺，只是留下一段笑料。

這段時間堪稱笑料的又何止這一樁呢，那時又大興唱「忠字歌」。歌詞曰「敬愛的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我們有多少知心的話兒要對你講，我們有多少熱情的歌兒要對你唱。千萬顆紅心，向著毛主席……」每唱至此，必有幾名可愛的積極分子手持「紅寶書」前邁一步，並雙手作掏出紅心敬獻偉大領袖狀。

這種敬獻忠心的滑稽劇，常常令我想到高爾基筆下那個丹柯的故事：丹柯所率領的部族迷失在大森林裏找不到出路，被黑暗和恐懼包圍的群眾驚慌氣餒，怨恨至極。丹柯於是掏出自己的心臟作為火炬，照亮道路，引導群眾走出了黑暗的森林。丹柯為人民大眾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倒下了，「他那顆勇敢的心還在燃燒」。他為人民而死，卻無怨無悔。記得小時候聽到這個故事時，心靈上曾引起怎樣劇烈的震撼啊！是他掏出心來為人民引路，而不是人民獻出千萬顆紅心為他效忠。兩相比較，我覺得反差實在太大。

不要說天天唱這種肉麻的「忠字歌」使我難以適應，便是人人胸前佩一枚偉大領袖的像章，我也認為流於庸俗（在這一點上我倒是佩服周總理，他就從來沒有佩戴過毛主席像章，而是佩戴一枚寫有「為人民服務」的徽章）。我就從來不戴這個玩意，以致附中學生忍不住問我，怎麼從不見我佩戴毛的像章？我答覆沒必要，但指指胸口說我的像章是別在我的心裏面。我只能這樣說了，此外還能說什麼呢？我確實是把某種東西別在我的內心深處的，那地方有一個角落叫「輕蔑」。我為什麼偏偏生活在這個把人當做「神」來供奉的環境裏？我們從造舊世界、舊觀念、舊風俗、舊習慣的反起家，如今為什麼又淪為新的精神上的奴隸？

我覺得淪為這種精神上的奴隸是一件很可憐的事情，我們這一代人不應該如此沒有出息。對於「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馬列主義的頂峰」等等說法，我們都應當有勇氣問一個為什麼。我通讀了《毛澤東選集》，將毛在一些問題上的論述與後來實踐發展的實際情況相對照，認為即便是毛主席這樣的偉大人物，也常有認識超出了實踐或落後於實踐的問題，用毛自己的話說，就是也會犯「左」或「右」的錯

誤。我在毛著上一些地方作眉批說，現在看來這裏「左」了，現在看來這裏「右」了。這在旁人眼裏自然是大逆不道，但我居然渾然不覺，全然不曾意識到白紙黑字已經留下了「惡毒攻擊」的罪證。

周凝淳和童丹偶爾會跑到華工來與我聊天。印象深的是有一次童丹談到毛澤東的接班人問題時說，毛澤東思想大致可分為哲學、黨建和軍事三大部分，能有資格繼承這三部分的人分別是陳伯達、劉少奇和林彪，主席的接班人也必然是從這三人中產生。實踐證明陳伯達只是理論上有一套，缺乏實際工作經驗和組織能力，不可能接主席的班；而劉少奇雖然富有經驗和能力，一度被作為接班人來培養，但因在路線問題上與主席有分歧，也只好淘汰出局；唯有林彪一貫緊跟主席，將毛澤東思想的旗幟舉得最高，所以最終被主席選為了接班人。但是，童丹話鋒一轉說，「據我看林彪也未必是真的忠於主席，而很可能是在主席身邊的赫魯曉夫似的人物。你們只要看看赫魯曉夫在斯大林生前是如何吹捧他，斯大林死後又如何一棍子將他打進地獄就清楚了。」當時正是林彪紅得發紫的時候，童丹的一番話可謂「石破天驚」，讓我們吃驚不小。

周凝淳則有一套「十年一大變」的理論，他說歷史上每隔大約十年的時間，必有重大的有轉折意義的事件發生。他舉例說1917年有俄國的十月革命，1927年有中國的北伐戰爭，而1937年有國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1947年則是解放戰爭的決戰時期；到了1957年中共發動反右鬥爭，而十年之後，卻又是鼓勵群眾造領導的反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再過十年，誰也不知道中國社會會發生什麼樣的大變動。但是程林不同意周的觀點，他說周是從繁雜的歷史進程中，挑出一些個別的歷史事件，敷衍成所謂規律，實際上從歷史中隨時可挑出重大事件，並不是「十年一變」的。他舉十月革命之後，僅我們中國就有1919年的五四運動，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1934年的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等等。程林說的也有道理，但每隔若干年社會上總會有一次大的變動，卻也是不爭的事實。

不過後來「專案組」就不這樣看了，他們說，什麼十年一大變？就是階級敵人妄圖再過十年二十年中國能復辟到舊社會。這當然也是很「雄辯」的，同樣一句話各有各的理解，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也不奇

怪。問題是「專案組」的看法不但霸道，而且能定人罪名，這就很可怕了。如此以言治罪，誰還敢講話，自然只能是「萬馬齊喑究可哀」的局面。

我相信除我們這些人外，民間的異類思想者也必定不在少數，只是默默無聞被剝奪了話語權罷了。記得有一天就有一個嶄新的年輕小學教師跑到華工來找我，提包裏塞了一摞厚厚的文稿，是批評中蘇論戰時中央發表的那九篇評論文章。據他說所有的人都不接受他的觀點，罵他是個瘋子，或者說他思想反動。但有人指點他，說華工有個姓魯的大學生，是紅衛兵的頭頭，思想激進，不拘一格，最能接受標新立異的東西，讓他來找我。我隨便翻了一下，好像是批評「九評」對蘇修的批判沒有批到點子上，而這位教師是從經濟學的角度來批判蘇修的。洋洋灑灑十幾萬字我看得如入五里霧中，便拿去請教張志揚。張隨便翻了翻，說文章前提就錯了。我便將稿子退還給了那位青年教師並轉達了張的意見，那位教師非常失望地悻悻而去。聽說此人後來是被打成了反革命，曾有人來看守所找我瞭解他的情況，但不知道他以後的命運如何。

我疑心張志揚當時並沒有細看他的文稿或並沒有看懂。張是研究哲學的，在美學方面造詣極深，但隔行如隔山，於經濟學或許也是「門外漢」。我後來後悔沒有將稿子帶給郭仲藩看，這位武大經濟系的高材生也許才有這方面的發言權。這位遭迫害的鄉村教師或許是真有真知灼見呢？我每每想起這位蓬頭垢面，抱著一堆書稿四處碰壁的鄉村教師，就會想起「和氏璧」的故事。那個身揣璞玉，被人認作是拿一塊頑石行騙於世的楚人，不是以欺君之罪被斷其足而抱玉痛哭於荊山之下麼？也許那位教師的文稿正是這樣一塊「璞玉」，只是無人識其寶而已。即使他的觀點並不正確，但敢於向「九評」這樣的權威叫板，其勇氣膽識也足以令人肅然起敬，然而卻是「反革命」的下場，這件事多少年都一直令我掛牽。

還有一天是週末，我回到航空路的家裏，有一廣州美術學院名叫李正天的學生登門造訪，也不知道他是如何打聽到我的住址的。這位李正天是廣州造反派學生中的一枝筆桿，老家武漢，這次是回來處理老家一些事。李說他這多年沒有回過老家了，這次把事處理完後，就

順便到各個院校轉了轉，感到各校張貼的大字報都是千人一面，了無新意。但發現一張貼出來供批判用的北斗星學會的宣言文字不俗，一掃時下流行的文革八股。特別是結尾一句誰主沉浮，其勢銳不可當，於是輾轉打聽尋到我這裏來。他翻閱了我的一些文章底稿，又將他帶在身上的一些他的文章拿給我看，果然筆力雄健，思想新銳，敢言人之所不敢言。是夜我與他交談甚歡，真可謂一見如故，相識恨晚。我們從毛主席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談到主席百年之後究竟誰來接班的問題；從當前的形勢，談到「九大」是否能夠如期召開的問題；從黨的最高層各派別之間的矛盾，談到中國會不會爆發內戰的問題，總之是無所不談。我們對局勢都頗感憂慮，認為情況決不像上面所宣傳的那樣樂觀。

後來我出事後也不知道他是否受到牽連，反正從未有人來找我外調過他與我的交往情況，證明他沒有對人洩漏過那天晚上的談話。既然無人知道這次談話，我當然也守口如瓶，不會自找麻煩。但李正天在外頭似乎也並未甘於寂寞，而是堅持著對真理的探索。六年之後，他與另兩位廣州青年以李一哲的名義合寫的題為《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思考》的大字報，使他一舉而聞名於世，並且遭到當權者的迫害。

李正天等人從最初的像我一樣的思想上的反叛，走向現代意義上的對民主、法制、人權與自由的追求，反對對「不同政見者」以言治罪，反對「封建的社會法西斯專制」。我以為，從某一點上說，這也是李正天這類獄外的「異端」，對我們這些以言獲罪的獄內的「異端」道義上的聲援。可惜我在獄中一直不曾知道這個轟動一時的「李一哲事件」。二十多年後我有次參加廣交會時與李正天在廣州美院重逢，與這位已蜚聲海內外的老朋友作徹夜談。談我在獄中的遭遇，談他發表在海外的文集。想起杜甫的詩句「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我們不禁都感歎不已。

那時我們華工附屬的子弟中學還有一位頗有頭腦的校長名叫周嶽森。周校長學生時代便已投身革命，為黨在大學生中的地下工作作出過貢獻。我回校復課的時候，這位曾經靠邊站了一年多的老校長復出擔當了附中革委會的副主任，主管教學方面的工作。因附中學生不安

心回校復課，不知怎麼這位校長就想到了借助我來做附中學生的工作。他大約是聽說我在附中學生中有些威信和影響吧，曾向附中當時擔任革委會副主任的王永紅徵詢意見，王自然是把我大大推崇一番，於是周嶽森決定約見我談一談。

關於周嶽森的為人，我早從附中學生那裏有所聞：文革前治學極嚴，成果斐然，且生活簡樸、平易近人，學生視之為良師益友。有這樣一件事頗能說明其為人：曾有一范姓女生從外校報考華工附中高中，中考成績不錯，但原學校對其操行評語甚差，校方甚至數次通過電話反映此生在該校之劣跡，力主附中不要招收該生。周從招生辦得知此事覺得蹊蹻，遂親自調檔並派人前往該生原所在學校弄清事情的原委，乃該生曾衝撞過學校一名道德敗壞、作風下流的領導。周於是堅決將其招入附中，此事一時傳為美談。這樣的好校長我焉能不見？便約好一個晚上，由附中革委會的幾位副主任、常委學生陪我一道造訪了周嶽森校長。

文革之初便被掃地出門的周嶽森一家，就暫住在附中後面山坡上兩間破舊衰敗的青磚屋裏。家中陳設十分簡陋，除了床和桌椅之外，一舊書櫃的劫後餘存的教學書和字典，便是他的全部家當了。周校長面闊耳方，一望便是一忠厚長者，對我十分的客氣，也不多言，只是聽我談論了一下對當前形勢的看法，便只奔主題，希望我能利用自己在學生中的影響力，幫助他動員學生回校復課。我答應了他，同時提出應擺正社會大課堂與學校小課堂之間的關係，認為在當前運動中，單純恢復文化課不容易讓學生收心，只有將學校學習與社會實踐結合起來，才能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改變過去教學脫離實際的弊病。

談完話後周將我送下山坡，殷殷握別道：「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遂分手，再無往來。然而怎麼也不會料到在我出事之後，我與周的這次會面和談話，竟給周嶽森帶來橫禍。周竟因此成為暗中操縱我進行「反革命活動」的黑後臺之一而锒鐺下獄，周本人也從黨的地下工作者變成「國民黨老牌特務」。歷史上不是有過趙高的指鹿為馬嗎？而鹿與馬畢竟還有相似之處啊，將周指為「國民黨老牌特務」，則簡直是指鹿為狼了，嗚呼！

我在華工復課的一兩個月中基本不再外出，幾近「兩耳不聞窗外

事，一心唯讀聖賢書」。我從附中圖書館弄來了《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來通讀，並且閱讀了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經典著作，還借閱了梅林的《馬克思傳》和李葛克內西的《回憶馬克思》。李葛克內西在回憶錄中寫道，「學習！學習！這就是馬克思經常向我們大聲疾呼的無上命令。」「他討厭聲望，追求聲望的行徑更使他憤怒。他厭惡花言巧語，……他嘴裏的『空談家』是最嚴厲的譴責語」。這些話對我觸動頗深。回顧我文革中寫過的文章，尤其是後來的那些「宣言」、「報告」，充斥著大量的空話大話和廢話，有的就完全是譁眾取寵。我必須坐下來好好地學習！學習！再學習！用李葛克內西的話說，就是「努力積累知識，為未來的戰鬥準備彈藥和武器」。但是我沒有意識到危險已經向我逼近，平靜的書齋生活很快就要結束，我即將面臨一次萬劫不復的「失樂園」。

在厄運降臨之前，我有幸與同學們一道前往武昌造船廠，進入一艘正在建造的潛艇內部參觀了一回。那時的潛艇設計方案，奉行的是「先軍事後生活」的原則，艇內為水兵預留的鋪位僅40厘米寬，鋪位與倉頂甲板之間的距離約80厘米，人只能平躺著「滑」進鋪位。水兵們就像是罐頭裏的沙丁魚一樣，擠在倉室裏休息和睡眠。但軍官們有自己獨立的倉室，大小和火車上乘務員的工作室差不多吧，也夠窄的了，不過比當兵的那個「沙丁魚罐頭」強得多。聽介紹潛艇出行一出就是一兩個月，由於艇內空間有限，供給有十分嚴格的限制。像淡水每天每人就只能供給500毫升。在這種狀況下生活幾十天，非一般人所能忍受。但是我們的海軍戰士卻不怕艱苦，長年累月地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令我們這些沒有吃過什麼苦的學生不禁肅然起敬。

本來按慣例，我們進入大三之後，就要安排海上實習課的。從大三到畢業，一般會安排三次實習，都是前往東海艦隊，跟隨潛艇部隊出海。我們從入學那天開始，就盼望著這個極有誘惑力、極具挑戰性的「海上實習」。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我們說不定都已經在海底世界縱橫馳騁過好幾番了，可是現在卻只能到本地的船廠參觀一下車間裏正在造的潛艇，那感受肯定太不一樣了。不過這次參觀讓我好歹見識了一回潛艇的真面目，也算是沒有白讀過「水下艦艇的設計與製造」專業一場。

後來在監獄的單人牢房裏，有時回憶起這次參觀潛艇的情景，我會想起水兵們棲身的那個「沙丁魚罐頭」似的倉室。我所棲身的這間囚室，至少比那種倉室要寬敞一些吧。就權當是隨潛艇在出海吧，那水下的生活也是非常的艱苦和枯燥的。倘若因為發生了什麼意外，不得已必須在水下蟄伏數年才有希望浮上水面，那不是比坐牢更難受更難捱嗎？我有時就是這樣來安慰自己，當然是自欺欺人了，但是還的確有點作用呢——麻醉作用。

這次前往船廠參觀後沒幾天，就有人要找我的麻煩了。四月一號，是個星期一，那天的下午，全院師生坐在各自的宿舍裏，收聽院革委會主任張立國的形勢報告。這位已經貴為省革委會副主任的同齡人此刻正春風得意，滿懷豪情，在興致勃勃地向全院師生報告了他在北京被偉大領袖親切接見的特大喜訊後，又向大家報告了他「巡視」湖北各地所見之一片大好形勢。他說全國全省革命形勢正如偉大領袖毛主席所指出的，是大好不是小好，形勢確實是好得非常喜人呀。但是，張立國話頭一轉：一小撮階級敵人不甘心他們的滅亡，仍在四處活動、八方搗亂。然後舉了許多的階級敵人破壞革命的例子，突然說，「我們學校也有這種人，被曾劉首長點名批判後，在社會上混不下去了，跑回學校來仍不甘心。坐鎮寢室、遙控武鬥，省裏許多地方的武鬥，都是他一手操縱的。這個賬，我們要給他算一算。」

我越聽越不對勁，張立國的話似乎是在針對我了。但我回校已有一個多月，從未插手過任何地方的武鬥，更遑論「遙控」。顯然是上頭什麼人要找我的茬，今天張立國的報告殺氣騰騰，分明已經發出了下手的信號。於是等報告一結束，我就將一些我喜愛的書籍如《約翰·克里斯托夫》、《牛虻》等向附中轉移。班上幾個頭頭以為我要轉移「罪證」，手忙腳亂地試圖阻攔我，但我不睬他們，只管抱書而去。其實他們所需要的「罪證」我動都沒有動，像筆記本啦、日記啦、寫有眉批的毛著啦，我仍留在抽屜裏了，我當時竟一點未曾想到，從那些東西裏面是可以「雞蛋裏挑出骨頭」，而且是挑出「反骨」來的。搬完書後，我找到馮天艾和程林，向他們說到我的預感和憂慮。他們卻說你又沒有遙控什麼武鬥你怕什麼？何況張立國又沒有根據，他也並沒有點你的名，你用不著多慮。我想想他們的話也有道理，但總有一種預感要出事。

事實上這天晚上宿舍裏的氣氛就特別得很，班上幾個頭頭出出進進神秘得不得了，直到很晚還在碰頭商議什麼。我不管他們搞什麼名堂，仍睡我的覺，但是也實在睡不安穩。過半夜了正迷糊之中，聽見寢室門被打開，三個陌生人打著電筒出現在我面前，其中一個自稱是院革委會的，叫我穿上衣服跟他們走一趟。「張立國要找你談談。」來人說，於是我也披上衣服跟著他們出了宿舍。三個人一前兩後，成品字形將我夾在中間，三隻手電筒齊刷刷地射出光來照路。天上下起了小雨，電筒光中映出細密的雨絲。我頭腦裏亂哄哄的沒有個頭緒，只是想見了張立國，倒要就「遙控武鬥」的問題向他問個究竟。

黑夜中七彎八拐，我被帶到了一間廢棄的工房的一個小套間裏。領我來的人讓我先進屋裏呆著，幾個人出外咕噥了一陣進來說，張立國現在正忙著，今天就不談話了。你先在這屋裏過一夜，明天再說。然後出門將我這間屋的門反鎖起來，我頓時意識到我已經被關起來了。我拍拍門叫了幾下，但沒人理睬我，我又去開窗子，但窗子也被釘死了，果然我已落進他們設下的陷阱。那麼既來之則安之好了，倒要看看他們究竟要把我怎麼樣？環顧房內，僅一舊床一破桌而已。床是木板床，上有一床髒兮兮的被子。我也不想睡覺，便翻破桌子抽屜內的舊書舊報，竟翻到一本舊版的俄國詩人涅克拉索夫的名篇《在俄羅斯誰人能快樂？》，我就靠著牆躺在床上，把這首描寫沙皇農奴制下的農民生活的長篇敘事詩讀了一遍又一遍。

第二天早上，院革委會保衛組的頭頭劉玉滿來到工房裏令我寫交待。劉玉滿是機電系的學生，院革委會的常委，以擅長武鬥而出名。只見他陰沉著臉，煞有介事地翻著一本小本本，斜著眼怪聲怪氣地詐唬說，先把你如何操縱各地武鬥的事情交待交待，一筆筆都要交待清楚。其實我這裏都基本上掌握了，揭發你的材料多得很，只是給你個主動交待的機會罷了。劉玉滿邊說邊把那小本本翻得嘩嘩響。其實我明白那小本本之中什麼揭發材料都沒有，因為我根本就沒有插手任何地方的武鬥，於是說我沒法交待，我沒有操縱什麼武鬥。「你封口別封早了，」劉玉滿惱火地說，一邊甩甩手裏的本子，「這高頭記的就都是各地送報的揭發材料嘛，沒有確切的證據，我們能隨便往你身上栽？」我就說那把你揭發材料念一點我聽聽，只要真有那回事，我全認。劉

玉滿自然拿不出任何一張真的材料給我看，他只是擺頭說「材料是太多了，哪一件都夠你受。也用不著跟你念，還是自己交待的好，自己做的事情自己還不明白？」我當然是不明白，愈聽愈不明白，到中午送飯來時我仍一個字也不交待，實在是無可奉告。

張立國仍不見露面，倒是郭保安來見我。還是那張河南人的臉，但臉色和那次到宿舍來勸我寫文章時全不一樣，面皮也繃得緊緊的，陰沉得像是用鍋灰刮過幾道。他對我的「拒不交待」非常不滿。

「你的問題是嚴重的，現在就看你的態度，在沒有交待清楚之前你不能離開這裏。」

「難道我是犯人嗎？」我問。

「我沒有說你是犯人，」郭說，「是犯人就不是關在這裏了，這裏是隔離反省。」

行了，我並不是犯人，那張立國等人有什麼權利將我關押起來呢？晚飯後我聽聽四下沒人，猛地一腳將反鎖的房門踢開就往外衝。但沒料到偏房中有倆人在值班，他們在我將扭開第二道門的鎖時將我死死地按住了。劉玉滿得知我「越獄」的消息後馬上趕過來，一同來的還有那位革委會常委、一心想爬上院黨委書記寶座的趙文成。「想跑，膽子還真的不小。」趙文成惡狠狠地說，並指示加崗加哨把我看起來，明天再作處理。第二天一早，我就被「處理」到五系教學實驗樓的四樓一間實驗室裏繼續「反省」，班上派同學每兩人一班，輪流日夜對我進行監守，敦促我交待問題，以及一日三餐替我打飯。聽說解放初期「三反」、「五反」時打老虎就是這樣，想不到現在我也成了「老虎」，想想未免可笑。看守老虎特別是晚上看守老虎實在是個辛苦的差事，班上的梁克家同學卻主動要求來看守我這隻老虎。這好，我正可以趁機問問他究竟是怎麼回事？

「你還不曉得，系裏把你的抽屜攏了，抄查了你的幾本筆記和日記，還有幾本毛選，說是毛選上批了很反動的字。不過我不信！」這個湖南伢子樂呵呵地一點都不在乎地說，「你的筆記我又不是沒看過，麼子反動嘛，真反動不早就抓了還等到今天？」

「那他們一個勁逼我交待是我在遙控各地的武鬥，又是怎麼回事呢？」我問。

「那是據說最近各地武鬥搞得蠻厲害，打死了不少人。省裏和軍區惱火得很，懷疑是你在搞鬼，指示學校要從你這裏挖挖，現在急等要材料哩。」

原來如此。我想這中間實在有些誤會，須找機會澄清一下才好。但這個地方哪容你申辯，「首長」要材料，下頭就搞逼供信，這種事文革以來見得還少嗎？但想到張立國對我搞的是突然襲擊，馮天艾他們可能還不知道我被關起來了，得讓他們知道。我就請梁克家把我被關的消息傳給附中的學生，他很爽快地點頭應允。這時又來了個叫冷啟安的同學來替他值班，梁便說他回去吃了飯後就給我把午飯打來。

留下來的這個冷同學一米八幾的個子，河南人，也是文體大隊的，打籃球，平時和我關係馬馬虎虎。他就坐在不遠的一張桌子旁邊看一本雜誌，好像是《知識就是力量》什麼的，非常的專心。我則在發給我寫交待材料的材料紙上亂寫亂畫，什麼「追兵來了，可奈何？娘啊，我像小鳥兒回不了窩……」信筆塗鴉，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糊塗亂畫了些什麼。寫累了，畫煩了，忽然想起去偷偷看看冷啟安到底看什麼東西看得那樣入迷。我躡手躡腳地走到冷的背面，他居然毫無察覺。不遠處實驗室的門就敞開著，我突然想到了逃跑。也顧不得我那支「英雄100」的鋼筆還擋在那邊桌子上，就屏住氣悄悄地向大門移動。移到了門口冷同學仍無知覺，於是我一轉身出了實驗室，飛快地沿樓梯下到一樓。出大門後我邁開雙腿，以久已不用的百米衝刺速度向附中方向狂奔，沿路遇到的人都好奇地望我，不知我發了什麼顛。

事後聽梁克家告訴我，那天食堂正好加餐吃粉蒸肉，他替我打了一份，和冷啟安的一份一起正打算送進來。但是沒到門口就見門前亂作一團，說是我逃跑了，而冷啟安居然不知道我是怎樣逃掉的。負有怠忽職守責任的冷啟安為此愧惱不已，班上幾個頭頭又反過來安慰他。經過分析，頭頭們認為我不可能在冷的眼皮子底下從大門逃脫，於是猜測我是趁冷不備，從冷背面的窗子翻過去，跳到樓外面逃走的。我就好笑他們也不想想，我又沒有練過輕功，哪有本事從四樓往下跳？當然他們也有他們的根據，說我七二〇時曾從大橋引橋幾十米地方往下跳都跳過，也只是摔成骨折而已，所以從這四層樓跳下去也並非不可能。

但是梁克家不信，他擠擠眼睛笑著說，還不是冷啟安睜隻眼閉隻眼放了你一馬。其實說冷啟安放我一馬那真的是錯怪了他，聽說後來軍宣隊工宣隊進學校後，就這件事真還追究他的責任。他百口莫辯啞巴吃了黃蓮，最後畢業分配時因為這個問題被遠遠發配到甘肅。冷同學當然是冤枉的，我就很詫異這樣重要的事情，為什麼就從來沒有人到監獄裏來找我瞭解一下當時的實際情況呢？

再說我一路狂奔逃到附中之後，原敢死隊和紅反團的一撥人聞訊而來，與我一道商量對策。正在這時我父母親也由馮天艾陪著找到附中來了。原來張立國郭保安已於昨晚派人深夜上門秘密抄家，將我在文革中搜集的大量資料、小報、傳單一抄而空，整整裝了兩大麻袋。來人一律大口罩蒙面，只留一雙眼睛在外，並威脅我家人不准聲張。我父母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急得不得了，一早就乘車趕到華工找我，卻見不到人。問班上的頭頭，頭頭不耐煩地說，不曉得人跑哪裏去了，大概是跑出去搞武鬥去了吧。我父母不信，說一直在學校上課上得好好的，前幾天禮拜六才回的家，禮拜天晚上回的校，怎麼一下子人就不見了？父親眼尖，一眼瞅住了高個子冷啟安。說昨天晚上到我們家抄家的就有你一個，莫看戴個大口罩，我還是認得出你。冷狼狽不堪偷偷溜掉，結果溜到實驗室替下人家守我，心不在焉倒讓我成了「漏網之魚」，而父母親也由馮天艾陪著到附中打聽我的消息，正好碰上了我。

我讓父母先回去，我在附中暫時避避風頭再說。我就在附中的學生宿舍裏住了一段時間。王永紅和他手下「紅反團」的人把我保護得好好的，讓我安心地在宿舍裏看書。但不多久附中學生得到消息，說張立國已經知道我就藏在附中，準備派人到附中搜尋。王永紅說沒事，沒人敢來附中搜人的。但我不想給附中添麻煩，也不打算長時間蟄伏在這個小角落裏，決定盡快離開這個是非之地。

王永紅見我去意已定，便不再留我，許諾將我安全護送出華工。一天中午吃罷午飯，王永紅和附中「紅反團」的幾個「武林高手」，每人腰插一柄短槍，擁著我匆匆上路。將近學院大門時，似被設在圖書館大樓上的崗哨覺察，遂聽見哨位上鳴槍示警，氣氛頓時緊張起來。我們加快步伐一路小跑，闖出校門，直撲路邊的15路公汽車站。正好一

輛公汽進站，王永紅等把住兩個車門，將我推上車後，將下面候車的人一律拒之門外。「保鏢」們手中的短槍，把乘客全給鎮住了，誰敢造次？王永紅便令司機開車直奔武昌中華門，整個護送行動不枝不蔓，乾淨俐落。多年之後，我每看一些國外的驚險動作片如《野鵝敢死隊》時，總會想起當年王永紅們手持短槍，立於車的後廂，護送我逃離華工的那驚險的一幕。

人總算是逃出來了，但耽心再次被綁架，只好東躲西藏。先是在航空路宿舍鄰居家睡了一晚，而後又送到母親一位同事家住了幾天，最後是找到漢口民生路銅人巷一個親戚家住下。親戚姓袁，其母是我外婆的嫡親姊妹。這位親戚念過中師，因國語成績突出受到一位國文老師的青睞。但老師被查出是「歷史反革命」被逮捕，殃及弟子，法院以莫須有的「思想反動」罪判其勞教一年。釋放後這位親戚參加了工作並已有家室子女，文革中作冷眼旁觀未參加任何組織，我到他家避難他也不反對。

其時附中學生有在華工革委會任常委職的，從內部弄到一份機密材料。材料上列舉了我文革中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炮打三紅及為劉少奇叛徒集團翻案等諸多罪行，分門別類，倒是列舉得十分齊全。我想這大概就是張立國們搜集的我的全部「罪證」了，必須一一反駁以絕後患。當時「楊余傅事件」※20剛發生不久，武漢的造反派正在掀起「三反一粉碎」※21即「粉碎右傾翻案風」的運動。我於是將張立國拘禁我這件事，和「右傾翻案風」聯在一起來說事，三天之內足不出戶，一口氣寫下三篇總題為《我回答你們》的文章。其一「讓歷史作證」，其二「歷史在說話」，其三「歷史將宣判我無罪」。三篇文章以季米特洛夫在萊比錫法庭上的講演和卡斯特羅的辯護詞《歷史將宣判我無罪》為藍本，「正義凜然」地將張立國等人對我的指控逐一駁斥，「強詞奪理」之處自然也不在少數。

因為以當時的環境，我的一些言論確實是夠上「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綱的。我便取「避實就虛」的策略，繞開這類於我不利的問題，而大談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衝鋒陷陣的「赫赫戰績」，如率先揭露批判舊省委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率先為「一小撮」南下革命師生辯護、率先向「鎮壓群眾運動」的支左辦公室

挑戰、率先為工人戰鬥隊翻案等等。我挖苦說，當我和我們敢死隊以大無畏的勇氣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作殊死搏鬥時，你們這些害怕燒傷自己指頭的雞公和雞婆們正躲在雞窩裏作什麼呢？不錯，你們是很少犯錯誤的，正如——我引魯迅先生的話說——「誰也沒有發現過蒼蠅們的缺點和創傷。然而，有缺點的戰士終究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究不過是蒼蠅」。

然後我以一名「有缺點的戰士」的資格，對「完美的蒼蠅」們大加撻伐，極盡挖苦嘲笑譏諷之能事，酣暢淋漓地把這些「完美的蒼蠅」糟鄙了一通。我甚至將張立國與法西斯的頭子作類比。我說張立國在我逃出華工後叫囂說你儘管跑吧，我不怕你，我會有辦法對付的。這使我想到德國法西斯的黨棍戈培爾。戈培爾在萊比錫法庭上被季米特洛夫的發言駁斥得體無完膚時就曾惱羞成怒地咆哮說：季米特洛夫，你等著瞧，我不怕你！但歷史已經證明究竟是誰怕誰呢？！我在文章的結尾說：歷史將證明究竟誰笑到最後。歷史將宣判我無罪！

最後這句「歷史將宣判我無罪」，當然是從卡斯特羅那篇著名的法庭上的演說詞中學來的。我覺得卡斯特羅的這句話很精彩，極為自信極有力度而且大氣磅礴。不過我說這句話時何曾想到過真要兌現這句話，需要我拿出整個的青春作代價。附中學生拿到我這三篇文章後，立刻刻印成傳單到處散發，同時這三篇文章的大字報也一下子貼滿了華工校園，引來大批同學和老師圍觀。出乎我的意料，華工方面對我的文章不作任何回應，不組織反擊，也不公開我的「罪行材料」，只是在學校裏到處刷上巨幅標語，曰：

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朱九思！  
揪出反革命變色龍周嶽森！  
捉拿反革命小爬蟲魯禮安！

但說歸說、做歸做，不久我斗膽重新出現在華工園內時，也並沒有誰來「捉拿」我。我在附中幾個學生的護衛下，回宿舍取幾樣東西。那位因「怠忽職守」導致我的逃跑而難過得幾天吃不下飯睡不安覺的冷同學，把眼睛瞪得燈籠大，看外星人似的望著我，半晌不挪窓。末了才搭訕說：「回了？吃飯了沒有？」一點都沒了將我捉拿歸案，以贖當

初「怠忽職守」之過的勇氣。雖然如此，回校繼續復課似乎也是不可能了。華工園雖好，卻已不是我久留之地，張立國郭保安等人隨時可能秉承上頭首長的旨意，將我「捉拿」起來。我只能東躲西藏，「朝避猛虎、夕避豺狼」，只是因此而連累了不少曾給我提供宿食的人家。

例如我曾睡過一晚的鄰居胡家，我曾住過幾天的母親的同事家，更不用說親戚袁家了，事後他們無一不被扣以「窩藏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受到審查和迫害。而將這種罪名加在他們頭上也實在堪稱荒唐，因為按法律之規定，只有對被明令通緝者進行窩藏隱匿，才構成「窩藏」罪。而我被正式逮捕之前，是被通緝的犯人嗎？或是越獄逃跑的囚徒嗎？都不是。我只是一名學生，學籍在冊，享有一切公民的政治權利，留宿我的親朋好友何「窩藏」罪之有？

張立國等人之所以敢拘禁我限制我的人身自由，自然是得到上頭首長的默許，但是一些造反派的頭頭對此頗不以為然。工總的勤務員朱鴻霞也是省革委會中的副主任，有天當面質問省革委會常委郭保安為什麼把我關起來？郭尷尬地辯白說並沒有關，只是弄到一個地方向魯瞭解一些情況。朱說人被限制自由了不是關是什麼？還問他說我遙控武鬥有什麼根據？郭無話可言，便說「魯禮安確實有個對主席不忠的問題，我們掌握了這方面的證據」。朱便問他證據在哪裏？郭說反正有證據，但目前還不便公佈。

這些話都是工總的宣傳部長田國漢轉告我的。老田關心地問我究竟有什麼「不忠」的把柄給學校抓住了。我說還不是反對天津延安中學的經驗和為六十一人集團翻案之類的老問題，沒有什麼新的。但是我從附中學生那裏聽說，我在隔離反省時留下了一個圖畫，據說有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之嫌，但附中學生也無人知道那張「圖畫」究竟畫的是什麼。

聽附中學生說，「圖畫」的事，是郭保安向他們透露的。郭對他們說，再莫跟魯禮安跑了，莫受魯的蒙蔽，我們手裏有魯禮安反對毛主席惡毒攻擊毛主席的鐵證。俗話說「鐵證如山」，難怪張立國有恃無恐地叫嚷他不怕我、他有辦法對付我呢。

但是我對這個傳聞一點都不害怕。我對毛主席是崇敬和熱愛的，有些什麼看法也都是說在明處，我從來不做背地裏「惡毒攻擊」之類的

勾當。我真有「惡攻」的「鐵證」掌握在他們手裏的話，他們不早就將我捉拿歸案還等什麼？不是傳說有一種叫蠱的害人蟲嗎，專門會含沙射影，張立國郭保安就是蠱之類的傢伙，他們哪裏敢正大光明地與我交鋒。我在發表了三篇《我回答你們》的文章向他們的「黑材料」挑戰後，他們不是連屁也不放一聲麼？所以我對一些流言蜚語毫不心怵，自以為「身正不怕影邪」，張立國們奈何不了我。

黃石的中學生一年前曾由我帶領著和軍區的韓東山司令辯論過，與我私交甚好。他們聽說我在學校挨整，便邀我去他們那裏散散心。四月裏的一天，我和幾個附中的學生乘船去了黃石一趟。不料抵達黃石時，那裏的「鋼」「新」兩派正在進行武鬥。持「鋼派」觀點的「中學紅聯」的幾個學生據說被「新派」觀點的電廠抓了，「中學紅聯」的學生於是將電廠包圍住要求放人。雙方整整對峙了一天，電廠方面仍不放人，學生們急躁起來，準備大動干戈。當時電廠一帶看熱鬧的群眾極多，一片混亂，我在幾個熟識的黃石學生的陪同下，在離電廠遠遠的一條公路旁觀戰。

那時已近黃昏，只見幾個人影在電廠的圍牆下緊張地跑來跑去，忽然就見火光一閃，接著聽見「轟」地一聲巨響，有一處圍牆當中就出現了一個大洞，看來是中學生們在實施對電廠的「爆破作業」了。但學生們似乎並不敢貿然從這個炸開的洞口向廠內進攻，只是虛張聲勢地吶喊了一陣「衝呀！殺呀！」，就撤除了對電廠的包圍。這天晚上，我在「中學紅聯」的大本營黃石六中裏，見到了學生們的頭頭黃開石「黃司令」。黃開石就是上次來武漢找韓東山辯論時領隊的頭頭，與我是老熟人了，他請我給他手下的一幫人講講當前的形勢，我便信口開河地講了一通，無非是形勢嚴峻，「右傾勢力」猖獗，必須對「右傾翻案風」堅決反擊等等。我還以自己在華工挨整的事實，證明「新派」的一些頭頭已經淪為「右傾勢力」的幫兇，必須與之進行毫不妥協的鬥爭。

但鬥爭並不等於蠻幹，我對黃石學生炸開電廠圍牆的舉動提出批評。我說光天化日之下炸人家的圍牆，而且是發電廠的圍牆，影響肯定不好，會引起群眾的反感。我希望他們以後能夠理智一些，策略一些，盡量避免盲目性，不要讓人抓把柄。但在場的學生提出了一大堆圍攻電廠和炸圍牆的理由，我一個局外人不明就裏，也說服不了他

們。黃開石本人對我的批評似乎也不怎麼以為然，見面會最後弄得不歡而散。

「新華工」方面很快就知道我去了一趟黃石，頭頭們非常敏感地將黃石的那次武鬥和我現身黃石的時間聯繫到了一起，斷定這次武鬥就是我去策劃指揮的。湖北大學一位有「彭油嘴」美稱的名叫彭勳的講師，在給「新華工」的師生作形勢報告時，就提到了我前往黃石「操縱武鬥」的事情。他說黃石的學生在我的指揮下包圍了黃石電廠，並且準備用炸藥包爆炸電廠裏的發電機組。據他說導火線都已經點著了，眼看一場大爆炸就要發生。千鈞一髮之際，魯禮安突然覺得不妙，趕快一個箭步衝上去，掐滅了正在嘶嘶燃燒的導火索，才沒有造成嚴重的後果。彭引用法律術語，說我這屬於「中途停止犯罪」，可減輕一些罪責，但仍應按「爆炸罪」追究，云云。彭勳到底不愧「新派」的頭號名嘴，將此子虛烏有的「爆炸電機」事件編造得繪聲繪色，活靈活現。當附中的學生把彭編造的這套故事引述給我聽時，我不禁啞然失笑。「掐滅嘶嘶燃燒的導火索」，我哪有那個本事和膽量？「彭油嘴」大概是驚險小說看多了，把一些書中編排的情節生搬硬套到我的頭上，真是好笑！

附中的學生說他們在彭勳誇誇其談地吹得忘形時，擠到他後面，偷偷地將彭勳放在隨身的皮包裹的一柄公安用的小手槍竊到了手。這把手槍十分的小巧，可連發八粒子彈，俗稱「小八音」，也不知彭是從哪裏搞來的。附中學生們將這把「小八音」拿給我看，只見湛藍色的槍身晶瑩光亮，放在手心裏只有半個巴掌大小，果然是非常的精緻。

說到槍的問題，文革中不知有多少槍支流失到民間，可謂後患無窮。我們班上有位女生叫劉愛蓮，河南人，是紅反團的成員。有一次附中學生在擦槍時沒有退掉子彈，一不小心槍走火，一槍正好命中劉的胸部，使其當場斃命。這個女同學的父親聽說是河南的造反組織「二七公社」的頭頭，女兒死後曾來過我們學校處理後事。聽附中學生講，劉父頗識大體，不但不責怪那個肇事的學生，還安慰他不要難過自責。劉的父親還引毛主席的語錄說，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我們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劉父自然是深明大義，姿態之高，幾可與在得知自己的長子在朝鮮戰場上犧牲的消息

後的偉大領袖相比。但我還是覺得這位當父親的表現得太冷靜、太理智了，他真的認為他的寶貝女兒的不明不白地橫死是「死得其所」麼？他真的沒有中年喪子的大痛大苦麼？

我沒有見過劉愛蓮的父親，所以我也說不出什麼。但在黃石的那幾天，我倒是目睹了一位父親的喪子之痛的。有一個父母都在外地工作的中學生在武鬥中被打死了（有學生悄悄地告訴我說，這個學生多半是在混戰中被自己的戰友誤殺的，因為子彈是從背後穿過），他的母親聽到獨生兒子的死訊後便昏厥了過去，父親尚能強撐著趕到黃石奔喪。我見到這個學生的父親（一位礦山工程師）是在學生們召開的「烈士追悼會」上。只見這位可憐的父親兩手抱著兒子的骨灰盒，神色悵然地坐在一張椅子上和兒子的同學們合影。沒有一句言語，也沒有一滴淚水（淚水想必早已流乾了），從那位父親的空洞茫然的眼神裏，能看到的只是無可言狀的悲慟、無助和絕望，是一種撕心撕肺，叫人慘不忍睹的大痛苦。這位父親顯然被突如其來的災難徹底地擊垮了，我不知道這位父親今後將如何面對殘生——這個世界對他來說也許再無快樂可言。

老實說，面對這位失魂落魄、痛不欲生的父親，我那時在心靈上是有過震撼的。我想到「七二〇」前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間的鬥爭，想到「七二〇」後的鋼新之爭，想到這些派別之間的鬥爭曾經和正在奪去多少無辜群眾的生命。那些在武鬥中橫屍街頭的同學也好，那些被流彈或「槍走火」誤殺的同胞也罷，他們真的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死」，而死得「比泰山還重」麼？他們在九泉之下，真的能夠安詳地合上眼睛麼？

我就想到我寫的那些鼓吹武鬥的文章——我究竟是在為「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搖旗吶喊。還是在為一種骨肉相殘的罪惡推波助瀾？我無法回答，也不敢回答，甚至不敢徹底地去想。所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已經被逼到懸崖邊上，無路可走，唯有按照原來的思路，擊退對手對我的攻擊，或許還能殺出一條生路。我已別無選擇。

從黃石返回武漢後，我仍然「頑冥不化」地堅持自己的那套理論。我私下堅持認為，形勢並非一片大好，黨內矛盾實際上愈演愈烈，軍閥割據的局面不是不可能出現。當時我收到一張上海《紅衛戰報》，上

面刊有一篇題為「一切為了九大」的文章，是上海一些激進的中學生寫的。文中提出「黨權是政權的核心，是階級鬥爭焦點的焦點。敵人不甘心失敗，正在焦急地拼湊殘餘力量，妄圖在九大上反攻倒算。」我和馮天艾交換過意見，一致認為「九大」很可能不能按毛澤東預計的在六八年召開。若果然如此，全國各地造反派中的先進分子，極有可能像當年毛澤東、李大釗那樣，聚集在一起探討中國革命的前途，籌建一個真正忠實於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馬列主義政黨。我們認為傳言毛主席提出的「重上井岡山」，就有著重建共產黨重建人民軍隊的意味。歷史上孫中山先生不就曾因國民黨中右派勢力猖獗，而拋棄舊黨另建新黨的舉動嗎？我們覺得黨內的「右派勢力」正日益坐大，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已經構成極大的威脅。目前的路線鬥爭，主要是要反右。

那時我們對曾經殘酷鎮壓上海「紅革委」的張春橋特別不滿，便將張春橋列為黨內右派勢力的頭號目標。周恩來也因其在黨內鬥爭中一貫取「調和路線」而成為我們非議的對象。但是我堅持可以含蓄地批評周的一些觀點和錯誤，但不要點名。因周有極深的資格、極高的威望，在黨內一直是毛主席所倚重的左右手，而且在「鞠躬盡瘁」這點上還是令人尊敬的；而張春橋則不同，無任何資歷和威望可言，不過是一個借文革暴發的新官僚而已。

在5月16日《五一六通知》發表一周年之際，我們在田國漢所在的印刷廠裏印刷了《揚子江評論》的創刊號，以「新華工決戰決勝戰鬥隊」的名義發表了我起草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派》一文。這篇當時流傳各地、流毒甚廣的文章，顯然是模仿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派》一文。文章抓住毛主席當時提出的「對派性要作分析」一語作根據，對上海《文匯報》一篇社論「派別是階級的一翼」的一些觀點，如「派性的反動性」，「無條件實現大聯合」，「現在的鬥爭主要是公與私的鬥爭，不再是革與保的鬥爭」逐一進行批駁。文章指責上海在復旦一所大學「就抓出了具有極『左』思潮的『右派學生』兩千餘人是對革命造反派學生的反攻倒算」。我在文章中再次重申了戰爭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延續的觀點，指出「一旦資產階級首先把刺刀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就必須用暴力對付暴力，用革命的戰爭來反對反革命的戰爭。」我

堅持認為文化大革命要取得最後的勝利，一場「國內戰爭」幾乎不可避免。我最後說，

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右傾分裂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的潮流，衝破了小資產階級熱心散佈的一種革命收場了的幻想。去年九月至十月的聯合高潮，在我們看來，不是革命運動的終點，而是這個運動的起點……運動中的一些政治派別也會急劇而尖銳地分化開來，如馬克思所論：「直至它們跟各大階級即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完全相吻合，而無產階級會在一系列搏鬥中相繼博得各個陣地為止。」

平心而論，我們對以所謂「中派」為代表的「調和路線」的批判，本身就是站在「極左路線」的立場上的，所以很難做到客觀。但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黨內鬥爭正繼續趨於激化，各種政治派別都在急劇而尖銳地分化。而那將要召開的黨的「九大」，也絕非什麼「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而是一場更加驚心動魄的黨內鬥爭的起點。

這一期《揚子江評論》還發表了馮天艾的《派別與派性》一文。之後馮還將在這個《評論》上發表一系列的文章，而我的這篇文章則是我文革中的「絕筆」。僅僅兩天之後，我在赴黃石途中於鐵山被劫，從此從人間消失。

後來我曾無數次對自己在文革中那些代表極左思潮的文字進行認真的反省。我問自己，如果我不是在六八年的夏天失去人身自由，以我狂熱激進的思想方式，在以後的年代裏是會像張立國那樣淪為「四人幫」的爪牙，還是像我的朋友李正天那樣，從狂熱走向冷靜、從幼稚走向成熟、從狹隘的派性走向為整個民族的利益和社會的進步而鬥爭？我想我一定會走向後者。無它，只是因為我從來疾惡如仇，崇尚正義，我不但有一個能夠獨立思考的頭腦，且不乏探索真理，為真理獻身的勇氣。但是歷史沒有給予我走向真正覺醒的時間。

## 第十二章

# 沉入黑暗的深淵

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蠱惑我在五月十七號這天，鬼使神差地踏上這條通往黃石的「恐怖之旅」。我只記得那天晚飯後，附中的「小和尚」突然跑到我家裏來，把我拖出門說，有車子去黃石，到黃石可以搞到印報的紙張，而我那時正在為「揚評」銷量極好而紙源不足發愁，於是欣然前往。「小和尚」帶著我過江，到武昌一所電力設計院的宿舍大院搭車。一輛嘎斯69工程車正停在院子裏，機床附件廠與我一道在湖藝呆過的吳昌青師傅和附中原敢死隊的幾名隊員孫彥章、干小雄等也已等在那裏。還有幾位不認識的工人師傅，是設計院造反派的頭頭，連同司機，一共有十二三人，都準備去黃石。

從那幾位頭頭嘴裏知道，黃石的學生兩天前剛剛從一座部隊的軍火庫裏，搶了大量的槍枝彈藥，這幾位造反派的頭頭，想去那裏搞一批輕重武器。他們聽說我與黃石學生有一段特殊的友誼，便想請我幫他們牽線。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這還不是小菜一碟嗎？上車就是。大家請我在前面駕駛室就坐，我謝絕了，和大夥兒一起坐在後面的車廂更融洽一些，而且可以聊天解悶。小吳師傅撥弄著手裏的一把加拿大產的勃朗寧左輪手槍，吹牛皮說莫看這把槍子（指手槍）不起眼，我可以用它百步穿楊。我笑道吹牛皮不打草稿，你可以百步穿牆還差不多。眾人大笑，笑聲中我們爬上卡車，駛出了武昌城。

汽車在蒼茫夜色中奔馳了兩三個鐘頭，小吳師傅指著窗外告訴我，馬上就快經過鐵山了。鐵山是大冶鐵礦的主脈，延綿十數公里，貯藏著極為豐富的黑色金屬，聽說毛主席都曾親臨鐵山視察過。聽小

吳師傅介紹說，鐵山的造反派非常厲害，而今此地乃「新派」的一統天下，專與黃石的「鋼派」作對，黃石的學生輕易不敢從鐵山經過，視此地為畏途，稱其為「小臺灣」。黃石學生總在叫嚷「解放臺灣」，但「鐵山聯防」壁壘森嚴，哪個敢動他們半根毫毛。說話間只覺得車子減緩了速度，慢慢煞在一處路卡旁邊，下面似乎有什麼人要上車搜查。然而車子猛一發動，向左邊歪了一下，便拐過哨卡衝上了公路。我們坐在車廂裏，看見下面有兩個人追著車子喊停，但很快就被車子甩得老遠。漸漸一切都重歸於寂靜，耳朵裏只有汽車的馬達聲在響，偶爾，從遠處會傳來礦山小火車短促而尖銳的汽笛聲。

公路兩旁的麥子已經成熟，空氣中彌漫著麥穗的清香。遠遠的是黝黑的連綿起伏的山嶺、一閃而過的明滅閃爍的燈光。礦山的夜晚十分寧靜，偶爾會有犬吠聲。黑暗中一輛礦山的重型卡車迎面駛來，與我們擦肩而過，車上的工人一律頭戴柳藤帽，手持衝鋒槍，威風凜凜得嚇人。慘澹月光之下，我們看見車頭架著好幾把蘇製馬克辛式帶護板和小輪子的重機槍。月光照耀下的槍頭，晃動著淡淡的藍光。

公路兩旁的山嶺逶迤伸展，如長蛇般不見頭尾，我們坐的嘎斯跑了好半天，都還沒有跑出鐵山的地盤。我們深感困倦，一個個打起哈欠，汽車的顛簸，更使我們昏昏欲睡。迷糊中突然聽見槍聲大作，子彈像著火的飛蝗，從後面向我們直飛而來。流彈在夜幕中劃出密集而耀眼的彈道，我們乘坐的嘎斯後面的厚厚的鋼製檔板，被彈頭打得劈劈崩崩地亂響。我們幾曾見過這種觸目驚心的場面，全都被這突如其來的襲擊弄懵了。追擊我們的車輛，無疑正是剛才與我們擦身而過的那輛武裝巡邏車，他們一定是巡邏到哨卡時，被告知我們這輛車強行衝關，而誤將我們認作了「敵人」。我們現在只能暗中叫苦，唯一能做的事，是把身體盡量匍匐得低一些，把腦殼盡量往下壓一些，以避免傷亡。爆竹般的槍聲響了一陣，漸漸停歇下來，我們好歹鬆了口氣，慢慢抬起頭來互相看著，慶幸自己的命大。

然而莫高興得太早，那可怕的槍聲又一次爆起，一道道火龍再次向我們飛來。一位工人師傅躲避不及，頭部中了子彈，頓時血流滿面。驚恐中他絕望地問旁邊抱著頭的一位同學，他的腦殼打穿了沒有？那同學冷俊不禁苦笑道：腦殼打穿了你還能說話麼？忽然槍聲又

停了下來，一同學趕忙在胸前劃十字作祈禱狀說，上帝保祐沙皇。上帝是否真的保祐沙皇，可是誰也不知道，但我們的處境之險惡是明擺著的，再跑下去肯定是凶多吉少，要出人命。倘若弄不好全車人一齊給包了餃子，那豈不是太可悲？唯一的辦法，是讓車子停下來讓鐵山的人檢查。我便趁射擊暫停之機，爬到車廂前壁，隔著窗玻璃，用拳頭拼命捶打駕駛室，呼叫司機停車，但一點作用也沒有。也許是司機根本聽不見我的捶打和叫喊，也許是聽見了也無暇理會，一心只想衝出這恐怖的山谷。

槍聲再次響起，我們的嘎斯像頭發狂的猛獸向前狂奔，後面的車子更像頭噴火的怪獸窮追不捨。黑暗中一道道火鏈，在兩車之間飛舞，那場景一定非常之壯觀，令鐵山的居民大飽眼福。據說那一晚礦區的老百姓是傾巢而出，爭相目睹這場激烈的「鐵山追擊戰」。

我們的嘎斯終於沒能跑過對方的車輪，車子被對方撞上攔截了下來。我們被趕下車做了俘虜，隨即押上他們的車，送到一處戒備森嚴的地方。我們排成幾行隊列點數。被槍子打傷頭部的那位工人師傅，在他的同事的攙扶下，血人似的戰戰兢兢地支撐站立著。大家都不免物傷其類，而且後怕：倘無車後那塊厚厚的鋼板的掩護，我們十之八九要被那後面的幾挺「馬克辛」打得稀爛。但事後鐵山聯防的說法又不一樣，他們說當初考慮到情況不明，射擊時是只盯著車輪打的，不然我們車上人早就統統見了閻王。

不管怎麼說，沒死人就好。那位頭部受傷的師傅，不一會也被送到礦山醫院搶救去了，鐵山人還不像傳言中那樣「殘無人道」。但一個聯防隊員不知怎的，就是對我這種戴眼鏡的看不慣。先罵我一聲臭知識份子，又罵一句四眼狗，接著也不管「君子動口不動手」的古訓，揮起拳頭對準我的眼鏡猛地一擊，眼鏡就不翼而飛老遠。等孫彥章替我撿回時，鏡架早已「一分為二」，一隻鏡片也已摔成八瓣，幸免於難的那一片，我趕緊塞進襯衣荷包裏。這時候有幾個聯防隊員急匆匆地闖進來，他們在我們那輛車的車廂裏，發現了幾粒散落的手槍子彈。

「誰帶槍了？誰帶槍了？」聯防的舉著一粒子彈衝我們大叫。大家都說沒帶槍。「沒帶槍，這車上的子彈哪裏來？難道是從你們的屁眼裏屙出來的？」聯防的一個頭頭掂著手心的幾粒子彈冷笑說，我們都不吭

聲。又追問了幾遍，那頭兒便令手下對我們一一仔細地搜身。其他人我倒不擔心，我就擔心小吳師傅，槍和子彈只有他有，但從他身上也沒搜出任何武器來。看來他一見勢頭不對，抽機會早把隨身帶的那把勃朗寧扔到爪哇國去了，但事情做得不乾淨，竟把子彈散落了一些在車廂裏，搞得大家都脫不了糊。

聯防的一無所獲，就把我們押進一間大屋。在押解中我悄悄傳話，叫大家一律不要叫我的名字，因為我預料我的名字在這個地方會給我帶來麻煩。我們被押進屋後分三行站好，四周是荷槍實彈的聯防隊員，窗子外則扒滿了看熱鬧的大人和小孩。一個紮武裝帶佩小手槍的「分頭」開始向我們訓話，指責我們「夜襲鐵山」、「破壞革命和生產」，他們是被迫「自衛還擊」、「捍衛新生紅色政權」。總之他們追擊我們打傷我們的人，都是「革命行動」。胡說一通之後，他突然想起問我們是哪個組織、哪個單位的，幾個附中學生一齊說是「新華工」的。頭目一聽愣了愣，臉色驟然和緩，忙打哈哈道，「新華工的，怎不早說？一家人打了一家人，誤會、誤會。大水沖了龍王廟嘛，誤會。」

眼看已是柳暗花明，不知哪個偏偏多嘴，加一句說「他們是新華工敢死隊的」。頭目一聽，臉色又一下子晴轉了多雲，咕嚕說「媽的，差點搞錯了碼子，原來是敢死隊的。你們隊長是那個魯禮安吧？」頭目分開手指頭梳梳他那油光水滑的分頭，眨巴著眼說，「魯禮安是專搞打砸搶的，你們快莫跟他瞎雞巴跑了。」然後要我們一個個站好，他要「對麥子」(湖北方言：驗身份，對號的意思)。我已想好一個熟識的同學的名字，準備蒙混過關。聽前排的人一個接一個地通報姓名、單位，已快輪到我了，忽然一眼瞥見斜對面爬在窗戶上看熱鬧的一個學生伢，直盯著我滿臉驚詫。只見他貼著同伴的耳朵嘀咕了幾句，就溜下了窗臺。

我心裏楞登了一下，知道這個學生一定是認出了我。因為鐵山黃石七中的學生一年前是隨黃石紅衛兵造反團來過武漢，參加過與省軍區的韓東山司令的辯論的，而我受華工頭頭的委託帶過他們，這些學生全與我混得很熟。後來黃石與鐵山的學生分成了「鋼」「新」兩派，各為其主，七中的學生要「水」(湖北方言：出賣的意思)我那是一點都不奇怪。我恐怕是蒙混不過去了，一顆心砰砰直跳，幾乎懸到了半空

中。果不其然就有人進來，眼睛直直地盯著我，在頭目耳邊咕嚕了幾句，頭目便用手直指著我，令我出列。

我硬著頭皮站出來，隨即被帶到隔壁一間小屋子裏站好。等了一會，幾個年紀大些的人陰沉著臉走進屋來，在一張桌子後面坐下。一個年輕的女人坐在桌子側面，攤開紙筆做記錄。這幾位大約級別高一些的頭目一言不發，幾雙眼珠像掃描似的，在我臉上掃過來掃過去，像要掃出密電碼之類的東西來。在他們身後和兩旁，擠滿了橫眉豎目的大漢，有的穿件背心、有的披件汗衫、有的乾脆就是赤膊大仙。一個個或背衝鋒槍、或挎盒子炮（一種老式駁殼槍）、或扛日本刀，那陣勢不由得讓我想到小說和電影《林海雪原》中那個座山雕的威虎廳。

／忽然，坐中間那把交椅的一個大胖子，把手掌猛地向上一抬，眼睛鼓得癩蛤蟆似的，牙關咬得錚錚直響。我一時產生錯覺，以為那緊咬的牙關之間，要崩出那句土匪之間「對麥子」的有名的暗語「天王蓋地虎」（匪語，與下面對應的一句「寶塔鎮河妖」，均見小說《林海雪原》）了。不料他卻將桌子重重地一拍，喝道：「你叫什麼名字？」

原來鐵山與威虎山並不是一個「遯子」（匪語：一個窩子的意思）的，我只好咽下已到嘴邊的一句「寶塔鎮河妖」，逕自通報自己的姓名。我並非英雄好漢，但眼下已明知蒙混不過了，只得「行不改名、坐不更姓」地大丈夫了一回。

「嗯，還算痛快。」大胖子鼻孔裏哼了哼，點點頭，問：「深更半夜，到鐵山幹什麼來了？」

我告訴他們，是去黃石搞印報的紙張，路過鐵山。

「胡……胡說！」胖子旁邊一個師爺模樣的瘦高個打斷說，「你們不是路過鐵山，是攻打鐵山、夜襲鐵山，破壞我們的抓……抓革命促生產、顛……顛覆紅色政權。」

這個結巴給我們加的罪名夠大了，只是八竿子也打不著。我辯解說這是不可能的事，我們總共才十來個人，且手無寸鐵，如何敢攻打你們號稱「固若金湯」的鐵山呢？

聽我說他們「固若金湯」，那胖子得意了，點頭說，「這你算是說對了，我們就是固若金湯，所以你們的陰謀是不可能得逞的。有人還攻

擊我們是小臺灣呢，小臺灣又怎麼樣？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我們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就是在罵聲中成長、壯大，啊欠，啊……欠。」胖子顯然困了，打了個大大的哈欠。於是輪到師爺接著放蛆，說，「你不要避開要害問題，否認你的罪……罪行，滑是滑不過去的，你們也絕不……不是手無寸鐵，而是帶……帶了武器的。」旁邊另一人插話說，「你們首先開槍，挑起武鬥，我們才被迫還擊，武裝自衛，責任完全在你們身上。」

正說著，忽然有人匆匆進來，貼著那正閉目養神的大胖子的耳朵，神色緊張地說了幾句什麼，好像是危險、搶救之類的話。那頭目眉頭一皺，眼皮一翻，突然將桌子猛地一拍喝道：「你還敢狡辯！你們剛才從車上開槍，已經打傷了我們的人，現正在搶救。搶救得過來還好說，若是搶救不過來，我要你抵命！」頭目此話的意思，我聽得明白，其實是說我們那位被機槍擊傷的工人師傅傷勢嚴重，正在搶救之中。倘搶救得過來，還好交待；倘搶救不過來，便要強指我們開槍打死了他們的人，搞個「一命換一命」，以逃避責任。果不然審問迅速升級，一屋人拍桌打椅，大呼小叫，逼我承認首先開槍傷人。然而這種性命攸關的事，我豈能瞎講。

「識時務點，夥計。」那師爺勸道，「識時務者為俊……俊傑。好漢做事，好漢……漢當。不承認的話，硬抗沒……沒有好下場。」

「沒有開槍就是沒有開槍。」我實事求是地說：「夜闌鐵山是個錯誤，引起了誤會，我們可以道歉。但絕不是攻打你們，我們根本就沒有帶槍。」

「撒謊！」一小頭目叫道，「你們肯定有槍！車廂裏找到了子彈，有子彈還會沒有槍？有槍就證明是開了槍。」

子彈這件事情，真是害人不淺，我只好說「有沒有個別人身帶槍，我也不敢保證，但可以肯定沒有人開槍。當時你們的機槍子彈掃得我們頭都抬不起來，還有誰敢開什麼槍？何況你們說有子彈就一定有槍，有槍就一定開了槍，也沒有道理。邏輯上不能成立，事實更非如此……」但是不等我說完，大胖子頭目早就惱羞成怒了，咆哮說：「你還敢強嘴，膽子不小！給我綁了。」下面的嘍羅們一哄而上，用根

粗麻繩將我來了個結結實實的五花大綁。麻繩勒得皮肉生緊，全身都發麻。真倒楣，我自脫娘胎以來，幾時受過這種洋罪？

「極不老實！」頭目嘴一撇，對嘍羅們說，「教訓教訓這個傢伙……。」

四五個大漢兇神惡煞地圍緊了我。正面一個向我當胸一拳，我朝後一倒，背脊上接著又挨了一下，幾乎同時，兩邊腰子也挨了拳頭。我身手全被綁著，躲無可躲、防不勝防，任我有百米跑得飛快的功夫，此時也只能給打手們充練習拳頭的「沙包」。忽然我眼窩重重地挨了一記老拳，一瞬間眼前金星四迸，就像打鐵時鐵砧上金星飛濺一樣，我終於體驗到所謂「兩眼冒火」絕非虛傳。我感到眼睛火燒火辣、疼痛異常，擔心這隻眼睛會保不住，禁不住大叫一聲，淚水從受傷的眼裏洶湧而出。朝我下毒手的那傢伙卻毫無人性，竟幸災樂禍地獰笑道，原來你也會哭哇，不是大名鼎鼎的敢死隊隊長嗎？不是說敢死隊的骨頭是蠻硬的嗎？怎麼變成了個熊包？我被這個魔鬼的挑釁激怒了，抬起頭睜開紅腫的眼睛傲然宣佈說：「敢死隊的骨頭，在百匪面前從來就沒有軟過。」

「好哇，這傢伙敢把老子們比作百匪！」那傢伙一跳三丈，霍地從屁股後摸出把雪亮的匕首，兇神惡煞地逼過來，咬牙切齒道，「老子今天非把你這小子一塊一塊零剮了。」他邊說邊揪住我的左耳，操起匕首朝耳根上就是一下。我只感到耳根一陣劇痛，隨即麻木，鮮血汨汨地順著脖子朝下流。這時小吳師傅正好被人推進來，目睹了這一幕，驚得目瞪口呆。那傢伙還要蠻幹，但是旁邊有一個人過來從他手上奪下了匕首，扔到地上。那人又不知從哪裏扯了點舊棉絮，塞住了我的傷口，這時我穿的白襯衣的領口，早已被血染紅了一片。一直坐在桌子側邊的那位年輕女人走過來，遞杯水到我口邊，讓我喝了口水，然後有幾個人跑過來，七推八搡地把我帶出了房間。當我跌跌撞撞地被帶出房間時，卻聽見屋子裏又傳來小吳師傅挨打的慘叫聲，大概是哪個同伴恐懼之下指認他帶有槍，於是這群人又在用拳頭和皮帶收拾他，逼迫他承認開槍傷人了。

真他媽的「小臺灣」！一點不假。只是，我們哪一點冒犯了他們？竟至遭此荼毒。昏頭昏腦的我被帶進一間地上鋪有稻草的空屋，屋門

外上了鎖，還有人把守。我身子是捆綁著的，只能麵袋子一樣倒在稻草上睡。渾身痛得散了架似的難受，密密麻麻的蚊子偏又來湊熱鬧，把我當成它們盡情享受的「滿漢全席」，而我連動都無法動一下。腦殼裏更是一團亂麻，像有一窩馬蜂在裏面嗡嗡地亂叫。

我實在是懊惱極了：出發之前，為什麼就不打聽一下沿途的情況呢？俗話說出門先問路、行船先看風，早知道鐵山在搞「封建割據」的話，說什麼也不能綠頭蒼蠅似的瞎闖，要是像上次一樣搭船或是搭火車豈不是順順當當？還有上車時該就坐在前頭駕駛室的，那樣過鐵山路卡時我會見機行事，打「新華工」這張牌子（華工的校徽和「新華工」的袖章我身上都有，不怕哨卡不相信），讓「友軍」放行，而不至於由司機莽莽撞撞強行衝關，惹下這場飛來的橫禍。另外小吳師傅也太不謹慎，扔手槍時怎麼會把子彈遺落在車廂裏呢？結果被人家拿住了把柄，說都說不清……總之現在說什麼都晚了，倒是該想一想一朝魔窟脫險後，該怎樣控訴鐵山聯防的暴行。諸如「半路攔劫，開槍傷人，嚴刑拷打，私設牢房」之類的罪名，鐵山聯防自然是逃不脫的。題目呢，就叫「魔窟脫險記」或「鐵山遇險紀實」好了。或者乾脆就來個左拉式的標題「我控訴」，登在《揚子江評論》上。到時再開個記者招待會，把華工那次綁架我的事情與鐵山的截車事件一窩端。想來想去沒想出個頭緒，人倒是昏沉沉地睜不開眼了……

朦朧中就覺得小吳師傅揣著他那把「勃朗寧」，和幾個附中學生閃了進來，拉起我就往外跑，一路悠悠蕩蕩腳不點地跑到一片曠野之中，我們來時乘坐的那輛工程車就停在那裏。我又驚又喜奔向車子，同夥們全在車上等著我們。於是就爬上車，車飛奔起來。但槍聲又追著我們響起，突然轟的一聲，車被炸翻了，我一屁股摔在地上，屁股摔得生疼。睜眼一看，哪裏有什麼車子和同伴，倒有幾個聯防的人直挺挺地站在我面前，其中一個正用腳上的反毛皮靴使勁地踢我的屁股。「起來、起來！」「反毛皮靴」吆喝說。我便用勁爬起身來，幾個人七手八腳倒是給我鬆了綁。我正想活動一下又酸又痛、又辣又麻的雙臂，卻又被他們戴上了手銬。接著我被帶出了屋子，黑暗中幾支電筒照路，帶我穿街過巷。

過了一條很寬的公路，翻過礦區的鐵軌，前面房屋漸漸稀落，頭

上的星光卻愈來愈明朗。不是做夢，是真的來到一片曠野之中了。但曠野中並沒有我夢中見到的那輛卡車，卻有一棟簡陋的工棚，孤零零地豎在那裏像座荒廟。與之相伴的有一鐵籠，冰冷而蕭森，如一噬人的野獸蹲在黑暗之中。

已是下半夜了，該是一天中最黑暗的時刻，四周寂靜得彷彿可以聽見流星割破夜幕的撕裂聲。我仰視星空，詫異自己被押到這曠野中來是幹什麼？私刑拷打，秘密處決，一切都可能發生。巨大的恐懼籠罩著我，我孤立無助，大腦中一片空白。

我被幾個人推到了鐵籠之前，其中一人把鐵籠的一扇小門打開，命令我說：「進去！」我十分惶恐，不知道要我進去做什麼，進去後他們會如何處置我。我忽然想到了明清統治時一種懲治犯人的刑具「站籠」，是將犯人置於籠內，折磨至死。難道這種地方承明清酷刑之遺風，也使用此類刑具麼？正胡亂猜疑時，有人抓住我的胳膊使勁一推，我便跌進了籠內。押送我的三四個漢子，隨即也鑽進籠子緊緊地貼著我站著，一個個神情冷漠雙目微閉，像是在等待什麼嚴重的事情發生。我愈發緊張得心都要跳出胸腔，想起書中讀過的美國三K黨對黑人使用私刑的情節，不禁渾身汗毛倒豎。突然耳邊響起轟隆聲，大地在我腳下裂開，我們一古腦全陷進了地裏。

原來，我們這是站在礦井的吊罐裏往井下下降。吊罐迅速而平穩地下沉，四周凸凹不平岩錫斑駁、溜光水滑佈滿了苔藻的岩壁，一段段向上退去。不過幾分鐘的光景，吊罐落到距地面約200米深處的隧道裏，我發現自己來到一個燈火通明、亮若白晝的地下世界。無數的鋼纖電纜網羅交織，一道道窄幅鐵軌橫七豎八犬牙交錯；巨大的水泵不停地將不斷湧出的地下水抽上地面，各種礦山機械的轟鳴聲如雷貫耳，不時有滿載礦石的礦車在眼前哧溜滑過。這樣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新奇世界，我還未看仔細，便被押進了一間離大巷道較遠的僻靜的工棚。工棚裏有兩位披著棉襖的工人師傅，正坐在一座長方形的大電爐旁邊烤火。爐子上煮著一杯什麼東西，從咕咕叫的杯子裏，散發出一陣陣濃郁的肉的香味。

這已是五月的中下旬，我在武昌是穿著件薄薄的襯衣上路的，儘管外頭早已變得有些燥熱，但井上井下氣溫相差懸殊，坑道裏寒氣逼

人，令人竟有秋蕭之感。留在井下看守我的一個「聯防」，早就套上件工裝湊到電爐邊烤火去了，卻令我坐到工棚角落裏一個木頭的工具箱上。「老老實實就在那裏呆著，不然打斷你的狗腿！」那「聯防」警告說。其實不用他說，我也不敢亂動，在這隔絕天日的井下，戴著手銬，加上看守，我是插翅難飛。我又冷又餓又怕又困，蜷縮在角角裏全身發抖。值班的工人師傅心倒好，端了半杯煮好的肉片湯給我喝，熱湯下肚，身子頓時暖和起來。一位師傅又從工具櫃中找了件舊棉襖，扔給我讓我披上，那「聯防」對此也不加阻攔。我精疲力竭，卻難以入眠，半靠半躺在工具箱上發呆。地面上夜色該是慢慢在褪散，黎明正悄悄地走來，但黎明的曙光再不能照到我的頭上了。

我不知是什麼時候睡着和醒過來的，礦井下分不出晝夜，只知道值班的師傅是八小時一次輪換。看守我的聯防隊員，也是隔段時間換一次班。換班時，有的隊員會記得下井時給我捎來一碗飯菜或麵條，有的就乾脆什麼都不管，活該我挨餓。倒是剛進棚裏遇見的那兩位值班的師傅心腸好，只要是他倆當班，吃的總有我一份。有天趁看守閒逛去了，我悄悄問他倆是哪一派的？兩位師傅很不好意思地說原來是百萬雄師的，站錯了隊。我說那有什麼，保守派裏也多數是好人，造反派裏壞人也不少。站對站錯，其實很多是偶然的因素。他們問我為什麼被抓進來？我說晚上開車去黃石路過這裏，大概是沒有接受他們哨卡的檢查，他們就追，用機槍跟在後頭掃，把我們的人頭都打傷了，又把我押到這裏來。

兩位師傅聽了就搖頭，說簡直一點王法都沒有了，又說怪不得礦上都吵得吼吼神，說有一夥武漢來的「鋼派」和聯防接上了火，打了一晚上，結果都做了俘虜。要他們交出槍來死也不交，打得一個個像鬼叫，原來就是你們。可是看你這個樣子文質彬彬的，也不像個打仗的嘛，你是個學生？我說我是新華工的學生。他們就奇怪道新華工和鐵山不是一家嗎？怎麼倒把你捉了？我只好說一言難盡。他們還想問，但是看守轉回來了，和他一起的還有一位自稱「湯某人」的幹部，和兩個半槽子大的中學生，他們剛從井上下來。

「你知道我們為什麼要把你關在這兩百米深的礦井下嗎？」湯某人問我。我搖搖頭，湯於是說，「我們知道你的本事大得很，新華工把你

關在四樓，你都有本事從窗子跳下去逃走。所以我們把你關在這地底下深深的，看你還有什麼招數？現在你要老老實實交待你們首先開槍打傷我們聯防隊員的罪行。」

我說我們沒有開槍。

「你到現在還是抗拒！把衣服脫掉。」湯某人邊說邊向旁邊那兩個中學生遞了個眼色，然後踱到一邊去背向著我。那兩個中學生一人抓起一根用鋼絲絞成的鞭子，就朝我蒙頭蒙腦地抽下來。一道鞭子一道血印，我痛得蜷縮在地下，一邊用戴著鎚子的手護頭，一邊大聲慘叫。值班的兩位師傅在一旁看得心驚肉跳，但他們「站錯過隊」，哪裏敢出來制止他們的暴行。此後一連幾天，這位湯某人都要帶著這兩個打手下井，用鞭子逼我交待子虛烏有的開槍事件。而我當然不能承認，於是每次都免不了一頓毒打。那兩個與我往日無冤近日無仇的學生娃娃下手之狠，實在出我意料之外。我一向相信「人心都是肉長的」，「人之初、性本善」，這些半槽子娃娃怎麼就如此沒有人性？早就聽說北京的高幹子女組織「聯動」心狠手辣、如狼似虎，能將「黑五類」往死裏打而毫不手軟，看來並非虛傳。

不過我至今都並不記恨那兩個毒打我的學生，我相信人性遲早會在他們身上復蘇的，上帝寬恕他們，但是我永遠會記得那個「湯某人」，記得他的兇殘、卑怯和偽善。他從不親自動手，在我被打得嗷嗷慘叫時，他甚至會背過臉「不忍目睹」，然而他正是對我施暴的主凶。我與他同樣是素昧平生，他為什麼要如此殘酷地虐待我？到底還有沒有一點人性？事實上他的這種法西斯的暴行，終於把值班的兩位師傅激怒了。他們有一次再也看不下去，就和這位湯某人講理，叫他不要打人，「要用文鬥，不用武鬥」。但哪裏有什麼用，湯連正眼都不看他們一眼，只是說，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你們的屁股想坐到哪一邊？

但有人看不過去了，畢竟讓湯某人等有些心慌，也許我們受傷的師傅也終於脫離了危險，我後來皮肉竟不大受苦了。湯也不再常來，來了也不再逼我承認開槍的事，情況似乎有所轉機。一天一位聯防隊員輪班，告訴我說華工的郭保安來鐵山了，並且在鐵山革委會常委擴大會上發表了講話。這位聯防隊員，就是那天晚上在毆打我時，從一

隊員手中奪下匕首，使我免遭荼毒的那人。他說他久聞我的大名，私下十分佩服我寫的文章。他和礦山一位叫馬業成的師傅十分要好，而這位小馬又是我中學同學施婷婷的鄰居，與我早就是大熟人了，他說是小馬托他想辦法照顧我。他一面說一面打開飯盒，盒內是一份飯和熱氣騰騰的粉蒸肉。

「你只管吃，」他掏出串鑰匙將我的手銬打開，「我已關照過大夥，平時在井下就不用上銬了，又不怕你逃走。以後只要有兄弟我在，就不會讓你皮肉受苦。那個姓湯的鳥人是個半吊子（湖北方言：不大明白事理的意思），我熊了他一頓熊得他像個龜孫子。」

我非常感謝他的關心，一面吃飯一面聽他透露有關我的消息。

「我打聽了一下，好像是說你的問題還沒有定性，但肯定很嚴重，最主要是反對毛主席。一是反對過天津一所中學的什麼經驗，那經驗又是毛主席稱讚了的；二是為什麼叛徒集團翻案，也不曉得究竟是不是；還有是說你在主席著作上批字，說這裏左了那裏右了。哎，對了，據說還有一個惡毒攻擊偉大領袖的反標，或者是反動漫畫什麼的，公安機關正在鑒定。」

又是什麼反標、反動漫畫，大概也就是郭保安對附中學生說過的那個「鐵證」了，可是我實在不知道那「鐵證」究竟是個什麼東西。文革之初，倒是有過從一幅畫中發現「三面紅旗」倒了一面，從另一幅畫中發現暗藏有蔣介石萬歲幾個字的例子。其實這種似是而非的東西，你朝天上的雲朵多瞄幾眼，都可以從中發現一大籬筐。牽強附會、指鹿為馬的事情，文革以來還見得少嗎？我才不怕這類誣告。平心而論，我對主席再怎麼「不忠」，也不至於去寫什麼「反標」，或畫什麼「反動漫畫」來攻擊他。我其實何曾對主席「不忠」了？我不過是不像一些人那樣虛偽，明明一肚子壞水，卻偏偏急於在人前「獻忠心」；也不像一些人那樣愚蠢，直恨不得把主席像章別進皮肉裏去以表忠心；或者在家裏失火時，寧可置骨肉於不顧，也要捨出「命根子」紅寶書。我的「不忠」，不過是腦袋多少有一部分，是長在自己的肩膀上罷了。

我提出要見郭保安。我是華工的學生，有問題也只能由華工來審查，鐵山有什麼權力把我羈押起來，刑訊審問呢？但是郭保安在鐵山住了兩天，一直拒絕與我見面。而自郭來鐵山後，對我的審訊內容就

變成了逼供「反標」或「反畫」。這個什麼「標」什麼「畫」，對他們是如此之重要，一個鐵山革委會的大人物，甚至不惜屈尊親自下井來提審。

「這是我們革委會的副主任。」陪大人物一起提審的湯某人介紹說，一副卑躬屈膝的樣子，真給人說准了像個龜孫子。「你要在領導面前老實回答問題。」龜孫子說。

領導德高望重，面容慈祥，和藹可親，諄諄善誘，全沒有湯某人那種猙獰面目。這位慈祥的長者，看來是做了一輩子思想工作的，極擅長心理戰術。他懂得不戰而屈人之兵，以攻心為上。

「魯同學，你這些日子受了些委屈。」長者的一聲「魯同學」，一句「委屈」，感動得我差點淚珠子往外掉，忙說，「領導，我們確實沒有開槍……」但是長者搖搖手打斷我說，「開過槍也好，沒有開過槍也好，這些問題就不再追究了。我們不久也會送你回學校。但是有一個問題你一定要說清楚，就是，你在學校審查你的時候，畫過一個什麼東西，是不是？」長者和顏悅色，耐心誘導。

我說跑出華工後，是聽班上同學說過有個什麼圖，但我一點都記不起在紙上究竟畫了些什麼。

「別急，你仔細想想，回憶回憶。自己寫的畫的，不可能一點沒有印象，時間隔得並不長嘛。」領導繼續啟發，也不急躁。

「我只記得當時被關在我們五系教學樓的實驗室裏，覺得無聊，信手在一張紙上亂寫亂劃。寫過追兵來了，可奈何，我像鳥兒回不了窩這樣的句子，是電影夜半歌聲裏唱的。好像還有我的家在松花江上什麼的，別的還寫了劃了些什麼，實在一點印象都沒有了。」

「你再記一記，還寫了、劃了些什麼，是針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長者明確提示說。

「針對毛主席？不可能！」我斷然否認，「不可能有什麼針對毛主席的，沒有這個動機。」

「恐怕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這方面的動機吧，」長者逼視我的眼睛說，「你們學校革委會對你實行隔離審查，你不會沒有怨氣吧？這完全可以理解。革委會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支持倡導的新生事物，你本來就對它有意見。現在審查你，一肚子怨氣，一時把握不好，無意中發洩到偉大領袖頭上，也是不奇怪的，也可以理解。一時的糊塗不要緊，

但是問題還是要講清楚，要和錯誤思想一刀兩斷，爭取得到革命群眾的諒解。誰不犯錯誤呢？改了就好。何況你過去造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還是有過功勞的嘛。功過相抵，一時的糊塗，就更可以原諒了。但必須有個前提，就是承認錯誤，交待問題。割尾巴要割到底，不能怕痛，否則就是站到革命群眾的對立面，就會不可救藥。現在是革命群眾在挽救你，向你伸出了手來拉你一把，而反革命也在向你伸手，拉你越陷越深。何去何從，就決定於你自己了。」長者把右手抬了抬，做了個拉我上岸的動作。

長者的良苦用心，真是使我感動。我於是表態說，自然是願意站在革命群眾一邊，也非常感謝革命群眾對我的挽救。如果我真有什麼針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罪行，我也極願意交待清楚。「只是，」我無奈地說，「真的是記不得究竟寫了畫了什麼東西，我又不能瞎編。這樣行不行，你們把那張什麼圖拿來給我看一看，翻拍成照片給我看也行，或許能回憶出……」但是長者已經用手掌在桌子上重重地拍了一下打斷我，臉色變得非常難看，有點像鹵過的豬肝。他氣惱地說我是不到黃河不死心，不見棺材不落淚。他指著我的鼻子說，「你有僥倖心理，以為我們未必掌握有證據。你還妄想僥倖過關是不是？你做夢！」

「不，不是，」我慌忙分辯說，「我知道你們一定掌握了什麼東西，這是肯定的，但我真的記不起我當時究竟胡寫亂畫了些什麼。我只是希望把東西向我出示一下，好幫助我回憶情況，這並不過分。」

「你是想摸底呀，癡心妄想！」長者不耐煩地站起來拂手而去，走幾步後又回過頭，吩咐唯命是從的湯某人說，「老湯，好好幫助他把問題交待出來，上面等著要。」

原來這就是郭保安鐵山之行的目的：借鐵山之手，從我嘴裏撬出「惡毒攻擊」的口供。而他們所說的「上面」，不用說就是那二位權傾湖北的「曾劉首長」了。

但我豈能糊裏糊塗地招供。《阿Q正傳》裏提審阿Q的那個光頭的老頭子，不是很和氣地哄阿Q說，「招了可以放你」麼？結果阿Q糊裏糊塗地招了，終於被殺了頭。「惡毒攻擊」這種天大的罪名，我豈能不見證據就胡亂背起來，我又豈能相信那個不是光頭的老頭子的「一時糊塗」犯錯誤可以原諒的誑話。「不到黃河不死心」，這話算是說對了，

不見證據我當然不死心。而真的見了證據，我相信總能有個合理的解釋，不至於「跳到黃河裏也洗不清」。

革委會的老頭子走了，二人轉似的，不知從那裏又轉出那兩個執鋼鞭的中學生來，他們是湯某人用來「幫助」我交待問題的。他們用鞭子非常賣力地「幫助」我，我被打翻在地上，他們就用腳上的靴子踢我，說「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自我被關進礦井後，我就沒少受這兩個學生的毒打。老實說，我已經對這兩個打手產生了條件放射——只要一見他們下井，我就會恐懼得渾身發抖。而帶他們下井的湯某人，在我眼裏更是一個邪惡無比的「魔頭」，一個毫無人性的衣冠禽獸。這不，這個「魔頭」慢吞吞地很斯文地踱著方步踱到我面前，用皮鞋尖碰碰我的頭，警告我說，「你這個頑固不化死硬到底的反動分子，要知道我們無產階級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他扔下一摞紙讓我交待問題，臨走時突然回過頭來拔出手槍，對著我惡狠狠地叫道，「再不交待老子斃了你。」

斃了我，他們有這個膽量麼？聽井下的工人說，和我一道被扣押的人，早已全部「禮送出境」了。他們回到武漢後，一定會設法對我展開營救。鐵山這夥人攔路劫持、私設牢房的罪行，必定引起公憤。莫說湯某人這個「老子」，就是再借他幾個老子，他也未必敢斃我。何況我與他們鐵山，又有什麼深仇大恨，值得他們必整死我而後快？問題是他們為什麼遲遲不把我交給學校呢？他們關押我於此地，明顯違法，為什麼偏要背這個包袱呢？還有，他們既然口口聲聲說掌握有我「惡攻」的鐵證，為什麼又始終不肯將證據與我見面呢？另外，中央早已三令五申，禁止任何組織私設公堂，軍區和警司方面為什麼不對鐵山的違法行為予以干涉？所有這些我都百思不得其解。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對我的逼供愈來愈急迫、愈來愈兇狠。我幾乎每天都逃不脫一頓鞭笞，打過之後再寫交待，不交待就繼續打。我只好交待些桌面上的東西，以「蒙混過關」。除了「惡毒攻擊」和「操縱武鬥」這兩個實質問題絕不鬆口之外，其他問題都可以交待、檢查、認錯。我承認反對延中經驗是「狂妄至極」，批評「抓叛徒」一案是「反動透頂」，在領袖著作上批字更是「膽大包天」。我承認我是不大同意領袖的批示「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我交待說我狂妄地認

為毛澤東思想並沒有結束真理，而只是在實踐中不斷開闢認識真理的道路而已。我在這裏玩了個花招，暗中將《實踐論》中「馬克思主義並沒有結束真理……」這句話中的「馬克思主義」，換成了「毛澤東思想」，但新華工的冬烘腦袋的秀才們後來公佈我的「罪行材料」時，竟真的把這句話也當作我的「反動思想」公佈了出去，而這正是我所希望的。

我在交待問題時小心地字斟句酌，因為我準備有朝一日，這些問題有機會交由歷史來甄別時，它們要經得住歷史的檢驗。伽里略不是被迫懺悔過嗎？但他堅決相信「地球仍然在轉動」。三百年後梵蒂岡宣佈為他平反了，因為的確確實的事實是「地球仍然在轉動」。而「句句是真理」的神話，我想大概還用不了三十年就難免完蛋。小時候看過一篇俄羅斯的民間故事，說是以前有位王子，曾從他美麗的妻子手上，學會一手漂亮的編織手藝。有一次他不幸落到了一夥強盜手裏，被迫替強盜編織錦毯，在織毯時他在錦毯中織進了求救的信號。結果他的妻子在從強盜手裏購得錦毯後，從中破譯了其中的密碼，終於救出了自己的丈夫。我當然不會也不可能織什麼錦毯，但是我在交待我的「罪行」時，織進了我將來翻案的密碼，我相信總有一天人們會讀懂它。

關在井下不見天日的日子已經不短，看守我的聯防隊員，走馬燈似的換了一批又一批。工棚的值班師傅提著飯盒下井值班，又提著空飯盒上井回家，周而復始，三班倒換。但無論怎樣倒來倒去，向偉大領袖「早請示、晚彙報」是雷打不動的。下井的師傅們，一早一晚手捧「紅寶書」，在工棚牆壁上掛的一幅領袖像前，小和尚念經似的咕嚕一陣，便算是「請示」或「彙報」過了，天才知道他們咕嚕了些什麼。偶爾值班的師傅只有一位時，我發現此人必定是既忘記了早請示，又記不得了晚彙報。「萬壽無疆」也不喊了，「永遠健康」也不叫了。

於是明白什麼「早請示晚彙報」、「獻忠心」一類的把戲，全是做給旁邊人看的。彼此都在做戲，人人都在做戲，全國十億人一起空前絕後地演「花鼓」。

我靠著棚牆坐在工具箱上，冷眼旁觀值班師傅們無奈地做戲時，常常漫無邊際地胡思亂想，有時覺得真是好笑。然而可怕的是湯某人又下井了，帶來的打手換成了一個腰圓膀乍，滿臉橫肉，敞開的胸膛

上一窩黑毛的彪形大漢。我不知道此大漢是不是從屠宰場上找來的屠夫，反正一看就叫人心驚膽顫，我想這回可是要吃大虧了，不被這個屠夫打得皮開肉綻才怪。

湯某人這一次仍然是來逼我交待「反標反圖」的問題。他抖著幾張我交上去的材料說，這都寫了些什麼？全是雞毛蒜皮樣子都夾不上的事。帽大頭小、避重就輕，要害問題上打馬虎眼，關鍵的問題隻字不提。想糊弄革命群眾麼，那只能是死路一條。「怎麼樣，想通了沒有？願不願意交待？我們留給你的時間不會太多了，這是最後的機會。」

我只覺得耳朵邊有只馬蜂在叫。我仍然堅持證據見面。

「你是皮肉生得賤！」湯某人惡狠狠罵了一句，手一揮，「屠夫」便提著鞭子橫眉豎眼、殺氣騰騰站到了我的面前。他舉起鞭子，把眼睛一鼓就抽將過來。我眼睛一閉，早已魂飛魄散。然而我並未感到什麼疼痛，鞭子似乎只是在我身上淌了一下，便又提了回去。我不禁偷眼看了「屠夫」一眼，他提著收回的鋼鞭，兩臂張開如腰鼓形，雙腳站成馬步，兩眼圓睜，緊咬鋼牙，活像個正待捕食的癩蛤蟆，或者說像怒鞭督郵的張翼德也差不多。但他雖然做出一副兇神惡煞的樣子，卻並不對我真下毒手，乃一兇神模樣菩薩心腸的好人也。阿彌陀佛，我就納悶那些半槽子大的學生娃娃怎麼就都變成鐵石心腸了。不是說都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毛澤東思想的陽光哺育起來的革命接班人麼？怎麼倒像是狼奶喂大的狼崽？

湯某人終於上井去了。桌上是他扔給我寫交待材料的幾張紙。可是我還能寫什麼呢？承認寫反標畫反圖嗎？當然萬萬不能。寧可交白卷，讓皮肉受苦，也不能認那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的死罪。主意是拿定了的，且欣賞一回貼在工棚牆壁上的一張主席詩詞《卜算子·詠梅》的條幅。詞曰：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下注「讀陸游《詠梅》詞反其意而用之。」我倒是記得陸游原詞的上半闕是：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已是黃昏獨自愁，更著風和雨。這是那個「壯年從戎，悲歌擊筑，恁高酌酒」，曾經「氣吞殘虜」的陸放翁寫的嗎？他如何也到了這種寂寞、孤獨，飽受風吹雨打的愁苦境地。忽又想到主席六五年十月在驚聞印尼共產黨總書記艾地慘遭殺

害時，填寫的另一首《卜算子·詠梅》，便信手將這首文革中流傳甚廣的主席詩詞，寫到了材料紙上：

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奈何笑容難為久，春天反凋殘。  
殘也不堪殘，何須自尋煩。花落自有花開日，蓄芳待來年。

寫畢，回頭一看值班的一位年輕的聯防隊員，正俯身全神貫注地盯著紙上的詩詞。他似乎對這首詩詞很感興趣，要我大聲將它念一遍，我便大聲朗誦起來。不料我剛把「蓄芳待來年」一句念完，腦殼上就重重地挨了一擊，幾乎痛得我懵過去。接著是一陣雷吼：「媽媽的反了，還花落自有花開日，蓄芳待來年呢？狗日的賊心不死，蓄芳待來年，蓄你的狗屎去吧。」一邊狂罵一邊解下皮帶，朝我蒙頭蒙腦地抽起來。我雙手抱著頭，拼命地向他申辯，這不是我寫的，這是毛主席的詩詞，是悼念艾地的。可那年輕的聯防隊員才不管這些呢，只是死命地打，一邊叫罵老子才不管是艾地還是艾天，你他媽就是指桑罵槐，想反攻倒算。老子讓你自有花開日，讓你蓄芳待來年……一頓毒打之後我重新被戴上了手銬。

然而就在這天的下午，我突然被提到了井上。我被解開銬子，換了件乾淨襯衣，說是我母親探望我來了，我這就去見她。路上那位湯某人警告我說，見面時不許亂說不利於他們的話，「否則見完後打折你的腿。」

母親已端坐在一間會見室裏，旁邊坐著的一位中年人我不認識。母親介紹說，這位陪我來看你的是你父親單位的同事。我便向他點點頭表示感謝。母親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摸摸我的臉，摸摸我的手，又翻翻我的左耳朵，說：「沒有割耳朵？都說你這邊耳朵被割掉了呢！」我說沒有割掉，媽媽放心。母親說那個小吳師傅怎麼回來說，他親眼看見鐵山的人，把你耳朵割了呢？我笑笑說割了一刀，被旁邊人攔住了，現在耳朵已經沒事了。

母親便告訴我，一聽說我在鐵山出事的消息，她急得到處奔走，又趕到市工代會反映。工代會的勤務員們都已知道了這件事，下面所屬各工交系統基層組織也都紛紛打電話詢問情況。黃石工代會的一個負責人說，知道人關在哪裏就不要緊，出不了事。找8206部隊的楊

團長，讓他給鐵山打電話，叫鐵山放人就行了。這個同志就寫了封介紹信讓她到黃石，由黃石工代會的人引見楊團長。她在黃石住了一個禮拜，接到8206部隊參謀長的電話，讓到鐵山來見你。母親又說我不聽話，「人叫不聽，鬼叫飛跑」，跑到鐵山惹這麼大的禍。

母親又問我究竟為什麼事被扣在這裏。我說不知道，大概是闖了他們的哨卡。母親說既然給人家地方上添了麻煩，關你幾天也好。你給人家道歉沒有？我說我已經道歉了。母親就對湯某人說，我兒子闖了禍，也關了好多時了，也向你們道過歉了，是不是能讓我兒子隨我回去呢？湯某人搖搖頭說，現在還不能，你兒子一些問題還沒有交待清楚，我們暫時還不能放人。母親就來了氣，說，要弄清問題也輪不到你們，我兒子有自己的學校，你們送他回新華工好了。湯便說你兒子是在我們鐵山出的事，那就該我們鐵山來管，問題弄清楚後自然會送你兒子回學校。母親說我兒子的問題與你們鐵山有什麼關係？就算是反革命，也該由警司來處理。你們私設公堂，是直接對抗中央指示的行為。湯某人理屈詞窮，便說，「真要送警司就不好辦囉，老馬同志，我們現在還是想挽救你的兒子。」母親轉過頭問我：「黃毛（我的乳名），你到底有多大的問題？」我說：「我過去不聽毛主席的話，犯了不少錯誤。但是我沒有插手過武鬥，也沒有惡毒攻擊過毛主席，絕對不是反革命。」

湯朝我瞥一眼說：「是不是反革命由你自己說嗎？」

「那也不由你們幾個人來決定！」母親拍案而起，「應該由廣大革命群眾來決定。我兒子是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群眾自有一雙雪亮的眼睛！」

湯兩手一攤，說那就沒有什麼好談的了，就要帶我走。母親說等等，她從懷裏掏出十元錢，塞到我手裏要我留著用。她用手摸著我的臉，心痛地說，「兒子，你瘦多了，這裏的人對你還好吧？」我說還好。頓一會兒我又補充說，「這裏的工人師傅對我好。」我把「工人師傅」幾個字說得重重的。那姓湯的還真敏感，他歪著脖子說，「工人對你好，那幹部就對你不好了？大家都對你不錯嘛。」我扭過臉不理他。「走吧。」湯某人推著我的身子朝門外走。臨出門時，我聽見我的母親

大聲地告誡我：「黃毛，你對的要堅持，錯的要改正。要聽毛主席的教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這是我入獄之前，聽到的我母親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

湯把我帶到井下後對我說，「你的這個魯媽媽還真是不簡單呢，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了，她竟然還要你對的要堅持，還在給你撐腰打氣。哼，對的要堅持，你還有什麼對的？你手上還會有什麼真理？他媽的。」

很多年後我才知道，母親那天晚上曾要求第二天再見我一面，但是被鐵山方面堅決拒絕了。母親不甘心，她只聽說我是被關在地底下的，一早天不亮就起床，找了根棍子，在她住的附近的地面上使勁地敲打，一面大聲呼喊我的乳名，癡望能聽見我的回音。然而我被關在那幾百米的深井下，哪裏能聽到我母親的呼喚？我慈愛而可憐的母親喲，我這輩子如何能報答您於萬一啊！

也是後來才知道，母親從鐵山返漢後，四面求援、八方呼號，爭取到了社會上的廣泛同情。在關懷著我的各方人士的支持和援助下，成千上萬的群眾自發地組織起來，對我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規模空前的營救行動。前後有數百個群眾組織參加了營救，三百多輛卡車上街示威遊行，鐵山與華工如臨大敵，惶惶不安了好一陣。

也許是迫於外界的壓力，在我母親返漢後不久，關在礦井下已多日不見天日的我，終於上到了地面。我被關進一棟樓的一間緊靠聯防隊員駐地的屋子。屋子的門上，臨時鑿了個小窗，供聯防隊員隨時對屋內進行監視。屋的一角，放有一張木板床，靠窗有一套桌椅，地上還有一個臉盆，和一個供夜間撒尿用的馬桶，白天裏可以喊報告上廁所。條件雖簡陋，但總算是個人住的地方了。須知在井下的二十多天裏，我從沒有洗過臉、洗過腳、洗過身子。而現在我不但有臉盆、有毛巾，還有肥皂、牙膏、牙刷等日用品，此外還有一個吃喝兼用的搪瓷大口杯。與井下尤其不同的是，再沒有人毒打我了。

鐵山聯防的人，似乎成天都非常緊張，據說是武漢和黃石的一些群眾組織，已放言要夾擊鐵山，營救出獄。而我母親在武漢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也猛烈抨擊鐵山的暴行，並證實我的耳朵「是被割了」。這一下子群眾更加被激怒，一夥中學紅衛兵，甚至設計綁架了郭保

安，揚言要割掉郭司令的鼻子，「以牙還牙」。鐵山方面招架不住，由湯某人出面，令我給我母親寫封家信，「澄清割耳朵的問題」。我便提筆寫道：「親愛的媽媽，我在這裏一切都好，這裏的工人同志也對我好，我的耳朵沒有被割掉。」湯某人拿過信反復看了幾遍說：「你這句耳朵沒有被割掉的話，有問題。那意思好像是說，割還是割了，只是沒有割掉。不行，重寫，把那個掉字去掉。」我反駁說本來就是割過一刀，被人把刀子搶掉了，耳朵才沒有割掉，我說沒有割掉有什麼不對？要說實事求是就是這樣，不然這信我寧可不寫。湯某人無可奈何，拿著信紙悻悻而去，並且破天荒竟沒有再向我施暴。他當然不會是變仁慈了，他是懾於外頭「營魯」的聲勢太大，已不敢再對我施虐。

鐵山遲遲不予放人，社會上「營魯」呼聲日益高漲，張立國、郭保安，恐怕還有他們身後的那幾個「首長」，已經等不得落實我那張「惡攻」的證據，只好先將已整理好的材料拋出來再說，以平息社會上那股洶湧的「營魯」浪潮。六月十五日出版的《新華工報》，以整整八個版面的篇幅，拋出題為《評反革命跳樑小丑魯禮安》的長文。幾天後我在鐵山讀到了這篇洋洋萬言的所謂「本報評論員文章」。

「好生讀一讀！」湯得意洋洋地說，「好生認識一下自己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炮打三紅的罪行。我們可以告訴你，這篇文章是有來頭的，是有很大的來頭的。」

有來頭，而且是很大的來頭，那無非是說，這篇僅題目就意在將我一棍子打死的文章，是承了曾劉這兩個「很大來頭」的旨意。如此而已！不管它什麼來頭不來頭，且耐心讀下去。

文章起首便誣我「一貫以新時代的狂人自居」，「為了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大造反革命輿論，製造出一套又一套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理論、新策略和新思潮』」，然而卻被一些人打扮成「勇敢的革命闖將、江城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優秀代表」，現在要用「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的照妖鏡使之徹底現出原形。」

文章共分五個部分，為：一、吠日的狂犬；二、毀我長城的小丑；三、新生紅色政權的死敵；四、這是哪個階級的造反闖將？以及五、反右必須防「左」。

文章首先從我對毛主席、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上，斷定我對偉大

領袖、對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有著「刻骨仇恨」。其證據便是大量使用經過「處理」的材料，然後指鹿為馬，無限上綱。例如將我在《北斗星學會創立宣言》中的大量句子，都挖出來作為「影射攻擊」偉大領袖的證據。如我在宣言中曾有一段文字說「震撼世界的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如何總結它，如何承受它，難道還需要那些躲在黃鶴樓上看翻船的大人先生們去進行，而不是由我們這些在泥巴裏滾過的毛小子和廣大工農群眾一道來完成嗎？」文中的「躲在黃鶴樓上看翻船的大人先生們」這句話，竟被指為是在「影射」。

評論問道：「這裏的所謂大人先生又是指誰？」接著說「是誰最有資格承受和總結文化大革命？是我們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反革命跳樑小丑魯禮安如此瘋狂地攻擊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再如我在讀《法蘭西內戰》的筆記中，談到馬克思關於「根絕常備軍」的設想時，明明指出「馬克思這一論述，已經在今天由毛主席在他的五七指示中得到了解決」，文章卻硬說我是鼓吹「必須根絕人民解放軍」。評論的作者是如此之卑劣無恥，所使用的這種穿鑿周納法，是極可怕極兇惡的，完全是欲置我於死地而後快。這種以「莫須有」的罪名治罪的陰險手段，用魯迅先生的話說，只要略有人氣者，是萬萬豫想不到的。

我就想到運動之初對「三家村」的批判。鄧拓明明只是從兩座廟的興廢中，就文物的保存問題發了一點感歎，姚文元就偏能「獨具慧眼」地看出文中所興所廢，乃暗示興資本主義滅社會主義。我們那時只是覺得這樣的批判奇特而新鮮，哪裏悟得出其中暗含的殺機。後來鄧拓不就被「批」得自殺身亡了麼？但我怎麼也不會料到同樣的手段、同樣的殺機，如今竟會用到批判我這個無名小卒的頭上來。我這一回是真正感到了處境的險惡，尤其糟糕的是，我完全無法為自己辯護。

我於是漸漸悟出，對手為什麼在我身陷鐵山之前，不拋我的「罪行材料」了。他們明白倘進行面對面的辯論，根本不是我的對手。即使我用三篇措辭激烈的《我回答你們》向他們發出挑戰，他們也忍氣吞聲不作任何反應。而一俟我失去了自由、縛住了手腳、封閉了口舌，他們的批判文章，便連篇累牘地上場了。這是什麼伎倆？這是鬼蜮的伎倆。

兩個拳師放對，一拳過來一拳過去，才叫搏鬥。倘一個被綁住手腳，另一個來施展拳腳，那不叫搏鬥，叫虐殺。我現在遭遇的就是虐殺。

這時湯某人走過來，盯著我手中的報紙，皮笑肉不笑地問道：「感想如何？這篇文章，是充分地擺事實講道理的囉，你見過這樣雄辯有力的文章麼？」我冷冷一笑，把報紙往地上一扔，鄙夷地說：「什麼雄辯有力，除那些涉及到我的具體材料外，通通是從上海一篇批判『東方學會』的文章中，整段整段地抄的。抄襲人家的文章也叫批判？而且又不讓我反駁——『雄辯』就要辯嘛——不讓人反駁算什麼『雄辯』？」

話是這樣說，其實有一點我倒是很感謝湯某人，就是他拿來這篇文章讓我「學習」，倒是讓我對被抄得沸沸揚揚的所謂「反標」、「反圖」心中有了底——洋洋數萬言中，根本就沒有提「反標」二字。而只要沒有這一罪證，其他罪名能奈我何？但問題是我必須站出來說話，洗刷掉加在我身上的各項罪名，並施以反擊，揭露對手的卑劣和無恥。否則我就只能是砧板上的魚肉，任憑刀筆吏們宰割。

然而我又如何能讓大眾聽到我的聲音呢？也許只有一個辦法，逃出鐵山。

這個念頭一下子使我興奮起來，滿腦子都是「逃！逃！逃！」我決定鋌而走險，孤注一擲，揪機會設法逃出這個虎狼窩。

七月的第一個星期，鐵山地區風雲突變，連日大雨滂沱。我居住的那間屋子的窗戶鐵欄下面的木框，被雨水浸泡得非常鬆軟。機會來了，我先拔出一根鉤窗子的鐵鉤，然後用它刨空插鐵欄杆的一處木孔，拔出了一根鐵杆。但我仍將它插進去保留原狀，準備等後半夜聯防的人都睡熟後再行動。

這天晚上，我一直處於高度的亢奮狀態之中，九點以後，還幾次報告要求上廁所，趁機觀察屋外的地形地貌。屋外右側，有幾棵楊樹和一叢濃密的灌木，可以以此為掩護，爬到旁邊一條小路上。這條小路應該是通向公路的，但絕不能走公路，應從旁邊的田野潛出鐵山，有難得的大雨遮掩，說不定此舉僥倖成功。當然這一著也十分冒險，有極大的危險，甚至是生命的危險。但唯此一舉，我已無別的選擇。

就這樣左思右想，躺在床板上烙燒餅似的翻來覆去，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得真慢啊，然而，屋外的掛鐘終於敲響了12點。

我翻身起床，是行動的時候了。

我走近門口，通過門上那個小窗，朝外望了望，沒有人。於是走到窗前，將早已鬆動的欄杆從木孔中抽出來，然後把它輕輕靠牆擋在一邊。我從已打開的窗欄的縫隙間，把頭探出去瞭望。窗外依然是大雨如注、漆黑如墨，好的，我開始翻越窗子。不一會我的頭和身子和一隻腳都已鑽出了窗外，然而就在我挪動另一支腳的時候，靠牆擋著的那根鐵杆突然滑落，重重地倒在了水泥地上。清脆的咣噹聲在深夜裏格外響亮，屋外值班的人被驚動了，走道裏響起匆忙而雜亂的脚步聲。大事不好，我急忙抽身回屋，但是已經有幾道雪亮的手電筒光從門窗外齊刷刷地射進來。隨著一陣嘩啦啦的鑰匙響，門打開了，一群人湧了進來，好幾雙手撲上來抓住我的肩膀、胳膊和頭髮。他們像按一隻嗷嗷待宰的豬似的手腳並用，把我死死地按倒在水泥地板上。

「誰是你的同夥？」他們抓著我的頭髮向上扯起，扳過我的臉問。

「沒有同夥。」我說。

「誰在外面接應。」

「沒有接應。」

「還是不老實，打！」

幾個聯防隊員一起解開皮帶朝我抽過來。其中一個一皮帶扣重重地抽到我的頭上，我痛得大叫了一聲。這時我聽見有誰在說「打歸打，莫打頭嘛。」另一人說就是要打扁這小子的腦殼，「老子今天正好當班，跑了老子麼樣交待？」說完氣沖沖地又是一皮帶刷來。

「不要打了，我問他話。」這時我聽見了魔頭湯的公鴨聲音。湯陰沉著臉走到我面前，問：「誰給你出的主意？誰在外頭接應你？不說出來是過不了今天這一關的。」

「是我自己的主意——沒有誰出主意，也沒有誰接應。」

「不可能！」湯斷然說，「沒有人給你出謀劃策，也沒有人在外頭接應，你敢跑，你跑得了？我敢說你連周圍的視向都打不到（湖北方言：辨別方向的意思）。說吧你，誰讓你跑？」

「我自己要跑。我想回家。跑不跑得出去我沒想過，管不得那麼多了。」

「你還是欠打。」湯把頭一擺，背過身子，狠狠地說。「打！給我打，重重地打！」幾根皮帶馬上雨點般罩住了我，我除了抬起雙手盡量保護住頭之外，只能聽天由命。

「停。」湯左手掌向上一晃，定格足有十秒鐘，他背著身子再次問道：「誰是你的接應？」

「沒有誰，我又不認識這裏的人。」

「撒謊！」湯猛地轉過身盯著我說，「你是認識人的，要不要我提醒你？」他說出了一個名字，正是認識我的馬業成的朋友、那位一直關照我的聯防隊員。「他一直在關照我們的隊員照顧你。他對你的格外的關心，早就引起我們的注意，我們只是暫時不動聲色而已。說，」湯上前一步，抓住我的頭髮，厲聲問道，「你是怎麼認識他的？」

我告訴他鐵山的馬業成是我的熟人，馬認識這個聯防的，托他關照我。

「那麼是馬業成和這個人策劃你今晚的逃跑，是不是？」湯緊逼道，雙眼像隻食人鷹一樣死死盯著我。

「不是，」我照直說，「我和馬業成一直沒見過面，聯防的那位，這兩天也沒有打過照面，平時偶然見到也很少說話——他只是生活上對我有點照顧。」

「那把你逃跑的計畫通知過他們沒有？」

「沒有，」我搖頭說，「我本來也沒有想到跑。今天突然大雨，窗戶的木頭泡軟了，欄杆一抽就抽了出來，我就動了逃跑的念頭……」

「真是這樣？你真的就吃了豹子膽，敢一個人逃跑？」湯冷笑一聲說，突然又問：「你幾天前和誰單獨離開過這裏沒有？」我想了想，說，「前兩天那聯防的當班，倒是帶我到前面不遠一個山坡上，指著周圍的地形說，這四周都是防衛工事，鐵網似的連隻鳥都難得飛進來，還說過去連百萬雄師都不敢進犯一步……」

「好哇，把地形、工事都指給你了，這不就是暗示你的逃跑路徑嗎？你還有什麼好狡辯。」湯認為他總算抓住點什麼了，也就不再審訊。聽說他派人分頭布控馬業成和那位聯防隊員，結果是馬業成正在

家中睡得正酣，而那位聯防隊員隨巡邏隊外出巡邏去了，根本沒有回來。「策應」一事純屬子虛烏有。但是馬業成還是被人從家中揪出來，挨了一頓痛毆。而那位聯防隊員一回到駐地便被下了槍，「停職反省」。我則重新戴上了手銬，嚴嚴實實地被看管起來。廁所也不准上了，白天黑夜大小便一律拉到屋內的馬桶裏，湯說我這叫「敬酒不吃吃罰酒」，自找。而有關逃跑的傳聞，倒是像電波似的很快在鐵山傳開。大抵是說武漢方面組織了一次對我的營救，一支武裝小分隊利用大雨作掩護，秘密潛入了鐵山，鐵山內部則有人策應。此外似乎還有些不同的版本，但結果都是營救行動被保持高度革命警惕性的鐵山聯防挫敗了。關於我的傳言更多，似乎被描述成了對逃跑有專門研究的「特工」。證據之一就是我在華工被隔離審查時，竟能從四層樓上翻窗跳下樓逃走，傳得活靈活現的。其實呢，莫說四樓，就是二樓我也不敢跳，我又不是隻跳蚤。

這次流產的「逃跑事件」後不久，大概是中央或者省裏有了個什麼通令，各組織的武鬥班子一律勒令解散。「鐵山聯防」突然撤防，眾隊員頓作鳥獸散，我也被轉移到鐵山礦山消防隊，由消防隊的人代管。在消防隊可以不戴手銬，白天裏房間也不上鎖，還賣給我一些食堂的飯菜票，讓我和消防隊的人一道上食堂打飯，每天晚飯後，還可以和消防隊員一起打打籃球。有一天搞消防演習，消防隊甚至讓我也蹲上「救火龍」，跑出去風馳電掣了一回。

「你只要不跑就行，」消防隊隊長一再對我說，「反正這裏也不是長久之地，早晚要放你回去。你要跑了出了什麼事，就是給我們添麻煩，我們不好對上頭交待。」我答應不給他們添麻煩。

在消防隊的日子過得似乎格外快，一晃已有一個多星期。七月的鐵山悶熱難當，白天還好，晚上得鑽進密不通風的小屋裏「熬油」。而蚊子又多，輪番向我進攻，根本招架不住，只好用衣服蒙住臉，讓這些蟲子們在我胳膊腿上練「針灸」。不過蚊子雖多，能聽到的「小道消息」也不少，說是武漢有七十二個群眾組織發表了聯合聲明，抗議鐵山方面對我長期非法扣押，說是一些組織正在醞釀一次大規模的聯合營救行動。鐵山現在緊張得要死，一再和華工交涉，要送我回華工，而華工又不同意。鐵山也曾想把我交給武漢警司，警司也拒絕接收，說

軍區內部為我的定性問題也有爭論……總之事情不久就會有個結果，鐵山不想留我一輩子。

七月十八號這天，正是我鐵山被劫滿兩個月的日子。晚上我已睡下，約十點鐘的樣子，一位消防隊員突然進屋，解開我手上的銬子，帶我去食堂宵了個夜。宵夜這種奢侈事，我在鐵山兩個月來還是頭一次享受，我就端了碗隨那人上食堂。夜宵的品種不少，那人叫我盡量吃點好的。我對於吃一向馬虎，也不曾領會那人的意思，只買了碗稀飯外加一根油條吃了，又隨那隊員回屋睡覺。到了夜半時分，我於睡夢中被喚醒，說是連夜要轉移地方。這回特別得很，要給我化個妝，據說是為了路途上的安全起見。我全身上下像裹木乃伊似的，被結結實實地裹上醫院用的繃帶，連腦殼都纏得嚴嚴實實，嘴裏還塞了團紗布，以防止我出聲。纏好之後，又在繃帶上一些部位塗上紅汞和碘酒，整個一副重傷患的打扮。然後我被擋到一架擔架上，塞進一輛救護車就出發了。一名穿白大褂的醫生，戴上一副聽診器坐在我的擔架旁，將聽筒插進繃帶貼在我的胸前，隨時看我有沒有閉了氣。

救護車在礦區內顛顛簸簸七彎八拐，就上了平坦的公路。我雖眼不能看，但耳朵能聽。一路上車子幾次被攔阻盤問，車上的人都是回答礦上有重要傷患，要送武漢搶救。如此說來，肯定是在回漢的路上了。那麼幾個鐘頭之前，消防隊的人領我去宵的那頓夜，正是送我上路之前，我在鐵山的「最後的晚餐」。不管怎樣，謝天謝地，我總算是擺脫了鐵山這個夢魘。然而我又怎會想到，就是在這個漆黑的夜晚，我不但永遠告別了我的學生時代，而且永遠告別了我的青年時代。我本應擁有的寶貴的青春和自由，一切的幸福和歡樂，都在離我遠去，前面等待著我的，是像這黑夜一樣沉重而無邊的苦難。

「是意志呢，是命運呢、還是偶然的呢？我都不知道。」(但丁《神曲·地獄篇》)



## 下卷

### 十年一覺圖圓夢

你要在清水裏泡三遍，  
我在清水裏已泡過三十遍了；  
你要在血水裏浸三遍，  
我在血水裏已浸過三百遍了；  
你還要在鹹水裏煮三遍，  
我在鹹水裏已煮過三千遍了。  
泡過浸過煮過四千多個晝夜了，  
何時才能踏上回家的路？

當我有一天從地獄歸來  
你可還守在伊甸園裏的  
那棵生命樹下等我？  
你還在等著聆聽我的歌麼？  
我將撥動塵封已久的琴弦，  
歌唱逝去的歲月、青春與夢想；  
歌唱苦難中蘊含的人生智慧  
——等待，還有希望。

——唱給逝去的歲月  
(摘自1980年出獄後的詩)



## 第十三章

### 逮捕與批鬥

這是什麼地方？我看不到，我的眼睛被紗布蒙蓋著，只記得是在華工呆過，因為清晨聽見「新華工革命造反廣播站」的播音。大約是在下午，我被塞在一輛轎車的座位下面，被送到了這個房間。我被帶到一張椅子旁坐下，押送的人中有一個就對我說：「我們革命群眾今天扭送你到這裏來接受審查，你要老實交代問題。」——似乎是趙文成的聲音——然後聽見一夥人一湧而去。過了一會有人進來，動手給我鬆綁，將我頭上的繩帶一圈一圈地鬆開。我忽然就想到解放前拍攝的那部恐怖片《夜半歌聲》中的宋丹萍，他被人往臉上灑了硝礮水後，就有一個在醫院裏將包紮在臉上的繩帶一圈圈鬆開的鏡頭。他從鏡子裏看到的是一個被礮水燒成的魔鬼似的臉孔，那麼我現在將看見什麼呢？

自然，繩帶解開後我什麼可怕的東西都沒有看見——這房子裏沒有鏡子，我看到的只是一門一窗，以及一位睜大眼睛吃驚地瞪著我的鬍子花白的老頭。老頭穿一件發白的舊軍襯衣和一條短褲，我頭上的繩帶就是他給我鬆開的。我想使他吃驚的，不是我這張年輕的學生的臉，而是我的這一身「木乃伊」似的裝扮。他一面繼續給我鬆開身上的繩帶，一面問我是哪個單位的？我告訴他我是新華工的學生。他又問我犯了什麼事？我說我不知道犯了什麼事。他說那為什麼把你這樣用繩帶從頭到腳綁得嚴嚴實實的送來？我說我也不知道。他最後問我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我自然還是回答不知道。他有點惱火地說你怎麼一問三不知呢？「告訴你吧，」他突然大吼一聲：「這個地方是監獄！」說完呼的一聲關上門就出去了。

監獄？是的，是監獄。這並不太出乎我的意料，從我被塞進轎車駛出學校那一刻起，我就估計到我將被送進監獄。但這是哪一家監獄呢？送我來的轎車似乎並沒有過江，那麼應該是武昌民主路的省一監獄了。這座監獄離我就讀過的實驗中學不遠，我讀中學時常從它的大門前路過，想不到現在我自己竟成了獄中的犯人。

黃昏漸漸臨近，西斜的日頭把它的餘輝灑進監房的鐵窗，將房子裏東壁的牆面劃出一道道窗欄的剪影，如同一幅很大的幾何圖案。婆娑的樹影在這幅圖案上悄然無聲地搖曳，從窗外的樹梢上傳來一陣陣知了的叫聲。夏天的黃昏仍然是那樣溫馨美妙，但我現在只能「在獄吟蟬」了。一陣悲慟禁不住襲來，膀胱也突然感到發脹，我於是捶門大叫。那位年老的獄卒開門進來，仍然像瞪鬼似的瞪著我。我說「要撒尿」，他轉身出門，給我拿了隻醫院用的那種尿盆來。我撒完尿忽然又說「我還要拉屎」，老頭子有點不耐煩地說：「就在這尿盆裏拉。」我請他拿點手紙來，老頭子愈發不耐煩，罵道：「就你屁多。」一邊罵一邊順起一腳，將地上散成一團的繩帶踢到我的跟前，那腳法之嫋熟、傳點之到位，絕不遜於幾十年後的馬拉多納。「將就用。」老頭指示說，我只好將就。將就之後老頭喊了一個身穿黑色囚服的犯人進來，把尿盆拿出去倒掉清洗後又送回來。隨後又有兩個犯人抬了一張木板床進來，還替我在床上鋪了席子扯了蚊帳。

晚飯是兩個蒸得很好的白麵饅頭，兩頭尖尖形似紗廠的紗梭，中間裂一道口子又像是美國兵的船形帽。饅頭實在做得不錯，蓬鬆噴香、酥軟可口，後來知道那是犯人中一級白案師傅的傑作。主糧之外是一大碗飄著厚厚一層油花子的肉片湯，我狼吞虎嚥地啃完饅頭喝光肉湯，摸著鼓脹的肚皮躺在木板床上胡思亂想：群眾扭送、接受審查，算什麼呢？肯定不算是收監。收了監哪裏還會有這好的饅頭，這好的肉湯，這舒服的床板，還有涼席和蚊帳。審查就審查，十天半個月，事情總會弄清楚。毛主席不是說不冤枉一個好人不放過一個壞人嗎？我相信我就是毛主席說的好人。如果我是壞人，學校那些人為什麼要偷偷摸摸人販子似的把我「偷渡」到監獄裏來。我倒頭就睡。雖然沒有燈，屋子裏也亮堂得很，正像魯迅先生那本《狂人日記》裏說的：今天晚上，很好的月亮。

一晚上睡得很甜，第二天醒來時已是豔陽高照。一位身材魁梧長相英俊的年輕公安給我送來一隻臉盆和一套牙具，以及口杯、毛巾、手紙等日用品，此外還有一套簡裝本的毛選和一本毛主席語錄。年輕公安還叫人搬進來一張寫字的桌子，然後又拿來一柄木工鑿子和一把鐵錘，叮叮噹噹地在門上面敲了一陣，挖出一個四方形的小洞。小洞外面還裝了一塊活動的擋板，活計幹得十分乾淨利索。

「群眾送你到這裏來，就是要把問題查清楚。」年輕公安對我說，「你就在這間屋子裏認真反省，看有哪些事做得不對，違反了毛主席的教導。這本主席著作你要好生地學習，用毛澤東思想對照自己的一言一行。過幾天就會有人來找你談話，那時候要把問題一老一實作一個徹底的交代，爭取得到黨和人民的諒解。」我自然是不停地點頭。「你就好生想自己的問題吧，」公安說，「在屋子裏不許大聲喧嘩，不許無理取鬧，有什麼事情等我們來時可以報告，明白沒有？」我說明白。「那好，你學習吧。」他鎖上門走了出去，接著聽見他又打開了一道門，然後又關上。

我住的這屋是個套間，不過外間是空著的。只要外間的門一響，我就知道是年輕公安或那個老頭來了，於是趕快坐到凳子上正經八百地讀「毛選」、背《老三篇》：「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產黨員、五十多歲了，不遠萬里來到中國，」或者背「我們是共產黨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是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的，張思德同志就是我們這個隊伍中的一個同志。」還有什麼「我死了以後有我的兒子，兒子死了，又有孫子，子子孫孫是沒有窮盡的。」總之是放開喉嚨讀，讀得愈起勁愈響亮愈好，好讓那位已來到裏間門前，正悄悄撥開門洞擋板的年輕公安聽見。至於我在背誦時心裏究竟是怎樣在想，那他是無法知道也不想去知道的。倘若他知道我在背「子子孫孫是沒有窮盡的」這句話時，其實想的是那子子孫孫將來是不是甘心像他們的老祖宗愚公一樣，笨得只曉得挖山呢？不知會怎樣火冒三丈哩。

但是那位年輕的政治覺悟頗不一般，他還是從我讀「毛選」、背老三篇的表面之後，看出了我對主席不是真正的「忠」。有天他突然對我說，「我看你這個人的確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態度有點問題。我每次早上來都悄悄地仔細觀察過，發現你早晨起床後，從來沒有敬祝過

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和敬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這可以證明對革命領袖有無無產階級感情的問題。」

「我房子裏連張毛主席的畫像都沒有，怎樣敬祝他老人家萬壽無疆呢？」我申辯說。

「沒有毛主席畫像，毛主席著作你總有吧。還有，毛主席語錄有沒有？」年輕公安反駁說，「這些你都有嘛。你如果真是無限熱愛毛主席，對毛主席懷有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你就會無時無刻不感覺到偉大領袖就在你的身邊。只要真正信仰堅定，哪怕你一時受了冤枉、受了委屈，也不管是處在什麼樣的惡劣環境，你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必定是面向太陽升起的東方，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敬祝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萬壽無疆。這應當是雷打不動的頭等大事，從能否堅持這樣做這一點上，就可以檢驗出一個人的忠心程度是深是淺。」

年輕公安的這番話真是振振有詞，我還有什麼好狡辯的。只是我已落到這個地步，真忠也好、假忠也好；深忠也行、淺忠也罷，於我都無所大謂。反正是寧可「破罐子破摔」，也懶得去搞那套假惺惺的「敬祝萬壽無疆」的把戲，玩那套假把戲實在太累。但儘管我是抱定主意破罐子破摔，年輕公安卻是有一分希望就要盡十分努力來對我進行挽救，有事沒事一天中總要來我房間幾次，對我進行一番苦口婆心的教育。有一次他對我說你們這種臭知識份子其實最愚蠢，世界觀從根子上沒有改造好，所以學習毛主席著作總是學不進去。毛澤東思想沒有掌握好，又怎麼能夠緊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呢？所以你老覺得跟得很吃力，要拼命地跟、拼命地攆，即使這樣還老是跟不上。

年輕公安的話使我頗受教育，似乎茅塞頓開，於是自作聰明地說，那像我們這樣的人，更應該拼命地跟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跑了。「那當然，」年輕公安點點頭，但又楞了一下，白了我一眼說，「什麼跟著跑不跑的，只有跟著毛主席革命路線走——我看你是故意逗散方（湖北方言，開玩笑的意思），你的思想看來是真成問題呢。」

我想說跑又有什麼問題，走不贏就跑嘛，又不是田徑比賽競走，一跑就算犯規。但忍了忍沒有說。

還有一次他向我宣講「毛主席揮手我前進」這句口號的深刻含意，說只有這樣才能統一步驟、統一指揮、統一行動，才能保證革命的勝

利。我於是請教說毛主席揮手我前進，毛主席再揮手我就再前進，那兩次揮手之間總有停頓的時候，這時候是前進呢，還是不前進呢？我想我這個問題是問得比較刁鑽的，但年輕公安腦子一轉馬上回答說：「毛主席揮手怎麼會有停頓？毛主席是不斷地在揮，像這樣」，他邊說邊很快地揮著右手做示範，「所以我們就得不斷地前進、前進、再前進。」我一面頻頻點頭表示心領神會，一面暗想，主席一天到晚這麼揮手真是夠辛苦的，到頭來不落個肩關節勞損才怪？我本來還想鑽牛角尖，問他主席晚上睡著了還怎麼揮手，十億人民還要不要再前進呢？但想了想耽心又會落個刁難他的罪名，還是忍住了。年輕公安對我的刁鑽古怪雖然很有意見，但一直是對我誨人不倦，而我從他身上也受益匪淺。如果早就有這麼個革命同志對我耳提面命，我哪裏還會在「忠」這樣的大問題上誤入歧途呢？

和這位年輕而忠誠的公安相比，那位老獄卒思想就落後了很多。他除了管吃管拉，很少關心我的思想改造。他好酒貪杯，有時喝得醉熏熏地跑到我的房間裏，就公然當著我的面牢騷滿腹。有一天我抱怨說打鐵山見過母親一面後，快兩個月沒有見到家裏人了，好想家。這個老頭就瞪著紅紅的眼珠大吼起來：「你兩個月就想家，想你媽個雞巴。我外孫姑娘才十五六歲的初中生，沒考取高中，他媽的被哄到新疆墾荒去了。個姑娘伢一個人丟在那無遠八遠（湖北方言：老遠的意思）的地方，遭孽哇。」

我看他眼淚汪汪的倒真有點同情他：這個小小的獄卒沒有路子，伢們自然只有上山下鄉或去新疆墾荒這條路。如果他是個芝麻綠豆官，他就會有芝麻綠豆的機會，給他家的孩子安排好一點的出路；如果他是個更大一點的西瓜官，他就可以滾出更好一些的門路；假如他是個相當級別的官老爺，他的子女或孫子女就可以完全不用操什麼工作的心了。哪怕再不中用，再沒有出息，男孩子可以去部隊，女孩子可以進文工團，這是高幹子女腳下最平常的兩條坦途。我高中就讀的實驗中學就有許多高幹子女，我聽說過一些屬於他們那個圈子的秘密。通過這種坦途，這些高幹子女就可以一步步走進偉大領袖所說的那種「理想的境界」。

所以「上山下鄉」也好，「支邊墾荒」也好，還有後來的什麼「知識青

年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也好，都是針對覺悟不高的老百姓和他們的子女說的。對於具有高度無產階級覺悟的高級幹部來說，莫說他們本人，就是他們的子女，也早在娘胎裏就已經受到無產階級革命思想的潛移默化，以後更是天天受到無產階級革命精神的傳統教育，根紅苗正，自然不必上山下鄉，也不必接受什麼「再教育」了，他們天生就是「紅色接班人」。不是有資料證明（據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會議簡報第九期披露）六八年底至六九年上山下鄉運動掀起高潮時，湖北軍區副司令員副政委以上幹部的子女，竟無一下放農村嗎？你個當獄卒的老頭子又埋怨個什麼呢？你就不怕擔上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制定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的罪名麼？

但老頭子卯上勁了就什麼都不顧，說他的孫子本來有個參軍的機會，但是叫個烏龜王八蛋狗當官的把名額硬是給挖走了。說到傷心氣憤處，老頭子自然又是破口大罵，罵了東家罵西家，最後不用說還是要罵到我的頭上。因為千仇萬恨，最終還是要落實到「階級敵人」的頭上，就像樹上的蘋果最後都要落到地上一樣。「你他媽的還想家，想雞巴卵子毛哩！」他忿忿地罵道，「住在這風吹不著，雨打不著，日頭曬不著的地方，一日三餐送到你的手頭。吃的是18元錢一個月的空軍地勤灶的伙食，你個狗日的比老子屋裏的伢們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你強多著呢。你個狗日的資產階級大學生！外頭鬧哄哄的倒是把你保起來了還有意見？」這老頭儘管罵得邪火，我倒一點不惱怒。他不在這兒宣泄，他又能在哪裏宣泄呢？而且從他的口裏我才知道，我在這裏享受的竟是18元錢一個月的空軍地勤灶的伙食標準，而我在大學的伙食標準，也不過每月13元呢，難怪每天不是大肉就是大魚吃得這麼好。我因此越發相信我的問題不算什麼，難道真像那老頭子說的，是讓我呆在這裏把我保護起來？

這種大肉大魚的空軍地勤灶伙食標準的生活整整過了一個月。這期間每隔三四天，會叫我寫一份檢查材料。沒有人來找我談話，也沒有誰說我的檢查交代怎麼樣，我只是覺得生活的空間實在太狹窄，日子過得實在太單調。我住的房間朝陽的一面牆有扇窗子，窗口正對著一堵帶電網的很高的紅磚砌成的圍牆，透過窗子斜著朝上看，可以望見圍牆的西南角上，有一處架著機槍的瞭望哨。房間朝陽的一面挨著

天花板的地方，還開有一扇狹小的窗子，將凳子擋在桌子上，人站上去再踮起腳尖，就可以看見窗外的世界了——那大概是可以稱作「魍魎世界」的，來來往往三三兩兩的，全是黑衣黑褲衣服上印有大大的「勞改」二字的囚犯。囚犯的光頭在陽光照射下格外刺眼，白生生滑溜溜的像砂鍋炒熟的土豆。可惜見不到女犯，倘有個把，那怕是萬顆豆中一點紅，想必也能在這灰暗的人群中生出點亮色。然而功夫不負有心人，有一次還真讓我看見一小隊女犯人排著隊列從窗子下走過。不過居高臨下地看下去，她們除了頭上留有些齊耳的短髮外，其他方面和那些男土豆簡直就沒有什麼區別。

當然在這種地方，男女區別是愈不明顯愈好。倘太明顯地展現出女性特徵，難免引得男犯們想入非非，不利於改造。然而疊桌架椅、掂腳臨窗的高空作業，沒幾天便告夭折，那不用說是外面的犯人也看見了窗子裏面的我而報告了政府。年輕公安警告我之後，釜底抽薪乾脆撤掉了我的凳子，說反正還有桌子，坐在床板上寫材料也是一樣。窗外的魍魎世界是看不到了，但犯人每天早晚例行唱歌時的歌聲，卻照樣非常響亮地震盪著我的耳膜。犯人們唱的多半是「語錄歌」，唱得最多的是「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犯人們集體唱起這首歌來還真有點氣勢，特別是唱到「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嘿！自己跑掉」的「嘿」字的時候，那真是有點力拔山兮氣蓋世的氣概。

除了告發我爬著窗子朝外看外，犯人們還告發我把紅燒肉從窗子裏往外倒。也是怪我天天魚呀肉呀的吃油了嘴，有天晚上一碗紅燒肉實在吃不下了，便將剩下的幾塊倒出了窗外。犯人告發後，那年輕公安倒沒有多指責我，只是說影響不好，「吃不完可以讓端回廚房，但是不能往窗外面倒。那些犯人成天做工，一星期才打一次牙祭，你倒好，動不動就把肉拿到倒，這些犯人怎麼想？」嗨，我怎麼就沒有想到這點呢？真是「肉食者鄙，未能遠謀。」

轉眼到了八月中旬，檢查交代寫了不少，但問題一點解決的影子都沒有。我希望組織上早點給我一個實事求是的結論，不過總算聽年輕公安說問題就快有眉目了，過兩天上面會派人來。於是盼星星盼月亮盼了兩天，果真上面來了人。一共來了三位，兩位是省公安廳軍管

會的代表，還有一位便裝，大概是書記員。三個人隨那位年輕公安走進我的屋子，在一張臨時搬進來的長桌後面一字坐下，然後那位年輕公安就退出去了。公安廳軍代表中年長點的一位居中，桌面上放了隻大大的皮包。三人一律神情嚴峻，面色凝重，從他們那咄咄逼人的目光中，我突然有一種來者不善的預感。

坐中間的軍代表開始對我例行公式地作了番詢問：姓名、年齡、籍貫、文化程度，最後問到個人成份和家庭出身。我回答說個人成份學生，家庭出身職員。

「職員？什麼職員？」那軍代表突然提高了聲調，我則惶惶然丈八金鋼摸不著頭腦，因為這是我平生頭一回碰到的問題。

「我不懂是什麼意思……職員，就是職員麼，一般的職員。」我結結巴巴地說。

「一般的職員？」提審員冷笑著嘲諷說，「看來你是想裝蒜了。好吧，那我問你，你父親解放前三年是在什麼地方工作？」

我回答說是在海關工作。

「是呀，海關工作，」提審員將背朝椅後靠了靠，手上的鉛筆敲打著桌子，慢悠悠地問道：「那解放前的海關是哪個政府的海關呢？」

我回答說是國民黨的海關。

「國民黨的海關是什麼海關？」提審員伸直了脖子，窮追猛打地逼問道，綠眼珠子似子彈般要射過來。

「什麼海關？」我可是又犯糊塗了，「海關，還有什麼海關？海關不就是海關麼……」

「那我告訴你吧，那是國民黨偽海關！」提審員給我上階級啟蒙課了，「你的父親也不是什麼一般的職員，而是國民黨偽海關的偽職員。明白沒有？」我說我明白了。於是軍代表要我重新回答出身的問題，我便說是偽職員。他就問我剛才為什麼要隱瞞？我說我一直都不知道我是偽職員出身，從小學、中學到大學、入團，履歷表上都是填的職員出身。「那你欺騙組織有很多年了，」提審員嚴肅冰冷地說，「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現在總算還原了本來面目。你走上反革命道路是有淵源的。」

我很狼狽，也很屈辱。為什麼一進監獄連出身也變了呢？解放前

的海關是國民黨統治的海關不假，可我父親只是個進海關工作不久的最低級的辦事員呀，怎麼就成了偽職員呢？如果海關職員是偽職員，那國民黨統治下的銀行、郵電、鐵路、輪船等行業的職工，是不是也都要叫作偽職員呢？再推而廣之，大中小學校的教職員工是不是也都要叫偽教職呢？就連工廠的工人、鄉村的農民，甚至街上的乞丐是不是也都要叫作偽工人、偽農民、偽叫花子呢？還有那些解放前出生的阿狗、阿貓、老鼠和跳蚤，是不是最好也叫偽阿狗、偽阿貓、偽耗子、偽跳蚤才更合適些呢？這也許是我在無理演繹，胡思亂想了，但我當時受審時的確是有點想不通。

實際上林彪垮臺後，提審的人就說我只是算出身「舊職員」，而不是什麼「偽職員」。到出獄時法院又說無所謂新職員舊職員，我還是恢復了「職員」的出身。毛驥繞著磨心轉了一圈，從哪裏來又回到了哪裏，證明我並沒有「欺騙組織很多年」。八三年父親單位派人赴廣州調查取證，曾隨大軍南下參加接管粵海關的父親，又成了享受離休待遇的「老革命」。然而當時哪怕渾身是嘴又哪裏有我分辯的權利？軍代表說我「欺騙組織很多年」之後，還從口袋裏掏出本語錄本，翻到其中一頁念道：「頑固分子，實際上是頑而不固，頑到後來就要變，變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念完這段主席語錄後也不說什麼，只管把眼睛死死地盯住我，那眼神分明表示他因嫋熟而恰到好處地引用了這麼一段最高指示而自鳴得意。而我因出身問題上的「頑而不固」，分明已經變成了一堆「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一個「偽海關職員」出身的狗崽子，除了任人蹂躪和踐踏外，還能怎麼樣呢？從出身問題上入手，將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支腳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我知道提審的軍代表就要在我身上再踏上一支腳了。

「這一陣子問題都交代得怎麼樣了哇？」還是中間那個軍代表問話，聲音慢悠悠地拖得老長，好似漫不經心，又像是貓兒在玩耍一隻落在它利爪下的小老鼠。這隻小老鼠此刻膽戰心驚，除了束手就擒再沒有別的選擇。

「我記得的問題全都一五一十地交代過了。」我輕輕地說。

「那你再把你交代過的主要問題過一遍。」軍代表說，一隻手慢騰騰地翻著桌子上的一疊材料。

我就從我六七年三月反對「天津延安中學以教學班為單位實現大聯合的體會」說起，說到六七年四月寫文章為薄一波、安子文「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翻案，「七二〇」前後鼓吹揪軍內一小撮，以及六七年十二月寫大字報支持浠水巴河一司進城造反等等。但軍代表聽了不多會兒就已經聽得不大耐煩了，揮揮手打斷我說，「這些問題材料上都交代得有，你重點說說你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方面的問題，這是最主要的。」我就說我否認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認為毛主席也會有或左或右的錯誤；我在主席著作上亂批字，在人口和吃飯問題上和主席的「革命加生產就可以解決吃飯問題」的英明論斷唱反調等等。

軍代表算是耐著性子聽我炒了一遍芝麻綠豆的現飯，點點頭說，「嗯，你是交代了一些，其實，不用你交代我們也掌握了，主要是看看你的態度，看看你是否願意交代。現在看來你始終是在避重就輕，撿芝麻不抱西瓜——直說吧，你還有一樣重要的東西沒有交代。」

一樣重要的東西？我心裏一沉，知道他要說什麼了，但我確實不知道那「東西」究竟是什麼東西。終於那軍代表豎起一根食指說道：「一張圖！」——後來我在監獄的號子裏從廣播裏聽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中審樂平的一場戲時，就覺得審我的那位軍代表，是把自己當成楊子榮而把我當成樂平了，當他說到「一張圖」時，那聲調都是學的楊子榮——但這位「楊子榮」接下去並沒有要我交出一張土匪們才有的「秘密聯絡圖」，而是要我坦白畫過一幅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反動圖畫。但我無法坦白，像在鐵山礦井下酷刑逼供時我堅持證據見面一樣，我堅持要求出示證據。證據這回倒是向我出示了，是按原件大小拍攝的一張照片。照片上紙的左邊有毛澤東三個字，紙的右邊的上方則寫有一個絞字，絞字下面有個拖得很長的簡體的開字，而「開」的兩邊又劃有一些長長的向兩邊傾斜的線條，這就是傳得沸沸揚揚的所謂「反動圖」或「反動漫畫」或「反標」了。

我把照片拿在手裏左看右看，照片上的字倒是我的筆跡，但我實在不知道為什麼會在紙上寫一個「絞」字，那個「開」又是怎麼回事呢，字的兩旁又怎麼會拖出一些長長的線條呢？而在這張紙上怎麼又會寫有毛主席的名字呢？所有這些我真的弄不清楚，我的頭脹得老大。

「照片上的字都是你寫的嗎？」我終於聽見軍代表在問我的話。

「是……是我寫的，」我供認不諱，「但……但怎麼會寫個絞字，還有這個開字、開字的旁邊，怎麼又畫了許多的線條呢？」我結結巴巴地說，聲音都變了調。「我也不記得……這上面無緣無故地，怎麼會……寫上毛主席的名字？」

「你認為你的同學會陷害你嗎？」軍代表逼視著我的眼睛問。

我搖頭說我不認為同學會陷害我。

「那就是證據確鑿囉？」軍代表用手裏的鉛筆不緊不慢地敲著桌子說。

「證據，確……鑿？」我十分惶恐。「怎麼是……確鑿？這張紙上應該還寫有一些別的字句，都是張立國關我時我在紙上亂寫亂畫的。這些字都並不是寫在同一個位置，它們之間不能說有什麼必然的聯……聯繫。」

「沒有必然的聯繫？那你為什麼不在紙上寫劉少奇、寫鄧小平，偏偏要寫毛澤東這幾個字呢？」軍代表把身子靠前，手上挪動著鉛筆，眼睛死死地盯著我，眼光中一股殺氣直穿透我的全身。雖然天氣炎熱，我卻感到透心的冰涼。軍代表的聲音陰陰的像是從冥界飄來：「這畫的又是個什麼東西呢？應該是絞架之類吧，而同一張紙上又寫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名字，那是什麼意思呢？你是想要絞死……是不是？」

「不是，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打死也不會這樣想，這完全不可能……」我失神地搖著頭，我不知道怎樣辯解，完全陷入了絕望之中。

「你不承認也沒有用。」軍代表收回照片，小心地夾進一個本子裏，眯著眼睛冷冷地盯著我，像是欣賞一頭落到陷阱裏正垂死掙扎的困獸。「我們是重證據、重調查研究的，不輕信口供。你還是老實交代，認罪服法的好。說吧，為什麼要在紙上畫那個絞架？」

「絞架？」我竭力回憶那天關在東二樓實驗室裏的情景，「絞架，那是絞架嗎？可能是架絞車吧？當時房子裏就有一架做實驗用的絞車……」

「那就是絞架！怎麼會是絞車？」軍代表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厲聲喝道，「你還想狡辯嗎？我看你真正是花崗岩的腦袋，不見棺材不落淚了。」他掉過頭和旁邊另一位軍代表頭靠頭地耳語了幾句，然後坐端正，一隻手卻插進桌上的皮包裏摸什麼東西。突然他將那東西猛地抽

出，手向後一揚，整個身子霍地一下後仰立起，以一個非常戲劇化的動作，來了一個像現代京劇《紅燈記》中李玉和和那位地下交通員接頭時高舉號誌燈的那種亮相。但他揚起的並非號誌燈，而是一張32開大小的紙張，同時就聽見叫板似的一聲吼：「魯禮安，你被捕了！」

隨著這聲響亮的叫板，從外房裏呼啦一下魚貫跑進一隊腰別手槍，手拿「小紅書」的軍人。只見他們順溜在軍代表後面左右各四人成雁翅形站好，一律左手高舉毛主席語錄，右手按往腰間皮帶上的手槍，個個昂首挺胸，威武雄壯，目光如電，正氣凜然。那手槍自然是象徵無產階級專政，而小紅書則是象徵毛澤東思想的無窮威力了，軍代表給了我好一個下馬威。

我後來疑心這一幕威武雄壯、氣衝霄漢的集體亮相也是從樣板戲中學的，真佩服這齣戲的導演。只可惜當時沒人來錄相，倘錄了下來，大家恐怕會以為敬愛的江青同志又培植出第九個革命樣板戲了。不過我那時卻沒有這麼多的聯想，我那時從未看過任何樣板戲，也來不及作任何聯想，我被「魯禮安你被捕了」這一聲吼吼得魂飛魄散，大腦中頓時一片虛空。恐懼之中又心有不甘：那張什麼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都沒有搞清楚，怎麼就成了「鐵證如山」，就將我逮捕了呢？難道辯都不容分辯，逮捕人就是這樣簡單嗎？

我恍恍忽忽，眼前一片茫然，「像霧像雨又像風」，糊糊塗塗就似乎聽見有人叫我上去簽字。我搖搖晃晃走上前，木然地拿起桌上的鋼筆在逮捕證上簽了字。那一刻我的感覺像是在賣身契上簽了字——我的人生自由從此將不再屬於我自己。因為手不斷地發抖，那字也簽得歪歪扭扭，不像阿Q那樣有志氣，雖然在簽字時也是幾乎「魂飛魄散」，也是「手捏著筆卻只是抖」，但卻要將那圈圈「立志要畫得圓」。簽字之後的事就不太清楚了，昏頭昏腦只覺得一屋的人影在皮影戲似地晃動，一個個綠盔綠甲，出出進進。再之後人全沒有了，床也沒有了，蚊帳自不必說，連桌椅也都撤了出去，只剩下地上的一張席子和牆角的一隻馬桶與我形影相吊。

面對空徒四壁的房間，我知道我從此再沒有了做人的資格。我現在是犯人了，而且是現行反革命犯，我已淪為人民的敵人、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地富反壞右中的老三，真正是「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

我這輩子算是他媽的徹底完蛋。我狠命地捶打自己的腦袋，發瘋似的拔自己的頭髮。我罵自己混帳，幹嘛要在那張紙上胡寫亂畫？你什麼不好寫？偏偏寫了毛澤東幾個字，你要寫也該寫偉大領袖毛主席呀，毛澤東這三個字也是你有資格叫的嗎？尤其可惡的是你為什麼要畫那個似絞架非絞架的東西呢？大概是因為那時正在讀伏契克的那本《絞刑架下的報告》吧。那幾天我正在看那本書，日記裏還提到過，但為什麼不直寫書名卻又劃了那個說不清道不白的圖形呢？還有那個絞字，那個長長的開字，以及開字兩邊的線條又是怎麼回事呢？是有人後來加上去的嗎？我寫字的鋼筆就扔在桌子上的，但誰又能證明這一點呢？現在正應了那句俗話：黃泥巴掉在褲襠裏，不是屎也是屎，我就是全身是嘴也講不清楚了。

這一夜沒有月亮。天花板上亮著燈，開關在門外，燈是一直要亮到天亮的。我淒零地守著燈光下牆壁上的孤影，想起了叔叔當年的下場。在鐘祥縣搞稅務工作的叔叔，五七年因反映農民生活苦，說大躍進餓死了人而被打成右派，在下放農村監督勞動改造時，患水腫得不到治療，孤零零地死在一間破茅屋裏，死得無聲無息就像死了一條狗。而我現在的罪名比我叔叔大得多，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是「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的殺無赦的罪名，那下場更是可想而知。

我並沒有過「惡攻」的念頭，卻又將一輩子悲慘地背上這個罪名接受改造，世界上沒有比這更冤屈更痛苦的事了。生命中自由幸福的一頁已經揭過，以後的日子雖生猶死，不過行屍走肉。受黨的教育多年，我們這樣的年輕學生將政治生命看得比生命本身更為重要。中學時代就已熟讀了奧斯特洛夫斯基寫的那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將書中保爾·柯察金那段「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的名言視之為座右銘。現在政治上一下子判了死刑，還怎樣能夠在將來「回首往事時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恥，也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還怎樣有資格說「我的一生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鬥爭」？思來想去，腦子裏亂成一團麻。既無法排解心中的痛苦，也無法原諒自己的糊塗。一切可能的出路都想到過了，覺得唯有一死，方能求得一種永久的解脫。

入監時那位老獄卒在收去我的皮帶時扔給了我一根舊褲帶，或許

這根褲帶就是幫助我一勞永逸地擺脫痛苦的紐帶。我把他解下來，踩著馬桶將它繫到朝西的那扇窗子的欄杆的上半截，然後將褲帶打個結，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心裏默默喊一聲「媽媽，兒不孝，兒先去了」，將腳下的馬桶一蹬，人就懸了空。

然而也許是命不該絕，那根褲帶一點都不結實，崩的一下就斷開了，我撲通一下摔倒在水泥地上。大概是窗紗上人的影子引起了窗外的注意，有什麼人大叫起來。不一會監獄的好幾名衛兵衝進了我的屋子，見我沒事，先鬆了口氣，接著有一個軍官走進來，冷冷地說了一聲：「鎊起來！」我便被雙手背後反鎊了起來。「不老實，想自絕於人民嗎？」那軍官無比鄙夷地喝道。他命令衛兵們仔細地檢查地上的鋪蓋——也就是一床涼席——看還有沒有什麼可以「自絕於人民」的工具。搜過之後又將我身上所有的「危險品」，包括褲子上的金屬勾連、球鞋上的穿鞋帶的口眼，統統敲掉帶走，然後扔下我這個雙手反鎊的可憐蟲揚長而去。

屋子裏又重歸於沉寂。

夜已經深了，但睡不著。這倒也沒有什麼，今後我還將度過無數個不眠的夜晚。麻煩的是我要小便了，這雙手被鎊在背後，如何把小雞雞從褲襠裏拉出來撒尿呢？這種給人上反鎊的辦法，真是缺了他八輩子祖先的德。難道犯人就不是人，就不需要拉屎拉尿，就活該把屎尿拉在褲襠裏？我憋著一肚子的尿在屋子裏轉來轉去，一點輒都沒有，一屁股乾脆坐到草席上，打算從後面把褲子往下挪。但這一坐竟坐出辦法來了，我發現反鎊的雙手，似乎是可以慢慢地貼著屁股翻越兩片「夾金山」的，翻過之後，再把兩條腿從手挽中穿出來，反鎊便變成了正鎊。這意外的發現幫了我大忙，我可以方方便便地撒尿，也可以順順當當地睡覺了。求死既不得，那就撒完尿後安安生生地睡覺，到下半夜時，我還真睡著了。

清晨屋外的犯人們又在唱「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的歌，突然我聽見大門外第一道門被打開了。不好，我猛地意識到老獄卒送早飯來了，而我的雙手仍然是正鎊著，這是要惹麻煩的，必須立刻將正鎊還原成反鎊。我馬上故技重演，讓戴手鎊的兩隻手從前至後，再次翻越「夾金山」。但不知怎的，一夜之間屁股似乎發了福，怎

麼翻也翻不過去。銬著的雙手老在山頂磨蹭，這可真是急死人了。而第二道門也就是我這間屋的門的門鎖，已經在咔嚓響動，就是說倒計時已是最後幾秒，再不容磨蹭。情急中我就地一個驟打滾，借身體的力量將雙手硬是翻過了山頭，而幾乎就在同一時間門打開了，老獄卒端著饅頭稀飯走了進來。

「你又在搞什麼鬼？」他大吼一聲，把早飯放下，兩隻眼鼓得銅鈴大。我急中生智，又在地上打了個滾，叫道晚上睡不好，涼了肚子，肚子痛呢。一邊呻吟一邊又在地上滾了幾下，不由得老頭子不信。老獄卒果然出去弄了瓶十滴水來，硬要我當著他的面喝下。十滴水苦得很，然而「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只好苦著臉說喝藥後肚子不大疼了。老獄卒說不疼就好，要不還得來一瓶。他給我把銬子打開，又伸手扳起我的脖子仔細看了看，搖搖頭說「作孽，自作孽！」又問我還想不想死？我說不想了。他便點頭說年紀輕輕的還有大半輩子，有什麼想不開？螺螢彎彎扭，總有出頭路，一生還長著呢。然後要我吃飯，飯後仍給我戴上銬子但不再反銬了。臨走時他說雖說逮捕了，但只要還沒有判刑，就只是個未決犯，仍是屬於審查階段，並沒有最後定性，就是判刑也還有緩期執行和監外執行的。你畢竟是個學生，估計總不會一棍子打死吧。要爭取政府的寬大處理，用不著灰心喪氣。

我很感謝這位老獄卒對我的指點。我不應當輕易就絕望就自暴自棄，應當像外面的犯人唱的「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要相信群眾相信黨是會把問題最終弄清楚的。我相信到正式提審的時候，專職的提審員不像那些半瓶醋的軍代表，是會把一切問題弄得一清二楚，決不會冤枉一個無辜者，於是懷著一線希望懵懵懂懂地過，一心等提審的來。

過了約莫一個多星期，果然就有人來提審了。但來人也是一身的軍裝，「一顆紅心頭上戴、革命的紅旗掛兩邊」，讓你分不清楚是專職的提審員，還是半瓶醋的軍代表，又不敢問。

來提審的人似乎是專門為挖我畫「反動漫畫」的動機來的，他首先念了一段主席語錄作為開場白：「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這倒是說對了，黨和人民把我從一個什麼都不懂的娃娃，培養成了一名大學生，我是熱愛黨熱愛毛主席的。我在文革中起

來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也是響應偉大領袖的號召。儘管後來變得狂妄了，吃了豹子膽，認為毛主席也會有錯誤，也並非一貫正確，說的話並不一定句句是真理，那也是認識上的偏差，絕不會有惡毒攻擊的念頭。

但提審員顯然不是這樣想的，他認為我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是一貫的，由來已久，有很深的思想根源。他除了把那些早已挖出來的陳穀子爛芝麻又清倉了一回外，又拋出些新材料來證明這一點。比方我在日記中關於「我要製造真理的軍艦，去征服思想的海洋」那段話，就被說成是暴露了我否認毛澤東思想是真理，妄圖另外製造一套真理的狂妄野心。我只好解釋說日記的意思並不是這樣的，我說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可以探索、發現、掌握真理，但不可能製造真理。我這段話的實際意思無非是說要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來鍛造批判的武器，並非是說要去製造什麼真理。提審員只說了聲「狡辯」也不再糾纏，他的主攻方向仍然是「反動漫畫」，要我老實交代「動機」。

我哪裏交代得出什麼「動機」，只是承認在紙上亂寫亂劃確實是嚴重地損害、玷污了偉大領袖的光輝名字，罪該萬死，死有餘辜，但實在並不是有意為之。「希望批判從嚴，處理從寬，使我能有機會脫胎換骨，重新做人。」我誠懇地對提審員說。但是提審員冷笑了，歪著頭說：「你別來這一套，我們又不是三歲小孩。你給自己倒是戴了一大堆空帽子，什麼損害啊、玷污啊、罪該萬死死有餘辜啊，可是鬧了半天還是沒有動機。大帽子下開小差，你這是老實態度麼？」我無言以對，只好不做聲。相持了許久，只聽提審員一拍桌子警告說，「告訴你證據確鑿鐵證如山，想蒙混過關那只能是癡心妄想！」

看著提審員兇神惡煞的樣子，我想向他提一個蓄謀已久的問題。這個問題在我的肚子裏已經策劃了一個禮拜，現在該端出來派點用場。我說提個問題行不行？提審員說行。我於是說：「你們說那東西是惡毒攻擊，我說不是有意的。現在不管有意無意，我只想弄明白，憑那東西就逮捕我，到底是根據哪一條規定？」

「哪一條規定？這還用說嗎？」提審員滿臉不屑的神情，「凡是惡毒攻擊污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都必須依法嚴懲。」

「這是哪個文件上規定的呢？」我裝著不知道的樣子問道。

「公安六條啊！※22怎麼，你還不知道公安六條上有這個規定？」提審員伸長脖子歪著頭，像隻醜過的鴨公。

「知道。」我點頭說，心想現在這個鴨公將進入我的鴨籠子了。

「那你是明知故問囉？你要我？」提審員的頭更歪了，從黃鶴樓歪到了鸚鵡洲。

「不，不是，我怎麼敢。」我趕緊說，「我是說公安六條上的規定與你說的好像不大一樣。」

「什麼不大一樣？你……你什麼意思？」提審員顯然發怒了，頭從鸚鵡洲越發歪過了河，只怕歪到了漢口姑嫂樹。(黃鶴樓在武昌，鸚鵡洲在漢陽，姑嫂樹在漢口，均為武漢的地名)

「我記得公安六條第二條是這樣講的，凡是投遞反革命匿名信、秘密和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或標語攻擊污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構成反革命罪。按照這條規定，必須是以匿名信投遞或秘密公開散發傳單標語的形式，攻擊污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才夠得上犯罪。但是我並沒有上述行為，憑什麼以反革命罪對我實施逮捕呢？」

我精心發動的這一波反擊無疑出奇制勝，歪脖子提審員的脖子頓時歪定了格，好半天緩不過氣來。

「那麼……」提審員終於拿腔拿調的那麼起來，「你是說不該把你那個……抓起來囉。很好，你很會鑽無產階級政策的空子。但是，你並沒有鑽得進去。我問你，難道你沒有畫那個反動漫畫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麼？」提審員聲音拉高八度質問道，腦殼也一下子從姑嫂樹回到了黃鶴樓。

「是不是反動漫畫我現在也說不清楚，但問題不在這裏。問題是這種私下亂寫亂畫的東西，算不算投遞反革命匿名信？算不算秘密或公開散發反革命傳單標語？我想弄明白的是這個。」

提審員的一口氣大約完全緩過來了，竟能振振有詞地反駁我一番：「我們看問題是看實質，不是只看現象。你惡毒攻擊是鐵的事實，這就是實質。林副主席指示我們，誰反對毛主席，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要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何況你的行為已經構成了完完全全不折不扣的現行。你在紙上不留名，這就是匿名；你偷偷躲在陰暗

的角落裏炮製反動漫畫，這就是秘密；你有意把這個圖畫落到同學手中，這就是散發。六條中的每一條規定，都恰好不過地扣得到你的頭上。你還想狡辯、想反抗、想鑽空子以求一逞，你這是罪上加罪！」提審員愈說愈起勁，他大概很為自己嚴密的邏輯推理所陶醉，為自己非凡的辯才所激動，以至於本來已回歸到黃鶴樓的歪腦殼又歪了過去——這一次不止是歪到姑嫂樹而幾乎是歪到西雙版納去了。

記得魯迅先生寫他小時候念私塾時那位教他書的冬拱先生，說那位冬拱在讀到得意的文章時，那頭是要「仰起、搖著、向後面拗過去、拗過去」，總之是和這位提審員的「歪過去、歪過去」異曲同工。而我也就從這位提審員的這番高論中，認定此公之分析能力，與其腦袋之偏斜度成正比，頭越歪理也越歪。和半瓶醋的那位軍代表相比，他只能算是四分之一瓶醋。我決定不再反駁，於是保持沉默，把頭偏向一邊，假裝是在洗耳恭聽。

面對審訊室裏這種不可理喻的「弱智」，我忽然渴望被拉到社會上去批鬥。在群眾面前我總還能為自己辯護些什麼，而群眾自有自己的判斷力。自我這個群眾熟悉的「革命小將」忽地變成了「現行反革命」以來，廣大群眾一定希望瞭解事情的真相。因為自從我五月十七日在鐵山遭綁架之後，揭露、批判、聲討、打倒之聲不絕，而還我戰友、評說功過的聲音想來也不會少，唯一聽不到的就是我本人的聲音。而無論是批判我的還是為我辯護的，在我本人的聲音面前都會顯得蒼白。是不是有罪，我自己最清楚。我相信只要允許我公開為自己辯護，江城人民一定會認定我不過是革命小將犯錯誤，認定我並不是罪人。

就在這次提審之前，我就從那老獄卒的口裏聽說，幾個月前武漢的造反派群眾出動幾百輛汽車上街遊行，要營救我脫離虎口時，是軍區司令曾思玉把這次營救活動硬壓下去的。「你狗日的還真不是個簡單的人物咧！」老獄卒神秘兮兮地說，「原來你就是那個姓魯的華工學生，外頭怎麼就會有那麼多人營救你呢？幾百輛車子遊行，都一直遊到武昌來了。不是曾司令親自出面，你個狗日的真要成氣候了。」

八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在我被正式逮捕的當天，曾思玉在省革委會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上，宣佈魯禮安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已依法逮捕。於是新華工、新湖大等「新派」掌權的

學校紛紛請纓，要求把我揪到學校去批深批透、鬥倒鬥臭。八月底的一天，警司開來一輛麵包車，將我從監獄「送」回學校批鬥。車子經過洪山某軍區招待所時，一位叫左林的無線電系的學生上得車來。這位左林是一位軍隊高級幹部的紈袴子弟，運動之初「血統論」盛行時，曾狂妄地揚言等運動過後，至少也要混個「副省長」當當。這位未來的「副省長」見我戴著手銬坐在車底板上，幸災樂禍地譏笑道：「原來你這個反革命分子也有今天？給我老實點！」一邊罵一邊朝我頭上猛踢一腳，然後一陣狂笑，得意得不得了。

一路上左林就將他的一支腳踩在我的身上，直到車子開進華工後他要下車了才把腳拿開。車子一直開到學校露天電影場的大門前，我被下掉銬子，由早已在門口等候的幾個身強力壯的學生扭著胳膊，推上那個曾經批鬥過「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委書記朱九思、「挑動群眾鬥群眾」的工作組組長王躍、「反動學術權威」船舶系教授劉穎和「歷史反革命分子」干毅的臺子上接受批鬥。兩名人高馬大戴著紅衛兵袖章的「紅司戰士」將我雙臂向後反扭，我像隻燕子反剪著翅膀，又像隻噴氣式飛機向後伸開了雙翼。不僅如此，我的眼窩被後面伸過來的一隻大手摑進去死力地向後扳，於是我也身體前傾，頭卻後仰，整個人成大鵬展翅狀。這就是文革中批鬥階級敵人時發明的「噴氣式」，又稱「坐飛機」。多麼偉大的發明創造呀！我大汗淋漓，骨骼似裂，像隻被抓住了翅膀只待宰殺的鴨子，卻連撲騰的份都沒有。

三十年後我參觀陝西歷史博物館時，在隋唐展廳裏見到一些天王鎮妖魔的塑雕。那雕塑的天王無不是怒目圓睜，頭髮上指，目皆盡裂，雄糾糾氣昂昂地將牛鬼蛇神踩在腳下。那神情、那氣勢、那造型、那威風，怎麼就和當年文革中的批鬥英雄何其相似乃爾。但是人家天王也不過是將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而已，人家並沒有搞什麼「噴氣式」、「坐飛機」，天王都還講一點「人道」。但在當時自然不會想到這些，我只聽見台下一片「打倒反革命分子魯禮安」、「砸爛魯禮安的狗頭」、「誰反對毛主席就堅決消滅他」，還有什麼「頑抗到底死路一條」之類的口號。

口號聲中我們班上一位「左派」走上臺來，手中拿著一張紙片在我面前晃了晃，厲聲問道：「這是不是你畫的？」我集中注意力仔細看了

看，正是那張「反動漫畫」的原件。除了逮捕那天軍代表向我出示的照片上的內容外，我注意到在毛澤東幾個字的左邊，有「歌聲唱徹月兒圓」一行字，也是我的筆跡。我心中陡然一亮，想起我為什麼會寫毛澤東幾個字了。但是所謂「絞架」又是怎麼回事呢？我腦子裏又倒海翻江起來。那位同學又追問道：「是不是？」我點頭說是。那位同學收回紙片，面向會場的群眾大聲說，他承認是他畫的了。這個現行反革命分子竟敢惡毒攻擊我們的偉大領袖全世界人民的偉大導師毛主席，真是可忍，孰不可忍！這位同學接著揭發和批判說：「反革命分子魯禮安一貫就是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胡說毛主席也會犯這樣那樣的錯誤，在毛主席的光輝著作上大放厥詞，說主席這也左了那也右了，真是狗膽包天！他還公然反對毛主席親自批示的天津延安中學大聯合的經驗，公然跳出來為薄一波安子文叛徒集團翻案，他的反革命愛憎何其鮮明！他頑固堅持反動立場，死不回頭，直到最後喪心病狂地書寫反動漫畫，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充分暴露了他反黨反人民的罪惡本質。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滿懷革命義憤，堅決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魯禮安，用毛澤東思想為武器，將他們倒鬥臭，永世不得翻身！」然後是喊口號，臺下此起彼伏地倒也熱鬧。

接著又有人上臺來，重點批判我那篇據說極其反動，流毒甚廣，「每個字都是反動的，要一個字一個字地批判」的《北斗星學會宣言》。所謂批判，大抵上也就是用《新華工報》上那篇「評反革命跳樑小丑魯禮安」文章的手法，指鹿為馬，逼良為娼。我在宣言中挖苦過的「學者」、「名家」，站在黃鶴樓上看翻船的「大人先生」等等，都被說成是在含沙射影，暗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發言者憤怒地指出，六七年秋天偉大領袖毛主席剛剛視察中南三大區，對形勢作出「形勢大好，不是小好」的英明總結後，反革命分子魯禮安竟敢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是「站在黃鶴樓上看翻船」，「不是歷史的創造者的呼聲」，這不是反動透頂嗎？

發言者繼續「揭露」說，在這篇反動宣言裏，像這類指桑罵槐、含沙射影的三家村式的語言比比皆是，舉不勝舉。像宣言中所說的「不顧火刑與十字架的威脅，去開拓新的道路」一句中的「火刑與十字架」，就是影射無產階級專政，而「開拓新的道路」，就是開拓反毛澤東思想的

反革命道路。說到這裏發言者突然掉過頭來，盯著我的臉惡狠狠地質問道：「你說，火刑與十字架是不是影射無產階級專政？老實回答。」我於是老實回答說：「不是，無產階級專政沒有火刑，也沒有十字架。」說完後我聽見會場裏許多人都笑起來。

大會的嚴肅性顯然受到了干擾，於是發言人大呼「不許狡辯！」臺上更有人趕緊領呼口號：「敵人不投降，堅決消滅他！」然後發言人繼續批判說，宣言揚言要「為未來的鬥爭準備彈藥和武器」，就是陰謀將來進行反革命政變。至於結尾那句「北斗、北斗，未來幾十年的中國世界，將誰主沉浮」就更不用說了，那是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反動派妄圖在中國實現反革命復辟的反革命幻想曲。發言人接受了我剛才趁機「狡辯」的教訓，雖然也不時走走形式向我提出這個那個的問題，但不待我開口便又自顧自地批判起來。

發言人的「一言堂」顯然引起會場上一些人的不滿，有人就在下面喊，「聽聽他講嘛，聽聽他講嘛，」大會主持人趕忙抓過麥克風大聲喊道：革命的同志們，警惕個別壞人擾亂會場。一面又大叫把魯禮安的黑保鏢干小雄揪上來示眾。但下面的附中學生喊道，干小雄跑了。干小雄是原敢死隊的隊員、附中初三的學生，其父干毅解放前官至國民黨少將，解放後任華工機械系的教授時又被打過右派，早已是被打倒的「歷史反革命」和「反動學術權威」，不把干小雄這個「狗崽子」揪上來揪誰？可惜竟跑掉了。不過跑了芝麻，還有西瓜，大會主持人便宣佈將附中原校長、「變色龍」周嶽森揪上臺來陪鬥。周嶽森僅僅因學生返校復課方面的問題與我有過一次談話，便毫無來由地和我成了「一丘之貉」，顯然，是有人故意要整他。

周嶽森從下面的人群中被叫上臺時步履沉重，面色蒼白。當他從我面前走過時，我聽見他壓低聲音悄悄說了一聲「講良心，說實話」。我知道他是擔心我頂不住了亂咬人——這種事情文革中實在是太多了，不由他不怕。但我怎會亂咬無辜之人呢，該負的責任自己來負不可嫁禍於人，這是做人的底線，我豈可不遵守？這時我聽見周嶽森已在五一十、從容不迫地交代那天與我談話的情況了。談話自然是無懈可擊，什麼也證明不了，批判者只好抓住周嶽森送我從他家中出來時說過的一句客套話不放，那句話是「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發

言人於是大做文章說：大家聽呀，周嶽森是多麼看重大反革命分子魯禮安呐，魯禮安一席話竟比他讀上十年的書還管用呢！於是打倒魯禮安打倒周嶽森的口號連成一片。

一年之後，周嶽森這位曾為共產黨從事過地下學運的革命幹部，竟然變成了「國民黨老牌特務」，並且被打成我的「黑後臺」之一，其證據即「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這句話。為一句客套話而賈禍，周嶽森在蹲大獄時，想必充分領教了什麼叫做「一句頂一萬句」，嗚呼！

批鬥大約進行有一兩個小時了吧，其間我聽見曾綁架並將我非法關押了整整兩個月的鐵山的「革命群眾代表」也上臺發言了。這夥將我關押在礦井下對我進行毒打折磨的「革命群眾」，居然也有臉在臺子上控訴我「破壞鐵山革命和生產的大好形勢的罪行」起來，真不知人間有比這更加無恥的事情。不過我也幾乎聽不清楚他是如何在胡說八道，我被反剪著胳膊摑著眼窩，身子前傾兩支腳尖點在地上，在烈日下已被批鬥了小半天了。我口乾舌燥，身體幾近虛脫，這時候只要後面揪著我的人一鬆手，我就會撲倒在地不能動彈。但後面的人把我的兩隻胳膊抓得死死的拼命往上掰，我的肩頭肌恐怕已經掰傷了，好像斷裂似的疼痛。我問蒼天，我為什麼要受這種辱？為什麼要受這種罪？蒼天無言，但是天上的太陽開始向西傾斜了。

往日在學校裏念書，這夕陽西下的時分是何等美好的時光。我們院田徑隊的隊員都開始進入田徑場進行訓練——奔跑、跳躍、投擲，我們是校園裏最生龍活虎的一群。但是現在我再也沒有機會和同學們一道奔跑跳躍在田徑場上了。我的同學們，曾和我朝夕相處的同學們，你們真的相信我一夜之間成了十惡不赦的罪犯嗎？你們難道就沒有自己的鑒別力嗎？不，我不相信。但是即使你們仍然信任我，又有誰此刻救得了我？然而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此時此刻就在距批鬥會場不遠的地方，一支隊伍正隨時準備「劫法場」。

這是附中的一群「武林高手」，每人暗藏了一柄五四手槍，正埋伏在可以看見批鬥現場的一個隱蔽的角落裏，等待他們的頭領王永紅的命令。但是王觀察了一下形勢：警司一個班的兵力荷槍實彈戒備在批鬥臺的周圍，華工更有大批「保衛」執槍巡邏在會場四周，一旦衝上去

必發生槍戰，死傷在所難免。代價太大，成敗未卜，王永紅最後還是決定放棄了這次冒險行動。

現在還是回到批鬥會場上來，當時儘管誰也不曾想到會場外已是危機四伏，然而也總會有人擔心夜長夢多恐生意外，總之批鬥會是宣佈鬥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而匆匆結束。我被押下批鬥臺，重新用車送回監獄。在我被押著從臺上下來走上車子這短短一段途中，夾道的群眾紛紛伸出拳頭向我的頭臉和身上打來，還有人朝我的身上吐唾沫。許多人在叫罵「反革命！反革命！」「打死你個反革命！」這些同學這樣做，當然是出於對偉大領袖的無比熱愛和對我這個「反革命分子」的巨大仇恨，但是我能夠抱怨他們嗎？

我被武警戰士「保護」著從憤怒的人群中擠出來，押上汽車送回監獄，像隻死狗一樣被扔進關押我的小房間。我四肢攤開，躺在地板上完全不能動彈，全身似乎散了架，兩支胳膊像不是長在自己的身上而是被人給下掉了。老獄卒走進房來問我怎麼回事，我說動不得了。老頭說人家王任重一天鬥幾場，鬥完了屁事沒有，怎麼就你這麼豆腐塊做的受不起折騰？過了個把鐘頭，老頭又送饅頭和菜湯進來，但我仍坐不起來。老頭子便喊了個犯人醫生來給我聽了聽心臟，又號了一回脈，留下幾片藥片給我吃了，但我還是動不了。手和腳都背叛了我，根本不聽我的使喚。那老獄卒也無計可施，搖搖頭，將晚飯擱在地上便出了房間。

那一晚我就這麼躺著，直到半夜身子總算能夠活動了，但食欲一點都沒有。昏黃的燈光下，我看見牆角有螞蟻正在四處覓食，便掰了一點饅頭扔過去。饅頭很快就被螞蟻發現，不一會便有許多螞蟻聚攏在一起，開始「愚公移山」。我爬在地下，仔細地觀察這群小螞蟻們緊張而有序的勞動過程，突然羨慕起這些無憂無慮與世無爭的小東西：與其生活在沒有思想自由的暴政之下，倒不如變成這螞蟻王國中的一名「蟻民」。但是我現在就算是變成了一個微不足道的螞蟻，籠罩在我頭上的那隻魔掌也仍然是不會放過我的，它隨時可以把我捏得粉碎。

我昏沉睡去。



## 第十四章

# 民主路415號信箱

逮捕於我彷彿是一個惡夢，但惡夢總有醒來的時候，而我的這個惡夢是無時無刻不在追逐著我咬齧著我的靈魂，使我晝夜不安。我很少再能進入熟睡，任何一點哪怕是最細微的聲響，也會使我立刻驚醒。而在醒來的瞬間，心悸未定的我常常會禁不住追問自己，你到底是誰？你現在是在什麼地方？當然我很快就清醒了，我是已經被宣佈逮捕了的「階級敵人」，我現在是在監獄裏。唯一能稍稍自慰的是，這個地方並沒有真正的獄警，沒有看守，沒有其他的犯人，當然就更沒有什麼明確規定的監規紀律，沒有人一天24小時監視我，我甚至可以隨心所欲地引吭高歌。事實上我那些時就是成天靠唱歌打發日子，我搜腸刮肚，把我從兒時到上大學後所學會的所有歌曲，都輪著唱了一遍又一遍。

我有一段時間愛唱金焰演的宋丹平的「夜半歌聲」，特別是夜深人靜的時候：

空庭飛著流螢，高臺走著狸牲，人兒伴著孤燈，梆兒敲著三更。在這漫漫黑夜裏，誰同我等待著天明？

誰同我等待著天明呢？也許只有我的親人吧，但他們與我如隔重山，連我現在在什麼地方大概都未必知道。而最渺茫的是我究竟還有沒有天明？管不得那麼多了，沒有天明就沒有天明吧，還是唱我的歌吧，唱夜晚和黃昏的歌：「歌聲輕輕蕩漾在黃昏的水面上，暮色中的工廠已發出閃光……」我唱的是蘇聯歌曲「山楂樹」。

但是無論是「夜半歌聲」還是「山楂樹」，都畢竟不能代替一日三餐，混日子每天還是得吃得喝，而伙食標準自逮捕那天起就一落千丈了，從空軍地勤灶降為獄中勞改犯的伙食。不過勞改犯的伙食辦得並不差，特別是晚餐，菜湯中油花厚厚的，甚至能撈到幾塊肉片。那二兩一個蒸得蓬鬆焦黃形如織布梭的饅頭，就像塊蛋糕一樣誘人，不要說吃便是那模樣便秀色可餐。原來吃空軍地勤灶時油水厚，一個饅頭都要吃半天，現在一餐兩個饅頭三口兩口便下了肚，我於是向老獄卒提出能不能每餐給我三個饅頭。

第二天晚飯時我如願以償，每餐變成了三個饅頭一碗湯，如是者數日。但俗話說「胃口越吃越大」，我又進一步要求晚餐的饅頭增至四個，而下一頓的晚餐，我的飯碗裏便真的變戲法似的有了四個饅頭。然而人心不知滿足，吃著碗裏望到鍋裏也許是人的天性，我不久更提出一餐要吃五個饅頭。五個，也就是一斤，上大學時田徑隊搞大運動量訓練，我一頓吃上斤把還不是家常便飯？但是這回老頭子把眼睛鼓了個銅鈴大，死死地瞪著我說，「饅頭？五個？你狗日的莫不是想把自己撐死？」我說不是，是肚子還是有點吃不飽，我在學校就是有名的大肚漢。老頭子說那好，我去說一說吧。臨收碗走時他一邊磨蹭一邊自言自語地咕嚕說：「怪不得說行人飽，坐人饑，睡倒的要吃一筲箕呢。」

下一頓晚飯終於盼來了，菜湯依舊，但饅頭卻重新變成了原來的兩個。正像《漁夫和金魚的故事》那篇童話詩中所寫的那樣：

那老婆子正坐在門檻上，擺在她面前的，還是那隻破木盆。

我已經有了一餐四個饅頭還不滿足，當然只能落得老婆子一樣的結局。於是擺在我面前的，還是兩個饅頭，這真是一個深刻的教訓。

我疑心從四個饅頭還原為兩個饅頭是那個年輕公安的主意，因為隔了一天他就到我房間來狠狠地教訓了我一頓。他背著兩支手從房間的一角踱到另一角，再從另一角慢悠悠地踱回來。踱了幾個來回之後，他站定轉過身，略有所思了一會，開口說，「你在這裏啥事都不做，餐餐大米飯白麵饅頭養著你還不知足，一頓居然要吃五個白麵饅頭。你知道我們家鄉的老百姓平日是吃些什麼嗎？他們汗流浹背一年

幹到頭，逢年過節才能吃上一頓白麵饅饃。你真是太不知足了，你人心不足蛇吞象。」我想辯解說我本來飯量就大，不是人心不足是肚子不足，而且不想吞象只想多吞幾個饅頭。但我已經是被宣佈逮捕之人，不再敢像剛送進來審查時那樣說話放肆，所以只好一聲不吭任其數落。數落來數落去，最後自然還是要落實到思想改造這一點上。

年輕公安拿起桌上一本毛選，也斜著眼問道，「近來一陣子學習得怎麼樣啦？」我回答說毛選四卷都已經從頭到尾學習過兩遍了。年輕公安說學習不是光圖速度，關鍵是要學進去，帶著問題學。要用毛澤東思想對照自己的言行，認真反省自己哪些地方違背了主席的教導，要狠挖深挖自己犯罪的根源。說了一大通之後又問我有什麼想法？我說為了更好地領會毛主席著作，想讀一點馬列的書，像《國家與革命》、《法蘭西內戰》之類都可以。年輕公安說：「毛主席寫的《論聯合政府》、《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等等，就都是專門講國家與革命的。論述內戰問題的著作也不少，比如《蔣介石在挑動內戰》啦」，他把手裏的毛選翻了幾下說，「這就夠了，哪裏還要去學什麼法蘭西的內戰。林副主席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發展史上的第三個里程碑，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的頂峰。馬列書中有的，毛主席的著作中都有，就是馬列書中沒有的，毛主席也創造性地提出來了。所以林副主席英明地提出，學馬列主要是學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著作，這是學習馬列的捷徑，要用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時間學習毛主席著作。你要學馬列的著作，那毛選上不是也引用了不少馬列著作中的話嗎？你把那些學一學也就非常夠了。」

這位年輕公安侃侃而談，水準還真不算低，但我還是心有不甘置疑說：列寧著作中有篇《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好像毛選中還沒有涉及這個問題的文章。列寧的這篇著作我可不可以讀一讀呢？「怎麼會沒有？你簡直是胡說八道！」年輕公安將手中的毛選刷啦刷啦一翻，翻出篇《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指著其中一段念道：「紅軍第四軍的共產黨內存在著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這對於執行黨的正確路線，妨礙極大。」然後解釋說：「這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就包括了列寧所說的那個『幼稚病』。所以說毛澤東思想偉大，就在於它高度概括了無產階級的革命理論，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關鍵

是我們要善於領會毛主席每一句話的深刻含義。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把毛主席的每篇著作都讀熟讀懂，這就夠我們學習一輩子了。像你們這種半瓶子醋的臭知識份子，就更不能放鬆學習。第一步是用毛澤東思想改造人生觀，然後再進一步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不然這一輩子都等於白活。」

年輕公安的教誨自然使我受益匪淺，但我還是不明白，毛主席著作中一句「共產黨內存在著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的簡單概括，如何就能包含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這篇著名論文中所論證的豐富而深刻的思想。何況毛在寫作《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這篇文章時，可能根本就沒有機會讀到過列寧的這篇著作，連「左派幼稚病」這個名詞說不定都聞所未聞，他又如何去概括？年輕公安不過是想當然耳。

年輕公安後來多次來我這裏，檢查我的學習情況，例如問我「老三篇」背熟了沒有哇？我當然是早已背得滾瓜爛熟，他絕對考不倒我。但是有一次他突然要我回答「老三篇」每篇的寫作時間，並且要精確到月和日，我沒有準備自然是答不來，結果被他狠狠地挖苦了一頓。

「連這個都答不出來，還好意思說自己都讀熟了。你見過人家部隊上的學習毛著標兵沒有？隨便你挑毛選四卷中哪篇文章，人家都能馬上答出文章的寫作年月，甚至答出這篇文章是在選集的哪一頁，這才是真正的下了功夫。」年輕公安這話自然又讓我長了不少見識，懂得了「學問無止境」的道理。但問題是把寫作時間記得那麼具體，把文章的頁碼弄得那麼精確，究竟又有什麼用呢？不過是「可憐無補費精神」，用背那些東西的時間不如洗個澡還實用些。為什麼突然又扯到洗澡上去了呢？無它，實在是我身上發癢，自入獄後我已很長時間沒有洗過澡了。年輕公安的諄諄教導雖說語重心長，如醍醐灌頂，能潛移默化我的思想，但於久未洗澡而發癢的身體何益？於是打報告要求洗澡。過了兩天，那老獄卒還真讓犯人提了桶熱水進來，兑桶冷水讓我在一個大木盆裏洗了個澡。

那天有雨，刮了風，天氣變得有點涼，用溫熱水洗澡實在舒服。人坐在木桶裏暖和和的，竟有一種孩提時代坐在家裏的澡盆裏讓大人給擦洗時那種溫馨的感覺。一個失去自由的人，似乎只有在澡盆中能

暫時獲得一種和自由人平等的感覺。洗澡水滑溜溜濕膩膩地流過人體的各個部位時，那種感官上的舒暢，當囚犯的和當總統的又有什麼質的區別？事實上人脫光了身子泡在澡盆裏時，赤條條的分得出誰是囚犯誰是總統？

不過一從澡盆中上來，穿上衣服，人的身份就各異了。該管人的還是管人，該受人管的還是受人管。我把脫下的衣服自己洗了，打起赤膊條膀，因為沒有換洗的，須等衣服晾上一晚乾了再穿，夜裏就赤身露體躺在地上的草席上睡覺。反正屋裏無他人，赤身裸體也無妨，就學他劉伶「以天地為棟宇，以屋室為衣襟」好了。但晚上蚊蟲甚多，又專檢「老二」咬，無奈，只好用一條毛巾照顧好「老二」，其餘地方便隨蚊蟲之尊便了。

但未料到這天天氣有些涼，次日一早竟發起燒來。年輕公安聽說了，送來幾片感冒藥讓我吃下，燒慢慢倒是退了些，但身上仍是畏寒，老獄卒弄了件犯人穿的棉襖給我穿上，才感覺好一些。第二天躺在地上身上還是冷，便繼續吃藥。但是快到下午兩點鐘的時候，一夥軍人衝進我的房間裏，要把我帶出去批鬥。

「我這兩天正在發燒，還沒好，剛剛還吃了退燒的藥，不信可以問幹部。」我有氣無力地說。一個當官模樣的人彎下腰，用手摸摸我的額頭，說「不怎麼燒嘛，問題不大的。」陪這夥人進來的老獄卒說：「能不能朝後推兩天？」「不行，」軍官直搖頭，「會場早佈置好了，群眾也差不多到齊了，不把人拉去怎麼交代？」說完便命人將我戴上銬子，推搡出門押上一輛軍車。軍車呼嘯著駛出監獄，從小東門直奔閱馬場，駛進了湖北大學的校門。車子經過學校47號樓時，我從車的小窗子裏朝外頭望了望，兩年前就在這棟樓的牆上，我貼出過那張《為南下革命師生呼籲》的大字報，替被打成「南下一小撮」的北京來的紅衛兵戰友辯護。可現在有誰來為我呼籲、為我辯護？正是「湖大校園依舊，人世幾經滄桑」，我忽然有一種悲涼之感。軍車不一會在湖大大操場旁停下，我被推下車押上批鬥台。這時我看見馮天艾也已在臺上，但沒戴手銬，依舊風度翩翩，無絲毫怯意。我那時尚不知道他因《揚子江評論》的緣故，正被隔離在市衛生學校內的一個甄別教育所接受審查。

批鬥會在一片口號聲中開始。湖大革委會的權貴們紛紛上臺發

言，當然也是拿《北斗星學會宣言》中的片言隻語作文章。但我很快發現湖大的批判「醉翁之意不在酒」，把我和馮拉來批鬥是為了借題發揮，將鬥爭矛頭指向他們學校一支叫「紅八月戰鬥隊」的兩位頭頭。這兩位頭頭一位叫梅子惠，一位叫賈培培，都是學生中最先起來造反的學生。梅還是校革委會中的一名副主任，卻因觀點的差異不見容於學校當權的主流勢力「新派」。梅與賈都是與我要好的朋友，曾應邀出席過北斗星學會的成立會，而這件事便成了湖大革委會中一些人借題發揮的把柄。

一個發言者拿出一張不知從哪裏搞到手的北斗星學會成立會的入會者合影照，指著梅問我這是誰？又指著賈問道這又是誰？然後舉著照片故作驚訝地叫道，大家看呀我們湖大還真有人和這個反革命分子稱兄道弟，狼狽為奸，一起開會，一起照相，坐一條凳子穿一條褲子呢！但是湖大那個「紅八月戰鬥隊」也不是好惹的，會場裏人群中馬上就有人大聲嚷起來，不准污蔑！不准把矛頭指向革命群眾！會場上便有點亂，主持人趕忙請出人來壓陣。我偷眼一看，上來的原來是「新派」陣營中的頭號理論家「油嘴」彭勳。

但見「彭油嘴」雄糾糾氣昂昂地走上前來，在麥克風前站定，突然朝著我猛一轉身，右腿後跨成一弓步，兩隻手臂像扯蘭州拉麵似的猛然拉開，做出一個白鶴展翅的漂亮的亮相動作。我讀小學時，觀看過蘇聯國家大馬戲團的演出，曾見過團中一位魔術大師做過類似的動作。那時從他手掌中飛出了一個又一個的鴿子，飛得人眼花繚亂。我一時產生錯覺（也許是發燒燒昏了頭），以為從「彭油嘴」的手中也會飛出鴿子來。但是並沒有，飛出來的倒是革命大批判的猛烈炮火：魯禮安，你從極端的個人主義發展到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在文革中作惡多端，犯下了一系列不可饒恕的罪行。正是傾東海之波，難寫汝之惡，罄南山之竹，難書汝之罪。魯禮安，你不是狂妄地叫囂未來幾十年的中國世界誰主沉浮嗎？那我們告訴你，試看今日之域中，是毛澤東思想的天下；試看明日之域中，將仍然是毛澤東思想的一統天下！

「彭油嘴」的口才真是了得！我前幾個月去鐵山前，曾針對彭勳編造我在黃石策動「爆炸電機」的謊言，專門寫過一篇題為「正告彭勳」的

文章，將彭狠狠挖苦過一頓。這篇文章尚未來得及發表，我就在鐵山被劫持，文章的底稿也落到「新華工」手中。彭勳或許已經看到我這篇文章，這個批鬥會正好給了他出口鳥氣的機會。那就不妨耐心地看他一會兒馬步一會兒弓步，一忽兒氣壯如牛一忽兒兇惡如狼的表演吧。人家看我被批鬥，我看人家批鬥我，彼此都還划算。但是彭勳後來還說些什麼，都不大聽得清了，只覺得一個矮小的影子在眼前跳，還有含糊不清的唱戲似的拖腔。我站在臺上雖然沒有人往後掰我的胳膊，也沒有人用手摑住我的眼窩把頭朝後掰，但時間一長還是支撐不住了，須知我正在發燒啊，身子開始發起抖來。但在彭勳等的眼裏，定然是階級敵人被革命大批判批得膽顫心驚渾身篩糠，證明了毛澤東思想的巨大威力。

最後我聽見彭勳正激情滿懷地結束他的發言，那末了兩句是用的毛主席的詩詞：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振盪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哦呀呀，真是厲害，我這個「害人蟲」於是被「全無敵」們又送回了監獄。

這之後又是好幾日，我的燒倒是全退了。我擔心「全無敵」們恐怕是要遵循偉大領袖的教導，「宜將剩勇追窮寇」的。那末對我的批鬥將會是一場接著一場，以肅清我這個「害人蟲」的流毒，但奇怪的是竟沒有。我這個「反面教員」，只拉出去給群眾上了兩堂課，就靠邊站了真的沒有道理。以前王任重被打倒的時候，可是一天就要拉出去批鬥好幾場喲，看來「革命群眾」是越來越不重視「反面教員」的作用了。也好，不拉出去當「反面教員」兼濟天下，那就一個人呆著「獨善其身」好了。但是有一天上午年輕公安突然帶了人進來，要我馬上轉移地方。「把東西收拾一下。」年輕公安說。有什麼好收拾的呢，除了四個多月前從漢口去黃石隨身的衣服和一塊蘇製勝利牌手錶之外，我是一無所有，於是戴上手銬就跟那人出了房間。

屋外就是監獄的大院，有許多光頭的犯人正在幹活，做些汽車修理方面的活計，整個監獄就是個修理汽車的工廠。不一會出了監獄大門，朝左轉進了一個有哨兵看守的院子。進院子後通過老長的一個巷道又是一個院子，大概有兩個籃球場的大小。走過院子是一棟兩層樓的老式樓房，青磚黑瓦，似乎很有些年頭了。樓的正面的大門門楣

上，有一行字已被刮掉但仍依稀可見，是漂亮的楷體「自新之路」，當是解放前或文革前留下的遺跡。而現在在門的兩邊，是紅底黃字油漆的兩行毛主席詩詞：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樓房的牆壁上，還用紅油漆刷有幾幅內容與「專政」、「改造」有關的「毛主席語錄」。這個地方便是門牌號武昌民主路76號的湖北省第一監獄看守所了。

這個省一監看守所對外稱415號信箱，我現在就將被裝進這個「信箱」塵封起來。在「塵封」之前，我先被帶進看守所的所長辦公室登記註冊。照例是姓名、年齡、籍貫、成份、文化程度、家庭住址及原所在單位等等問了一遍，並由一位幹警一一登記在一個冊子上。此外還要填一張「個人物品登記表」，我自然是只有那隻蘇聯錶好填。一位中年幹部問我有沒有錢要保存？我說沒有。

最後一道手續是搜身，我頓時緊張起來，因為褲子荷包裏有一張紙條，上面有我頭天寫的幾句詩。詩的最後兩句是：待到大澤東逝去，江上何處見峰青？這後一句自然是從唐代詩人錢起的那兩句有名的詩「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演繹而來。之所以寫這兩句，是不滿於江青仗著是主席夫人，便到處飛揚跋扈頤指氣使，心想「一旦山陵崩」，其何以自托於國中？若這個意思被幹部破讀出來了，哪豈不又是罪上加罪？我一時緊張得心都吊到了喉嚨管裏。而那位幹部還真把這張字紙從我荷包裏搜了出來，並且打開看了一眼，但奇怪的是這位幹部只是望了我一下，什麼話也沒有說便把那張紙條又還給了我，我才如得大赦鬆了口氣。

後來知道這位幹部姓季，是位科班出身的老公安。坐在辦公桌後面的所長，也是一位老政法，他一直注意地看著我不作聲。等季幹部檢查完了，所長站起來，從背後一個櫃子裏拿出一條毛巾一支牙刷一管牙膏和一隻口杯遞給我，然後揮揮手說跟季幹部進號子去吧，要遵守監規。我便跟著季幹部走過監所長長的走道，到達最前端的一間監房。季幹部打開門讓我進去，然後關門上鎖。鎖上好後，季幹部又將門上一扇小窗打開，囑咐說有事報告班長。說完又將小窗梭門推攏，便回辦公室去了，空徒四壁的「號子」裏，便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站在號子中間，環視四周，號子的一角有一隻帶蓋的馬桶，算

是這間屋裏的唯一的「傢具」。較為特別的是屋子裏竟鋪有上了油漆的木地板，這種木地板不要說在監所，就是在外面那時也並不多見。整個號子的面積大約有十一二個平米，地板佔了房子面積的三分之一，另外那三分之二其實也是木地板，但像學校教室中的講臺一樣高出了地面一巴掌，這就成了床鋪，可橫排並睡三至四人（出獄後在電視裏看到的日本人的「榻榻米」，和這牢房裏的床鋪倒是差不多）。這麼說來我較後來的「哈日」一族，早十多年就享受到那玩藝了，哈哈）。除此之外，屋子裏可謂空空如也。

如果說還有什麼的話，那就是牆上貼有一張《犯人守則》。從頭看來，第一條是犯人要認真學習，改造思想，爭取改惡從善；第二條是要服從幹部和班長的管教，不許亂說亂動。這一條頓時提醒了我，趕緊從荷包裏摸出那張惹禍的紙條扔進馬桶，讓它「曲終人不見」。再看第三條是犯人不得在監號裏大聲喧嘩，不得互相鬥毆，不得交換案情，議論是非；第四條則是要愛護室內一切設施，不得損壞。但僅此而已，尚未規定「如有損壞照價賠償」之類，這是與我後來在賓館旅店看到的《住店守則》或《賓客須知》中的規定略有不同之處。想來是考慮到犯人入監時，多半口袋裏是「一貧如洗」，哪有能力照價賠償？何況又有幾個犯人真的活得不耐煩了，要去破壞那幾個大錢不值一文的「設施」呢？

《守則》還有幾條，什麼不准在牆壁上塗寫塗畫，保持室中衛生，以及犯人間不許用外語交談（想得真是周到！）等等，一共有八條。一一拜讀之後，我便開始檢測室內設施是否完好，摸摸桌椅，揭揭馬桶，再脫了鞋在床板上踩幾腳。所有設施似乎都無啥問題，手卻仍然發癢，便抓著窗子上的鐵欄搖了搖，就聽見門外一聲大喝：「你想幹什麼？」我一回頭，只見門上的小窗口梭板已被拉開，一雙雪亮的眼睛正從那窗子外緊緊地盯著我，那是一張非常年輕的士兵的臉。我趕快鬆開手，走下床板，說「報告班長，我不想幹什麼。」「不幹什麼你拉那欄杆作甚？」那班長操一口陝西口音說，「老老實實呆著聽見沒有？」「聽見了，報告班長。」「哐」的一聲，窗子的梭門又推上了。

我於是醒悟到，我在此處的一舉一動，都在班長的監視之中，我這時才真正有了「坐牢」的感覺。照文字家的考證，牢最初是養牲畜的

圈。《詩經》上說「執豕於牢，酌之用匏」，就是說把豬關在「牢」裏，用一種叫「匏」的瓢去餵養它。我的號子的門外，不也擺著一隻吃飯用的瓦鉢子嗎？那就是我受「酌」時用的「匏」，和「豕」又有什麼兩樣？「牢」除了圈豬，當然也可以圈牛、圈馬、圈羊。所以那個漢朝的太史公司馬遷因李陵的案子下獄後，在給朋友的信中，開頭就自稱「太史公、牛馬走」，就是說他是像牛馬一樣被關在「牢」裏供人驅使。而後人在注釋這個「牛馬走」時，卻只是稱之為「自謙」，實在是太皮相了。

牢房從本來意義上講，實在是一個只適合於圈養牲畜的地方。一隻瓦鉢和一支馬桶，雖然也解決了人的吸收和排泄方面最基本的生理需要，但是人畢竟不是只需要吸收和排泄的動物，他還有其他的社會需求。哪怕是勞動改造即所謂「勞改」，相對於「坐牢」也顯得是多麼的人道。所以一切的刑罰中，強迫犯人長期「坐牢」也許是最可怕的一種，我也害怕在這個看守所裏長期「坐」下去。我現在哪裏都願意去，就是不願意在這個號子裏枯坐終日。除了一日三餐和偶爾提審，這個地方成天死一樣地沉寂，說它像個墳墓一點都不過份。

沙俄時代的民意黨人妃念格爾在一本獄中回憶錄中，把她監牢中的日子稱為「生命之鐘停了擺」。不過生命之鐘其實仍然是在動的，只是變得極其緩慢、極其微弱，緩慢微弱得你已經不能感覺到外部世界的存在。這種感覺是我在鐵山的礦井下甚至在監獄的那間套房裏被隔離反省時都沒有過的，即便是被宣佈逮捕後的那段日子，我都只是在短暫的絕望之後，便又恢復了對生活的信心。無論綁架、逮捕還是批鬥，我都曾經以「遊戲」視之，而我不過是在這種遊戲中充當一個被追捕的角色罷了。儘管是扮演了一個危險的角色，但是我從中體驗出的人世的艱險、人心的險惡、世態的炎涼和政治鬥爭的殘酷，卻是人們通常情況下體驗不到的，這也未常不是一種樂趣。然而真正一旦落進了這隔絕人世的牢房，一天24小時受到哨兵的監視，與各種各樣的罪犯同伍，你就知道「遊戲」已經結束。你現在置身於其中的，是一個沉寂而恐怖的活人的墳墓，就像古代被扔進王公貴族的墓中做殉葬品的人俑一樣，被扔進了這個被稱作「牢房」的墳墓。

不同的是牢中囚犯仍然是活著的，但是歲月、年華、青春、愛情對他來說，都已經凝固在入獄之時的那一刻，也就是妃念格爾所說的

「生命的鐘停了擺」。用一句中國的成語便是真正變成了一具「行屍走肉」，而且所能「行走」的範圍，也僅僅不過是那間窄小的監房。這個看守所長長的通道兩邊，二十間牢門緊閉的牢房正像兩排直立的棺材。我每次被「班長」押著走過通道時，都會想像那一扇扇牢門後面的那些犯人是何形容，他們中關押日久的是不是都已形同枯木，猙獰可怖，而這些枯木很可能就預示著我未來的模樣。

沒有人來提審，也沒有人找我談話。寂寞孤獨和痛苦，像毒蛇一樣死死地纏著我，我的精神幾近崩潰。我一連幾天不能吃，也不能睡，像一頭受傷的刺蝟，緊緊蜷縮成一團，而這蜷縮的一團正被扔在一堆火上焙烤。門上的小窗被撥開了，但這一次不是班長在查看號子裏的「刺蝟」的動靜，而是獄中的廚役給我送晚飯來了。廚役有著一張和我一樣年輕的臉孔，剃著光頭，證明也是獄中的犯人。但他又和我與其他犯人不一樣，他可以在監號之外走動，給號子裏的犯人送水送飯，還有清晨給各個號子換馬桶。他是這監所中的一個「准自由人」，我好羨慕他啊。

晚飯和中飯一樣，是三兩米飯和小半碗清水白菜，我從窗子裏接過飯菜，但我仍然毫無食欲。十分鐘後小光頭來收碗，我原封不動地把飯菜又遞了出去。他接過碗，皺皺眉頭，問：「怎麼還是不吃？」我說不想吃。「還是吃一點、吃一點。」他又把碗向窗子裏推，一面點著頭，像哄一個胃口不好的小孩子似的。我說真的是一點胃口都沒有。他歎口氣說一點都不吃怎麼行呢？你中午也沒有吃，這樣身體會拖垮的。見我執意不吃，他忽然又問道：「你認識袁長寧不？」我說認識，高中的同班同學麼。袁中學畢業後考進機械學院了，莫非這小光頭與袁大學同學？我便問他，他笑一笑也不回答，朝旁邊掃了一眼，很快把窗門哐的一下關上，接著就聽見門外放哨的班長問他剛才跟號子裏的犯人說什麼啦？

「沒說什麼。他兩餐都不吃飯，我要他吃一點，就說這。」小光頭回答說。

「他吃不吃關你什麼事，以後不准和犯人說話，鬼頭鬼腦的想搞什麼鬼？」班長大聲喝斥道。小光頭答了聲「是」，便又叮呤咣啷去別的號子收碗了。

這位做雜役的小光頭原來是和我同樣的大學生，大約也曾是一名紅衛兵小將吧，是一種什麼性質的失足，使他也落進了這口深淵？但我想一定不是「反革命」的性質，因為一旦與「反革命」沾上邊，那是在監所裏連做送飯倒馬桶的雜活的資格都沒有的。因為反革命出於反動階級的本性，會在飯桶裏放毒，會利用發飯和倒馬桶的機會，繼續進行反革命的陰謀活動。反正小說中的反革命分子都是這樣幹的，焉能不防？所以我猜想小光頭肯定是由別的什麼刑事問題進來的，但問題也不會太大，可能僅僅是拘役一段時間，否則管教幹部也不會放心地使用他。但是管教幹部也不直接管他，管他的是一個操河南口音的廚師。

我不知道這個廚師的身份，但可以肯定不是幹部，因為他在幹部面前是搖頭擺尾卑躬屈膝的奴才；但他肯定不是犯人，因為他在犯人面前是趾高氣揚兇神惡煞的主子。這個比幹部低賤而又比犯人高貴的滿腮鬍茬一臉橫肉的河南漢子四十來歲，我在入監的第一天就瞥見過他的尊容。那一刻我從外面被領進所長的辦公室時，在通道裏就正碰見他對著一間號子的門窗破口大罵：「婊子養的一群狗都不咬的懶鬼，吃了飯碗都懶得洗乾淨，懶狗日的怕是蛇鑽進了屁眼裏都懶得動手拉哩，老子操你的娘！」站在他旁邊的班長邊聽他海罵，邊用手蒙著嘴笑。我當時就暗自詫異，這威嚴陰森的看守所裏，怎麼就准許這麼個潑皮牛二撒野呢？

令人納悶的事情還有呢，有一次碰到這位大師傅來收碗，聽見門窗響的一響，我趕緊將粒米未動的飯碗遞出去。卻見這位「潑皮牛二」將身子飛快地朝旁邊一閃，然後伸出隻手，老虎奪食般來奪我手中的碗，其舉動令人莫名其妙。後來見他每次來收碗時，都是這種「一閃一奪」的動作，也不知是犯了什麼毛病。直到以後與其他犯人關在一起時，我才知道了此公這怪誕習慣動作的由來。

一連兩天我粒米未進，小光頭著急，那「潑皮牛二」的廚師也沒轍，便報告管教幹部。所長遂找我談話，問我是不是絕食？我說不是，是實在不想吃，一點胃口都沒有。所長說胃口不好，可以讓廚房給你做點麵條，但故意絕食是不准許的。說完他問我還有沒有什麼要求。我提出既然已經逮捕了，希望早一點作出處理。所長說幾時處理

那不是他們說了能算數的，他能肯定告訴我的只是我在看守所的時間不會太長。

「我們這裏只是個臨時羈押犯人的機構，不是長期關人的地方，」所長說，「一般從逮捕到審判處理都不會超過半年時間。或判或放，半年之內總會有個結果，你要有點耐心。」聽所長這麼講我倒多少安了些心。半年甚至更長一點的時間我想我還是熬得過去的，這一點耐心我也還是有的。但老是這樣蹲單監卻也孤獨難受，是否哪天也會把我轉到大號子裏呢？一個號子裏多有幾個人總要好過一些，而況每天還有放風。我每天或上午或下午，總能聽見通道兩旁各個牢房的門開得哐當直響，然後是雜亂匆忙的腳步聲，那肯定就是放風了。放風，多麼令人嚮往的一種享受啊！我就盼著轉大號。終於有一天所長來通知我要給我轉號子了。

「你一個人關的時間不短了，」所長說，「我們這就準備把你轉到大號。但是你要注意大號裏是很複雜的，人員流動得也快，出出進進三教九流各種各樣的人都有。你進去後一定要管好自己，有事及時向班長或者管教幹部報告。還有，號子裏犯人之間是不准互相叫名字的，只能叫號——記住你的編號是66號。」說完又叮囑我差什麼東西的話可以報告，不要和那些犯人拉拉扯扯，那些人鬼名堂多得很，凡事都要多個心眼，不要惹麻煩。

我謝過所長的關照，抱著鋪蓋和所裏發給我的幾樣日用品，隨所長走過通道，一直走到一間號子的門口站住。只見所長先梭開門上的小窗朝裏面看了看，然後開鎖。我抱著東西，忐忑不安地看他把鑰匙插進鎖孔，腦子裏像有股龍捲風在旋轉：我將進去的這間號子裏都關著一些什麼樣的犯人呢？叛徒、特務？殺人犯、縱火犯、搶犯？抑或是流氓、小偷、人販子？或者也有像我一樣的政治犯？這些人都是何方神聖？是豺狼虎豹、毒蛇猛獸一樣窮兇極惡猙獰可怖麼？而我現在就要和這些牛鬼蛇神共一個「籠子」了。你害怕了嗎？你怯場了嗎？那麼還是記住但丁的話罷：

到了此地，一切的恐懼和畏怯都要放在腦後了。

牢門嘩的一聲拉開了，我抱著鋪蓋跨了進去。號子裏只有三個犯

人，齊刷刷地一起朝我望過來。他們一個年輕，一個已到中年，還有一個是個老頭，頭上都一律光光如也。這一剎那間我腦子裏顯現的，不是豺狼虎豹，也不是毒蛇猛獸，倒是惡作劇似的冒出一句「最高指示」：「革命委員會要有老中青參加，實行老中青三結合」。眼前不就是老中青三結合麼？難道號子裏也興這個規矩？偉大領袖的「最高指示」，真正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呀，照到哪裏哪裏亮。雖然這回閃閃發亮的，只不過是三個犯人頭上的青皮。

「給這個新來的挪個地方。」所長說，那中年人便將他位於中間的一床鋪蓋，朝旁邊挪了個位置。我走過去把我的一床鋪蓋放上去，算是入了他們的夥。

「有什麼事喊報告。」所長招呼一聲便鎖門離開。我環視了一下室內，大小和我前幾天住過的單監一模一樣，但屋子裏多了一個帶椅子的小木桌，沒有抽屜，不過是幾塊木板子拼成而已。另外馬桶有兩個，一個擋在另一個的上頭。如果說比我那單監還多點什麼的話，那就是屋子裏彌漫著難聞的體氣和汗臭。

再看那「三結合」的諸位，老的約莫六十多歲，枯瘦而猥瑣，蜷縮一團抱腿坐在靠左壁的床鋪上，用一雙老鼠般的細眼骨碌碌地上下不停地打量我，我疑心他是個投機倒把犯或人犯子；那中年漢子看上去只有三十多歲，臉圓而腮鼓，個子矮小體態虛胖，一對金魚眼泡鬆鬆的似乎夜生活過度，我疑心他是犯的所謂「男女關係」方面的案子；年輕的那位看上去僅二十五六歲，瘦削而英俊，腰板挺直頗具軍人氣質，穿的也是一身軍便服，我打量他不是現役軍人就是軍校的學生，也許和我一樣還當過紅衛兵呢。只是若真是現役軍人或軍校學生，犯了案應該由軍事法庭審訊並且羈押在軍事監獄裏，怎麼也和我們這種平民百姓關在一起呢？但不管他是不是軍人，我是一點也猜不到他是犯的哪類案？

在我打量這三個犯人的同時，這三個人自然也在打量我。那年輕人端坐在木桌後面，時而翻翻毛選時而望我一眼；中年人則在地板上來回不停地踱步，一邊踱一邊輕輕吹著口哨，吹的竟是那首有名的蘇聯曲子「紅梅花兒開」，踱著吹著眼珠就時不時朝我瞥過來。那糟老頭子也用他的一對老鼠眼盯著我，忽然磨磨蹭蹭地爬起來晃著身子

摸到牆角解小手。許是年齡大了，一泡尿淅淅瀝瀝半天都解不完，那老頭偏偏還要邊解手邊回頭不斷地瞄我，像是在做什麼見不得人的勾當似的。而馬桶老敞著，體氣汗臭之外，滿屋又是刺鼻的尿騷味。

對這我倒是有所準備，一個屋內四個人算不錯的了，聽說一些區一級的看守所是幾十個人擠在一間房子裏，也沒有什麼鋪板，就是地上鋪一層稻草，犯人靠牆圍成一圈躺下。誰是新進號子的，誰就靠在馬桶旁邊，一直等另外再進了新犯人，才能往邊上挪挪窩。而幾十個人共一間房共一兩個馬桶，那氣味之污濁，就更是可想而知了。這些我都是以前聽工總的人說的，他們許多當頭頭的「七二〇」前都被抓去蹲過牢房，曉得牢房的內情和坐牢的滋味。他們那時很豪邁地說：「為了幹革命，不怕坐大屋。」大屋者，牢房也，幾十個人關在一起不是「大屋」麼？而我現在享受的是四人一間的「小屋」，應知足矣。

「你老傢伙快點嘛！」突然聽見那中年人停住腳步，朝那解手老也解不完的糟老頭吼了一聲，然後又問我說：「家裏人送東西來啦？」他指的是我放在鋪上的那些毛巾、口杯、牙膏、牙刷等東西。「不，不是，」我說，「是發的」。「發的？」中年人眼睛瞪得老大，「誰發的？」我說是所長發的。「所長發的？」中年人更驚奇了，「你和所長是熟人？」「不是。」我搖搖頭，忽然想起反問一句：「你們不發？」「哈哈哈！」中年人仰頭一笑，笑得比貓頭鷹還難聽，「誰還發這些給我們，發雙筷子你吃飯用就不錯了，還管你洗不洗臉、漱不漱口。」我默然無語，看來所長對我的照顧有點特殊了。我與所長非親非故，素不相識，為什麼照顧我呢？

中年人不再說話又開始踱起步來，一邊踱一邊仍然吹他的口哨，這回吹的是「莫斯科郊外的傍晚」——還真能吹兩首呢，是個知識份子是無疑的了。我便一屁股坐在鋪上，邊整鋪蓋邊聽中年人吹口哨，但他卻又停下來，用下巴點點那位坐在椅子上看書的年輕人說：「18號，我們號子的號長。」號長於是向我點點頭苦笑了一下，算是和我這個新來的號員認識了。「老頭47號，」中年人繼續說，「我本人12號，你是幾號呢？」他問我。我說我66號。「66號？嗯，很好、很好。」12號一邊點頭一邊又來回踱起步來，兩手背在後面口中念念有詞：「66號，66號，

嗯，很好。」「是好得很呢，」那個糟老頭子忽然傻呼呼地笑起來：「六六大順，是好兆頭呢……」他還想說什麼，但立刻被12號大聲的呵斥打斷：「你胡說什麼？你個老雜毛。什麼六六大順不大順，你還在宣揚封建迷信呀？頑固不化的老東西。」

「老雜毛」受到呵斥，趕緊住口，然後不緊不慢地搔腳板上的老繭，床鋪上早已落了不少魚鱗般的老繭皮，而糟老頭竟偷偷地把老繭皮往嘴裏塞。於是聽見12號又對老頭子罵起來，罵他是畜牲。號長18號卻什麼都不說只是伏在桌上偷偷發笑，但他心事重重笑得十分苦澀。而我則是見了一次世面，知道這世界上是有人連自己腳上的繭皮也可以放在嘴裏當魚片或牛肉乾嚼的，看來史書上所說的有人「嗜痂成癮」並非妄言。

老頭子被罵一頓之後，不嚼腳上的繭皮了，但還是不甘寂寞，總想搞點麼名堂。他慢吞吞地站起來，又磨蹭到牆角的馬桶跟前，一支手把上面的馬桶提起來放到地下，另一支手就解起褲子來。一直密切注視著「階級鬥爭新動向」的12號，突然又大喝一聲「老雜毛你拉肚子了？」「沒……沒拉肚子。」老頭子提著褲子慌忙說。「沒拉肚子你解什麼褲子，現在不准解大手。」12號命令說。老頭子倒也聽喝，把褲子慢吞吞地拉上，又將馬桶提起來放好，然後慢吞吞地回到自己鋪位上打坐，看來肚子裏還真不急。

「這是規矩。」12號向我解釋說，「要想保持號子裏的空氣乾淨，這下面一個大便桶非特殊情況輕易不用的，要等第二天清早換馬桶前才用。大家抓緊時間輪流坐莊，拉完了屎正好拎出去，換涮乾淨了的馬桶進來，免得有粑粑悶在桶子裏臭一天。」

12號的一番話我聽得直點頭，心想這正是莊子所說的「道」無處不在，連屎溺裏面都可以發現「道」在其中。這不，牢房裏單是拉屎這件事就大有學問，只是我初來乍到還是有些不大明白，就獻疑道：「那一早屙不出來呢？有些人是從來都沒有早上拉屎的習慣，有的人還是夜貓子，專門拉夜屎，那怎麼辦？」「怎麼辦？」12號白我一眼說，「不准他晚上屙就是了，死夾也要夾到第二天早上。這都不過是個習慣問題，這個地方人都改造得過來，點把習慣還有改不過來的。」那老頭也湊過來，說一早要是屙不出就過震，麼樣也震得出圪把兩圪的。12號

這回倒不呵斥他，只是繼續說，「習慣成自然，你慢慢就會體會到清早解大手，是最合乎自然的好習慣。」

12號的這些話我想也都有道理，是經驗之談。聽他自己說他進號子已經有四個多月了，四個多月的時間，當然是可以總結出許多經驗的。他教我用紙給杯子做杯蓋，杯蓋的中間，還有一個用牙膏皮的頭部那圈圓圈和蓋子做成的杯蓋的蓋把，做得非常的巧妙。他還告訴我怎樣利用放風的有限時間洗大件衣物，比如被單，可以先在號子裏用早上發的洗臉水洗頭道，打好肥皂把被單搓乾淨泡一泡，等放風時就可以直接在水池子裏清洗了。他還告訴我這裏每月有一次肉吃，每次差不多有半斤。肉不要一次吃完，因平時缺少油水，一次吃容易滑腸。分幾次慢慢吃既可以慢慢品味，又利於營養的充分吸收。

正聽得流口水，外面通道上響起了手推飯車的軋轆聲，開午飯了。號子裏幾個人都趕快湊到門旁邊，一人手裏拿著隻杯子等著。號子的門窗哐裏哐當的順次響著，不一會就輪到我們這個號子。大家先把杯子伸出窗子打開水，然後將一鉢飯和一碗菜從窗子裏接過來。接下來就是抓緊時間吃飯，一口接一口不能耽誤，完全是軍事行動般的爭分奪秒。因為那個河南廚子在飯菜發到最後一個號子時，就開始從最頭前發飯的那個號子收碗鉢了，這之間的用餐時間最多不過十分鐘。至於你過去在外頭時進餐是否習慣慢吞細咽，是否一頓飯要吃一兩個小時，或者你是否有胃病從來吃東西都快不得，或者你牙齒都快掉光了根本就快不起來，對不起，這些舊黃曆在這個地方一律不管用。

我在吃飯速度方面絕無問題，但我現在的問題是仍然沒有一點食欲，所以勉強喝了幾口菜湯，挾了兩筷子白菜，便將飯菜讓給他們三人瓜分。瓜分自然是由號長18號主刀，這位聽12號介紹也是學工出身的年輕人，到底不愧是學過用圓規三等分圓的，一雙筷子將一鉢飯三等分得毫釐不爽。

等號子裏的三個人把各自的一份風掃殘雲地解決後，那收碗的車子也剛好已推到我們號子的門前，還是那個滿腮鬍茬一臉橫肉的河南漢子打開門上的梭窗收碗。收碗時仍然是把梭窗一撥馬上身子閃到一邊，然後將手伸進來，老虎奪食般將空碗鉢猛奪過去。河南

漢子的這種令人莫名其妙的動作，早已讓我納悶了好久，便請教12號。

12號說這個做飯的河南人是個二百五（指那種頭腦不清白、不明事理的人），原來是湖北大學教工食堂的大師傅，40多歲了都未成家。大概是想那屌事想瘋了，竟以糖果點心為誘餌，姦污了一位老師的上幼稚園的小女孩。事情敗露後被判了幾年刑，刑滿後就留在看守所做飯和倒馬桶，犯人放風時也幫忙管一管。而這個二百五竟以為他這個勞改釋放犯，身份雖在幹部之下，卻在關押的這些未決犯之上，平時在犯人面前作威作福肆意叫罵囂張得不得了，犯人都叫他「二幹部」或者乾脆稱他「二保長」。但是有一次他對號子裏一個犯了死罪的殺人犯也大呼小叫地抖威風，人家可不吃他這一套，等他收碗時，將手裏的一摞鉢子猛地朝他摔過去，幸而他頭歪得快，否則早被砸得稀爛。從那以後「二保長」就犯下個毛病，收碗時自我保護意識極強，生怕再有瓦鉢子從梭窗內飛出來。久而久之，那套撥窗、閃頭、伸手、奪碗的路數練得爐火純青，令看守所全體犯人歎為觀止。其實這個河南漢子的毛病是他自己惹上身的，他倒是應該去看看心理醫生才對。

但是我眼下飯吃不下、覺睡不著，不也是精神壓力引起的麼？我是不是也應該去看看心理醫生？可在看守所這個地方，看心理醫生豈不是個笑話？能讓你每天出號子看看室外的天空就不錯了。幸而政府仁慈為懷，每天都給點時間讓犯人放風，也就是放點「好空氣」給犯人吸一吸。但是風也與「瘋」同義，說「放風」就是「放瘋」，即放一群瘋子出來曬曬太陽，也未嘗不通。那放風場上不總是有哨兵真槍實彈的把守著嗎？就是為了防止瘋子們撒野。

不過考證這放風究竟是放空氣還是放瘋子意義畢竟不大，我實際上關心的是進了這大號子裏，放風是不是就有我的份。但事實上我的擔心是多餘的，我進號子的第二天上午，到了放風的時間時，所長打開我們號子的門後，就指著我要我出來一起放風。我於是端著個臉盆和號子裏的人一起走到了室外。

走過通道邁出監所這棟樓的大門時，眼前一片炫目的陽光。多好啊秋天的太陽，院子裏的幾株柏樹葉上，跳躍著陽光的金色的碎片，風暖暖地吹拂著面頰，柔和得像母親的手在撫摸。儘管有高牆擋著，

仍可以眺望遠處的蛇山：雖是秋天了，那逶迤的蛇山上仍是翠綠青蔥的一片，林子間甚至能看到山上遊客綽約的身影。我在貪婪地欣賞遠處的風景時，出來放風的各個號子的犯人已經在端著臉盆直奔水池，搶水管洗衣服了。不洗衣服的就在院子裏轉圈子。轉圈子也沒有什麼嚴格的規定，隨便轉來轉去，一個個像作布朗運動似的亂轉，有個光頭的小夥子甚至原地來了個後空翻，翻得那個幫忙幹部監視放風的「二保長」咧著個大嘴，笑得合都合不攏。

犯人們老老少少我大致數了一下，約有五六十人，多半是光著頭。那不光頭的一小半人是腦袋上戴了頂帽子，破帽遮禿而已，並非享有「帶髮修行」的資格。不過戴頂帽子總比不戴帽子雅觀得多，若放風時全都不戴帽子，一個個土狗子樣的，那看上去真的十分刺眼。那麼全都戴頂帽子豈不好麼？當然好，但問題是帽子得靠家裏人送進來，或自己掏錢找幹部代買，而偏偏有些犯人口袋裏既無一文錢，家裏也對他不理不睬從不送任何東西來。像我們號子裏18號和12號就是帽子一族——18號是自己掏錢買的，12號是他老婆送進來的，而那老頭子就是無帽一族——口袋裏沒錢，家裏人也根本不管他，只好成天光著個頭灰溜溜地發呆。看著這放風場上光禿禿的一統天下，我尋思我不久也必將成為光頭黨無疑，看來也少不了搞頂帽子放風時戴戴才好，於是又想到要給家裏寫封信。

自從鐵山送進監獄之後，家中一直不知我的音訊。照理在將我逮捕之後，有關方面有責任把我的關押地點通知我家裏人，但有關方面未必會通知。現在已正式轉送進看守所了，難道也不通知麼？於是放風結束的時候，我向所長提出能否給家裏寫封信，向家裏要些日用品和過冬的衣物。所長想了想說，等請示一下再答覆吧，你先回號子。我便隨犯人們一道回號子。這回號子又叫「收風」，有放便有收，也是當然的。但收風回號子時，犯人們的腳步個個沉甸甸地像戴了鐵鎗似的，不像放風時一窩蜂走得飛快地朝外頭湧。

放風之後便是等午飯，午飯仍然是一鉢飯一碗菜。菜仍然是白菜葉子，不多，其實只有小半碗，更糟糕的是菜裏沒有什麼油，比我在那邊監獄裏時勞改犯的白菜湯差遠了。但是沒有辦法，你要是瞧不上眼，其他犯人可是都盯著你碗裏的那點青菜呢。一碗菜我囫圇吞棗

地咽了一多半，對那飯還是一點興趣都沒有，於是一鉢飯仍然給號子裏那三位「難友」分了。

午飯之後可以午睡一個鐘頭，午睡之後剛剛坐起身，忽然號子的門被打開了，只見那個被叫作「二保長」的河南漢子，拿著個凳子和理髮的推剪，旋風一樣地旋進來。他讓我坐在凳子上理髮，我便坐下，但聽見頭皮上像刨冬瓜似的刷刷刷一陣響，頭上的三千煩惱絲便早給推了個乾乾淨淨。這頭剃得是真的快，只是苦了我這個挨剪子的，這哪裏是剃頭，完全是受罪！頭上剃得像狗啃似的且不說，而且比狗啃還痛。一摸頭皮，頭皮上竟道道血痕。

「二保長」的頂上功夫的厲害，那自然是不用說了，手裏的那把推剪，簡直就是個「草上飛」。問題是他那把推剪的刀口的那個鈍哪，根本上連芋頭皮只怕都削不動，何況人頭。他又只是圖快，剃頭時推剪像「康拜因」(一種聯合收割機)一般，只管在頭皮上飛快地推過去，那頭髮連剪帶拔的，焉能不痛？當然，「二保長」廚房的活很忙，剃頭是兼職，看守所裏五六十個人頭都歸他修理，也真是難為了他。「蘿蔔多了不洗泥」，是要圖個快，怪不得「二保長」的。只是，換把好點的推剪，或者至少把刀口磨快一點，總是做得到的吧。

這頭上的「酷刑」總算是受完了，接下來的時間，按看守所的規定是要學習和反省的。學習好說，每天下午會有一份《人民日報》傳遞進來供學習用，此外還有毛選和語錄等，反省就難說了，手上捧的是毛著或報紙，腦子裏究竟在想什麼天才曉得。魯迅先生挖苦國民黨大員拜謁中山陵是強盜裝正經，所謂「靜默十分鐘，各自想拳經」，這句話用在號子裏的形形色色的犯人特別是刑事犯身上，那也是再恰當不過的：一天到晚枯坐在牢房裏「學習」、「反省」，不想「拳經」、「盜經」、「淫經」，還能想什麼？有幾個是真在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自己的靈魂」？但看守所的幹部們哪管得了那麼多，他們又不能變成飛蛾子鑽進犯人的肚皮裏聽壁角(聽壁角：偷聽的意思)。他們只看哪個犯人在捧著報紙特別是捧著毛著看，他們就說哪個是在認真改造。而假正經誰又不會裝呢？我就捧了本毛選第三卷在認真地看。

我看的是《整頓黨的工作》這篇文章。主席在文章中說「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我們究竟有多少人創造了可以稱為理論的理

論，算得科學形態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葉的理論呢？特別是在經濟理論方面，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從鴉片戰爭到現在，已經一百年了，但是還沒有產生一本合乎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的、真正科學的理論書。」這段話是主席40年代說的，那麼到了現在60年代是不是就有了一本「合乎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的、真正科學的理論書」呢？似乎仍然沒有。中國的經濟學家多於牛毛，他們的經濟理論著作汗牛而充棟，但哪個不是照搬蘇聯斯大林的一套。就是主席本人，除了有那麼一句「發展生產、保障供給」或者後來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經濟學外，在經濟理論上亦無任何可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相媲美的建樹。那麼憑什麼說毛澤東思想已經達到當代馬克思主義的頂峰，又憑什麼說毛主席已經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呢？至少在經濟學方面就沒有。

毛主席在文章另一個地方指出有不少的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書本上的某些個別字句看作現成的靈丹妙藥，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費氣力的包醫百病。這是一種幼稚者的蒙昧，我們對這些人應該作啟蒙運動。」但是啟蒙了幾十年，為什麼現在毛主席著作中的所有的「個別字句」都變成了包治百病的靈丹聖藥，甚至專門編了一本《語錄》來推廣這種靈丹聖藥呢？我們十億人民在毛澤東思想的培育下，究竟是走向成熟還是愈來愈陷入蒙昧之中呢？

你看我這不也是在學習毛主席著作嗎？而且學得相當的認真和仔細，但是這種認真的窮根究底的學習，除了使我對一些問題更加疑惑不解之外，又如何能夠幫助我「改造思想」、「認罪服法」呢？像我的問題，說來說去，無非是不贊成把毛主席著作中的個別字句當成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對問題多了一點獨立思考，怎麼就成了思想反動，就要逮捕監禁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我想通過學習我會慢慢解開的。而只要有足夠的書，看守所倒不失為學習的好地方。可惜可讀的書實在太少，我其實很想能讀幾本馬列的原著。

大概就在我向所長提出給家裏寫封家信的第三天，所長通知我上頭同意我寫信了。所長把幾張信紙和一支蘸水筆從門窗外遞進來，說：「你有個姐姐是不是？信就寫給你姐姐好了。你現在這個樣子，你父母的日子恐怕也不怎麼好過，暫時就不給他們寫信的好。」所長頓了

頓，又說，「聽上頭說你母親在外面一直不承認你有罪，堅持你是小將犯錯誤。你在信中要表明自己的態度，要認罪。這不但對你自己有好處，對轉變你母親的立場也有好處，否則對你母親也很不利，你在信中要掌握這一點。」

所長的話不能說不是出自一片好意，我點點頭說我會掌握的，於是便給姐姐寫了入獄後的第一封信：

姐姐：請給我送秋冬衣服來。

要內褲、秋衣、絨衣、棉衣和兩頂帽子。還有肥皂、牙膏、手紙、碗，以及鞋襪、被子枕頭。學習資料請多送些來。我還需要一套毛選，另請破費買一套兩卷本的《列寧文選》。另外我還需要一副眼鏡，度數和以前差不多就可以。

……我對毛主席，對人民犯了罪。我正路不走走邪路，炮打了我國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和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炮打三紅，成為反革命分子，我罪該萬死。由於資產階級世界觀在我頭腦中佔了統治地位，我站到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方面，墮落成為反革命派，而受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制裁，完全是罪有應得。你是個共青團員，一定要和我劃清界線，站穩立場，革命到底，還要多對父母做工作，指明我問題的嚴重性，要他們也與我劃清界線，決不能用感情代替理智……

弟弟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直到今天，我仍清楚的記得我那天寫這封信時極其複雜的心情。我寫信時拿筆的手像患了帕金森病似的顫抖不停，一邊寫字一邊流淚。我真的認為自己是反革命，罪該萬死，罪有應得麼？不，但我在信中又不得不這樣糟蹋自己。我什麼罪都可以受，但是我不能讓性格剛烈的母親因為不能與我「劃清界線」而受到牽連，因此我必須讓她知道我已徹底認罪，使她對我的問題不再抱「無罪」的幻想。但我又怎能甘心背上「反革命分子」的惡名，故一面承認因「炮打」而成為「反革

命分子」，一面又說是因世界觀的問題站錯了立場而「墮落成反革命派」。

我挖空心思地如此措辭，是因為意念中反革命派是思想上站錯隊的問題，而反革命分子則是有行動有破壞的「現行」，這兩者之間是有區別的。但我萬沒料到距我寫這封信整整一年之後，一天不多一天不少也正是九月二十七日這一天，我的案件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因有中央一份「指示」，我竟真的成了一個反革命派別的頭頭、一個龐大的「反革命地下組織」的「首犯」。不過那時我已經經過一年監禁生活的磨煉，已不再是一個容易被擊倒的學生娃娃，而是一個準備把牢底坐穿的「銅豌豆」了。我的神經已經堅硬到可以與任何罪名抗衡，哪怕那罪名是「欽定」的彌天大罪。

所長將我寫的信看了一遍，也沒說什麼，只是問了問帽子為什麼要兩頂？我說換著戴。其實我多要一頂，是準備送給同號子的糟老頭的。所長還說如果家裏不送東西來，你就再寫一封信試試。家裏人如果實在不來的話，所裏會發你幾件衣服過冬。我說家裏人見到信後絕對不會不來的。所長說還是要有個思想準備。「你父母不便來，你姐姐又可能不願意來。哎，人一出事，兄弟姐妹撒手不管的情況我們是見得太多了。」所長歎口氣說。我很感謝所長的關照，但他說的那個「如果」、「可能」則是多餘的。我家裏人接到我的信後豈會不管我，別說是進了監獄，就是下了地獄他們也絕不會棄我不顧。

信發出後的第三天，我姐姐便將我所要的物品送到了看守所。除衣服被褥和一些日用品外，還有一套兩卷本的《列寧文選》以及幾本馬列著作單行本，此外還給我配了一副眼鏡。這些東西全都裝在一個桶形的黃色帆布旅行袋內。這個顏色洗得發白、打有補丁、袋口沿圈釘有一串銅扣眼的旅行袋，是我父親49年南下廣州時在旅途中使用過的，現在它帶著親人的氣息送到我這裏，將伴隨我度過漫長的獄中歲月。



## 第十五章

# 形形色色的「同犯」

在看守所有段時間我常常琢磨，這號子裏犯人之間，究竟該以什麼樣的名義相稱呢？在學校讀書時彼此之間稱同學，如果是在單位工作，彼此之間可以稱同事，在社會上則認識不認識，見了面都稱同志就行。此外還有同行、同門、同仁等稱謂，但似乎都不適合獄中的案犯，為此我們號子裏的幾個人還特地討論過。

「我看還是應該叫同志！」12號非常自信地說，「為什麼呢？因為犯人之間也是反面意義上的同志嘛，像國民黨黨員之間還不是互相叫同志。」聽了12號的高論我不禁啞然失笑，說：「是不錯呀，孫中山還勉勵他的黨員信徒『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呢！不過那是另一回事。不信你就試一回，報告幹部號子裏有位同志有什麼什麼事，看幹部不訓你一頓才怪。」一直沉默寡言的18號也笑了，說犯人之間肯定是不允許稱同志的，稱同案大概還差不多。我說同案是指同一個案子中的人，這裏的犯人各是各的問題，談不上是同案。正說著縮在一邊一聲不吭的糟老頭子突然出其不意地怪叫道：「叫難友！」把我們都逗得笑起來。12號瞪他一眼說，「難友個屁，爛你個雞巴友。你還當是過去共產黨坐國民黨的渣滓洞呀，誰跟你難友？」老頭不吱聲，把我送給他的那頂帽子拿在手上彈了彈灰塵，朝頭上低低地一罩，遮住眼睛閉目養神。我們三個人終於沒有談出個結果，而我也無意深究。

後來有一次在放風場上集合，聽一個犯人介紹他自入監之後如何遵守監規服從管教，認真學習改造思想的體會。只見他先朝旁邊的管教幹部鞠個躬，然後轉過身來聲音洪亮地叫道：各位同犯們……原來

如此！我們犯人彼此之間叫「同犯」。同犯者，同為犯人之謂也，似乎也說得過去。只是這同犯有殺人放火、搶劫強姦的同犯，有思想反動、企圖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同犯，似不可一概而論。前者「刑事犯」，後者「政治犯」，性質大不一樣。而據專政機關的說法，那後一種犯是要從根本上搞垮人民當家作主的紅色江山，所以危害性尤其大，屬於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

我所在的這個號子四個人中，我是政治犯自不必說，那位12號也是犯的政治方面的案子，而不是我原先猜測的「男女關係」；18號照他自己偶爾透露的片言隻語，似乎也與政治沾邊，算他半個政治犯罷。只有那個糟老頭子，據說出身貧農且話都嚼不清楚，恐怕不會牽上什麼政治問題。這樣粗略一分類，我原先的估計都錯了。正是人不可貌相，我們這四個人中，政治犯倒是佔了一多半。

先說那位12號。12號姓張，叫張良楚，一個十分書香氣的名字。老張個子矮矮的滿口玉米牙，又鼓著一對金魚眼，未免其貌不揚，而他還偏偏穿一件說是出差太原時買的對襟小薄棉襖，那樣子簡直就像山西小縣城的一個村幹部。但這個湖南人的肚子裏有點墨水倒是真的，唐詩宋詞都背得一些，懂得的典故也不少，一手字更是寫得相當漂亮。老張是中專學歷，被捕前是省地質局的一名技術幹部，且有妻有子。但妻子除在他剛入監時送來過一次衣物用品，以後就再沒有來過。老張對此傷心得不得了，常眼淚汪汪鼻涕兮兮地苦著臉說，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這話真是一點都不假。那麼這個大難是如何引起的呢？相處時間一長我免不了問他。「那是我活該倒楣，」老張歎氣說，「辦公室裏的一張《長江日報》，我不曉得麼樣子一時痰迷心竅，在高頭隨手寫了幾個字，也沒在意就扔進了字紙簍裏。誰想到偏偏就有人把報紙翻出來看到了，說那幾個字是反動標語。科室一查筆跡，是我寫的，就把我關進來了。」

「是幾個麼字呢？」我興趣倒來了，「屬於惡毒攻擊之類？」

「倒不是，」老張搖頭說，「是寫的美帝國主義萬歲。」

「你怎麼想到寫這個呢？」我簡直覺得莫名其妙。

「我也不知道哇，」老張兩手一攤愁眉苦臉地說，「我幹麼子要美帝國主義萬歲？我一個貧苦出身的，好不容易上了中專，成了國家幹

部，美國佬萬歲對我有麼子好處？」我就問他那白紙黑字怎麼解釋？

「筆誤，肯定是筆誤囉。」他眼睛一瞪非常確定地說，然後又用拳頭敲敲腦門：「我想我本來是想寫美帝國主義萬死的。」「美帝國主義萬死？好像沒有這個說法吧，」我否定說，「只有說罪該萬死，沒有說誰萬死的，你說是筆誤恐怕是難得過關。」「就是囉，就是！」老張頭點得雞啄米似的，「提審員就硬說我是狡辯，態度不老實。我現在是黃泥巴掉到褲襠裏，不是屎也是屎。你說我現在怎麼辦？」

我搖搖頭，心想我也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如何知道這位「同犯」該怎麼辦？但即使是對照「公安六條」，他寫的那個也哪一條都對不上，頂多不過給他扣個美化帝國主義的帽子罷了。意識形態上的問題，何至於抓進來坐牢。我向老張說了我的看法。老張長歎一口氣，說提審員也認為問題並不算大。但交代問題老是反復，一時承認是有意寫的，一時又翻案說是筆誤，所以一拖就是三四個月，案子還是定不下來。「飯炒夾生了，」老張垂頭喪氣地說，「要是一開始就咬死是筆誤，只怕早就放了。或者乾脆承認是故意寫的，只要認罪，不翻燒餅，怕也早出去了，頂多戴個思想反動的帽子，總比關在這個鬼地方強得多。現在還不曉得拖到猴年馬月才能結案，活該倒楣呀。」

聽老張就這點莫名其妙的事情就一關三四個月，還不知哪天才能結案，讓人感到確實可怕。但老張關的時間還不算長，這間號子裏的「元老」是穿軍便服的18號，他來了差不多大半年。大概是在軍隊裏養成了保密的習慣，我幾次和他談這談那想掏他的話，都從他嘴裏掏不出半點他的案情來。只知道他是現役軍人，營級，在一個保密單位工作。有一次18號被叫出號子提審，我才從老張那裏對他的案子略知一二。據說此人畢業於哈軍工，從事導彈研究，因為在給老鄉的一封信中洩露了軍事機密而以洩密罪被捕。

「他也是該當要出事，」老張說，「他寄給老鄉的信因地址不詳又給退回來了，結果被組織上發現了信的內容。領導本來還想保他，念他是個人才。誰料他在停職反省期間又去跳河，頸子上還吊了塊大石頭，但他懂水性，還是沒有淹死，就被送進看守所來了。也真是，反省就反省嘛，為什麼要跳河呢？不就是違犯紀律洩了點密嗎，又不是

做了麼事見不得人的事。」老張頗為惋惜地說。「其實連密也沒有洩，」我說，「信不是退回來落到組織手上了嗎？至多也只能算個洩密未遂。何況18號又肯定不是有意洩密，領導對他印象本來不錯，到頭來還是會從輕發落。估計最多判他個一兩年，可能還是緩期或監外執行，也可能關些時後教育釋放。」我們對18號的前景估計得十分樂觀。

但是我對這個案子還是心存疑惑：既然信因地址不詳被退回，怎麼就會被領導拆開看了呢？不管是哪級領導，私拆他人信件，本身也是違法的呀。難道是領導早就懷疑他會洩密？好像也不合情理。哎，管這麼多幹什麼，自己一屁股屎，還管人家腳洗得乾不乾淨，反正他的問題比我輕得多。不料18號提審回來後卻長吁短歎，神情憂鬱，沮喪地說，「可能要判了，不會少於三年。」

自家有病自家知。他雖犯了洩密罪，但畢竟沒有造成後果，為什麼還會一判就是三年，我們真是搞不明白。個中原由，恐怕也只有他自己清楚。不過憑我的直覺，總感到這位年輕的軍人的內心，有著一種難以啟齒的隱痛，這種隱痛時時刻刻都在折磨著他的靈魂。不過我那時還是很尊重他的，就憑哈軍工、營級、導彈這幾點，就令我這個學潛艇的學生欽羨不已。有一天晚上我睡不著，見他也翻來覆去睡不著，就把自己的案情「竹筒倒豆子」，全倒給了他聽。我訴說了自己的苦惱，然後向這位老大哥請教如何克服這種像蛇一樣纏身的無可擺脫的痛苦。其實我知道他也痛苦得不得了，我不過是「病急亂投醫」唄。

18號長長地歎口氣，說他其實比我苦惱得多。「我三十歲不到就已經是正營級，又是單位的業務尖子。如果不犯錯誤，用不了幾年就能升副團。現在一切全完了。我愛人也是部隊上的，在蘭州，已提出離婚了。我以後刑滿釋放也只能回河南老家種地，反正全完了。」這回倒是我來安慰他了：「犯一回錯誤，一生就會給毀了那倒也未必。你年輕又有技術，以後總有用武之地。只是你不過出了這點事，妻子就要跟你打脫離，這做妻子的是不是也太無情無義。三年算什麼呢？就等不了三年？人家《劉三姐》裏面三姐和牛二哪個九十七歲死，奈何橋上還要等三年呢！」

18號聽我這麼說苦笑了一下，說也不怪他的妻子，主要怪他自己，是他自作孽。他反過來又安慰我，說中央有政策，對一些犯錯誤

的學生領袖要想辦法予以保護。他認為把我抓起來可能也是一種保護，免得我陷得更深。「保護？」我當然寧願真是如此，但「曾劉首長」對我這個「學生領袖」哪裏有半點保護的意思。如果真是想保護我，他們就不會指示《新華工報》發表那種給我無限上綱上線的文章，也不會處心積慮要從我口中逼出「惡攻」的證據，更不會在證據未查實的情況下，急急忙忙就將我逮捕。不過逮捕之後再要「陷得更深」倒是不會了，就權當是保護起來了吧，我聊以自慰。

從鋪的一側傳來了糟老頭子的呼嚕聲。呼嚕聲一串接一串北京糖葫蘆似的，一點破綻都沒有，響得令人心煩。在我們四個人中間，他是睡得最安穩的一個。和18號一樣，他也不大透露自己的案情，老張說他是老奸巨滑，狡猾狡猾的有。「樹老根多、人老話多」這句俗話，對他卻不適用，他是人老軒多。他的另一特點是人老屁多，白天吃過飯後就迫不及待地放屁，接二連三放禮炮似的，放得號子裏臭氣熏天。據老頭自己說是腸胃不好，吃多了不消化。那就少吃一點好了，也不，老頭子深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豈能輕易好事他人。糟老頭子儘管從不主動談自己的案情，哪怕我和老張談得吼，他也埋著頭決不參與。但畢竟人老了不像18號那樣捱得緊，有一回提審回號子後，被老張問得緊了，慌亂中竟一語洩漏天機：

「醜死了，醜死人呢，不提它。麻繩穿豆腐，提不得哩！」

老張登時金魚眼瞪成了牛眼，抓住戰機窮追不捨：「醜什麼？怕什麼醜？做都做了還怕醜？現在就是要脫了褲子割尾巴不怕醜！自己不好割大家幫你割。是不是姦污婦女？」老張B52式地狂轟一通，還真把老頭子轟昏了頭，終於坦白交代說是用糯米餳糖把個小姑娘哄進了房。老張趕緊趁勝追擊，問他和小姑娘上床沒有？老頭子連忙擺手說沒有沒有。

「你哄鬼喲，沒上床會把你抓起來？到底上了沒有？老實講。」老張連唬帶詐，老頭子慌不擇言，終於承認「上了」。老張又問他脫了小姑娘的褲子沒有？老頭子說「沒……沒有，後來，脫……脫了。」糟老頭雖然步步設防，但終抵不住老張的步步緊逼，防線已一觸即潰。老張問他脫了之後又麼樣？「睡在旁邊……沒有麼樣。真的，沒有麼樣。」老頭子吞吞吐吐，還想守住最後一道防線。

「你的褲子脫了沒有？」

「脫……脫了。」老頭子猶豫了半天終於說。

「兩個人都脫光了，你還不幹那事？」老張大吼一聲，「還不趁早交代，爭取寬大處理。」

糟老頭全身抖得篩糠一般囁嚅道：「是，是幹了……想幹沒有幹成。那……那話硬不起來，進不去，真的，軟不拉塌塞不進去，我就用手摑……」「不要再說了！」一直坐在鋪上一聲不吭的18號突然狂暴地大叫一聲，極厭惡地制止了這場「誘供」。老張與老頭的對話也就此戛然而止，18號卻痛苦地雙手抱頭，把腦袋埋在雙膝與胸口之間。我見狀腦子裏突然一閃念：莫非兩人的對話觸動了他的哪根神經？

「那姑娘伢是個天生的小妖精。」這之後糟老頭倒是不再三緘其口，反而提起這件事就喋喋不休，並且對小姑娘恨得咬牙切齒。「我就曉得她是狐狸精變的專門勾引人，勾上來了你躲都躲不掉，非引你上床不可，害你脫不了糊。」聽他說得眼淚汪汪的，像真是被「狐狸精」害慘了，我就問他那女孩幾歲了？他說七八歲。我說七八歲的不懂事的小姑娘會勾引你？你自己不是東西，七老八十的人了，怎麼連畜生都不如？這個糟老頭子後來是被從重判了10年，送到勞改隊去了此殘生。而18號也正如他自己所料，被判了三年徒刑。

而據後來轉號子轉到我們號子裏來的一個看守所資深犯人說，這位18號根本不是為了什麼「洩密罪」進的監獄，而是因為誘姦了同事家的十歲的幼女。單位的領導出於惜才，也確實想把他保一保。但民憤難息，而他又吊塊石頭去跳河，自絕於組織，只好將他扭送專政機關了事。既然做了這種下流而傷天害理之事，也就怪不得他的老婆要和他「一刀兩斷」了。但我看18號還是有點羞恥心的，所以也就難怪他聽不得糟老頭子的「現身說法」。他既然還知恥就還有救，儘管摔了一大跤，畢竟還不是那種不可救藥的社會渣滓。憑他的學識和技術，他出獄後很快就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至於那種社會渣滓，也就是社會上所謂的流氓，這監所裏也關了不少。我所在的這間號子就曾經進來過一個年級輕輕的流氓，姓汪，這個不折不扣的下流胚，一進號子就大言不慚稱自己是犯的「花案」。

「你就是魯克思魯博士吧，哈哈，汪某早就聽說你的大名了，如

雷貫耳。」汪犯進得號子後，雙手抱拳與我打招呼，並且封我為博士。我打量了他一下，只見此人面容消瘦，瘦骨嶙峋，站無站相，坐無坐相，舉手投足，無不透出一付玩世不恭的樣子，用通俗的話說叫做流裏流氣。

這個汪某和一般的流氓大概也沒什麼兩樣，較為特別的是他並不諱言自己是個流氓。

「一些人總是把流氓小偷相提並論，其實完全不對頭，流氓小偷根本上是兩回事嘛。」汪振振有辭地為「流氓」正名說。「小偷偷東西，偷偷雞摸摸狗、最沒出息。流氓不一樣，講排場、有臉面，江湖上以義字為先。過去黃金榮、杜月笙都是上海灘上有名的大流氓，其實都是人中豪傑，連蔣介石都敬他們三分。蔣介石就是個流氓頭子。老毛頭也是一樣，江青就是他的小老婆嘛，曉得他玩過幾多女人。」

我是頭一回聽人叫偉大領袖「老毛頭」，什麼小老婆這種話更是聞所未聞。從這個流氓嘴裏出來的這些話，才真正稱得上「惡毒攻擊」，怎麼不把這種人當政治犯抓？但汪某人顯然對政治毫無興趣，他感興趣的只是「男盜女娼」，嘴邊的口頭禪就是女人如何如何。「女人生就是給男人玩的，一生不日三個尻，閻王見了也不依。你玩過女人沒有？」他問我。我搖搖頭。「連女人都有玩過就坐牢，你算是白活了。」然後他便津津有味地談起玩女人的事。

「會玩的玩嫂子，不會玩的玩婊子，」他說，「玩婊子邂逅，容易得病，還要花錢。玩嫂子又乾淨又保險又不用花錢，搞不好她還倒貼。你莫看街坊上的小嫂子一個個正兒八經的，其實都是假正經，心裏頭欠那事欠得要死。只要你攏邊，保證一貼就上。」說興奮了就流裏流氣地唱：嫂子的小肉鍋呀，煨我的小豬腸呀……老張聽他唱得忘乎所以，便嘲笑說那你是煨小豬腸煨進來的囉？

「那倒不是，」汪否認說，「搞嫂子又不犯法，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何況嫂子們是結了婚的，而我是童子伢。一定追究起來，倒是嫂子們壞了我的童子身，憑什麼抓我？」

「那你這個『童子身』就不是搞嫂子進來的囉。」老張改口說。

「那當然了，」汪點點頭說，「我的案子也是一言難盡，總之色字頭上一把刀，從來都是英雄難過美人關啦。」汪居然以「英雄」自居。而後

來終於弄清楚，這位「英雄」是因為與幾個哥們輪姦北京南下串連的女學生被抓起來的，那是有一次汪某吹牛吹忘了形，無意中抖出了自己的把柄：

「那些苕姑娘佢完全有出過門，一點社會經驗都沒有，隨便幾句話就哄上了手。」汪眉飛色舞地說。「幾個小姑娘都才十三四歲，還戴著首都中學紅衛兵的袖章哩。在武昌火車站下的車，到處問接待站在哪裏？我們幾個人也戴起紅衛兵袖章，說帶她們去。把她們帶到胭脂路七彎八拐，拐進個巷子裏找間空屋子就把她們弄了。個個都是原裝的呢，一杆子捅進去血直飆。有個白皮細肉長得最清爽的，我們四五個輪到上，硬是把她整熄了火。」

「你們也太殘忍了，下得了手。這小姑娘怎麼受得了？」老張說。

「老子們的雞巴要過癮，管她哪個受得了受不了。」汪惡狠狠地說，一臉的凶相，流氓本色畢露。這種人怎麼不早點拖出去斃了？和這種流氓雜種住在一間屋子裏，令人成天都感到壓抑，而這個流氓又偏偏特別喜歡賣弄他的流氓本事。

「連女人那玩藝都有摸過就坐牢，你可真是倒血楣。」汪有一天又訕笑著對我說，「沒有吃過肉，未必連豬在地下跑也有見過麼？那我告訴你女人的那玩藝是個麼樣子，讓你開開眼葷。」汪邊說邊將一隻胳膊一夾，亮出道夾縫，說就跟這縫縫差不多。說著又伸出另隻手的大姆指往縫裏戳，嘴裏還念念有辭：「第一下戳進去，不知不覺；第二下戳進去，又癢又好過；第三下戳進去，我的乖乖好疼喲。」這大概就是汪所津津樂道的「市民文學」了，和《紅樓夢》中薛蟠唱的那個「女兒樂，一根雞巴往裏戳」是一路貨色。只是汪不像薛蟠那樣有錢有勢有門第，他不過是武昌胭脂路一帶貧民窟裏長大的個小混混。

汪混混生得十分瘦，這也許和他自小生在貧民家庭營養不良有關，也許與他後來的放浪形骸有關，但也許與他偏好素食也有關。他並不信佛，也不是回回，卻稱自己從不食肉，特別是豬肉。他說他屬豬，「聞到豬肉就翻胃。」看守所裏伙食很差，一月難得吃上一回葷，汪頭一回碰到吃肉時還真的不伸筷子，很大方地把碗裏的肉讓給我們幾個分享。但是到第二個月吃肉時，他那油水日漸稀薄的肚皮，就再也抵擋不住豬肉的誘惑了，於是慨然開戒。而這一開戒便不可收拾，

天天叨念下個月幾時吃肉。每次打牙祭時，他三下五除二一碗肉就下了肚，然後便十分眼饑地把眼珠子落到我們幾個的碗裏，恨不得從我們碗裏沾起幾塊肉到他碗裏才好。有一回吃肉時他終於忍不住了，竟宣佈說因為頭一回他的肉是分給我們吃了的，所以現在應該每個人拿出幾塊來湊一份還給他。老張說有這個理嗎？汪把眼珠子一翻說，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麼樣沒這個理，未必我那碗肉是白送給你們吃了？厚顏無恥而又橫蠻得可以，自然犯不著和他計較，我們就各自沾了幾塊肉到他碗裏了事。

但幾個月後有一次他又不吃肉了，記得是五一節那天，中飯時每人一碗紅燒肉，他勉強吞了兩塊便放了筷子，說是噁心、想吐、要拉肚子，話沒說完便直奔馬桶打開桶蓋嘔吐起來。吐完之後又要拉，愁眉苦臉地坐在馬桶上屁眼直打鏢槍，弄得滿屋子臭氣熏天。大家哪裏還吃得下去，只好把碗合上靜待其拉。總算等到汪拉完稀提起褲子蓋上了馬桶，大家打開飯鉢正要吃，卻見汪又邊扯褲子邊奔向馬桶，開始了新的一輪狂轟亂炸。我們只好又一次合上碗鉢，無可奈何作壁上觀。如是者三，弄得大家全沒了口味。汪似乎也有點不好意思，一面抱怨自己肚子不爭氣，一面假惺惺地要把碗裏的肉分給我們。但有了上回「殺人抵命、欠債還錢」的教訓，誰還敢領他的情，他便把肉留在自己杯子裏放起日後再用。

監所裏肉食之稀罕自不必說，就是蔬菜也不多。市場上白菜便宜時，就一連幾十天盡吃白菜；蘿蔔便宜時就一連幾十天盡吃蘿蔔。本來伙食費就只七塊錢，這倒也罷了，問題是白菜也好、蘿蔔也好，給你的那一份根本就不夠吃，菜裏也極少見得到油水。短時間吃這種伙食倒無所謂，時間一長肚子裏掏空了油水，成天就搜腸刮肚地感到餓。記得狄更斯在他的小說《遠大前程》中，曾經對十八世紀英國的習藝所裏的飲食，有過十分生動的描述：那些用來進餐的盤子進過餐後是用不著洗的，盤底都被饑餓的兒童舔得精光。實事求是說，我們在看守所裏還沒有饑餓到這種地步，但菜碗不用洗是真的，一碗菜完了哪怕殘湯裏還看得見一絲油珠子，也是一定要用開水把它蕩進嘴裏的。而每一次吃完飯後，也真的很想像那位孤兒奧里佛一樣，端起吃完的飯碗向管理員乞求說：Give me a little (再給我一點點)。

當然這「一點點」從管理伙食的人手中是永遠不可能得到的，除非同號子的犯人中有誰吃不完他那一份。這種機會也不是不存在，例如我在進號子之初，好長一段時間就完全吃不下飯，飯菜大半都給同號子的人分享了。不過一個月後我便也徹底地被饑餓征服，飯菜愈來愈不夠吃，一天到晚老是餓得發慌。那種饑餓感比當年「大躍進」之後的三年「自然災害」帶來的饑餓感還要厲害——那時還有「瓜菜代」，而這牢房裏連「褲腰帶」都不准有，還哪裏去找「瓜菜代」？

也許是天可憐見我饑腸辘辘，有一回曾經送了個「飯碗」到我們號子裏來，所謂「飯碗」，也就是個飯量小的老頭，一餐吃不完二兩飯，菜也吃不完。也許是覺得我面善，也許是見我是個學生，這老頭進號子後主動地把他吃不完的飯菜全趕給了我。那時汪混混也已在我們號子，見老頭趕飯給我而不是給他，心中極不是滋味。但他只用眼角瞥了老頭一眼，似乎毫不在意，心裏卻早打起了算盤。第二天一早，汪居然破天荒把自己剛買的一支中華牌牙膏扔給老頭，說是「同船過渡，五百年修。這個地方東西還分什麼彼此，拿去用就是了。」接著又讓出自己強佔已久的桌椅，給老頭吃飯時用，還送給老頭毛巾、肥皂。老頭一時受寵若驚，汪則殷勤有加，孝敬老頭像孝敬祖宗似的。如此一來二去，老頭吃不完的飯菜自然全成了汪的盤中物。

「投桃報李」乃人之常情，自然也不必對他們的交易說三道四，何況這一老一少還蠻談得攏，頗有一些「共同語言」。老頭似乎也是在江湖上混過的，懂得好多江湖上的規矩，諸如南拳北腿之類都熟悉得很，而談起女人來二人更是臭味相投。老頭說他年輕時一晚上嫖過四個女人，汪說那算什麼，他一晚上最多可以放它七八炮，還說那最後一炮竟是炮的一泡尿，惱得那女人臭罵了他一頓。聽汪這麼一吹老頭只好甘拜下風，且似笑非笑不知是挖苦還是奉承地對汪說：「小兄弟豈不是賽過一頭驢？」汪聽了後就非常之得意。

但是汪與老頭的「蜜月」似乎並未維繫多久，原因就在於老頭的飯量慢慢變得大了，而匀給汪的那一份則日益減少，汪因此覺得吃了虧。汪於是開始要老頭替他買這買那，肥皂吶手紙吶沒完沒了的，老頭終於知道了汪的厲害。忍氣吞聲了一陣之後，老頭終於忍無可忍，說汪欺人太甚，而汪又豈是省油的燈，結果二人大吵了一頓。爭吵的

高潮是算總賬，算來算去，把汪當初送給老頭的牙膏算進去一扯平，老頭還吃虧三分錢。然而汪眼白一翻，理直氣壯地說那支牙膏用完了，皮子還能賣三分錢呢，一句話嗆得老頭子差點沒有憋過氣去。老頭仍不服氣，說「那這多天白吃我這麼多飯菜麼樣講呢？」汪回答說那是你吃不完的剩飯，我是在幫你揩屁股。老頭無話可說只能自歎弗如。

「這老東西你莫小看了他，」有一回汪在老頭被提審時背地裏評論說，「傲得很，是外頭老玩的。我跟他說切口，你聽不懂吧，那是只有圈子裏的人才懂的。本來江湖上翻了船，大家都相幫點，老頭子偏偏老不熄火，還敢在老子面前翻揚。就算你格子再老，也已是昨日的黃花下山的日頭，還有麼事翻頭。連老毛頭都說這世界歸根結底還是我們年輕人的，希望寄託在年輕人身上嘛，他老狗日的秋後的螞蚱還蹦個屁！」汪因為在「老玩的」面前栽了面子，所以耿耿於懷不斷地糟鄙老頭子。還好老頭子在接連幾次提審後便出了號子，是判是放誰也不知道，汪則巴不得老頭子頂好是判了個無期。沒有了對頭，汪倒是頗感寂寞了一段時間。但不久號子裏又關進來了一個孱弱不堪的「政治犯」，汪於是又可以重振雄風。汪在「政治犯」面前總是優越感十足的，何況新來的又是一個典型的老實砣子。

老實砣子姓游，三十來歲，江蘇丹陽人，捕前在漢口和記蛋廠做打包工。游是個單身漢，有個表姐在武漢工作，算是他在這裏唯一的親人。游進得號子來大氣都不敢出一聲，縮手縮腳，低眉順眼，一看就是個與世無爭的人，怎麼也成了「政治犯」？

「說說吧，犯了哪門子案子進來的？」汪混混靠著牆，兩手交錯抱肩，兩腿絞成根麻花，像公安局盤問嫌疑犯似的問游。游站在屋子中間兩手垂著渾身發抖，像被汪剛剛現場拿住了贓的賊。

「說呀，」汪皮笑肉不笑地逗著游，「天大的事對雷子（指公安）可以隱瞞，對我們不必隱瞞。進了這間號子，就都是一家人。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我們現在就都是你的朋友。就像老毛頭說的，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汪說著就說走了樣，主席語錄也敢亂引一氣，我禁不住掩著嘴好笑。見游被汪問得楞頭楞腦，我便插話說：「看你也不大像個幹壞事的人，怎麼會進這個地方？」

「我是沒有幹過壞事的，從來都沒有，」老游神情憂鬱，滿腹委屈地說，「我是覺悟不高，說錯了話。但我只是想開個玩笑，水準低就把話說岔了。」我便問他究竟說錯了什麼話？

「我說我們車間的黨支部書記是劉少奇的黨員，說他只配戴劉少奇的像章。」

「哈哈！戴劉少奇的像章。哈哈！你個游……油葫蘆說話真是過癮得很。」汪在一旁聽得哈哈大笑樂不可支，我卻感到汗毛倒豎，說，「就憑這句話就把你抓起來了？」

「哎，算我倒楣，是書記蓄意要整我。」被汪混混稱作「油葫蘆」的老游鎮靜一些了，把自己簡單的行李鋪在床板上搖頭說。「其實我和支書還是江蘇老鄉，平時也還合得來。運動開始時他參加老保，我也跟著他站錯了隊。七二〇後他反戈一擊表現特別積極，又變成了造反派。當了造反派就反過來整原來一起的保保，我看不大慣，就和他疏遠了一些。前幾天為點點小事我們倆爭吵起來，我指著他胸前的毛主席像章，說他不配當毛主席的黨員，只配當劉少奇的黨員，只配戴劉少奇的像章。我說這話其實是半認真半開玩笑的，當時周圍看熱鬧的也沒有哪個說什麼，有的還在旁邊蒙著嘴笑。不料過了兩天，廠裏的軍代表找我談話，說我是在放毒，是誣衊黨員幹部，是給劉少奇塗脂抹粉，讓我反省。反省才一個晚上，今天就讓群眾扭送進來了。哎，今年是我的本命年，就知道是逃不過這一難的，就是繫紅腰帶也沒有用。那老鄉是太狠心了，非把我整到這地方來才高興。」

說到傷心之處，游垂著手坐到鋪上淒然淚下。看來這位老游比老張更冤。老張還畢竟是寫了個「美帝國主義萬歲」，白紙黑字拿斧頭都砍不掉。可這位老游就嘴邊一句信口開河的玩笑話，也便成了「反革命」，這「反革命」豈不是要多於過江之鯽？而老張聽老游一說，也不再長吁短歎了，他發現這天下比他冤的還大有人在呢。

過了幾天老游被叫出去提審。老張問我老游會不會判刑？我說判不了，拐主要是拐在他單位有人整他，搞什麼「群眾扭送」。公安機關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只好先收進來「審查」幾天，以後肯定還是收回原單位。但汪聽了撇撇嘴，顯出非常不屑的樣子說，油葫蘆的話你就信了？他就憑那句話會抓進來？這只能哄著，這傢伙定有別的說不

出口的名堂。我說莫瞎猜了，人家一看就是老實人。現在為句把話就倒楣的人有的是，不過像老游這樣胡裏麻裏就送進來坐牢的倒不多見。但說穿了也就是那麼芝麻綠豆大的事，過不了幾天肯定放人。

「放？恐怕冇得那簡單。」汪鼻子一哼說，「你們真以為油葫蘆老實，笑話！你們眼裏沒水，看不出他是裝老實。他的案子我八成摸準了，肯定是誘姦幼女沒有少。」

「誘姦幼女？你麼樣知道？」我反駁說，「還八成摸準了，你摸準個狗屁！」老張也說汪不能亂說。「我怎麼會亂說？這種事情我看得頂準！」汪自作聰明吹噓說，「第一憑他的眼神。油葫蘆眼神混濁無光，不像是有破過身的童男子，肯定搞過不少女人；第二，他一人在外地，又沒有成家，還不整天想那事，不搞皮絆才怪，除非他不是個正常的男人；第三，他一個窮工人，長得又醜，說話又笨，鼻樑上還一道大傷疤破了相，哪個黃花姑娘會找他？認得的媳婦嫂子他又不敢去勾，你說他慄急了麼樣辦？只好找不懂事的小姑娘伢下手。」汪見我們都不信他這套推論，便打賭說，「要不信等他提審回了，看我有法子讓他說實話。若是掏不出實話，我情願輸你們一鉢飯。」不多久游回到號子，汪也不管有沒有人願意和他賭，就真的學起樣板戲中那個刁德一，「旁敲側擊將他訪」了。

「喂，油葫蘆，提審提得如何呀，馬上就要放你回廠裏了吧？」汪向我們擠擠眼說。

「沒有，」游老打老實地說，「恐怕是回不了廠了，廠裏已經不要我了。」

「那當然啦，問題本來就不是那句把兩句話嘛。哈哈，你那天還真把老張和魯克思都哄信了。」

「我可是沒有哄哪個。」游不知就裏，直瞪瞪地望著汪，又望望我和老張。

「哄不哄其實都無所謂，俗話說逢人只說三分話嘛，」汪作出一付大度的樣子，「不過在我們這些難友面前，也把自己案子捂得滴水不漏，那是不是也太不夠朋友了。其實我們都是蠻夠意思的，你把實情擺出來，大家可以幫你商量一下對策嘛，何必信不過朋友？」

「我是沒有別的事，就那，你們都知道的那些。」

「那不見得吧！哈哈，老游，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你經常買些棒棒糖、水果糖、麻烘糕、山楂片都是搞麼用途呀？糖果的味道肯定不賴吧，街坊的小女伢們都跟到你跑是不是？哈哈，我說老游你他媽的悶頭雞啄白米，手段蠻不錯嘛。」

「你都在說些什麼呢？」游愈聽愈不對味，警覺起來。

「說麼事你未必真不懂，何必裝佯呢？」汪眼見游「裝聾賣傻」不上他的鉤，將使他輸掉寶貴的一鉢飯，便只好把話乾脆挑明：「你油葫蘆油頭滑腦的，老牛啃嫩草，還蠻會哄小姑娘伢呢。老實說你一共哄到手了幾個？」

游急了衝著汪吼道：「你不要胡說八道好不好，哪個哄過小姑娘哪個遭天雷打！」

汪也急了，跳起來指著游罵道：「你毒心爛肝就是遭天雷打！」

「你個臭流氓才毒心爛肝遭雷打。」游忍無可忍反詰說，真是兔子逼急了也要反咬一口。

「麼事哇我是臭流氓？」汪勃然大怒，指著自己的鼻子咆哮起來，「狗娘養的老子不比你香一百倍。你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階級敵人，頑固不化的花崗岩的腦袋，你也配罵老子？你褲襠裏的那玩意也不撒泡尿把你照照。老子點把點的作風問題，怎麼說也是人民內部矛盾。連幹部都說老子和你們這些反革命是根本不同的性質，屬於失足青年，以後還要回到社會上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而你算什麼呢？階級敵人、專政對象、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支腿，永世不得翻身的。你死到臨頭還不曉得天從哪頭亮，洞庭湖裏吹喇叭不知哪裏哪，你還敢跟老子犟。」

汪的一頓劈頭劈腦的臭罵，罵得老游頭都抬不起來，只好偃旗息鼓掛免戰牌，讓汪繼續一個人罵。等汪終於罵得沒勁了，我便開口挖苦汪賣瓦盆似的一套接一套蠻有口才哩。「不過，」我冷冷一笑說，「你現在反正是欠我一鉢飯。」汪本來聽我說他有口才，正得意地吹起口哨來，待一聽我提到欠一鉢飯，頓時臉色一沉，口哨也吞到喉嚨管裏了。其實我也不過說說而已，將他一軍，要真想從他口裏挖出一鉢飯來，那怕是比虎口拔牙還難呢。

過了一些時，地質局的那位老張走了，他是被喊出去提審後，隨

幹部返回號子取走他的衣物離開的。清行李時我悄悄問他怎麼樣？他小聲說回單位。我很為他高興，並且摸到一點大致的規律，就是判斷放人還是判刑要看情況。提審後自己回號子捲鋪蓋走路，那多半就是放了；倘若提審後人不再回來，由幹部進號子替他捲行李，那肯定就是判了。老張的釋放於老游應該是個好兆頭，因為游的案情顯然比張還要輕一些。游聽我一分析，心情也就輕鬆了不少。但是汪不高興，老張這樣和美帝國主義一鼻孔出氣的「反動分子」都放了，而他這位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失足青年」卻仍關在這裏，那當然是想不通的。

汪對此不高興就不高興好了，但接著發生的一件事卻又讓汪高興起來。大概是幹部通知了廚房我們這個號子走了人，但忘了通知送飯的幫廚，因此中午發飯時，幫廚的照例往我們號子裏發了四鉢飯。汪接過飯鉢，頓時眼睛像皮靴擦了油似的一亮，「嗨，今天多一鉢子飯菜，相因（湖北方言：好處、便宜的意思）來了。」汪手舞足蹈地說，忽然想起還欠我一鉢飯，便假惺惺地說，「這鉢飯就算是我賠你的如何？」我將手裏的筷子一擺說：「算了，我不要，你送出去好了。」汪說，「那我不再欠你的飯了是不是？」我說就算是吧。但汪並不將飯送出，卻建議三個人分了。我聲明不要，但游經不起「失足青年」的誘惑，吃了汪劃給他的三分之一，汪則將其餘三分之二一掃而空。掃空之後又為如何處理飯鉢子發愁，因為二保長已經發現少了一鉢飯，正一個號子一個號子追問誰多領了一鉢飯。怎麼辦呢？將多出的這個鉢子摔碎扔進馬桶，扔到窗外似乎都不妥當。汪急中生智，想到把床板抬起來，將鉢子藏進去了事，於是和游使出吃奶的力氣搬床板。然而床板就是巍然不動，倒是把肚裏的飯菜先消耗了兩成。

於是汪坐下來捧著下巴另想主意，但主意尚未想出來，那位二保長已經追查到我們號子來了。二保長哐的掀開門窗，惡狠狠地問道多拿了鉢飯沒有？汪搖頭說沒有。二保長又順序往下一個一個號子地問，問了一圈後一無所獲，大概想起我們這個號子是剛剛走了人的，遂把懷疑重點放到了我們這間號子。二保長走過來仍是惡狠狠地問我們號子到底有沒有多拿了鉢飯？汪仍是搖頭堅持說沒有。二保長半信半疑，又跑到另外幾個只關了三個人的號子問，問來問去最後還是把

目標鎖定到我們這一間。他知道汪是個滑頭便不再問汪，而是將老游喊到門口的小窗前單獨問話。

「說！多領的鉢飯哪裏去了？快說！」二保長氣勢洶洶地逼問道，一雙眼睛瞪得像副牛眼，滿腮幫子的鬍茬子根根都豎起來。老游嚇得全身發抖，正眼也不敢看二保長一下。二保長又狠狠地追問了一聲，老游仍不做聲，但臉都發白了。二保長見老游這個樣子，抖抖索索又不開口，知道有戲了，愈發吼得厲害。老游一個老實砣子，何曾見過這種仗勢，且天生的不會撒謊，經不起二保長的連唬帶詐，終於囁嚅道：「吃了。」話音未落那二保長像挖出了個金娃娃似的，竟樂得拍起手來，連叫「哈，找到了，找到了。」隨即一轉身就連跑帶蹦地去報告幹部，邊跑邊報功似的喊：「幹部，報告幹部，是這個號子的人吃……吃啦！」惹得走廊上的班長都搖頭好笑。

很快就有幹部過來進我們號子問清了情況，對汪和游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處罰，只是告訴他倆，開晚飯時他們只能合用一鉢飯。游自然最慘，他只不過多吃了一鉢飯的三分之一，但卻要賠進半鉢飯，而且還被汪罵了個夠，說他不中用、骨頭軟，根本上是個當叛徒的料。我看不過去，就說游即使不承認，最後一搜號子，還是會把鉢子搜出來，事情更不好收場。汪說若是搜號子搜出來，那又是另一回事，搜出來之前就決不能繳械投降。而況他油葫蘆真是有種的話，就該一個人把擔子挑起來，就不應該幹部來問時把他汪某人也水出來，壞了江湖上的規矩。汪講得振振有辭泡沫直飛，但我想游本來就不是你們江湖上的人，他為什麼要遵從你江湖上的規矩？何況貪吃那鉢飯的主謀也是你姓汪的，大半鉢飯也是你吃的，游不過是「分一杯羹耳」，為什麼要一個人扛擔子給你墊背？

汪當然不會這樣子想，飯鉢事件之後益發變本加厲地作踐老游，游完全成了汪的下飯菜。游好在是個逆來順受的性格，任汪怎樣欺負都是一聲不吭，而且盡可能不招惹汪。但一間號子就那麼十一二個平方米，一個鍋裏的勺子鏟子還要碰磕呢，同一間號子早晚都關在一起，難免總有衝突。而每次汪和游發生了衝突，總是汪佔上風，凶得不得了。游則地地道道一個窩瓢廢，從來都只有受氣的份。

有一次號子裏輪到老游值日，開飯前由老游負責把幾個人的杯子

一齊從門窗裏送出去打水。但杯子伸出窗子時外頭二保長沒接穩，剛好將汪的那個洋瓷杯子掉到地上，結果杯子摔掉了一點瓷。杯子本來就是個舊的，也已經掉了不少的瓷，但汪硬說游是故意使壞，非讓游買個新的賠他不可。游不肯，汪便威脅說等下次他值班，照樣也會在送杯子出去時「失手」，將游的杯子摔破它。游的杯子基本上是新的，上面還有和記蛋廠建廠多少周年紀念的字樣，是游視為有紀念意義的珍愛之物。為保住這個杯子，游只好打報告買了個新的賠給汪。

見游軟弱可欺，汪此後更是肆無忌憚，巴不得騎在游的脖子上拉屎拉尿才好。有一天汪看了幾頁毛選，便向號子裏的另一個新來的犯人大談他們流氓的「革命性」，說毛主席說了像上海的青幫洪幫都很勇敢能奮鬥，是一種革命的力量。聽汪斷章取義大放厥詞，我便對游說以青洪幫這種流氓幫會對社會的破壞性，若論革命那絕對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不可能成為真正的革命力量。游是個文化不多又無主見的人，我說什麼他都唯唯諾諾，自己並沒有什麼看法，而我這番話其實是說給汪聽的，汪一聽就明白了。汪見我跟他唱反調，不給他這位「革命的力量」面子，心中自然是老大的不快，但他吃柿子找軟的捏，便找游的歪。汪走到游跟前一把抓住游的衣領子，說游是不是瞧不起他？不等游分辯，他一拳頭就朝游的眼睛揮去，游的一隻眼頓時腫得像個核桃。

游大聲哭起來，跑到門口喊報告。聽說號子裏在打架，一位剛從部隊調到看守所來「支左」的姓馬的軍代表過來處理。(原來的所長已經靠邊站了)他將汪和游一起叫到辦公室去詢問情況。不到一刻鐘的功夫兩人就回來了，先進號子的是汪，得意洋洋的那副神氣，簡直就像拿破崙從科西嘉島流放地凱旋回到了愛麗舍宮一樣。緊跟著從門外踉踉蹌蹌跌進號子的，是鼻涕眼淚糊得滿面的油葫蘆，居然手腕上扣了副手銬。鬥狠打人的贏了官司，懦弱可欺的反受到懲罰，我不知道這個新來的馬軍代表是遵循哪條法則斷案，便打報告要求和馬軍代表談一談。但老馬說事情已經弄得很清楚了，用不著和我談。後來才弄明白馬軍代表是在聽了汪巧舌如簧的一通詭辯後，認定是游不肯認罪服法，夥同號子裏的其他現行反革命分子，打擊號子裏願意認罪服法積極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犯人，難怪汪打人有理了。

兩天後馬軍代表在犯人放風時針對我們號子發生的事情，當著全體犯人訓話說：「我們政府是站在認罪服法分子一邊的，是站在弱者一邊的。我們不准許某些思想反動的反革命犯憑仗自己的那點臭知識，欺負其他文化不高的犯人，打擊壓制其他犯人學習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的積極性。」老馬說這話時游戴著銬子耷頭彎腰地被推出來，在犯人隊列前示眾，這自然是殺油雞給猴子看。但是憑仗自己那點臭知識「打擊壓制其他犯人學習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的積極性」的明明是我呀，怎麼不銬我示眾，卻去銬並沒有那點臭知識且根本沒有開口說話打擊誰壓制誰的老游呢？老馬實在事情做得毫無道理。而最得意的自然是汪這個流氓了，他站在我旁邊一邊篩膀子（指腿子）一邊斜眼看我，大大地神氣了一回。

幾個月後汪和游都先後離開了號子——游仍被接回了和記蛋廠，汪則因流氓輪姦罪被判了十幾年徒刑，看來並不是人人都像這個昏庸的馬軍代表一樣良莠不分。

地質局的老張回單位了，老游也回單位了，老張和老游當初可都是作為「政治犯」給抓進來的囉。相反，「失足青年」汪某，還有那個「失足軍人」、「失足老頭」都是犯的流氓罪而非政治問題，卻都給判了，像汪還判得不輕。如此看來專政機關的眼睛還是雪亮的：誰個劣、誰個不劣；誰個懲罰要重、誰個處理從寬，都還是有個大致的杆杆。但話雖如此，還是不斷有莫名其妙的「反革命分子」被群眾扭送進看守所裏來。所以在看守所的放風場上雖然一些熟悉了的老面孔的「政治犯」逐漸不見了，隨時又會有新面孔的「政治犯」加入到我們的行列中來。而這些「政治犯」中的許多人之成為政治犯的案由，說起來差不多，幾乎都與所謂「惡攻」有關。

比方有個人說另一個人胸前戴的毛主席像章做得不好，說毛主席的像做得太瘦了，簡直像個猴子，於是便被告發犯了「惡攻」——攻擊偉大領袖「像個猴子」。再深入一查，此人出身又不好，於是便抓了起來。如此一來，「政治犯」豈不要氾濫成災。管你是國家幹部、學校教師，還是工廠工人、一般居民，也管你是有文化還是睜眼瞎，「政治犯」都好當的。我號子裏甚至進來過一個農民，或者講是個農工，國營

三店農場的，拿工資——一個月的工資不過20元錢人民幣，是那種臉朝黃泥背朝天，一年汗水流到頭的最辛苦的工薪一族，其實和農民沒有什麼兩樣。

那是六九年春節之後一個大雪紛飛的傍晚，我們號子裏三個人正盤坐在鋪上或翻書或看報，百般無聊地消磨晚飯後睡覺前那段難耐的時光。突然門鎖一響，門被打開，一個高而瘦留西裝頭的年輕人被送進了號子。年輕人約莫二十七八歲，穿件深藍色的鄉下人才穿的布扣子的對襟棉襖，額頭生得很高，個子足有一米八以上。進號子後他在門角直挺挺地站著，兩手交叉垂在肚子上，像一棵老榆樹就在那角角紮了根似的一動也不動。只見他雙眼直直地盯著前面的牆壁，像是對牆又像是對我們幾個人，或者在他的感覺中是對著廣大革命群眾也說不定，嘴裏不斷神經質似的重複一句話：「我不是有意的，我是好心說了錯話。」我見他那個顯然是受了刺激，茫然失魄哭不像哭笑不像笑的樣子，就招呼他先坐下來冷靜一下。我一邊幫他騰鋪位一邊笑道：「我們都是和你一樣呀，都不是有意的，都是好心，好心說了錯話。如果心不好出了問題呀，就不是來這裏而是送醫院了。你貴姓？在哪裏做事？你的好心究竟是說錯了什麼話呢？」

「我免貴姓夏，叫夏家旺，陰曆十月二十滿24歲，是三店農場的農工。我老婆叫劉水英，小我兩歲，我們的小伢狗貨滿三歲會走會跑了。我是貧下中農的成份。」這位姓夏的年輕農工原來不過24歲，但長得老相，背起這些家庭概況來又像個小學生。

「我是無事找事狗抓耗子多管閒事，一百年有積極過偏偏這次假積極了一回，一假積極就闖了個鬼。」夏農工繼續背書似的講起他的案由。「我本來是從不管閒事的，那天見隊裏的堂客（指已婚的婦女）們一放工就忙不迭往家裏跑，心想隊裏規定的向毛主席他老人家早請示晚彙報未必就不要了，那還成個麼名堂？就假積極了一回喊她們回來。我說婦聯們哪莫慌到直顧跑沙，晚彙報還有搞呢，我們對毛主席要像對菩薩一樣，莫忘了天天早燒香晚磕頭哇……我一說就曉得這話說岔了。不過我真的不是有意，我是覺悟低只有小學二年級的文化，連封信都寫不攏，我是好心說了錯話。」

聽這位夏農工把主席比做廟裏的菩薩，把早請示晚彙報比作是早燒香晚磕頭，我差點沒笑出聲來。何等精彩的比喻啊，真了不起。只是，真的就憑這一句話把你給抓進來了？我問。

「就這句話！」夏農工忙點頭說，「多半句你掌我的嘴巴。」

「就這句話你怎麼也不至於坐牢。」我搖頭。

「是呀，」夏急忙說，「你這位兄弟看樣子就是個有學問的人。你評評看，我不過是比方有打好，說錯了一句話。那天農場的軍代表聽到人報告後，也是說我不該瞎說，不會說話就少開口，要我好好認識作個檢查，也有有說要抓我。可是生產隊隊長老熊高低不依，硬說我這是惡毒攻擊毛主席的反動言論。軍代表耳朵軟，到底還是聽了熊瞎子的挑撥，舞(湖北方言：弄的意思)了輛車把我送到公安廳。人家公安廳都不肯收，要場裏把我舞回去教育一下就行了。場裏一夥跟到熊瞎子起哄的人就說不能給革命群眾潑冷水，說是好不容易揪出個混在革命群眾中的反革命，那是非要抓起來才能平民憤的。狗日的我有卵子的民憤，不就是上次在棉花田裏摘棉花時，陰到在祥喜媳婦的奶子上抓了一把麼？她笑嘻嘻的罵了一聲，也有得一點民憤。其實呢我曉得生產隊長熊瞎子不懷好心，早就在打我堂客的主意，這回把我搞進來他好佔相因。這個娘子養的害我，可憐我屋裏還有個剛剛三歲會跑會走的狗貨……」

夏一提到他的堂客和小伢就一臉的苦相，那是他的命。我便安慰他不用著急，屁大點事既上不了綱也上不了線，何況你又是貧下中農的成份，那就更不是打擊對象了。既然公安廳都不願意收，是勉強收下來的，那過不了幾天就會放回去的，只看哪天提審走個過場就結案。夏聽得直眨眼，半信半疑，但明顯情緒平靜多了。

這之後他不開口則已，只要開口必是叨念他的堂客和他的狗貨。我們就常常和夏開玩笑，說他這一抓他那個年輕輕的媳婦哪裏守得住，肯定早就跟那個熊瞎子跑了。他曉得是在逗他也不惱火，倒總是說起他媳婦的諸般好處。有一回說興奮了把他們新婚那個晚上洞房中的事都拿出來講，說結婚時媳婦才剛剛18歲，晚上進洞房後上了床，他替她脫衣服時媳婦羞得把臉蒙得死死的看都不敢看。還說他媳婦長得有多麼白多麼嫩，頭一回做那個事時如何如何……回憶起這些往日

的快活事，這位年輕的農工就一臉的幸福。他這一輩子的快樂恐怕也就是他的老婆孩子熱枕頭了，也許還加上一些葷話，而他的葷話也還真的不少。他有次講起農村裏辦紅白喜事的吹鼓手時說，有人要辦喜事吹鼓手就去了，東家絕不能怠慢。你招待得好給的賞錢多，吹鼓手就吹好聽的喜慶的曲子給你助興；倘招待得不周或東家太小氣，吹鼓手就會使壞，專吹些邪門的調子。夏用兩隻手做個吹喇叭的樣子，就給我們學起來：咪來——咪來——多來朵拉——多來朵拉，也就是屎癢——屎癢——趕大的拿——趕大的拿。夏的這類葷段子讓我們一個個笑得東倒西歪。

夏進來之後沒幾天就被提審了。提審回來後我問他情況怎麼樣？他說是公安廳一位幹部來提審，說他是迷信頭子，要好生檢查檢查。又問他這幾天有什麼想法，思想覺悟提高些沒有？他一個字也說不出，卻眼睛直勾勾地盯著人家手中的香煙。那提審的還蠻好，扔了一支香煙給他抽。夏說要是每天都提回審，每回都有根煙抽就好了。我說你不要老想過煙癮，你要想想下一次提審時該說些什麼。只要好生作一次檢查，說自己經過政府的教育認識到了錯誤，你大概就可以回家了。夏說有那好的事？我說你等著吧，要是真像你這樣的都抓來坐牢，這地方再修10座看守所也關不完。這次提審後不過一個禮拜，果然幹部就通知夏捲鋪蓋出獄了。出獄時正好是開午飯，夏問幹部他是不是可以把飯菜帶回去吃？幹部搖搖手說不用帶了，回到家裏還怕沒有好的吃？飯菜留給號子裏幾個人分它算了。

夏農工走後不久，號子裏一個小偷也走了，記不得是放了還是判了。這偷兒不過十七八歲、獐頭鼠眼天生一副賊相。這種偷兒號子裏已經出出進進了好幾個，我發現他們的共同點是都極為猥瑣，像黑暗中的蟑螂，既動作敏捷，又膽怯自卑，好像有一種天生的自卑感。這也許和他們在社會上的謀生方式有關，他們幹這一行的，永遠都在人前抬不起頭來。聽說這號人往往都主動找有頭有臉有勢力的地痞流氓作保護，把竊來的錢財按一定比例供奉給保護人，難怪連那個姓汪的流氓都瞧不起他們，不屑於和他們為伍。但我倒是覺得這些小偷比汪那種流氓要「低調」一點，他們在號子裏至少不欺負人。像我們號子裏這個小偷手腳還蠻勤快，每天都主動把號子打掃得乾乾淨淨，有時還

跪在地板上用抹布把地板擦得一塵不染，所以小偷這麼個「勤雜」一走，我們都還捨不得。

小偷走後我們號子裏又進來個「土匪」。不過也不是真的是土匪，是他自己說自己的綽號是「土匪」。「土匪」也是個年輕人，五大三粗濃眉大眼，屬於那種「腰圓膀又乍」的人物。「土匪」說他是省交通廳下面一個縣級單位的司機，是他們那個縣交通系統造反派的頭頭，並且說和我有過一面之交，聽過我的報告。他稱他與我是過去的「戰友」、如今的「難友」，警告號子裏的人誰也不准欺負魯拐子（拐子：江湖話，指幫中的老大），否則他的拳頭是不認人的。我就遺憾「土匪」早幾個月沒在我這個號子，倘那時就在，諒那個姓汪的流氓也不敢囂張。「土匪」似乎文化程度也不高，但極講義氣，據他說他是為以前一次武鬥中死了人一事挑撥子進來的。他說人是他部下開槍打死的，但他是總指揮，就扛了這個擔子。「為朋友兩脣插刀」，似乎是「土匪」的口頭禪。

「土匪」很喜歡天南地北地海吹，特別是文革中發生在武漢的幾次大武鬥，如在六渡橋啦、民眾樂園啦、漢陽軋鋼廠啦等地方的幾次大規模的武鬥，好像造反派這邊都是他在總指揮。我知道他是在瞎吹，武漢這邊的造反派中藏龍臥虎，哪裏輪得上他個下面縣裏的小頭頭來指揮？不過他想吹就吹好了，反正吹吹牛又不犯法，而且我還愛聽他吹出些前一段時間鋼新之間的內訌。他說互相鬥得很厲害，搞不好就是武鬥，而且和七二〇之前不一樣，雙方都有武器了，真槍真炮地幹。鬧厲害了，中央就派飛機把朱鴻霞、李湘玉、吳炎金、楊道遠、張立國幾個頭頭，都請到北京去談判。頭頭們就一起「鬥私批修」，都說對不起毛主席，互相抱頭痛哭一番，於是簽協議，不打了。但是一回到武漢協議就狗屁不值，仍然打得鬼哭狼嚎。

「那一紙協議有什麼用？當指屁股的草紙都不好用，根本上還是要靠實力說話。」「土匪」說。「遵照毛主席的教導，要用革命的兩手反對反革命的兩手。談談打打，打打談談，以鬥爭之手段，達團結之目的。人民的武裝，一枝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土匪」講得唾沫四濺，這大概就是他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了。其實造反派也好、保守派也好，鋼派也好、新派也好，其頭頭們多半也都是像「土匪」一樣，從主席著作中各取所需的。所謂毛主席的話「放之四海而皆

準」，也就是說無論是誰，都可以從中找到適合自己需要的東西。這也正是文革中對立的雙方，都可以引用主席語錄進行攻擊和防禦的原因。「語錄仗」這千古奇觀的奧秘，也正在於此。

「土匪」除了喜歡吹噓他武鬥中的「戰功」外，也對女人津津樂道。他老說人家玩女人要貼錢，他不但不貼錢，女朋友還倒貼他，如此說來他是很得女人緣了。他有次掏出個錢夾子，給我看夾子裏夾的張他女朋友的玉照。我看照片上的姑娘胖乎乎的咧著張大嘴傻傻地笑；很俗氣的樣子，心想不怎麼樣啊，難怪她要倒貼他了。但「土匪」很喜歡這個女人，說是他們縣裏的一枝花，人稱「黑牡丹」。我看這個姑娘黑是黑一點，和「牡丹」卻是半點邊都沾不上。不過露出的兩排牙齒倒是白得很，叫她「黑人牙膏」也許還合適些。

我當然不會這樣講掃「土匪」的興，我說「土匪」你真有豔福，搞了個黑牡丹當壓寨夫人。「不是搶來的吧？」我開玩笑說。不料「土匪」哈哈一笑，得意地說：「真給你說對了，我這女朋友還真是搶來的。」他就給我講起「壓寨夫人」的來歷：有次縣裏的兩派大武鬥，他率領他這一派的人把對手打得丟盔棄甲潰不成軍，對方的總指揮也給子彈打殘了腿成了廢人。「土匪」帶領隊伍佔領了對方指揮部所在的樓房，繳獲了不少的「戰利品」。在一行「俘虜」中，「土匪」發現了對方總指揮的「情況」(湖北話，指情婦之類)——有名的「騷貨」黑牡丹。黑牡丹在「土匪」的教導下，很快就認清了革命形勢，決心跟隨「土匪」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立新功」。「毛主席說思想工作是第一位的，」「土匪」引經據典說，「思想通了，一通百通。何況自古就是英雄愛美人，美人愛英雄嘛，我跟她談過話後，只朝她點了個頭，她就迫不及待地往我懷裏撲，躲都躲不掉呢！」

「土匪」越說越得意，「我老婆人也不錯的，缺點就是好吃醋，不高興我跟黑牡丹玩，老是眼淚鼻涕地跟我鬧。我才不管她呢！你想想老子們把腦殼繫在褲腰帶上出生入死地搞革命，造反動路線的反是為什麼？說到底不就是為了撈點實惠，過得舒心一點麼？49年解放時，曉得幾多老幹部把鄉下的黃臉婆甩了，另外找城裏的漂亮女學生，還不就是這個道理。我不跟老婆打脫離，就很對得起她了，她鬧什麼鬧？」我就說「土匪」你別說你老婆不好，如今你坐牢了只有你老婆會等

你，那個黑牡丹會不會等你？「土匪」歎口氣說，「她哪裏會等我，還不曉得這個騷貨現在又跟那個大雞巴睡一起了哩。」「土匪」很為「革命果實」的得而復失懊惱。而我通過和「土匪」的交談，也增添了不少見識。特別是對造反派（其實保守派也是一樣）中一些人的「革命觀」、「造反觀」有了深入的瞭解。可謂與匪一席話，勝過聽喇叭。喇叭者，公開的輿論宣傳也，比方「為革命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可丟」，「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之類的光亮話。

「土匪」和我相處了一段時間後便走了，多半是判了刑。但我始終沒有搞清楚他為什麼會有「土匪」這麼個難聽的綽號。

我在號子裏一年中最後還接觸過兩名「政治犯」。其中一位曾是漢陽一所中學的老師，以後我再提他；另一個跑江湖的中年漢子，倒是很有意思特別值得說說的角色。那是一個晚上，已經過了9點，我們號子裏四個人都已睡下，忽然聽見門開了進來一個犯人。監所的號子據說是按三個人一間設計的，不過一道三米多寬的鋪板睡四個人也勉強，睡五個人就肯定打擠了。但那一陣子外面搞「清理階級隊伍」※23，不斷有新的犯人送進來，人滿為患，號子就開始超載。這個中年人挾著一卷看守所發的鋪蓋進了號子，見我們四人已將鋪位睡滿，便大聲喊道哪裏是他的地盤？此人中氣很足，聲如洪鐘，一下子把我們都驚得坐起來。大家便給他騰「地盤」。他把鋪蓋放下，打量了一下，見給他騰的地盤不是全部鋪位的五分之一，便有意見，說：「不平均，這不行。」不行之後竟引孫中山的話為證，說孫總理指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這號子中的地權也是人均一份的，為何他的就少？

聽了這條漢子這番不同凡響的理論，倒使我格外留心注意他。只見此人兩眼炯炯有神，身體十分壯實，年紀約莫四十上下，怎麼就閉口孫總理、閉口孫總理成了民國的「遺老」。因不摸底細，一夜無話。次日試探地問他案由，此人竟全無遮掩，一一道來。於是便知道此人姓龍，黃岡人，農民，有初中文化，犯的是「反革命煽動罪」。但龍根本不承認犯罪，說：「犯他娘的鳥罪。憑什麼說我宣傳封建迷信要顛覆無產階級政權？我是在傳播大同世界的真理，是在替天說話。但可惜普通人凡身肉眼不識真身，故我有此牢獄之災。」聽他說得玄乎，我便

故意問他傳播的大同世界的真理究竟是怎麼回事，「誰委託你替天說話了？你說肉眼不識真身，莫非你還是什麼真身不成？」

他見我對他有興趣，頗得意，端坐在鋪板上身板筆直，目不轉睛，然後要我看他的眼睛。我便注意看他的眼睛，是否有什麼不同尋常之處？看來看去眼球亮則亮矣，如舜之重瞳之類的異象卻是沒有。龍見我看不出名堂，便啟發說再看、注意看，看我究竟像哪個？我便再仔細看，此人倒是生得隆准而龍顏，有俗稱的貴相，至於說他像哪個還真看不出來。我只好搖頭，說「哪個都不像。」

「怎麼看不出來呢？」龍歎口氣，遺憾地搖搖頭，便指著自己的鼻子說：「像不像朱元璋？」我一聽差一點噴飯，誰見過朱元璋了？簡直是瞎扯淡。但是又聽見他接著說：「也像黎元洪。」我說算了吧，黎元洪我也不知道是個麼樣，誰知道你像不像。龍於是又說孫中山的像你總見過吧，你看我像不像孫中山孫總統呢？我聽他越說越邪門，便點頭說像，真有點像。龍得意了，又問我他像不像毛澤東？我說你怎麼又像這個又像哪個呢？我看你是四不像。龍說莫瞎說，你要知道朱元璋、黎元洪、孫中山、毛澤東其實都是一個人，都是一個真神的化身，現在又已經化到他身上來了。你們對真神是絕對不能懷疑的，懷疑要招大災。已經有讖語出來了：乖乖隆的隆，朱黎孫毛龍；轉世到如今，五洲要大同。你們都要跟隨我，將來才能享受榮華富貴。

聽龍一通胡說八道，我算知道他是為什麼被抓進來坐牢了。這種自命為「真命天子」的人農村中到處都有。這些人往往都是些粗通文墨的半瓢醋，腦子裏封建迷信的東西也多，還自命不凡，以為自己真是真龍天子下凡，就滿世界胡說。其中也真有懷有野心铤而走險，搞反動會道組織，想鬧出氣候「黃袍加身」做皇帝夢的，四清中據說就清出過這類反動組織。不過這個姓龍的究竟是神經有毛病胡言亂語，還是真有野心並付之於行動想登皇帝寶座還搞不清楚，須再觀察觀察。

然而尚未待我觀察出名堂，號子裏早有人將龍的反動言論報告了幹部。龍被提出號子挨了一頓訓，戴上銬子給送回來。放風時龍又被當作反改造的典型，在全體犯人面前示了一回眾。龍經此教訓從此夾起尾巴做人，認真學習改造思想，從早到晚苦讀毛著孜孜不倦，連蹲馬桶時也手不釋卷。龍對毛著中有關國共兩黨鬥爭的部分尤感興趣，

研讀之後常有驚人之語。有一回讀《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此公竟稱自己曾與杜將軍一同供職孫中山大總統的門下。當時國共即將分道揚鑣，孫總統問杜是選擇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選國民黨就向右跨一步，選共產黨就向左跨一步，結果杜向右跨了一步。孫總統歎息說杜將軍這一步跨錯了，但是以後到了關鍵時刻可以起義。可惜杜將軍沒有記住孫總統的告誡，所以最後落了個當俘虜的下場。

聽龍又在說胡話了，我便問他那時在孫總統面前是向左還是向右跨了一步呢？他說他哪邊都沒有跨，所以國共兩方都沒有了他的地位，他只好解甲歸田，潛心研究三民主義數十年。他說現在之所以出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因為沒有實行孫總統提出的「平均地權」。說著說著又開始走火入魔，大聲喧嚷起來，要哨兵放他出獄，讓他向百姓宣傳「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革命道理。哨兵訓斥說哪來的韃虜？龍說你就是韃虜，統統要驅除的。哨兵火了，說再胡說槍斃你。龍一下子把衣服扣子解開，拍著胸膛說：「有種就朝這裏打！莫說你一支槍，就是用機關槍掃又能奈我何？在外頭時村裏的民兵曾架起五挺機槍圍著我打，都沒有傷我一根毫毛。我是什麼人？我是真命天子不是凡胎，是刀槍不入的金剛不壞之身，不信你們就在操場上架起機關槍六〇炮試一試！」龍和哨兵這一大吵自然又沒好果子吃，這一回不但重新戴上手銬，而且上了腳鐐。那十幾斤重的腳鐐可不是吃素的，拖不上幾天，那腳脖子就是血印斑斑。

龍於是又老實了一陣子，待刑具去掉後，就向幹部要紙要筆寫交代材料。龍悶著頭整整寫了一天，好幾張材料紙都寫滿了。我偷偷看了一眼，啊呀不得了，龍要立大功了！那紙上的標題是「向政府獻巨寶支援國家建設立功贖罪的報告。」我說龍看不出你還藏有「巨寶」啊。龍趕緊擺手要我莫作聲，說這附近有韃虜，獻寶的事不能讓韃虜知道了。我說你寫的東西我可不可以看一看，他說可以。我便拿過他寫的「報告」瀏覽了一遍，大意是說他當年追隨孫中山北伐，一路打土豪、分田地、挖浮財集聚了一大批金銀財寶，還有新式炸彈、原子武器，都埋在龜山附近某個神秘的地方，而這地方現在只有他一個人知道。如政府放他出去，他願意把這些寶藏全部獻給國家，等等。

我就告訴他這個報告至少有兩個地方經不起推敲：第一北伐是

26年之後的事，孫中山25年就死了，如何領導北伐？第二原子武器是45年才製造成功的，孫中山怎麼可能早20年就有了？所以你這一套東西鬼都哄不了。龍聽我說得有理，趕忙收回報告認真地刪改起來，堵漏補缺，儘量要把個杷杷捏得圓。他將原子武器改成了自動武器，將北伐戰爭改成了武昌起義，自以為圓範（湖北方言：圓滿，無破綻的意思）了，高興地對我說幸好我幫他發現了紕漏，不然政府看了會對報告不相信，那就壞了他獻寶的大事。他還翹起姆指稱讚我有知識，說以後你可以當我的軍師。龍見號子裏另兩個人楞楞地盯著他，便說孫總統教訓我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你們都要努力，革命成功後是要論功行賞的，但是首先要作貢獻。兩個犯人就問他麼樣作貢獻呢？龍說當初長毛起事反清時，入夥的人都是要變賣房屋財產繳入夥費的。現在這號子裏面各位想必也變不出錢財來，那就每餐匀一點飯菜與我，也算是作貢獻的意思了。

原來如此！號子裏的人自然又報告了幹部，龍再一次被提出去鎊銬加身，送進了關禁閉的小號子。這小號一共四間，獨立設在放風場一側，是專門用來對付屢教不改、繼續犯罪的頑固分子的。龍自關進去後就再沒有露過面，他在那小號子裏面還做他的「真命天子」夢嗎？

事後馬軍代表特地找我談了次話，問我為什麼從不向他報告龍在號子中的反動言論。我說龍明顯是個神經病，是瘋子，說的全是瘋話，有什麼好報告？老馬說你不用給他打馬虎眼。龍不是什麼瘋子，他是裝瘋賣傻，自稱真命天子大肆散播反動言論，企圖煽動群眾鬧事，達到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虧你還是個大學生，連這都看不出來？真是白讀了十幾年的書。

我承認我是看不出來，我只看得出他是個瘋子。他不應該進看守所，應該進瘋人院。

後來我讀了幾本姐姐送來的醫學方面的書籍，在一本關於精神病的醫書上，看到有一種叫做「偏執性精神障礙」的病症。這種病症十分罕見，患者以持久、頑固、堅定不移而高度系統化的妄想為主要症狀，看來這個姓龍的就是個典型的偏執狂或妄想狂。

這個姓龍的瘋子後來得到治療了嗎？或者他仍然在監獄裏——就像《基度山伯爵》裏的那個「瘋子」長老一樣——繼續孜孜不倦地修訂他

的獻寶計畫？抑或他早已因他的頑冥不化而走上了不歸之路也說不定，我只能願他一路走好。

## 第十六章

# 達摩克利斯之劍

我在看守所的這間號房裏，和其他犯人一起生活了整整一年。俗話說鐵打的營房流水的兵，我們這裏是鐵打的牢房流水的犯人。老的犯人或判或放出去了，新的犯人又不斷地從外面給送進來，只有牢房堅如磐石穩如泰山，像一隻巨獸蹲在這條「民主路」上，無情地吞吐著「民主制度」下的罪人。這些被人類社會拋棄的罪人被剝奪了正常人的一切權利：沒有自由，缺乏營養，見不到親人，每天只有半個小時可以在放風的小操場裏見到頭上的藍天，呼吸一陣子新鮮的空氣。放完風之後回號子時，大家的腳步總是倍感沉重。那可詛咒的狹小的號子，又將把我們與整個世界隔絕，與一個墓室實在沒有什麼兩樣。

每次我通過甬道走向自己的囚室，總是禁不住會想到我十三歲時，隨我父母去姑嫂樹火葬場給奶奶送葬的情景：奶奶躺在一輛手推車上，通過一條甬道送到火化室。當奶奶的遺體被送進火化爐時，我們全家人都嚎啕大哭起來。我現在也正是在被送進一個火化爐，只是我還是一個活著的人。那爐子雖然不是焚燒我的身體，卻能焚燒掉我的寶貴歲月，焚燒掉我的青春年華、我的自由和幸福，連同我曾經有過的理想和抱負。雖生猶死，度日如年，這就是我在牢房中每一天最基本的感受。

這是一種死一般的靜寂、孤獨、冗長和灰暗的生活，這種生活絕不是一個心理和生理正常的人能夠長期忍受的，難怪乎法律規定看守所只是一個短期羈押犯人的地方。如果在羈押的時間上不作法律的限制，它足以把人關押成一具活屍或者一個瘋人。倘若精神上沒有充分

的準備，或雖有準備但心理較為脆弱，長年累月地監禁在這個活棺材裏，發狂只是遲早的事。在放風時我就見到一些瘋瘋癲癲的人，有的還帶著腳鐐，這都是一些因長期監禁而精神失常的犯人。當然也有雖長期監禁仍保持正常思維的，但也早已是鳥面鵠形，形銷骨立。

有個瘦小個子的四川人，據說入獄前還是個警官，在一次押送犯人的行動中不僅犯人跑了，連手裏的槍也不見了蹤影。有人就說他是被人買通私放囚犯，他自然不承認，於是也給關了起來。逃走的犯人一直未能抓捕歸案，這個四川人的案子也就一直懸著，人也就一直關在這個看守所裏，據說快五年了，是看守所資格最老的囚犯之一。他每次放風時都是由同號子的犯人攜扶著出來，在場子裏也極少活動，只是籠著袖籠曬曬太陽。

因為關的時間太長，這個犯人臉色特別蒼白。本來個子就小，如今更是縮成一團，不成人的樣子，整個人就像一棵被蟲蛀空了的枯樹在風中簌簌顫抖不停。和他同過號子的人說他患有很重的胃病，基本上吃不下飯，就靠喝幾口菜湯維持。我想這個人像這樣關下去，恐怕是活不了幾年。難道那個逃脫的犯人一輩子不歸案，這個人就得一輩子關在看守所嗎？實在是太可怕了。但這個四川人能夠不瘋不傻地熬這麼多年，還真夠堅強的。有的人熬不住就瘋了，也有人自殺。不過我覺得能下決心自殺也很不容易，「千古艱難唯一死」，一死了之也未必不是人到絕望時一種勇敢的選擇。

說到自殺，我在被宣佈逮捕那天是試過一次的，但死神沒有接納我，我也從此不再有此念頭。而且即使有此念頭也很難得逞，因為看守所有著非常嚴格的措施防範犯人自殺。首先犯人入監時要經過仔細的搜身，一切可能傷害犯人身體的物品全部沒收。小刀小剪、皮帶鞋帶、圓珠筆鋼筆等自不必說，連穿鞋帶的金屬扣眼都要給拔掉。杯子也只許用搪瓷的不許用玻璃的，鏡子當然也不准用，但近視或老花眼鏡卻又除外。在號子裏晚上睡覺通宵不熄燈，而且頭一律朝外以便哨兵觀察。總之所有能想到的地方都想到了，所以在看守所內犯人自殺而死的事件不多見。但百密一疏，防範得再嚴總也有疏忽的地方，在看守所裏我目睹的犯人自殺身亡的事例有過兩起，不過情況都比較特殊。

第一個自殺身亡的，就是我進看守所時那個安慰過我的做雜役的大學生。

說情況比較特殊，就是這個學生犯人與我們比較有較多的自由。他白天幫那個河南廚師做活，洗菜燒火換馬桶什麼都做，可以在監所裏面自由行動，只是晚上得回號子。他一人住一間，就在我們這個號子的對面。對這個被判了三年徒刑，就留在所內服役享有「半自由」的大學生，我們都羨慕得不得了。他對我們也和氣，不像「二保長」那樣狐假虎威討人嫌。大約是看在同是大學生的份上，在用開水方面他對我格外照顧，總是把我那個大瓷缸子打得滿滿的，有時還多給我一瓢，好讓我擦個澡。

但是有一天幹部找他去談了些什麼，他那天的臉色就特別的陰鬱，悶悶地給各個號子發飯、收碗、送開水。晚上9點就寢前他搖了搖睡覺鈴——這是他每晚必須做的事情，我們早已習以為常——奇怪的是晚上快半夜了又聽見他搖了回鈴，這可是從未有過的，我們就開玩笑說大學生在發神經了。後來又聽見值勤的班長喊他不要關燈睡覺，喝令他把燈打開。不久又再次聽見班長喊他開燈，再之後就沒有聽見什麼動靜了。

天亮時睡夢中突然驚醒，聽見那個二保長在捶對面的門，一邊捶一邊罵：「狗日的還不起來生火，日頭曬花花屁股了。」但是屋子裏沒有反應。二保長使勁把門推開走進去看，忽然見鬼似的大叫一聲媽呀，吊死啦！就從屋裏退出來，亡命地往外跑。不久幹部和部隊的人還有醫生都跑來了，幾個班長從號子裏用擔架抬了一個用白布蒙著的人出來。所有這一切我們都從門上的小窗子的側縫裏看得一清二楚，大學生確確實實是上吊死了。

當天下午季幹部就找我們號子的幾個人分別談話，首先就是找我。季幹部問我說今天都看見些什麼啦？我當然說我今天什麼都沒看見。季幹部點點頭說那就好，然後照例要我好好學習，改造思想，安心等待政府的處理，要相信黨的政策，不要胡思亂想等等。他還說只要交待清楚問題，年紀輕輕總還是有出路的。像那個做雜活的小青年，還不是和你一樣的大學生，表現比較好嘛，這不上午就放了。我連連點頭說那是那是，心裏卻在好笑季幹部說話也不臉紅。那個大學

生當然是放出去了，難道還會把個屍體留在這裏讓它發臭嗎？這裏又不是殯儀館。讓人費解的倒是三年刑期不算長，而且也已經服刑服了一段時間了，這個大學生何以突然要自殺？

後來終於知道他犯的是件命案。文革之初「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時候，他和學校的幾個紅衛兵一起上街打擊流氓。有個小流氓平時總愛到他們學校搗亂，他們把他逮住後帶回學校狠狠地揍了一頓。不知是手下得重了還是那傢伙不經打，小流氓就死在學校裏了。事發後追查責任，因為他是這次行動的頭頭，由他來擔擔子，按「過失殺人」罪從輕判了三年，判刑後就留在看守所服刑。但是死者家屬不服，上訴到上級部門，現在要重審重判。大學生對這個想不穿，擔心重判會判得很重，便選擇了輕生這條路。

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大學生自殺後，我有很長一段時間整夜都無法入睡。我總是聽見那個鈴鐺在我耳邊搖著響，那鈴聲就是那個大學生告別人世的絕響啊！一個人生命的熄滅原來竟是這樣簡單，像風中之燭，還是像根易折的蘆葦？或者在這種地方生即是死，死即是生，也許參透了就無所謂了。

若干年後我又遭遇了另一個年輕人的死，死者身份不詳，案情不知，只是在放風場上邂逅過。這個小夥子身體十分健壯，濃眉大眼，體形剽悍，一付桀驁不馴的模樣。此人好像也是為文革中的事入獄，但始終不服管教，堅持是受了冤枉。因為老是鬧監，免不了經常性地腳镣手銬。有一段時間腳镣是除掉了，銬子仍戴在手上。那天放風結束後，他本已隨其他犯人進了監所的甬道，忽然又報告說曬的衣服沒有收，幹部就讓他回院子裏收衣服。不料他回到院子裏，一看執崗的哨兵都已離開放風場，竟拔腿便跑。

我那時正在院子裏隔斷的一個小園子裏單獨放風，就望見一個人不知是用何種方法居然躡上了廚房的屋頂，然後便不見了。院子裏哨聲大作，幹部和當兵的全跑了出來，其中一名班長守住我讓蹲下什麼也不准看，很久才允許我回房。事後聽說那小夥子是從屋頂上一頭栽下去摔死了，頭落地，濺了一地的腦漿。是失足，還是自殺不得而知，不過他既然是戴銬越獄，我看他就沒有存生還的打算。這人是否真的受了天大的冤屈我不知道，倘是，他九泉之下如何瞑目？

除了這兩個人自殺身亡之外，其他犯人也有用各種方式企圖自殺的，有吞針的、吞刀片的、吞瓦礫的，還有吞指甲剪的（也不知是如何吞下去的），但都一一搶救過來。還有人把嘴鼻悶在臉盆的水裏想憋死，用毛巾勒自己的脖子想縊死，但憋到縊到一定的時候就憋不下去也縊不下去，人的求生本能決定了這種自殺方式的徒勞。實際上這些想死的犯人也並非都是真想死，他們不過是初入獄時，不能接受這種突然失去了一切自由的現實，而作一種絕望的反抗。一旦接受並適應了現實環境，也就會放棄這種念頭。這時犯人所渴望的就是盡快得到處理，只要能離開看守所這個令人窒息的地方，去哪裏都行。

我剛被關進看守所時就完全不能面對現實：我，一個紅旗下長大的共青團員、共和國的天之驕子、文化大革命中的紅衛兵小將，怎麼一下子就成了人民的敵人，成了被剝奪了一切權力的罪犯，被關在這個囚籠裏與殺人犯、強姦犯、搶劫犯、扒手、國民黨的殘渣餘孽、各種人類的渣滓為伍了呢？開頭那些天我成天抱著腦袋痛苦不堪地坐在床板上不作聲，白天吃不下飯，晚上睡不著覺。實在按捺不住時，我會去搖窗子的鐵欄，去捶牢門的門板。當時那個地質局的湖南人對那個軍人說，聽說以前這牢房裏也關過一個年輕學生，也是這樣子，後來就瘋了。我也害怕有一天會突然成了瘋子，但現實又實在讓我難以忍受。

有一次在幹部找我談話時，我幼稚地提出，政府可否給一條出路，比方送到青海新疆去開礦，只要不把我成天鎖在這個狹小的號籠裏就行。這當然只能是一廂情願，於是我就只能盼望提審，心想早提審就能早弄清楚問題，問題弄清楚了案子就能得到處理。幹部不是說一般最多三四個月就可以得到處理麼？我一個學生，沒有歷史問題，也沒有人命，又是文革中犯的錯誤，審查清楚後處理起來還不快麼？儘管同號子的那個湖南人僅僅因為在報紙上寫錯了句話，就關了好幾個月，但我認為我和他的情況不一樣，不可能關那麼久。

在號子裏過了差不多一個月，才好不容易盼到了一次提審。我被叫出號子，指令順著甬道朝前走，一直走到預審室（對面就是幹部的辦公室）。預審室一共並排有三間，我被指令進入其中一間。預審室裏靠窗有一張桌子和幾把椅子，是預審員用的，我坐在面對預審員的一把

腰鼓形的石墩上接受審訊。按慣例預審員為1-2人，另外還有一個書記員負責作記錄，在照例問過姓名年齡籍貫職業後，審訊便進入正題。

「你先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交代一下，梳個辮子吧。」提審員說。

我於是照例從反對過天津延安中學那個關於大聯合的體會和為「六十一人案」翻案說起，翻來覆去就是這樣幾條。而就是這幾條我也準備好了如何進行辯解，我想既然是正式提審，那應該有道理可講，這裏又不是鐵山。

「你為什麼要反對天津延中的大聯合的體會呢？」提審員問。

「我當時認為一所中學兩大派組織在軍訓團的幫助下，通過學習毛主席著作僅用一天時間就實現了大聯合，是根本不可能的。我認為這個體會不真實，所依據的材料是虛假的，所以提出了反對的意見。而事實上這個學校的大聯合幾天之後就垮了，證明這個體會、這個經驗經不起實踐的檢驗。」

「你知道這個體會是誰肯定的嗎？」提審員盯著我的眼睛問道。

「知道，是主席肯定的。」

「偉大領袖毛主席肯定、支持的東西你公然反對，你知道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嗎？」

我不作聲。牆上的掛鐘滴滴噠噠地響著，提審室裏靜極了，靜得讓人心裏發慌。提審員點起了一支煙，吸一口，向空中慢慢吐出煙圈。煙圈一個連著一個，我注意地盯著這些煙圈不斷地升騰、消散，再升騰、再消散，腦子裏卻在緊張地想著該如何回答這個問題呢？

「你回避，你不敢回答！」提審員終於開口了，「因為你矛頭就是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

「不是，」我連忙否認，「我只是針對這個體會本身。我認為它是虛假的，是一些人用假材料欺騙了上面，我至多只是說有人在欺騙主席。我就是說錯了，那和把矛頭指向毛主席也是兩回事，是完全不同的性質。」

「有人欺騙毛主席？」提審員用鼻子哼了一聲冷笑道，「你是說偉大領袖毛主席也會受騙上當囉？這麼說你比偉大領袖毛主席還高明囉

——簡直是一派胡言。」提審員邊說邊狠狠地把煙頭在桌上的煙缸裏一按，一縷清煙從煙缸裏嫋嫋升起，筆直筆直的。我便想起了一句唐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我覺得自己彷彿就是置身於大漠之中，無人可以和自己溝通。主席就從來不會受騙上當，這是什麼邏輯？可是你能與提審員理論麼？不過提審員也根本不打算和我理論什麼，他已經轉向下一個也許他認為是更為重要的問題。

「你再交代一下有關六十一人叛徒集團一案的問題，說說你究竟是為什麼要為這些人翻案？有沒有什麼人在你身後指示你這樣做？」我首先肯定地告訴提審員沒有任何人指示我這樣做，我之所以為六十一人集團案翻案，是因為我覺得將薄一波、劉瀾濤這些老幹部打成叛徒集團不公正。我說當時全國上下到處都在抓叛徒，挖叛徒網、叛徒集團，我手上就有許多這方面的資料。我從這些資料中發現有一些地方一個村一個縣的黨員幹部全做過叛徒，叛徒中甚至有「叛變」時年僅十二三歲的娃娃，我就對這些材料的真實性感到懷疑了。

我就將我在那篇文章中所闡述的理由又重複了一遍。我說我當時認為，如果那六十一人「自首」是錯誤的，首先也是錯在中央，責任主要應由上面承擔而不是由他們本人承擔……但是不等我說完，提審員便打斷我，要我不要在這裏繼續放毒了。

「你明明知道關於六十一人集團自首叛變問題的中央文件，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批發的，你還敢公然為這些叛徒翻案，胡說抓叛徒網是黨內有一小撮真正的叛徒、特務、走資派為掩護自己而玩弄的一個陰謀，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的組成部分，說大抓叛徒網是為了保護一小撮。你在這裏所說的一小撮真正的叛徒、特務、走資派是指誰？你必須老實回答這個問題。」提審員的聲音咄咄逼人，但我還想據理力爭。我說我所說的並沒有具體對象，我只是憑自己的感覺，覺得這份中央文件經不起推敲，不應該把薄一波等人當年執行黨組織的指示而有過的自首行為定為叛變，覺得這不符合對歷史的問題應作歷史的分析的原則。人家不該負的責任為什麼硬要人家背上？何況叛徒又是一個極嚴重的問題，這不是要置人於死地嗎？所以就懷疑中央有人在搞陰謀，又在搞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那一套了，就寫了那篇說大抓叛徒網保護一小撮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的組成部分的文章。

「那麼你是說偉大領袖毛主席在搞陰謀、搞新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囉？」提審員冷笑說。

「不，不是……」我慌忙否認說。提審員的「誘供」太可怕、太惡毒了，簡直是把我往死胡同裏趕。但是這個將六十一人定為叛徒集團的中央文件，確確實實又是偉大領袖親自批發的呀，六十一人問題的來龍去脈，偉大領袖也是完全清楚的，再說偉大領袖是受了蒙蔽受了欺騙顯然說不過去。我只好說當時一時衝動，自以為是，就沒有考慮這份文件是主席親自批發，六十人的性質是主席親自定的這些情況了。我真的是一時昏了頭，腦殼發熱。

「恐怕不是什麼一時衝動，腦殼發熱吧，」提審員用手中的鋼筆敲敲自己的腦門搖頭說，「應該是你的思想決定了你的行動，你的立場決定了你的認識。你從來就沒有把偉大領袖毛主席放在眼裏，你根本不承認偉大領袖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是各族人民和世界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根本不承認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所以你才膽大包天、狂妄至極。一會兒說偉大領袖也會上當受騙，一會兒又說主席批示的文件是大毒草、是搞陰謀。你仗著所謂紅衛兵小將的身份，說了地富反壞右想說而不敢說的話，充當了帝修反的代言人。你完完全全站到了革命人民的對立面，墮落為人民的敵人。正因為這樣，你在革命人民對你進行隔離審查的時候狗急跳牆，喪心病狂地炮製反動漫畫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也就絕非偶然了。你現在要老老實實低頭認罪，交代自己一貫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這是你唯一的出路。」

提審員呷了一口茶，看看桌上一卷打開的案宗說，「把反動漫畫的炮製過程、思想動機，一老一實地交代出來吧。混是混不過去的，那只能加重自己的罪惡。坦白才能從寬，抗拒只能從嚴，你應當清楚政府的政策。」

反動漫畫，反動漫畫，還是這個該死的反動漫畫！它簡直就像一道緊箍咒，聽見這幾個字我就頭疼。可它究竟是怎麼回事，我一直無法回憶起來，更不用說什麼「作案動機」了。何況它本身就是一個似而非的東西，說是反動標語它並非標語，說是反動漫畫它又漫畫了什

麼？牽強附會的東西我絕不會接受，「惡攻」這個罪名，我更不會承認，這可是個掉腦袋的罪名。問題是我當時到底為什麼會寫寫畫畫，搞出這麼個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呢？唉，擋下這個慢慢再想吧，還是先把為什麼會在紙上寫下毛澤東三個字的由來說清楚。在華工的批鬥會上我不是見到了那張紙的原件麼，那毛澤東三個字的左上方，不是有「歌聲唱徹月兒圓」這句詩麼？這就是由來。

於是交代說張立國把我隔離在五系東二樓的實驗室裏要我寫檢查時，我不肯寫，就在紙上亂寫亂畫，隨心所欲地寫了一些東西。其中有柳亞子在50年國慶盛典上呈獻給主席的一首詞《浣溪沙》中的一句：歌聲唱徹月兒圓，因為這首詞是柳亞子特地呈獻給毛主席的，所以接著就在詩的右下方順手寫了毛澤東三個字。後來不知怎麼又突然想到《絞刑架下的報告》那本書，就在紙上畫了個絞架，但是沒有注意到這個圖形就畫在離毛澤東三個字不遠的右上方。我那時是隨手胡寫亂畫的，確實沒有留心這個問題。

後來我找機會溜出了實驗室，這張紙也就留在了桌子上，至於上面寫了些什麼，一點印象都沒有了，直到逮捕那天看到了照片，我才知道闖了大禍。具體情況也是這些天慢慢才回憶出來的，事情的經過就是怎樣。我承認將主席的名字寫到那個東西旁邊，是對主席極不恭敬；我也承認由於我的疏忽造成的後果極為嚴重，極大地損害玷污了偉大領袖的光輝形象。但是我實在不是有意這樣的，如果不是因為柳亞子那句詩，我絕不會無緣無故寫毛澤東幾個字……

「啊啊，行了，行了！」提審員打斷我說，「很好，你很會為自己辯護。你承認你的行為後果極為嚴重，也承認極大地損害玷污了偉大領袖的光輝形象。但是，所有這些你都不是出於有意，你是無意為之，有客觀效果但是沒有主觀動機。你確實非常善於用『但是』兩個字，大帽子下開小差。但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毛主席又教導我們共產黨人是主觀動機和客觀效果的統一論者，教導我們要透過現象看本質。我們正是通過大量現象，抓住了你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本質。滑是滑不過的，溜也是溜不掉的，承認後果否認動機也是行不通的，老實交代才是唯一的出路。說吧，為什麼要畫那張漫畫？」提審員銳利陰

冷的目光，像兩束X射線要透過我的腦袋找出那個「罪惡動機」，可是我實在沒有「動機」呀，沒有的東西如何交代？

當然，編出一套也很容易，但後果不堪設想，我對面坐著的「提審」就像餓狼一樣，正準備咬我的脖子哩，我決不能上當。本來我還打算像逮捕後第一次提審時那樣，引公安六條中的第二條來表明即使我是有意識地在紙上畫了什麼漫畫，但只要不投遞不張貼不散發，也不能構成反革命罪。但是面前這個提審員的橫蠻、霸道、先入為主，已經讓我對他毫無信心，便決定在這個問題上咬死不是故意這一點。無論再怎樣問，總之是「後果嚴重，沒有動機」，就是問成死罪也是這句話。要殺要剮，那是沒有辦法的事，但絕不引頸就戮。

我和提審員僵持了許久。提審員最後說，回去再好好考慮考慮吧。你交代也好，不交代也好，我們重證據，一樣可以給你定罪。而且不交代只會加重你的罪行，你不要抱著花崗岩的腦袋去見上帝。

我沮喪地回到我的號子。原以為轉到看守所後，通過正規的提審可以澄清一些問題，可以充分地講道理，實事求是地申辯，現在看來只不過是幻想。提審員需要的是老實交代，是認罪服法，是按照他們的需要，在鐵板上再多釘幾顆釘釘。除此之外，任何申辯都是狡辯，是態度不老實，是頑固不化，甚至是花崗岩的腦袋見上帝。但是上帝呀，究竟誰是花崗岩的腦袋？是我還是提審員？

地質局的老張那時還在號子裏，很關心我的提審情況。聽說我申辯碰壁，便勸我說，「其實你乾脆交代個動機出來，爭取個坦白從寬，也許還好一點，不然他們還是照樣要定你的罪。」他又講起他的教訓，一會兒承認，一會兒翻案，把問題搞夾生了，要是一開始就承認是美化美帝國主義不改口，那案子也早結了，也早回單位了，何至於在這個鬼地方受罪。我說我不存在什麼翻不翻案的問題，我從來就沒有承認過我那是反動漫畫。倒是你一開始就應該堅持那個萬歲是筆誤，堅持你沒有說美帝國主義萬歲的動機，那倒是真可能早放回單位去了。

老張聽了直點頭，說倒是、倒是。提審員問我為什麼要寫那個萬歲，我說我崇洋迷外呀，我嚮往美國呀，美國人的生活富裕呀。提審員說憑你這點本事，你去美國還不是窮人一個，街上討飯去吧，你嚮往美國什麼？唉，其實提審員都不相信我編的那些鬼話，我真的該堅

持是筆誤的。我說你現在堅持還來得及，但不要聽人家一拍二詐又變卦，千萬再翻不得燒餅了。只要不翻燒餅，負責你要不了幾天就出得了這個牢門。

老張聽我這樣一說情緒又變好一些，他背著手來回在號子裏踱著步，嘴上照例吹他熟悉的那些曲子，「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紅莓花兒開」啦，還有「花兒為什麼這樣紅」、「九九豔陽天」啦，吹著吹著，他竟小聲地唱起來：「九九那個豔陽天來喲，十八歲的哥哥呀坐在小河邊……」老張五音不全，一唱就走調，但那熟悉的優美旋律，還是把我帶進那部叫《柳堡的故事》的電影之中，那是我讀小學時看過的一部電影。那遙遠的少年時代，純樸的田園詩般的歲月，豔陽天一般的日子，自由自在無憂無慮的生活，你還會回來麼？我的嗓子也「蠢蠢欲動」，忍不住跟著唱起來：「東風呀吹得那個風車兒轉啦，小哥哥惦記著呀小英蓮……」一曲終了，意猶未盡，我清清嗓子，又唱起我喜歡的一首民歌「牧羊姑娘」：「對面山上的姑娘，你為誰放牧著群羊……」

然而還不容我把羊放下去，牢門就被甬道上值勤的班長狠狠地「砰」了一下。班長是個年齡與我相仿的小兵嘎子，他「哐」的一聲拉開門上的小窗板，厲聲問道：「誰在唱歌？站過來！」我和那位害得我「誤入歧途」違犯監規的老張一起，筆挺挺地站到門窗之前，準備挨訓。老張膽子小，渾身嚇得直篩糠極可憐的樣子。班長問誰先唱的？老張耷拉著腦袋，乜斜了我一眼，結結巴巴地說：「我先只是輕輕哼了一下，他就唱起來了。我不該哼的，我該死，我低頭認罪，接受教育，保證不再重犯。」

那年輕高個的小班長倒也並不上綱上線追究誰該死誰不該死，只是操一口河南腔問道：「你就是那個新進來的大學生吧？」我說是。他用指頭把門一敲挖苦說，「行啊，到底是大學生啊，都啥地方了，還有心思唱風流歌。」接著狠狠加上一句，「很可以改造改造的。」我有點狼狽，又覺得委屈，忍不住辯解說：「那不是風流歌……」「住嘴！」班長打斷說，「啥子對上個鄉下的姑娘，還不是風流歌是啥？」「不是對上個鄉下的姑娘，是對面山上的姑娘。」我還想與他認真，但是班長不聽這一套，說那還不是一回事。「反正再不准唱哇，再唱有你好受的。」說完梭板哐的一下又關上了。

我不再爭辯，也沒有什麼好爭辯的。反正不讓唱就不唱好了，管他是對面山上的姑娘，還是對面山下的蛤蟆，都與我有什麼相干？只是對面山上的姑娘被說成是對上個鄉下的姑娘，讓人憋氣得很，我為什麼要對上個鄉下的姑娘？不過，這個鄉下的姑娘要是能有辦法使我出獄呢？那恐怕也是可以對上一對的——莫說是個鄉下的姑娘，就算是個鄉下的婆娘說不定也幹。嗨，想到哪裏去了，還是面對現實吧。班長說得不錯，都啥地方了，胡思亂想有什麼用？

從提審的情況來看，反對過天津延中的經驗也好，為六十一人案翻案也好，都不是定罪的關鍵，關鍵是那個「漫畫」。前面那些東西，都是給這個「漫畫」定性做鋪墊，證明我犯下「惡攻」的罪行不是偶然。但漫畫本身是個似是而非不明確的東西，並沒有畫什麼人吊起來了。旁邊有主席的名字不假，但可以從柳亞子的詩中得到解釋。顯然提審員手中掌握的所謂「漫畫」並非什麼「鐵證」，所以提審員千方百計要挖動機。只要挖出了動機，就可以將一個似是而非的東西定成「鐵證」。因此，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不能為了所謂的「坦白從寬」，而編一套動機去應付。

在這一點上我與老張的情況完全不同。老張寫那個「萬歲」，也可能是筆誤，也可能是下意識，但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都具有偶然性，是一個孤立的問題。而且問題本身並不嚴重，與「惡攻」之類掛不上鉤。他如果編一套動機編得牽強，提審員甚至會不相信。比如他說他「嚮往美國」，提審員就反問他「你去了美國還不是個窮叫化子，你有什麼好嚮往的？」但是我就不一樣，我只要說因為在哪一個問題上對主席不滿，一時衝動「惡攻」了，那提審員是求之不得。所以只要我一日不交代動機、一日不承認是畫的「反動漫畫」，提審員就一日不會甘休；而我若違心地交代了、承認了，那也是送肉上砧板，結果只會更加糟糕。現在「反動漫畫」就像希臘神話中那柄「達摩克利斯劍」懸在我的頭上，對我構成極大的威脅。要去掉這把達摩克利斯劍絕非易事，除非我能拿出「漫畫」並不反動的有說服力的證明。問題是我究竟為什麼要畫這麼個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呢？

我整天都在號子裏抱著頭苦思苦想，但無論如何也想不出個頭緒來。而老張也是成天為他那個「萬歲」傷腦筋。有幾次我甚至看見他跪

在床板上，合上手掌向老天作揖，口中念念有詞，要大慈大悲的觀音菩薩來救他。但觀音菩薩哪裏敢到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監獄裏來救他？何況老張平日裏又不信佛，臨時抱佛腳有什麼用？我倒是自小就在教堂裏領了洗的，但讀書後就信仰了唯物主義，所以上帝也不來拯救我。指望「唯物主義」來拯救我，也指望不了，那些口稱「唯物主義」的人，在審問我時並不怎麼唯物。他們注重的是你腦子裏想些什麼，他們最拿手的是「誅心」。

提審之後又過了半個月，那個提審的又來審問了我一次，那個「漫畫」的問題自然少不了又要審一遍。但我咬緊牙關堅持不承認那是意在「惡攻」，堅持以「無動機論」來抗衡對方的「誅心之論」。提審員對此也無可奈何，於是又翻老賬，竟將文革初期教務處整我的材料也拋出來了。「工作組進你們學校時曾提出學習老三篇改造世界觀，你卻在辯論會上說學老三篇見鬼去吧，有這回事吧？」提審員翻著一迭材料紙說。「沒有這回事，」我回答說，「我是說通過學習老三篇三天改造好世界觀根本不可能……」「好了，不提這個，」提審員擺擺手說，「你們學校有人揭發說從未見你戴過毛主席像章，是這樣嗎？」「那是我怕像章掛在衣服上容易掉。」我解釋說，又補充道：「我是把毛主席的像章珍藏在心裏面的。」

「好一個珍藏在心裏，嘿嘿，說的比唱的還好聽。」提審員冷笑道。

「你用不著狡辯，我這也不過是隨便舉個例子罷了，」提審員說，「你對主席一貫不忠是有目共睹的，這方面的揭發材料多的很。你在班上公開對同學說你對主席像章根本就不感興趣，你文革中寫的大字報從來就很少引用毛主席的語錄。你在毛主席的光輝著作中更是大放厥詞，說主席這裏左了那裏右了，可見你根本就不承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你墮落到今天這個地步絕不是偶然的。」提審員教訓我一通後，又逐條落實我「炮打三紅」的罪行：「你在決派宣言草案中說革命委員會是折衷主義的產物，是各派臨時湊合在一起的一個暫時的同一體，是不穩固的，不可能長期的維持下去。還說什麼革委會必將由革命群眾自己來把它消滅掉。你這不是公然和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委員會好』唱反調嗎？」

「毛主席是說這個臨時權力機構的名稱叫革命委員會好，並沒有說革命委員會好。」我糾正提審員說。

「你不用狡辯」，提審員擺擺手不屑地說，「名稱和內容是統一的，難道叫革命委員會好，革命委員會本身還有什麼不好嗎？」我不再和他抬杠，但是心裏想，叫什麼名稱好的好是合適的意思，如叫某種人為混蛋好，是說這個人夠得上是個混蛋，難道混蛋本身就因此變得光彩了嗎？比如面前這位提審員就叫他二百五最好，但他就樂意當二百五了嗎？但與他如何說得清楚？不過提審員對這些似乎也並不十分在意，卻把我起草的「決派宣言」的一個作廢的稿子拿出來做文章。這份草稿中有段話認為，我們國家文革前仍是在襲用資產階級國家體制，要實行徹底打碎的原則。

「資產階級國家體制？什麼意思？」提審員問道，「難道我們現在的國家體制還不是無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的，要徹底打碎嗎？」

我回答說徹底打碎舊的國家機器是《紅旗》雜誌1967年第三期社論中提出來的。那篇題為《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的社論說，「被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控制的這一部分國家機器，實質上是資產階級國家機器。這些系統的奪權鬥爭，必須實行馬克思主義的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原則。」而文革中全國所有的省市都實行了奪權，按照《紅旗》社論的精神，我自然理解為原來的政權機構都已經為走資派所控制，實質上都是資產階級國家機器，都必須實行徹底打碎的原則。

至於國家體制的問題也不是我提出來的，也是《紅旗》社論上說的，它說毛主席在宣佈那張全國的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是廿世紀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的宣言時，就已經英明地天才地預見到我們的國家機構，將出現嶄新的形式，而上海一月革命中，主席又提出了「中華人民公社」這個名稱，所以我認為文革之前的各級政權機構都是仍在襲用舊的國家體制、國家形式，而通過文化革命將創造出一種嶄新的無產階級的國家體制，一種類似巴黎公社式的國家機構，實行巴黎公社的原則。這個問題其實文革剛開始時公佈的《十六條》就已經提出來了……

「等等」，提審員突然叫停，「你們口口聲聲說要創立巴黎公社式

的國家，要實行巴黎公社的原則，說說看，什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

提審員的提問自然難不倒我，因為我在獄中已經把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和列寧的《國家與革命》讀得滾瓜爛熟。我回答他說，巴黎公社的原則就是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所有行政部門的公職人員一律由選舉產生，對選民負責，隨時可以撤換。自下而上一切公職人員都只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薪金，並且不享有任何特權；廢除享有特權的官吏，取消常備軍……

「慢」，提審員又一次叫停，「你剛才說什麼？取消常備軍。對了，你在一篇日記中不就說過要根絕常備軍麼？可馬克思當年所說的常備軍是指的資產階級的軍隊，而我們現在的常備軍是無產階級的子弟兵，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創建和領導、由林副統帥直接指揮的人民解放軍，按你的意思豈不就是要根絕人民解放軍，是不是？」

提審員這一問問得很陰險，似乎問得很有邏輯性，但是我不鑽他的籠子，想「請君入甕」沒那麼容易。我對我的那段早就被《新華工報》批判過的日記記得非常清楚，無論是《新華工報》，還是面前的這位提審員，在這個問題上都不過是斷章取義。我一字不漏地向提審員背出日記的原文，然後對日記內容作了一番解釋，指出我日記中明明是說馬克思當年的設想由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創造性地解決了，怎麼就一口咬定我是鼓吹取消解放軍呢？難道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是指示取消解放軍嗎？……

見我說得頭頭是道，提審員沒轍了，不再談「炮打軍隊」的問題，於是說日記上的內容我們還會去核實，但是決派宣言中你還有一句是說決派將在鬥爭中得到鍛煉，成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難道你不知道黨才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嗎？你是不是想用你們決派來取代共產黨？煽動群眾脫離共產黨的領導？提審員的這一問又是非常的厲害，回答不好又會上綱為「反對黨的領導」、「企圖取代黨的領導」，罪莫大焉。不過我對此也早有準備，還是用毛主席的指示來為自己說過的話辯解。

我說「決派」即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是主席去年11月份在一次關於教育革命的批示中提出來的。主席說到進行無產階級教育革命的問題時，並沒有說要依靠黨組織、依

靠黨員——因為黨組織文革一開始就已經癱瘓掉了，無從依靠——而是說要依靠學校中廣大革命的學生、革命的教員、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們中間的積極分子，即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我對主席這個指示的理解是主席將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看作是進行無產階級教育革命的先鋒隊了。先鋒隊就是站在革命隊伍的前頭，是起帶頭作用的。毛主席在「青年運動的方向」一文中就說「五四」以來，中國青年起了某種先鋒隊的作用，這和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組織這一點並不矛盾。

我舉例說，文化革命初期紅衛兵就起過先鋒隊的作用，但並沒有人說紅衛兵就取代共產黨了。我認為主席提出「決心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這個概念，就意味著這個派別在這一階段起先鋒隊的作用了，也並非是說用決派取代共產黨。我寫「決派宣言」就和文革之初一些中學生寫「紅衛兵宣言」是一回事，難道我在宣言中的一些提法，比那些北京的中學生的宣言還過分嗎？何況決派宣言的這一稿，始終只是作為一份討論稿在內部傳閱，既沒有定稿也沒有發表，實際上是作廢了。發表的一稿宣言只是涉及農民運動的問題，這都是有案可查的。

我說的這些，在提審員看來自然都不過是在「狡辯」，可是除了搬出主席本人的話來為自己「狡辯」，我還能怎樣？「以子之盾，禦子之矛」是我唯一的選擇。但是提審員也有他的說法，說我是一貫的「打著紅旗反紅旗。」他說我最好不要狡辯，坦白交代才是唯一的出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我當然知道，黨的一貫政策嘛。但是號子裏的犯人對這個政策卻有一種完全不同的理解，他們說那是個誘餌。實際情況是「坦白從寬，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回家過年」。

實際情況是不是真是這樣，我不敢妄言。但坦白也好，抗拒也好，這都僅僅是個態度問題，關鍵還是應該看事實——是有罪還是無罪，是罪大還是罪小。無罪的人受冤屈的人當然要抗拒認罪，難道因此就要對其從嚴嗎？這豈不是冤上加冤？而那些殺人放火罪大惡極的罪犯，難道因為其坦白了就從寬處理嗎？所以「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只能是針對一定的場合，針對某些案犯而言，絕不具備普遍的指導意義，將這句話作為審案判案的基本政策，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只會製

造數不清的冤假錯案。但是在我受過審訊的任何一間審訊室裏，這八個字都是赫然寫在牆壁上用來威懾受審者，不知有多少無辜者被這八個字所蠱惑，放棄了正當的抗拒作出違心的坦白，而成為法律的可憐的犧牲品。

至於我自己，文革中所做的一切，自信沒有一件是不可告人的。我在所寫過的幾十篇文章裏，都從來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我可以承認我的觀點有許多是不成熟的，甚至是錯誤的；我也可以承認我有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的言論，有干擾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言行，我可以認罪。但是絕不為了所謂「坦白從寬」，而按照審判員的意思「坦白」「交代」並不存在的東西，比如「反動漫畫」的作案動機和作案過程之類。無論這件事最後如何定性，至多也只能承認「客觀上玷污了偉大領袖的形象但沒有主觀意圖」，這是一條必須守住的底線。

我曾經就這一想法試探過老所長的意見。我覺得所長是老政法出身，懂得點法律，人也好像比較正直，對我不抱成見，於是有些所長找我談話時，我便試著大膽地向他談到了「漫畫」的問題。我說提審員在提審中多次要我交代「炮製反動漫畫」的動機，但事實上那並不是一個確鑿的「漫畫」，也不存在「動機」，在這個問題上我該怎麼辦呢？

所長沉默了一會說，實事求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要相信政府、相信群眾。我說提審員說我民憤很大。所長冷笑一下說，什麼民憤很大，全市幾百輛汽車上街營救你你知道嗎？我說聽說過。所長說，哼，連我都上街參加過營救你的遊行呢！不過現在不提這了，那都是搞派性。我於是知道這位所長也曾經是個造反派，難怪我入監後他對我多有照顧。所長又問我在這裏生活上有沒有什麼困難？我說別的也沒有什麼，就是飯不夠吃，成天餓得發慌。所長說定量是國家規定的，伙食費也只能按規定來，但是我可以想想別的辦法。

後來這位所長還真的幫過一次忙，特地將一個年老的犯人調進我這個號子。這個原來在一個勞改農場管犯人的老頭，嗜酒成性乃一酒鬼。這酒鬼一次酒醉之後色膽包天，竟敢姦污勞改的女犯，東窗事發後被送進了監獄。老酒鬼入獄前是成天泡在酒罐子裏的，入獄後酒沒得喝了，弄得一點食欲都沒有，一餐三兩飯，總要剩下三分之二。老

所長把他調進我們號子，也就是調一個飯鉢子進來了，這使得我與號子裏其他幾個「同犯」都很是興高采烈了一陣。

然而正所謂有其利也必有其弊，這老酒鬼雖能剩下一些飯菜供我們度饑荒，但晚上睡覺時打起呼嚕來也是不同凡響。從他那圓呼呼肉滾滾紅通通的酒糟鼻子中發出的鼾聲，究竟高達多少分貝，我們自然測不出來，但是牢房窗子上的窗玻璃被震得吱吱直響，倒是絕非誇張。這位酒麻木在勞改農場管犯人多年，對手下的犯人們想必一貫頤指氣使「嗤之以鼻」，那被酒精泡腫了的酒糟鼻練出如此出類拔萃的呼嚕聲正不必大驚小怪。《三國演義》中不就形容那位張翼德「鼻息如雷」麼？只是這樣一來苦了我們幾個同犯。特別是我，本來就睡不了幾個鐘頭的囫圇覺，老頭子的鼾聲一響，我就只有整晚整晚地「於無聲處聽驚雷」了。

號子裏的犯人被吵得睡不好覺就推他，讓他側著身子睡，但怎麼推都推不醒他，只好幾個人合力把他的身子推成側臥。但這老頭子道行頗深，能夠「左右開弓」，左側也好右側也好，照樣鼾聲無礙。沒有法子，有個犯人就說，他原先住過的號子也有個人打鼾打得厲害，用鞋底板敲了他鼻子幾下，就再也不敢打了。於是如法炮製，拿了隻鞋子用鞋底敲老頭子的鼻子。先輕輕敲了幾下，老頭子根本沒有反應，只好重重地敲。這一敲倒是管用了，老頭子一下子驚醒過來，直起身哇哇地亂叫，被酒精泡得醉熏熏的眼睛驚恐地四顧，但立刻又倒在床板上呼呼地睡著了，且呼嚕報復似的打得愈發厲害。那呼嚕聲怪聲怪調的像巫婆在叫魂，弄得人腦子裏像有條蚯蚓在彎彎扭扭地爬，難受極了。我就向所長報告，要求把這個酒麻木調出號子。所長問明情由歎息說，「給你個飯鉢子，你都不要」，就把老頭子又轉到別的號子去了。這樣一來號子裏的幾個「同犯」又為飯鉢子弄扔了埋怨了我一番。

後來，大約是69年的春節前後，那個靠邊站了一段時間的老所長調走了，也有說是進「學習班」交代問題去了，大概與他參加過造反派有關。新來的那個馬軍代表正式開始了他的「領導一切、指揮一切」。那年頭不只是監獄看守所，好像所有的機關學校企事業單位都派駐了軍代表，由最最忠於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軍隊來領導一切。這些軍代

表雖然對地方上的業務往往一竅不通，但在林副主席的直接指揮和領導下，「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個個都是「毛主席的好戰士」。所以由思想覺悟最高、黨性最強的軍代表領導一切、指揮一切是再合適不過。

這位馬軍代表上任不久，正逢黨的「九大」召開。不知為什麼，開「九大」就像開「黑會」一樣，是偷偷摸摸地開的。一直到閉幕那天，才從廣播裏聽到「九大」已經神不知、鬼不覺地開了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於是那天風也不放了，馬軍代表和他的同事們，興沖沖地去參加慶祝「九大」閉幕的盛大集會。軍代表們胸前，都品字形地別了三個大大的毛主席像章。像章的直徑估計都在15公分以上，一個個足有菜盤子大，金光閃閃的，就像古代的武士身上披掛的盔甲，威風極了。可惜「珍寶島事件」※24剛剛發生過了，不然馬軍代表們披掛起這種「盔甲」，說不定上了前線是可以「刀槍不入」的。

我們犯人們在「九大」閉幕那天也歡欣得很，不過不是歡欣「九大」的召開，而是歡欣我們那天吃到了肉。須知自馬軍代表來看守所後，我們打牙祭的機會就大大地減少了，所以犯人們成天盼著開葷。俗話說，臉上無肉，做事寡毒，這位長得精瘦，臉上刮不出二兩肉的馬軍代表，對我們犯人既刁鑽又刻薄，刻薄得就像一部丹麥電影《瞎子的領路人》中那個刁鑽古怪的教士。那個教士對跟他的那個流浪兒非常吝嗇，每拿出一塊風乾的肉乾打牙祭，先都要比較半天，挑一塊最小的拿出來。然後還要在這個小得不能再小的肉乾上割下一點，留作下次用，或者掰一塊下來塞進自己的嘴裏。我們這位馬軍代表當然不會是繼承了那位教士的衣鉢，他也許只是在「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罷了。毛不是指示對階級敵人「決不施仁政」嗎？一個月給犯人好幾兩肉吃，就大有「施仁政」之嫌，當然應該革除掉。

這位馬軍代表又深諳林副主席所謂「物質越少的地方越是要重視精神」指示的真諦，所以特別注重強化犯人的學習改造。原來老所長在時，犯人們在號子裏來回走動也可以，東倒西歪也可以，互相聊聊天也可以。但是馬軍代表大力肅整紀律，規定除睡覺時間外，一律在自己鋪位上面朝牢門端坐不動學習毛主席著作，特別是要熟讀並能背誦「老三篇」。每天放風時，馬軍代表還要隨機點一兩個號子的犯人集體

背誦，這就使得一些沒什麼文化從不知背書為何事的犯人叫苦不迭，有的只好混在同犯之中濫竽充數。

但馬軍代表明察秋毫，豈容這種「南郭先生」蒙混過關，便時不時單挑一些犯人單獨背誦。這對於沒有文化的那些犯人無疑是將了一軍，其中一些記性差的只得硬著頭皮亂背一氣。有個犯人背《紀念白求恩》時，開頭還馬馬虎虎，什麼「白求恩是加拿大共產黨員，五十多歲了，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啦，「不幸以身殉職」啦，後來就亂了套，什麼「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啦，「死了以後還有兒子，兒子死了還有孫子」啦，全混成了一團，把老三篇揉成了三合面。不但聽他背書的犯人們都蒙著嘴笑，警戒的班長們也忍不住笑，就連馬軍代表自己也忍俊不禁，只能罵一聲「媽拉個巴子簡直是狗扯羊腿」了事。

除背書外，馬軍代表還規定犯人放風時要集體高唱「語錄歌」，其中以「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為主打，其他諸如「什麼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麼人站在反革命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之類的歌也是經常唱的。像作家張賢亮在他的小說中寫的勞改犯們用猥亵的聲調唱「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這種語錄歌的事，在看守所裏根本不可能發生。放風場上一群頭皮剃得精光的犯人，一個個不是「反動的東西」，就是「社會的渣滓」，誰敢唱「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啊？他們只能在刺刀的監視下，扯著喉嚨驟吼似的唱「凡是反動的東西……」

許多年後在電視螢幕上，看見廣告裏播放一群昆蟲邊跳邊唱「我們是害蟲！我們是害蟲！」時，我就禁不住會想起當年在看守所的放風場上，我們這些「牛鬼蛇神」唱「凡是反動的東西」的情景。我們這些犯人，不要說其中一些人並沒有犯什麼罪，就是真正的罪人，也應尊重他的人格而不應肆意作踐，但是在看守所這種地方，哪裏還談得上什麼人格不人格？

就在我們在放風場上大唱「凡是反動的東西」的時候，社會上開始了「清理階級隊伍」。所謂清理階級隊伍，當然主要是清理混進造反派中的階級敵人。階級敵人本來就是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的，豈能搖身一變變成造反派，造紅色政權的反。造過反的都必須一個個

地清理出來，這就是「秋後算賬」。算賬的結果是愈來愈多的「階級敵人」被送進看守所來，享受唱「凡是反動的東西」的語錄歌的恩典。而能享受這種恩典也還是幸運的，有的人連這種歌都來不及唱就完蛋了。報上有消息說北京召開萬人公審公判大會，公開判處了一大批階級敵人，其中有幾個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炮打「三紅」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被當場宣佈判處死刑。既然「首善之區」開了殺戒，各個地方也必然效法絕不會手軟，武漢的軍政領導在這方面更是從來不甘落後的，則我的處境必定「汲汲乎殆哉」。

我的擔心並非杞人憂天，因為就在北京那個公審大會開過之後不幾天，馬軍代表就找我談話了。他問我報上登的那個北京召開公審公判會的消息看過了沒有？我說看過了。他問我有什麼感想？我說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他說聯繫到自己的罪行有什麼感想？我說我罪大惡極也夠斃了。他說能認識到這一步就好，但光認識不夠，要在思想上真正作好最壞的準備。「抓一批、關一批、殺一批是革命形勢的需要，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需要。」老馬說，「如果形勢需要用你來殺一儆百，你也應該認識到是自己罪有應得，而不應該有任何怨言。當然這說的只是最壞的一種情況，一般來說，對於你這樣的學生，政府還是立足於挽救的，如果不是看你是個學生的話，依你的罪行恐怕早就有幾多殺幾多了。」老馬一番話嚇得我汗毛直豎，就聽見老馬繼續說據來提審的人說我的認罪態度不好，交代問題避重就輕，在關鍵問題上始終回避要害。老馬說這樣的態度是非常危險的，是與政府繼續為敵，如果堅持頑抗下去那只能是自絕於人民。

老馬說的關鍵問題要害問題，自然就是指的那張「漫畫」。但如果我為了圖個態度好而承認那是一張「反動漫畫」，並編一套「反動動機」來應付，到頭來以「反革命惡攻」罪被殺了頭都沒有話說；然而如果堅持不承認不交代而實事求是，又將落一個頑固不化堅持與政府為敵的罪名，自然還是可能被從嚴處理。而且「惡攻」的罪名，我即使不承認，他們還是照樣可以以重證據為名予以認定。那麼究竟是承認還是不承認、是交代還是不交代好呢？我處於一種兩難的「囚徒困境」，好像無論是承認還是不承認、交代還是不交代，政府都有理由置我於死地。馬軍代表對我所說的一番話也不知有沒有來頭，是不是代表了哪

一級組織的意思？反正我越琢磨越覺得不對頭，老馬難道是在提示我要作好「伏法」的思想準備嗎？可是我只不過寫過幾篇文章，並沒有犯下殺頭的大罪呀。

從馬軍代表的辦公室裏出來，回到號子裏我情緒十分低落，晚飯也只勉強扒了幾口，晚上更是久久無法入睡。我才只二十大一點呀，難道就要作屈死鬼？實在不敢想下去。但不想又是不可能，想得最多的是一旦哪天真的上面派幾個人來把我叫到提審室，宣佈判我死刑我怎麼辦？這並不是我杞人憂天自己嚇自己，「曾劉首長」一心要置我於死地是顯而易見的，所謂「反動漫畫」正好授其以柄。這些對平民百姓握有生殺予奪權力的權貴要用「惡攻」的罪名除掉我，還不是跟殺隻雞一樣容易嗎？

那張所謂的「漫畫」不明不白，但是把我害慘了，冤死了還要留下個「惡攻」的罪名遭萬人唾罵。是不是臨刑前也學電影中那些革命者，喊幾聲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以表示自己並不是反革命呢？似不必。了便了了，「反革命」就反革命唄，「愚忠」是當不來的。唯一的願望是與父母姐姐見上一面，要向父母磕幾個頭，感謝他們的養育之恩，拜託姐姐替我照顧好父母，代我盡一份孝心。最後要告訴他們我是冤死，死不瞑目，倘歷史真有一天能宣佈我無罪，就到我的墳頭上告訴我一聲。我那時能夠想到的，充其量也就是這些了。何況臨刑前能不能與親人見一面，都是個問號，想這許多傷感的事又有什麼用呢？

夜很深的時候，迷迷糊糊覺得自己真的就被提出牢房，押到一個亂墳崗上，手臂朝後綁著，後面跟著個槍兵，然後行刑的槍聲響起來。我驚醒，一個鯉魚打挺直起身來，那槍聲大概是班長的槍托在門上碰了一下的響聲。但夢中的經歷太逼真了，我就像真正上了一回法場。夢醒之後好半天，我心裏都怦怦直跳，身上大汗淋漓，眼淚也禁不住簌簌地往外流。四周是死一樣的寂靜，寂靜得令人恐怖，幾個「同犯」睡得正熟也像死人一樣。人只能死一次，為什麼我在夢中還要「預死」一次，這不是太殘酷了麼？倒是聽老人們說過，夢見人死那人反會添壽，但從來沒有聽說過夢見自己死是禍還是福。也有說夢中的事和實際情況是相反的，但我寧可相信「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夢中被殺頭恐怕不會是什麼好兆頭。

我於死其實是有所準備的。「反動漫畫」如真正坐實了，是砍頭的大罪，我如何心中無數？「漫畫」的問題我一日解釋不清楚，我頭頂上懸著的那柄達摩克利斯劍，就隨時都可能落下來。而我又如何能將那個胡寫亂畫的該死的「漫畫」解釋清楚呢？莫非是「天亡我」乎？

當然這些都是我自己在胡思亂想，我並沒有被拉出去「大劈」。但是隔一段時間，少則十幾天多則個把月，總會有人來提提審，讓我交代「漫畫」的問題，而我總是以客觀上玷污損害了偉大領袖的形象但無主觀動機來「搪塞」。這種「搪塞」自然不能令提審的人滿意，他們需要的是我「坦白交代」自己為何與如何「惡攻」的罪行。他們說只有坦白交代了罪行才能認識罪行，才能接受他們的「挽救」，才能「重新做人」，總之他們對我是非常的仁至義盡。

但是我知道魯迅先生早就說過，那「仁義道德」的字縫中寫的是兩個字「吃人」，是「獅子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他們大家連絡，佈滿了羅網，逼我自戕。」我心明肚亮，絕不鑽他們的羅網，絕不自戕，絕不承認自己畫了什麼「反動漫畫」。這樣相峙了好多回之後，那些急於從這個問題上對我進行突破的提審員們，眼睛都變得紅紅的像兩粒鬼火。

有一天來了一位穿軍服的提審員單獨對我提審（通常來提審的都是兩個人）。這個軍人高大而威猛，但他與其他提審員不一樣，並不逼我交代「反動漫畫」的作案動機和作案過程，而是要我實事求是地把問題說清楚。

「你一直堅持客觀上污辱了毛主席，但是沒有主觀上的動機，」軍人望著我說，「但這樣說是過不了關的。現在你好好回憶一下，你那個圖案畫的究竟是什麼？」

「畫的究竟是什麼？」我被提審員這句突如其來的問話一下子搞懵了，「不……不是畫的個絞刑架嗎？不是絞架還能是什麼？」

「絞架是這個樣子嗎？」軍人直直地盯著我的眼睛反問道。

「那是什麼呢？」我臉上一片茫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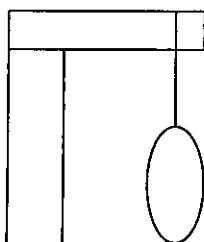
「你自己回號子裏仔細去想吧！」軍人合上案卷站起身來，「今天就審到這裏。」

我魂不守舍地回到號子，一宿無眠，腦子裏一團亂麻在飛旋。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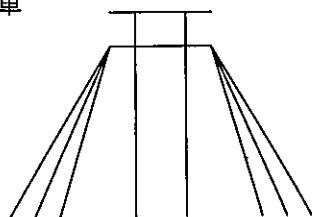
漸地這團亂麻變得清晰起來，挽成一個線球，我從中抽出了那條將我從絕望的迷宮中引出來的「阿莉阿德尼線」。我記起來了，我畫的那個東西根本就不是什麼絞架，而是一架絞車。我在被捕的那天就曾回憶過那個「東西」大概是一個絞車，因為我亂寫亂畫時，我所在的那個實驗室裏，正好就有一架作實驗用的船用絞車。但是我的交代被認為是「狡辯」，是「態度極不老實」，辦案人員認定那只能是個「絞架」，我竟然也就承認了是個「絞架」，而將「絞車」二字遺忘得乾乾淨淨。我在後來的提審中只知道堅持「絞架」與主席的名字無必然的聯繫，堅不存在「惡攻」的動機，竟不曾想到要從根本上否認「絞架」的存在，我怎麼竟如此糊塗呢？這位好心的軍人一定是查閱過我的全部案卷，發現了這個可致我於死地的問題的端倪，然後利用提審的機會向我指破迷津。這是上帝派來拯救我的天使啊！

天亮之後我即向幹部要紙要筆寫交代材料。我在材料中說我終於回憶出「漫畫」的真相——我畫的那並不是什麼「絞架」，而是一副船上用的「絞車」或「絞杆」。之所以想到畫「絞車」，是因為當時關我的實驗室裏，正好有一架船用絞車。我還在材料中舉出我畫的東西絕不是「絞架」的理由。我畫了一架在蘇聯影片《丹娘》中見過的法西斯的絞架的圖形，再將我畫的「絞車」與「絞架」作了對照：「絞架」是有繩索和索套的，本身通常為倒L形，而「絞車」是兩邊有繩索而沒有索套，一般為T形，這是二者之間的根本區別，如下圖所示：

絞架



絞車



我還指出，我畫的右邊那個圖形兩邊的線條是分別向左右傾斜的，而且兩邊都有多股，這也不符合「絞架」的結構。因為「絞架」的繩索必須是垂直向下的，而且通常只是一根就足夠了。（後來再仔細琢

磨，我畫的那個圖形其實連什麼「絞車」或「絞杆」也不像，它更像是大型船舶上用的「桅杆」。實際上直到今天，我仍然不清楚我當時究竟是畫了個什麼東西和為什麼要畫那東西，總之，天曉得。我那時只是想證明那東西不是「絞架」就行！）

我將這份「交代」通過看守所轉給辦案人員後，大大地鬆了一口氣，但我還是擔心提審員來找我的麻煩。我知道那些眼睛紅得像兩粒鬼火的提審員，是不會輕易在這個要害問題上善罷甘休的。「曾劉首長」早已將「漫畫」定性，辦案子的豈能容我將這個「鐵證」推翻？

後來果然有提審員在提審時仍抱著所謂「絞架」不放。但我不再害怕，理直氣壯地和他辯論，駁得提審員啞口無言只能乾瞪眼，再後來提審的就不大提那個「反動漫畫」了。我估計一定是辦案人員內部在「漫畫」這個問題上早就有分歧，而在我提出「絞車」、「絞杆」說之後，對「反動漫畫」持懷疑態度的這部分人就佔有了主動。如果不是辦案人員中有這部分人為我說話，哪怕我提出再有力的理由，那個「反動漫畫」是否認不了的。文革中指鹿為馬，信口雌黃，屈人致死的事情還少嗎？我是不幸中之大幸遇到了好人，才總算讓那柄懸在我頭上的達摩克利斯劍，化作了一縷輕煙。

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輕鬆——當初逮捕我的主要罪證已經不復存在了，其餘的問題都是「極左」性質，不過是小將犯錯誤而已。而小將犯錯誤又絕非我一人，比我問題嚴重的多著呢。主席不是說過允許小將犯錯誤，也允許小將改正錯誤嗎？我犯了什麼了不得的錯誤不允許改正呢？我樂觀地等待政府在弄清「漫畫」真相後，按政策處理我的問題。「既不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放過一個壞人」是黨的一貫政策，我堅信我是好人，不是壞人，黨和政府終究是不會冤枉我的。「反動漫畫」和「惡攻」的罪名不就終於澄清了嗎？黨和政府看來對我這個學生還是實事求是的，坐牢的日子該是屈指可數了。

然而我實在是過於樂觀了，我不知道在那柄達摩克利斯劍摘去之後，我頭頂上的危險不但沒有消除，一場更加恐怖更加凶虐的風暴正在向我襲來。我和成千上萬無辜的人，正面臨可怕的滅頂之災。



## 第十七章

# 五雷轟頂「九·二七」

「反動漫畫」的問題澄清後，我覺得一個致命的包袱終於卸下來了。希臘神話中有個叫阿基里斯的勇士英雄蓋世，唯一能致他於死命的是他的腳跟。「反動漫畫」就是我的「阿基里斯之踵」，現在這個「踵」也沒事了，提審的還能奈我何？只是看守所的日子太難熬了，如果不是隔三岔五的提審，這種單調的囚禁生活，簡直每天都像一滴水和另一滴水一樣相似。犯人對這種生活的印象非常荒蕪，像照在苔蘚上的月光一樣，一層覆蓋著一層，蒼白、淺浮而模糊。唯一能盼望的是明天，但明天等來的仍然是失望。像夢魘一樣壓迫我許久的「反動漫畫」的問題既然已經真相大白，當初逮捕我的依據也就不再存在，但是釋放我的跡象還是一點都看不到。我被羈押在獄中已快一年了，不是說看守所只是個臨時羈押人的處所，問題審查清楚了就要及時處理麼，為什麼要對我這樣？難道就這樣沒完沒了地一直關下去麼？

除了對於前途的憂慮，還有對於被關瘋的恐懼。與各種各樣的流氓、小偷、殺人犯、強姦犯關在一個籠子裏，精神上受到的傷害是非常厲害的。中國有句古話，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離開學校還未踏上社會，就陷入了一群社會渣滓的包圍之中。我能保持住自己的純潔而不墮落，我能在這黑暗王國裏避免精神和肉體的崩潰嗎？文天祥在他被元人囚禁於土室中時作《正氣歌》，說到他的處境時說：「哀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他是憑藉一股什麼樣的正氣，才將那「陰房闇鬼火，春院燭天黑」的極其悲慘的囚室視作了「安樂國」，並抗拒了一切邪惡之氣的侵害呢？他說是靠了一股浩然之氣，

即天地間之正氣。但他是面對兇惡的元兵，是堅守民族的氣節，而我是被關押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監獄裏，是被視為專政對象接受革命人民的審查，儘管我覺得我是被冤枉了，可我的「正氣」在哪裏？如果我代表了「正氣」，那對我實行專政的政權豈不是代表了「邪氣」？而那時在我看來這又似乎是不大可能的。這很使我苦惱，正像但丁在《神曲·地獄篇》中說的：

從我這裏走進苦惱之城，從我這裏走進罪惡之淵，從我這裏走進幽靈隊裏。

苦惱纏繞著我，罪惡籠罩著我，各種幽靈包圍著我，我如何擺脫這重重的包圍？

另一件令人苦惱的事是夏天近了。我一年前剛進監獄時是獨處一室，室內有床有帳並且允許點蚊香。如今和幾個犯人同居於斗室之中，腥臭污穢之氣自不必說，屋子內全不通風炎熱異常，完全就像一口蒸籠。40℃高溫的鬱蒸之下，哪怕光著身子只穿條內褲，也是大汗淋漓，我們每隔一會，便將濕漉漉的背脊往牆壁上貼一貼，讓牆上的石灰吸乾背上的汗漬。而最難耐的是夜晚，室內悶熱得連床板都是飛燙，要躺下睡覺，只有用涼水把床板澆濕，或者把毛巾在涼水裏浸一浸，墊在床板與背脊之間隔熱。等毛巾也變得發燙了，就再放進涼水裏浸一遍。一晚上如是者再三，最後連臉盆裏的涼水也變成了溫熱水。

除酷熱難當之外，蚊子也成群結隊地飛進囚籠裏來趁火打劫。雖然窗子上蒙有細鐵絲網，但蚊子卻能千方百計地從空隙處鑽進來。牢門上開的那個觀察孔，也是蚊子偷襲犯人的一個通道。觀察孔是裝有可移動的梭板的，但這個梭板晚上照例是要拉開一部分，好讓「班長」隨時監視牢房內的動靜，這就給蚊子的自由出入大開了方便之門。每天擦黑之後，囚室裏滿屋子蚊子飛舞，只等你躺下之後，便紛紛輪番向犯人進攻。蚊子們大概都是學過靜脈注射的，一扎一個准，肚子馬上鼓脹起來，吸飽後便飛到牆壁上小憩，一個個血紅血紅的像小尖椒似的掛在牆上。

蚊子的助紂為虐使我們忍無可忍，本來就熱得毛焦火辣，「無產

階級專政」當然是不能反抗的，這小小的蟲兒難道也不能反抗？反正也睡不著，就爬起來自衛反擊，「血債要用血來償」嘛。雖然蚊子身上的血，其實就是我們自己身上的血，但還是要討還血債，就在牆壁上找目標。目標一個個紅通通的，自然也不難找，見一個拍一個，見兩個拍一雙。拍死後再使勁一拖，雪白的牆壁上便拖出掃帚星尾巴似的長長的一道血痕。有一晚這樣的血痕我一個人就在牆上拖出了四十幾道，戰果不可謂不輝煌。若照這樣子拍下去，用不了多久，這牢房裏就差不多「全國山河一片紅」※25了，很可以慶祝一下的。

但有天馬軍代表突然光臨我們號子檢查什麼，自然發現了滿牆上「血染的風采」。他老著臉非常惱火地說：「蚊子叮一叮有什麼了不起，要這樣興師動眾地打。打死也罷了，還要故意一拖。拖什麼拖？搞得一牆的血，是不是別有用心，有意醜化無產階級專政呀？」這位軍代表真是喝涼水不怕碜牙，讓他自己到這號籠裏來蹲上幾天，將可惡的蚊子們喂飽之後，他恐怕才會和我們一樣對蚊子「同仇敵愾」，說不定拍蚊子拍得比我們還起勁呢！

軍代表視察號房後不久，大約還聽到其他犯人對監室的生活多有抱怨，有一天在放風時，便向全體犯人上起了政治教育課。這也是軍代表和原來的管教幹部顯然不同之處。原來的管教幹部在放風時間是儘量讓犯人自由活動，比如洗衣呀、跑步呀、做操呀、曬太陽呀，從不向犯人發表什麼長篇演說；而軍代表則講究「政治掛帥」，講究「用毛澤東思想佔領每一寸陣地」，連犯人放風的有限時間也要劃出一塊來用作「政訓」。政訓的主講，自然總是那位馬臉的馬軍代表。像蚊子叮犯人的血之前，總是要嗡嗡嗡地講一篇叮血有理的大道理一樣，這位馬軍代表也喜歡牧師佈道似的向犯人講道。

比如有一次在犯人唱「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的語錄歌時，他就針對一個被同犯揭發只動嘴皮不發聲音搞假唱的犯人講了一大套：「唱，還是不唱；是真唱，還是假唱、是自覺地唱，還是勉強地唱，這是個態度問題，是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態度問題；是認不認罪、服不服法的問題，是願意觸及靈魂、脫胎換骨，還是堅持反動立場、頑固不化的問題，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政治問題。當然，像這個頑固分子這樣不肯唱、假唱的人只是極個別的，絕大多數人還是願意

唱，而且唱得很認真的。開始唱這支語錄歌時，也可能會感到彆扭，臉上掛不住。但只要堅持唱，天天唱，唱進去了，你就會漸漸覺得那個反動的東西在離你而去，那是過去的你，而不再是現在的你。你就會愈來愈痛恨過去的你，你會站起來主動地要求打倒你自己。不破不立，只有把過去的你打倒了，新我打倒舊我，你才會有今後的新生。」

你看，馬軍代表的口才多好啊。有過去的你，還有現在的你，一個是舊我，一個是新我，新我非常痛恨舊我，要打倒舊我，兩個我在那裏打架。但是打來打去，還是只有一個我在這裏坐牢，又不能從舊我中「複製」出一個新我釋放出去，只好新我舊我一同坐監，多冤啊。其實倒是馬軍代表手下的一個大老粗些的軍代表說得更直截了當一些，他說語錄歌是廣大革命群眾唱的，像你們這種牛鬼蛇神本來根本就沒有資格唱，現在特許你們唱一點是抬舉了。而有人居然還不肯唱，那是給臉不要臉，是反動透頂，不可救藥。當然，這位軍代表說話的水準就比馬軍代表差一點，他不像馬軍代表那樣有理論，時不時還會掉點書袋。現在馬軍代表又要講理論、掉書袋了。他這回竟給犯人們談起了什麼是「權威」。

「什麼是權威呢？」老馬點燃了一根香煙，叼在嘴角上猛吸一口，從嘴的另一個角不一會就有清煙嫋嫋飄出，「你們中間誰能回答這個問題？」

犯人們自然是被問得只能面面相覷，或如一句歇後語說的，張飛穿針——大眼瞪小眼。也許大多數人只會想到眼前這個吞雲吐霧的軍代表就是權威，有權又有威，不是權威是什麼？老馬見沒有人回答，便說「那我就要點將了。」他首先指一個犯人讓回答。那犯人想了想頭一歪，說：「政府就是權威。」老馬搖搖頭，又點另一個。另一個犯人說「毛主席是權威。」老馬還是搖頭，再點。這第三個犯人很坦白地說他不知道什麼叫權威。於是又一連點了好幾個，也有說不知道的，也有說得牛頭不對馬嘴的，有一個說得尤其離譜，說他原來的「拐子」的拳頭就是權威。只有一個人說得好像是有點依據，他說「革命就是權威」，並且說是恩格斯說的。但是老馬糾正說恩格斯是說革命是天下最權威的東西，革命是一種非常權威的手段，但這並不就是權威的定義。「究竟什麼叫權威呢？66號！你不會沒有讀過恩格斯的《論權威》

吧？你說說權威是什麼意思？」老馬最後問到我的時候，他已經在悠然自得地吸他的第二支煙了。

馬軍代表的確說得不錯，我還真讀過恩格斯的《論權威》，而且不祇讀了一遍。恩格斯似乎只是談論權威在某種特定條件下的表現即將某種意志強加於人，以及對這種意志的無條件的服從，但我並不認為恩格斯所說的就是權威的一般定義。我略略地想了想回答說：「權威應該是指在一定範圍一定時期中，某一領域內最有發言權最有威望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或機構。權威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但還沒等我回答完畢，馬軍代表就把手一揮，不屑地說：「夠了」。

「有的人據說有『克思』之稱，」馬軍代表彈彈煙頭鄙夷地說，「看來也不過如此，肚子裏空得很，連權威究竟是指什麼也說不上來。其實關於這個問題，革命導師恩格斯早有論述，恩格斯在《論權威》中指出，權威，是指把一部分人的意志強加於另一部分人；另一方面，權威又是以服從為前提。我今天在這裏引述恩格斯的話，是要告訴你們，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機關，就是革命權威的代表，就是有權力把無產階級的意志強加於你們，不讓你們亂說亂動，而你們必須對此無條件地服從。」

馬軍代表的這番話，就他所要達到的目的而言講得並不錯，而且有點精彩。但以恩格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針對無政府主義否定權威的錯誤言論而提出的觀點為根據，就斷言權威即是將意志強加於人，以及權威以服從為前提則大謬。例如在科學領域內，作為權威難道就可以將自己的意志和觀點強加於人，難道科學研究的本質就是以對權威的服從為前提，而不是在尊重事實的基礎上自由地探討嗎？如果是這樣的話，還哪裏有科學的進步可言？思想領域內也同樣如此，也不應當以對權威的服從為前提，不能將權威的意志強加於人，否則就只能是思想專制。

而就在我的思想信馬由驥地亂竄時，馬軍代表又在繼續他的宏論了：「恩格斯還舉出在汪洋大海上的航船為例，說明在緊要的關頭，所有的人必須絕對服從一個人的意志。林副主席英明地指出：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在中國革命的每一個重大的歷史關頭，都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文化大革命中尤

其是這樣。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充分證明我們必須服從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絕對權威。誰敢不服從，誰敢另搞一套，誰敢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就要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就要堅決對他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而不管他曾經跳得有多高。」

老馬一邊說一邊眼珠子骨碌碌地往我這邊轉，放風場上所有犯人的眼珠子，也就都跟著那雙馬眼往我這邊轉，這個老馬今天算是把我給盯上了。這個馬臉為什麼總和我過不去，未必就因為我在牢房裏拍蚊子拖了一下，弄得滿牆的血跡「醜化無產階級專政」？也許有一點，但不全是，因為馬軍代表接下來說的話，非常明顯地道出了其中的奧秘。他說：「有的犯人自以為讀過幾天大學，算得上是知識份子，尾巴翹到天上，關在號子裏還在繼續放毒，散佈醜化偉大領袖毛主席、攻擊毛主席光輝著作的反動言論。我們正告這種跳樑小丑，如繼續執迷不悟，將來是要算總賬的。」這話又無疑是對著我來的，只是我究竟又在號子裏放了什麼毒呢？

想來想去，大概有兩次和同號閒聊夠得上「放毒」的邊：一次是談到紅軍長征，我說主席長征時除了騎馬，多數時間是坐轎子，坐在轎子裏看書，看孫子兵法。還有一次是看報時看到毛著的發行數已達到多少多少億冊時，我說印這麼多幹什麼？一個人手上都有幾套了，有必要還印嗎？以後印濫了，怕只有賣燒餅油條的用得著。估計這些話被同號彙報給幹部了，才引起老馬今天的震怒。看來老馬還會找我談話的，我如何才能蒙混過關呢？心中無底，也只好硬著頭皮「見機行事」。放風後老馬果然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談話，果不其然談的就是那兩次「放毒」。

「你是聽誰說的主席長征中坐轎子呢？」馬軍代表問道。

「我是67年冬天徒步串聯時，在井岡山和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座談時，聽老紅軍講的。我當時一聽，也覺得有點不可思議，但後來又覺得很正常。主席的時間是非常寶貴的，要指揮全局，要簽署文件和命令，還要讀大量的兵書，讀馬列和歷史文獻。坐在轎子上正好一邊行軍一邊讀書，兩頭都顧到了有什麼不好呢？」聽了我這段話老馬也不好說什麼，只是哼了一聲：「就你知道得多。」便轉入另一個題目：

「你說主席的著作印得太多了，印濫了，以後只配包燒餅油條，你這話又是什麼意思呢？也是井岡山的老紅軍教你说的嗎？」

「那自然不是，」我搖頭說，「不過我也並不是說主席著作以後只配包燒餅油條。我是說主席著作印得太多有些浪費，人手一冊就夠了，太多了就會有些人不知道愛惜，偷偷用來包燒餅油條也說不定。反正我的意思是說主席著作是供人學習的，不是做樣子裝門面的，沒必要無限制地印，要印就多印些外文版的，支援世界革命……」

「你不用詭辯了！」馬打斷我說，「我聽得出來，你對學習毛主席著作從骨子裏是有抵觸的。你再怎麼花言巧語，也掩飾不了這一點。這非常危險呀！你是怎麼進來的你自己最清楚，年輕人啦，你要懸崖勒馬呀！不然總有一天你會粉身碎骨的。這就算是我這個老頭子對你的一點忠告吧。」

馬軍代表的這番「忠告」，似乎還隱隱含有一點對我的關照。他在放風時沒有當著犯人的面直接點我的名，也沒有當場給我帶銬，算是很給我留了一點面子。對此我還是知好歹的，但是我仍不認為我在學毛著的問題上放了什麼毒。不問實際需要，無限制地濫印毛著，明擺著是要氾濫成災的，我相信物極必反的道理：莫看眼下各個書店裏的書架上全是紅通通的毛主席著作，這其實是反常的。都20世紀後半葉了，怎麼還可能像封建社會「廢黜百家，獨尊儒術」那樣「獨尊毛術」呢？而況就是現在的學毛著熱潮也是個假相，大多都是在走形式、做樣子，大家不過心照不宣，彼此「捏著鼻子哄眼睛」罷了。保不定將來有一天，許多人又會將這些「寶書」棄之如敝屣。想到如今專門提倡說假話，樹假典型，立假樣板，搞得人人都不得不戴一副假面具以自保，我心裏就很不是滋味。這種弄虛作假的民族還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嗎？

從老馬的辦公室回到號子裏後，就有同號告訴我，是新調進號子的一個老東西把我「水」了。這老東西自進號子後就一言不發，任我們議論什麼，都只是閉著眼睛打瞌睡，原來其實是在聽壁角。我憤然大怒發火說，有麼事人前當面講，做麼事打小報告？報告了又怎麼樣，我還不是屁事沒有？我一個學生，政府會把我麼樣？早晚是要放的，出去後我手下的人伸個小指頭，就能要那個告密的一家吃不了兜著

走。個傢伙大概還不曉得老子們的厲害吧，老子手下有四大金剛，個個能飛簷走壁，有百步穿楊的好槍法，都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橫吹豎吹唬得那個老頭子尿都流出來了，一下子爬到我面前磕頭說：你老大人不記小人過，是我一時老糊塗了。也不是我有意的，是軍代表囑咐我要注意你的一言一行，隨時向他報告。你老宰相肚裏好撐船，是大英雄，放我一馬，我再也不敢打小報告了。

見這老頭子一副窩囊相，我不禁又好氣又好笑。我一介書生，手無縛雞之力，連殺隻雞都不敢，能把誰如何？不過一時火起瞎詐唬一通罷了，沒料到這個告密者就嚇得屁滾尿流了。曾經有同犯教我，身在狼群裏就得學狼嗥，看來此言不假。只是學狼嗥慣了，會不會真的就變成狼呢？我想到這一點就不禁毛骨悚然，而想到最近以來我在號子中的一言一行，都在人監視之中，更是不寒而慄。倘真有更出格的言論被抓住報了上去，於我豈不是雪上加霜？看來還是要謹慎點為好。

我就嘴巴上加了把鎖，在號子裏少談國事或不談國事。要談，就談無關痛癢的事，談風花雪月。有幾個「同犯」大約在外面時饕餮慣了，對美味佳餚特別的嘴饞，每天早上醒來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坐在被窩裏「上館子」。一個說，夥計，今天到「老通城」去吃碗三鮮豆皮如何？另一個就說，豆皮昨天不是剛剛吃過了嗎？最好上「四季美」來一籠湯包。這個又說該去嘗嘗「蔡林記」的熱乾麵，那個就說「小桃園」的雞湯好久沒有喝過了，要去喝一罐。「老通城」、「四季美」這些地方都是武漢有名的特色餐館，犯人們身在牢房裏了，對這些地方還是念念不忘，就只好過嘴巴癮，也算是「過肉鋪而大嚼」，多少得到一點心理上的滿足吧。

我對吃方面看得很淡，從不跟這些美食家一起「上館子」。我覺得老想那些好吃的東西，肚子只會感到更加餓。不過我也有自己「找樂」的辦法，常常模仿一些電影中的人物，在「同犯」面前出出「洋相」。

我學電影《三毛流浪記》中的三毛，用手指指著自己的鼻子，氣憤地對著警察叫嚷：「阿拉沒飯恰儂不管，阿拉哭儂倒要管。阿拉偏偏要哭，喔喔喔……」

或者學印度電影《流浪者》開頭的那個鏡頭，手向前一揮，唱道：

「暴風雨要來了……」然後拿隻臉盆頂在頭上，一手扶盆，一手叉腰，學印度婦女那樣一面擺臀一面唱：「小心呀！小心呀……」

有一次我學蘇聯電影《列寧在1919年》中的列寧，將兩支手插在胸前的兩個背心的荷包裏，急促地走過來，又走過去，突然停下來，轉身面對正在看我表演的一個「同犯」掏出右手，將一個指頭伸到他鼻子前說，「瓦西里同志，你又騙了我一次！」我的表演惹得「同犯」們捧腹大笑。很長一段時間，這個「經典動作」成了我在號子裏的保留節目。

我還靠記憶來背誦古詩詞、背古文。我背「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歎息」；背「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背《長恨歌》、背《琵琶行》，還背《岳陽樓記》：

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嶽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范仲淹這裏所描繪的究竟是自然界的風雨，還是政治鬥爭中的險惡環境呢？而我此刻的處境，正是「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正是「檣傾楫摧，薄暮冥冥」。事實上這年的夏天也正逢「霪雨霏霏，連月不開」，入夏以來一直多雨。據報上說長江上游山洪暴發，導致中下游水位猛漲，江南五省大片土地已成澤國，的確是「滿目蕭然」。

七月十八日，是我入獄一年的日子，想起入獄前後樁樁往事，夜裏完全無法入眠。許是古詩詞這些日子背多了，忽然有了靈感和激情，躺在床上沉吟良久，吟出五言長詩一首，共一百零二句，曰《獄中自述五百壹拾字》：

蒙冤入獄整一年矣。近日大雨滂沱，浸淫大地，莫非天公發威  
洗我清白乎？思之潸然，徹夜難眠，回首往事，歷歷在目。乃  
仿古詩《孔雀東南飛》，作五言雜句百行以抒胸臆，舒吾憤懣。

小時多浪漫，桃李吐芬芳。

三歲伊唔始，歌唱共產黨，四歲丹青手，繪畫赴京展。

五歲黃毛兒，乳臭尚未乾，千人萬眾前，指揮大合唱。

六歲眺峰火，朝鮮戰正酣，鴻雁傳書信，紙薄意拳拳。  
 七歲入學堂，好學不知倦，師長驚不止，問是誰家郎。  
 九歲少先隊，十六共青團，成長全靠黨，胸中有朝陽。  
 久懷凌雲志，志在鑄成鋼，不學瀟湘館，要煉筋骨強。  
 奪冠百米道，登高喻迦山，發奮工程系，來日造兵船。  
 平地霹靂響，風雲多變幻，造反浪滔天，革命雷電閃。  
 自謂肝膽壯，挺身鬥凶頑，援筆批劉鄧，挽弓射強梁。  
 矫矯弄潮兒，生愛濤頭站，赫赫敢死隊，威名震四方。  
 戰友皆勇敢，臨陣不彷徨，疾惡當如仇，大義亦凜然。  
 路遙有艱險，征途多雪霜，風雨七二〇，不亂雁群行。  
 獨身闖敵陣，拍照送中央，追兵持槍至，躍橋筋骨傷。  
 渴飲朝露水，暮卧大橋旁，迎來黎明啟，豪情滿大江。  
 惜哉華工園，雞輩暫把權，利刺立雞眼，不除終難安。  
 一時妖霧起，誣陷加誹謗，無奈淫威盡，撼我難上難。  
 滿紙文章在，擲地金石響，屈指功與過，我心自安詳。  
 黓驥技既窮，毒手下鐵山，鋼鞭血肉濺，噩訊傳武漢。  
 群眾仗大義，出車三百輛，飛蓋過三鎮，欲救小將還。  
 此願雖未果，此情永難忘，時窮義乃見，慰我赤子腸。  
 士為知己死，弦為知音斷，餘生何所惜，熱血報梓桑。  
 國際悲且壯，狂飆從天降，大雨連五省，洪峰起百川。  
 正氣泣天地，忠貞感玄黃，精誠貫日月，浩歌衝宵漢：  
 窮雞棲樹眠，作樂歲未央，自有落湯日，休看一時狂。  
 傷鷹苟未死，終將復翹翔，翹翔天際去，萬里沒浩蕩。\*

\* 杜詩〈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有「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之句。

此詩中涉及到的兒提時代的往事，我在書的第二章中大都講述過，其他內容也都見於上卷諸章之中。在這首詩中我對黨還是滿懷感激之情的：「九歲少先隊，十六共青團，成長全靠黨，胸中有朝陽。」當是發自我的肺腑之言。我相信我之所以蒙冤入獄，禍根就是那張「漫畫」。「漫畫」的問題澄清了，我也就清白了，其餘問題作為「小將犯錯

誤」，是會得到政府諒解的。我對前途不再悲觀：我是在黨的培育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大學生，本質上是熱愛黨的，文革中起來造反，也正是響應黨的號召。思想上偶入歧途，犯了些錯誤，只要認識到了，黨是不會拋棄我的。

轉眼已是八月。一日幹部喊我出號子，但不是去提審室而是去一間辦公室。辦公室裏只有一名三十多歲的軍人坐在那裏等我，那軍人笑眯眯地望著我，樣子不大像是提審。

「你出去吧。」那軍人對領我進來的幹部揮揮手，說是要單獨跟我聊一聊。等幹部退出去後，那軍人便讓我坐到他旁邊的椅子上，而這之前我從來都只有與提審員面對面坐在被審席上的份，而且從來沒有人說和我「聊一聊」，今天是怎麼回事，日頭從西邊出來了麼？我滿腹狐疑。

「你不用緊張，也不要拘束，」那軍人非常和氣地對我說，「我今天也不是來提審的，只是想和你聊聊天，瞭解一些情況。」接著他自報身份，是邱少雲所在部隊的一名幹部，姓陳，是組織上派他來找我談話的。聽說他是邱少雲所在部隊的人，我忽然有了一種親切的感覺。邱少雲在朝鮮戰場上寧可被火燒死也不暴露目標的英雄事蹟，是早在小學課本上就讀到過的，邱少雲和黃繼光、董成瑞這些革命烈士，一直是我學生時代敬仰的英雄。對於來自心中的英雄所在部隊的這位陳軍代表，我頓時有了好感。何況他對我又是這般和顏悅色，不自覺中針對提審員構築的心理防線便撤除了一大半。我聽見這位陳軍代表說：

「你來這裏快有一年了吧？這麼長的時間為什麼還沒有處理？是不是還有什麼重要的問題還沒有講清楚？」我回答說這一年的時間裏，我什麼問題都交代清楚了，沒有對政府有任何隱瞞。我說我也不曉得政府為什麼到現在還不處理我的問題。

「處理總是要處理的」，陳說，「不要性急嘛，性急吃不了熱湯圓。關鍵是要把問題搞清楚，要對你的政治生命、對你一生的前途負責。若是匆匆忙忙處理了，草率地下個結論，弄不好你這輩子就算完了。畢竟還是個學生娃娃嘛，黨和政府還是從教育人挽救人出發，多化一份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有什麼不好呢？於黨於人民於社會主義事

業都有好處，於你本人也有好處嘛。所以不要著急，要認識到時間長一點對你只有好處，沒有壞處，時間長一點體現了黨的耐心。黨和政府希望看到你的真正的覺悟，和過去那些錯誤的東西徹底地決裂，早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並非是要把你一棍子打死。問題是你願意早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嗎？」

「當然願意。」我說，眼淚在眼眶裏直轉。入獄一年來，這是頭一次有人代表政府問我願不願意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在我看來這個提問是非常不尋常的，這個問題只能是針對人民內部，而不可能是針對階級敵人。因為對於階級敵人來講，主要是認罪服法，改惡從善，重新做人的問題，而不是什麼「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能談得上「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的，只能是人民內部一分子。如文革初期執行過錯誤路線的領導幹部，曾犯有走資派錯誤但不是堅持不改屢教不改的當權派，在路線鬥爭中站錯過隊的「保守派」群眾，以及「犯錯誤的紅衛兵小將」。看來「漫畫」問題的澄清起了作用，「惡攻」既不成立，政府終於開始重新審視我的案子，準備實事求是地對待和處理我的問題了，黨真的沒有拋棄我。

「你這幾天可以認真地把自己的思想梳理一下，」陳說，「把自己文革中的問題，前前後後全面地系統地寫一份材料，可以按時間順序來寫。特別是每一階段的思想是受到哪些人的影響？幾十篇文章都是如何寫出來的？要詳細地回憶一下，任何對你的思想和行動有過影響的人，都不要遺漏。我們只有摸清了你的思想發展變化的來龍去脈，才好對症下藥，也才談得上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你一定要把握住這個機會。」陳軍代表的一番話，可謂是苦口婆心了，我還能放棄這個機會，拒絕黨和政府的挽救嗎？我當即答應回號子後一定好好地寫一份全面的系統的交代材料，一定讓黨和政府滿意。

回到號子後我異常興奮。根據我在獄中的經驗，大凡運動中因犯政治方面的錯誤而被羈押於此地接受審查的人，一俟被要求寫一份全面的材料深挖自己犯錯誤的根源，那也就是將被從寬處理的信號。我於是認認真真、詳詳細細地寫了一份長達萬言的材料，將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為全盤托出，從造工作組的反、造舊省委的反到造武漢部隊支左辦公室的反、造陳再道的反的過程一一道來。然後說在一

片「造反闖將」的恭維聲中飄飄然不知所以，狂妄地企圖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之外另搞一套，先後組織了「北斗星學會」、「決派聯絡站」和編輯《揚子江評論》，發表了一系列觀點錯誤的文章，嚴重干擾了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使自己站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對立面，起到了「帝修反」想起而起不到的作用。

我深挖犯錯誤的思想根源，說自己長期放鬆思想改造，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佔據了頭腦。表現為極端狂妄，狂妄到連毛主席都不放在眼裏，主席的指示都敢反對，主席肯定的東西都敢否定、敢攻擊。根本否認毛澤東思想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否認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發展的頂峰，所以我今天走到反革命的邊緣絕不是偶然的。至於我文革中的種種思想和觀點是受了哪些人的影響，我說主要是受了王力、關鋒、戚本禹這些人的影響。這幾個人文革以來掌握著《人民日報》、《紅旗》雜誌這些重要的輿論工具，通過這些宣傳工作的喉舌散佈了大量有害的錯誤的言論，例如「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揪軍隊一小撮」等等觀點就都是首先從兩報一刊的社論中傳達出來的。我中毒不淺，不但全盤接受了這些極左的觀點，還寫文章加以發揮，成了王關戚極左路線的別動隊。

總之我在材料中盡可能給自己上綱上線，但不上到「反革命」這個綱上，只上到「反革命的邊緣」為止，不然性質就完全不同了。我既然已經將「反動漫畫」的問題澄清，我當然不能再承認自己是「反革命」。若是「反革命」，還怎麼能談「爭取早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豈不是自欺欺人？其實，說我文革中的思想主要是受王關戚的影響，又何嘗不是自欺欺人呢？就拿「揪軍隊一小撮」來說，其始作俑者不是毛主席本人又是誰呢？毛在他親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中不就明明白白地提出「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麼，按此提法是要揪「一批人」，何止「一小撮」？

記得有一次一位提審員就問過我怎麼會想到「揪軍內一小撮」，是受了誰的指示？我那會真是被問得莫名其妙，此公難道連「五一六」通知也不會聽說過麼？還有「北京公社」、「中華人民公社」以及「砸爛舊的國家機器」之類的提法，無不始自主席本人。後來竟倒打一耙，反誣我

們這些盲目跟風的學生娃娃是企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真是霸道得「前無古人」。但現在黨和政府既已向我伸出了挽救之手，要實事求是地落實我的問題了，也就不必再將責任往「始作俑者」頭上推，要維護偉大領袖一貫正確、永無失誤的神聖形象。一切責任都往王關戚這幾個「死老虎」身上推好了，大家都體面的事何樂而不為？

自己當然也有該反省的地方，比如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呀、搖擺性呀、無政府主義、風頭主義、名利思想之類，還有世界觀沒有得到徹底的改造，屁股後面拖了一條長長的個人主義尾巴等等，怎麼狠挖都可以。下狠心把那條個人主義的尾巴一刀子割掉也可以，反正尾巴也並不是真的長在屁股後頭，割這種尾巴連麻藥都無須上，比割鬚尾還方便，很可以割一割的。

材料厚厚的一疊遞上去了，我就等待處理，十天半月，總該有答覆吧。但出乎我的意料，第三天陳軍代表就找我來了，而尤其令我意外的，是他們對我交代的材料根本就不滿意。

「你這算什麼呢？」陳軍代表頗不高興地翻著我那一疊材料搖頭說，「都是自己是怎麼想的、是怎麼做的，這些我們早就掌握了嘛，還用得著你老炒現飯？說到影響，就是王關戚，就是兩報一刊的社論，都是空的，沒有一點實際內容……」我便辯解說有實際內容呀，在哪個問題上是受了他們哪些講話和文章的影響，都講得很具體呀。但是陳軍代表不容我辯解，說我們要你交代和這些人之間的具體交往情況。比方說，你和北京的王力是有聯繫的，王力還親自點名讓你去《紅旗》雜誌，但是你都沒有認真交代。當然，這還只是我隨便舉的一個例子，其他類似的情況我們手裏掌握的還有，但不準備都說出來，還是想給你一個主動嘛。你為什麼不採取主動呢？難道還想作這些人的殉葬品嗎？我說我當然不想作什麼人的殉葬品，但我也真的和王力這些人沒有什麼具體的聯繫。

「沒有聯繫？不可能吧，」陳軍代表似笑非笑地搖搖頭說，「那王力怎麼就不點別人，偏偏點你去北京呢？你還收到過王力的一封信是不是？」

「沒有，我從來沒有收到過王力的信。」我斷然否認說，「我只是從附中學生那裏知道王力給我們學校的頭頭張立國打過招呼，要我到

《人民日報》『任立新』寫作小組報到。他們說張立國在學校紅司常委會上傳達過這件事，但張立國從來沒有通知我去北京報到。至於當初是誰向王力推薦過我，我一直都不知道，後來王力垮了，這事就不了了之了。」

「後來王力垮臺了當然就不用說了，可是王力在垮臺前可是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是紅透半邊天的人物，一般人想巴結都巴結不上啊。你既然知道王力點你去北京工作，你還不趕快往北京跑嗎？並不一定要張立國通知你嘛，是不是？」

「但是不管張立國通知沒通知我，事實上是我並沒有去北京。」我用事實作證說，「而且我對上北京的事並不是非常感興趣——上頭的人事變動太頻繁了，早上還是紅人，晚上就可能變成了黑線，所以我對我手下的人一再叮囑過，不要輕易和上頭的大人物發生聯繫，要當心將來一些事情說不清楚。我說只要頭上沒有黑手，身後沒有背景，我們作為學生就是犯了再大的錯誤，也不過是小將犯錯誤。若有背景、後臺問題就複雜了，性質也就嚴重了，所以我從不和上頭的大人物打交道。」

陳軍代表聽我這樣說也無言以對，默想了半天，突然又問我一共去過幾趟北京？我告訴他北京我一次都沒有去過。他聽了很是驚訝，不大相信，說大串聯時也沒去過？我說我是隨學校一支長征隊步行串聯的，走到中途中央通知停止串聯回校鬧革命，我們就打轉了，沒有去成北京。「那大串聯之初呢？」陳軍代表又問，「毛主席可是前後八次接見檢閱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啊，全國各地的大中學生哪個沒有接受檢閱？難道你就沒去？」「我確實沒去。那時工作組搞反動路線，有省委支持，我和他們幹上了，沒工夫去北京，以後想去也沒有機會了。」我說的基本上是實話，那陣子全國各地的大中學校的學生不管是不是紅衛兵，都爭先恐後跑到北京去接受毛主席的檢閱，那股狂熱勁不就跟穆斯林上麥加朝聖是一回事嗎？許多同學一提到上北京受主席檢閱的「光輝經歷」，就激動得渾身顫抖。其實主席站在高高的天安門城樓上，離受檢閱的學生們八百丈遠，看上去不過毛毛蟲一般大小，是分得出鼻子眼睛還是分得出鬍子眉毛？可學生們偏偏就以「見到了」為無尚的光榮和幸福。聽說有個紅衛兵有幸登上天安門並且和主席握過

手，那隻手也就成了「金手」，個把月都捨不得洗一洗，而且其他同學和這隻「金手」握一握也會激動得不得了。我常想這和打嗎啡尋求快感有什麼兩樣？但也許是我「悟性」比較差也說不定。

後來出獄後社會上正風行「氣功」，嚴新之類的「大氣功師」常常到各地作發功的表演，令芸芸眾生為之瘋狂。有一回一個有名的氣功大師來武漢公開表演，我也去領教了大師的「真功夫」。只見大師雙目緊閉，嘴中念念有詞，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併攏向受眾發功，滿館成千上萬的受眾就都隨著大師的功力搖晃起來，並且都眾口一詞地聲稱感覺到大師在發功了，有人甚至當場手舞足蹈並且大聲地哭起來，可見大師的功力真是了得。可惜我卻什麼都沒有感覺到，我沒有感覺到有什麼人在發功，我只是感覺到全場的人都在發瘋。但也有人說感覺不到師傅發功是因為「悟性」太差的緣故，這使我未免有些悲哀。

我悲哀地想到文革中我也正是因為缺乏「悟性」，竟沒有悟出在那全民大瘋狂的年代，是應當隨波逐流，把偉大領袖當成「教主」來供奉來崇拜的。我連上京「朝聖」都不曾朝過，也夠「異端」的了。而「異端」是要受到懲罰的，中世紀歐洲的「宗教裁判所」，不就是專門用來懲治「異端」的嗎？「誰要是不聽規勸，那就把他從世界上消滅掉！」這就是「宗教裁判所」的邏輯，這並不奇怪。奇怪的是無神論的共產黨怎麼也用這種邏輯對待思想上的異端；而且是以革命的名義、人民的名義，這真是太可怕了。

我在恐懼之下願意聽從規勸，我不甘心年紀輕輕就以「反動」的罪名從這個世界上被消滅掉，我決心從此忠於偉大領袖，至少表面上做到對偉大領袖「無限忠誠、無限熱愛、無限敬仰、無限崇拜。」但是陳軍代表說「忠不忠，看行動」，那麼是不是需要我像西藏的朝聖者那樣，一步一個叩拜地從武漢叩拜到北京，以贖免我「不忠」之罪呢？也不是。陳軍代表所說的行動，是要我把躲在我後頭暗中操縱控制我的「黑後臺」揭發出來。他們最先大概是想抓住王力這條黑線查找我的「後臺」的，但出師不利，查不出我和王力有任何關聯，於是另闢蹊徑，要我交代與其他「黑線人物」的往來情況。

「我已經說過了，我和上頭的人物從無來往。」我說。

「口不要封得太早吧，」陳軍代表有點不快地說，「要不要我提醒你一下，你和一個叫王盛榮的老幹部就常有往來，對不對？」

王盛榮這個人提起來我倒是不陌生。此人只是市裏的一個局級幹部，但資格不淺，是井岡山時期就投身革命的老紅軍，乃六級高幹，據說年輕時還曾在蘇聯莫斯科大學學習過，是大名鼎鼎的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中的一個或半個。我和此人確有過一面之交，是有一次蘭憲生帶我和小和尚等七八個學生，一道去王的住宅拜訪過他。當時蘭憲生不知怎麼認識了這位已賦閑在家而又不甘寂寞的老紅軍，蘭稱他為「王老」，說這個老頭子一肚皮的黨內秘史，我們可以從他那裏瞭解一些黨內鬥爭的情況。於是有一天晚上，我們一行七八個學生就前去造訪。

這位王老非常好客，非常健談，也不問來訪者是誰，就大談自己的光榮歷史。談過光榮歷史，便又傳授起當年他們在白區開展地下鬥爭的經驗。他說他們過去缺少經費，就要找大閥佬、有錢人要。怎樣要呢？也不用上門，寫封信客客氣氣地開出數目就行了，但信封裏封了一顆子彈。閥佬們一看心裏就明白，乖乖地就把錢拿出來。「你們紅衛兵現在造走資派的反，想必也是缺少經費的，也不要搞打砸搶。主席教導我們要用文鬥，不用武鬥嘛，所以打砸搶是不好的。那你們怎樣辦呢？好辦，你們也可以給那些走資派寫信嘛，恐嚇他一下，他還不乖乖地把錢交出來。」王老的一番「白區地下鬥爭」的不二法門，直讓我們聽得目瞪口呆，虧他還好意思大言不慚地當作「革命經驗」來傳授，他大概把我們當成是北京的「聯動」或武漢的「特動」一類專搞「紅色恐怖」的高幹子弟了。

「我們有自己辦事的原則，」我對王老說，「我們不會向誰要錢，更不會寫恐嚇信的。」王老一聽就哈哈大笑起來，「什麼叫原則？你們還信那個呀？我告訴你們吧，原則這東西，可大可小，可長可短，可肥可瘦，可方可圓，可有，還可無嘛！」我們一聽也都呵呵地笑成一團，鼻涕眼淚都笑出來了，然後便告辭。出門後我對蘭憲生說，這就是你說的那個一肚皮黨內鬥爭秘史的老紅軍、老革命？老紅軍、老革命就給我們灌輸這些東西？蘭憲生結結巴巴地說這回王老大概沒有準備，下回再找他就要他專談黨內某段歷史事件，他都清楚。我說不用

再找他了，他個老糊塗談得出什麼名堂？與王盛榮的交往僅此而已，印象最深的除了他「滿嘴荒唐言」之外，就是他的那「一支獨腳腿」，另一支腿整個的沒有，安的是假肢，走路一拐一拐的，像個鐵拐李。

「你們後來按照王盛榮講的去做過什麼沒有呢？」陳軍代表雖然對我交代的上述內容不大滿意，但仍心有不甘地問道，「比方說寫封恐嚇信……」

「沒有。我們不可能照他說的去做。」

「他的話對你們總有點影響吧？」

「沒有影響，」我斷然地說，「如果一定說有什麼影響的話，就是讓我們奇怪怎麼老革命會給我們傳授這種經驗？」。

陳軍代表一點轍都沒有，沉默了半晌，說：「王盛榮不是老革命，是個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但我想說王盛榮是「老革命」也好、是「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也好，他是他，我是我。他甚至未必記得有個叫魯禮安的學生造訪過他，他也不可能去影響這個姓魯的學生，更不用說什麼操縱、控制我了，這一點應該是不容置疑的。

王力的線斷了，王盛榮這條線也串不上，這似乎頗讓陳軍代表為難。似乎為了挽救我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就必須斬斷我身後的「黑線」，而要斬斷「黑線」，則必須先找出或挖出「黑線」。但要找出挖出這樣一條「黑線」，實在是談何容易，即使是從邱少雲所在部隊調來的這位能幹的陳軍代表也頗感棘手。不過偉大領袖毛主席早說過：越是困難的地方越是要去，這才是好同志。毛主席還說過共產黨人要發揚「愚公移山」的精神，「毫不動搖，每天挖山不止」，陳軍代表就是一個用「挖山不止」的勁頭和韌性來挖我後頭的「黑線」的好同志。他每天將我的交代材料帶回去，和另外一些我不曾見過面的好同志一起，用毛澤東思想的「顯微鏡」、「照妖鏡」仔細地檢查分析辦別一番後，又帶著新的指示來我這裏「挖」新材料。

為了打消我的顧慮，給我創造一個良好的寫交代材料的環境，陳軍代表甚至讓看守所給我專門安排了一間號子白天裏寫材料。並且為使室內通風涼快一些，破天荒地不鎖門。但人在牢籠中關久了，牢門開著反倒不習慣、不自在，無所適從，於是報告幹部要求還是將牢門鎖上，而幹部也正為門不上鎖大打敞開一事犯難，聽我自願鎖門自然

是求之不得。我也因此悟出上古時雖無監獄卻能「畫地為牢」的緣故，蓋因犯人雖不見有形之獄，卻有無形的桎梏將其囚禁其中也。如我既已是被囚禁的犯人，日子一久，便已不習慣囚徒之外的權利，對門不上鎖這一極小之事也如此。因為那事雖平常，卻是自由人才享有的權利。

陳軍代表照常每天來我這裏催材料，也不管我的房門怎麼又給鎖上了，他真正關心的只是從我身上能榨出什麼新材料。為了做我的思想工作，他還帶來了外頭「清理階級隊伍」的一些資訊，向我傳達了據說是偉大領袖親自肯定的什麼北京「六廠二校」清理階級隊伍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26。那套經驗說來說去也無外乎「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分化瓦解，各個擊破」之類。其中有個新華印刷廠的經驗據說是「最好的」，領袖指示要「批發全國」。

經驗中有一條是說有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的人，可以定為界於「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之間。這些人好比是站在十字路口，推一推就掉下去了，拉一拉就能拉過來，或鬆一鬆就倒下去，幫一幫就立起來。到底劃成哪類矛盾，全掌握在軍管人員手中。軍管人員以此為法寶，促使犯錯誤的人「竹筒倒豆子」，徹底交代問題，以爭取「坦白從寬」和「立功贖罪」。經驗中還列舉了許多的例子，來證明這種政策和手段的巨大威力。陳軍代表便借鑒這個經驗，反復對我進行政策攻心，說我就是屬於這種界於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之間的犯了嚴重錯誤的人，推一推就掉下去了，拉一拉就能拉過來。現在黨和人民願意伸出手來拉我，關鍵就看我自己願不願意接受挽救了。陳說我目前態度還不夠明朗，還沒有真正做到「竹筒倒豆子」，還有「留一手」的僥倖心理。他說這很危險，豆子悶在筒子裏會爛掉的，統統倒出來，人就輕鬆了，也就有希望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

「你本質並不壞，」他語重心長地對我說，「雖說是生在舊社會，但畢竟是新社會長大的，從小到大都是受的黨的教育。你從一個無知的小孩子成長為一名大學生，又入了團，對黨和毛主席應該還是有感情的。文革中犯錯誤，除了自身方面的原因，主要還是受了各種錯誤思潮的影響和毒害。我們從本質上看問題，認為你還是可以挽救過來的，只要改正錯誤，迷途知返，還是可以運用自己學過的知識為社

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的。黨的政策一貫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嘛，我們並不主張樹敵過多。現在我們看你是個青年學生，對你立足於挽救，可以說已經做到仁至義盡了，你應該認識到我們的一片苦心。俗話說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這個店。你再不抓住這次機會，以後會後悔一輩子的。」

我很感激陳軍代表的苦口婆心。但是該交代的我真的是都交代了呀，我並沒有什麼要向政府隱瞞的，我也絲毫沒有「留一手」的想法。我只是想把所有的問題都說清楚，好讓政府對我有一個全面的完整的正確的評判。現在政府方面似乎已經認定我本質上不是個壞人，屬於挽救的對象，這自然不是件壞事。但是陳軍代表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我揭發我身後的黑手或黑後臺，卻使我不知所措，因為並沒有什麼黑手黑線操縱控制我，讓我如何揭發？其實平心而論，我倒是希望挖出個把兩個黑手黑線的，根子挖出來了我的責任不就減輕了麼？但是沒有這個東西我又怎麼挖？憑空造一支黑手編一條黑線，我豈不是弄虛作假嫁禍於人罪上加罪？可交代不出黑手黑線，我似乎又回不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這使我苦惱至極。

有一次陳軍代表來催材料，我就向他談到了我的苦惱。陳軍代表說不要以為黑手是在自己臉上貼了標籤的，階級敵人在新形勢下，總是打著革命的甚至馬列主義的旗幟，暗地裏向你灌輸反動思潮，具有很大的迷惑性。陳說，「黑手不只是在上頭，你周圍也有。據一些中學生揭發，你旁邊就有幾個搖鵝毛扇的人，一個叫周凝淳，一個叫童丹，一個叫張志揚，都是老謀深算的人物，說你受這幾個人影響很深。」可是周凝淳不過年長我兩三歲，是馮天艾中學同學，如何算得上「黑手」？就是他提出的「十年一大變」的觀點，也無非是指歷史上每隔一段時間，由於階級關係的變動和各種力量的消長，總會有一些重大事件發生，似乎也談不上是什麼「反動思想」。

說到童丹，倒是滿腹經綸，但也只是給人一個學究的印象，我也極少聽他有什麼出格的話。雖然有一次他倒是說過他懷疑林彪是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但也只能說是關注黨和國家的命運，是「多思」的表現，而且所思所想不無道理，絕不像是出於反革命的動機。童說這話

時只有很少幾個人在場，只要別人不揭發、他本人不交代，我就絕不能落井下石出賣朋友。

至於張志揚，是研究黑格爾費爾巴哈的，哲學上的造詣似乎頗深。他為人沉穩，大智若愚，深藏不露，你很難聽到他有什麼觀點。偶爾從他嘴裏蹦出句把黑格爾等人的語錄，如「歷史的巨人在前進時難免踩壞一些好花好草」，好像也算不得是什麼「黑話」。如果一定要說這幾個人對我有什麼影響，那也就是讓我在他們面前感到自己才疏學淺，浮華不實，要好好讀點書才是。所以我想他們幾個人也不可能是我身後的黑手。那我後面還有誰呢？誰也沒有。

陳軍代表有一次倒是提到過附中校長周嶽森，說他有歷史問題。周究竟有沒有歷史問題我不知道，就是有也是他自己的事，與我何干？他不就是就復課的問題找我交談過一次嗎？總不至於憑這就懷疑他是我身後的「黑手」吧。還有一個白樺與我有過一面之交，並且參加過北斗星學會的成立會。陳軍代表說他是五七年的「右派」，白樺被打過右派這我早就知道，但右派又算什麼？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放到五七年還不都是「右派」？而且是「極右」，比右派還右派。說白樺欣賞過我寫的《北斗星學會宣言》是事實，但我寫這篇宣言時還沒見過白樺，不可能受他的影響，何況我從不承認宣言有問題，就是白樺讚賞過又怎樣？想來想去，還是挖不出任何與「黑手」、「黑線」有關的線索。實在也是沒有辦法，我只能實事求是地「竹筒倒豆子」。至於這些豆子是紅豆還是黑豆、是黃豆還是綠豆、或是顆「嚼不爛砸不扁的銅豌豆」，那就只能由辦案的人來定奪了。

我就天天「竹筒倒豆子」，倒來倒去地倒了一兩個星期，自以為倒得夠乾淨了，但是陳軍代表對這一地的豆子似乎都不滿意，有一天突然向我提起原新華工敢死隊的隊員干小雄來：

「干小雄你是很熟悉的吧，說說他是怎麼認識你的？」

「干小雄是附中的學生，我拉敢死隊時他報名參加了，就這樣認識的。」

「他在敢死隊起很大的作用吧？」陳也斜著眼睛瞅著我說。

「他一個初中生能起麼很大的作用？何況他也不大說話，只負責刻鋼板的事——他鋼板字刻得不錯。」我實打實地告訴他說。

「他後來又是怎樣參加北斗星學會和決派呢？」

「干小雄沒有參加過北斗星學會和決派。」

陳軍代表皺皺眉頭又問道：「見過干小雄的父親干毅嗎？」我回答說見過。

「是在什麼地方？是干小雄帶你去的嗎？」

「是在機械系教學樓參觀『干毅罪行展覽』時見過。那是文革開始時，干毅成天掛個牌子，站在展覽室的門口示眾，我那時還不認識干小雄。」

「後來干小雄帶你去單獨見過他的父親嗎？」我說沒有。

「可是干小雄對你談到過他父親攻擊林副統帥的話，你為什麼不揭發？」

「我沒有聽他說過他父親有攻擊林彪的話。」我想了半天回答說，心裏卻在打鼓，因為我確曾聽干小雄說過他父親講過一句與林彪有關的話。

「不說是攻擊也是議論過吧？好好想一想，沒有根據我們是不會無緣無故問你的。」

「關於林彪……」我裝著很努力的樣子回憶，突然記起來似的說，「是聽干小雄有一次說過，是在我們談論林彪的軍事才能時插話說的，說他父親講國民黨的軍隊最怕的倒不是林彪，而是劉伯承。」

「還有呢？」我說沒有了，就這一句話。陳軍代表也不再問。

說到干小雄的父親干毅，那確實是個人物，解放前曾留學歐美日本五國，回國後在國民黨軍隊中效力，官至「國軍少將」。解放前夕干毅「棄暗投明」，上頭本準備讓他帶一個裝甲師，但他堅辭不就，去了東北大學當教授。後調入華工，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此後每次政治運動中都要挨整，成了華工著名的「老運動員」。幸好我沒有和干毅打過交道，否則還真是說不清楚。

回到號子後我心裏十分忐忑不安。陳軍代表這一陣子又是王盛榮、又是周嶽森、又是白樺、又是干毅地問個不停，究竟是要達到什麼目的呢？是想說我是受了這些人的影響所以才犯錯誤，好對我從寬處理嗎？可是我犯不犯錯誤實際上與這些人半點關係都沒有，用句俗話說是「八杆子打不著」啊，問得再詳細又有什麼用？當然問清楚了也

好，主席一貫強調「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只有調查清楚了，辦案子的人才會相信在我的背後確實沒有什麼「黑手」、「黑線」操縱和控制我，也才會相信我確實只是屬於「小將犯錯誤」一類。

晚上從寫材料的房間回到號子後，我忍不住把自己的想法對一位新進來不久的同號講了講。這位同號姓楊，五十多歲了，曾經是漢陽縣一所中學的語文教師，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幾年後摘了帽子就留在學校裏打雜，文革中又不知惹了什麼禍，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關進了監獄。這位老知識份子在號子裏很少與人說話，唯與我有得一談，談起來則常有驚人之語。有一次他悄悄對我說，黨中央只有彭德懷是真正的大英雄，其餘人都不過是仰主席鼻息的弄臣。還有一次談到江青時，他說主席百年之後江青必不得好死。他有次還慨然歎息說，文化革命革文化的命，把全國都變成了一座大監獄。

楊是「右派」加「反革命」，「歷史」加「現行」，自然憂憤尤深。但他飽經滄桑，看透世事，說話往往一針見血，鞭闡入裏。我對他的憤激之言，雖不能全都苟同，但我覺得他有頭腦有見識，絕非等閒之輩，只是生不逢時，命運多乖罷了。楊聽了我的想法後，沉思半晌分析說，這個姓陳的找你瞭解你與這些人的交往情況，也可能好事，也可能是壞事。若上頭無意繼續整你，那就是件好事，可以定你個小將犯錯誤；若上頭有心要把你往死處整，那就不是什麼好事。你想一想你一個學生，文革中說幾句錯話寫幾篇過火的文章，算得了什麼大問題？比你問題大得多的學生多的是。但若是和什麼「黑後臺」之類的牽掛上，那就問題變嚴重了，關鍵是你究竟有沒有後臺？

我說我屁的後臺都沒有，陳軍代表調查了個把月，也沒有說我有什麼後臺。他們只是想把問題徹底地弄清楚，好對我作實事求是的處理。陳軍代表反復說過對我是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政策，是要對我進行挽救，幫助我早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楊說照你說的那樣當然是好，但那個姓陳的軍代表的話你也不要太相信了，這些辦案子的人是很會口蜜腹劍的。這些人既懂陰謀，又懂陽謀，你要多一個心眼。我說別的人我不敢相信，這個陳軍代表我還是信得過的，就衝他是邱少雲部隊的人，我就沒有理由信不過他。

楊聽我這樣講也不好多說什麼，便問我知不知道五七年發生的「漢陽一中事件」※27？我說有點印象，好像是一些右派學生受人煽動上街遊行，公開呼喊打倒共產黨的口號。楊搖頭說根本不是那樣一回事，其實只不過是學生們對傳聞的升學率有意見，跑到縣教育局質問。管教育的官員拒不接見他們，學生們一氣之下，砸了辦公室的桌椅。這件事正好發生在反右之時，被政府武斷地定性為反革命事件。定性後也是拼命追查學生的「後臺」，結果有三個邊都沾不上的老師，其中有一個還是學校的副校長，被揪出來判了死刑，其餘被定為右派而勞改勞教的教師和學生就更多了，其實都是冤枉的。死者含冤九泉，生者打入另冊，至今上十年了，誰又敢為他們翻案？

楊的一番話讓我聽得心驚肉跳。儘管我也不怎麼相信學生會上街遊行反對共產黨，但也不敢相信真有這種冤死人的事情。俗話說「人命關天」，共產黨怎麼可能草菅人命，濫殺無辜呢？所以對楊說的這些也只能是姑妄聽之。至於我這個案子，陳軍代表雖然向我瞭解了一些與我有關的人，但並沒有斷定誰是我的後臺，他不過是想弄清我的思想和觀點，是否受過別人的影響罷了。其實，說到影響，文革中對我思想影響最大的，正是毛主席本人。我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歸根結底都是遵循主席「造反有理」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倘一定要找出我的後臺，這後臺恐非主席莫屬，我想陳軍代表又何嘗不明白這一點？

進入九月後陳軍代表又來找過我幾次，對我態度都極為和善。有一次陳和我坐在一條凳子上談話時，甚至半認真半開玩笑地對我說，「你知道我們是不會和反革命分子坐一條板凳的。」說完後哈哈大笑，那言外之意，顯然是說他們已經不再將我視為階級敵人。我聽他這樣講，不免有點沾沾自喜，甚至在寫給家人的信中，非常樂觀地說自己「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已經為期不遠」。「反動漫畫」的問題早已澄清，其他問題也都已弄清楚了，無非是「極左」性質的思想錯誤，且不受任何「黑手」、「黑線」的操縱，只是小將犯錯誤而已。通過政府一年來的教育，已經認識到錯誤決心痛改前非了，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不就「為期不遠」了嗎？我對此滿懷信心。

轉眼已是九月底，再過幾天就是建國二十周年大慶。歷來大慶之

日往往會伴有「大赦」之舉，我在這大慶之日，能重獲自由回到社會上嗎？我焦急地期待著。

九月三十日，正是國慶前夕，我被叫到一間提審室裏，有兩名軍人正襟危坐在房間裏等我，陳軍代表卻不在其中。我預感到來人是要向我宣佈對我的處理決定了，又激動又緊張，心中忐忑不安，不知究竟將怎樣處理我。來人中的一位盯著我盯了好一會，才慢吞吞地從一個公事包中抽出一張紙，異常嚴肅而冷峻地對我說，要向我宣讀一份中央文件。我屏聲靜氣，伸長耳朵，只聽他一字一板地念道：中共中央對武漢問題的指示，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以下就是這個編號為中發(69)67號的中央文件(簡稱九二七指示)※28的主要內容：

湖北省革命委員會，並武漢市革命委員會：

(一)毛主席批示照辦的中央的「五·二七」指示、「七·二三」佈告、「八·二八」命令，必須在湖北全省、武漢全市堅決地、無條件地、不折不扣地執行。有的反革命分子到現在還在逍遙法外，擾亂革命秩序，破壞「五·二七」指示、「七·二三」佈告和「八·二八」命令的落實，這是絕對不能容許的。

(二)根據現在看到的材料，在武漢出現的所謂「北斗星學會」，「決派」這類地下組織，幕後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假借名義、暗中操縱的大雜燴，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復辟。他們不擇手段，製造謠言，散佈各種反革命的流言蜚語，混入群眾組織進行挑撥離間，大刮經濟主義、無政府主義的歪風。對這類反革命的地下組織，必須堅決取締。

(三)所謂《揚子江評論》，是一些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幕後操縱的反動刊物，肆無忌憚的大量放毒，必須查封。《揚評》的主要編寫人員，應由湖北省革命委員會責成有關機關審查，按其情節輕重，分別嚴肅處理。

(四)對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王盛榮、國民黨反動將領干毅、老國民黨特務周嶽森等犯，必須立即逮捕，依法懲辦。……

聽完這個「中央指示」，我頓時呆若木雞，人整個地傻了。「北斗星學會」、「決派」怎麼忽然就變成了由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縱的「反革命的地下組織」？《揚子江評論》怎麼忽然就變成了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幕後操縱的「反動刊物」？我們又什麼時候「混入群眾組織進行挑撥離間，大刮經濟主義、無政府主義歪風」了？我一時如遭電擊般，有天崩地裂之感，整個世界都像在我面前坍塌了，我的眼裏一片黑暗。

我不記得我是怎樣離開提審室的，我失魂落魄地跟著管教幹部走回自己的囚室。但並沒有回到原來的那間號房，而是被帶到另外一間，我的行李和鋪蓋都已丟在裏面了。我知道我又重新被投入了單監——這可是「要犯」才享受的待遇啊，我不覺「從頭直冷到腳跟」——就像魯迅先生在《狂人日記》中說的——「曉得他們佈置都已妥當」。望著除了幾件鋪蓋和行李、簡陋的桌椅及屋角的一隻馬桶外空空如也的牢房，我悲憤地意識到我已落進一個深不可測的政治陷阱中，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時期真正來臨了。

「瓦西里同志，你又騙了我一次！」

## 第十八章

# 覆巢之下復有完卵

「九二七指示」下達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我都陷在絕望和虛脫之中。我並不是一個容易被擊倒的人，我有勇氣蔑視學校那班新貴對我的迫害，我也有膽量面對鐵山那幫暴徒對我的摧殘，我甚至有充分的自信力頂住「曾劉首長」對我發動的圍剿，但是我無法抵抗這個來自最高當局的「紅頭文件」。儘管我完全清楚這個「紅頭文件」中的每一個字都是謊言，是在用無辜者的鮮血染紅它的權威。

魯迅先生在《狂人日記》中說：凡事須得研究，才會明白。可是對這個突如其來的中央67號文件，我是不研究固然不會明白，研究了卻愈發糊塗。「北斗星學會」也好、「決派」也好、《揚評》也好，都是我和幾位同學自發搞起來的。其組織、其活動、其宣言，無一不是公開做的事情，即便是「逆潮流而動」罷，也是光明磊落的「反動」，何曾「地下組織」了？就算是扯得上「策劃於密室、點火於基層」這條罪名，那罪魁禍首也非我莫屬，在我身後哪來的什麼「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假借名義、暗中操縱」？

從文件上看，中央指名道姓必須「立即逮捕，依法懲辦」的「老反革命分子王盛榮、國民黨反動將領干毅、國民黨老牌特務周嶽森等犯」，應該就是在我後頭「假借名義、暗中操縱」的黑手了，但根據是什麼呢？堂堂中央文件，總不至於紅口白牙瘋狗一樣亂咬人吧？它既然敢將王盛榮、干毅、周嶽森三人定性為「北、決、揚」的後臺，那總得有點事實作根據吧，可是從文件中什麼也看不出來。文件只是籠統地說「根據現在看到的材料……」，那麼中央看到的是些什麼樣的材料？這

些材料又是誰送上去的？材料的可信度如何？是徹頭徹尾假造出來的嗎？「曾劉首長」難道吃了豹子膽，真敢瞞天過海炮製假材料欺騙中央？而僅僅為了整我們幾個微不足道的學生娃娃，這些軍政大員犯得著做這種喪心病狂的事嗎？俗話說殺雞焉用牛刀，曾劉首長抬出的豈只是一把牛刀，那簡直就是一柄尚方寶劍！只是，用得著麼？

我就想見見那位曾和我促膝談心，口口聲聲「不和反革命分子坐一條板凳」的陳軍代表，我要當面向他就這個「反革命地下組織」的問題問個究竟。殺人不過頭落地，但朗朗乾坤下總得有殺人的理由。須知針對「北決揚」問題下達的，是一份頂著「中共中央」頭銜的紅頭文件呀。而據我所知，自文革以來以中央紅頭文件的名義，將一個學生組織定性為反革命組織的事，好像還從未有過。

我就向看守所的幹部打報告，要求見那位陳軍代表。幾天之後，陳軍代表果然來了。

國慶二十年大典剛過不久，陳軍代表滿面紅光，神采飛揚。他和我在提審室裏面對面坐下，不再說「不和反革命分子坐一條板凳」的話，但仍然是面帶微笑，一臉的和氣。只是這一次陳軍代表的和顏悅色，在我眼裏虛偽得很，怎麼看都像那種笑裏藏刀的笑面狼。

「中央九二七指示節前向你傳達了吧，怎麼樣？有什麼想法沒有？」陳軍代表揭下頭上的軍帽，用指頭彈了彈帽上的灰塵，皮笑肉不笑地問我。

「沒有什麼想法，」我冷冷地說，「我只是想知道，九二七指示上說『北決揚』是反革命地下組織有什麼根據？說我們幕後有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縱又有什麼根據？我就想知道這個。」

「根據，這個……當然是有根據的啦……」，陳軍代表一面用指頭使勁地搔頭，一面含含糊糊地回答我說。從陳軍代表的頭皮上似乎搔下來不少的頭屑，紛紛揚揚的不知是不是就是他帶來的所謂「根據」？

陳軍代表終於搔完他的頭皮了，他重新戴好他的軍帽，十指交叉在一起，朝椅背靠穩，打起了官腔：「如果沒有充分的根據，中央怎麼會隨便下達這樣一份文件呢？中央文件，這個中央文件，是個非常嚴肅的東西，我們怎麼能夠懷疑中央文件的正確性呢？何況，何況這份

文件……我乾脆告訴你罷，這個文件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批准下發的。嗯，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要說？」

我明白陳軍代表的意思，他抬出「偉大領袖」來說法，自然是極厲害的一招。按古書上的話是「天皇聖明臣罪當誅」，服服帖帖引頸就戮就是，我還能說什麼呢？然而困獸猶鬥，兔子被攆急了還要反咬一口哩！於是我問陳軍代表，中央文件說我們學生背後有叛徒、特務、老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縱，而且點名道姓將王盛榮、干毅和周嶽森三人逮捕法辦，很明顯是把這三個人定為了我們的幕後操縱。可是如果別人不清楚，你陳軍代表還不清楚這三個人究竟與我們有多少干係嗎？難道就憑他們和我見過一次面、說過幾句話，甚至連面都沒見過、話都沒講過，僅僅是因為他們的子女和我認識，就成了我的幕後操縱嗎？他們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在哪一點上操縱控制我了？毛主席說過說話要有證據，說我的背後有叛徒、特務、老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縱有證據嗎？說一千道一萬，中央文件也好，毛主席親自批准的也好，我還是希望看到證據。

陳軍代表聽我這樣問，半天沒有吱聲，只是不斷地斜著眼睛瞅我，把個指關節掰得嘎崩嘎崩的響。在乾咳了幾聲之後，陳軍代表正正帽檐，很坦然地答覆道：「怎麼沒有證據哇？王盛榮當面向你們傳授搞恐怖活動的經驗，宣傳反動的多可論，算不算證據？干毅通過他的兒子干小雄，向你們散佈流言蜚語，舐毀我們敬愛的林副統帥，算不算證據？周嶽森企圖利用你在附中的影響來控制學生，又算不算證據？當然，這些都不過是隨便提一提，還有許多的證據，我們從各種渠道上搜集到的證據多得很，就不一定都要和你見面了。好了，不必多說了，我今天到這裏來，主要是要向你傳達劉豐同志在最近一次的省革委會擴大會上關於北決揚問題的重要講話的。」陳軍代表邊說邊從隨身帶的一個挎包中抽出一疊紙來。「聽完這個傳達，我想你腦子裏許多問題都可以得到解釋，這對於你提高認識端正態度是很有幫助的。下面你就聽仔細了。」

我當然要仔細聽聽這個「根據錄音整理，未經本人審核」的軍政領導的「重要講話」。

劉豐說，中央九月二十七日對武漢問題的指示，是一個極為重要

的文件。這個文件是經過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批准的。這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黨中央對我們的最大關懷……為了更好地貫徹執行中央的指示，公安機關軍管會於九月十九日依法逮捕了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王盛榮、國民黨反動將領干毅、老國民黨特務周嶽森。(九月十九日便開始貫徹執行中央的九二七指示？豈不荒天下之大唐！)九月二十日，依法逮捕了《揚評》的部分主要編寫人員和部分幕後操縱者馮天艾、蔡萬寶、甘勇、周凝淳、張志揚、童丹、馬業成、田國漢、嚴琳等九人，連同去年逮捕的魯禮安共十三人。劉豐接著說，為了使廣大革命群眾充分認識「北斗星學會」、「決派」和《揚評》的反革命本質，徹底清算他們的反革命罪行，徹底肅清他們的流毒，他將從「北決揚」的「反革命歷史、反革命罪行、反革命綱領、反革命班底」等幾個方面「對北決揚作全面的批判。」

首長「劉豐同志」「七二〇」前不過是武漢部隊空軍的一名副司令員，因「七二〇」中「護駕」有功連升三級，躍居武漢部隊政委這樣一個大軍區政委的高位，且兼任湖北省革命委員會第一副主任的要職，可謂是位高而權重。文革中各種人物的升降浮沉也見得多了，對「劉豐同志」的此般扶搖直上，也並不感到驚奇，令我驚奇的是「劉豐同志」居然能夠對我們的「反動思潮」進行全面的、系統的批判。曾思玉司令早就說過，北斗星學會宣言的每個字都是反動的，要一個字一個字的批判。曾司令的那番信口開河是當不得真的，他不過是個半文盲。但劉豐政委就不一樣了，他乃大軍區的政委喲，照說是應該有一點點水準的。但他是屬於政治上的「暴發戶」那一種，所以水準未免有限，而且那點有限的水準，聽說也都用在搞腐化上面去了。所以一聽是由他對「北決揚」進行批判，我還是未免有點意外。

「劉豐同志」的批判講話洋洋萬言，什麼「北決揚的反革命歷史」、「反革命罪行」、「反革命綱領」什麼的，還真像有那麼回事似的。比方說到北決揚的「反革命歷史」，劉豐就從六七年十一月份成立的「北斗星學會」談起，說什麼「一小撮階級敵人不甘心自己的滅亡，從陰溝裏爬了出來，打著紅旗反紅旗，大耍反革命兩面派，以極其陰險狡猾的手段，欺騙和蒙蔽一部分群眾，拼湊了反革命地下組織『北斗星學會』，並發表了反動透頂的反革命『宣言』，即他們的第一個反革命綱領」。

「劉豐同志」說得義正詞嚴、泡沫直飛，但我們當時公開成立的這個學會如何就成了「反革命地下組織」？我們公開發表的宣言又如何「反動透頂」、如何稱得上是「反動綱領」？「劉豐同志」半個理由都拿不出來。

關於北決揚的「反革命罪行」，「劉豐同志」歸納了整整十點。除了「鼓吹決派思潮」、「煽動反軍亂軍」、「煽動搶槍」、「大搞分裂活動」、「鼓吹二次革命」、「鼓吹反『考』(即反考茨基派)」之外，還有什麼「鼓吹『造反派受壓論』」、「鼓吹『反復舊』運動」、「鼓吹反動的『工團主義』」、「煽動不提『反復舊』口號的『反復舊』運動」幾條。這後面幾條以前我聽都沒有聽說過，大概是社會上的一些群眾組織鼓吹過的，也一古腦栽到我們頭上，好湊足「十大罪狀」，「劉豐同志」真的有點犯魯迅先生說的那種「十景病」。

關於北決揚的「反革命綱領」，「劉豐同志」歸結為所謂「三反對、三重建」即「反對新生的紅色政權，重建『嶄新的國家機器』；反對中國人民解放軍，重建所謂『人民武裝』；反對中國共產黨，重建所謂『決派黨』」，聽起來似乎就是去年六月十五日《新華工報》評論員「批魯」大作的翻版，連遣辭造句都和那個「評論員」如出一轍。這麼一說，劉豐的講話不過是炒的「隔夜飯」，還能有什麼新鮮的貨色？劉豐講話中唯一能引人注意的，倒是那個第四部分即「決派及揚評的反革命班底」。真是不聽不知道，聽了嚇一跳，我在牢裏呆了不過一個年頭，外頭就鬧出個「反革命班底」來了。倘不是文件上「北決揚」三個字說得明白，我還真以為外頭有個隱藏很深的鳩集了一堆叛徒、特務、老反革命分子的什麼「反革命班底」被挖出來了呢。就像那個可憐的阿Q，在勾引吳媽不成反被打了一棍逃出屋後，聽見屋裏吳媽尋死覓活，還糊糊塗塗以為外面的熱鬧和自己無關哩！且聽「劉豐同志」如何「揭底」罷。

劉豐一開頭便點了我和另外幾個大學生的名，說：「一號頭頭魯禮安，所謂的魯克思，是一個惡毒攻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現行反革命分子(曾思玉同志插話：武漢還搞了個營救魯禮安代表團營救呢！這是站在什麼立場上，為誰說話呀？！)二號頭頭馮天艾，華中工學院學生，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在武漢的反革命黑會就是他負責的。他惡毒攻擊我們黨中央、攻擊解放軍，去年發表的極其反動的『四評』就是他寫的。還有一個楊秀林，武漢大學學生，文化大革命前就因攻

擊我們的偉大領袖、咒罵我們社會主義制度並企圖外逃投敵而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另一名幹將郭東藩（即林地），也是武漢大學的，是一個惡毒攻擊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右派學生，曾勞改十個月。」

劉豐接著就說到「躲在北決揚幕後暗中操縱」的「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王盛榮，說王盛榮是從蘇聯回國的所謂「二十八個半」中的一員，是個幾十年來都瘋狂反對毛主席的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是教條主義時期反對毛主席的得力打手。他給魯禮安等人親自傳授反革命經驗，要他少搞些衝衝打打，多搞恐怖手段，散佈反革命的「多可論」，說什麼「原則這個東西嘛，可大可小、可肥可瘦、可方可圓、可長可短、可寬可窄、可有還可無嘛！」然後劉豐又籠統地提了一下躲在幕後操縱「北決揚」的，還有國民黨臺灣城防司令部的少將參謀干毅，老國民黨特務周嶽森，和黃石鐵山的反革命分子馬業成。至於這些「老反革命分子」是如何「幕後操縱」，劉豐則語焉不詳。（他當然是無詳可語）

劉豐接著說，直接操縱「北決揚」的還有幾個十分陰險狡猾的反革命分子：一個是二七區手管局業餘學校代課教員周凝淳，地主兼資本家出身；再一個是武鋼第三業餘中學代課教員張志揚，父親是歷史反革命；另一個是武漢長虹小學代課教員童丹，父親是勞改犯。這些傢伙都是堅持反動立場，對我們黨和人民懷有刻骨仇恨，瘋狂反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他們經常給「決派」及《揚評》編輯部灌輸反動思想，散佈反革命謠言，鼓吹反動的「多變論」，詭稱他們發現「世界歷史和中國歷史都有個十年一大變的規律」，妄想我們國家有一天也會變成資本主義、修正主義。這些傢伙在文化大革命中「打著紅旗反紅旗」，幹盡了壞事。因此我們同「北斗星學會」、「決派」及《揚評》的鬥爭，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同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是革命同反革命的鬥爭。

「劉豐同志」指出，有的人卻說《揚評》是幾個十八九歲的青年搞的，是「小將犯錯誤」，用不著小題大做、大動干戈。這種說法，第一，不符合事實，第二，即使是十八九歲的，但他們搞反革命活動，也是不能允許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說：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

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反革命地下組織「北斗星學會」、「決派」及其反革命喉舌《揚子江評論》，在其存在的一年多的時間裏，做了那麼多的壞事，廣大革命群眾是不會饒恕他們的。他們的命運，將同他們的老祖宗劉少奇及陶鑄、王任重之流一樣，以搗亂開始，以滅亡告終，他們絕對逃脫不了這個命運。

「劉豐同志」的講話聽上去氣勢如虹，字字千鈞，但在我這個知內情的當事人看來，其實是氣壯如牛，字字牛屎。他說到了幕後操縱的幾個「老反革命黑手」，但是他舉不出一件幕後操縱的事實；他也說到了直接操縱的那幾個「十分陰險狡猾的反革命分子」，但他同樣拿不出任何一件直接操縱的證據。他能夠拿出來的材料，都無非是說這些人的父輩有這樣或那樣的「歷史問題」。父輩的歷史問題是真是假姑且不論，就算是真的，又如何能證明童丹他們是「直接操縱」我們這幾個學生的「十分陰險狡猾的反革命分子」呢？劉豐呀劉豐，你沒有任何證據就敢把人當反革命整，也太沒有人味了。你這個「萬戶侯」，說白了，不就是一堆人神共憤的不折不扣的牛糞麼！

但劉豐頂著一頂「大軍區政委」的帽子，他就是一堆牛糞一堆狗屎你又能把他怎麼樣？而尤其可悲的是「牛糞」們手握的是「中央指示」這柄尚方寶劍，就像魯迅先生筆下那個前朝遺老趙七爺，他說那個頭上被剪了辮子的七斤，「該當何罪，書上都一條一條明明白白寫著的」。這個中央「九二七指示」，不也就是趙七爺拿來唬人的張大帥手中的「丈八蛇矛」麼？

儘管我現在遭遇的不是什麼「燕人張翼德的後代」張大帥，而是「曾大帥」、「劉大帥」，但既然「大帥」們手上有了那支被稱為中央指示的「丈八蛇矛」，我這個「犯了皇法」的平頭百姓，不要說毫無還手之力，連招架之功也是一點都談不上的，只有束手就縛的份。不過就連那個「砍腦殼的」七斤，也會對趙七爺罵一句「入娘的！」，就怪不得我這個一向不守王法的「反動分子」，還是忍不住向眼前這位傳達「劉豐同志講話」的陳軍代表，再提一個問題。

我說：「中央九二七指示幾天前已經向我傳達過了，現在又聽到了曾劉首長關於九二七指示的講話。聽首長說九二七指示是經過偉大領袖毛主席批准的，這自然是毫無疑問的。只是不大明白，既是偉大

領袖毛主席批准的中央文件，抬頭上一般都應該有主席的批示吧，至少也有主席的『照辦』兩個字吧？可是九二七指示上好像一個字的主席批示都沒有。」

聽我這樣說，陳軍代表頓時一臉的不高興，沉默了半天才開口說：「你怎麼知道文件上主席沒有批字？」

「前幾天來人向我傳達九二七指示時我就估到了，」我回答說，「文革以來凡傳達中央文件，首先要傳達主席的批示，這已經是慣例。所以我特別留心主席對這個九二七指示有什麼批示，但好像是沒有，不然不會不向我宣讀的……」

「嗯，你很會鑽牛角尖的……不過，你看問題的方法真的很成問題。」陳軍代表搖搖頭說，「主席沒有批字，嗯，就算是這樣吧，但這並不能表示主席就沒有看到這個文件，也並不意味著主席沒有批准這個文件。偉大領袖日理萬機，也不可能對每一個文件都親筆批示嘛，一般的畫畫圈也就行了嘛。所以你最好不要去鑽什麼牛角尖，不要再抱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你現在最要緊的是端正態度，認真地學習、領會九二七指示的精神，爭取立功贖罪，回到人民的懷抱。除此之外，一切僥倖心理或抵觸情緒都是要不得的，只會使自己愈陷愈深，到頭來不能自拔，那時我們也就愛莫能助了。」陳軍代表攤開兩手，作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似乎他是多麼的悲天憫人。

陳繼續說：「魯禮安你也是相當有頭腦的聰明人，你應該想得到既然是中央正式發文給你們定的案，那就是鐵板釘釘的鐵案。誰翻得了，誰又敢翻？一千年翻不了，一萬年也翻不了！好了，我今天就講這些，也算是苦口婆心罷，都是為了你好……還有一點內部材料倒不妨向你透露透露。有材料證明，就是像王盛榮這種躲在幕後的黑手，其實也只是浮在水面上的。王盛榮的後面恐怕還有大魚，很大的魚啦。比方說……」陳軍代表眨眨眼睛故作神秘地說，「那個跑到蘇聯不回的大叛徒王明就一直在關心國內的情況，前不久還在炮製文章，用極其惡毒的語言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呢！曾思玉同志已經指出，你們那個揚評上用的好多語言，都和王明攻擊我們的言論是一致的，驚人的一致呀！這二者之間難道就沒有任何聯繫？王盛榮本來就是王明那個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中的一員幹將

嘛，他和王明就真的一點干係都沒有？那麼就不能排除王明和你們這個案子有著某種聯繫。」

陳接著說，「倘若真的就你們幾個學生娃娃搞的一個學會、一個組織、一張報紙，能有那樣大的影響？陰溝裏的幾條泥鰍，還能成什麼氣候？就你們幾個乳臭未乾的娃娃，還犯得著如此興師動眾，要驚動中央來發文件給你們定性？顯然問題不是一些人想的那樣簡單啊！毛主席、黨中央高瞻遠矚著哩。」說到這裏陳軍代表臉上浮起一絲詭譎的微笑，用手托著下巴，也不看我，彷彿自言自語似的說，「有大魚，有很大很大的魚，藏得很深很深的魚呢……」

陳軍代表夢游了一陣後，繼續向我透露「機密」說：「知道嗎，就在你們北決揚鬧得最凶的時候，另一個大叛徒張國濤也悄悄地從加拿大溜到了蘇聯，就躲在與我國東北接界的一個地方搞活動。張國濤早不來晚不來偏偏這個時候跑過來，這件事不是也很蹊蹺麼？這又是一個值得深究的動向。所以中央這次下達九二七指示，實在是太及時、太英明、太有必要了！」陳軍代表用手指頭使勁地敲著桌子激動地說，「這是毛主席黨中央的一項重大的決策，我們得從思想上、行動上緊緊跟上！跟上！不能懷疑，不能動搖，這是對我們的黨性的考驗！」

看著陳軍代表夢囈似的在那裏念念有詞，我暗自揣摩這位從邱少雲所在部隊抽出來的連隊政工幹部，前一陣子大概有點跟不上形勢的發展了。恐怕連他自己也未必弄得明白，那幾個老頭子怎麼一下子就被中央定成了我們這幾個學生娃娃的黑後臺。但他的「黨性」、他的「組織觀念」又要求他不得對「中央指示」有絲毫的懷疑。當然，他那些純屬捕風捉影的「階級鬥爭動向」也未必是他想像得出來的，那種將我們和「國際反動勢力」聯繫在一起的天方夜譚，只能是他上面舞指揮棒的決策層的傑作。難怪中央九二七指示閃爍其辭，胡說什麼「北決揚」的幕後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假借名義、暗中操縱」呢，我一直就不明白中央文件中所說的「叛徒」究竟指的是誰？現在聽了陳軍代表的一番話，才知道上頭「高瞻遠矚」，早就把大叛徒王明，甚至大叛徒張國濤，從遙遠的蘇聯和加拿大拉到了「北決揚」的幕後，真不愧是驚天動地的大手筆。

但為什麼又不在「指示」上明說呢？聯想到「指示」上雖點名逮捕法

辦「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王盛榮、國民黨反動將領干毅、老國民黨特務周嶽森」，而又不明說這三個人就是「北決揚」的幕後操縱，就不難想像這個中央指示下得是何等的心虛、何等的尷尬、何等的不光明正大。而發佈這道「指示」的，就真是我一直熱愛和崇敬的「以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麼？

我忽然就想到曾經與我同過號子的那個龍瘋子。他一忽兒說自己像朱元璋，一忽兒說自己像黎元洪，一忽兒又說自己像孫中山、像毛澤東；一忽兒自稱真命天子，一忽兒又說自己曾與杜聿明將軍一同供職於孫總統的麾下，根據呢？自然是子虛烏有。炮製「九二七指示」，將完全子虛烏有的什麼「叛徒、特務、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冊封為我的後臺，這應該是龍瘋子作的事啊。難道炮製「九二七指示」的人也像龍瘋子一樣，患上了「偏執性精神障礙症」而信口雌黃麼？（據我出獄後得到的消息，這個「九二七指示」其實是康生一手炮製的。對此我一點都不感到意外，覺得很符合邏輯。）

就在我胡思亂想的時候，陳軍代表似乎也一直在我的對面不厭其煩地嘮嘮叨叨，似乎是說全市全省正在掀起批判「北決揚」的熱潮，全市全省廣大革命群眾正在熱烈歡呼挖出「反革命地下組織北決揚」的偉大勝利。許多受「北決揚」蒙蔽的群眾都紛紛反戈一擊了，革命形勢空前大好……陳軍代表要我好好地配合「專辦」的清查工作，重點要放在檢舉揭發幕後的那幾個「黑手」是如何操縱控制我的，要拿出過硬的揭發材料。否則就很難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諒解，就不可能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等等。

哈哈，什麼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難道弄虛作假，無中生有，指白為黑，大興冤獄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難道為了目的不擇手段就是「無產階級的政策」？如果為了達到某種目的竟連「實事求是」這個最基本的原則都可以棄之不顧，那豈不正好印證了「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王盛榮那個「原則這東西，可大可小、可肥可瘦……可有還可無」的理論是正確的麼？那還煞有介事地批什麼「多可論」？政客們還恬不知恥地厚著臉皮擺出一副很「政策」的姿態說：在批判和處理「北斗星學會」、「決派」和《揚子江評論》的時候，一定要認真執行毛主席的各項無產階級政策，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這

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打擊面要小，教育面要寬，要團結大多數群眾，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擊一小撮最頑固的敵人。政治家們總是說的比唱的還好聽，事實如何呢？

據「北決揚事件」發生三十年後官方出版的《武漢大典》記載，當時「全市被定性為五一六※29、北決揚的多達數萬人」，為此受到清查的更是不計其數，據估計達數十萬之眾。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這把由政治家們縱起來的邪火，真不知殃及了江城多少無辜群眾！而他們在舉起屠刀，濫殺無辜時，居然還要一本正經地大談什麼「要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要執行無產階級的革命政策」，「要以挽救為主，不要樹敵過多」，我在獄中每思至此，總是禁不住會想到偉大領袖毛主席用過的一句名言：又想做娘子，又想立牌坊。

我就想起《牛虻》那本書中那個年輕的亞瑟，想起亞瑟被他的懺悔神甫出賣後的絕望：瘋狂的笑容從亞瑟的嘴唇上消失了。他從桌上抓起了那柄鐵錘，奮身向那耶穌蒙難像撲去……神像的碎片在他腳跟前散滿一地。「我以前真蠢呀！」亞瑟說，「為了這些虛偽而卑鄙的人」。

我不是亞瑟，我手中也不可能有一柄鐵錘供我去砸碎什麼。但在我的心中有些曾經十分神聖的東西，確實已經因為一些「虛偽而卑鄙的人」變成了一堆碎片。

但我還是幻想有一天能有機會向人們講出案子的真相。有天我問監獄的季幹部，將來正式審判我的案子時，我有沒有說話的機會？季幹部沉思了一會，遲疑地支吾說，機會應該還是有的吧。等開庭審判時按法律規定是要給被告人時間說話的……一般都是這樣。至於像你這樣由中央直接定性的案子，將來怎樣審、怎樣判，還真不好講。不過不管怎樣講，到時候該說的話總還是會讓你說的吧……再說這個案子牽涉的也不是你一個人，好多人包括王盛榮這樣的老幹部都扯進來了。嗨，不是你這個案子，我們還真不容易見到王盛榮呢！這個跛老頭子，六十多歲了，一拐一拐地走起路來你還追都追不上……

聽季幹部這麼說，王盛榮這幾個「幕後操縱」也是關在這個地方了。那麼馮天艾他們呢？他們也是關在這裏嗎？也都和我一樣是單獨監禁嗎？這個看守所的牢房並不多，要是一個個都變成了單人牢房，

原來的那些犯人將如何安置？不過我這也真是吃多了拉夜屎，犯人的安置問題也用得著我去操心麼？

過了一段時間，那個口蜜腹劍的陳軍代表又到看守所來找我。陳臉上笑咪咪的洋溢著勝利的喜悅，他如今已是挖出「反革命地下組織」的功臣，人血染紅帽上的花翎，他當然喜形於色了。陳軍代表是來向我宣講外頭揭批「北決揚」的大好形勢的，「『北決揚』的頭目和骨幹分子，包括幕後操縱，已經一網打盡，鬥爭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陳軍代表揮動手臂興奮地說，「鬥爭正在向縱深發展……當然，也有阻力，一小撮階級敵人是不會甘心自己的滅亡的，必然要作垂死掙扎。他們到處散佈流言蜚語，說什麼前三皇、後五帝，勝利以後殺功臣，朱元璋炮打功臣樓。還有什麼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惡毒攻擊我們清查揭批五一六、北決揚的革命行動，非常非常反動哇。」陳軍代表皺著眉頭忿忿地說。

他看看我，若有所思了一會兒，又說：「為了更有力地揭開『北決揚』的蓋子，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的囂張氣焰，教育廣大受蒙蔽的群眾迅速覺醒，我們認為最有效的辦法是讓你這個北決揚的一號頭頭出面自我揭發、自我批判。因為直到現在還有不少人認為你不過是小將犯錯誤，一直在替你鳴冤叫屈哩！我們考慮到你前一段時間認罪態度還可以，決定給你個機會，讓你到外面去向廣大群眾交代自己的罪行，好讓那些替你鳴冤叫屈的人閉嘴。同時對廣大受蒙蔽的群眾也能起到教育作用，幫助他們認清『北決揚』的反革命實質。這對你也是一次考驗，看你是不是能用實際行動回應中央九二七指示，下決心與自己的過去決裂，真正願意回到人民的懷抱。」

「回到人民的懷抱」，多麼誘人的海妖般的歌聲啊，古希臘神話中那些可憐的水手，就是被這種誘人的歌聲迷倒而船傾人亡。現在任你陳軍代表唱得再好聽，我還會上你這個卑鄙而虛偽的人的當麼？向一個已經被定性為「反革命地下組織」的一號頭頭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一個將被打入十八層地獄的囚犯，奢談什麼「回到人民的懷抱」，不是有點滑稽甚至有點殘酷嗎？雖然想是這樣想，我還是願意「用實際行動回應中央九二七指示」，到群眾中去「交代罪行」，我正愁廣大革命群眾搞不清楚我究竟犯有哪些十惡不赦的滔天大罪呢。到群眾中去「交代罪

行」，至少可以讓大家知道在我這個「一號頭頭」手上，並沒有誰在幕後操縱的證據，我本人也並沒有畫什麼「反動漫畫」惡毒攻擊過誰。只是，專案組的人會允許我實事求是地「交代罪行」嗎？那豈不等於是允許我公開翻案，有這個可能嗎？

果然就聽見陳軍代表說話了，要我好好準備一下，先到他們指定的一個什麼學習班「試講」，看效果如何。「試講」的範圍圈定在「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炮打三紅」、「為劉少奇叛徒集團翻案」、「組織反革命地下組織」等等。此外，要重點揭發王盛榮、干毅、周嶽森這幾個「黑手」是如何對我們進行幕後操縱的，要爭取在這個重大問題上立功贖罪。我表示願意「試講」一下，但要講真話。陳軍代表不大高興地說誰要你講假話了？我說那我就準備一下吧，心裏想不說假話如何會有效果？又如何能「立功贖罪」？

當然假話は無論如何也不能講的，我總記得周嶽森在華工批鬥我的大會上，被押上臺陪鬥時偷偷對我說的一句話，「講良心，說真話」。如今周嶽森等人皆因受我的牽連而不幸下獄，「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為我而死」，我怎麼還能昧著良心去無中生有，落井下石。所以我抱定一個宗旨，可以把自己罵得狗血淋頭，可以把自己說成「罪大惡極、死有餘辜」，但決不承認自己是「現行反革命分子」；可以承認自己對毛主席不忠，承認自己不贊成「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但決不承認「惡毒攻擊」的罪名；可以抽象地承認王盛榮等人是我的「幕後操縱」，但決不編造任何誣陷他們的不實之詞。總之，帽子盡可以大，只要沒有具體事實，那頂帽子就是頂空帽子，而廣大革命群眾自然也就知道真相如何了。我於是用了幾天時間字斟句酌地準備了一篇提綱式的稿子，交陳軍代表看了。他大概見我一條條罪名都昭然若揭地擺在紙上，點點頭也就首肯了，只是叮囑我試講時內容一定要具體翔實，我自然滿口答應。

於是有一個晚上我被帶出看守所，在幾名專案人員的陪同下，乘一輛軍用吉普馳往一個不知名的地方。我被帶進一間大屋子，屋子裏已坐滿年輕的學生，年齡都比我小，看來都是些正被強制洗腦的中學生。文革中這類專門給人「洗腦」的所謂學習班多如牛毛，其實也就是一種強迫有「異端」傾向的人「脫胎換骨」的思想集中營。我向這些被集

中洗腦的學生們掃了一眼，竟然在他們中間看到了久違的「龍洛霍夫」和他的「阿克西妮婭」。他倆是觸犯了哪一樣天條被送到這個學習班來了呢？抑或他們的不幸僅僅是因為那位女孩子的「胡風分子」的父親與他們有血緣上的牽連呢？唉，我如今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哪裏還管得了他們的事。我突然注意到有幾名軍人不聲不響地進了房間，悄悄地坐到屋子的一角。其中有位年長的想必是個領導，他多半是來給今天的「試講」把關的。只是，我恐怕要讓他失望。

我對著滿屋的學生娃娃也就是所謂「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開始作「自我控訴」、「自我批判」。我說自己由極端的個人主義發展到極端的狂妄，一直狂妄到反對、攻擊偉大領袖和毛澤東思想。我揚言毛主席也並非絕對正確，也會有或左或右的錯誤，並非句句是真理，也不可能一句頂一萬句。我否定毛主席親自肯定的天津延安中學實現大聯合的經驗，甚至跳出來為毛主席親自定性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翻案。我罪大惡極、死有餘辜！我向偉大領袖毛主席請罪，向廣大革命人民請罪。

然後我對自己「炮打三紅」的罪行進行批判，說自己對馬克思的理論「斷章取義，蓄意歪曲」，罪該萬死。把自己上綱上線的臭罵了一通之後，我開始重點揭發王盛榮、干毅、周嶽森這些「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是如何對我「幕後操縱」。一屋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聽到這裏頓時來了精神，因為這正是大家最關心也最感不可思議的事：赫赫有名的學生領袖「魯克思」，居然是在受「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的暗中操縱。然而他們不聽不知道，聽了更糟糕，因為除了在我嘴裏再一次聽了一回王盛榮的那個名揚四海的「多可論」之外，他們從我的揭發中根本找不到任何能夠證明我是受「黑手」幕後操縱的事實。

我的揭發交代效果顯然出奇的好，下面的學生有的已在交頭接耳地悄悄議論起來，但我知道這種效果絕對不是這次試講的組織者所需要的。坐在屋子一角的那幾個軍人已經提前退場了，我也明白這種自欺欺人的把戲很快就會收場。《紅樓夢》裏有句話說得好：「偷來的鑼鼓敲不得」，我們這個案子的製造者所作的一切，都只能是暗箱操作。他們怎麼就利令智昏地想到要我出面揭發批判、自我控訴，他們就真不曾想過弄不好事情會「穿幫」、會「露餡」麼？我很贊成毛澤

東同志的一句話：「假的就是假的」，雖然他老人家一貫熱衷於聽假話。

不出所料，專案組果然不再安排我到獄外去「自我控訴、揭發批判」了。陳軍代表倒是來看守所找我談過幾次話，說我那次試講很失敗，上面很不滿意。陳說我在「惡毒攻擊」這個問題上仍在狡辯，只承認客觀效果，不承認有主觀動機。還有揭發幕後操縱只是泛泛而談，沒有拿出過硬的材料，比如行動前怎樣請示，行動後又是怎樣彙報，時間、地點、內容等等。我反駁說那個「反動漫畫」的問題已經在提審時澄清了，本來就是無意為之，既不存在什麼反動漫畫，也不存在任何動機，我如何交代動機？至於那幾個幕後操縱，是九二七指示定的，和我究竟有多大關係，你陳軍代表最清楚呀！真要能拿出過硬的材料，我不早就拿出來了。

陳軍代表一時語塞，咕咕噥噥也不知說了些什麼，然後說我既然不能配合政府立功贖罪，那問題就嚴重了。經中央定性後，「北決揚」已變成中央直接掌握的大案、要案。對我這個一號頭頭，就是判上十年、二十年也不是不可能。陳軍代表要我一定要認清形勢，想好自己究竟該怎麼辦。關鍵還是要消除顧慮，大膽揭發，爭取立功贖罪，這是唯一的出路。他「語重心長」地說，想想，問題都壓在你這個一號頭頭的身上，你承擔得起？不粉身碎骨才怪！陳的弦外之音我哪會不懂，但是哪怕坐穿牢底，我也絕不能做昧著良心嫁禍於人的事！

陳軍代表見我始終不開竅，只好怏怏地打道回府。臨走時他告訴我，我的問題一時半載怕是解決不了了，但是便宜了馮天艾那小子。他說周總理幾次發話放馮回學校分配工作，估計這幾天就要放他回去了。我知道馮天艾的一大罪名就是「攻擊周總理」，總理寬大為懷，指示將馮釋放，這是總理的度量。但馮畢竟是「曾劉首長」點名的北決揚「二號頭頭」啊，既然「二號頭頭」能免於治罪，我這個「一號頭頭」也未必就「在劫難逃」，我們畢竟都有「青年學生」這個護身符啊。我覺得釋放馮天艾絕對是個好信號，證明中央方面並不一定要置我們這些學生於死地。

十多年後我終於打聽到當年總理指示釋放馮天艾的內幕。原來早在中央「九二七指示」下達前，武漢工代會的幾位頭頭就一直利用各種

機會為我和馮天艾辯護，堅稱我們是「犯錯誤的革命小將」。這件事終於驚動了總理，在一次和武漢地區群眾代表會晤時，總理親自過問了這件事。總理問我們是哪個學校的學生，又問抓我是因為什麼問題？曾劉說我的問題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總理遂不語。然後又問馮天艾是什麼問題，曾劉回答是「惡毒攻擊敬愛的周總理」。總理笑了笑，揮揮手說這算什麼問題，放了，馬上放了，讓他回學校去。

此後總理又曾多次催促武漢放人，直到「九二七」指示下達之後，總理仍明確指示將馮釋放，顯然是不願背有學生因他之故而坐牢的惡名。至於像我這樣被指為「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雖也是學生一個，但事涉偉大領袖，總理不便表態也不足為怪。只是我也未免太冤，我「惡毒攻擊」的罪證不是早就被否定了嗎？何曾「惡毒攻擊」了？曾劉偏偏死咬著不放，實在太歹毒。

然而當年儘管有總理的多次指示，馮天艾到底還是難逃牢獄之災。「曾劉首長」居然陽奉陰違，頂住總理的指示不辦，照樣將馮投進監獄長期關押。理由是很冠冕堂皇的：清查「北決揚」期間，需要留下馮天艾這個二號頭頭調查核實材料。俗話說「小鬼比閻王厲害」，一點都不錯！

說到我和馮天艾，也算是一對難兄難弟了，我一年多前在鐵山被綁架後，馮就出面組織對我進行營救。「營魯」失敗後馮本人亦被通緝。當時的警司司令方銘在一次會議上大放厥詞，說魯禮安的後臺已經查出來了，是個女的，叫馮天艾。據說「七二〇」前在百萬雄師內部，也盛傳鋼工總的頭頭是個女的，叫朱洪霞，是王任重的皮絆。看來方司令員是不願意叫百萬雄師專美於前，也要鬧出個男女不辨的笑話來出出洋相。令人悲哀的是正是這種昏官在把握吾輩的命運！至於馮天艾之所以入獄，倒並非是因為組織了「營魯」，而是他在我入獄之後也就是六八年的七、八月間，發表了四篇題為《評某氏人物》的文章，將矛頭指向了周總理以及張春橋等中央首長，指其為機會主義分子，於是惹火燒身。

那年九月份在湖北大學召開大會批鬥我時，馮天艾被拉上臺陪鬥了一回後，就一直被關在警司交代問題。不料馮被關在警司裏不但不思改悔，反倒秘密寫下數封致曾劉首長的公開信，托人偷偷帶出去在

社會上廣為張貼，一時引起轟動。公開信的內容我不甚清楚，但可以肯定是非常犀利潑辣叫首長大人們很沒有面子。而首長們的報復心如眾所知又是特別的重，所以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總理親自發話放人，曾劉仍要頂著不放了，報復心使之然也。

後來漸漸知道，馮天艾並沒有關在武昌這邊，關在這邊的只有張志揚、田國漢和三名被「欽點」的「幕後操縱」。其餘蔡萬寶、甘勇、馬業成、周凝淳和童丹、嚴琳、楊秀林幾個也不知是關在哪裏。據「曾劉首長」在省革委會擴大會上宣佈，對我們這十幾個人都是依法逮捕，但實際上並非如此。比如對馬業成、甘勇和童丹三人就並沒有下逮捕令，而僅僅是拘留。之所以不予逮捕是因為實在找不到任何逮捕他們的證據，但這似乎並不妨礙將他們十年八年地關下去。嗚呼，這就是當年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法制」。那麼這些被一一依法逮捕或依法拘留的「北決揚骨幹」即「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究竟都犯了些什麼法呢？這裏倒有必要不吝筆墨一一錄來，以供將來研究中國文字獄史的人士研究之用。

王盛榮、干毅、周嶽森三人，是中央「九二七指示」明令逮捕的「幕後操縱」。其中王盛榮乃三十年代投身革命的老紅軍，六級高幹。王與我素昧平生，僅因文革中在對我的身份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對我和一些學生鼓吹過所謂「多可論」，而被定為「幕後操縱」之一。而這個「多可論」我們當時曾視之為謬論，直到遭難後才醒悟到，此論實為王老經歷長期黨內鬥爭而總結出來的經驗之談。那個「九二七」指示不正是作踐黨的「實事求是」原則，將原則「可方可圓、可有可無」的理論付之實踐的典範嗎？

周嶽森，華工附中原校長，中共黨員。解放前夕曾從事學生運動，是黨的週邊組織的成員。因與我有過一次關於復課問題的談話，而成為「北決揚」的幕後黑手之一，並因此而莫名其妙的像川劇中的「變臉」似的，變成了「國民黨老牌特務」。干毅則係國民黨起義將領，華工機械系二級教授，與我從未有過來往，僅因其子干小雄與我關係密切，便被指為我的「幕後」之一。其「幕後」的唯一罪證，是對他兒子說過「國民黨最怕的並不是林彪，而是劉伯承」。

以上是三名「北決揚」的所謂「幕後操縱」。

那麼被指為「幕前操縱」的幾個人又是怎麼回事呢？

周凝淳，二七區手管局業校代課教師。其父是解放前武漢火柴廠的老闆。周擅長圍棋，曾獲武漢市青少年圍棋冠軍。文革中因與馮是中學同學的關係而與我們有了交往，逐漸來往甚密。周對歷史頗有興趣，曾宣稱從對歷史的研究中發現「世界歷史和中國歷史都有個十年一變的規律」，即每大約十年總會有較重大的歷史事件發生，從而影響歷史的進程。此論被打成妄圖變天的反動的「多變論」，周也因此而定為「決派」及《揚評》的直接操縱者遭到逮捕。

童丹，武漢長虹小學代課教員，張志揚，武綱第三業餘中學代課教師。二人均是滿腹學問的哲學愛好者，張在德國古典哲學方面的造詣尤深，出獄後以其美學研究方面的成就而蜚聲國內外美學界。當時二人雖無任何把柄可抓，也因與我有所來往，而被定為直接操縱「決派」和《揚評》的「陰險狡猾的反革命分子」，遭受長期拘禁。

至於「浮在前臺水面」的幾個大學生，除我和馮天艾外，還有楊秀林是武大歷史系學生，郭仲藩即林地是武大經濟系學生。我們這幾個人就是「九二七指示」中所提的《揚評》主要編寫人員。「曾劉首長」指楊秀林「文化大革命前就因攻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咒罵我們社會主義制度，並企圖外逃投敵，清理階級隊伍中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郭仲藩則是「一個惡毒攻擊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右派學生，曾勞改十個月」。其實楊與郭均是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優秀學生，對他們在校時的那些「反動思想和反動行為」的指控，全是誣陷不實之辭，這我在上卷第十章中都談過了。楊後來也被投入了監獄，出獄後在一所大學長期從事歷史教學，郭仲藩撥亂反正後因其在經濟學領域頗有建樹，而被推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後曾擔任黃石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另外蔡萬寶、甘勇、嚴琳及馬業成等人都是一般的工人，他們之所以入獄，除了本人參加了「北決揚」的活動外，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家庭成員中據說都有人有「嚴重的歷史問題」。根據「老子反動兒混蛋」的邏輯，他們當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

以上就是「曾劉首長」所謂的「北決揚的反革命班底」，據說正是由這些人組成了「一個貨真價實的反革命的裴多菲俱樂部」。

除了關在我隔壁的張志揚我有機會偶爾在早上換馬桶時打個照面

之外，其他幾個人都關在離我較遠的號子裏，我也就無緣和他們碰面。想想這幾個人真是冤枉，我畢竟還寫過反對天津延安中學大聯合經驗的大字報，寫過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翻案的文章，寫過一些被認為是「離經叛道」的宣言、日記和筆記，他們又都寫過什麼呢？什麼都沒有。僅僅因為與我有所交往，就被株連進這個案子裏來。他們無緣無故被關在這暗無天日的地方，怎麼咽得下這口怨氣？果然沒幾天我就聽見從一個號子裏傳出一陣怒氣衝天的叫罵聲：「老子犯了什麼罪？老子老紅軍、老革命，十六歲就跟了共產黨，爬過雪山，走過草地，挨過國民黨的槍子，今天竟來坐共產黨自己的牢房，還有王法沒得？麼事北決揚五一六，和我有個狗屁關係，我幾時操縱他們了？完全是陷害。老子要控告你們迫害老紅軍、老幹部！老子操你們八輩子的先人！老子當年鬧革命的時候，你們的老子只怕還在穿開襠褲呢。個混帳王八蛋，整到老子格頭上來了！」一聽就知道是王盛榮這個老頭子在發倔脾氣了。

罵得真的痛快！但也只有這個王盛榮敢罵。他曾為共產黨出生入死，如今無端坐起共產黨的監獄，他當然要罵。然而這看守所乃「無產階級專政」之地，豈能容許犯人咆哮監房。很快就聽見甬道上響起嘈雜的脚步聲和一串鑰匙的響聲，然後是開門聲，不一會便聽見王盛榮殺豬似的叫起來：「打人啦！打人啦！無法無天啦……」接著聽見一陣「哎喲……哎喲」的叫聲，是一種痛極才發出的聲音，也不知道管教用什麼方法在折磨他。但王盛榮仍是罵：「混帳局長……王八蛋！一群混帳局員！」不曉得他嘴裏的「混帳局長」究竟指的是誰？不過「混帳局員」當然是指正在折磨他的人了。只聽見那管教咬牙切齒道：「好哇，你個老混蛋還敢罵人。你不要還以為你是什麼老紅軍、老革命了，你是個老反革命！我們今天給你戴上銬子，就是要打打你這個老反革命的威風！」

聽著像是王管教的聲音。這個姓王的管教是新近從部隊「支左」支到看守所的一名「大兵」。這位三十來歲的兵哥哥生得五大三粗，人倒長得端正威武，但在犯人面前簡直就是個凶神，手裏老是提著副銬子、成天繡著個臉，似乎隨時都準備瞅個機會，把哪個看不順眼的犯人銬起來，王盛榮今天算是栽在這位凶神手裏了。本來像王盛榮這樣大鬧監房，按規矩是免不了上镣的，但一來他已是六十多歲的老人

了，上腳鐐肯定吃不消；二來王的一條腿戰爭年代受傷早鋸掉了，是個「獨腳」，所以只享受個上手銬的待遇。不過手銬要是上得太緊，也是不好受的，剛才王盛榮大概就是銬子上得太緊了，才「哎喲、哎喲」地痛得叫喚。但「打人」又是從何說起呢？難道管教真的動手打他了？弄不清楚，反正是「虎落平川受犬欺」。

事實上文革中任你是三十年代投身革命的老紅軍、還是省裏屈指可數的六級高幹，只要一旦被指為「反黨」，你就比一堆狗屎還不如。論資格，劉少奇的資格可謂老矣，論級別，劉少奇的級別可謂高矣，結果怎麼樣呢？毛澤東一句話，然後是「八屆十二中全會」一道決議，劉少奇就變成了「叛徒、內奸、工賊」，被「永遠開除出黨」，成了「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誰都可以作踐。與劉少奇相比，你王盛榮又算得了什麼呢？不過王盛榮敢在這個地方「倚老賣老」擺老資格，替大家出口胸中的惡氣，也算無愧為「老紅軍、老革命」了。

王盛榮上銬後沒幾天，我「沿著紅軍的足跡」，也嘗了回上銬的滋味。也是怪我好奇心太重，一心想看看王盛榮手上的銬子是不是取下來了，在王盛榮放風時，扒在窗子上朝放風場張望了一下。不料剛一露臉，就被正站在放風場中央監督王盛榮放風的一個姓鄭的小個子管教抓了個正著。鄭管教氣勢洶洶地闖進我的房間來，後面跟著他的搭檔王管教。王管教背著手，那副令犯人聞風喪膽的手銬就在背後哐里哐啷地響。

「你想幹什麼？說！」鄭管教眯著一雙小眼睛，厲聲喝問道。

「不，我不想幹什麼……」我兩腿直發抖，腦子裏突然浮過杜甫的兩句詩來：「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只是「一何苦」的不是那個老嫗，而是我這個可憐的囚徒。

「不想幹什麼那你朝外頭望什麼望？」鄭管教兩手叉腰歪著脖子問。

「是……是想看看王盛榮是不是在放風？」我想來瞞不過去，照直回他的話說。

「你怎麼知道是王盛榮放風？嗯？」

「我聽見走道裏有咚咚咚的拐杖聲，知道是他出來。」

「王盛榮出來放風關你個屁事？也要你來操心！」鄭管教冷笑一聲

呵斥道，然後開始了他慣用的一套——也不知道是不是從小說《二十二條軍規》中學來的——窮追不捨的追問：

為什麼想知道是不是王盛榮出來放風？

我說我沒有事幹，太寂寞了……

為什麼沒有事幹？——我在坐牢。

為什麼要坐牢？——我不聽毛主席的教導。

為什麼不聽毛主席的教導？——我狂妄自大。

為什麼要狂妄自大？——我放鬆了思想改造。

為什麼放鬆思想改造？——我沒有讀好毛主席著作。

為什麼沒有讀好毛主席著作？——我受了十幾年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毒害。

為什麼要受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毒害？——只怪家裏供我讀了小學又讀中學又讀大學。

為什麼供你讀了小學又讀中學還不夠，還要供你讀大學？

……

問題一個咬著一個，可以像大海裏的帶魚一樣，一條咬住一條的尾巴，緊緊咬住不放。面對鄭管教這沒完沒了帶魚咬尾巴似的的問題，我不由得想起一句俄羅斯的諺語，「一個笨蛋提出的問題，十個聰明人也回答不了」，況且我又不是個聰明人。正當我發愁如何應付鄭管教的提問時，站在一旁的王管教早已不耐煩了，他打斷鄭管教，直截了當地問我是不是還想和你的黑後臺搞反革命串聯？

「不……不是。怎麼可能呢？」我分辨說，「王盛榮也並不是我的什麼後臺……」

「好哇，還敢嘴硬！」王管教用手指指著我的鼻子惡狠狠地叫道，「連中央指示都說了王盛榮是你們一夥的黑後臺，你小子竟敢不認賬！簡直是反了，反了……把手伸過來，併攏！」王管教一面下命令一面用右手舉起打開的鎊子。「砰」的一下，王管教將鎊子對準我伸直併攏的手腕猛砸下來，然後將鎊子死命地收緊，一直緊到我忍受不了叫出聲來。

「我叫你今天也嘗嘗無產階級專政的厲害！」王管教得意地說，「你硬，還硬得過王盛榮麼？老紅軍又怎樣？我不照樣整得他伏伏貼

貼。」說著王管教從口袋裏掏出鑰匙把銬子打開。我以為事情就此下地，剛鬆口氣，卻聽見王管教大喝一聲「手臂伸直併攏，舉起來！」等我伸出手臂後，王管教將銬子再一次舉起來狠狠向我的手腕砸去，再一次死命地將銬子收緊。然後再打開，再砸、再開，再砸……如此翻來覆去地折磨，兩隻手腕不多久便砸出血印了。我這才明白王盛榮那天被上銬時，為什麼要痛得大叫打人了，這個姓王的純粹是變著法子對犯人搞體罰。按照政府的規定，監獄裏是不准許體罰犯人的，對個別嚴重違反監規的反改造分子，必要時可以上戒具加以管束。這個王管教就是利用了這個規定，他不但濫用這個規定，而且將上戒具的過程，變成了一種用刑的手段。正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誰說這個姓王的管教除了抖狼什麼本事都沒有呢？

我舉著血跡斑斑的雙手，任憑王管教施暴欲哭無淚。我想過上告，因為進看守所後曾經聽所長傳達過中央首長的指示，大意是說對監獄裏的在押人員，要實行人道主義的待遇，不許對犯人搞體罰或變相體罰，不許虐待犯人。犯人如果受到虐待，准許犯人提出控訴。這個據說是得到毛主席認可由總理親自宣佈的指示，當然是非常人道的，非常保護犯人的「人權」。但准許犯人控訴代表無產階級專政和國家意志的監獄當局，豈非是癡人說夢？這就好像虎對羊說羊有控訴狼的權利一樣荒唐。如果哪個犯人真的聽信了中央首長的那個指示，去控訴虐待他的管教幹部，除非他有通天的本事一狀將管教告倒，他以後就休想在號子裏有安生日子過，那些管教不把他整死才怪！何況那個「控告狀」又如何能夠「上達天庭」呢？

再說就是上達天庭了又能怎樣？像劉少奇、賀龍這樣的大人物在獄中的處境，難道中央就一點都不知道？還不是照樣被虐待至死。所以受虐待也好、體罰也好，打落了牙齒往肚裏吞就是，這才叫「認罪服法」，否則就是繼續頑抗，而頑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條。我只能按下「控告」的念頭，不再「頑抗」。

但懲罰還未結束，我戴著銬子被送進放風場旁邊的一間單獨的「小號」關禁閉。「小號」順道共有四間，是專門用來關押已判了極刑的死囚和嚴重違反監規的犯人的。有一陣子夜深人靜的時候，曾隱約聽見從小號厚厚的牆壁內傳出淒厲的慘叫聲，據資深犯人說，那是

長年累月被關在那不見天日的地方關瘋了的瘋子在叫。厚厚的鑲鐵皮的木門被打開，我被王管教推了進去。

號子裏很暗，只有天花板上開有一個小小的天窗。一縷光線從那天窗裏射進來，看得見灰塵在那光束裏飛舞。牢門一側還開有一個圓形的玻璃小窗，小窗設計得很「監獄」：從外面可以觀察屋裏的一切，而從屋裏看外面是混沌一片。我放風時曾看見管教通過這種小窗朝裏面觀望，現在不知道他們是不是也正在在窗子外面觀察我，像觀察一頭關在籠子裏的受傷的野獸。說小號像關野獸的籠子是一點也不誇張的，它的面積很小，幾乎就只能容得下一張床，那是張鑲了一層木板的水泥床。床旁邊有一個拉屎用的茅坑，此外就一無所有了。不，我說錯了，就在那個茅坑和水泥床之間有一根鐵樁，鐵樁上的一個小孔裏，分明繫著一副長鏈條的腳鐐。我搬起腳鐐看了看，鐐銬上還裹有一些碎布，布上浸漬有血的陳跡。

目睹這布上的斑斑血跡，悲涼和恐怖一起向我襲來。我不知道我為了那一點好奇心，還將付出多大的代價，我會在這個不見天日的地方呆上多久呢？我手上的鏃子還要鏃多長時間呢？管教們倘若心血來潮，會把這副鐵鐐也戴在我的腳上嗎？時間關長了我也會發瘋嗎？我實在不敢多想了，聽天由命罷，我把命運交給上蒼。

號子裏的光線愈來愈淡，終於完全黑了下來。我靠牆半卧在床上，抬頭仰望頭頂上那口天窗外的一小塊夜空。我看見夜空裏似乎有微弱的星光在閃爍，那是我日夜心馳神往的外面的世界。

我曾經幸福地生活過二十年的遼闊自由的世界，我還能回到你中間去嗎？

大滴酸澀的淚珠順著我冰涼的面頰流下來。



## 第十九章

# 煉獄三日冥想

鐵山拷打也好，逮捕批鬥也好，兩年多來我都從不曾輕易流淚，但這一次我流了。我不明白命運為什麼對我如此不公。不就是看了外面一眼嗎？便受到戴銬、挨打、關小號的懲罰，這懲罰不也太隨意了嗎？我還算是個人嗎？管教們如此踐踏我，無疑與那個可惡的中央「九二七指示」有關。自這個指示下達後，我便從一個正在受審查的普通的「犯罪嫌疑人」，一下子升格為一個「反革命地下組織」的首犯，一個罪大惡極、死有餘辜的反革命頭子。蹂躪我、踐踏我不正體現出管教們的「無產階級革命義憤」，體現「對階級敵人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的精神嗎？我年紀輕輕怎麼就落到這種生不如死的地步？我悲憤至極，淚如泉湧。

一晚總算熬過去了，但感覺中像是熬過了整整一個世紀。接著而來的是白天，但除了有一束光線從天窗射進來，白天和黑夜又有多少區別呢？在這個可怕的小屋裏，連白天裏時間也彷彿是停滯的。因為從早到晚，除了屋內光線的明弱有所不同，你無法感覺周圍有任何變化。你半躺在床板上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等待，等待什麼呢？等待一日三餐飯送進來。那時門下方的一個小洞會被打開，有一小鉢飯和一小碗菜遞進來。一刻鐘後小洞會再一次被打開，空出來的碗鉢會被取走，於是這個小洞就成了你和外界溝通的唯一渠道。

但這個送飯的不過是個役犯，他只會默默無聲地送飯和取碗，而不會和你有任何別的交流。除了送飯送菜維持你的生命外，他的出現（一隻手）只是告訴你你的名字還沒有從看守所的犯人名冊上勾銷掉。

僅僅如此而已，然後你面對的仍然是可怕的寂靜，是令人恐怖的寂靜無聲。你什麼也聽不見，什麼也感覺不到，似乎外面的世界已經永遠向你關閉了大門，你有一種被人類世界徹底遺棄的恐懼。這種恐懼無聲無息地從四周的牆縫像冷氣一樣侵進你的骨髓裏，你覺得自己被埋進了地窖，沒有人知道你還活在裏面。你變成了一具活屍，只等流逝的歲月將你風乾成乾癟的木乃伊——時間長了，無論是身體還是精神都會乾癟，如果你還沒有完全瘋顛的話。

這種將人與世徹底隔絕的禁閉方式對人的傷害太厲害，我不得不懷疑這個禁閉室的唯一目的，就是從精神到肉體將人徹底地摧垮。這種地方如果有必要存在的話，也只能是短時間用來懲戒極個別嚴重違反監規、擾亂監獄秩序的危險分子，它的使用應該受到法律嚴格的限制。只是國家有監獄管理方面的法律嗎？如果有的話，為什麼現在任何一個管教都有權把他看不順眼的犯人關進小號，而不管他是否只是稍微觸犯了一點監規或根本談不上犯規，這難道也是法律允許的嗎？是誰給了管教們這麼大的權力呢？或者只好承認，我們國家的整個監獄管理制度，都存在著嚴重的缺陷，以致於犯人連最基本的人權也得不到法律的保護。

這個問題在監獄系統想必由來已久，而今愈演愈烈，以致於要由中央首長出面講話，要求監獄裏不得虐待犯人，並且准許受虐待的犯人提出控告。但控告監獄當局在事實上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你被折磨至死，也許會有人來過問一下如何善後，但也不會真正有人承擔實質性的責任。如果你是「畏罪自殺」呢？與監獄方面更加無關，誰要你「自絕於人民」！

其實自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是需要相當的勇氣的。人非到對前途完全絕望，不會輕易用自己的手去了斷自己的生命。前幾天的報上倒是有個自殺的例子：一個五十年代初就被逮捕關押的美國間諜飛行員，在北京的一所監獄裏，用剃鬚刀片割斷手上的血管自殺了。這個美國人無疑是實在忍受不了長期被囚禁的生活，而決心告別這個他不再留念的世界。另一個與他同時被捕同樣關押了十多年的美國間諜飛行員，隨即得到寬大釋放，被押送出境經香港返回了美國。後者的獲釋與前者的自殺，顯然有著邏輯上的某種關係。當然這只是極個

別的例子，像我們這個看守所裏，就不止一次發生過犯人自殺的事情，但從來沒有聽說誰因此而受益。其實報紙上的那則消息真正引起我的興趣的，是那個美國鬼佬的自殺方式：晚上睡覺時用被單遮住身體，不聲不響地用刀片輕輕在動脈上一劃，就把自己結果了，誰也不會察覺。等到血流一地時，就是被人發現，也早已嗚呼哀哉。

這個美國人的自殺方式對我不能沒有觸動，我的鞋子的後跟內，就藏有一塊很小的指甲大的鐵片。小鐵片是在一次放風時偶然在地上檢到的，拿回號子後偷偷把它磨鋒利了，平常悄悄地用它來削削指甲（沒有這塊鐵片之前，指甲長長了，就只好放在熱水裏泡軟後，再慢慢撕掉過長的那一部分，只是弄不好往往把肉裏的指甲也連帶撕了，很難受的）。我想能夠削斷指甲的東西，切開血脈也應不成問題，我要不要也試一試呢？

傍晚時屋裏的光線愈來愈暗，把我珍藏的這塊「刀片」從鞋子的後跟中悄悄取出來，用手指摸摸「刀片」的鋒口，又把它在水泥地坪上磨了幾下，然後幾乎是下意識地用它在我手腕上試著劃了一下。劃過的地方有點發麻，摸摸劃傷的口子，有血緩慢地滲出來。流血是生命誕生的象徵，流血也是死亡來臨的預兆。《新約》啟示錄上說，天主身邊那些穿白袍的人，在人世時都受過大苦大難，曾用羔羊的血洗白了他們的長袍。我不能用羔羊的血但總可以用我自己的血來洗潔我自己吧……我的血會不停地流嗎？血流盡之前那感覺是痛苦還是舒坦？我會通過一段從黑暗到光明的死亡隧道走向永生嗎？我的意識慢慢有點混亂，閉著眼睛躺在床板上任憑思緒信馬由疆。

忽然我眼前一片血紅，我睜開眼，是頭上的獄燈亮了。我看見對面的牆壁上有一個圓圓的觀察孔，我抬頭看頭頂上的天窗也是圓的，那圓圓的天窗之外，應該是廣袤的星空。我是置身在一艘太空船中麼？那太空船上的倉室不也是很狹小的嗎？那倉壁上的小窗不也是圓圓的嗎？宇航員生活在那僅夠棲身的倉內，不也是遠離塵世異常寂寞嗎？我是一名被地球上的統治者趕出地球的反叛者嗎？我正被放逐到另一個自由的星球上去嗎？在重獲自由之前，我必須把自己封閉在這個小小的空間裏，度過一段漫長的孤獨時光嗎？

是的，我是被封閉在太空船的小倉裏，正在宇宙中飛行哩。飛行

的速度現在是愈來愈快了，我會追上光速嗎？太好了，眼前愈來愈光明，我似乎要回到我的童年了。不，我還是個嬰孩哩。我很餓，大人都不在家，沒有人聽見我饑餓的哭聲。我饑腸轆轤，把我坐的竹車椅上的竹篾當成了麻花，但是我並沒有一副像熊貓那樣的消化系統，我的腸胃被竹篾撐壞了。我性命垂危，被送進一家教會醫院搶救。醫生說救過來的希望很小，死馬當著活馬醫罷。然而天主垂憐我的無知無辜，我竟奇跡般地活了下來。

我僥倖活下來了，都說我的命是檢回來的。檢回來的命大，命大的大概膽子也大，我的命運彷彿從童年起就注定一生坎坷。那個不到五歲就敢上臺，當著一禮堂的人的面指揮大合唱的幼稚園的小朋友是我嗎？那種「千人萬眾前，指揮大合唱」的膽量於我究竟是福還是禍呢？說不清楚。我還是繼續在我童年的時光裏遨遊罷。

還是五歲那年，朝鮮戰爭正在激烈進行，武漢人民積極回應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捐獻飛機大炮」的號召，積極進行捐獻。幼稚園的老師也動員我們小朋友，把家裏的破銅爛鐵捐給國家打槍炮。無奈我家裏的破銅爛鐵都被媽媽和姐姐清出來捐給單位和學校了，情急之中，我翻出了我坐過的帶四個小鐵輪的舊車椅（就是那個我把竹篾當成麻花啃的車椅）往幼稚園拖。但我力氣太小，拖這樣一個輪子已不能轉了的車椅是太費勁了。路上遇見一位志願軍叔叔，他聽說我是把車椅捐給志願軍做槍炮的，高興地幫我把車椅扛到了幼稚園。

抗美援朝期間，政府除了動員市民捐贈外，還動員各界人士給戰鬥在前線的志願軍戰士寫慰問信寄慰問品。當小學教員的母親在寫慰問信時，把我畫的一幅志願軍叔叔拿槍狠狠打擊美國侵略者的圖畫，也一起寄往了朝鮮。信和畫分到一位姓黃的志願軍戰士手中，他給我們回了信，表示了感謝和殺敵立功的決心，還特別誇我畫畫得好，並隨信寄贈了兩張朝鮮紙幣以作紀念。那時候一個像我這樣的愛國兒童，會想到十七年後自己將被視為革命的敵人、十惡不赦的罪犯而身繫繩縛嗎？究竟是我在人生的路途上「迷失了正確的路徑」——如但丁在《神曲》中所說——還是「這森林太荒野、太險惡，舉步維艱」呢？

說到迷路，小時候倒是差點迷過一次，是因為大人們玩牌時我偷拿了一張大鬼，大人找牌時我做賊心虛往街上跑，繞著車站路、勝利

街跑一圈兩圈就跑糊塗了。家裏人四出尋找還報了警，最後雖然安然無恙，但全家虛驚了一場。其實家裏人最擔心的倒不是我一時迷路，他們最擔心的是怕我在外面遇上麻鬍子。據說有那麼一種專門拐賣小孩的麻鬍子，只要他用手在小孩的臉上一摸，小孩子眼前就會產生出左邊是水、右邊是火、後邊有虎狼追逼的幻象，只好乖乖跟著麻鬍子走。這個傳言是極可怕的，幸好我在「潛逃」之中不曾碰見這種麻鬍子。但是，命中注定要發生的事情終究還是要發生，十幾年後我還是被一種幻覺所迷糊：路的左邊是「修正主義」的豺狼、路的右邊是「資本主義」的虎豹，而身後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的洪水在逼近，必須一直向前走，結果是走向了萬丈深淵。但問題是究竟是誰讓我迷糊的呢？我真的說不清楚，我只知道我曾經是個雖然幼稚單純但並不迷糊的少年。

啊，少年，小小少年，何等美好的時光呀！

那個在廣播電臺少兒合唱團的排演室裏，引吭高歌岳飛那首《滿江紅》的九歲的少年歌手呢？那時的他是何等的意氣風發，慷慨激昂啊。如今身陷囹圄，孤苦伶仃的他，再莫說什麼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了，眼睜睜只能是「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那個在市里舉辦的推廣普通話詩歌朗誦比賽會上，大聲朗誦臧克家的詩《有的人》的十一歲的少先隊員哪裏去了呢？「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有的人，騎在人民的頭上，啊，我多偉大；有的人，低下身子給人民當牛馬。有的人，把名字刻在石頭上想不朽；有的人，情願做野草，等著地下的火燒……」是的，有的人還活著，他如今在那個少年的心中已經死掉了。而那些騎在人民頭上的偉大者，那些把名字刻在石頭上想不朽的人呢？「名字會比屍首爛得更早」麼？

那個曾經癡迷於幾何解題中的純真的初一學生又在哪裏呢？剛進初中時，聽數學老師說，至今為止還沒有人能單用圓規和直尺三等分一個角。可是我們這些乳臭未乾的初一學生卻偏偏不信這個邪，一個個廢寢忘食成天比劃著直尺和圓規，拿出一個又一個破綻百出的方案，都自稱解決了這個據說是初等數學中三大難題之一的問題，結果自然是可想而知了。但只有無知少年才有的那種盲目自信和蓬勃覺醒的求知欲探索欲，還是給了我們怎樣的快樂啊！

那個自己創作劇本並曾登上武漢劇院的舞臺演出的十四歲的少年學生呢？當他在舞臺上活靈活現地表現美帝國主義分子的醜態時，他想到過有朝一日他自己也會莫名其妙地成為「帝修反的別動隊」而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麼？

還有那個在初中畢業前的那年的新年聯歡晚會上，指揮班級合唱隊演唱英文歌曲《老黑奴》的十六歲的初三學生呢？「快樂童年，一去不再復返」，那個老黑奴唱的，如今怎麼突然就成為他自己的寫照？《老黑奴》這支歌，是那學期教我們英語的梁高樹老師教我們唱的，這位曾在一所中學擔任過校長，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後來調到十二中教書的老教師，教我們唱美國黑人民歌《老黑奴》，唱《沒有人知道我的痛苦》。那「為何哭泣，如今我不應憂傷；為何歎息，朋友不能重相聚」的悲愴歌聲，那「沒有人知道我的痛苦，只有耶穌」的沉重歎息，是否寄託著他對過去坎坷人生的傷感呢？

還有，那個在田徑場上快跑如飛，百米奪冠如囊中探物的運動健兒到哪裏去了？當年當他在跑道上如風似電地奮力奔跑，將所有的對手都遠遠地甩在後面時，他會想到他那活力四溢的青春歲月也將脫離常軌，迅速地閃逝過去而令人追悔莫及嗎？

那個在蛇山腳下捧著自製的可以撥轉的夏夜星圖，面對滿天的繁星一一辨別哪是大熊星座、哪是仙后星座、哪是人馬星座？那個在學校的實驗大樓的頂樓，通宵達旦地用天文望遠鏡觀察遙遠星空的高中學生，又到哪裏去了呢？那浩瀚而神秘的星空，曾引起這個少年無限的嚮往和無窮的想像：在那熠熠星光的後面還存在著什麼呢？這些巨大而遙遠的天體是在什麼時候又是怎樣形成的呢？有什麼神秘的力量在控制這浩渺的宇宙空間麼？不過那種少年的好奇心隨著時光的流逝而逐漸模糊，而現在在這四周死一樣的沉寂、孤獨和黑暗中，那少年時代的好奇心卻漸漸在蘇醒過來。

我的思緒在冥冥中飄向遙遠的星空，飄向神秘的宇宙。

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我問自己。

發生於億萬斯年前的那次宇宙大爆炸中，有後來誕生我的那粒分子麼？是一種什麼樣的分化與聚合，通過漫長的演化，最終孕育出了我這樣一個血肉之軀？這個微弱的生命哪天又將還原為化學元素，融

入無限的宇宙之中？無論是從時間的無垠還是從空間的廣袤而言，我這樣一個純屬偶然的個體生命，都是太微乎其微了，簡直就是海灘上一粒微不足道的沙子。或如帕斯卡所說，不過是大自然中一棵脆弱的蘆葦，一口氣，一滴水就足以致它於死地。但也如帕斯卡所說，這是一棵能夠思想的蘆葦，人的全部價值和尊嚴正在於此。當然，人也正因為能夠思想並具備了知善惡的能力而招致苦難。

比如按《聖經》上的記載，人類的始祖亞當和夏娃，就是因受蛇的誘惑，偷吃了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後，才被逐出了伊甸園。但我總疑心上帝之所以將亞當和夏娃逐出伊甸園，並非是怪罪他們吃了樹上的果子，能如上帝一樣知道善惡，而是「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樹的果子吃，就永遠活著。」這才是上帝所忌諱的。至於亞當和夏娃走出伊甸園，耕種他們所自出之土，我想也並不是什麼壞事。因為他們雖然離開了伊甸園，但是眼睛明亮了，並且如上帝一樣能知善惡，還能通過勞動自食其力，通過懷胎繁衍後代。這一切難道不比呆在伊甸園裏卻盲目、卻混混沌沌不明善惡，連羞恥心都沒有，也不能傳宗接代勝過無數倍。

因為上帝在創造天地的第六天早就說了：人類「要生養眾多，遍佈地面，治理大地」，並非要將人類的始祖永遠孤單地留在伊甸園裏。我以為亞當夏娃走出伊甸園，實際上是標誌人類走出了童年期，開始走向成熟，是《聖經》中值得大歌大頌的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件。不過我並非自不量力，要在《聖經》的解釋上標新立異，我手頭也沒有一本《聖經》，也永遠休想在這監獄裏讀到這本連外面都看不到的書。我實在是從人類始祖偷食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而被逐出伊甸園這件事上，想到我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的遭遇。

我不也是因為讀了幾本書，些微睜亮了眼睛，有了一點分別善惡的能力而受到懲罰嗎？但人類的始祖因經不住蛇的誘惑偷食了禁果，上帝對他們的懲罰，也只不過是將他們逐出伊甸園，讓他們再不能無憂無慮地坐享其成，必須用辛勤的勞動養活自己，要與各種災難作艱苦的鬥爭。而現實對我的懲罰卻是將我打入十八層地獄，讓我永世不得翻身，以作為對其他膽敢有獨立思考精神者的警戒。這種現實是不是也未免太殘酷太可怕了呢？何況現實中的統治者並不是上帝，是誰授予他們對天下萬民濫施懲罰的權柄？

上帝，我淪落在這萬劫不復的悲慘之地，是否能夠向你傾訴幾聲？因為《聖經》上挪亞的子孫亞伯拉罕說了，「我雖然是灰塵，還敢對主說話」。我現在就是一粒被「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掃帚」掃進了歷史垃圾堆的「垃圾」，已經被剝奪了說話的權利。但我還敢對主說話，向主傾訴我心中的痛苦。

仁慈的上主，當我還是襁褓中的嬰兒時，母親就告訴我，你是天地間的至尊至聖。母親抱著我到教堂裏領受了洗禮，母親說我們這些受過洗的，從此就都是上帝的羔羊，而耶穌基督便是我們這些羔羊的善牧。母親還說，耶穌本是上帝的兒子，為救贖人類的罪惡而降生為人，並以自己的血，完成了救贖的工作。耶穌被惡人釘死在十字架上，但三日後便復活了。耶穌還將重返人間，對所有已死的和活著的人進行末日審判。

母親教導我做人要做像主耶穌基督那樣誠實、正直的人；要做善良、有愛心的人。對人要憐憫和寬恕，以德報怨，不計前嫌，總要與人為善，要愛別人如同愛自己一樣。

稍大後，母親又給我講解天主頒佈的十戒：除了上帝耶和華以外，不可敬奉別的神；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

我那時還小，似懂非懂，也並不清楚人類之上，是否真的存在有一個君臨一切的大智大能的上帝。上學後所受的無神論教育，更淡薄了神在我心中的地位。但是母親的教導我卻一直銘刻在心，不敢違背她告訴我的那些做人的準則。從小到大，我從不敢心存惡念，更不用說胡作非為。耶穌基督說要愛一切人，我從小內心充溢著的就是對父母、對親人、對老師、對同學、對朋友的愛。我從來都不知道什麼叫仇恨。

當然，學校裏的老師和團隊組織也教我們要心裏有愛，要愛祖國、愛人民、愛領袖。但是學校和組織同時又教我們要學會恨，要恨舊社會、恨剝削階級、恨階級敵人、恨地富反壞右。為了在我們這些青少年的心中埋下仇恨的種子，組織給我們不斷地進行階級鬥爭的教育。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報刊、圖書、電臺、報告會，成天給我們灌輸的是階級仇恨。

我們被組織參觀揭露地主階級罪惡的大型泥塑「收租院」(幾十年後才知道，其中揭露的許多大地主大惡霸劉文彩的罪惡材料是人為編造出來的，例如莊園裏那座用來關押勞動人民的陰森恐怖的「水牢」，就是向壁虛造)，觀看反映國民黨反動派監禁迫害革命志士的電影《紅岩》(也是幾十年後才知道，《紅岩》中描述的那個專事迫害、殺戮革命志士的「中美合作所」，其實是抗戰時期在對日間諜戰中累建奇功的一個情報機構，與「渣滓洞」、「白公館」裏發生的事情並不相干)。還有進行階級教育的話劇「千萬不要忘記」，也是提醒我們青年一代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上高中那年，一位叫雷鋒的「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成了我們學習的楷模。偉大領袖親自號召全國人民「向雷鋒同志學習」，中央領導也紛紛揮毫題詞，號召學習雷鋒同志「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愛恨分明的階級立場」。報刊雜誌更是連篇累牘地鼓吹要像雷鋒同志那樣，「對同志像春天般的溫暖，對工作像夏天般火熱，對個人主義像秋風掃落葉，對階級敵人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號召全國人民都像雷鋒一樣「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做毛主席的好戰士」。接踵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雷鋒精神得到了最好的發揚。(我後來常常想，雷鋒同志倘若不是在文革前「因公殉職」，以他對毛主席的無限忠誠、無限信仰，他會在反對「劉鄧路線」的鬥爭中充當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呢？毫無疑問，他一定會無條件的「聽毛主席的話」，成為「炮打司令部」的「雷霆」和「先鋒」。果若如此，後人將如何評價「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雷鋒」？)成千上萬過去的同志都被打成「階級敵人」，打成了「牛鬼蛇神」。全國上下人人自危，互相猜疑，互相攻訐，「春天般的溫暖」見不到，嚴冬的寒風卻讓人毛骨悚然。「牛鬼蛇神」要大遭殃了，「走資派」要大倒楣了，「黑五類」更是難逃滅頂之災。而像我這種不大聽毛主席的話的「逆子」，自然也活該「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可是平心而論，我這個「逆子」究竟又犯了什麼「滔天大罪」，值得興師動眾，擊鼓而攻之。一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最根本的是看他是否誠實、正直；是否寬容、善良；是否熱愛真理、主持正義；是否忠誠於自己的祖國和人民。我承認我是個不夠聰明的人，缺乏心計、胸無城府、說話無遮無擋、做事不計後果，但我至少還是一個誠實善

良、熱愛真理、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人；至少還能堅持實事求是，絕不作假見證，更不用說對人誹謗和陷害了。

儘管如此，我也並不否認我在文革中確實說過許多錯話、做過許多錯事。雖然我敢說我的良心是清白的，但是捫心自問，我做過的那些錯事、說過的那些錯話，畢竟都是一種嚴重的過失。特別是我發表過的許多尖銳刻薄極富煽動性的文字，以我當時的影響力，不可能不對某些人造成相當的傷害。自入獄以來，我其實無時不在對我的錯誤進行反省。

我對張體學同志曾經有過的攻擊就是頗具殺傷力的，我不但指其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後來還進一步炮打省委，攻擊省委領導為「黑幫黑線」。我真的有充分的根據這樣給人上綱上線嗎？沒有。我不過是抓其一點，不及其餘；頭腦發熱，給人無限上綱罷了。儘管我後來也主張讓張體學同志站出來工作，但這並不能勾銷我對自己應有的譴責。

我還沒少過「罵人」。什麼「混蛋、王八」、「婊子、牌坊」的，罵得倒是痛快。其實你愛和誰辯論就辯論好了、愛向誰「挑戰」就挑戰好了，何必要用帶侮辱性的字眼。不錯，學校教務處的人是極其惡毒的謾罵和恐嚇過我，但我為什麼也去這樣做呢？義正詞嚴，並不就要對人進行人身攻擊，哪怕對手的確是個混蛋。

我總是受人家的整，飽受歧視，這是真的。但一旦有可能時，我不是同樣糟鄙、歧視別人麼？比如在長征途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和隊友們一起，侮辱、攻擊路上遇到的所謂「保守派」紅衛兵，弄得這些素不相識的同學灰溜溜的狼狽不堪。你要革命，卻不准人家革命、嘲笑人家革命，你不是「假洋鬼子」是什麼？

還有，我一直認為在「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戰爭最終不可避免。我因此積極擁戴「文攻武衛」、「武裝抗暴」。「七二〇」後甚至撰文鼓吹「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形式仍然是武裝奪取政權」，流毒之劇，影響之壞，怎樣估計都不為過分。往重一點說，我寫這種文章，等於是唯恐天下不亂，替「反軍亂軍」推波助瀾。

就說那回去黃石，有人想通過我搞槍，我想都不想，就輕率地一口答應。倘若我不在鐵山出事，黃石軍庫的槍支彈藥經我之手流散回

漢，那些武器是可以殺人的，後果難以想像。儘管我沒有直接參加過「殺人」，但武器若是我搞出來的，能說與我沒有干係嗎？

在鼓吹派性方面，我就更是不遺餘力了。我為某些組織的一派獨大、自封核心的做法沒有少吹過喇叭。我在《長江日報》上發表的那篇「論武漢工運道路」的文章，就是吹喇叭的一篇「傑作」，什麼「大樹特樹」、「絕對權威」，想起來都叫我臉紅。人家要「鋼化江城」，你湊哪門子熱鬧？那些狗屁不通的文章，完全就是譁眾取寵。

還有那些吹捧王仁舟，為他那個「新農村」大肆捧場的文章，就更是讓我無地自容了。王仁舟的那些違反歷史潮流的「革命創舉」，倘得以謬種流傳，必然是禍國殃民，生靈塗炭，而我豈不是助紂為虐、為虎作倀麼？

至於到處「偷書」的事就不用說了，即便有「竊書不為偷……」一說，也不過是自欺欺人。雖然情有可原，實在是圖書館都封閉了，外面又什麼書都買不到，但偷畢竟還是叫偷，抵賴不了的……

每想到我原來還有如此許多的劣跡，我就禁不住要大汗淋漓，無地自容。唯一能夠聊以自慰的是，連上帝也會原諒年輕人犯錯誤——這話是列寧說過的——何況我雖說過不少錯話，但沒說過謊話；我雖做過不少錯事，但沒做過昧良心的事；我罵過當權者混蛋，但從未誣陷過他們；我面對面地和當權者鬥過，但從不作踐他們的身體。在這一點上，也只是在這一點上，我敢用《聖經》上的話說，「在天主和人面前，我都保持了清白的良心」，我相信上帝會原諒我的。

然而當權者終於有了機會整我時，卻昧著良心用謊言和偽證來誣陷我，用手銬和皮鞭來摧殘我，事實上文革以來我自己就不斷遭受誹謗和誣陷。從文革初期學校教務處誣衊我出身「汪偽漢奸」家庭開始，這兩年中潑在我頭上的髒水就足夠淹死我好幾回了。這回以中央名義下達的「九二七指示」，更是如泰山壓頂般讓人沒有絲毫辯護和反抗的可能。但是也正是這個「九二七指示」，擦亮了我的眼睛，使我終於看清了政治家們的無恥嘴臉。我確信當權者在這件事上是犯罪了，犯了不可饒恕的大罪。作為罪犯，又何來權柄對我進行審判呢？因為即使我真的有罪，我的命運也只能由自身是清白的人來決定。

《約翰福音》中那個有罪的婦女誰有資格審判她呢？那些假冒為善

的經師和法利賽人嗎？不，他們的罪孽更加深重，根本沒有給人定罪的資格。有資格的只有耶穌，因為只有耶穌才是聖潔無罪的，耶穌卻懷著憐憫和同情赦免了那個不幸的婦人。但是那些口稱講政策講事實而實際上專造假案的偽善者，對人絕不會心存憐憫和同情，他們只會誣陷和迫害。但是《聖經》上說了，「沒有遮蓋的事，將來不被揭露的；也沒有隱秘的事，將來不被人知道的。」這些造假作惡的人，難道就一點都不會想過這件案子的真相總有一天會被揭露、會大白於天下嗎？他們就不相信蒼天有眼麼？而當事實的真相終於暴露時，謊言的炮製者必將身敗名裂。因為天主說過：「申冤在我，我必將報應。」而「報應之日到來時，死人也將受到審判！」

但是天上的主，我遠離你已經很久了。從我接受唯物主義思想以後，我便離開了你，如今我已身陷可怕的地獄，我的天主，你還能接受我這個迷路的羔羊重歸你的懷抱麼？

只是我的上主，你畢竟離我太遙遠、太高不可攀了，而且我實在不知道，你是否真的無處不在、無所不能。長期以來我對你的信德已經非常淡漠，但我現在寧可相信你在天上無時無刻不在注視著人間的苦難。天主，你注意到我身受的苦難了嗎？你會垂憐我這個可憐的囚徒、迷途上的羔羊麼？

我應當怎樣向你告白我此刻的心情才好呢？我合攏兩隻手掌，學我外祖母那樣開始祈禱。但我連一句禱詞也不會講，儘管很小的時候我便隨父母上教堂作禮拜，但記憶中留下的只有那莊嚴典雅的讚美詩的歌聲。那些對天主的讚歌，曾經給了我何等美妙的精神享受啊！當教堂裏管風琴的伴奏中「普天頌贊」的歌聲響起時，童年的我在心靈上受到的震撼，真正是無可言述！那高亢入雲、歡騰跳躍的樂曲，如同恬靜安詳的《平安夜》一樣，都是來自神啟的天籟之音啊，它完全徹底地把我那顆稚嫩的童心俘虜去了。

記得有一年過聖誕節，節日的早晨當我從夢中醒來時，發現枕邊有聖誕的禮物。母親告訴我說，禮物是半夜裏有聖誕老人乘鹿拉的雪橇從窗前經過時，送到我枕頭邊的。我當然是深信無疑，只是埋怨母親不曾將我叫醒，讓我見見可愛的聖誕老人。聖誕老人後來是見到了，不過是在讀中學時新年化裝晚會上。只是正值全國都鬧饑荒的年

頭，聖誕老人也是餓著肚子給我們發紙張粗劣的聖誕卡。但我放假時在漢川的外祖母的教堂裏得到了許多教友的贈遺，而就是在外祖母那裏，我讀到了那部記錄基督奧跡被稱作聖經的煌煌巨著《新舊約全書》。

上帝用七天的時間創造天地萬物，伊甸園裏人類的始祖亞當和夏娃，還有那條教唆夏娃偷食智慧果的狡猾的蛇。後來又有人類的墮落，四十天的大洪水的懲罰，然後便有了耶穌的誕生，耶穌在山上的講道，以及為了救贖人類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十多年前囫圇吞棗讀過的《聖經》中的一些故事，我還依稀記得，經上說過的一些道理也未有完全忘掉。那麼上主請你告訴我，我正在經受的苦難是否是神的恩賜，是否是神讓我在苦難中去體驗基督的受難與死亡，啟示我收回我早已喪失了的信仰，呼喚我重新回到主的羊棧。若果真如此，上主，我願意迷途知返。如果有一天我在主的護祐下，能活著走出這人間地獄，我將向主獻上一堂隆重的謝恩彌撒。我將高唱讚美主的詩篇，走向上主的臺前……

窗外晨光熹微，頭上的獄燈不知什麼時候已經熄滅，眼前的紅光也消失了。我並沒有死，血管裏的血並沒有噴薄而出，我仍然好好地活在這個世界上。當然，我也並沒有置身在什麼太空船裏，那不過是我暗夜裏的幻覺而已。啊，天際飛行，星球放逐，多麼富於想像，多麼富於詩意，又是多麼的自欺欺人啊。不過我還真希望有能追趕時光的太空船，載著我去追回那逝去的歲月！我那如詩如畫的黃金歲月啊。儘管但丁曾在《神曲》中借弗蘭切絲卡的口說，「沒有比在淒慘的境遇中回憶過去的幸福時光更令人痛苦」，但我還是願意不斷地回溯到過去的時光裏，來麻醉痛苦的靈魂。

風雨如磐，長夜如漆，我實在是孤苦無助，淒冷悲涼。我萬般無奈，只好祈求上帝，但是上帝無言。我知道我是太渺小、太卑微了，即使「天高聽卑」，也未必能聽見我的呼聲。或許上帝已經聽見了我的呼聲，但上帝需要對我進行考驗。可我經受得了苦難的考驗嗎？入監時聽犯人們說，這牢房裏還關過天主教的老神甫，從解放之初關起，一關就是一二十年，可那些神甫們卻能心靜如水、安之若泰。我不知道那些神甫如何能夠如此頑強地度過漫長的獄中歲月，是什麼東西在

支撐他們呢？想來正是對天主的信仰，堅定了他們的意志，鍛造了他們的精神。然而像我這樣信德淺薄的凡夫俗子，哪裏能像神甫們那樣在精神上達到超然世外的境界呢？

與這些神甫相比，我的內心其實非常軟弱。外面許多人都以為我是一個堅強的「造反闖將」，其實我知道我實際上一點都不堅強。我不過是不知天高地厚，有什麼想法有膽量說出來而已，我不過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罷了。我哪裏談得上什麼堅強？

說到堅強，我會想到我中學時讀過的《紅岩》、《革命烈士詩抄》這類書籍。我曾深深為這些革命志士的堅強意志和鬥爭精神所激勵、所鼓舞，並決心以這些先烈為人生的楷模。(還是幾十年後才知道，原來連詩抄中那首膾炙人口的陳然烈士的詩『一個共產黨人的自白』，也是出自小說《紅岩》作者的『贗品』。想想我們這些『革命接班人』被人騙了多少年！)但問題是他們是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監獄裏，和代表黑暗勢力的敵人作鬥爭，而我卻是關在共產黨的監獄裏，是被定性為人民的敵人，是「反革命分子」。一個「反革命分子」倘在共產黨的監獄中作「英勇鬥爭」，豈不是「堅持和革命人民為敵」，罪上加罪麼？運動以來那麼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被定為「反革命黑幫」或「黑線人物」後，哪一個不是老老實實向革命人民低頭認罪，承認自己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死有餘辜。無論是誰，也無論你過去有多深的資格、多大的功勞和多高的地位，只要被扣上了一頂「三反」的帽子，你就成了革命群眾眼裏的階級敵人，成了「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你所能做的至多是為自己申辯。而人一旦落到辯護的地步，就已經是身不由己，處境悲慘了，還如何「堅強」得起來？

想那偉大領袖倒是教導過他的革命同志，要有堅持真理，為真理獻身的大無畏精神；教導大家為了堅持真理而「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不怕開除公職、不怕丟掉黨籍、不怕老婆離婚」，說得真是大義凜然。但是誰真的為此而坐牢、而殺頭、而沒了工作、丢了黨籍、離了老婆，他就是個不折不扣的冤大頭，誰也不會把他當英雄。我的叔父不就是這樣個冤大頭麼？只為講了一句大實話，工作丢了不說，連命也丢了。儘管後來的事實證明他說的話沒有錯，鄉下確實是餓死人了，又有誰來為他平反，他不照樣是個背著右派惡名的荒野孤魂。既要人

家「五不怕」，就得創造一個言者無罪的寬鬆環境，不然就是給人設陷阱——挖好坑鼓勵人跳下去，然後把這些「不怕」的人活埋掉。這是算陰謀，還是算陽謀？想想實在可怕！

我愈想愈覺得自己傻，愈想愈頭痛，也愈想愈恐怖，愈感到危險。我很清楚我現在這種思考問題的方式，離「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愈來愈遠，我再也不可能回到這條「革命路線」上來了。有句話說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我不懂上帝為什麼要發笑，但笑一笑總不算什麼要緊的事，要是發怒就麻煩了。現在的情況是平民一思考，而思考的方式和領袖不大一樣的話，領袖就要發怒，而且是震怒，叫我們老百姓怎麼還敢長一顆屬於自己的腦袋！怎麼還敢有自己的思考！可我已經關在牢裏了竟還敢思考，我是不是頑冥不化的花崗岩腦袋？偉大領袖就說過有些頑固分子是「戴著花崗岩的腦袋去見上帝」的。

不過我現在既然是被關在與世隔絕的黑牢裏面，已經被剝奪了一切自由活動的空間，那麼除了腦袋還能自由地思考以外，我還有什麼呢？我當然必須堅持有一顆屬於自己的腦袋，我只剩下這點值得珍惜的東西了，為什麼不堅持自己的思考？哪怕是戴著花崗岩的腦袋去見上帝罷，這顆腦袋也必須是顆能獨立思考的花崗岩腦袋。

那麼，我這顆腦袋中究竟都思考了些什麼？

我首先要說我並不是那種「心懷不滿的年輕人」。

解放那年我才剛滿三歲，從小到大，我可以說是在黨的光輝照耀下成長起來的，我個人的成長史，與共和國的歷史幾乎同步。作為「毛澤東思想哺育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一直接受的是黨團的教育，我沒有理由對黨和人民「心懷不滿」。我一直是遵照黨的教導，嚴格要求自己，努力把自己鍛煉為一個合格的「共產主義接班人」。

小學入隊，中學入團，大學進入船艦專業，我是一步一步在走向黨指引的遠大目標。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使我面前遙遙在望的目標突然變模糊了。我們成天鬧起革命來，熱衷於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連課也不上了，因為據說發生了關係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件。「中國的赫魯曉夫」要用手中篡奪的權力改變黨的顏色，在我們國家全面實現資本主義復辟，使中國人民受二遍苦、遭二遍罪。我們被號召「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進行到底！」既

然是這樣，我們這些從小就被教育要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的年輕學生，當然義無反顧地投身於文化大革命中了，我們別無選擇。

是的，我們別無選擇。但這並不是說我們所有人都只知道唯馬首是瞻，都完全喪失了自己的思考能力。偉大領袖本人不就教導我們要對任何問題都問一個為什麼、要多思嗎？我大概就屬於比較喜歡多思的一個。不但多思，我還不憚於公開說出自己與眾不同的觀點。而正是這一點，成了我從一名紅衛兵小將淪落為「新生紅色政權」階下囚的禍根，因為上面其實並不喜歡小將有自己的腦袋。等我終於明白這一點為時已晚，我早已成為待罪之身。

可是我不願隱瞞自己的觀點又有什麼錯？我不搞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又有什麼不對？主席不是說過歷史上凡是搞兩面三刀的人都不是老實人，比方王明、比方張國濤，而一切不老實的人最終都不會有好下場，都無一例外要受到歷史的懲罰嗎？為什麼我聽了偉大領袖的話反倒錯了呢？我承認，在偉大領袖的話被奉為「句句是真理」的現實環境裏，我的一些想法是不合時宜甚至會被看著大逆不道。我不但不相信「句句是真理」，而且對領袖親自批發的文件也敢提出否定的意見。如果這就叫反動，我只好承認。問題是偉大領袖批示或肯定過的東西就肯定不會有錯麼？別的不說，這中央「九二七指示」，不也說是偉大領袖點過頭的麼？這個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完全不顧事實的荒謬指示，難道一經偉大領袖過目，就會變成真理？就會變成實事求是的東西？這是哪家的邏輯！

列寧說世界上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的，毛主席本人也說過類似的話。硬說偉大領袖從來不犯錯誤也永遠不犯錯誤，豈不是說領袖不是人而是神麼？列寧曾經批判過的那種「造神運動」，怎麼幾十年後又在我們中國出現了呢？一些人不是口口聲聲號稱自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繼承人麼，難道就是繼承列寧批判過的這種荒謬的東西嗎？真的搞不明白。或者在這個問題上真的是我錯了，可我不過想用自己的頭腦思考一點問題，作出一點自己的判斷。即使我判斷錯了，又何至於用大牢伺候？

我進大學僅僅一年，政治上其實還非常幼稚，社會經驗更談不上。運動中響應偉大領袖的號召起來造反，左突右闖，批七鬥八，在

和「反動路線」的鬥爭中鍛煉得似乎成熟了一點，但還遠遠沒有成熟到深諳「政治就是騙」的底蘊。我實在想不明白，黨和政府不是自稱不但擁有強大的專政力量，而且擁有革命的真理嗎？既然如此，為什麼在我這件案子上要處心積慮地弄虛作假，掩蓋事情的真相？列寧說誠實是政治上強大的表現，說謊是政治上虛弱的表現，有人是不是感到了虛弱？當權者既然如此強大、如此權威，為什麼竟然會用造謠這種最下流的手段來陷害人呢？是政治上的需要嗎？然而倘若為了所謂政治上的需要而製造假案大興冤獄，竟連我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青年學生都不放過，這些人和歷史上最殘暴最反動最獨裁的統治者還有什麼兩樣呢？有人也許會用黨和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來為自己的政治欺騙辯解，似乎只要目的正當可以不擇手段。可是我從革命導師恩格斯的文章中卻讀到這樣一句話：「手段的卑鄙恰好證明目的的卑鄙。」

說到目的，不就是不讓人發出與當權者不同的聲音嗎？不就是禁止與當權者有不同的想法嗎？不就是企圖鉗制人的獨立思考能力嗎？馬克思在批評資產階級政府的書報檢查令時說，「你們讚美大自然悅人心目的千變萬化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你們並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羅蘭散發出同樣的芳香，但你們為什麼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呢？」馬克思當年批評的是專制的普魯士政府，我們這個據說是世界上最民主、最自由的社會主義國家，怎麼竟和一個世紀前的那個半封建的專制國家的做法如出一轍呢？

主席，我想說，在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裏，任何一個公民都應當有發表意見的權利，不管他的意見是不是與領導者的想法相左。我還想說，作為人民共和國的一名公民，我雖渺小，雖微不足道，但我也有說話的權利。這種權利體現了我的價值與尊嚴。而且正是為了維護這種價值與尊嚴，我才落到了這種境地。假使我沒有思想的勇氣，或沒有勇氣發表自己的思想，我就不會落到這種境地，但人的價值與尊嚴呢？

古希臘哲人歐里比德斯說，所謂奴隸，就是一個不能發表自己思想觀點的人。我是既被剝奪言論自由又被剝奪行動自由的人，我充其量淪落為奴隸，而奴隸也是有價值有尊嚴的。而外面有些既享有言論自由又享有行動自由，卻從來不曾有過自己的思想只會仰人鼻息的

人，只怕是連做奴隸的資格也沒有，他們只配稱為奴才！我不明白在一個號稱人民享有真正的民主自由，一個據說完全由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為什麼人民如果不想成為奴才，就必須淪為奴隸？難道「東方紅、太陽升」後，就必須「朵朵葵花，向著紅太陽」麼？難道革命領袖就當真成了一種被稱作「紅太陽」的圖騰，必須匍匐著頂禮膜拜麼？

說到「紅太陽」，不禁要想一想，這麼多年來，我們老百姓的耳朵裏充斥過多少「太陽」啊！「東方紅、太陽升」自然不用說啦——這是咱們中國的「太陽」；還有什麼「斯大林和毛澤東，像太陽在天空照」啦——這就有兩個「太陽」了；還有什麼「勞動人民的解放者，我們的恩人，民主的新朝鮮，偉大的太陽……」——這是兄弟鄰邦的又一個「太陽」，這社會主義的朗朗乾坤下，怎麼無產階級的領袖們一個個都變成了「太陽」？《淮南子》上說舜時十日並出，草木枯槁……這「太陽」多了叫老百姓如何受得了？一旦老百姓實在忍受不了了，誰能擔保他們不會發出「時日曷喪？余及汝偕亡！」的呼喊！

當然，這都是些大逆不道的話，我只敢在這見不到人的地方對牆壁說。其實說也白說，有什麼用？充其量不過是一吐為快。曹孟德有言：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我這個地方莫說杜康，連馬尿都不會有。怎麼辦？像我這樣胡天胡地亂想一氣好了，何以解憂？胡思亂想，也是可以舒惡氣、排憤懣、解憂愁的。能胡思亂想還真不錯，至少證明我還能思想，證明我還活著。笛卡兒不是說過麼：我思故我在。

我在這小小的號子裏任憑思想海闊天空，雖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卻是四壁茫茫皆不見，我能見到的只是迷茫和空虛。算一算我在這小號裏也一呆就是三天了，毛澤東有詩云：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照此推算，我這幾日中在宇宙間巡行，也有二十多萬里路了，只是我無法感覺到而已。

其實，世界上有許多東西都是我們無法感覺的：數公升的血液在我們的體內不停地循環流動，我們感覺得到嗎？一些新的星系正在誕生，而一些舊的星系正在死亡，又有誰能知道？我當初組織「北斗星學會」、創辦《揚子江評論》之時，我又怎會想到我會因此招至彌天大禍？同樣，現在政府動用無數的人力物力財力來清查的我們這個案子，老

百姓大概也不會想到清查的其實是個假案，何來的「叛徒、特務、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暗中操縱我們？何來的「反革命地下組織」？何來的一大堆「現行反革命分子」？但他們就是閉著眼睛硬要勞民傷財，建起鎮妖降魔的雷峰塔，來鎮壓我們這些所謂「大大小小的毒蛇」，他們想過這座塔其實是建在沙灘上的麼？

只是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夠活著見到這塔倒掉的一天。塔既然興師動眾地造起來了，一時自然是倒不了的。當局要證明自己永遠是正確，怎麼會讓它倒？要倒怕也是幾十年甚至幾百年之後的事，眼前最要緊的是能從這個小號裏放出去。這小號又陰暗又潮濕，死寂得像墳墓一樣，而且沒有報紙看，更不用說書籍了。而沒有書沒有報看時間長了我是絕對受不了的，我不能每天都在幻想中生活，那肯定會瘋的。問題是我現在對自己的處境要有一個清醒的估計，案子既然鬧到直轄中央了，就要有長期坐牢的思想準備：三年、五年，甚至更長時間都是可能的，我如何去度過那漫長的監禁生活呢？

我想第一要緊的是像那些神甫一樣精神不能垮。我必須守住一個信念：我沒有罪。特別是在「九二七指示」下達後，應當認識到有罪的不再是我，而是冤案的製造者；第二，要相信事情的真相總會大白於天下，我也終有重見天日，與親人團聚的一天，我要頑強地等待這一天的到來；第三，我要常使心靈重回春光明媚的童年和陽光燦爛的少年，我要通過回憶重新用明亮無邪的眼睛來看這個世界，相信這個世界會重新變得像以前一樣美好；第四，我還要盡可能保持身體的健康，例如在牢房裏練原地高抬腿跑，盡量多走動，放風時則盡量繞圍牆多跑幾圈，總之是利用一切機會鍛煉身體，防止疾病纏身……

但我也知道我無論有多麼堅定的信念，有多麼頑強的忍耐力，有多少幸福的回憶，以及如何堅持身體鍛煉，也無法長期抵禦單身監禁中孤獨和痛苦對我身心的摧殘。我的生命之泉必定漸漸乾涸如枯井、沙化如荒漠。我知道只有一個辦法能有效地防止我的生命之泉乾涸和沙化，那就是讀書。在獄中書籍是唯一能灌溉心靈，使之免於枯萎的甘泉，也是我與外部世界聯繫的唯一紐帶。只有讀書才能夠幫助我擺脫寂寞和空虛，幫助我重建對生活和未來的信心；也只有讀書可以使

我不虛度年華，白白浪費自己的青春歲月。讀書，可以把我現在所處的斗室拓展至無窮，可以讓我在時間上上溯至遠古、下追至未來。我可以在書中心馳四極、意騁八荒；可以在書中和古今中外的智者交談；可以盡情地汲取幾千年來人類創造的知識，用人類精神文明的乳汁滋養自己幾近乾涸的頭腦。而且，我只有在讀書的過程中，才能守住我做人的尊嚴。

問題是你從哪裏去弄到你想要看的書呢？看守所裏沒有圖書館，又不准家裏給我送我想讀的書。這一年多來天天看的書，還是剛入獄時家裏送來的一套毛選。本來還有一套兩卷本的《列寧文選》以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是前所長特別開恩讓拿進來的，馬軍代表接任後沒多久，這兩套文選便給收去封存了。馬軍代表對我說，我們敬愛的林副主席指出：要用百分之九十九的時間學習毛主席著作，百分之一的時間可以學學馬列的著作，這是學習馬列主義的捷徑。據老馬說，馬列書中有的，毛主席著作中也都有；馬列書中沒有的，毛主席著作中也有，讀毛主席的書不是學習馬列的最好途徑嗎？至於其他的書你目前就更沒有必要讀了——一套謬論和我剛進監獄還沒有轉到看守所那陣管我的那個年輕公安說的，簡直是一個磨子倒出來的。

我不能說也不敢說馬軍代表的話不對。歷史上伊斯蘭教的一位教主，在主張把《可蘭經》之外的一切典籍燒毀時，就持大致相同的理由：凡是好的東西，《可蘭經》裏都有了，凡是《可蘭經》裏沒有的，都必定不是好東西，留下那些書幹什麼？當然，我絕對不敢說我們「敬愛的林副主席」的話和那位伊斯蘭教教主的話如出一轍，而且在看守所這個地方，絕沒有我半點反駁馬軍代表的可能。老馬就是這裏的「通天教主」，他說的話不容置疑。但是我要從看守所這個泥潭裏救出我自己，除了拼死爭得讀書的權利外別無辦法。

可這個地方拼死也是沒有用的，沒人怕你拼死。唉，其實我不就是要讀點書麼，要求並不過分呀。列寧的夫人克魯普斯卡婭在回憶錄中說，列寧坐沙皇政府的牢時，可是什麼書都准許看的，流放期間甚至可以通過免費的國際郵遞，從瑞士的國家圖書館借書。可我們現在坐人民政府的牢，怎麼要讀點書就這樣難呢？而只要有書讀，還真沒有哪個地方比監獄裏更不受外界干擾，更能使人專心致志哩！沒有書

讀的日子才是真正的苦刑。只要有書讀，即使是漫漫長夜，我也能擁有一片璀璨的星空。

培根說人在獨居和退隱的時候，最能體會到讀書的樂趣。盧梭則認為，即使是在巴士底獄的單人牢房裏，他都可以進行安靜愉快的遐想。我想那也是須以有大量的書可讀為前提，單靠「遐想」，在單人牢房中怎麼可能對抗長年累月的孤獨和寂寞？書籍對於一個處在孤獨中的人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契珂夫的短篇小說《賭》中，那個用十五年的自由去賭銀行家兩百萬的年輕律師，不就是通過大量的閱讀戰勝了孤獨，獲得了心靈上的自由和對塵世的超脫，以致在重獲自由之前，自願放棄了那馬上唾手可得的兩百萬麼……

嗨，兩百萬啦，那是一個什麼概念？我實在無法想像。不過我現在需要的不是那個兩百萬，我需要的是早點從這個鬼地方出去。還好，到第四天的早上，小號的門終於打開了，是季幹部來開的門。他給我打開手上戴了三天的銬子，讓我跟他走。走出小號，看見秋天的陽光正溫柔地灑在鋪滿落葉的放風場上。涼風輕輕地拂過臉頰，樹梢在風中搖曳著發出沙沙的響聲。外面的世界真好啊！從形同地獄的小號走出來的那一瞬間，我覺得只要能見到人、聽見聲音、沐浴陽光，哪怕是在監獄裏面，也是人間的樂園！

這時聽跟在我後面的季幹部說：「以後不要再做傻事了，要記住這個地方是監獄。監獄有監規，不能想作什麼就作什麼，明白嗎？」我說明白。「明白就好！現在有個外地的單位來找你外調，算是你的運氣，要不然還有你在裏頭呆的！」季幹部把我帶到提審室，讓我進去。我進去後看見屋子裏坐了一大排人在等我。這些風塵僕僕不知從哪裏來的外調人員，眼睛一齊對準了我，好像獵物進入了他們的視野，一個個頓時亢奮起來。

我毫無抵抗力地坐在他們對面的鼓形水泥凳上，等待他們狩獵。



## 第二十章

# 活下去，與命運抗爭

外調人員是從老遠的鄖西山區趕來的，有穿軍裝的和不穿軍裝的，總不下七八個。來人一個個虎視眈眈地盯著我，目光中既有「無產階級的革命義憤」和警覺，更充滿著未見過世面的山裏人的樸實和好奇。他們中的一些人，只怕是有生以來頭一次來到武漢這種大城市。劉姥姥進大觀園，真得感謝組織上給了他們一次來武漢外調的機會，讓他們大開一回眼界，回去後對縣城的親戚朋友有牛好吹。好比阿Q進了一趟城後回到鄉里，就有資格嘲笑未莊那些未見過世面的可笑的鄉下人，「沒有見過城裏的煎魚！」，而我現在就是這樣一條「城裏的煎魚」，正放在油鍋裏，被人用了文火慢慢地煎炸。也就難怪擠在審訊桌旁的那些鄉下人，眼珠子死死地瞪著我都瞪得發綠了，他們終於見到了我這條「煎魚」——這條聽說城裏的造反派出動了三百輛大卡車上街遊行示威都沒能營救出來的「大鱷」、中央點名的「反革命地下組織」的一號頭頭，如今就擺在他們面前，他們是何等的興奮啊！

他們中間一位穿軍裝的中年人乾咳了兩聲，開始用一種帶川音的彎管子普通話向我發問，我便用武漢本地話回答他。不料這個矮胖黝黑的中年人突然尖聲叫道，「回答問題不許用土話！」我有點愕然，長到二十多歲，還是頭一回聽人說我說的是什麼「土話」。

「不許用土話？」我裝糊塗說，「那用麼事話？」用洋話麼，Foreign Language？這後面一句自然悶在肚子裏沒敢說出來。

「用普通話！」坐在中年人旁邊的一個年紀大些的人大聲說。這個

穿中山裝蓄山羊鬍的幹部慚出來的京音更難聽，用句俗語來比再恰當不過，那叫「山西驢子學馬叫」。

我點點頭表示明白。中年人用手指指審訊室牆上貼的一幅標語讓我念，那是主席的語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等我念過後，中年人說：「響鼓嘛，不用重錘。你也是個明白人，應該懂得這個。只有坦白交代，才是自己的唯一出路。其實問題我們都已經掌握了，沒有把握的話，我們也不會跑老遠的路來提你的審。現在是要落實幾個問題，也是給你這個，一次坦白從寬的機會。」一通廢話樣的開場白後，那個老一點的蓄山羊鬍的開始問話了：

「我們鄖縣的某某你是知道認識的嗎？」

「不知道，不認識，從來沒有聽說過。」我一口回絕，舌頭都不打卷。

「門不要關得太早了吧！」蓄山羊鬍的老頭搖搖頭說，「這個人你肯定是認識的！不但認識，而且有來往；不但有來往，而且來往密切。一般人見不到你，他見得到你；一般人和你搭不上話，他可以聽你直接發指示，你們之間是垂直領導關係。我們鄖縣的七二三武鬥，就是某某一手策劃的，某某就是武漢北決揚在我們鄖縣的總代理，這次流血事件就和你魯禮安一點干係都沒有嗎？嗯？」

「什麼七二三武鬥？」我兩手攤開困惑地說，「聽都沒聽說過……。」

「不用裝這個……馬虎啦，」中年人很不耐煩地打斷我說，「某某本人都已經交代了。武鬥發生前他到武漢來過一趟，直接向你請示過。你要他勿打無準備的仗，要多搞些……槍和子彈嘛！」

「聽清楚了吧？」山羊鬍接話說，「不需要再提示更多的吧？我們知道你的記性是很好的，人稱什麼魯克思哩，哈哈！」他扭頭旁顧，得意地打個哈哈，旁邊的人也都跟著哈哈哈地傻笑起來。

「這是哪年的事呢？」我撓撓腦門裝著回憶的樣子，「事情太多，實在是想不起來……。」

「那我們還是提醒你一下好了，」山羊鬍說，「是六八年的事，你和他見面是七月中旬。再該記起來了吧？」

「六八年七月中旬？……不錯！」我拍拍腦門說，「是七月十八號那天吧？」

「對！正是七月十八號。」穿軍裝的中年人興奮地拍打了一下桌子大聲說。審訊從時間上首先突破，下面必將有實質性的斬獲。此行千里迢迢不辱使命，他當然興奮了。只見他示意坐在桌子一角的一位女青年準備好筆錄，然後向我點點頭，說：「就從你們在武漢什麼地方，怎樣見面的談起吧！」

六八年的七月十八號，這一天我怎麼會忘記呢？刻骨銘心一輩子也忘不了哇！那天是我鐵山被劫整整兩個月後，被秘密轉移到監獄的日子。就是在那天的凌晨，我全身被纏上繃帶，塞在一輛救護車裏繼續我苦難的歷程。在鐵山的礦井下被打得遍體鱗傷的我正在送監的路上，又怎麼可能去指示什麼人去策劃什麼武鬥呢？豈不是癡人說夢！於是淡淡地回答說：「那時我已在監獄裏面了。」

在我對面正襟危坐的一窩人，中年人也好、山羊鬍也好、其他人也好，所有的外調人員全都傻了眼，眼神裏全是茫然、意外和驚訝。這盤棋一開局我就突如其来放出一招「勝負手」，對手措手無策，棋是下不下去了。冷場好半天後，那位穿軍裝的中年人才心有不甘地搖頭說，「怎麼可能呢？這個……你一定是記錯了。我們說的是六八年的這個……七月份，是中央九二七指示下達的那個……頭一年……」他顯然急了，短短一句話裏，「這個、那個」的連成了葫蘆串。

「我重複一遍，六八年七月我已經在監獄裏面了，這裏的季幹部知道得清楚。」我站起身來準備走人，像這種莫名其妙的外調，我這年把見得多，完全是瞎忙呼。像鄖西的這撥子人，偏處湖北一隅，消息閉塞，孤陋寡聞，大概以為我這個「北決揚」的「一號頭頭」，也是在「九二七指示」下達期間被一網打盡的，所以也就聽信了他們縣裏的那個某某胡編亂造的口供，便千里迢迢跑到武漢來落實。不料落實的卻是我「不在場」的證明，他們真的是「瞎子點燈白費蠟」。那白費的豈止是蠟，那耗費的可都是民脂民膏啊！

但有關方面哪裏在乎什麼民脂民膏呢？這民脂民膏正好點燃清查的走馬燈。一撥一撥的外調人員走馬燈似的轉著，一撥子走過去，一撥子又走過來。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焚膏繼晷，不捨晝夜。清查到最高潮的那一陣，各單位的外調人員要排隊登記提前預約，才能約到我這個「一號頭頭」。外調的人多得炸了窩，對我來說簡直是場災難，

我每天就忙著應付「外調」——去審訊室，審完了回號子；再去審訊室，再回號子，晚上還要寫證明材料。最忙的時候提完審號子都不用回，下一撥外調的正在審訊室外面候著呢！我記憶中在外頭時，只有江漢路的四季美湯包館有這麼旺的人氣——一桌的食客還沒用完，桌旁邊就已經圍滿人等著空位了——我想我又不是四季美的湯包，怎麼這麼多人都排起隊來想在我身上咬一口？

但是我又有什么辦法呢？反正不管哪個地方發生過的大案要案，殺人啦、放火啦、武鬥啦、搶槍啦，總之是要追查到我頭上才甘休。儘管所有這些真查到我頭上，保准連狗屎都查不出來，但屎盆子還是要往我頭上扣。據專案人員說，全省之內所發生的武鬥和搶槍事件，都是「北決揚」煽動的，因為《揚子江評論》發表過鼓吹武鬥和反軍亂軍的文章。在「鼓吹武鬥」這個問題上，我承認我是有錯誤的，但是《紅旗》雜誌不同樣發表過這類文章和評論麼，怎麼就不把搶槍和武鬥的問題歸結到是受了《紅旗》雜誌的影響呢？難道我們幾個學生的煽動力比《紅旗》雜誌的煽動力還大不成？何況省內鼓吹武鬥的組織和小報多如牛毛，豈止我們一家？他們不但鼓吹，而且實戰，機槍大炮的幹，賬怎麼都往我們幾個學生身上算！

每次和這類外調人員打交道之後，我都是啼笑皆非。明明八杆子都夠不著的事，也要往我身上拉！實在拉不上，也要說那事「追根溯源」還是與我有關。而一些單位受清查的對象被逼得沒轍了，也就把問題都往我身上拉——有時間、有地點、有內容、有旁證，還真像有那麼回事。來我這裏一核實，影子都對不上。末了還是要說「無風不起浪」，那事反正和我「間接有關」。追根溯源也好，間接有關也罷，也不能說全無道理，不是有種說法，說是生成於太平洋上的某次颶風，也可能與南美大峽谷裏一隻蝴蝶的翅膀的扇動有關麼？我現在就是那隻扇起颶風的蝴蝶，所有的風暴都是我煽動起來的，我認了。不過我的翅膀早已折斷，以後不管是太平洋上的颶風，還是戈壁灘上的龍捲風，應該再和我無關了吧！最好不要再鬧鄖縣外調那種笑話。

然而這類笑話還多著呢——將來大概都可以編入《笑林廣記》的——這不，有一陣子外面又搞起什麼「一打三反」，就是「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於是找我調查的人又多起

來。有一次有一個什麼單位的外調人員來找我核實材料，事涉「工造總司」的前司令彭祖龍。

「彭祖龍這個人你總該是知道的囉！」外調的說。

「當然知道吶，」我裝著很熟悉的樣子點點頭，「工造總司的前任司令麼，和龍梅生、楊業龍共稱新派三條龍嘛，還有誰不知道？」

「很好！」外調滿意地說，「你和他們都是很熟的，他們對你也很崇拜。特別是彭祖龍，與你一直往來密切，關係也非同一般。現在有些事情，要在你這裏落實落實，就從頭講起好了：你和彭祖龍第一次見面是在什麼時候？什麼地點？當時還有哪些人在場？開始吧！」

「我第一次見到彭祖龍是在六七年初，大概是元月份吧，具體日子沒印象了，只記得是在一次群眾集會上。會上有一人代表工造總司講話，我當時在臺下，聽旁邊人說，臺上講話的是工造的頭頭，叫彭祖龍。就這些了。」

「嗯，這只是遠距離接觸，後來的具體交往呢？」外調的一面記錄一面問，「接著講！」

「接著講？講什麼？」我望著外調的，故意裝糊塗。

「嗨！你還問我？當然是講你們之間後來的具體接觸的情況呀，你裝什麼糊塗？」外調很不高興地說，「每一次見面的時間、地點、談話內容，都要一老一實地講清楚。你們在一起是密謀幹了不少壞事的！其實彭祖龍都已經一一交代了，你也不用替他打掩護。是誰的責任就是誰的責任，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俗話說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你們在一起幹的那些壞事，革命群眾早就看在眼裏記在心裏，要和你們算賬！還是不要心存僥倖吧，坦白從寬是唯一的出路！」外調的說得煞有其事，滿嘴泡沫橫飛。我懶得和他糾纏，於是向他攤牌說：「彭祖龍幹過什麼壞事，我可是一點都不知道，他和誰密謀過什麼，我更是一無所知。除了在那次群眾集會上遠遠見過他一眼外，我和他從未有過任何來往。如果彭祖龍說和我一起密謀過什麼，那他一定是張冠李戴記錯了人，這完全可以當面對質的。」

我說得斬釘截鐵，毫無迴旋的餘地，外調的登時目瞪口呆，無言以對。冷了半天的場，才想起趕快搭梯子好讓自己下臺：「時間是隔得

遠了點，有些情況可能一時記不起來。這不要緊，可以給你時間回去慢慢地想，我們過些時再來。」

自然，黃鶴一去不復返，他們根本就不會再來了。他們本來就是搞詐唬，妄想憑空詐出些材料。我心裏有數，也就樂得故意和他們兜兜圈子，牽著他們的鼻子轉兩圈。我也並非故意使壞，我太需要一點刺激了。我一個人被關在號子裏，成天面壁枯坐，一個交談的對象都沒有。有人來外調，我就變著法子和他們開開心，先吊他們的胃口，等胃口吊足了，再讓他們大失所望。看作一撥撥的外調人馬乘興而來，鎩羽而歸，我便有一點捉弄人的快感。

我想這並非不道德。《紅燈記》中鳩山向李鐵梅索要密電碼，李鐵梅遞給他的是一本老掉牙的舊皇曆；鳩山找李玉和要，李玉和打哈哈說他一個窮工人，哪有什麼電馬電驢的，都是一種鬥爭藝術。我入獄也早，沒得眼福見識八個「革命樣板戲」，但看守所裏每天早晨都要播幾段「樣板戲」的片斷。所以雖未目染，卻也耳濡久矣，對「樣板戲」並不生疏。但我確實是想聽一聽《紅燈記》、《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這些現代京劇的全劇，心嚮往之，雖看不到，聽聽也好。

有天我問季幹部，能不能讓我家裏人送一臺半導體收音機給我——最簡單的那種，一個晶體管的就行，我想聽聽電臺播的樣板戲。季幹部睜圓了眼，望著我好半天，說魯禮安吶，你真的是敢想、敢想！我不做聲，心想送臺單管的半導體進來，有什麼大了不起呢？還怕收到「敵臺」不成？不過我並不怪季幹部，他並不是不通融，他是不敢。這位老資格管教在看守所內沒有實權，一切得服從馬軍代表的領導。「外行必須領導內行」，是我們中國特有的「第二十二條軍規」，他只有服從的份。就算他同意我家裏給我送半導體，也絕對過不了馬軍代表這一關，所以我提出送半導體是自找沒趣，何苦來。

說到馬軍代表，其實也並不是個沒有文化、不懂政策的主子。他是從部隊派來的，沒有任何管理犯人的經驗，大概以為對犯人愈嚴厲愈苛刻，愈能達到「改造」的目的；也不懂得犯人在未判決之前只是個「犯罪嫌疑人」，不應該就當罪犯看待，所以我們就只好遭罪了。此君好像也讀過幾本馬列，曾在放風場上擺出很「理論」的樣子，出題目考犯人什麼叫「權威」。他的口頭禪是「保護弱小者」，而看守所內的「弱小

者」，在他看來就是那些沒多少文化的流氓小偷，而政治犯們一般文化層次較高，「知識愈多愈反動」，便是他的重點打擊對象。凡號子裏發生刑事犯與政治犯之間的衝突，無一例外該政治犯倒楣。大家背地裏叫他老馬頭，有時乾脆叫他馬臉。

馬軍代表的得力臂膀之一，就是給我上銬，用銬子打手腕，然後把我關進小號的王管教。他還有個搭檔姓鄭，就是那回我偷看放風場時將我抓個正著的小個子管教，平時悶聲悶氣的不大吭聲，但正所謂「不叫的狗更咬人」，一旦抓住了犯人的什麼把柄，整起人來也是非常厲害。這兩個管教都是從部隊支左「支」到看守所來的，後來就都留在了看守所。

除王管教鄭管教外，還有一個小王管教也是支左人員，河南人，聽說在部隊裏任過連隊司務長。此君個子不高，塊頭不大但勻稱結實，有點像個體操運動員。小王管教說話慢條斯理，舉止不緊不慢，哪怕對犯人也平心靜氣，和顏悅色，最得犯人好感。常常聽見他不溫不火地對鬧情緒的犯人說，「講道理嘛，你急什麼？要相信政府……」，這種話在那兩位管教那裏是幾乎聽不到的。

除了這幾位從軍隊來的管教外，原來的「留守幹部」就只有那個季幹部了。但我說過了，科班出身的季幹部雖然是管教中唯一懂得法律的，但在看守所沒有實權。他只能在他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讓監所內的秩序盡量有章可循。

我們看守所的樓上，是省公安廳七處的辦公室。聽說七處是管勞改系統的，和看守所有沒有直接的上下級關係，可是誰也不知道。他們的處長是個四五十歲的北方人，個子高大魁梧，紅紅的臉膛，濃濃的劍眉，看上去不怒自威。我們夏天裏有時放風放得早，會碰見這位處長在上班時間推一輛永久牌的自行車，從放風的院子不緊不慢地走過。我們見他就眼饑，當然不是眼饑他推的那輛自行車，而是眼饑他手指上總是夾著的兩張油餅——要知道那夾的早餐是不折不扣的兩張油餅呀，還不把人餓死了。在看守所裏一切沾了油腥的食品，都能吊起犯人的口味，使我們愈發饑腸辘辘。

有天大清早起床開門換馬桶，就聞見一陣陣油條的香味，從走道的另一端悠悠地飄過來。大概是值完夜班的幹部在吃油條過早，那油

條餘香繞樑久久不散，我們就拼命地用鼻子吸，也算是過過油條癮吧。還有一次算我運氣，開飯時發現發給我的那鉢飯的中間，竟浸有厚厚的一層豬油，估計是哪個幹部或家屬，在我那鉢飯上面蒸了什麼油膩的東西，油淌了些在飯裏了，那鉢飯吃起來可真是美味。抹乾淨油嘴後，我竟像寓言中那個守株待兔的傻子一樣，異想天開地盼望下一頓還會有這樣的好事，然而這種好事就像撞頭彩一樣，再也沒有遇到過。有時候輪到我中午放風，正碰見監獄裏看守犯人的武警戰士開飯，有的當兵的吃完飯，把碗裏剩下的就往溝裏倒，那倒掉的都是肉呀魚呀油呀湯呀的好東西哪！見了真的心疼，巴不得從溝裏撈起來往嘴裏塞才好，如果沒有人看見我或許真會這樣做的。

這一兩年關在牢裏，我肚子裏的油水早已刮乾了，成天就是刮腸刮肚地餓。有次從樓上落下來兩半空蛋殼，正落在我住的號子的窗臺上。我把手伸過窗戶的鐵欄，將蛋殼拿進來，蛋殼裏還有點蛋清呢。真說不出口，我把這點蛋清倒進杯子裏沖水喝了。回想起剛進監獄還未宣佈逮捕前，我可是吃過一個多月的空軍地勤灶。成天大肉大魚吃膩了，還把吃不了的往窗外倒，想起來真是罪過！現在算是報應來了，一個月才七塊錢伙食費，讓你天天欠吃欠喝。

其實我並不是一個好吃的人，我受過大饑荒年代的苦，知道飽足。記得大饑荒那年頭也是吃不飽，成天肚子裏頭餓得慌，肉對我們也是非常稀罕的東西。小學畢業時，我和鄰居家的幾個孩子為慶祝考上中學，曾破天荒去一家高級餐廳，吃了一回高價的肉絲麵。一人兩碗，一共八碗熱氣騰騰油珠四濺的肉絲麵端了上來，我們狼吞虎嚥捲殘雲，呼呼啦啦一下子就掃掉了各自的第一碗。但也許是久不曾饕餮了，第二碗竟吃了小半碗就再也咽不下去，只有一位勉強攻下了自己的一碗。我們剩下的三個則扒一口，停半天，你望我，我望你，既吃不了，又捨不得扔。於是我們吞一筷子麵，就繞著餐廳慢跑一圈，再吞一口，再跑一圈，和肉絲麵展開了持久的「運動戰」，也就是爭取在運動中殲滅敵人。我們終於在天黑之前將肉絲麵這碗「敵人」乾淨徹底地殲滅掉了。後來供應不再那麼緊張，我們也再沒有去那家高級餐廳吃飯。但我現在多麼想去到那個地方，再在那裏吃上一碗肉絲麵啊。

除了肚子總是感到餓之外，精神饑餓對我來說是一個更厲害的折磨。所謂「精神饑餓」，就是沒有書看。當然，毛主席的著作是有，中央指定的幾本馬列著作也是可以看的，此外准許讀的書就寥寥無幾了。六九年三月曾寫信讓家裏送來過一本群眾組織編印的名叫《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書，書中收錄有大量毛主席未曾公開發表的文章，包括許多毛的早期著作，極有研究價值。但老馬藉口這本書不是正規出版物，連書都沒有和我見面就沒收了。明知他是自己拿去看，我也只好自認倒楣。原有的兩套馬列的文選，還有一本《聯共(布)黨史》和尤金編的《哲學辭典》，也早被收走了。我自小酷愛讀書，幾乎一日不能無書，無書可讀於我無異於酷刑。關在這個地方又沒有書讀，時間長了我會瘋的。可是不管你說得多麼懇切，老馬個豬腦殼就是油鹽不進，堅決不准家裏給我送書也不肯把收走的那些書發還給我。怎麼辦？

想來想去，要防止自己的大腦遲鈍和僵化，最重要的是要設法讓腦細胞保持一種活躍的狀態，而寫作無疑是保持大腦細胞活躍的一種好方式。既然讀不到書我就自己寫書好了，就寫自己經歷過的文化大革命。有了這個想法，我很是興奮。寫東西的紙我有，是以前寫交代材料時剩下來的。但是沒有筆，因為每次寫完材料後，蘸水筆和墨水瓶都是一定要交出去的。我就多了個心眼，有次寫完材料後，我用個在放風時撿的安打瓶裝了些墨水，把蘸水筆上的筆尖也拔了，然後把筆桿放進墨水瓶裏遞出去，幹部也沒仔細檢查就混過去了。有筆尖了卻沒有筆桿，我就在放風時注意地面，有一次終於撿到顆廢棄的五號電池。我用偷偷藏著的那塊小鐵片把電池的一頭切開，將蘸水筆尖的尾巴插進去，便製成了一支很不錯的袖珍蘸水筆，我便用這支筆來寫我的書。

大約是從七〇年的夏天開始，我背著看守斷斷續續用極小的字體，在十來頁紙的正反兩面，寫下了五六萬字的紀實性小說《狂飆曲——紅衛兵之歌》。這部小說從毛主席六六年七月十六號在武漢橫渡長江寫起，以一所工科大學為背景，寫文革初期工作組進駐大專院校之後發生的事情。我開筆寫時，單為文章怎樣起頭就躊躇再三，在屋子裏走過來走過去，不知來回走了多少遍，反復構思了好幾天，才寫出了「引子——水調歌頭」的開頭一段：

習習江風驅散了江面的薄霧，江城在武漢關的鐘聲中醒來。正是盛夏時節，江水日漸上漲，早已漫過堤壩的警戒線，難怪住在岸邊的人說，晚上能聽見漲水的聲音。氣溫似乎也隨著江水上漲，入伏才幾天，就直竄到攝氏四十度了。晚上一擦黑，大街小巷全擺滿了竹床和涼席。城裏人也不分男女老少，都喜歡到外頭乘涼和過夜。酷暑炎炎，卻是玩水的好時令，遍佈全市的江河湖塘，都成了免費的天然游泳池。其中那條橫貫三鎮的長江，水深流急，幅面寬廣，更是大家愛去的好場所。從在岸邊扶著坡子打鼓凹，到能夠輕鬆自如地橫渡到對岸，多少江城兒女，在它裏面練出了一身好水性……

小說裏主人翁是個像我一樣的工科大學的一年級學生，我寫他和同學們一起參加了一年一度的橫渡長江活動，寫他在渡江時見到他們的偉大領袖站在快艇上，向他們高呼「人民萬歲」時的歡呼騰躍。結尾處我也構思了大半天，頗費思量，最後寫成這樣一段文字：

萬里長江，浩浩蕩蕩，永遠洶湧澎湃，永遠不會停息，它象徵著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象徵著我們中國革命的航程。如今，歷史的長河，又一次掀起狂瀾洪峰，億萬革命的青少年將劈波斬浪，在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鍛煉自己。他們不會被激流險灘所嚇倒，不會被驚濤駭浪所吞沒，而將決定的、有步驟的到達光輝的彼岸。

就在這一天，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又一次親自暢遊了長江，行程近三十華里，歷時一小時四十分鐘。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閒庭信步，表現了無產階級革命家恢弘的氣魄。西元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這個文化大革命中的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日子，就這樣永遠載上了中國革命的史冊。

他們會到達「光輝的彼岸」嗎？我不也曾以「弄潮兒」自居嗎？我到達哪個岸了？新岸嗎？好像勞改人員刑滿釋放就叫「走向新岸」。可我連勞改的資格都沒有，我是苦海無邊，回頭無岸。而我們當初投入革

命的初衷就是去坐牢、去勞改、去勞改多少年後再爭取「走向新岸」嗎？歷史真是給我們開了個天大的玩笑！

不去說它了，還是潛心於構思自己的小說吧，還是讓自己的思緒回到六六年那狂飆突進的瘋狂年代吧。那時我是一名「毛主席的紅衛兵」，是革命青少年中的一員。我們這些少不更事的幼稚的青少年學生，曾經是懷著怎樣聖潔的理想和獻身熱情，甘當「革命軍中馬前卒」，為著「反修防修」的「千秋大業」，替那位「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導師、偉大舵手」去衝鋒陷陣的。到後來我們的理想被亵瀆，我們的熱情被玷污，我們的青春被埋葬，我們的前程被出賣，這一切究竟是誰之罪？！我要把這段歷史留下來，留給我們的後人去評說。

我覺得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就像蠶要吐它的絲要結它的繭一樣。何況多年來讀書已經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沒有書讀我的生命就會衰竭，我只能用寫作來支持我自己，使我的生命之泉不至枯涸。有一段時間，我把我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小說的構思之中。我從早到晚都在房間裏來回踱步，嘴裏念念有詞，以致外面值班的班長一度懷疑我是不是神經出了毛病。他們哪裏會知道我的思緒正在過去的歲月裏神遊，在時間長河裏打撈歷史的碎片。

我寫文革開始時的「山雨欲來風滿樓」，寫學生們「停課鬧革命」；寫工作組進校，寫學生們和工作組的鬥爭……所有這些基本上都是以我的親身經歷為素材，寫起來也還得心應手。為避免被值班的班長發現。我一般是在肚子裏先把文章的「腹稿」打好，趁其他犯人放風時班長都到外面警戒去了，抓緊時間寫在紙上，然後藏起來。

我本來想把小說寫成正劇，但寫著寫著就不像了，寫成了搞笑的荒誕劇。因為我發現當初派工作組的好，保工作組的好，反工作組的好；造反派也好，保守派也好，走資派也好，他們之間的鬥爭，其實都談不上是真正意義上的「路線鬥爭」，都是在「給他人作嫁衣裳」。回頭看去，彷彿南柯一夢中的兩隊螞蟻在打架。所以我用亦諺亦莊的筆調，去寫那場據說是關係到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的鬥爭。這裏不妨從小說裏摘錄一個片斷，來看看我當時是用怎樣的心態和筆法來記述那段荒誕歷史的。這個片斷寫的是工作組撤出學校後，造反派學

生搶佔學校廣播站的一幕鬧劇。自然，小說中的人物老葉、小鮑和孫二娘等都是虛構的。

……且說老葉帶了一千精兵趕到東門，只見門裏面唯一上樓的梯道早已被孫二娘的娘子軍們堵死了。孫二娘等一班十來個食堂的肥胖廚娘當排頭，火頭軍之後是二三十個學校籃排球隊的人高馬大的女生。幾十個女將手挽著手肩並著肩，把個三米寬的樓道十多級樓梯塞了個水泄不通。面對這個打不得也摸不得的肉體盾牌，造反團的學生仔們一時真還傻了眼。孫二娘這個賣肉出身的佈置的這個肉陣還真的管用，令老葉的隊伍關前裹足，不敢越雷池一步。老葉暫且按兵不動，兩軍對峙一直對到中午，娘子軍們都餓得搖搖晃晃歪歪倒的了。臨革會見娘子軍們餓了半天了怕頂不住，便派人用吊籃把食物從窗子裏吊進樓裏去。手下人將這個動向報告了老葉。老葉靈機一動，對身邊人說我們能不能想辦法找扇窗子鑽進去？有人便找來了個附中的初中生，說他可以從樓的西面那棵靠牆的大楊樹上爬上去翻進窗子。老葉轉過去看，有顆樹上頭的那截樹幹是歪倒長的，快挨到十樓的那扇開著的窗子了，正好從那裏翻進去。老葉還是擔心爬那麼高有危險。那初中生卻說不危險，說他從小就專門會爬樹掏鳥蛋，爬這麼棵樹太容易了。老葉終於下了決心試試。他告訴那初中生一翻進樓裏後馬上跑下來把西門的插栓拉開，又叫兩個手下跟著一道去，在樹下負責保護這個學生的安全。

為避免引起對方的注意，老葉決定搞聲東擊西，明修棧道、暗度陳倉，要小鮑馬上從東門發動佯攻。小鮑領了計囊，便下令聚集在東門的攻擊部隊假裝發起強攻。造反團的棒小夥子們手挽著手三人一排，開始喊口號：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一邊喊一邊作要向樓梯口衝擊狀，後面擔任過院管弦樂隊小號手的幾個同學答答滴滴的吹響了衝鋒號。堵樓梯的娘子軍們頓時緊張起來，一個抱著一個貼得緊緊的擠成個大肉團。特別是女學生們，幾時見過這種陣勢，下面

的小夥子們假裝往上衝一次，她們就嚇得尖叫一次，下面佯攻幾次後，有的早已嚇得渾身發抖，面無人色。孫二娘見勢頭不好，趕忙給女學生們打氣，說男生們是虛張聲勢，不敢真的往她們身上衝的，誰敢真的衝誰就是流氓。但女學生們不信，說這些男生玩起命來麼事情做不出來？才不管流氓不流氓呢！一面說一面就有女生癱在樓梯上了。孫二娘沒料到識文斷字的女大學生們關鍵時刻如此窩囊，看來只能靠她們一班肚子裏沒有墨水的火頭軍來「中流砥柱」了。她揮動又粗又壯的手臂，要火頭軍們帶頭頂住！廚娘們粗氣直喘的儘管還能硬著頭皮頂一陣，但不少人也已經頭冒虛汗，腿腳發軟，不過是硬撐著而已。小夥子們則愈戰愈勇，一忽兒作向左衝狀，一忽兒又作向右闖狀，像小孩子們做老鷹捉小雞的遊戲一樣，把娘子軍們弄得一個個精疲力竭東倒西歪。小夥子們開心極了，越發肆無忌憚，嚇唬說要朝火頭軍們頭上丟灶螞子（湖北地方話灶螞子即蟑螂），嚇得廚娘們一陣怪叫。小夥子們又說要衝上去拉女生頭上的辮子，更是引得女生們一陣鬼哭狼嚎。有大膽的男生甚至衝上一步，拉了一位女生的辮子一下，那女生嚇得幾乎要昏厥過去。

孫二娘見男生們真的動手了，掉頭高呼同志們黨考驗我們的時候到了！然後帶領火頭軍們高喊「人在陣地在！」、「血戰到底，決不後退！」的口號。女生們受到感染，悲壯地唱起毛主席詩詞《西江月·井岡山》來：山下旌旗在望，山頭鼓角相聞。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巍然不動！早已森嚴壁壘，更加眾志成城。黃洋界上炮聲隆……然而炮聲還未隆完，就已經顯示出它的巨大威力了，造反團的學生們突然停止了攻勢，隨後就開始撤退。娘子軍們正暗自驚訝怎麼敵人忽然不戰自退時，就聽見她們後頭的樓梯答答答地響起雜亂的腳步聲，回頭一看樓道裏全是造反團的隊伍，娘子軍們就傻了眼，也不知造反團的學生是怎樣跑上去的。孫二娘自然是不甘心，還想孤注一擲，要火頭軍們跟著她衝上去奪回失地。火頭軍們說這麼多男仔擋在頭前，要我們怎麼去衝？孫二娘一咬牙發狠說「脫！脫了衝！」

廚娘們面面相覷，不知孫二娘要她們脫什麼？一個年輕些的廚娘怯生生地問她脫什麼呀，脫褲子嗎？孫二娘一跺腳說，哪個說脫褲子了？是脫上身，脫光了衝，保險神仙菩薩都擋不住。但是火頭軍們已經失去鬥志了，一個個蔫雞子似的哪裏還有勇氣赤膊上陣當脫星。「老娘要回去做午飯了啊……」其中一個娘們伸伸懶腰打個哈欠就開始往大門走，有人帶了頭更多的娘們就跟著往下撤。孫二娘獨木難撐，眼睜睜看著娘子軍們一個個的走光了……

不像是一場鬧劇嗎？但是小說中有兩件事我是以認真的態度去重墨描述的。一是關於「血統論」的辯論。當年那班高幹子弟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的張狂相給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他們當中那個叫譚力夫的那篇鼓吹「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講話，表達他們這些「紅色貴胄」對平民百姓子弟是何等的蔑視，對出身不好的「黑五類子女」是何等的仇視啊。他們自稱「自來紅」，是從紅色娘胎裏生就了的紅色貴族，廣大人民群眾不過是供他們這些八旗子弟奴役驅使欺凌的下等人。這就是從我們尊敬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家庭裏培養出來的「革命接班人」麼？有朝一日這些紈袴子弟真的接了班，還有我們這些普通老百姓的活路麼？文革之初最猖狂最囂張的是他們，對所謂「黑五類」進行瘋狂鎮壓的是他們，仗著老子的權勢到處為非作歹的也是他們，他們是一群新社會的「高衛內」。文革中我最鄙視的就是這些錦衣玉食、無法無天的「高衛內」，我在小說中對這個特殊群體進行了尖刻辛辣的諷刺和鞭撻。

還有一件我以極大的熱情濃筆描寫的事，就是我親歷的紅衛兵長征。從韶山到南昌，兩千多里路幾乎全是山地，都是我們一步一個腳印走過來的。很苦、很累，但是很快樂、很豪邁。那是真正在沿著革命前輩的足跡前進啊！文革中最難以磨滅的印象就是那兩千里長征，是那巍峨壯麗的八百里井岡山。我在小說中基本上是用寫實的手法，記述了這段難忘的歷程。這段記述也就是我寫這篇回憶錄時，回憶長征那段經歷（即「從韶山到南昌」）的藍本。

自然，我在小說中也寫到了我所渴望的愛情。但我寫得很痛苦，

我已經把談情說愛的黃金季節輕率地虛擲掉了，現在愛情對於我這樣一個前途暗淡的囚徒來說，不過是白日夢而已。可是我無法剪滅我的夢想，我正處在生命力最蓬勃最旺盛的時期，我怎麼能克制得了自己的欲望，於是只好在小說中來編織我的白日夢。但編織的那些愛情故事，只會使我更加黯然神傷，並且因此而使睡眠變得愈發糟糕，經常整夜整夜地睡不著覺。我也想控制自己，儘量不要心猿意馬，想入非非，但是不管用，一睡下那腦子裏就信馬由驥身不由己了。

進監獄的頭一年，在號子裏聽那個姓汪的小流氓成天談女人，開始時很反感。後來聽多了、聽慣了，加上實在無聊至極，也想女人想得厲害。那個姓汪的說我連女人的那個都沒摸過就坐牢了，算是白活了一場，現在想來不是沒有道理。連聖人都說食色性也，我卻對男女之事一無所知，我不是白活了是什麼？而且不要說是男女之事，我正經連女人都沒有仔細地看清楚過。記得讀初中時有個暑假，聽說鄰居薛家的三哥從北京航空學院放假回來了，我興沖沖地跑到他家找他。他家兩間屋，一間沒人，另一間好像裏面有人，估計三哥是在裏面了。一邊叫著三哥一邊把門推開，只聽見裏面一聲尖叫，三哥家的毛妹洗完澡正從腳盆裏站起來，身上一絲不掛，窈窕雪白的身體出水芙蓉般亮麗得讓人炫目。我不敢多看，說聲對不起趕緊把門給關上。可好幾天毛妹那凝脂般滑嫩的身體都在我眼前飄浮，趕都趕不走。

毛妹是我的鄰居，也是和我同齡的同學，從小一起長大，可謂兩小無猜。我們的父親都是老海關的，兩家門對門地住著，關係很親熱。毛妹是我的第一個也是二十多年來唯一的一個看見過身體的女人，我後悔當時沒敢多看她幾眼，我想就是多看了幾眼，她也不會怪罪我的。那天事後她在走廊上碰見我時，也不過似嗔非嗔地罵了聲「冒失鬼」。

唉，想這些有什麼用呢？錯過了這村就沒有這店。我那個老二現在完全不聽指揮，動不動就昂首挺胸，想壓都壓不住。剛進監獄時，同號子的那個12號姓張的犯人曾傳授經驗說，在這個地方要把老二當帝國主義來仇恨、當修正主義來批判、當反動派來打擊，要懷著打擊帝修反的決心來壓迫老二。只要決心大，這個問題就好解決了。那年代偉大領袖常常在天安門城樓上號召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共同打擊

帝修反。老張是犯「美化美帝國主義」的錯誤給抓進來的，入獄後痛改前非，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已經到了「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水準。我就以他為榜樣，只要肚子下的那傢伙一不對勁，就馬上「打倒它狗日的」，「消滅它狗日的」，命令自己與之作堅決的鬥爭。

這辦法一時半刻似乎還真能「立竿見影」，那傢伙還真的就「氣息奄奄」地軟下去了。我不禁沾沾自喜。然而老張的經驗管得了上午管不了下午，管得了白天管不了晚上，底下的那個老二還是經常不聽使喚。特別是晚上，一睡下去那話就直挺挺地翹起來，一點都沒有「日薄西山」的樣子。看來這「帝修反」也不是好對付的主子，需要與之進行艱苦持久的鬥爭，要準備打持久戰。

然而話是這樣說，要和自己與生俱來的生理欲望作鬥爭，實在非常非常難。像偉大領袖所說的那種集「高尚的人、純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有益於人民的人」五種人於一身的是聖人。可既然古代的聖人也離不開食與色，叫我們這種凡夫俗子真的無所適從。反正我坦白我在獄中十幾年，沒有一天不想女人，而且想得非常厲害。有時候想狠了，實在熬不住，只好把個枕頭夾在胯間來「自慰」。「自慰」之後愈發悵然，於是更多的是自責，後悔不該這樣作踐自己，罵自己卑鄙下流，但是過不久又還是忍不住，要照樣「卑鄙下流」一回。所以雖然在牢房裏思想改造了許多年，我仍然無法改造成為一個高尚的、純粹的、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這只能說是我頭腦中「封資修」的東西比較根深蒂固，而不能說是黨的改造政策的失敗。一般經過多年的監禁特別是單身監禁，再不安分的人也會被改造得無思無想，無欲無念，木頭似的符合「重獲新生」的標準了，可惜我沒有。我仍然是個不可救藥的「好色之徒」，成天胡思亂想。

我漸漸意識到我在這裏沒完沒了的坐牢，不但對不起我的父母，而且對不起我胯下的老二。這老二正值生機勃發，大有可為的黃金時代，卻在這個鬼地方陪我一道受苦，好可憐又好委屈喲，難怪它夜夜都要「揭竿而起」了。讀小學時唱過一首歌叫「臺灣島，我的寶島」，其中有句歌詞是「英勇的解放軍，已登上了艦艇，炮口對準基隆港……」，我現在是炮口早就進入了一級戰備狀況，成天翹得高高的，

可到哪裏去找那個「基隆港」呢？炮口忍不住了就在夢鄉裏胡亂放炮，浪費彈藥，我對此也無可奈何，我只能想法安撫、懷柔。用枕頭自慰便是實施「懷柔政策」的一種常用的手段，偶爾也用手淫。

有一次手淫時一用勁，竟把陰莖上那過長的包皮給破天荒地翻捲過來，露出了被包皮一直包了二十幾年的「龜頭」。啊呀可是不得了，那像烏龜頭一樣的東西上，竟蒙著厚厚一層白色的積垢。聽說這個叫包皮垢的玩藝對身體有害，須得把它清除乾淨才好。卻沒有料到我這從未見過世面的「處女地」太嬌嫩了，根本不能碰，稍微挨一下就受不了。既不是痛，也不是癢，而是又麻又辣又酸一種說不出的近似觸電的感覺。怎麼辦？我盯著龜頭上這白茫茫的東西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將杯子裏的冷開水倒了一點在上面試一試，嘿，這龜頭竟與水有緣，一點都不在乎。我於是用杯子裏的水不斷地沖洗龜頭上的包皮垢，讓這個嬌生慣養的龜兒子「經風雨、見世面」。這辦法還真有效哩，那龜兒子慢慢的不再那麼敏感，我可以用毛巾蘸著水，輕輕地擦拭龜頭上的那些積垢了。於是很花了點時間，我終於小心翼翼地把這個自我出生以來幾十年從未碰過的「奧吉亞斯牛圈」，清掃得無比的乾淨。那龜頭紅嫩嫩地高昂著，似乎為得見天日得意得不得了呢！

我這個龜兒子通過一番「溫泉水滑洗凝脂」，算是得見天日了，可畢竟算不得翻身得了解放，因為到底還是「光棍」一條。而光棍總是免不了想入非非的，比方放風的院子裏曬衣服的繩子上，有天突然曬了件女人穿的內褲，還有一副奶罩，我那龜兒子就敏感地意識到看守所進來了女犯，頓時興奮不安起來。我於是極想一睹這位女犯的芳容，後來還真讓我睹到了，但並非是什麼女犯，而是樓上七處新來了一個年輕的女公安幹警。這位女公安的長相實在不敢讓人恭維，全身上下唯一漂亮的地方，就是腳上穿的一雙半高跟皮鞋。這位見了讓人恨不得要哭的女孩，令我大失所望。回到號子裏掃興之餘，忽發奇想：像這樣一個我在外頭時看都不會多看一眼的女孩，如果願意進這牢房裏來與我做伴，我是否接納她呢？苦苦地想了一個晚上，還是作不出決斷，讓人好為難也。

不過仔細想來也太荒唐，人家好端端的女孩子，憑什麼來陪你坐牢？純粹是在做秋夢！何況人家一個姑娘長得好不好看，關你個屁

事，如此糟鄙人家豈不缺德？於人家其實無損半根毫毛，倒是暴露自己靈魂深處的骯髒。但我反過來想，也是自己長時間關在這裏壓抑得太厲害了，產生些難以啟齒的性幻想也是難免。不要說我想女人想得發瘋，那些如今和我一樣關著的「同案」，特別是像我這樣年輕未婚的，也一樣想女人想得發瘋。我們中後來真有為此發了瘋的，此是後話。怪誰呢？怪我們像豬狗一樣的被關著，而且是單人監禁，這根本不是人正常生活的環境，一個個不心理變態才怪？！

確實，看守所不是個長期關押人的地方，它和監獄完全不一樣。監獄裏除了限制自由和強制勞動外，和外面的社會並沒有太大的區別。比方說監獄裏的犯人可以吃得飽，可以購買副食；犯人工餘可以參加文體活動，可以閱讀自己喜愛的書籍，還可以看電視甚至看電影；犯人之間准許有正常的交往，可以給家人寫信或打電話，甚至可以定期接見家屬。至於洗澡、剪指甲這些生活中必須做的「小事情」，就更不用說了。可是看守所呢，它除了維持你生活的最低需要外，不會考慮一個人其他的生活要求，哪怕它屬於最基本的生活範疇。

比方我們長年吃不飽飯，看守所卻既不准我們購買也不讓家裏送副食進來；很少讓我們與家人通信，和家人見面更是奢想。冬天沒有熱水洗澡，夏天沒有降溫條件不說，就連剪指甲這種雖然小但必須做的事，看守所也不管。還有，我們的褲腰帶在入監時就給搜走了，管教也不管犯人腰帶沒收了怎麼穿褲子。當然大活人總不至於給尿憋死，犯人自有犯人的活法。比如沒有褲腰帶就用點布頭，把褲子前面相近的兩個褲栓緊在一起，褲子就可以不垮。沒有指甲剪，犯人們就把指甲在熱水裏泡軟後用力撕斷，（偷偷藏有小鐵片的犯人就用磨快的鐵片削）。再比如補衣服，有的犯人居然能下功夫把褲子上的那根帶小孔的金屬扣連磨成一根針。只是針眼太大，磨製的「針」太粗，根本縫不了衣服，有的犯人就從放風場上檢根從樹上落下的松針穿個眼當縫衣針用。還有些煙癮大的犯人，偶爾放風時在地上撿到粒煙屁股，他會扯點棉絮來搓硬是搓出火來，點他那根寶貝香煙屁股頭。此外有些犯人苦中找樂，把廢紙裁成小方塊作撲克牌，用放乾了的饅頭片作象棋，用小石頭作跳棋，開展號子裏的「娛樂活動」，儘管這些土法上馬的東西看守所一發現就沒收，但這類「生產線」從來就沒有中斷過。

許多犯人還有一手用爛布頭搓繩子的手藝，搓出來的繩子又光滑又結實非常好用。我也有這樣一根，是過去同號子的「土匪」送給我的，一直在當褲腰帶用。至於冬天沒有熱水洗澡的問題，同號子的人就把發給每個人喝的開水湊在一起，供一個人洗澡，大家輪流洗。可像我這樣關單監的，每頓飯就那麼一杯開水，哪怕一口不喝，又如何能夠洗澡？不過我也有我的辦法。早上一杯水我用來洗上半身的前胸，中午一杯水我用來洗上半身的後背，晚上一杯水我就用來洗下身。這樣一天三杯水我分段使用，一天下來，照樣等於洗了一個熱水澡。有時候開水都用來洗澡了，晚上菜吃鹹了口渴得厲害，怎麼辦？我略施小技，假裝頭痛，向幹部報告要片頭疼藥。服藥時就「順便」要點開水，吃藥是假的，偷偷吐掉，那「順便」要來的開水才是真正需要的，喝下去正好解渴。這辦法我在看守所試過好些次，屢試不爽。騙人當然是不大道德的，但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是給逼出來的，是被困境壓迫出來的一種「生存智慧」。但是這種智慧實在是無奈得很，想的那些辦法，有些也是違反監規的，弄不好會惹出麻煩。事實上我就曾遭遇過一次大麻煩，差一點惹上殺身之禍。

事情是因為那根褲腰帶引起的。

那是七〇年的初秋。有天下午，號子裏開始放風了。犯人們放了一會風，就被集中在一起聽馬軍代表訓話。我們幾個「欽點要犯」，照例是沒有資格和其他犯人一起放風的，各自在自己的號子裏呆著。忽然就聽見許多當兵的闖進各個號子挨個翻鋪，我們就知道又在查號子了。這時外面下起雨來，老馬冒著雨照樣訓他的話，犯人們也一個不準動，要等號子一個個搜查完。但這回搜號子好像是有預定目標的，是有備而來，專查你號子裏有沒有繩索之類。我房間裏多的繩子沒有，褲子上的褲腰帶有一根，被王管教查出來搜走了。過了幾天，老馬忽然把我帶到他的辦公室談話。

「你看這地上都堆的些什麼？」老馬指著辦公室一角堆得小山高的一大堆長長短短的繩子問我。我說是繩子。老馬又問我這些繩子都是哪來的呀？我說是前幾天從號子裏搜出來的吧。老馬說看來你很清楚嘛。又問號子裏怎麼會冒出來這麼多繩子呢？我說這我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未必吧。」老馬點燃一根煙，吸一口，吐幾個圈圈，不緊不慢地說。「從你的房間裏，嗯，也就是從你身上吧，也搜出了一根繩子。你怎麼解釋？」

我說是以前同號子的人給我的。老馬問是誰？我說也不知道叫什麼，好像早就離開這裏了。老馬說你不用打馬虎眼，今天不說出繩子是從哪裏來的，恐怕是過不了關的。我不敢說是「土匪」送我的，只好不做聲。場面僵持了半天，老馬開口說話了：

「你魯禮安是個明白人，應該明白這一堆繩子是準備用來做什麼的！」

我說犯人們天天閑得無聊，用破布爛衫編些褲腰帶繫褲子，多半是這樣。老馬說我又是打馬虎眼。他挑了幾根特別長的繩子說，難道這麼長的繩子也是當褲腰帶用麼？我也不好說什麼，暗自揣摩大概有人手癢不過，搓起繩子來就沒個完，也可能是拿來捆被子用。卻沒有想到老馬竟然說這繩子是準備捆看守所的幹部和武警用的，是為搞暴動越獄作準備。我說既然是這樣，為什麼不追究那些藏了長繩子的人呢？老馬說士兵們沒經驗，把繩子都堆在一起了，現在分不出誰是誰的，誰也不認賬。

「不管怎麼樣，可以肯定這是一起嚴重的未遂事件！」老馬磕磕煙灰，一字一板地說，「性質極其嚴重，幸虧被我們公安幹警及時察覺，沒有造成實際後果。由於發現得早，不但保護了我們公安幹警的人身安全，也挽救了一大批不自覺捲進事件漩渦的犯人，阻止了他們繼續犯罪——上級機關已經對此作出充分的肯定。」說到這裏老馬向我意味深長地看了一眼，慢悠悠地問道：「那麼你現在對這個問題怎麼看呢？」

我說我不瞭解情況，沒有發言權。我說自「九二七指示」下來後，我就一直是一個人單獨關著，放風也是一個人放，什麼都不知道。但是老馬搖搖頭，說我不可能什麼都不知道。他說我實際上什麼都知道，有人為我通風報信，與其他號子進行聯絡，並且暗示這次所謂「未遂的暴動越獄事件」就和我有關。他舉了一些理由，說明我還是有機會和其他號子聯絡的，比方可以通過送飯的或換馬桶的役犯，還有曾有幾次新來的幹警不瞭解情況，讓我和 other 號子的犯人一起放過風，這

些都給我提供了和犯人串聯的機會等等。他特別抓住我有根褲腰帶這件事不放，這是他唯一掌握的「物證」，是他好歹撈在手裏的一根稻草。

「為什麼你那幾個同案也一樣是單監裏關著，從他們那裏就沒有搜出繩子，偏偏你身上就有？你怎麼解釋？」我只好向他反復解釋，說我是「九二七指示」下達之前就在這裏關了一年多的，和別的犯人關在一起過，褲腰帶是那時同號子的人給的。而我那幾個同案是後來進來的，進來就是關單監，所以他們那裏是不會有褲腰帶的。但是老馬根本不聽我解釋。

「你的能量不是一般的，」老馬站起身來，手臂背在後面在屋子裏來回踱步，「你的煽動力和組織力也不是一般的，我們可能小看了你。好在事件被及時制止了，否則後果無法想像。我們也不多加追究，你寫份材料把事情的來龍去脈交代清楚，再作出深刻的檢查，這件事就算是過去了。怎麼樣？」老馬扭過頭問我。

說得好輕巧！莫名其妙地讓我作什麼交代，作什麼檢查？說什麼交代檢查一下，這事就算過去了。「暴動越獄」這麼大的事，是交代一下、檢查一下就過得去的麼？這是掉腦袋的事情！無緣無故憑什麼要我來背這種掉腦袋的黑鍋？我當然不上這個老馬頭的當。我想無憑無據的事情我只要不鬆口，老馬能奈我何？我對老馬據理力爭，說憑什麼說我煽動組織犯人暴動，我連他們的面都見不到，我怎麼去組織他們？何況說話要有證據，你們有什麼證據指控我？老馬聽了只顧抽煙，好半天一聲不吭，只時不時翻翻眼皮瞅我一眼。他當然什麼證據都沒有，剛才那一套完全是麻詐唬。這個傢伙小題大做，搞出個駭人聽聞的「事件」想立大功，用心實在太險惡。這些人從上到下全沒安好心，造了一個「反革命地下組織」的假案還不夠，還想把我栽成在獄中煽動組織犯人「越獄暴動」的主謀，好將我逼進絕路，我豈能乖乖地鑽他們做好的籠子！

我堅持要老馬拿證據，老馬說沒有必要。兩下僵持不下許久，老馬終於和我攤牌：「我和你實說吧，這件事我們已經上報上級了，事件的性質已經確定。但既然沒有釀成既成事實，可以定性從嚴，處理從寬，主要是吸取一個教訓。問題是這事得有人出面承頭，但這麼大的

事，除你之外誰承得了這個頭？我們是慎重考慮了的，你的問題是中央抓的，你的名字也是中央點了的。天大的案子都犯下了，多這點事少這點事可以說對你都算不了什麼。而且我們不過是找你承個頭，對上面有個交代而已。只要你肯配合，事情就到此為止，不會為這個事特為處罰你的。這我老馬可以以人格擔保。」

原來如此！但你老馬硬往我頭上栽贓這件事，就已經證明你這個人毫無人格可言。你的人格還不如一堆馬糞值錢，我豈會上你的當！而且沒有的事情我怎麼配合？配合你老馬一起把我送上斷頭臺麼？哈哈，我還沒有那麼傻。我一口拒絕了老馬。老馬惱羞成怒，點點頭說好好，看來你是敬酒不吃想吃罰酒。我說敬酒不想吃罰酒也不想吃，反正你得實事求是。老馬把手裏的小半截煙朝地上一摔，轉身陰著個馬臉就出了辦公室。

不一會進來兩個當兵的，將我的一隻胳膊從肩膀上扭到背後，將另一隻胳膊從腰下面扭到背後，然後把兩隻手從背後像扭麻花似的銬起。這種銬法叫「背寶劍」，俗稱「蘇秦背劍」，背的時間長了會叫你痛苦得求生不得，求死不成，是犯人聞之色變的一種刑法。當兵的把我按著跪下，然後解下皮帶一左一右朝我頭上猛抽。我兩手是朝後反扭著銬起的，我連護頭的可能都沒有。士兵的皮帶上的銅扣兇猛地落在我的頭上，我痛得拼命地喊叫。當兵的打得愈發兇狠，一面吼叫道看你還敢不敢暴動！看你還敢不敢越獄！他們大概是真的以為我組織犯人準備暴動越獄了，他們懲罰我這個頑固不化的反改造分子，當然用不著手軟。皮帶雨點般打下來，我漸漸頭都被打麻木了，呻吟著癱倒在地板上。後來好像是季幹部進來了，他讓士兵們住了手，打開我手上的銬子，叫他們把我拖回我的號子。

我躺在鋪上，覺得兩個手膀子像斷了似的，腦殼更是疼得像炸開了一樣。用手摸摸腦殼，疙疙瘩瘩都是拱起的包。我究竟犯了什麼罪，要遭此荼毒？我很委屈，我孤立無助。叫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靈，淚水禁不住直往外流。我在心裏呼喊我的母親：媽媽，你知道兒子在監獄裏無辜挨打嗎？你知道兒在這裏生不如死，咬碎牙只能往肚子裏吞嗎？你知道有人還在往兒身上栽贓陷害，想把兒往死路上推嗎？媽媽，兒不想死，兒還想有一天能回到娘的身邊做個孝順兒子，

兒還想活著看到兒的案子真相大白，平反昭雪。媽媽，兒一定要活下去。兒要活得比陷害我的「曾劉首長」久，比中央那班昧著良心發「九二七指示」的老頭子久。兒要活著看見他們一個個死去，看到歷史宣佈我無罪的那一天到來。

我念著「媽媽、媽媽……」睡去，我想在夢中見到我慈愛的母親……

第二天下午，我正坐在小桌子前看報，忽然門上的小窗梭開了，窗外是老馬的那張馬臉。只聽他說聲「給你落實落實政策」，就把一截鉛筆頭丟進來。這個鉛筆頭是我放風時撿的，搜號子時給搜去了，同時搜走的還有我自己做的那枝蘸水筆，以及裝了墨水的安打瓶。所幸這幾個月來用它們偷偷寫的幾萬字的小說還在，我已經用飯粒將稿紙一層層糊成了幾張硬紙板，變成了《毛澤東選集》的精裝封皮，所以誰也沒有發現。現在好像沒事了，「暴動越獄事件」似乎已不了了之，大概老馬編的那套聳人聽聞的鬼話，上頭根本就不相信。不然老馬怎麼會把搜去的鉛筆頭又還給我，表示「落實政策」呢？什麼「落實政策」啊，簡直是在玩「黑色幽默」，這個莫名其妙的老馬頭！

又過了幾個月，快到年底了，對我們這個案子的處理仍是遙遙無期。唯一能讓人有點盼望的是過年，因為過年可以改善伙食。元旦那天加餐，早餐吃了肉包子，中餐回鍋肉，晚餐又是紅燒肉，豐富得很。我可捨不得一頓就把肉吃完，那樣一來胃受不了，二來浪費營養，得慢慢地留著吃。那年頭冬天很冷，天寒地凍；窗臺就是冰箱。一碗肉放在窗臺外，十天半月都不會壞。我一般每次最多吃兩三塊肉，過年的那幾頓肉，我可以慢慢吃上個把禮拜。每次吃飯時，我先把碗裏的飯從中間挖一坨出來，把肉塊埋在碗裏面再將飯蓋上。等飯吃了大半，那幾塊肉也被熱飯捂得流油了，我再來細細地品味。

過年那些天除了打牙祭外，還能整天聽戲，看守所裏的喇叭，從早到晚播放著廣播電臺的文藝節目，也就是清一色的「革命樣板戲」。八個樣板戲輪換著播，有時還是從頭至尾播全劇，聽一聽也能解些寂寞。這天晚上又在播放《智取威虎山》，楊子榮正在吊起嗓子唱那段有名的「打虎上山」：朔風吹，林濤吼，望飛雪漫天舞，好一派北國風光……

窗外也確已在飄雪了，雪花紛紛揚揚地在夜幕下飛舞，囚室裏寒氣逼人。我把被子裹著身子靠牆坐著，聽屋外的風聲呼呼地響。進看守所已經兩年半了，案子何時能夠了結？我憂心忡忡，睡下後久久不能入眠，夜半了還烙燒餅似的在床板上翻來翻去。遠處小東門鐘樓的鐘聲在寂靜的夜空中清脆地傳來，十一點、十二點，然後是一點、兩點……，我慢慢睡著了。時間在黑夜中無聲地奔跑著，我的生命之燭就這樣無意義的一寸一寸地燃耗掉。為什麼硬要把我們這些人在這裏死關，就是不作處理呢？案情都非常清楚了，為什麼非要把人冤到底呢？為什麼？到底為什麼？

新年過後是傳統的春節也就是舊年。過舊年最讓人想家，「每逢佳節倍思親」這句話，恐怕沒有誰比坐牢的人感受更深吧。每聽見監獄的大牆外有鞭炮聲炸響，就抓心抓肝地想家想得慌。看守所讓大家給家裏寫了信，信交給幹部後，就成天盼家裏的人回幾個字送點日用品來。這一天季幹部突然進號子叫我清行李，我一驚，不知要到哪裏去。按經驗清行李就是判刑或回家，可我並未宣判，放我回家似乎也不可能。我夾著行李跟著季幹部來到提審室，那個久違了的陳軍代表正在那裏等我。這個陳軍代表自「九二七指示」下達後要麼就不來，來必有重要事找我。那麼這次又有什麼重要事要找我呢？不料陳軍代表這回見了面什麼也不講，只是讓跟他一起來的一位軍人給我戴上手銬，然後把我帶上了一部北京吉普。

吉普車開出看守所，從小東門經大東門、閱馬場直上長江大橋。寒冷的江風撲面而來，吹得臉上涼颼颼的，但我感覺非常舒暢。這是兩年多來我第一次走出監獄的大牆，我多麼想好好看看美麗的江城，看看久違的武漢三鎮，但車上的軍人用手按住我的頭不許我東張西望。不一會車已經過了長江，正在龜山腳下奔馳。前兩天剛下過一場小雪，沿路兩側的山坡還有許多殘雪。想起兩年前離家前往鐵山時，正是暮春初夏的五月，大地繁花似錦。此後就是接連的厄運，再也沒有回過家了。「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想起《詩經》上的兩句詩，不覺感慨萬分。

吉普車很快過了漢水橋，沿武聖路直向航空路方向而去。航空路不是有我的家嗎，難道是要送我回家麼？我忽然一陣激動。但是吉普

車在快到航空路口時，忽然沿解放大道向左拐了個彎，朝寶豐路的方向駛去。顯然並不是送我回家，那不過是幻想，估計車子是在送我去另一座監獄——寶豐路上的市第二監獄。它離我家不遠，離我上初中讀過的第十二中學也很近。唉，武昌民主路上的省一監獄，不也是在我讀過高中的實驗中學附近麼，這監獄怎麼都一個個建在我讀過書的學校旁邊呢？莫非我命中注定出了學校就該進牢房？真是晦氣得很。

正在想著，我已被喝令下車，果然是進了市二監獄。就算是「二進宮」吧，我自嘲說。寶豐路的這座監獄會如何對待我這樣的「欽點要犯」呢？生活待遇會比一監看守所好一點嗎？在讀書方面能開點綠燈嗎？特別是會許可我定期會見親人嗎？我抱著裝著簡單行李的舊旅行袋向監房走去，心存一絲朦朧的期待。不管怎麼說吧，我現在至少離家近了，家裏人每次給我送東西，再不用辛辛苦苦地過江跑老遠了。唉，我的父母，我的親人，兩年多沒見面了，我好想念你們！你們知道我已經回到了漢口，現在就關在離你們不遠的地方嗎？

從老遠的地方傳來隱約的鈴聲，是我讀過書的那所中學的上課鈴或下課鈴在響嗎？我昔日的初中的同窗如今都在哪裏呢？課堂上在黑板前執教鞭的，還是從前的那些老師嗎？那位在美國留過學的教過我英語的余老師呢？她每天早上還是用那口美式英語的語音，對同學們說「Good morning！」嗎？還有那位教過我們唱《老黑奴》的梁老師呢，他為他的右派問題又遭罪了嗎？啊，老黑奴，我怎麼會忘記你在歌中那悲涼的歎息，又怎麼會忘記你在聽見來自天國朋友的呼喚聲後那急切的回應：

I'M COMING, I'M COMING.

是的，我來了，我來了。但迎接我的到來的，不是天國之門，而是又一扇沉重的牢門，我看見它已經向我敞開。



---

## 第二十一章

---

# 轉監獄的日子

我所在的監室，位於監獄西邊的一棟兩層樓的樓房的二樓。房間很大，水泥地坪，大概有二十多平米。外牆左右兩邊，各開有一扇對開的窗子，室內的光線很充足。監室靠窗的一角，對著門放了張鋪板床，床的斜對角也就是門的這一邊，有一個馬桶。因為房間大，室內顯得空空蕩蕩。不過房大也好，我來回走動的空間大，再不會是「從門到窗子是七步，從窗子到門是七步」這樣狹小的範圍。住在這樣的地方，我應該知足了。

來這裏幾天後，從管教的嘴裏，對周圍的環境有了一個基本的瞭解。這座監獄很大，內設男監、女監和看守所，此外還有幹部軍人家屬住宿區，用一道牆和犯人區隔離開來。男監女監關押的都是正在服刑的勞改犯，分別從事汽車修理和織布製衣工種，監獄內有條件良好設備齊全的車間供他們工作。看守所關押的則是未決犯，未決犯也要在自己的監室裏做些簡單的手工勞動。我們所在的這棟樓不屬於看守所，而是在監獄的幹部家屬區內，本來是監獄的幹部使用的，這回特地騰出來，集中關押「北決揚」一案的案犯，我們私下裏戲稱它為「白公館」。樓的上下兩層共有十七個房間，一樓的一頭還有一間廁所。每天開飯時管教把牢門打開，讓我們在門口取飯。飯仍然是蒸好的鉢飯，菜由管教親自從菜桶裏給我們打。菜打好後就進屋裏去吃，管教把門鎖上再去開下一間房，所以案犯之間還是難得打照面。倒馬桶也是開了門讓我們自己到樓下去倒，倒完一個再輪到下一個，防止大家碰頭。

但是有一天管教不知是嫌麻煩還是一時興起，在倒馬桶的時間放起了鴨子，將樓上樓下所有房間的門都打開了，要我們都端起馬桶在廁所門口排隊，一個接一個地進去倒。我們擠在一起，你望著我，我望著你，彼此又不許講話，只能以目示意，算是打招呼。管教反背著雙手，眯著眼睛，在我們面前走過來，又走過去，看看這個，瞧瞧那個，像欣賞什麼奇禽怪獸似的。看了瞧了半天，管教突然對著我們，像發現了新大陸似的大叫道：哈！這回真的是牛鬼蛇神大集中囉！說完就哈哈大笑起來，得意得不亦樂乎。這個管教姓胡，麻城人，聽說曾經是一個公社的大隊長，不知怎的放著大隊長不當，去部隊混了幾年，復員後安排到監獄裏來當了管教。

這個胡管教長得五大三粗，一口黃燦燦的玉米牙，又沒什麼文化，只會對犯人瞎吼。說他壞他也不算怎麼壞，說他好也好不到哪裏去，就喜歡拿犯人取樂。我們那時私下稱這位滿口麻城話的胡管教為胡傳奎，就是樣板戲《沙家浜》裏的那個草包司令。只見這位胡司令從牆角撿了根木條拿在手上，見哪個倒完馬桶從廁所出來了，就用手裏的木條朝哪個的屁股抽一下，一邊抽一邊諷笑道：狗日的這是個牛！下一個出來的就是個狗日的鬼，然後是狗日的蛇、狗日的神……一面用條子抽一面大笑不止，比撿到塊金元寶還快活，也不知他究竟快活個什麼？

我們無故受他捉弄，也只好忍氣吞聲，敢怒不敢言。此時此地，「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司馬遷老前輩早就說得明白。不過我們又覺得這位胡司令可憐得很，一個草包什麼都不懂，只會以捉弄犯人為娛樂，那精神世界也太淺薄了，大概和魯迅先生的小說《藥》裏的那個獄卒紅眼睛阿義或曹大叔差不多，所以只好說「可憐」。不過威風八面的胡司令若知道我們在可憐他，他一定會認為我們這些「狗日的」是瘋了。

胡管教在我們面前的自我感覺總是很好，還特別喜歡把他的鄉下媳婦擋在嘴邊炫耀。吹他媳婦讀過初中，是大隊的會計，能寫會算，長得白皮細肉，當姑娘時是公社遠近聞名的一枝花。這枝花據說比他年齡還大三歲，女大三，抱金磚，胡管教很有福氣地抱了塊金磚。有天提審回號子路過幹部宿舍，見胡管教正站在宿舍門口，身旁一個三

十來歲的白胖女人，坐在棵槐樹下在奶娃娃，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胡管教的堂客。這個女人兩腿八字岔開，衣服扣子解了，貼身的汗衫摟得老高。娃娃大概剛剛奶過，一雙碩大無比的白生生的奶子，仍毫無忌諱地在外面甩，甩得過路人眼花繚亂。有句俗話說當兵三年，老母豬變貂蟬，我自入獄後極少見到女人，但見到這個白胖女人一點也想不到像貂蟬，倒覺得像堆肥腸。

胡管教在女人方面是有點邪乎的。有回嚴琳的老婆「楊子」來監獄給嚴琳送東西，是老胡接待的，過後老胡就色迷迷地對嚴琳說，你老婆叫「樣子」吧？還真是個做模樣的樣子呢！好一朵鮮花，怎麼偏偏就插到你這耙牛屎上了。你這一關幾多年，你老婆在外頭守得住？嚴琳聽了，恨不得啐他一口。

另一位姓戴的管教，是胡管教的搭檔，年齡小點，都叫他小戴，也是個復員軍人。小戴矮矮的，又胖，卻有個苗條相當秀氣的老婆。他老婆個子比戴管教差不多高出了一個頭，我們背地裏說，這才叫做「鮮花插在牛屎上」了。這個姓戴的管教長得實在叫矮，矮得不像糧食，身高恐怕還不到一米六。我們都很奇怪這麼矮的個子，當初是如何進的部隊？據書上講雷鋒個子也矮，當年報名參軍時不夠體檢的標準，是在量身高時偷偷把腳尖掂了掂，才蒙混過關的。不知道戴管教是否在「向雷鋒同志學習」時學到了這一招，在體檢時掂了腳尖。不過以他的身高，光是掂腳尖恐怕還不夠，他得像如今的摩登女子那樣，穿雙鬆糕鞋才過得了關。

個子矮就不說了，那是爹娘給的，誰也用不著說三道四，可這個戴矮子卻又生就個火爆脾氣，這就讓犯人倒楣了。戴矮子脾氣爆起來可以像跳蚤似的一蹦三丈高，聽說不少犯人還挨過他的打。不過雖然也經常領教他的脾氣，我們這一撥人倒是很少挨他的拳腳。但有一次干毅下樓倒馬桶時趔趄了一下，把桶裏的糞水潑了一點在地上，戴矮子走過去對著干毅的屁股就是一腳，差點將干老頭踢倒。大家都知道戴的脾氣大，誰也不敢惹他。只要你不惹他發毛，他一般也不特意整你，而且他自己有時也說他脾氣不好，在同事中都常常會得罪人。我們這種「牛鬼蛇神」，自然更犯不著捋他的「虎鬚」。

戴矮子脾氣雖不好，人倒是不壞，壞的是他們上頭管我們這些人

的一個姓王的軍代表。這個王軍代表是東北人，約四十歲左右，個子高高大大，十分肥胖，又臃腫，眼皮老塌著，像沒睡醒似的。不過你莫看他眼皮塌著，眼珠閉著，其實肚子裏頭一天到晚都在盤算如何從我們這夥「臭雞蛋」裏挑點骨頭，如何讓我們的日子不好過。他經常不聲不響地貼著牢門上的小窗口聽壁角，聽屋子裏的人有沒有在自言自語說反動話。當然，我們誰也不會傻到說反動話，就是有什麼「反動話」，也只會爛在肚子裏，哪裏會讓王胖子抓把柄？王胖子雖一無所獲，仍樂此不倦，大概是一種職業病吧。這世界上無論是在什麼時代、什麼地方，永遠都有一種像雨果的《悲慘世界》中的探長沙威那樣的人。這種現存秩序的忠實衛士，對官府認定的「罪犯」充滿仇恨，絕不姑息，而不管這個「罪犯」是不是真的有罪。

不過還算萬幸，這個王軍代表的頭上還有另一位級別比他高的軍代表可以「罩」他。這位軍代表姓魏，山東人，從部隊支左支來的，是管我們這些案犯的「專管組」的正組長，我們叫他老魏。老魏也差不多四十來歲，個子不高，身體很棒，嘴巴部分有點突出，兩眼鼓鼓的，有點像類人猿和近代人之間過渡階段的類猿人、考古學上稱作「古人」的那種。原來我們敢死隊的大學生駱益民就和老魏同一類型，駱的外號就叫「古人」。老魏性格很倔，直率粗暴，弄毛了就要發火。但平常老魏對人卻很隨和，他並不熟悉也不拘泥監獄管犯人的一套規矩，只是隨著自己的性子來。

比方放風，老魏剛開始根本就沒有放風這個概念，說放啥風呀，每天下午出來倒馬桶不就是放風？後來聽我們說關在看守所的犯人每天都是要放風的，放出來曬曬太陽、洗洗衣服、活動活動，就說那就放吧放吧！於是一周中總可以給我們放一兩次風。老魏也懶得一個一個地放，乾脆要放就一起放，也不怕我們「串供」。老魏說這監獄裏那麼多犯人，天天都在工廠做活，也沒見出什麼大事，還怕我們這幾個臭老九在一起翻天不成？

老魏這些話都是胡管教管我們放風時透露給我們的。他還告訴我們老魏是野戰部隊的團參謀長，曾經入朝參過戰，立過軍功。老胡還說老魏在部隊裏因為搞軍閥作風體罰士兵受過處分，至於是因為這個罰他到監獄「支左」當軍代表的，老胡就語焉不詳了，估計他也搞不

清楚，不然也要捅出來的。反正他這個人肚裏存不住二兩油，使我們這些閉目塞聽的聾子和瞎子從他的誇誇其談中受益匪淺。不過看得出胡對老魏很崇拜，對老魏的話言聽計從。戴矮子也服老魏的管，但兩個管教都不大買王胖子的賬。老魏與王胖子似乎也是面和心不和，我們就親眼見過老魏當著我們這些犯人的面搶白王胖子，出王的挺，嗆得王胖子臉上紅一塊、白一塊下不了臺。

也不怪老魏不給王胖子面子，實在是王胖子說話總是欠水準。有一回放風時，老魏把《參考消息》上面登的一則消息念給我們聽，說我們國家西南某地又發現了一處儲量巨大的稀有金屬礦。王胖子正好也在場，就接過話信口開河，說我們中國的礦藏是世界上最豐富的。我見他說這種沒有常識的話，忍不住駁了一句說，未見得吧，起碼人家蘇聯的礦藏就比我們國家豐富。王胖子的臉頓時變成了豬肝色，兩隻眼睛死死地盯著我半天，說：「難道我們國家不是地大物博麼？我還說錯了不成？要你來糾正？」我說，地大物博和最豐富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不是同義詞……不等我說完王胖子早已惱羞成怒，氣急敗壞地指著我的鼻子，說我美化蘇修，骨子裏就是個反革命。

老魏在一邊冷眼旁觀，看場面鬧僵了，就說，好了好了，今天放風到此為止，都回號子去！我們就回號子，回頭看王胖子站在那裏，還盯著我餘怒未消，只是臉上的豬肝色似乎已經變成了驢肝色。我一面肚子裏暗笑出了回王胖子的洋相，一面又不免擔心他以後找岔子對我報復。我於是事事小心，盡量不讓他抓辯子。但是防不勝防，王胖子一有機會總要找我的茬。

大概是想摸一摸我在外頭時都做過哪些「壞事」吧，每當有人來找我外調，王胖子總喜歡到提審室來旁聽。一來就窩在沙發裏，像個大蛤蟆似的，眼睛半睜半閉，也弄不清楚他究竟是在聽話還是在養神。有次有個小縣城的一夥人來外調原來我下面的一個中學生的情況，他們大概也不清楚王胖子究竟是何路神仙，只看王胖子塊頭大、架子足，又上了點年齡，便畢恭畢敬地尊王胖子為首長。外調的人指著王胖子說，首長非常重視這次外調，親自來坐鎮旁聽，你要認真回答我們的提問。

我聽了暗自好笑，王胖子算那門子首長，他成天無所事事不坐在這裏混時間，還有什麼別的事幹不成？外調的就開始提問，無油無鹽

都不知道提的些什麼問，全是一些麻繩穿豆腐，提不起的綠豆芝麻事。我就說這個學生當時才上初中，十二三歲的小孩能懂得些什麼，不過是跟著鬧好玩而已。他這樣的中學生我下面多得很，我哪裏可能都清楚他們的情況，所以我是證實不了什麼的。我覺得你們也犯不著興師動眾，花這麼大的力量來調查一個小孩子……我話還沒說完，就聽見王胖子大喝一聲「大膽！」王胖子把眼睜圓了，用手指指著我，訓斥我不該頂撞外調的人。「該問不該問，還輪得到你說話不成！」王胖子氣急敗壞地說，「你當你是什麼人，你說！」我就說我是犯人。王胖子說什麼犯人？我說是政治犯，王胖子說什麼政治犯不政治犯，你是地地道道的現行反革命犯。你只有老老實實回答問題的義務，沒有拒絕回答問題的權力。

那夥外調的見王胖子如此為他們撐腰，很是受寵若驚，連忙巴結說首長說得對首長說得對。又回頭對我說，要服從首長的指示。說首長是直接管我們這個案子的，按首長說的去做才能爭取得到寬大處理……，左一個首長右一個首長的，我實在聽得肉麻，而且剛剛受了這個狗屁首長的侮辱，便不客氣地告訴他們，王軍代表並不是管我們案子的，我們案子由省裏的專案組管，更上面由中央管。這裏的幹部只管我們開飯、放風和倒馬桶。我說的全是實話，王胖子臉漲得通紅，卻又找不到我的碴，一張國字臉由紅變白，又由白變青，直恨得咬牙切齒還是毫無辦法。

除了這些無聊的提審之外，成天關在號子裏就更加無聊。原來家裏送的毛澤東選集和幾本馬列的著作早已讀得滾瓜爛熟，實在也不想再讀了，新書又沒有，真不知道這日子怎麼熬。更糟糕的是自轉到二監後快兩個月了，連家信也未獲准寄一封，也不知道家裏人曉不曉得我已經轉到這裏來了。找管教要求給家裏寫信，管教總是不置可否，找老魏老魏也總是說要請示，卻老是請示不下來，也不知上面葫蘆裏賣的什麼藥？而過去在武昌那邊是差不多每個月都准許寫封信回家的。沒有辦法，只有每次放風時纏著老魏要求給家裏寫信，老魏被我們纏不過，向上頭請示了幾次，總算同意我們給家裏寫封信。信的內容僅限於要點日用品，別的一律不准寫。這樣我們總算可以給家裏人報個平安了。

給家裏寫信後不久，家裏就給我送了錢和一些日用品來，還有幾本《紅旗》雜誌之類的讀物。錢和物是我外祖母送來的，附有姐姐寫的一封簡短的家信，信上說去年年底前就好長時間接不到我的信，曾到武昌那邊的看守所去問，只說是轉移了，轉到哪裏了都不肯說。到處打聽也打聽不到消息，家裏人一直都在著急。這回收到了信，家裏人總算放了心。以後需要什麼東西就寫信回來，我們會給你送。姐姐還告訴我爸爸媽媽都響應號召到幹校鍛煉去了，她的工作也很忙，平時請不動假，只好讓家家給我送東西。信封上魯禮安收幾個字是我外祖母寫的，信封背面還寫了要求見見我的幾個字，有落款是萬松街派出所的一行答覆：不可以送東西，也不能見面，我們也不知道他關在哪裏。這個信封大概是前一陣子外祖母到派出所打聽我的消息時用過的，我不明白，將我轉移到漢口來的事情，為什麼幾個月不通知我家裏人知道？把人關在什麼地點，難道也需要向他的家屬保密麼？

除了偶爾能給家裏寫封信外，想見見家人仍然是癡心妄想。有次放風時我們又向老魏提出能不能會見家人的事，老魏想都不想就一口回絕了。老魏說前兩天張志揚的愛人來這裏給張送點東西，把兩個七八歲的小女兒也帶來了。兩個小女孩在會客室裏哭著要見爸爸——那還不是她們的媽媽教的——哭也沒用，不能見就是不能見，上頭規定的，我們有什麼辦法？我們也都知道這事不能怪老魏的，老魏並非刻板之人，他有他的難處。其實凡能通融的地方，他總能通融通融，在這一點上老魏和王胖子完全不一樣。

老魏在給我們放風時習慣拿張《參考消息》看。那年頭《參考消息》還是內部讀物，一般老百姓不大容易看到。老魏這個人有點自由主義，或者他並不怎麼把我們這些人當階級敵人看，他看報看高興了，常常把報上的內容念給我們聽。不管是路透社美聯社還是塔斯社，凡有關我們中國的報導或評論，他都愛擇一些比較正面的內容讀給我們聽。這些報導和評論，自然難免有些地方和我們國家的對外宣傳報導不一樣，老魏就會停下來說，這個地方的提法不對，是片面的。如果讀到帶攻擊性的或是貶義的字眼，老魏會馬上指出，這句話是誣瞞我們、是反動的。總之，老魏一邊讀報，一邊隨時注意消毒，他大概把我們這些人當成缺乏辨別力的小學生來對待了，也是天真得可愛。

然而到七一年九月中旬之後，老魏突然不再給我們念《參考消息》了。不但不念，而且成天綑著個臉。而且不單老魏是這樣，所有的軍代表和管教都綑著臉不苟言笑，好像同時都死了親娘似的，我們就猜測共產黨內一定出什麼大事了。是偉大領袖病危或「駕崩」了不成？而接著而來的國慶日期間，雖然報紙上照例展示出偉大領袖萬壽無疆的光輝形象，但例行的國慶遊行和閱兵式卻出人意外的取消了。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敬愛的林副主席」突然從一切媒體上銷聲匿跡，那個舉著小紅書緊跟偉大領袖永遠不多不少正好一步半的林副統帥，似乎一下子就從地球上蒸發了。這位偉大領袖的親密戰友，自然不會像古巴的那位卡斯特羅的親密戰友格瓦拉一樣，是潛入到哪個第三世界的叢林中打遊擊戰去了。按照我們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來分析，這位「林副統帥」應當是下了台。

只是事情來得非常突然，一個在兩年多前召開的黨的九大上，才被指定為「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的黨和國家的第二把手，一個不久前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還是炙手可熱的鐵腕人物，一個全國人民剛剛還在敬祝他「身體健康、永遠健康」的政治明星，怎麼竟會沒有任何徵兆瞬間就隕落了呢？不過猜測歸猜測，報紙上並沒有任何有關這個問題的消息。軍代表和管教們個個守口如瓶，什麼也不向我們吐露。但蛛絲馬跡還是有的，報上開始大批「陳伯達一類的假馬克思主義政治騙子」，偉大領袖關於「要搞馬克思主義，不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的最新指示頻頻見諸報端，而早就靠邊站了的一些老將老帥也開始紛紛出頭露面。每天早上的廣播也在「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之後，再沒有那句「敬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了。

林彪的突然倒臺無疑是中國政壇上的一次大地震，震得所有的人都茫然不知所措。地震最強的一波過去後好久，喊慣了「身體健康、永遠健康」的那些人，仍然心有餘悸。有一天胡管教把我喊到提審室談話，東扯西拉了一陣，胡突然問我最近聽到什麼風聲沒有？我說我關在這個地方閉目塞聽，除了張《人民日報》外，什麼都看不到，能聽到什麼風聲？胡管教說最近看報，總有些什麼想法吧，說說看，沒關係的。我還是不說，只是望著胡管教不動聲色地笑。胡管教忍不住也

笑起來，把嘴一蒙，歪著頭說有話就講，有屁就放，笑什麼笑？我就說那個人倒臺了吧？胡管教說「那個人」是誰呀？我說林彪唄。胡管教說別瞎誑，一面扭頭朝門外看了一下，回過頭又笑起來，問我聽誰講的？我說這禿頭上的蟲子明擺的事，還用得著聽誰講麼！

胡收斂起傻笑，強作一副嚴肅相說，沒有公佈的事不許亂講！我說是你要我講的呀。胡管教便說當然、當然，講講也不要緊的，言者無罪嘛！我暗想人垮臺了當然「言者無罪」，要是人還在臺上，你敢言他半句不是？不馬上打成反革命才怪！這時聽見胡管教說，不管外頭發生什麼事情，有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天塌不下來。你回到號子裏也不要胡思亂想，老老實實地多想想自己的問題都交代清楚沒有。說完這番話，胡管教把我的那本不久前搜去的《毛主席語錄》退還給我。打開一看，語錄扉頁上林彪那段「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以及「活學活用、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題詞都已經被撕掉。

後來林彪的問題公開見報了，不知為什麼又把林彪和兩千多年前的孔夫子拉到了一起，成天在報紙上「批林批孔」。有天讀報上的一篇批判文章，文中關於林彪「倉促外逃、折戟沉沙」的說法引起我們的好奇，原來林彪是外逃了。堂堂「副統帥」竟「倉促外逃」，簡直匪夷所思，而「折戟沉沙」又當作何解釋呢？放風時問老魏，老魏說林彪坐飛機往蘇聯跑，半路摔死在蒙古國的沙漠上了。我們問用導彈打下來的嗎？老魏把眼一橫說，林彪當時還是黨的副主席，黨章指定的接班人，誰敢下令用導彈打他？打了他向全國人民怎麼交代？他乘的那架三叉戟是自己掉下來的。我們問飛機怎麼會自己掉下來呢？老魏說油燒完了唄。我們還想問，老魏不耐煩了，說開記者招待會嗎？還有完沒完？

我們只好不再問了，但總覺得這事發生得蹊蹺。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30，從來沒有人向我們傳達過，我們對這個事件的真相也一無所知，只能根據報上公佈的材料來進行分析。但有一點我們是認定了：這個「九一三事件」不僅標誌著林彪政治生涯的終結，而且在事實上宣告了偉大領袖一貫正確的神話的破產。

「九一三事件」過去幾個月後，全國各地開始揭批林彪在各地的代理人。武漢軍區政委劉豐被揭露是林彪在湖北的死黨，軍區司令曾思

玉則被揭發「上了林彪的賊船」。一個「死黨」，一個「活黨」，報紙上成天是批判他們的文章，很熱鬧的。我們這回是「坐在黃鶴樓上看船翻」，幸災樂禍得很。我肚中吟詩曰：「是非顛倒枉曲直，瞞天過海世誰知？冷眼曾劉二螃蟹，看你橫行到幾時！」曾劉曾劉，你們這兩個曾經一手遮天不可一世的混賬首長，可曾想過也有今天麼？！那幾天我們在放風時互相竊竊私語，交換看法，王胖子察覺出我們有「活思想」——據說他在部隊裏就是抓當兵的活思想的「標杆」——於是找我們一個個的談話。

「你對林彪叛黨出逃這件事是怎麼看的呢？」在我談話時他開門見山地問。

「林彪一夥企圖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陰謀敗露倉促出逃，折戟沉沙，自找滅亡，是他們叛黨叛國的可恥下場。」這些報上的陳詞濫調我照本宣科，背書似的開口就是一羊肉串。

「嗯，林彪的確是自取滅亡。」王胖子點點頭說，「林彪本來就是出身大地主、大惡霸家庭，這次叛黨出逃，是他的反動階級本性的徹底暴露！其實，偉大領袖毛主席早在井岡山時期，就看出林彪早晚要當叛徒——毛主席寫的那篇《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就是針對林彪的失敗主義、動搖主義和投降主義的，可見主席對林彪早有警覺。」

聽王胖子這麼說，我暗自在肚子裏好笑：主席既然早就對林彪有所警覺，早就料到林彪要當叛徒，為什麼還要扶持林彪當自己的接班人？豈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不過我也知道王胖子之所以這樣說，無非是想維護毛「一貫正確」的神話。只是這把把麼樣捏都捏不圓，何苦呢！

王胖子見我不做聲，自知他那套話鬼都不會相信，於是又接著往下套我的話：「除了剛才你說的那些之外，你本人還有些什麼自己的想法呢？——你不會沒有自己的想法的，對不對？」

「我自己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想法」，我搖搖頭說，「不過，對報上揭露的林彪說過的一句話倒是感觸很深……」

「林彪說過的那句話？」王胖子眼珠骨碌碌地轉著，死死地看我。

「林彪說，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林彪本人就是靠說假話爬上去

的，林彪在湖北的那個死黨也是靠說假話爬上去的。林彪那個死黨從來都是弄虛作假，欺上瞞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個人早該遭惡報了。那個上了林彪賊船的傢伙也同樣不是個好東西。我堅決贊成把這兩個共產黨的敗類批倒批臭！」

我說得義正辭嚴，無懈可擊，王胖子儘管聽得味道不大對，可一點轍都沒有。他腦子轉了轉，說：「曾思玉同志算是誤上賊船，目前還是按人民內部矛盾對待嘛。至於劉豐，作為林賊死黨，當然是死有餘辜，但他是他的問題。」王胖子慢吞吞地字斟句酌。「他是他，你們是你們，不要因為劉豐垮臺了就心存僥倖，以為自己的案子可以翻過來了，如果那樣想可是非常危險的。」

「我們這個案子不就是劉豐曾思玉他們整理材料上報中央的嗎？」我接過王胖子的話說，「他們上報的那些材料有多少是經得起調查的，你們真的心裏沒有數嗎？我希望林彪在湖北的死黨的罪惡暴露後，上頭能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復查我們這個案子。」

「嗯，你有這個想法也是可以料到的，」王胖子點點頭，「我們就是要你的活思想，我也可以把你的想法報告上面。不過我還是想再提醒你一下：劉豐的問題是劉豐的問題，你們的問題是你們的問題，各人有各人的賬要算。黃牛角，水牛角，各是各，不要搞渾。」說到這裏，王胖子似乎搞忘記了剛才說的主席早就看出林彪要當叛徒的話，突然歎氣說，「林彪的問題也是來得比較突然，這個人太善於偽裝，在他未徹底暴露之前，誰會想到他竟是埋在毛主席身邊的一顆定時炸彈呢？」我說我也沒有想到過，但是我們中間是有人想到過的。王胖子很詫異，歪起脖子說，你們中間？嗯，你們中間誰想到過啦？我說童丹就想到過。童丹有一次說到毛主席的接班人問題時，就說過他懷疑林彪最靠不住。我們問他為什麼，他說不為什麼，只要看看赫魯曉夫在斯大林生前死後的表現，看看赫頭當年是如何拼命吹捧斯大林，再對照一下林彪現在怎樣拼命吹捧毛主席就行了。

王胖子還是不相信，說童丹就有那麼大的能耐？你不要在這兒幫他胡編吧！我說沒這個必要在這個地方說假話，何況又不是我一個人聽童丹說的，馮天艾、周凝淳當時就都在場。你可以找他們還有童丹本人證實嘛！王胖子問我為什麼早不說？我說早先林彪是副統帥，是

黨章規定的接班人，早說給你們聽不是害了童丹？王胖子就說我就知道你們交代問題都是留了一手的，凡是對你們不利的問題，你們是不會輕易交代的，這就是你們的反革命本性。這回林彪出事後，你們又開始翹尾巴了，我勸你們最好不要打錯算盤。你們和林彪反革命集團儘管表現形式不完全一樣，反黨反毛澤東思想的本質卻是一樣的。不要以為林彪在湖北的那個死黨垮臺了，你們就可以出頭了，那是癡心妄想！你們和林彪的死黨其實是一丘之貉，林彪在湖北的那個死黨，也就是你們這些人在湖北地區的總後台！

真是越說越奇了，我們這些人正是林彪的那個死黨親自下令抓的，我們這個冤案是這個死黨一手炮製的，他憑什麼竟成了我們的後臺？他抓我們是為了捨車保帥嗎？可他當初正紅得發紫，炙手可熱，他捨我們這些無名小卒幹什麼？有回放風時那個戴矮子說得更玄乎，他說幸虧林彪被揭露出來，如果林彪掌了權，你們這些牛鬼蛇神就大翻身了，而我們這些人就得人頭落地。他邊說邊用手掌在自己頸子上做了個砍頭的動作，好像真是那麼回事似的。其實林彪上臺也是需要有隊伍擁戴他的，湖北有劉豐做他的死黨，曾思玉又是他的老部下，湖北的部隊應該是他的重點拉攏對象，戴矮子這些人只要跟著曾劉首長效忠於他，還愁不升官晉級麼？人頭落地的應該是我們才對，戴矮子不過是一派胡言。

王胖子找我談話後大約一個禮拜，專案組一個負責人來找我談話。來人居然問起我與劉豐的關係，問我與劉豐見過幾次面，聽劉豐說過些什麼，還要我揭發劉豐，爭取立功贖罪。我當然無法立功贖罪，因為我從來就沒有見過劉豐，我只在監獄裏聽專案人員傳達過「劉豐政委」在省革委會擴大會議上關於「北決揚罪行」的狗屁講話，那還用得著我揭發麼？專案人員問不出我與劉豐的關係很掃興，臨走前警告我不要翻案：「你們的問題不是劉豐定的，也不是曾思玉定的，不是那一兩個人隨便定的。你們的問題是黨中央定的，是偉大領袖毛主席點了頭的，不要說是三年五年，就是再過三十年、五十年，也是翻不了的，永遠翻不了！」

嘿，永遠！永遠是多遠？林副主席不也曾「永遠健康」嗎？他健康了幾年？至於再過三五十年，我還是《北斗星學會創立宣言》中的那句

話：「幾十年後的中國和世界，將誰主沉浮？！」我相信正義終究是要戰勝邪惡的，欺騙可以一時得逞，但事實的真相總有大白於天下的一天。

不過那時我們倒也確實曾寄希望於中央。我們指望「九一三事件」後，隨著林彪在湖北的死黨的被揭露，中央能審時度勢，對「北決揚」一案重新審查，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至於當初定案時中央根據的那份「現有的材料」，既是曾劉報上去的，完全可以在甄別後該否定的就否定，該修正的就修正，該保留的就保留，總之是恢復事情的原貌。弄虛作假、製造假案的責任，都推到林彪死黨身上不就得了，中央完全可以仍然保持「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一貫正確」。但是很遺憾，上頭為了他們的面子，偏要堅持「九二七指示」的正確性，黑胡同跑到底。上頭的冥頑不化自然是無可理喻，可我們就還得長年累月繼續遭罪了。在我們中國，權勢者的面子從來都比老百姓的死活重要！

但無論如何，「九一三事件」後，由於林彪在湖北那個死黨的垮臺，我們這些當初被這個死黨一手送進監獄的人的日子，還是相對好過了一些。比方說放風的次數明顯多了，只要天氣好，老魏就會放我們出來曬曬太陽。放風時我們這些人在一起交頭接耳，他也不大干涉，只顧看自己的《參考消息》。隔個把兩個月我們還可以給家裏寫封信。每次寫信我都要向家裏要書，但碰到王胖子代發信就沒有好果子吃，他毫不含糊地會把我所要的書籍全部劃掉。但我氣而不饒，下次寫信仍然要。有一次是老魏替我們發的信，家裏就給我把要的書都送來了。送來時不巧偏偏碰上王胖子當班，他把我叫到辦公室去，把我姐姐寫的封信交給我，把家裏送來的一條毛巾、一塊洗衣皂、一管牙膏，還有一本當月的《紅旗》雜誌遞給我，其他的一些「英語學習」期刊和一部舊版的《辭源》，以及一塊檀香皂，王胖子統統退給了我姐姐。

看著姐姐給我的信中被王胖子劃掉的書名，我心疼極了。明知沒什麼指望，還是想作一次努力，可憐巴巴地央求王胖子能不能把我姐姐送來的書給我。我說我一定好好改造思想，爭取將來用所學的知識為人民服務，立功贖罪。但是王胖子根本不為所動，只是把下搭的腫眼皮翻了翻，不冷不熱地問我說：你要家裏送那麼多的英語書來幹什

麼？我說就是想多讀點書。王胖子說多讀點書？好哇，那我問你馬列的書你有沒有？毛主席的書你有沒有？你都有嘛！還不夠你讀的？還要讀什麼英文！你讀英文幹什麼？我說學學總有用吧，馬克思說過外國語是人生鬥爭的一門武器。王胖子說是嗎？是馬克思說的？我說是的，我上中學時英語課本上就有馬克思的這句話。王胖子說馬克思就是說過這話，那也是指對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武器，你想用它來對誰進行鬥爭？像你們這些人，知識再多也是個廢物。你現在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通過學習馬列、學習毛澤東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觀，爭取重新做人。什麼學習英文，簡直是異想天開！你就死了心吧！

我聽王胖子這樣說，知道事情無可挽回，便想能不能爭取讓他把《辭源》給我。我就說那本《辭源》能不能給我呢？那是本工具書，讀毛選用得著。王胖子冷笑一聲說，你不必用學毛選來打掩護，那本什麼辭源，我是翻了一下的，還是三幾年出版的，紙都發黃了，還要它幹什麼？廣大工農兵群眾毛主席著作學得那樣好，沒聽說他們要查什麼辭源不辭源的。人家學得好是憑樸素的階級感情，憑對毛主席的忠心。上海郊區有個貧農叫顧阿桃，大字不識一個，她毛主席著作學得最好，她讀過辭圓還是辭方？告訴你吧這兩本《辭源》和那些英文書，都已經交還給你姐姐了，你在收條上簽字吧。我沒有筆，向站在旁邊的哨兵借枝筆簽了字，便拿上東西快快地回號子。

回到號子裏，我拿著姐姐的信呆呆地看，望著那上面被劃掉的幾行書名，直想放聲大哭一場。這個王胖子怎麼這樣沒有人性呢？他明知道書是我在這裏唯一的精神寄託，書就是我的命，卻偏偏在這方面刁難我。我搜腸刮肚，恨不得用盡世界上最惡毒的語言詛咒這個王八蛋。突然門打開了，那個借筆給我的哨兵衝進來，從我手中恨恨地一把搶過他的筆，嘴裏不知罵了句什麼，然後忿忿離去。我這才想到剛才氣糊塗了，連筆也忘了還他，他肯定以為我是故意不還想混他的東西，唉，冤枉我也。我再仔細讀姐姐寫的信，她要我把毛巾縫在被子的一頭，待毛巾被脖子擦髒了好拆下來洗。說被子要保持乾淨衛生睡覺才舒服些，等等。我只是想姐姐替我想得周到，別的也未多想。說實在的，我的腦子全被那些眼看就要到手卻栽在王胖子手上的英語書和《辭源》，攬成了一堆漿糊。

過了兩天，王胖子突然把我叫到提審室與我談話。他東扯西拉了半天，忽然問我我姐姐寫的那封信仔細看過沒有？我說仔細看過了。他說你姐姐信上都寫了些什麼呀？我說姐姐要我好好學習，改造思想，爭取早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他點點頭說，嗯，除了這還寫了些什麼呢？我想了想，說再就是說送了幾本什麼書啦，還有毛巾啦、牙膏啦，別的好像再沒有寫什麼。王胖子冷笑一聲說，真的再沒有寫什麼嗎？那我問你，你姐姐在信中要你把那條毛巾作什麼用？我說要我把毛巾縫在被子上用。王胖子又問為什麼要你把毛巾縫在被子上呢？我說好換洗呀，好保持被子乾淨呀。我一面回答一面納悶，這個胖冬瓜今天到底在這條毛巾上挑出什麼骨頭了？要問了又問。

這時只聽見王胖子繼續追問道，那被子乾淨又怎麼樣呢？我說乾淨就衛生嘛，還能怎麼樣呢？王胖子從鼻孔裏哼了一聲說，我就知道下面的話你不敢說！你姐姐要你在這個地方還要想辦法讓自己過得舒服一些，是不是？這話不是我王某人編的吧？就你姐姐這句話，你不說琢磨了十遍，至少也琢磨了五遍，你的心裏想必受用得很哪。你看，外頭那些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意識，到現在還在想方設法對你進行腐蝕，資產階級的東西真是無處不在無孔不入呀！難怪偉大領袖毛主席要告誡我們隨時警惕資產階級思想的進攻，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一刻也不能有絲毫的放鬆。我今天為這個找你來談話，也算是對你的關心和愛護吧！是要提醒你注意思想改造，要隨時想到來這個地方是接受改造的，不是來享福的，你要好生記住喔。

我一聲不吭。王胖子的這番話，使我不禁想到晚清譴責小說《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描寫的那些個「假道學」。是的，王胖子，我會記住你的！我會永遠記住你這個假道學對我姐姐人格的侮辱，記住你這個「正人君子」那副叫人作嘔的「道貌岸然」。我一聲不吭是因為我蔑視你！如魯迅先生說的，最高的蔑視是無言，連眼珠也不轉過去。

過了兩個月，我又有了一次給家裏寫信的機會。我不死心，又在信上讓家裏給我送英語書。我還想碰碰運氣，而運氣還真眷顧我來了。一天門開了，老魏抱著一大堆「英語學習」進屋來，嘩啦啦朝我床

上一丟，弄得滿床都是。哇！我要的書給我送進來了，真叫我大喜過望。老魏要我在我姐姐開的書單上簽字時，不過隨便問了一聲要這麼多英語書幹什麼，看得完麼？我樂呵呵地連忙說慢慢看、慢慢看。真的，這一大堆英語書，夠我慢慢看的了，我很滿足。

過了幾天，王胖子進到我號子來，一眼就看見了床上靠牆的一邊堆了一溜書，都是原先被他退回給我家裏人的那些。王胖子頗有點意外，臉馬上陰沉下來。他指指床上的書，問我這些英文期刊誰讓送進來的？我說是魏軍代表讓送進來的。王胖子聽說是老魏讓送的，也無話可講，只是搖搖頭就轉身走了。

又過了幾個月，就快過年了。有天放風時老魏一時興起，說起今年居民的春節物資供應很豐富，一戶居民能配購幾斤豬肉、幾斤雞蛋、幾斤豆油，還有年糕、糍巴、花生、芝麻、白糖之類，其餘糖果點心更是敞開供應。我們就問他我們有沒有這些供應呢？魏楞了一下，說供應肯定是有一點囉，過年會給你們打打牙祭的，你們慌什麼？我們說年糕、糍巴、花生有沒有我們的份呢？老魏搖頭說沒有，又解釋說這些屬於緊俏的東西，要保證供應居民。我們說那不緊俏的東西呢？比方說外面敞開賣的糖果點心，可不可以幫我們買一點？老魏又楞了一下，摘下軍帽搔搔頭皮想了想，咬咬牙說買吧！

他讓我們把要買的東西在胡管教那裏登個記，可我們大多身上都沒有糧票，大家趁機提出給家裏寫封信，要家裏送點糧票來。老魏說寫封信就寫封信吧，不過等家裏送糧票來那要等到幾時？你們互相借借好了。我們中間有個叫宋樂的老頭子說他有些糧票，我們就都找他借。宋原是武漢市委宣傳部部長，不知為什麼被打成「五一六」給關進來，和我們住在同一棟樓，也算是難友了。宋也沒有意見，只是反復提醒大家，等家裏送來糧票了莫要忘記還他。嚴琳故意恫他說，都是難友嘛，同船過渡，五百年修，有糧票大家打個平夥算了，還麼事還？宋老頭當了真，急得眼睛都翻白了，連連擺手說那可使不得，那可使不得……大家就都笑起來。這回讓買點心，又可以寫信回家，每個人都很高興，哪裏會真的去揩宋老頭的油呢？

春節前夕，大家登記買的食品都給買回來了，大致上也無非是水果糖、餅乾、發餅和喜餅，就那麼幾樣，但對我們這些一兩年來肚子

裏都是些清湯寡水的犯人來說，卻太解饑了。我傾其所有買了一斤水果糖、十個發餅、三十個大喜餅。喜餅直徑足有十公分，厚厚的，裏面的餡子油汪汪的很豐富，花生果仁冰糖芝麻棗泥應有盡有，據說是鄉下人娶媳婦時擺酒席用的。這種大喜餅一個六毛，光是它就用去了一十八塊，加上別的，一共花了二十塊錢。二十塊錢在那個時候是大數目了，算是大大地奢侈了一回。

其他人大多比我買得少，也有比我買得多的，其中數嚴琳買得最多，一共買了二十八塊錢的東西。大家都喜氣洋洋地把各自的東西抱回號子，關起門來大快朵頤。我買三十個喜餅，是打算每天上午半個下午半個，一天一個吃它一個月。不料才兩三個吃下來，肚子就撐不住了，不但影響到正常的一日三餐沒了食欲，而且拉起肚子來沒商量。白天黑夜拉個不停，屁股就像箍在馬桶上了退不下來，搞得屋子裏成天臭氣熏天。別的號子裏也都先後告急，一個個爭相拿馬桶出氣。也記不得那些發餅喜餅，最後是好歹咽進肚子裏過把嘴癮，然後再拉稀拉掉了，還是一直放著直到變黴後不得不忍痛割愛，直接丟進了馬桶，總之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這次「年貨大採購」的採購員胡管教小有收穫，他把裝糖的大號透明塑膠袋（二十斤裝）留下來裝被絮用。但他嫌一個袋子不夠，一個月後又主動來問我們，還想不想買水果糖。倒是有幾個還想買一點，但湊不起二十斤，胡管教就不願跑這個腿，以後也再沒有人提買食品的事了。聽說老魏因為擅作主張幫我們犯人買「年貨」，挨了上級的批評。我們都懷疑是那個王胖子撮的拐（湖北方言：意指說別人的壞話，撥弄是非，暗中使壞），因為大夥兒吃壞了肚子，找管教要止瀉藥的事被他知道後，他咬牙切齒地說我們是活該。

這是七二年春節前後的事情，是我們在獄中唯一的一次饕餮，以後再也沒有過這種大飽口福的機會。但我們還有過一段時間的「精神會餐」，也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後。那時有一陣子對我們的監視有所放鬆，我們都不是些好鳥，管得鬆一點就要放肆。我們開始大著膽子唱歌，先是小聲唱，慢慢就聲音大起來，而且站在窗子旁邊唱。一個人唱時，同一面牆的所有房間不管樓上樓下都聽得見，奇怪的是門外頭值班的班長明明聽見我們唱歌，也不怎麼干涉我們。

我所在的號子這一面朝南，樓上樓下除分別住著張志揚、馮天艾、蔡萬寶、嚴琳和我外，還有王盛榮、干毅、周嶽森幾個老頭子。老頭子們紀律性強，也可能是中氣不足，從來不參加唱的，我們幾個人則唱了一首一首又一首。你唱「蘇武牧羊」，我就唱「滿江紅」；我唱「三十里鋪」，他就唱「蘭花花」；還有什麼「夜半歌聲」啦、「梅娘曲」啦；「孟姜女」啦、「小白菜」啦；「大路歌」、「漁光曲」啦，盡唱老歌。大家搜腸刮肚，像打擂臺似的看誰的老歌唱得多。老歌唱沒有了就唱新歌，包括「毛主席詩詞」，但誰也不唱「語錄歌」——那不叫歌。

我們唱「我的祖國」，唱「草原之夜」，唱「紅梅贊」，也唱「花兒為什麼這樣紅」。然後又唱外國的，唱「三套車」，唱「山楂樹」，唱「紅河谷」，唱「我的太陽」。我們有天還想請王盛榮用俄語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但是早年留學蘇聯的「王老」不肯，說他老了，唱不出，但他願意聽我們唱。後來張志揚用俄語唱了一段，他醇厚深沉的男中音折服了我們每一個人，餘韻繞梁，大家為之陶醉。啊，多麼好哇，我們在牢裏唱外頭不讓唱的老歌和外國歌，而且是「這邊唱來那邊和」。回想起來，這是我們在牢裏最快樂的一段時光。

後來歌唱得差不多了，我們開始談話、拉家常。當然難免也談些與案子有關的事，比方說我就很想知道我被鐵山綁架後，外頭是怎麼對我展開營救的，哪些人參與了，營救失敗後我家裏人的處境等等。我們的談話引起了看守的注意，他們將這個「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報告了管教和軍代表。軍代表安排管教們晚上躲在窗子下面偷聽我們的談話，看有沒有什麼把柄可抓。我們聽見窗外的樹叢裏有聲音沙沙作響，那是偷聽的人在進入「前沿陣地」埋伏圈了；我們聽見草叢中的人在哈氣，那是偷聽的人被寒夜的涼氣凍得發抖了；我們還聽見有人凍得受不了，悄悄地在草叢裏跺起腳來。

我們於是不談別的，專講邱少雲埋伏在敵人眼皮底下時，被敵人的燃燒彈燒焦了身體也一動不動的英雄事蹟，意在激勵埋伏在我們窗子下的管教們，學習邱少雲烈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但管教們顯然不是當英雄的料，他們沒能堅持多久就堅持不下去了，紛紛從草叢中爬出來，對著我們的窗子大聲叫嚷：不許講話！不許講話！胡管教用他的麻城話說，狗日的不曉得這些反革命都在互相說麼

事？聽了半天，老子的雞巴都凍硬了，也有聽出個名堂。戴矮子則罵道是不是都不想活了？搞邪了還明目張膽地串起供來了！哪個再敢講話看老子整死他！

原來歌可以開恩讓我們唱唱，話卻是不讓互相講的，怕我們這夥人「串供」。其實我們之間的談話，談不上所謂串供或訂攻守同盟，因為我們在外頭的一切活動幾乎都是公開的，我們的觀點也都是寫成文章公開發表的，我們也沒有什麼黑後臺在背後操縱。總之，我們不搞陰謀，沒有做過任何見不得陽光的事情，我們比造假案的官方乾淨。而且該交代的我們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了，我們無供可串。但既然牢裏面的管教對我們之間講講話如臨大敵，我們也只好收斂一些。我們知道像戴矮子這種人，整起人來可不是好玩的，沒有必要自討苦吃。

不過積習難返，感到苦悶時，我們還是會情不自禁地站在窗子旁邊，與樓上樓下、隔壁左右聊聊天。有天晚上樓下住的嚴琳忽然問我有沒有女朋友？我說沒有。他說真的沒有？我說真的沒有，如果有我瞞你幹什麼？但是樓下另一間房裏住的蔡萬寶，卻突然插話說我有。我心裏一楞，倒是想到了一個女孩子。就聽見蔡萬寶說魯氏的女朋友是十九女中的，姓劉，是二輕局局長的姑娘。聽蔡這樣說我倒也無話可說，因為在外面時小劉對我的情有獨鍾，似乎大家都看在眼裏了，只是都不知道我並沒有領小劉的情。這時只聽蔡繼續說，這個小劉剛滿十八歲，瓜子臉、櫻桃嘴，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皮膚又白又嫩，一口氣都吹得破……蔡一張破嘴巧舌如簧，把小劉說成了天下第一美人。嚴琳就問他你怎麼把人家的女朋友觀察得這樣仔細？蔡也不理會只顧繼續往下說，說這個小劉對我如何崇拜，如何一往情深；在我被鐵山綁架後，如何急得寢食不安，如何為我眼睛都哭腫了；以及如何跟著大家四處奔走營救，如何成天陪著我的母親寸步不離，像親生姑娘一樣。還說我母親也非常喜歡小劉，把她當未過門的媳婦看待。蔡最後說小劉非魯氏不嫁，她在外頭是要等魯氏出來的。

樓上樓下的難友們聽了蔡的一番話，都恭喜我有福氣，我卻知道滿不是那回事。「九二七指示」下達後，與我有關係的人，個個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小劉受我的牽連，自己都不知道如何過關，她未必真

的會等我。而且蔡萬寶在「九二七指示」下達前就抓起來了，他又怎麼知道小劉會一直等我，所以蔡不過是在信口開河圖嘴巴快活罷了。特別是他把小劉美得天花亂墜，彷彿小劉長得真的就像宋玉形容他的那個鄰家女似的，「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施朱則太赤，敷粉則太白」，絕代佳人一般，叫我忍俊不禁。小劉當真美到那個地步，我不墜入情網才怪！

其實小劉不過一小家碧玉而已，過去在外頭還真不當她有如何如何好。這回聽蔡萬寶添油加醋地一講，特別是說到她為我眼睛都哭腫了，還有她成天像親女兒似的陪著我的母親的情況，都是我未曾想到的，使我非常感動。而且經蔡繪聲繪色地一描述，小劉的模樣在我面前竟活靈活現起來，水靈靈的一個俏冤家在我眼前趕都趕不走，整個晚上弄得我輾轉反側，睡意全無。第二天起床後，嚴琳問我晚上想小劉沒有？我說一夜無眠。這時只聽見蔡萬寶在他的房裏長歎一聲，說他也是失眠了一晚上。嚴琳就笑道魯氏一夜無眠那可以理解，你蔡萬寶為麼事也一晚睡不著呢？蔡無言可答，仍是歎氣，也不知他歎的那門子氣。也許在外頭營魯時，他見到小劉就被劉的模樣迷倒了，所謂情人眼裏出西施，小劉就是他眼中的西施。也就難怪他要把小劉形容成國色天香，現在談到小劉他自然也要失眠了。但不知小劉意識到他的單相思沒有？倘沒有，老蔡這位「情種」算是白癡情了一場。

但我的潛在「情敵」似乎還不止老蔡一個。有一次老魏把我叫到提審室去核實一份材料，說來也巧，還真是核實我和小劉的關係的，看來還真有人揭發我和小劉在戀愛。我從老魏口裏知道，小劉已下放到鄂西一個偏遠山區，接受所謂「再教育」快兩年了。老魏翻了翻手裏的一疊材料，問我和小劉是什麼關係？我說沒什麼關係。老魏說別打馬虎眼了，這材料上都揭發你們兩個可不是一般的關係。我說我不想隱瞞什麼，就是真有特殊關係也是我們兩人個人的事情。問題是我們之間確實不存在什麼特殊的關係，你要我怎麼交代？老魏說他明白我是想給那個小姑娘打掩護，沒有用的，人家自己都承認了，你還有什麼好說。我說她不可能承認什麼，如果她真的說我和她在談戀愛，甚至說我和她之間有過什麼，那好，我全認賬。老魏說不要鴨子死了嘴巴

硬，我現在就把她的交代念一點給你聽聽。

老魏翻了幾頁就念給我聽：「我對魯氏是有好感，但魯氏沒有反應。武大的楊秀林倒是對我有那麼個意思……」到此老魏就不再念了。我就說怎麼樣，是楊秀林對小劉有意思嘛，怎麼不去問他倒來問我？老魏就笑起來，說你們這些男孩女孩就是戀戀愛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不過隨便問問，你緊張什麼？再說，你們這些小夥子大姑娘成天在一起混，互相捏一捏摸一摸，摟摟抱抱也是難免的，裝什麼正經？我說我們之間從來都沒有捏過摸過，更沒有摟摟抱抱，你不要以為我們這些人在外頭都是亂七八糟的……，老魏呵呵大笑道不要說了，不要說了，你們這些人我還不知道……哈哈。笑得頭只朝後仰，笑過後就讓我回號子。我離開提審室時忿忿地想，你老魏知道個什麼？你知道個哈欠。

回到房間裏就一直想提審的事，老蔡對小劉單相思不說了，原來楊秀林也在打小劉的主意。這麼多人喜歡小劉，我卻一直蒙在鼓裏渾然不覺。想起來小劉對我那樣癡情，我卻冷冰冰地對待她，真是混賬的很。我就想起「七二〇」後在省歌劇院的那個晚上，小劉好像就坐在我的對面，正含情脈脈地望著我。我那時真傻，怎麼竟一點都不曾動心呢？怎麼就對眼前這位情竇初開的花朵般的少女無動於衷呢？唉！此刻我多麼想再見到她，向她傾訴我對她的思念。我要把她摟抱在我的懷裏，撫摸她烏黑的長髮，我要吻她甜蜜的雙唇，舔她滑潤的頸項，我要讓她和我……我想入非非，情不能禁。我知道我完了，我的心靈再也難得平靜。過去的日子雖然痛苦，但至少還平靜。現在平靜沒有了，卻添加了痛苦，思念的痛苦。我這是為什麼呀？都怪那個該死的蔡萬寶！

我不知道那個烏鵲嘴的老蔡是不是還在害他的單相思，但是有一天聽蔡說他吐血了，而且吐得很厲害，大口大口地吐。蔡大概不是害相思吐的血，他得的是肺病。他其實是苦出身，從小就營養不良，病根早就種下了，坐牢這幾年營養太差，於是舊病復發。監獄見他吐血，也帶他去醫院看過大夫，給他吃治肺病的藥，甚至破例准許他買牛奶和雞蛋等營養品。然而無濟於事，蔡照吐不誤，據胡管教說他吐起血來用臉盆都接不贏，好嚇人的。

過了兩周，監獄見蔡病情沒有好轉，且有繼續惡化之勢，擔心他死在牢裏不好交代，遂從「革命的人道主義精神」出發，讓蔡的父母來接他保外就醫。來接的頭一天，管教就通知了蔡，於是我們全體「同案」也都在晚上的「窗前聯播」節目中得悉了這個消息。大家都恭喜他提前出獄，但是蔡說軍代表說等病治好了還得收監。蔡似乎並不領獄方許可他保外就醫的情，說獄方這樣做無非是甩包袱，但我們還是一致認為能出去總比關在這裏面強。我們祝願他出去後能早日康復，但嚴琳說病好了又得重新進來，還是悠著點慢慢治吧，如今這肺病又死不了人。大家認為嚴琳說得也有道理，只是這道理道得太殘酷了一點。後來大家又紛紛托老蔡出去後如有機會能到各家走走，把我們的近況給我們的家人通報一下。老蔡自然是答應得很爽快。末了我又特地請蔡想辦法找到小劉，替我轉達我對她的思念。我要蔡告訴小劉我的案子的真實情況，讓她知道我的問題並非像外頭傳的那樣嚴重，我希望她能等我出來。蔡也是滿口答應。

第二天下午，我們聽見蔡住的那間牢房的門打開了，過了一會就聽見蔡喊了一聲再見囉，算是和我們道別。一陣紛雜的腳步聲後，整棟樓重歸於寂靜，只有值班的班長在過道裏來回走動的嚓嚓聲。我們呆在各自的房子裏，都在想像中跟著老蔡「回家」：我們見到父母了，我們又能享受天倫之樂了，能吃到可口的飯菜了，能看很多很多的書，能讀很多很多的報，還能看電影、逛公園，呼吸到自由新鮮的空氣，甚至能和自己的心上人壓馬路了。這種自由的生活是多麼叫人留戀，又是多麼令人嚮往啊！我覺得這世界上真的沒有什麼事情比自由更加可貴。如果有一天我能牽著心愛的姑娘的手，深更半夜在寂靜無人的大馬路上安閒自在地徜徉，我會認為我是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唉，我會有這一天嗎？

在二監獄這段日子時間過得比較快。這期間外面的世界發生了許多大事件，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恢復了，中美在上海發表了聯合公報，中日邦交正常化等等。正所謂「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但對我們問題的處理似乎仍是遙遙無期，我們對此也無可奈何。不過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還是為國家的進步、強盛、國際地位的提高而歡欣。我只是不明白，中日邦交正常化，我國政府為何要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請教於老魏，老魏回答說為了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

好下去嘛。他說當年國民黨政府都沒有要日本人賠償，我們難道還不如老蔣的姿態高？再說要日本賠償的話，那個負擔還不是由日本人民來承擔，我們要搞國際主義嘛。這是毛主席周總理從中日兩國人民的長遠利益出發，作出的英明決策。只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站得高看得遠，一看就看到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這個大題目上了，犧牲一點點戰爭賠款是算不了什麼的。

我聽了老魏這番高論還是似懂非懂，心想不是老說國民黨賣國求榮麼？怎麼在戰爭賠償這個問題上，又拿國民黨當榜樣？特別讓人搞不明白的是，自己的國民還是一窮二白、缺衣少食，居然憐憫起比我們富裕得多的日本人民，生怕日本人因戰爭賠償吃了苦，可怎麼不想我們中國人八年抗戰中吃了多少苦、死了多少人，多少人家破人亡。政治家們不知道是怎麼想的，一提邦交，國仇家恨全沒有了，似乎對日本人的感情超過了對自己國家的老百姓的感情。後來出獄後倒是看到一份《報刊文摘》上披露說，「中日恢復邦交時，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率領日本政府代表團訪華，據說擬備40億美元的戰爭賠款。毛說，要什麼戰爭賠款？日本人不侵略中國，我們早叫蔣介石吃掉了。我早就對日本公明黨、社會黨的朋友們講過了，作為共產黨，我們要感謝日本軍國主義呢！」這大概就是政治家考慮問題的方式吧，我們哪裏能夠搞得明白呢？

看來政治這個東西太玄奧，一般人是不會從這種政治中看出什麼名堂來的。那些搞政治的「政治家」也巴不得老百姓唯上唯書，認定只要是上面決定的，就是經過了深思熟慮的好東西，不必用自己的腦袋去想想上頭決定的事情是否真有道理。「政治家」們推行愚民政策是頗見成效的，即使是林彪事件之後，這種唯上唯書的思維定式仍然統治著多數「愚民」的頭腦。正是由於「唯上唯書」的傳統觀念並沒有真正解決，當廣州的李一哲寫出《關於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思考》，向獨裁和專制提出挑戰時，多數人還是把這少數「先知先覺者」視為「異端」。這種社會現實決定了我們的問題還不可能得到實事求是的解決，牢還得坐下去。

不過與武昌那邊相比，我倒是情願牢就在這裏坐。離家近是個原因，最主要的是這裏監管得比較寬鬆。我們這些人放風可以一起放，

可以互相談談話，這在武昌那邊是不可想像的。在這裏我們也不必剃光頭，多少還保持了一點做人的尊嚴。伙食方面和武昌差不多，雖不像武昌那邊每個月保證有一兩次肉吃，但平時菜裏看得到一點油水，比武昌那邊碗裏半點油水都刮不出要強些。說到吃肉，我們這裏常常是「三月不知肉味」。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十分羨慕牆那邊看守所的犯人，聽說那邊只要碰到槍斃人的事，當天中午全所犯人就要打牙祭。而那個年頭槍斃人是經常的事，犯人們托那個挨槍子的人的福，就經常的有肉吃。可我們這批人不屬看守所管，我們就沾不了死人的光，所以吃肉對我們是很稀罕的事。

有一回過五一節，蒙恩有點肉吃。聽見胡管教開了干毅那間屋的房門，叫干毅出來拿飯。胡管教大呼小叫地對干老頭說，你看你看，又給你們吃肉了！你們這種反革命分子在這裏麼事都不做，政府逢年過節還給肉你們吃，把你們養得白白胖胖的，你們還不好好感謝政府，還不好好改造你們的反動思想！干老頭自然是雞啄米似的點頭，一連串的「感謝感謝」，「改造改造」地答應著。可他真會感謝政府嗎？感謝政府把他無緣無故地關在這不見天日的牢裏麼？如果吃牢飯吃出了幾片肉就要感恩戴德，那麼關在豬圈裏過豬的生活，像柏拉圖說的，做一頭「快樂的豬」，就應該是人的最高理想了。

其實和豬相比，豬至少能吃飽，而我們卻總是感覺餓。記得有段時間老吃窩窩頭，窩窩頭是蕎麥做的，發不起來，三兩一個只拳頭大小，幾口就沒了。有天開飯時就聽見隔壁的嚴琳問胡管教，怎麼每餐就這一個窩窩頭？胡管教說你還想要兩個不成！嚴琳說總得讓人肚子裏有點貨吧。胡管教說你們肚子裏面的反動貨多得很，還想要麼事貨？嚴琳說我也不過是想稍微吃飽一點嘛，又不想要什麼好東西。胡管教說還好東西呢？我看你只怕還想吃人參燕窩哩！其實我們這些人飯都難得吃飽，哪裏會有這種奢想呢？事實上我在看守所十多年裏，莫說人參燕窩，正經連西瓜都沒有嘗過一瓣。

有一年夏天天太熱，看守所有天開天恩，發了我們每人兩個番茄「解暑」。還有一回，也是夏天，一位班長要交班了，忽然打開我的房門上的梭窗，對我說他水壺裏的清涼飲料還沒有喝完，剩下的問我要不要？我當然說要，於是拿缸子來裝了喝，這也是我十幾年中喝的唯

一一次稱得上「飲料」的東西，算是破了回天荒。我在寶豐路監獄住的是樓上靠樓梯的一間屋，一上樓左數第一間。有時候管教發飯從右邊一間發起，最後發到我這間時把我的菜打過後，倘菜桶裏的菜還剩出一些，可以都倒給我。有一回茶缸都裝滿了，桶裏還有不少的湯水，我索性把臉盆也拿過來裝。從這裏也可以看出我們這些人當年對食物的饑渴到了怎樣的地步！如此饑不擇食，可謂是「斯文掃地」。可是在那個地方為了一點吃的東西，哪裏還顧得上什麼「斯文」？

再說蔡萬寶的病在外頭治了一年總算是治好了，他在外頭是怎麼過的我們不清楚，反正他病一好就又回到了監獄。聽老蔡重新收監後講，他在外頭這年把時間裏，派出所和街道的人對他監視得很緊，除了去指定的醫院看病，他哪裏都不敢去。所以他曾經應許我們的事情，一樣也沒有能夠辦到。老蔡好不容易「保外就醫」，小心一些自然是應該的，沒敢到我們這些「同犯」家通報一下情況情有可原，我們也沒有理由怪他。

但大家心情都倍感沉重，因為從老蔡放出去又收進來這件事上，似乎能看出上頭短期內根本沒有解決我們問題的意思，像這樣長年累月地關著何時才是盡頭？人的承受力是有限的，看守所不是用來無限期關押人的。無限期關下去，就是想把人從身體到意志都摧垮，把人關成個廢人。事實上長期關押已經顯示出可怕的後果，除老蔡肺病復發之外，更嚴重的是有兩個人精神已經出了問題。

精神出了問題的一個是周凝淳，一個是田國漢。周其實什麼問題都談不上，就只是提出過一個「十年一大變」的觀點，意思是說每隔差不多十年，歷史總會有一個較大的變動。專案組硬說他是在鼓吹資本主義復辟，是妄圖變天就抓進來了。周的父親解放前是武漢火柴廠的老闆，家庭殷實，有過小少爺經歷的周生性脆弱，性格內向，他下圍棋的腦袋瓜子又特別敏感，無緣無故遭此牢獄之災自然受不了。自入獄後周一直沉默寡言，鬱鬱寡歡，大家一起放風時，他也從來不和人說一句話。後來就成天一個人自言自語，好像是說有人打他，內臟被打傷了。再後來就聽管教罵他，說他不講衛生，從來都不洗臉洗腳，還吃自己的屎，是個臭不可聞的畜生。管教從不進他的房，嫌他房間臭，換馬桶時常常一邊罵一邊用腳踢他，把他當條狗。

有一天閑過晚飯後管教到我房間來，說周拒絕吃飯，要我進他房間給他餵飯。我一進他的房間，就覺得房內臭氣熏天。我察看了一下，發現他床上到處都是乾屎，一坨一坨的散發出極刺鼻的惡臭。不知他是真的挨過打，還是妄想中有人打他。他神志不清，大概以為人的內臟被打傷了，吃自己的糞便可以療傷，就儲存並食用起自己的大便來，不然不知道怎樣解釋他「嗜屎」的怪異行為。但是監獄不送他去精神病院治療，卻說他裝瘋賣傻，與無產階級專政對抗，結果他的瘋病自然只能是日甚一日。看著周瘋顛的樣子，我心裏十分難受，便勸他吃飯。他不吃我便用勺子餵他，但他吃一口吐一口，我也沒有辦法。管教見他堅持不吃，就問我吃不吃？我說吃。房裏臭得呆不住，我就把飯拿回自己的房間吃。不料一口飯扒進嘴裏滿口是沙，根本無法吃，我才知道周為什麼吃一口吐一口了。可憐他連說話保護自己的能力都喪失了，怎麼會瘋到這個地步？他以前可是個冰雪聰明智商過人的圍棋高手呀！

再說田國漢。老田是老工人，又是老黨員，文化其實並不高，因為是印刷廠的造反派的頭，被推為工人戰鬥隊的宣傳部長。老田和我們很熟，特別是和馮天艾的關係非常好，我們印《揚評》他確實給過我們許多幫助。但平心而論，老田對我們在《揚評》上發表的文章是有顧忌的，認為我們的觀點是不是太「左」或太超前了，發表出來會不會惹禍。可他又太相信我和馮天艾，認為我們兩個江城造反派公認的「紅衛兵闖將」思想敏銳，理論水準高，對中央的精神領會得深，不會犯什麼大錯誤。何況文革中紅衛兵小報多如牛毛，從來都是文責自負，所以儘管不大放心，總還是給我們印報開方便之門。

後來「北決揚」出了問題，老田也被捲了進來。可他一直不服，不承認自己是「反革命」。他說他沒看出《揚評》的文章是打著紅旗反紅旗，他是水準低，屬於認識問題，不屬於敵我矛盾。他說他是老工人、老黨員，解放前受壓迫，解放後得翻身，對黨對毛主席有深厚的階級感情，絕不會反黨反毛主席。可是沒有人信他的話，軍代表和管教先還反駁他，說是不是反黨反革命不由自己說了算。後來見他成天纏著他們訴說他的觀點，就懶得反駁他了，倒是盡量避開他的糾纏。而老田卻著了魔似的，越發堅持要澄清自己的罪名。只要有人問他的

門，他就要纏著那人申訴他的冤枉。開飯時是這樣，倒馬桶時是這樣，放風時就更是纏著軍代表不放。他也說不出多的什麼，就只知道說他是老工人、老黨員，不是反革命，對黨和毛主席是有感情的……差不多就像《祝福》中的那個祥林嫂了。

軍代表和管教早已厭煩了他的叫冤，一聽老田說他是老工人老黨員就熊他說，知道知道，你不是反革命，你對黨和毛主席是有感情的，你受冤枉了。但是冤枉了怎麼還把他關在這裏呢？老田弄不清楚。那個戴矮子往往捉弄老田之後還不滿足，還要把他銬起來折磨一番。老田愈來愈糊塗，不管白天黑夜、屋裏屋外、有人無人，他都口中念念有詞，翻來覆去地訴說他的冤枉。老田終於完全精神失常了。

眼看著昔日的同伴從一個好端端的人被關成了瘋人，我們這些還沒有瘋的，心裏真是百感交集，我們感到痛苦和恐懼。尤其是我，不但痛苦和恐懼，而且十分內疚。如果不是主要因為受我的問題的牽累，他們這些隻言半語的「惡攻」言論都沒有的無辜者，怎麼會落到今天這種地步，我有愧於他們。特別是老田，他曾多次提醒我寫文章要把握分寸，多次勸告我要早點回學校復課。可是我沒有及時聽從他的勸告，自己倒楣不說，還把他也株連進來，我好後悔、好難受。看見他瘋瘋癲癲地成天自言自語，我心如刀割。他有老婆有孩子，孩子還小，一家人靠的是他這根頂樑柱。他如今關在這裏，又瘋了，他們一家今後怎麼辦？唉，在他們面前，我是個罪人哪！

自從小周和老田精神失常後，我們就不大說話了，放風時也各放各的，偶爾交談幾句也言語不多。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有次聽張志揚說他在學德語，書是原來在家裏時就有了的，老魏讓送進來了，同時送進來的還有一套上下冊的《西方美學史》，也是原來買的。他還想讓他愛人幫他買些德語方面的參考書和德國古典哲學方面的書，但他愛人跑遍武漢三鎮的大小書店都買不到。書店裏幾乎沒有什麼書賣，櫃上櫃下全是清一色的毛主席著作。我低聲地請教他說，難道人類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就這樣在我們中國絕跡了嗎？張搖搖頭說不會的，不可能。他說眼前的一切都只會是暫時的，中國總有一天將迎來自己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他這樣說時神態是異常堅定的，他潛心於哲學研究多年，通曉歷史發展的辯證法，有理由對人類文明的未來滿懷信

心。十多年後，當他以學者的身份站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的學術講壇上，用德語宣讀他的哲學論文時，他的思緒會偶爾回到當年獄中的放風場上麼，他還記得他對我說過的那句話嗎？

是的，石在，火不會滅。我相信幾千年的傳統文化，終究不會在我們這代人手裏滅絕。我們這個有著悠久文明歷史的古老而又年輕的國家，終將迎來她的文化復興。只是，我們這些人還能等到那一天嗎？我們羸弱的身體能健康地堅持到出獄的日子，我們的精神能堅強地支撐到自由的來臨嗎？我們的同伴已經不止一人精神崩潰了，在今後那些看不到頭的叫人發瘋的獄中歲月裏，時時刻刻都會有一個恐懼的念頭折磨著我們：下一個將輪到誰？

下一個將輪到誰？面對這個雖然殘酷卻避不開的問題，我們不寒而慄。

七三年三月份，軍代表向我們宣佈我們住的這棟樓將另作它用。我們中間有一部分人會留在二監，分配到監獄屬下的看守所分別關押，還有一部分人則將轉移到另外的地方。幾天後我和馮天艾、張志揚、甘勇，還有王盛榮、周嶽森和干毅這幾名「黑後臺」集中轉監。我們一行被押上一輛囚車，在天黑之後離開住了三年的寶豐路監獄。蒼茫夜色中我們被送過了長江。

## 第二十二章

# 三十形銷而骨立

我回到了闊別三年的省一監獄看守所。

仍然還是那幢黑瓦青磚的兩層樓的樓房，但牆壁上曾經用紅油漆刷上的那些「毛主席語錄」再也見不到了；住的仍然還是那麼個狹小的囚室，不過室內白色牆壁離地一米高的地方塗成了綠色；還是那麼多的清規和戒律，不過放風時再沒聽見犯人集體唱毛主席語錄歌；還是一日三餐少鹽寡油的飯菜，但一月又能吃到一次肉，且肉的分量也讓你一次能管夠；還是那些幹部和管教，但馬軍代表回部隊去了。謝天謝地，老馬頭走了就好。接替他的是一個姓張的，聽說原是省革委會警衛營的頭頭，一年前調來看守所當所長。張所長四十多歲，河南人，個子矮壯，虎額豹眼，臉上鬍子拔岔活脫脫一個猛張飛再世。張所長雖然外貌粗魯，對犯人倒也不是很凶。他成天背著手臂從號子的一頭踱到另一頭，從小窗外看看號子裏頭的情況。

有次我母親和姐姐給我送東西來，是這個張所長接待的。他讓我家裏人在他辦公室裏候著，由他到號子來把東西交給我。他一邊等我在清單上簽字，一邊說些教訓我的話。他說我母親生我姐姐這麼好個文雅溫順的女兒，怎麼就生我這麼個膽大包天的兒子。還說什麼一娘九種，非龍即蟲。又責備我上了大學卻不好好讀書，瞎造什麼反，弄到如今這個地步，辜負了父母的培養。我連連點頭，趁機提出可否讓我和母親姐姐見上一面？張所長搖頭連說不可。我又提出可否讓我家裏人給我送些書看？他想了想，說那需要向上頭請示。

後來他告訴我可以寫信讓家裏送書，只要是不違禁的書，原則上

都可以送。他還說他是電話請示了省裏的一位老首長的，不然他還作不了這個主。我自然是大喜過望，同時非常感激省裏的那位不知名的「老首長」。我立刻給家裏寫信，要我家裏把一套《辭源》，還有四冊港版的*Essential English*給我送來。這套《基礎英語》讀物是一個英國人為外國學生編寫的，圖文並茂，是那時國外非英語國家流行的英語教材。這套書還是我在大學時，田徑隊一個叫張鵬的高年級同學轉讓給我的，但一直沒有時間讀它。在監獄裏有時間了，想把這套書好好地學一學。以前在寶豐路監獄也要過這套書，但老魏見是港版的，不讓看。現在上面鬆了口，當然不能放過機會。此外我還向家裏要了不少書，都是文史方面的。

信發出後不幾天，家裏就把我要的書送來了。除三本《辭源》（民國22年即1933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上下兩冊，加上一冊「補遺」）和四冊《基礎英語》外，還送來了一本解放前出版的《英漢雙解模範詞典》，以及一部《史記選》和范文瀾編的《中國通史簡編》第一第二冊，是母親從她學校圖書室借的。看著這麼多的好書，我實在是開心極了。精神上有了依託，日子不至於白混，坐牢也不算虛度光陰。每天起床後用過早飯，我就端坐在小木桌前開始讀書。我給自己安排了一個學習時間：上午學《基礎英語》，下午讀《辭源》，晚上看其他書籍。這個時間安排，我每天除非碰上提審決不改變，用過去學毛著時的時髦話說，叫「雷打不動」。

我學《基礎英語》是從第二冊學起，第一冊太簡單，瀏覽一遍就行了。我翻開第二冊第一課，那標題是“*The Priestleys' House*”（布利斯特萊家的房子）。我於是走進這座位於倫敦郊外的房子，加入進布利斯特萊先生的六個學生中間，聽這位老師講課。這六位學生分別是四個男生皮得羅、奧尼弗、簡、霍普和兩位女生伏麗達、路易絲，在很長時間裏他們成為與我朝夕相處的朋友，陪我度過了許許多多的白天和黑夜，並且幫助我在英語學習上有了長足的進步。感謝寫了*Essential English*的那位Eckersley教授，他的書給了我這個遙遠的東方的牢房中的囚徒何等的快樂和喜悅啊！

這套書給我展示了豐富的西方世界的文化和歷史，時而引導我走過倫敦的大街小巷，時而帶著我訪問大文豪莎士比亞的故鄉；它讓我

拜讀了大作家狄更斯的小說「大衛·科伯菲得」的精彩片段，領略了大詩人密爾頓的不朽詩篇；這本書還把我帶到三百年前倫敦的那次可怕的瘟疫和大火之中，又帶引我和探險家斯科特一起遠征南極，讓我悲痛地目睹了斯科特和他的英勇的朋友們凍死在那個暴風雪的晚上；我甚至還跟隨中古傳說中的那位亞瑟王和他的圓桌武士遊歷四海，尋找耶穌在最後的晚餐中飲用過的聖杯……

讀這套書，就像是在文化和歷史的滄海裏遨遊浮沉。如同書中那位漂亮的小姐路易絲在課程結業後給老師的信中說的，“Life's not too bad here, in fact I am having a wonderful time”（在這兒生活並非太壞，事實上我在這裏度過了一段快樂時光）。不僅是「度過了一段快樂時光」，我通過學習這套書獲得的英語水準上的提高，對於我出獄後的求職和在外企中工作都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另外一部讓我受益匪淺的書就是《辭源》。它汪洋浩瀚，包羅萬象，博大精深，有叩必闇，簡直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百科全書。這部書擺在我家的書櫃裏塵封多年無人問津，現在正好為我所用，派上了大用場。但讀《辭源》也有個大問題，就是書上印的字是螞蟻大小的七號字體，偶爾查查個別辭條還無所謂，要是把它天天當書讀，那眼睛可是受不了。可是《辭源》這部書好不容易才送進來，我豈能輕言放棄！

得想個辦法，書要讀，眼睛也要不吃虧，要兩全其美。想來想去，唯一的辦法就是用放大鏡。但看守所裏是不准許用放大鏡的，據說是防止犯人利用放大鏡聚焦點火。其實這種擔心是多餘的，因為犯人真要想點火，搓舊棉絮就能辦到。而且有些老年犯人用的老花鏡就有聚焦功能，你總不能不准犯人不用棉絮，不用老花鏡吧。我決定好歹試一試，向所裏提出買個放大鏡的要求。但必須有個藉口，以讀《辭源》為理由斷斷不行，理由要盡量冠冕堂皇。

我就找季幹部，說這幾年視力愈來愈差了，也無法外出重配眼鏡，現在毛選上的字都不大看得清楚。為不影響學習改造，請求所裏讓我家裏給我送把放大鏡來看書用。見季幹部有點猶豫，我趕忙說要是所裏有什麼顧忌，我願意調一間朝北的沒有陽光的房間。季幹部想了想說，那倒也沒有必要，放大鏡的事我們研究一下吧。

過了一天，老季通知我說可以讓家裏送個放大鏡來。我連忙給家裏寫信要，不幾天家裏就給我買了隻放大鏡送來。為了方便閱讀，我用兩個牙膏瓶蓋子、一個墨水瓶蓋子加上一個大一點的藥瓶蓋，巧妙地拼裝成一副「孟」字形狀的放大鏡的座架，放大鏡的柄就套在座架最上面的一個打通了的牙膏瓶蓋上。這樣，我把帶座的放大鏡擋在《辭源》的書頁上，就可以方便地閱讀了——不僅可以輕鬆地讀書，還可以騰出手來作筆記。有一段時間看守所對筆和紙的使用控制得較鬆，便也以學習毛著為由，要來了鋼筆和筆記本，這樣我就對《辭源》裏我認為有用的辭條作了大量摘錄。

一兩年下來，我把《辭源》一字不漏地通讀了兩遍。兩次通讀的過程中，我所作的摘錄不下十萬字。中國古代的經史子集中出現過的重要辭條與典故，通過閱讀《辭源》，我都不再生疏。可以說這兩次閱讀極大地豐富了我在中國古典文化方面的知識，使我對於中國傳統文化有了一個較全面的認識。如果不是坐牢，我哪裏會有時間和耐心兩次通讀《辭源》這樣上千萬言的煌煌巨著呢？這也算是坐牢給我的一份不薄的饋贈吧！

有段時間晚上我主要讀《史記選》，同時對照著讀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恐怕沒有必要比較古今這兩種歷史著作的優劣，二者幾乎是不可比的。如魯迅先生所言，《史記》乃「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絕唱」響過近兩千年了，後世小子誰敢在司馬老前輩面前哼聲？范文瀾雖號稱黨內著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也實難與司馬老先生比肩。不過平心而論，《中國通史簡編》中收集的相當翔實的史料，對研究中國歷史還是非常有益的，只要你不囿於書中那套「以階級鬥爭為綱」、以農民起義為「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的教條，那書也是值得一讀的。讀《史記選》和《通史簡編》，於我可謂開卷有益。我讀過這兩本書的開首幾章後，對中國的監獄制度的起源有了一個大致的瞭解，而這正是我早就渴望瞭解的東西。

從《史記》和《通史》中知道，遠古「結繩紀事」時的先民是不知監獄為何物的，只是到了堯舜時代有了刑典之後，才對於社會上的「危險分子」開始使用或流或放或殛或鞭等等刑罰。如流共工於幽陵、放灌木兜於崇山；遷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但好像還沒有把人「囚禁」於

「牢」的記錄。到了商紂王時，便有「囚西伯裏」之類的記載了。《周禮》中更有了關於牢獄的明確的文字，所謂「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納之」。夫「圜土」者，即獄之謂也。最初大概是像《封神演義》中寫的那樣「畫地為牢」，圈子外有人把守。但犯人容易逃逸，於是「築其表牆，其形圜也」，便是最早的牢獄了。那牢房圓筒似的，大概有點類似抗戰時日本鬼子的炮樓吧，不過我無心對此作進一步的考證。

我關心的是那時的犯人在牢獄裏的自由度。從「文王拘而演《周易》」，「韓非囚秦，《說難》、《孤憤》」這些文字來看，犯人在獄中似乎還是有讀書和著述的權利的。犯人權利的每況愈下是後來的事。到了清代大興文字獄，那些不幸被網在文字獄中的文字犯或思想犯，想必是被剝奪了讀書寫字的權利的。誰要你竟敢挖苦大清統治者「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那就讓你牢裏面連書的毛邊也翻不成！

我們中國歷來的統治者都善於「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將讀書人長期單獨監禁又剝奪他閱讀的權利，那就更是將人逼入絕境。看守所原來那個老馬就是忠實執行這種虐殺政策的精神屠夫，寶豐路那邊的那個王胖子也一樣，倒是老魏這樣的人人性未泯，多少給了我們一些閱讀方面的通融。林彪垮臺後，我們在牢裏閱讀方面的條件有了改善，我才得以讀到《辭源》、《史記》和 *Essential English* 這類書籍，我的單監生活才不至於無法忍受。是閱讀給我打開了一個讓思想衝出牢籠的天窗。

然而就在我沉湎於讀書，在知識的海洋中遨遊時，看守所突然組織全體在押犯人從事起生產勞動。據說這是學習其他地方的經驗，更有利於犯人的思想改造，於是看守所安排我們就在各自的號子裏做毛刷。號子裏的小木桌上裝了開有U字形的木頭樁子，將打好一排排小圓孔的木板或竹板，插在樁子的U槽裏卡牢，就可以把棕毛用尼龍繩穿進小孔內製刷了。

棕毛分植物棕和豬鬃兩種，用植物棕做的一般是工業用的大刷子，活好做，但棕毛本身很髒，一天生活做下來，鼻子耳朵裏灌滿了乾泥巴似的植物粉塵。用手捧點水吸進鼻孔再噴出來，噴出來的水都是黑乎乎的。做豬鬃刷比較乾淨，但豬鬃短而且細，抓鬃時不易控制分量。豬鬃抓少了扎不緊，抓多了又扎不進去，比較麻煩一點。做刷

子扎棕毛的尼龍線或尼龍繩，是一團一團捲好拿進號子的。這種尼龍繩比犯人自己用爛布頭搓成的繩子不知結實多少，要是被那個老馬看見了，不知他會不會說看守所是在給犯人們提供「越獄暴動」的工具？在押犯人也都願意參加這種勞動，在號子裏做點力所能及的手工活一來好混點，二來糧食定量也增加了好幾斤，何樂而不為！

自從事手工勞動後，看守所大約有了不少計畫外的收入，犯人的伙食有所改善，差不多每個禮拜可以吃次肉。有回晚飯加餐，每人一小碗紅燒肉。晚飯後有任務要趕，據幹部說要做的這批鬃刷還是外貿訂購的「出口產品」呢，必須連夜趕出來交貨。我們當然只好加班加點的幹，一直做活做到半夜鐘轉點。外貿的車子早在門外頭等著了，我們就從各自的號子裏把做好的刷子往外頭抱。我也抱一堆刷子來到屋外，這是我幾年來第一次晚上外出，那是個秋天的夜晚，天又高又藍，湛藍的天空裏綴滿了晶瑩的星星。星光閃爍，星漢燦爛，多麼美麗的夜空啊！夜裏的空氣也非常清新，深深地吸上幾口簡直令人陶醉。可惜如此美好的夜晚不是屬於我們這種犯人的，我們得馬上回自己的號子去。

回到號子清洗了一下正準備睡覺，忽然聞到門外頭肉香撲鼻，幹部親自推著放了個大桶的小車子，挨著號子給犯人發「宵夜」的肉湯。我也得到一大碗肉湯，外加兩個豬肉餅。晚飯時吃過肉本來就口乾，就用肉湯來解渴。結果無異於飲鴆止渴，肉湯愈喝愈口乾。雖然是大快朵頤，肚子都漲圓了，可躺下不多久，那剛剛喝下肚的肉湯和剛剛吃下肚的豬肉餅就開始發難，在肚子裏翻江倒海，鬧起「張羽煮海」來。哇，可是不得了，胸口裏面像有團火在燒。那些肉食的熱量加起來不知有多少卡路里，似乎一起在身體內燃燒起來。第一感覺就是要喝水，要水來救肚子裏的火。可晚上發的一杯開水早就喝光了，哪裏還有水喝！平時晚上口渴得厲害時，用牙膏也能解一下，可今天不一樣，擠點牙膏在嘴裏根本不管用，肚子裏的火必須用水龍頭澆。

我只好敲門向班長要水喝，這時只聽見各個號子的人也都不約而同地敲起門來，砰砰梆梆像敲非洲鼓似的煞是熱鬧。犯人們一面敲門一面大聲喊「喝水！喝水！」，「開水！開水！」那時候還沒到費翔走紅的時代，否則犯人們說不定會針對那碗肉湯，一起唱起那首「你就好像

一把火！一把火！熊熊火焰燃燒著我」的歌來。幹部聽了班長的報告，很體察民意的，讓伙房燒了一大桶開水，解決了大家口乾的問題。

做刷子既容易混日子，又能夠吃飽飯，還能夠喝肉湯，似乎是好得無可挑剔。但我們從事的勞作，屬於一種技術含量極低的簡單勞動，成天就是無數次地重複抓棕、扎毛、穿線、收緊幾個簡單動作，枯燥至極。這種枯燥的熟練勞動是非常累人的，這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早有過精闢的論述。而尤其使我感到苦惱的是，成天從早到晚地做刷子，實際上等於剝奪了我讀書的時間。我不幸淪落在這看守所裏，讀書成為上天對我受苦給予的補償。我不能為了一碗肉湯，放棄這個極其寶貴的賞賜。一旦我有幸走出監獄的大門，我應當是一個通過讀書增長了大量知識的人，而不是一個可以憑做毛刷糊口的製刷匠，不然我這個牢真的白坐了。

我於是大膽向季幹部要求只參加上半天勞動，下午的時間我需要用來學習。老季請示所長之後，准許我只做上午半天活，但原先增加的糧食補貼要減一半。我自然沒意見，定量少點沒關係，有時間讀書就成。不過看守所裏這個「生產自救」沒搞兩年就收了場，大概是上頭不讓搞。畢竟看守所和勞改隊不一樣，看守所裏的「犯罪嫌疑人」的主要任務，是「反省」和「交代」，是搞清楚問題，而不是搞生產。

後來聽說關在另外號子裏的馮天艾、張志揚那期間也都先後提出過給半天時間讀書的要求，也都一一得到了幹部的同意。看來看守所的幹部還不是那麼不近人情，特別是那個張所長，因為如果他這關過不了，我們再怎麼提要求也沒有用。這位張所長後來還同意所裏幫我們到書店買書，讓我們把書單交給一個姓苟的雜役，由他外出採購時幫我們買來。

看守所裏做活的雜役又叫外勞，一般都是些判了刑但刑期較短的勞改犯，由他們擔當看守所裏諸如做飯、買菜、做衛生、倒馬桶之類的雜活。這位姓苟的雜役入獄前是個江湖的遊醫，懂一點醫術，單獨住間號子，晚上總在看醫書，什麼「湯頭歌」之類的中醫口訣，倒是背得滾瓜爛熟的。犯人有個頭痛腦熱，都是由此人看病開藥。苟似乎會拿點脈，用兩個指頭放在病人的手腕上，腦殼歪著，眉頭皺著，雙目微閉，翹著個二郎腿，人模狗樣還真像個大夫的樣子。苟也

會點針灸，吹牛說隔著棉襖他也能將針扎進穴位，可誰也沒敢讓他試過。

聽他自己說他家是祖傳的世醫，說沒有幾代的家傳，誰敢坐堂治病？治死了人可是要坐牢的。不過我懷疑他自己就是瞎治病把人治死了坐的牢，他的話正是夫子自道。我們就管這位姓苟的遊醫叫狗皮膏藥。看守所裏除了我們這幾個政治犯，其他犯人很少有要求買書的。狗皮膏藥見我特別喜歡買書，而且從家裏要了幾本我姐姐讀過的大學教材《實用內科學》和《中醫學概論》看，大概以為我對醫學也有興趣，就慫恿我買一套線裝本的清代乾隆年間編著的《醫宗金鑑》。說這套書如何如何的好，如何如何的有價值，如何如何的權威經典，是中醫學方面的扛鼎之作。我說我買這套書幹什麼呀？我又不是學中醫的，買來了我也看不懂。他說我可以教你呀。我說我們又不住一個號子，你怎麼教我？他說我每天晚上可以到你房間裏來教你呀。我說我是關單監的，幹部會同意你晚上進我的號子？他馬上又改口說我也可以隔著門上的小窗子教你嘛。

我聽他越說越離譜，明白他的意思是讓我買下這套書，實際上借給他看。就問他整套書多少錢？他說不貴，就一百八十塊。嘿，一百八十塊錢那年頭可不是個小數字哇！我說我沒那麼多的錢。他說叫你家裏給你送嘛。我說這書也太貴了，我也不需要。他急忙說不算貴不算貴，綵面的錦盒整整二十冊的線裝書，絕對值得、值得。我說這麼有價值的書又不貴，你怎麼不自己買套呢？他聽我這樣說知道沒戲了，臉一沉轉身就走。打那之後，我托看守所代買的書籍他總說書店沒有賣的，其他一些小事只要經他的手，他總要與我為難。幸好大點的事他管不著，我又從來不找他看什麼病，不然恐怕還真有狗皮膏藥的好果子吃。

不過和狗皮膏藥比起來，有個姓張的外勞才真不是個東西。這個姓張的是狗皮膏藥刑滿釋放後走馬上任的，判刑前就關在這個看守所，犯的是姦污幼女罪。因為案情簡單明白，提了幾次審就判了，有期三年。說來也巧，這個姓張的入獄前是我以前就讀的大學華工的老師，政治教研室的哲學講師。張文革中因帶頭造黨委書記朱九思的反有功，一路向上爬得溜快。因為是黨員，又和張立國抱得緊，學校成

立革委會時，作為教師代表當上了革委會副主任。老張個子矮墩墩的，一雙老鼠眼，嘴唇旁邊稀稀拉拉幾根灰白鬍子。已年近五十的人了，還老不退火，竟把主意打到同事的小女娃娃身上，結果被送進來吃牢飯。

但老張毫無自知之明，一點也不在乎我討不討厭他，老是趁班長不在走道時，跑到我的號子門口隔著小窗找我聊幾句天。我罵他孫子都有了，怎麼還做這種缺德事，就不怕遭雷打？他說那都是一時糊塗，現在你我都是難友，何必還提過去那些傷心事。我說我是政治犯，你是刑事犯，鬼才跟你是難友。張也不在乎我搶白他，仍然死皮塌臉的，一點羞恥都沒有。有一回我姐姐給我送東西來，被他路過幹部辦公室時看見了。第二天他瞅機會對我說，頭天他看見我姐姐了。他問我姐姐在哪裏工作？讀過大學嗎？又問我姐姐結婚沒有？我說沒有。本來和一位空軍軍官在談，都已經打算辦婚事了，正好我出了事，部隊政審嚴，這事就黃了。

張連連搖頭，直說可惜可惜。「你姐姐這漂亮個姑娘，終身大事就壞在你這個弟弟身上了，罪過罪過！」張一副悲天憫人的樣子。忽然又嬉皮笑臉地說「我看你姐姐背上你這麼個反革命弟弟的包袱，再想找個好人家恐怕不容易。不如這樣吧，等我過兩年出去時，你寫張條子把我介紹給你姐姐。反正我也不在乎你的問題，你姐姐也屈就一點，好歹我過去還是個大學老師……」聽張滿嘴的胡說八道我氣壞了，破口大罵他混賬。我說你個老不死的，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我姐姐一輩子不嫁人，也輪不到你這個老傢伙！姓張的臉大概是死臉，或者臉皮有城牆厚，罵得他狗血淋頭，他竟能沒事人一樣。老張的厚顏無恥恐怕是無可救藥，那是他自己的事，也犯不著同他較真。

但老張這傢伙也絕非等閒之輩，畢竟是在大學教過一二十年哲學的，即便是落在井裏癩蛤蟆似的了，仍然能把他的一套生存哲學琢磨得精通。在他從狗皮膏藥手裏接過鍋碗鏟瓢當上火頭軍後，便開始大刀闊斧對伙房進行改革以圖表現。他首先就將多年來一直蒸的鉢飯，改為用飯甑蒸，蒸好後給每個犯人盛一碗。用這種辦法蒸的飯確實香，泡鬆鬆的蠻可口。也許是太可口了的緣故吧，三幾筷子就沒了，肚子更加餓得快。飯做得再香那香味也填不飽肚子，我們就要求老張

還是改回來，像以前那樣蒸鉢飯的好，感覺上鉢飯吃得飽一點。但老張卻說飯甑蒸的飯營養好，執意不改，我們也拿他沒有辦法。

到了年底，老張突然無聲無息地從看守所消失了，聽說是加了刑送去了勞改隊。不久就知道了老張加刑的緣由，是他擅自克扣犯人的口糧。他自到廚房掌瓢後，每天都從犯人的定量裏扣出一些，大半年下來，竟從犯人嘴邊摳出了一大筆糧食。以前蒸鉢飯時一鉢飯的分量擺在那裏，很難搞什麼鬼，難怪他要改蒸散飯了。老張克扣犯人口糧的目的是向幹部邀功，好讓上頭給自己減點刑。這才真是當初浠水巴河的那個王仁舟說的：「蒸飯隔炊皮，人心隔肚皮」，這種從叫化子眼裏剝眼屎，只求自己能撈一點好處的損招，也虧姓張的想得出來！好在看守所根本不買他的賬，讓他偷雞不著反蝕了一大把米，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我後來想，人的本性其實是很難改的，所謂「狗走千里吃屎，狼走千里吃人」。像老張這種人，倒運的時候就是條吃屎的狗，連犯人的口糧他都要啃一口；走運的時候他就是頭吃人的狼，魚肉百姓連骨頭都不用吐。幸虧姓張的栽得早，要是他不犯事，以他的這套善於鑽營的本領，說不定能當上更大的官，到那時不知有多少人要害在他的手裏。而共產黨內像老張這種蠅營狗苟、欺下拍上之徒一旦多了，不腐敗變質才怪。

老張走後一個叫彭水清的年輕人接替他作外勞。小彭原來是湖北藝術學院美術系的青年教師，文革時當上院革委會主任。後來清查階級隊伍，彭被揭發與一次武鬥中的命案有關。雖不是他的直接責任，但他是一把手，就該他承頭，被判刑十年。正好老張走了，看守所就留下他當雜役。也是買米買菜燒水做飯倒馬桶，可惜了一個搞藝術的人才。六七年「七二〇」前我和我們敢死隊在湖藝住過一段時間，與小彭算是老熟人了，那回翻進圖書館看書，就是被他抓了個正著。如今獄中遇故人，也算是有緣分吧。他給號子送飯送水時常對我有所照顧。比方打菜多打一點，開水多舀一點，能做的也無非這些了。但就是這一點照顧，於我就非常不錯了。像冬天裏多給瓢熱水就可以多點水擦澡，可謂是雪裏送炭。

我們犯人冬天洗澡的問題後來倒是有所改善，看守所組織犯人造

了一座澡堂，冬天裏犯人每個月也可以洗次熱水澡。洗澡那天，通常最先是樓上七處的幹部和看守所的管教洗，那第一道湯大概是很乾淨很清亮的；然後是幹部們的家屬洗，那二道湯當然也髒不到哪裏去；再接著是當兵的洗，兵們成天摸爬滾打滿身的油汗，那池裏的水經兵們一洗，差不多就是一池油湯了。最後歸犯人們油湯裏面下餃子。一池子水油光可鑒，犯人們光頭光身地泡在裏面，像餃子一樣擠來擠去的，想必是熱鬧極了。我們幾個特殊犯人，自然又是排在所有的犯人之後，等大家都洗完了，再一個個地輪流去澡堂。

我頭一次去澡堂還是蠻高興的，待拿著毛巾肥皂進了澡堂，面對那一池髒兮兮的醬油湯還真倒了胃口。這水與其說是洗澡水，倒不如說是洗碗的泔水。當年讀高中時到黃岡支農，曾經去黃岡師專參觀，見過師專的學生開午飯。吃完飯後學生們洗碗的那個水池裏的水是不換的，碗在裏面洗來洗去，那池水就洗成了一池醬油湯。我們這些大城市來的用慣了自來水的「洋學生」很看不習慣，覺得鄉下人太不講衛生。現在倒好，我自己也要跳進這種醬油湯把自己當碗刷。不過也沒有誰非要逼我下油鍋，嫌水髒不洗不就得了。澡池旁邊還有個水龍頭，打開龍頭水也是熱的，只是不能調冷熱。我就用毛巾接水擦身體，也洗得很乾淨很舒服的，感覺蠻不錯。

有一回輪到我洗澡，洗完後意外地在澡堂放衣服鞋子的櫃子裏發現有半張殘缺的《參考消息》，趕快撿寶貝似的藏起來帶回號子。回號子後翻來覆去地仔細看那半張報紙，有關於林彪事件的一點內容，什麼林彪外逃時是怎樣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的，也說不出多少名堂，倒是上面登有毛澤東關於小說《紅樓夢》的談話，引起了我的興趣。毛說《紅樓夢》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是一部政治歷史小說，號召全黨同志都要讀讀這部書。我心裏一動，決定瞅機會向看守所幹部提出要求，讓家裏給我送套《紅樓夢》。

有天張所長找我去他辦公室談話，見他辦公桌上正好就擺著一本《紅樓夢》。談話中我趁機把話題扯到《紅樓夢》上面，我說張所長也喜歡看《紅樓夢》？張所長說喜不喜歡都要看，這是任務。我說看《紅樓夢》也叫任務？張所長說偉大領袖毛主席提倡全黨同志都要看呢，我都看過一遍了，還有點意思。我說張所長還準備看二遍？張說二遍算什

麼，你知道毛主席對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怎麼說？說《紅樓夢》至少要看七遍才有發言權。我說毛主席這麼看重《紅樓夢》，我能不能讀一讀？張所長稍微猶豫了一下，答應說行啊，下次寫信就叫你家裏給你送套來吧！不過這套書目前還真不大好買，外面要憑關係的。我很高興張所長高抬貴手同意我看《紅樓夢》，這以前莫說這種粉白脂紅、兒女情長的「愛情小說」，凡小說都是一律不讓看的，所以這回張所長算是開了禁。這位張所長與我非親非故，對待犯人原則性似乎也很強，不知何故對我卻常常網開一面，能照顧就給我一些照顧。這個謎底直到出獄後我才搞清楚。

只說當時我大喜過望，到寫信時就讓家裏給我買《紅樓夢》。然而正如張所長所言，外頭根本就買不到這套書。從七三年年底開始要書，一直到七四年國慶日都過了書還買不到。家裏人跑遍了武漢三鎮的大小書店，還不知托了多少親戚朋友也弄不到這套書。好不容易到年底才從一個遠房親戚家搞到一本《紅樓夢》的上冊，僅前六十回，還是五十年代初出版的。紙張發黃、缺角掉頁不說，書的封面上還黃不黃白不白斑斑點點的像是有一大塊尿跡。不過這半部《紅樓夢》已經使我欣喜若狂了，要知道這之前我還從來沒有讀過《紅樓夢》呢！

老人們過去總說什麼老不讀三國，少不讀紅樓，說年紀小了讀《紅樓夢》容易學壞，其實老了讀紅樓才是真的容易學壞。書裏面那些個叫賈赦賈政賈雨村的，哪個不是那些所謂的「老幹部」學壞的榜樣？在驕奢淫逸、腐化墮落方面，一些晚節不保的「老幹部」的所作所為，只會讓賈赦賈政們望塵莫及、甘拜下風。小青年讀讀《紅樓夢》能壞到哪裏去呢？頂多神魂顛倒地滿世界去找他或她的林妹妹和寶哥哥罷了。像我這個年齡才讀《紅樓夢》已經是太晚，不過能在這種地方靜下心來讀《紅樓夢》也真不錯。

讀書人的一大樂事據說是「雪夜閉門讀禁書」，這「獄中閉門讀紅樓」自然也別有一番趣味。這本又名《石頭記》的作者曹雪芹開卷便有詩云：「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好吧，且看看這滿紙荒唐言都寫了些什麼？其中味又到底在哪裏？有道是平生不讀《紅樓夢》，讀遍詩書也枉然。多虧毛澤東一句話，連我們坐牢的也能讀到《紅樓夢》。我用大約一個星期的時間讀完了《紅樓夢》的上

卷。後來家裏又給我從朋友家借來了四冊一套的新版《紅樓夢》，我在半年時間裏反復讀了四遍。以後家裏給我買到了一套，我又讀了好幾遍，一兩年內大概讀過不下十遍，總之大大超過了毛澤東提議的「至少七遍」。誰說我不聽毛主席的話呢？我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可是不折不扣啊，只是這類指示我知道得太少了一點，遺憾得很！

《紅樓夢》這部書，真是不讀不知道它的偉大。如評家所言：氣象恢弘，意境深遠，奧妙無窮，乃千古未有之奇書。也如魯迅先生說的，「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這是很了不起的。之前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是讀過的，也是寫封建大家庭的衰落，但思想成就與藝術成就都無法與之相比。並非巴金無才，實在是《紅樓夢》太偉大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一覽眾山小的龍頭老大，你怎麼去比？後來聽說有後生小子出過幾本歪書，便大言不慚地吹牛說弄不好說不定也弄出一部紅樓夢來，只好說這小子是癩蛤蟆打哈欠。至於《紅樓夢》的主題很難說得清楚，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怎麼說都有道理，我想這才足見《紅樓夢》的偉大。

而據我的心得，《紅樓夢》的主旨就在書中的八個字中：「千紅一窟，萬豔同杯」。曹雪芹用他這部畢生心血之作，為所有被封建禮教埋葬了美好青春的少男少女一哭，特別是為那些被封建制度壓迫摧殘的年輕女性捧上一掬辛酸的淚水。別的更深奧的主旨如階級鬥爭之類，我是領會不來也不屑領會。但記得清楚第七十四回「惑奸讒抄檢大觀園」中探春姑娘的一段話：「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必須先從家裏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塗地呢！」大族人家如此、一個國家大概也是如此，文革一起不也是大興抄家風麼？這些年來不也是成天清查階級隊伍麼？我就不明白我們國家為何偏偏熱衷自相殘殺，不明白怎麼就有那麼多王夫人似的主子、那麼多王善保家的似的打手和奴才。

除了《紅樓夢》之外，我這期間讀得最多的一套書便是魯迅的著作。從七三年夏天開始，書店裏買得到魯迅著作的單行本了。陸陸續續幾乎就買到了魯迅著作的全部單行本，一共二十多本吧，我也是翻來覆去讀了好多遍，並且邊讀邊從中摘錄了許多語錄。魯迅的文章從小學到中學課本都選編有，大概共有十來篇吧，現在得觀全豹，自然

是學習瞭解魯迅的極好機會。我認為在我們中國，要說知人論世，不能不讀魯迅；要探究中國人的國民性，不能不讀魯迅；要瞭解中國人身上普遍存在的阿Q精神，不能不讀魯迅。魯迅先生忌惡如仇的性格，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大無畏精神，對舊社會黑暗勢力的韌性戰鬥風格，令人肅然起敬。

魯迅的文字雖然都是針對舊社會的，但讀來字字都具現實意義。這就使我不由得不想到個問題，如果魯迅先生活到現在，他會不會對「新奴隸主子」同樣舉起「匕首和投槍」呢？以先生的性格，他會。問題是一旦先生這樣做了，他能否見容於新政權？曾經將他捧為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旗手」甚至尊為「聖人」的革命領袖，會對他網開一面嗎？實在說我是得不出答案的。我想魯迅這位「聖人」，正如過去的孔聖人一樣，之所以死後仍備受尊崇，用魯迅自己的話說，是「因為他不會嚙蘇了」。倘或到現在在新政權下還是嚙蘇，那也是要倒楣的。胡風是魯迅先生賞識的，他在新政權下之所以坐監獄，不就是因為他喜歡嚙蘇，搞了個三十萬言的意見書，對毛澤東製定的文藝方針說三道四麼？

其實說白了，我們這些後生小子不也都是犯了嚙蘇的毛病才坐牢的嗎？偉大領袖已經不要你嚙蘇了，明確地警告說「是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你聽不進，還要一個勁地嚙蘇，你能不倒楣嗎？只是這楣也倒得太慘了。從六八年五月鐵山被劫失去自由那時算起，我已經被關了七八年了。記得剛進監獄時就問過季幹部，幾時能處理我的問題？季幹部當時回答說多不過一年。他還說看守所不是長期關押人的地方，案子審清楚了就走人。過了一年我又問季幹部幾時處理我的問題？他有點尷尬，說總不會再用一年吧。又是一年過去了，我又問季幹部同樣的問題，他說都已經有兩年了，無論如何也不會再拖兩年。結果一過又是兩年，再問季幹部什麼時候解決，季幹部已是一臉的無奈，敷衍說他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解決我的問題，但以後的時間總不至於比過去的時間還長吧。還是句模棱兩可的話。我想哪怕再關上十年、二十年，季幹部的答覆恐怕還是那句話，無非是說總不會再關你十年、二十年吧。

老季這話說了等於白說，其實他也未必清楚我們的問題長期不予解決的緣由。除非我們在這裏被關到死，他或許能夠許諾我們下輩子

不會再關在這裏了。但我們還有下輩子嗎？而況就是有下輩子，如果仍是生活在現在這樣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專制國家裏，誰又能夠保證我們不再坐牢？不過也用不著為下輩子的事傷腦筋，讓人憂慮的是眼前的嚴酷現實。一個人一生能有幾個十年八年？而況是一生中最寶貴的時間，一個人生命中的黃金時段，就這樣眼睜睜看著被扼殺掉了。真是可恨哪！可是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呢？

每當輪到我放風的時候，我總愛站在院子中間，望著遠處的蛇山發呆。陶淵明有詩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夠悠閒的了。我則是放風高牆下，淒然見蛇山，與那位陶先生簡直不能攀比，但蛇山的四季景色，我想不見得會比陶先生的那座南山遜色。那綿延起伏的蛇山隨著季節的變化；一段時間綠了，綠得鬱鬱蔥蔥；一段時間又禿了，但仍有一片片蒼翠的松林點綴其間；到冬天一場大雪後則銀裝素裹，一派冰雪的世界。等嚴冬過後春回大地，蛇山又會是一片蔥綠青翠、生機盎然。遠遠望去，樹叢間常有人影晃動，或三三兩兩，或成群結隊，應該是捷足先登上蛇山來踏青的遊人或情侶了。

遙望那隱約出沒的人影，我忽發奇想：既然我在這個放風場裏能遠遠望見蛇山上的遊人，那麼山上的遊人是否也能看到我們這個看守所呢？如果借助倍數高點的望遠鏡，清楚地看見這個放風場上放風的犯人也是完全可能的。這個突如其來的念頭使我激動不已，我的放風時間通常是安排在全體犯人放風之前，一般是在上午八九點鐘，如果我的家裏人在這種時候登上蛇山，不就可以通過望遠鏡看到我放風嗎？然而我如何能把這個想法讓我家裏人知道呢？

我成天苦思苦想，終於想出了個辦法。我把我的想法寫在張紙上，疊成窄條，塞進一本精裝的《列寧選集》的書脊裏面。然後我用白線在一塊藍色的布條上，繡上「書脊內有字條」幾個字。再把這塊布條縫在一床床單上，外面再縫上一大塊布作補丁，遮住這塊繡了字的布條。這樣從外面看去，床單上除了有塊補丁外，什麼也沒有。有次寫信時，我讓家裏把舊床單和塞有字條的精裝書拿回去，等下次寫信時，我讓家裏把送回去的舊床單上的那塊補丁拆下來，說是需要那塊布補衣服用。等家裏人拆補丁時，自然就發現藏在補丁裏的布條了。

家裏人根據布條上的字，從那本書的書脊內找到了我寫的信。父

母和姐姐還真的照我說的買了副望遠鏡，一連幾天過武昌登上蛇山，通過望遠鏡找看守所的放風場。但後來聽他們說，一眼看下去全都是大大小小的房子，怎麼也無法從中找到看守所那幢二層樓的樓房以及放風場，自然更不用說捕捉我的影子了。我挖空思想出的辦法，到底還是沒有派上用場。

但看守所的幹部也還人道，他們見我許多年沒有和父母家人見面，就想了個辦法。有一次我因好幾顆牙齒被蛀爛了，牙齦經常發炎，疼痛難忍，經再三要求，幹部請示上級後同意我去附近一所醫院拔牙。張所長就先跟我家裏打了招呼，說某天某時我會去湖北醫學院附屬一醫院看病，讓家裏人到時在醫院門口等著，悄悄地見我一面。那天我家裏人準時趕到醫院門口，坐在長椅子上等我路過。我那天在季幹部和兩個軍人的監護下，也按時到了醫院。可不知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我家裏人坐在醫院門口等了整整一個上午，從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始終沒有看見我走過，這次難得的機會也就這樣泡了湯。

不過後來我知道所裏曾有過這樣一次安排，還是非常感動，幹部們能這樣想法子幫助我們一家人見面，已是很不容易了，須知他們這樣做是要冒些風險的啊。萬一我路途中逃跑了，看守所可是責任不小。所以他們一再叮囑我，萬萬不能給他們添麻煩。我當然是不會逃跑的，但去醫院的途中走到小東門一處小巷子時，我瞬間還真的動過逃跑的念頭。這條巷子就在我讀過的高中附近，這一帶我實在太熟悉了，只要我拔腿一跑，憑我的百米速度，分分鐘就溜得無影無蹤鬼都找不著。不過跑倒容易，往哪裏躲？而且一跑就變成了逃犯，全城通緝，豈不更加糟糕，且連累了看守所的幹部。何況「率土之濱，莫非王土」，我哪怕是跑到天涯海角荒山大漠，也照樣會被捉拿歸案。我就安安心心老老實實地坐我的牢籠，只是我的身體和精神還能夠支撐我堅持多久呢？

我感覺到身體方面已經大不如以前，日漸消瘦倒在其次，主要是身體變得非常虛弱。失眠、多夢，一晚上至多能睡眠兩三個小時。一睡著就做夢，而一做夢就夢遺，幾條內褲換都換不贏。本來這個地方營養就極差，晚上夢遺的次數頻繁了，身體疲憊不堪不說，精神上非常痛苦和恐懼。倒不是相信一滴精十滴血的說法，而是人好像被掏空

了，成天無精打采，萎靡不振。我只好向幹部反映這個問題，幹部說少想點雞巴事就不會有那種夢了，可實際上根本不是幹部說的那回事。我這樣二十來歲的年齡，正是身體內荷爾蒙最充沛的時候，這時候不想什麼時候想？問題是這些年來再怎麼想，我也很少夢遺，最近一段時間卻愈來愈管不住自己的身子了。

為此我特地讓姐姐送過一本她大學學的《中醫學概論》來看，據書上說若夢遺過於頻繁，除心智過勞外，主要是腎虛所至，須鎖精固本，正源去邪，加強營養，細心調理等等。藥物治療方面可服用「金雞虎丸」、「金櫻子膏」等中藥。加強營養、細心調理自然是談不上的，只有請看守所恩准讓家裏送些藥來。此後幾年中金櫻子膏之類的中成藥吃了不知有多少，然而收效甚微。我的身體日衰一日，夢遺亦愈來愈厲害。有一晚我夢遺竟達九次之多，幾乎一入眠就有女性在夢中出現，一夢見女人就要夢遺，我隨時會從夢遺中驚醒。我為此苦惱悲觀，甚至對睡眠都感到害怕，睡眠對我成了一種可怕的精神桎梏。雖然如此，我又渴望晚上進入夢境，因為只有在夢境中，我才能回到我曾經生活過的那個外面的世界。據說潛意識在夢中會活躍起來，負載著白天生活中不能如願以償的夢想，進入我的睡鄉。

最初的夢常常是夢見回到了家裏，見到了父母和姐姐。有時也回到學校，回到曾經朝夕相處的同學之中。再後來就常常夢見自己飛翔在空中——有時飛過蒼茫大地，有時越過城市的高樓大廈，更多的時候則是飛翔在崇山峻嶺之間，一座座山峰波浪似的在我的腳下一掠而過。我知道這是多年前隨學校的紅衛兵長征隊長征時，沿途經過的千山萬壑，正重現在我的夢境之中。我飛呀飛呀，卻總是飛得十分沉重，我是帶著枷鎖懷著對自由的渴望艱難地飛翔。據佛洛伊德對夢的解析，男人的飛行的夢具有情欲的意義，它與勃起和遺精有關。不過對佛氏的理論我不敢苟同，我的情欲不會是曖昧地表現在夢中飛翔中，而是直接表現在夢中和一些女孩子相遇，和飛不飛翔完全不相干。

有一次幹部找我到辦公室談話，正好有郵遞員進辦公室來送信。這位郵遞員是個年輕的姑娘，有一雙長長的大辮子。我趁她遞信給幹部時偷偷地瞥了她一眼，好像只是個姿色平平的女孩吧，但臉色紅潤

潤的很健康的樣子。回號子後我的眼前就怎麼也拂不掉這個素昧平生的女孩的身影了，想了一整天。晚上這女孩子還真的進了我的夢境，我抱她她竟也不抗拒，我正想和她親近，那東西早已不爭氣地噴礴而出，而我也隨即從夢中醒來，空留一腔惆悵。

像這種認識的或不認識的女子，我天天都在夢裏相遇，我遇見了就想同她們親近，但她們總是像幽靈一樣讓我無法靠近。只有一次我和一個鄰居家的女孩子有了親密接觸，我甚至似真非真地和她上了床做成了那事。更多的時候我會夢見小劉，但她老是離我很遠，我永遠也走不到她的身邊。有一回我一睡下就看見小劉和一個女孩子在前面悠悠蕩蕩地走，我就追上去。但是她們愈走愈快，我卻步履沉重，怎麼也追不上她們，眼睜睜就見她們轉彎在一棟樓房前消失了。我趕過去進樓房裏去找，一個房間一個房間地找她們，可是每個房間都是空的。我就喊她的名字，但是喊不出來。我就拼命地喊，一喊就喊醒了，才知不過是南柯一夢。

我也常常在夢中回到了父母的身邊。每在夢裏見到父母時，我就會擔心自己是不是在做夢，而夢總是要醒的。魯迅先生說：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走。我每次夢醒之後環視四周，冷壁孤燈，形影相吊，鐵窗內唯有冰涼的月光與我為伴，淚水就禁不住地流下來。

在這死一樣寂靜的牢房裏，我能擁有的只是不斷的夢想和夢想的不斷的破滅，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叫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靈，有時真想一頭在牆上撞死。坐牢已經很苦了，還要把我關在單人牢房；關單人牢房已經夠孤獨夠難熬了，還要十年八年的長期關下去；長期的關在單人牢房裏已經是非常可怕的折磨了，還從來不允許和親人見上哪怕一面。我實在想不明白，讓我和父母見見面於社會有什麼危險？於無產階級專政有什麼損害？於我的「思想改造」又有什麼妨礙？不錯，按規定看守所裏羈押的未決犯是不能接見家屬的。但看守所只是個暫時羈押而非長期關押犯人的地方，未決犯一旦問題審查清楚了，或判或放，總要給人一條出路。像我這樣問題早就審查得一清二楚了，卻死活不給解決，就無法從司法的角度作出解釋了。

無限期的把人用單身監禁的方式與世隔絕，甚至連與親人見一面都不可得，世界上還有比這更殘酷更野蠻更不講人道的事嗎？這樣做

不是要把人逼瘋又是幹什麼呢？我們且看看無產階級革命導師恩格斯對於這個問題是怎樣說的，他說：「除了死刑以外，英國的刑法還有兩種野蠻得無以復加的刑罰：苦役流刑和單獨監禁。前者通過群居把人變成禽獸，後者通過孤寂的生活把人變成禽獸。這兩種刑罰經年累月連續不斷地從肉體上、精神上、道德上來摧殘法律的犧牲者，一直把他們弄得像牲畜一樣。很難想出比這更殘酷更卑劣的刑罰了。」恩格斯的這段話已經把單獨監禁的本質與後果揭露無遺。恩格斯並且指出，就連資產階級的政府在輿論的壓力面前，也不得不廢除了單獨監禁制度，「十年以上的徒刑一律改為流放。」

事實上長期的單獨監禁已經顯露出了可怕的後果，和我們一起轉到這裏來的那個叫甘勇的青年工人，早兩年就已發了瘋。看守所硬說他是裝瘋，將他腳鐐手銬鎖起來，丟進小號任他發瘋發狂。更讓我意外和心痛的，是我最好的朋友馮天艾不久前也精神失常了。馮氏入獄後一直表現得很堅強，他不是一個意志軟弱的人，可是沒有想到他在精神上也支撐不下去了。

那天一大早天還沒有大亮，突然就聽見從馮住的號子裏傳出撕人肺的叫聲：你們為什麼不讓我出去？王海容在外面等我呢，我要出去！我要見王海容！班長不讓他喊，問他王海容是你的什麼人？也是你亂叫的？馮說王海容是他的未婚妻，正等他出去結婚。馮叫嚷說為什麼不讓他和王海容結婚？說你們知不知道王海容是毛主席的侄外甥姑娘，你們敢干涉我們的婚姻是犯欺君之罪！我貼著門聽馮亂說亂叫，知道他腦子出毛病了。不多會有人開門進了他的號子，接著就聽見馮被打得慘叫。但一連幾天馮仍然在號子裏亂說亂喊，而且越說越沒得譜，連《紅樓夢》裏的金陵十二釵都叫出來了。後來他也會被腳鐐手銬丟進小號關過一陣，關得更加瘋瘋癲癲，直到出獄後才去精神病院得到治療。

馮氏的精神失常對我的刺激很大，我覺得再繼續這樣無盡無了地關下去，我總有一天會步他的後塵。心裏憋得難受，總想找個地方發洩心中的鬱悶和憤慨，不然我真的也要瘋了，我害怕我管不住自己的神經。我們這個案子的一干案犯中，三個「黑後臺」已有兩個釋放回原單位了。還有一個楊秀林，因他有個在蘭州部隊當團長的哥哥，托部

隊首長給老戰友、武漢軍區副司令員姚喆寫了封信，姚喆批了幾個字後，楊秀林就被放回武大分配了工作。最後剩下我們不到十個人。現在不到十年時間，先後已經關瘋了四個，這實在太可怕了，誰能保證下一個發瘋的不是自己！

說到發瘋的問題，完全是由於我們所處的生存環境過於嚴酷所造成。單說獄中的恐懼心理，對人精神上的傷害就非常厲害。舉個簡單但刻骨銘心的例吧，有段時間看守所每星期的周日，准許犯人用針縫補衣服——一大早管教會把針線發進號子，晚飯後再收回去。但是有一次我用完針後大意了一下，當管教來收針時，針卻怎麼也找不到了。不巧的是收針的管教正是犯人人見人怕的那個姓王的，他一口咬定我把針藏起來了，警告我不把針交出來是下不了地的！王管教的警告讓我緊張害怕極了。屋裏的光線已經開始暗下來，我視力又不好，只能匍匐在地板上，一寸一寸地摸索著找針。等我僥倖地總算從地板的一處接縫處摸到針時，腦子裏繃得緊緊的弦一下子鬆開，身子幾乎癱倒在地板上。

一口針是多大的事呢，可找不到它我就有可能被上銬，甚至被關小號。這種對受懲戒的恐懼哪怕只有一次，就足以使神經脆弱的人精神崩潰，何況我們在獄中幾乎隨時都面臨這類恐懼的威脅呢。更不用說一個人經年累月被羈押在單人牢房裏所必然產生的絕望心理，對人身心的摧殘有多麼可怕了。但儘管恐懼，儘管幾近絕望，我們又總是對未來懷抱一線微薄的期望——正如《基督山伯爵》中那個叫鄧蒂斯的說的，人落到絕境中時，等待和希望就是他賴以生存的秘訣——我們正是靠這種朦朧的一點期望，年復一年地等待著，支撐自己活下去。

又是一年的新年到了，外面好大的雪啊，嚴寒中我想起艾青的詩《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

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鎖著中國……

窗外雪花飛舞，大地白雪皚皚。我坐在床鋪上，望著窗外的飄雪，聽著大牆外一陣接一陣的炮竹聲，不由得想家了。我想回家，想見我的父母，還有我姐姐，我知道他們天天都在期盼我回家。可是年復一年，回家始終只是個夢想。我心中的憂愁無法排解，想起了小時

候母親教我唱過的《松花江上》：「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裏有我的同胞，還有我衰老的爹娘……」忍不住就唱出聲來。

窗外泥濘的雪地上有腳步碾踏冰雪的聲音，是班長尋聲從屋外走過來了，他走到我的門口，用槍托使勁地敲門。我不理會他，繼續唱道：「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離別了我的家鄉……流浪、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可愛的家鄉……」

「不准唱！」班長在門外用槍托敲著門大叫，「你找死哇，你瘋啦？你敢再唱看我收拾你！」

我不找死，我也不瘋，快八年了，我只想見一見我的父母。想到父母，我眼淚禁不住奪眶而出，我哭泣著呼喊我的爹娘：「爹娘啊，爹娘啊，什麼時候，才能歡聚在一堂。」

年輕的小班長卻氣壞了，他命令我從鋪位上站起來，走到門口，立正、低頭。

「誰准你唱歌的？」班長厲聲地質問我。我回答說沒有誰准我唱。

「那你為什麼要唱？好大的膽子，想翻天了不是？」

「不是。我是想我的父母，我整整有八年沒有見過父母了。」

「活該！」班長啐一口說，「你不是罪大惡極，死不交代，政府會把你關八年？老實講，你手上到底有幾條人命？」我告訴他我手上一條人命都沒有。我說我過去只是個學生，我並沒有夠關八年的罪惡。我的問題早就弄得一清二楚了，政府就是拖著不處理……不等我說完，班長就叫起來叫我不用胡說了。他說你一個學生，又沒有殺人放火，問題也早弄清楚了，政府卻把你一關就是八年，那你豈不是受冤枉了？你這不明是在誣衊政府不講道理嗎？我說本來事實就是這樣。班長一聽更火了，說好你個頑固的傢伙，還敢強嘴，給我規規矩矩站好，頭低下來！我就站直身子，低下頭。班長又命令我彎腰，要彎成九十度，站兩個小時，一直站到他交班。

我告訴班長我彎不了腰，更莫說九十度了。我說要怎麼樣就怎麼樣，腰是不彎的。也不是我不彎，實在是這麼多年坐牢把脊樑骨坐硬了，腰彎不下來。班長才不聽我那一套，他只問我到底彎不彎？我堅持不彎。我打定主意這回寧折不彎，死也不彎，你個小班長能奈我

何！班長有點氣急敗壞，下最後通牒說：「我再說三聲。你彎不彎？你彎不彎？你彎不彎？」我咬住牙說：「不彎！」沒料到班長竟突然舉起手裏的半自動步槍，將槍頭的三棱刺刀從門孔外朝我的胸口猛的就是一下，我猝不及防被捅倒在地上，胸口痛得在地下打滾。班長卻在門外冷笑說，看是你厲害還是我厲害……

班長的槍頭的三棱刺刀是未開口的，刀尖上還有一個小圓點，殺人是殺不了的。但班長竟敢對犯人用刺刀捅，卻是我意想不到的，這個班長也太邪乎。屈辱和憤怒使我什麼也不怕了，我從地上爬起來，不顧一切地狂叫殺人啦！當兵的用刺刀殺人啦！平時我在號子裏是什麼也不能說，也沒人聽我說，我這回借題發揮，把憋在心裏的話一吐為快。我說我一個學生犯了什麼罪，一關就是整整八年。有罪就該判刑，無罪就該放人，憑什麼既不判又不放，把人往死裏整！你們究竟是不是共產黨……那個班長畢竟年輕，搞慌了手腳，退得老遠，只是瞪著眼睛用手指指著我說，「不准喊，不准喊！」他越不讓我喊我越要喊。我不斷地喊殺人了，班長殺人啦……同時不斷地罵，罵專案人員是法西斯，罵曾思玉劉豐是國民黨；我罵政府對我們的案子久拖不決，完全不顧人的死活；我說我要求政府對我進行公開審判。

別的號子裏的犯人聽見我叫，都捶門給我助威。小班長慌了神，一點轍都沒有，把正在吃年夜飯的季幹部喊來了。季幹部打開我的房間的門，問明情況，看了看我胸口被捅的地方，答應送我去醫院檢查。「你不准再叫了，」季幹部警告說，「這裏是看守所，看守所有看守所的規矩，再亂叫莫怪對你不客氣。」我說我不叫就是，不過我要控訴。季幹部說允許你控訴，你寫個東西交給我吧。

我的一封控告信經看守所送到了省革委會。處理這封信的某領導說我們的士兵都是很講政策的，不可能幹這種事。季幹部說犯人的胸部軟骨被捅傷，有醫院的檢查證明。當然事情最後也只能是不了了之，不過那個小當兵的倒是見不到了，聽說被調了防。其實我何嘗是真的要控訴這個不懂事的小班長呢，我真正要控訴的，是這種完全違反人道的監禁方式，是控告當局對我們的殘酷折磨。恩格斯在論及英國的監獄制度說到單人牢房的殘酷性時，就已經指出：「很少有人在單人牢房裏關上十年而不發瘋的」，當局為什麼要用這種方法折磨我們？

莫非當局的目的，不是要將我們關死在牢裏，就是要把我們一個個都折磨成神志不清，喪失正常思維能力的瘋子麼？

還記得英國作家狄更斯寫的《雙城記》中那個老醫生馬奈特嗎？還記得這位被無辜關押在巴士底獄單人牢房中的老人，在他被囚禁的十年的最後一個月，用一枚生鏽的釘子，蘸著從煙囪裏刮下來的煙灰與木炭粉，混著鮮血寫下的對迫害他的那對貴族兄弟的咒語嗎？他說：「我現在相信那血十字是他們無法逃避的了，他們決不會得到上帝的憐憫。我，一個不幸的囚徒，在1767年的最後一夜，在無法忍受的痛苦中發誓：到了清算所有血債的時候，一定要控訴他們，控訴他們的子孫，直至他們家屬中最後一人！我要向蒼天和大地控訴他們！」

當七六年《人民日報》的「新年獻詞」在看守所的喇叭中播放時，我知道從我落入鐵山那天起，我已經從當年的二十剛出頭被囚禁到快三十歲了，卻仍然看不到案子何時能得到處理，更不用說重獲自由的希望了。我不知道當權者究竟為什麼要將我這樣無限期的監禁在單人牢房裏，也不知道他們究竟要在我身上達到什麼目的？我也不明白這些手握權柄的人怎麼就如此毫無人性、如此喪盡天良，難道他們就真的不怕受到天懲嗎？面對窗外大雪紛飛的天空，我跪在鋪板上發出了一個誓言。我發誓這輩子只要有一天能夠走出這座人間地獄，我一定要把我獄中這段悲慘的經歷寫出來，我一定要揭露這樁「欽定」大案的真相。當然，我既不可能像基督山伯爵那樣，去殘酷地報復陷害我的仇人，也不會像馬奈特老人那樣，去詛咒對我進行迫害的那些權貴們的子孫和他們家屬中的所有人。我只將如實地揭露迫害者本人的罪惡，用筆將他們這些自由和民主的敵人、扼殺人類道德和良知的劊子手，永遠釘牢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在我被監禁的第八年的除夕之夜，我向蒼天和大地發下了這個誓言！



## 第二十三章

# 夜如何其？夜未央

八年，真像是一場惡夢！差不多八年的時間裏，我不僅失去了人身自由，而且被剝奪了會見家人的權利。為什麼要這樣懲罰我？家是一個人心中的聖殿，正如一首英國民歌中唱的：「無論我走到哪裏，都懷念我的家，好像天上的聲音，親切地把我召喚」。但是家的概念於我確實已經愈來愈陌生了，窗戶裏那橘黃色的燈光在我的眼中也愈來愈模糊，睡房牆上那座掛鐘的打點聲，在我的耳邊也愈來愈渺茫，唯有父母姐姐的音容笑貌，始終清晰地保留在我的記憶裏。那是寒冷冬夜裏點燃在我心中的一根燭火，我靠著這唯一的燭光溫暖著身心，使它不至於凍僵。

在我很小的時候，父親就隨大軍南下深圳參加接管九龍海關去了，是母親一手把我拉扯大的，我對母親有著特別深的感情。母親聰穎好學，知書達理，又正直無私，嫉惡如仇，眼裏容不得半顆沙子。我的性格與母親年輕時非常相似，大概正是來自DNA的遺傳。

母親原是漢陽一所教會中學訓女女中的學生。武漢淪陷後書讀不成了，無奈之中經一位高年級同學介紹，進漢口普愛醫院普仁護校學護士。有次上課時，醫院護士長英人戴美蘭給學員訓話，說什麼日本人打中國是因中國人自己不爭氣，中國政府治不好自己的國家，所以只有靠外國來幫助治理，說他們英國人就是上帝派來幫助中國人的等等。母親聽了這些話十分氣忿，想到在訓女讀書時有位叫周子賢的史地教員，每向學生講及百年來帝國主義列強在我國橫行霸道之侵略罪行至痛心處，往往捶胸頓足，熱淚滿面，母親便站起來反駁她。母親

說我們國家的貧窮與落後，是列強欺凌的結果，鬧得這位英籍護士長面紅耳赤下不了臺。

下課後戴美蘭把我母親叫到她的辦公室談話，叫她以後再不要當面頂撞她，要給她面子。並且說只要聽她的話，經常向她報告班上同學的言行，做一個上帝的馴服的羔羊，那麼她就喜歡我母親，以後還可以幫助我母親留學英國深造。但是母親說不做傀儡，不做內奸，一口拒絕了她。這位護士長於是露出了猙獰的面目，強迫我母親接連在傳染病房做了兩個月的夜班，病了也不准假。漸漸晚上起來值班時，母親就感覺胸痛發熱，找校醫檢查才知是患上了胸膜積水。但戴美蘭不准給我母親治病，叫人把我母親扔在一間貯藏室裏聽天由命。還是後來我外祖母在仙桃久不接我母親的音訊，趕到漢口看我母親，才找醫生救下我母親一命。

但母親身體元氣大傷，落下病根，到五八年「大辦鋼鐵」時舊病復發，肺上查出三處雞蛋大的空洞，差點丢了性命。母親原以為將一病不起，上面那段經歷，就是她在病榻上講給我和姐姐聽的。她說是共產黨毛主席解救了中國的窮苦老百姓，使中國人民當家做了主人。她要我們姐弟倆要永遠聽黨的話，永遠跟著偉大領袖毛主席走。看見我們姐弟倆都長大成人，而且先後都進了大學深造，母親為此感到無比寬慰。她做夢也沒有想到文革一來，我這個她最引為驕傲的兒子會給她帶來那麼多的驚恐，特別是沒有想到我會被投入監獄關押這麼多年。我讓母親傷透心了。我不知道這多年來生性好強的母親在外頭是怎樣過的？她還是像以前那樣樂觀、那樣自信、那樣追求進步、那樣對黨和毛主席深信不疑麼？

說到母親的追求進步，有一封五十年代初母親寫給我父親的家信尤能說明問題，信上說：

松茂：收九月二十日來信，得知九龍海關近來評薪評級，按照全國統一規定逐漸減少所謂「照顧工資」，我站在客觀立場上，認為這樣作法完全是對的。按勞取酬，才能增強每個同志在工作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這次上面提出的是減少照顧工資幅度不超過百分之二十五，不知你準備怎樣填表。我的意見是

自己要認清政策，我們有兩個人工作，不能教國家對我們負擔太重。我有一個建議，就是你的照顧工資申請組織上完全取消，而不是只減少25%，你應該在這次減薪中起帶頭作用……。

當時九龍海關職工中主動提出照顧工資全減的，僅我父親一人。當組織上知道是我母親動員我父親這樣做時，曾致信我母親，對她的覺悟給了很高的評價。但是文革一來，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竟誣衊我母親是什麼「汪偽漢奸」，「人民的死敵、民族的敗類」，瘋狗一樣亂咬一氣。雖然潑在母親身上的髒水後來都洗清了，但是我卻又被打成了「新生反革命」，致使母親不但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而且處處受到凌辱和歧視，甚至多次遭受批鬥。

母親之所以被批鬥，與她從鐵山回漢後，積極聯絡各方對我進行營救有關。那年(68年)六月的上旬，由市無線電研究所一個叫何景林的人牽頭，發表了一份關於「營魯」的《嚴正聲明》。當時有72個「工總」屬下的基層組織在這個「聲明」上簽了字。為首的即是「武漢重型機床廠」、「武漢鍋爐廠」、「漢陽軋鋼廠」和「武漢電信局」這「四大兵團」。「營魯代表團」的辦公地點，就設在無線電研究所所在的四明大樓。

雖然「營魯」的呼聲很高，鐵山仍拖延著不放我。六月十五日，在「曾劉首長」的授意下，由新華工出面，在《新華工報》上用整整八個版面的篇幅，發佈文章和材料，揭發我「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和「炮打三紅」的「罪行」。但是這些材料的公佈，並沒有達到曾劉預期的效果，「營魯」的單位反而激增到了三百多個。六月二十六日，各單位出動了三百多輛汽車進行聲勢浩大的「營魯」大遊行，一時轟動武漢三鎮。

面對「營魯」的巨大壓力，「曾劉首長」使出殺手鐗，將我亂寫亂劃的那張似是而非，尚待甄別的所謂「漫畫」拋了出來，定為「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鐵證」。七月十八日我從鐵山被秘密解送回漢，旋即關進監獄。十天後，大街上便出現了「新派」刷的大幅標語，說我已經被警司拘留。此時「營魯」已成強弩之末，母親終於沒有能夠把我這個兒子救出來。而因為曾經積極營救「反革命兒子」，母親往後的日子自

然不好過了，交代材料不知寫了多少本，大會小會上也不知批鬥了多少次，母親為我吃了不知多少苦頭。

文革期間知識份子被貶為「臭老九」，大批大批地被強迫下放到所謂的「五七幹校」※31勞動改造。母親在學校裏帶六年級兩個班的數學，又已年過五十，本不在下放之列，工宣隊卻寧可到外面請連課都不會備的女知青來代課，也要強迫我母親去「五七幹校」接受改造。去幹校時是乘船，船到了岸還有四十里的陸路。所有的女教師和部分年紀大而體弱的男教師，坐一種旱船去農場。在所有下放幹部中我母親年紀最大，又是女的，卻要和幾個身強力壯的男工宣隊員一起步行去。母親找根扁擔挑上行李，咬著牙硬是堅持走完四十里路不叫苦，讓同行的幾位工宣隊員不由得對她刮目相看。

母親自小到大從未做過體力活，頭一天打著赤腳下水田割穀，就腰酸背痛受不了。第二天出工前，母親先吞下兩顆止痛片，勞動時就不覺得痛了，就這樣拼命地勞動鍛煉，盡量不落人後。母親在幹校勞動中的表現，感動了許多原先對她抱有成見的人，都說母親年紀最大，表現最好，是大家學習的榜樣。區委領導在一次勞動總結大會上，還號召大家要向馬老師學習，母親用她的行動贏得了大家的尊敬。後來離開幹校時，區長還特地派人幫我母親把行李挑回家，和先前去幹校時母親備受歧視的情況大不一樣。

這些事情當然都是我出獄後母親講給我聽的。我當時只是從家裏給我的信中，知道母親有段時間是去了「五七幹校」。幾乎是同一時間，父親也去了幹校，家裏就剩下姐姐和外祖母兩人。外祖母老了行動不便，每次家裏收到我的信後，都是姐姐給我送東西。姐姐來了也見不到我，信和東西都是由看守所的幹部轉交。東西限於一般的日用品，如牙膏毛巾之類，吃的東西則一律不讓送進來，藥品一般也不准送。但是大約是上頭打過招呼，對王盛榮這個「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有所例外。有回幹部讓我進他的房間幫他擦地板，就看見他的床鋪上除了放著他的那條假腿外，還放了個餅乾盒。盒子裏裝有餅乾和點心，算是對他這個「老紅軍」的特殊照顧。

有一次姐姐給我送東西來，是所長一個人接待的。所長把東西給我拿來時，還帶了包水果糖進來。他要我把水果糖收好，一個星期內

一定要吃完。我不知道所長為什麼要背著其他幹部偷偷給我送糖，對我這樣的「政治犯」搞特殊照顧，不像是所長的一貫做法。直到出獄後我才弄清楚原因。原來姐姐常來看守所給我送東西，被這個四十多歲的所長看上了。他一個有老婆有孩子的人，竟提出要和我姐姐交朋友。姐姐花朵一樣的大姑娘，豈願意和這個又矮又胖的已婚男人交朋友呢？但又擔心不答應他的話，我這個弟弟在看守所裏會受夾磨，萬般無奈只得與之委婉周旋。

姐姐先是說所長是有家室的人，怎麼好又談朋友？張說他老婆是鄉下人，早就沒有共同語言了，只要姐姐願意談，他馬上就和老婆離婚。姐姐又說所長是公安幹部，而她是在押犯人的家屬，兩人在一起不合適，會影響所長的前程。張說不管什麼前程不前程的，只要姐姐願意談，他可以申請轉業。他還說他來看守所前，是省革委會警衛營的營長，和省裏的首長們都很熟。只要姐姐肯嫁給他，他保證有辦法找路子將我弄出來。胡裏花哨地許一通願，又要我姐姐星期天去公園跟他約會。姐姐不敢不去，又怕發生意外，便請了單位一位要好的同事一同去公園，離得遠遠的當「保鏢」。到了公園，只見這個所長換了一身筆挺的西裝，脖子上還打了根領帶，再戴上副墨鏡，人模人樣的還真像個赴約會的樣子。姐姐就聽他天一句地一句地瞎扯淡，水來泥築，兵來將擋，不管張所長怎樣說得天花亂墜，總之一句要等弟弟出獄了再談。

張所長一計不成又生一計，要求和姐姐一起去我家看看。姐姐擔心帶他來家裏是「引狼入室」，出了什麼事就難得說清楚了，就以我家裏是街道監控的對象，隨便什麼人去我家，都要受鄰居監視和盤問為藉口拒絕了。這些事情自然都是我出獄後才知道的，姐姐與張所長巧與周旋，既表面上沒有駁他的面子，又始終沒有上他的鉤，這真是不容易的。這件事也讓姐姐受了多少委屈、多少難堪，虧姐姐勢單力薄還對付過來了。要是對付不過來，中了這傢伙的招那如何是好？就我而言，情願坐上一輩子的牢，也不會同意姐姐嫁給這個「乘人之危」的張所長。哪怕他真的有辦法把我弄出監獄，也不能拿姐姐作交易！

話說回來，當時我是不可能知道張所長特殊開恩把那包水果糖拿給我，是要討我姐姐的好。我只是在動腦子用何種辦法既能夠把糖留

著慢慢地吃，又不會碰到幹部突然查號子時，發現我這裏藏有糖果，讓張所長下不了臺。想來想去終於想出個好辦法——我這裏有個軍用水壺，是六七年底長征串聯時用過的，我讓家裏送來我冬天裝開水用。以前武漢的冬天特別冷，屋外面夜裏滴水成冰。看守所裏一天只在早中晚發三次開水，開水打在茶缸裏，不多會就冰冷了。我就把發進來的開水灌進水壺裏，再把水壺塞進棉被裏捂好，這樣子一天隨時都能夠喝到溫熱的開水——我現在想出的辦法就是利用這個水壺。我把水果糖全部裝進水壺裏，然後灌開水把糖化成糖水。糖水裝在水壺裏，誰會想到它是水果糖化成的，誰來查號子也不怕，可以說是萬無一失。我一天喝它幾口，等於吃幾顆糖，慢慢喝的話夠我喝些時的。其實我這樣做是多慮，那陣子根本就沒有誰來查號，所長不安排查，誰會無端的來查？水果糖就是放上個把月慢慢地吃，也不用擔心會被發現。

其實那點水果糖既解不了我的饑，也補充不了我身體內欠缺的營養。老實說我對這包把水果糖也並不覺得有多稀罕，我真正稀罕的是能夠見見家裏人。我隻身一人年復一年關在這個狹小的天地裏實在太寂寞，不要說家裏人，連一般人的影子都難得見到一個，頂多只能聽到窗外歇在樹枝上的麻雀嘰嘰喳喳地叫。還有半夜三更時屋頂上貓的叫春聲，尖聲怪調的讓人聽了越發心裏煩。不過要是真有隻貓啊狗啊與我做伴就好了，可哪裏可能呢？有隻麻雀也好，可麻雀從來沒有飛進來過——窗子上蒙有紗罩，麻雀根本就不可能飛進來。唉！這鬼地方連隻螞蟻都沒有，真是一窮二白，螞蟻都不進來拉屎撒尿。

然而皇天不負有心人，有一天屋子裏竟還真的進來了個小動物——一個小耗子。那天我正坐在牆角的馬桶上解大手——平時肚子裏的油水少，解大手向來是件折磨人的苦活。大便乾結，震半天震得面紅耳赤的，肛門都流血了，都解不出一點點，最後好不容易解出來的，都是些黑顏色的羊子疙瘩。這黑釉似的疙瘩蛋蛋看沒看相，聞沒聞頭，一點都不臭。聽說人吃得越好，解出來的屎越臭，看來這話確有道理。所以達官貴人之流不但良心壞，連拉的屎都臭不可聞——好了，還是說我解手時遇到的「號子裏進耗子」的事罷。

話說我正坐在馬桶上土法上馬生產羊疙瘩，忽見從馬桶旁邊牆角

的一個小洞裏，伸出個小小的小老鼠的腦袋。那隻小老鼠長不過一中指，想必生下來後才斷奶不久，通體光滑圓頭圓腦米老鼠一般十分可愛，不像大老鼠渾身黑毛，叱牙咧齒，賊頭賊腦令人生厭。這隻小老鼠離開鼠媽初出茅廬，睜開眼睛就想打探洞外面的大千世界，它哪裏曉得這外面的世界兇險得狠啊！這不，連我這個犯人都屏聲靜氣在打它的主意呢。

小老鼠畢竟是老鼠，鼠膽內有的是鼠輩們膽小多疑的基因。只見小老鼠把頭探出來，馬上又縮回去；再探出來，再縮回去，如是者再三，大概覺得外面很安全，終於邁出它的歷史性的第一步，嗤溜溜地從鼠洞裏跑出來。不過一開始沒跑一點遠，就趕快又沿牆壁溜了回去。這個還未完全進洞，卻見又有一隻小老鼠也從洞裏跑出來。哇哈，搞了半天，原來剛才是兩隻小老鼠在輪換著從洞裏向外頭探頭探腦，但不知道他們是兩兄弟還是兩姊妹，鼠頭鼠腦的都一個樣，哪裏分得出雌雄？這兩個小老鼠就這樣在我眼皮子底下輪換著一會兒跑出來，一會兒跑進去，膽子愈跑愈大，跑的距離一次比一次遠，一直跑到房門那裏才回頭。

看著兩隻小老鼠跑來跑去，不知怎麼就想起小時候唱過的一首兒歌：「兩隻老虎，兩隻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隻沒有尾巴，一隻沒有腦袋，真奇怪！真奇怪！」我忽然覺得這支兒歌並非兒歌，而是一句箴言。它非常有預見性地警告了中國的知識份子：在新政權下第一莫翹尾巴自以為是，第二莫用腦袋自以為是，否則將沒有好果子吃。我一邊胡思亂想一邊留意兩隻老鼠，只見這對小老鼠兄弟或兄妹跑昏了頭，以為這牢房之內就是它兩個縱橫馳騁的跑馬場，全不知道危險正在眼前。等一隻小老鼠進了洞，另一隻小老鼠溜出來，正跑到門口準備轉身的當兒，我突然用早已從腳上脫下來的一隻球鞋，把老鼠洞堵了個嚴實。正在往回跑的小老鼠聽見聲響，見勢不妙，拼命朝洞子逃竄，可洞子早被堵死了。

小老鼠慌了手腳，掉過頭又朝門口跑，可門口又哪裏有它的出路？可憐的小老鼠就這麼跑來跑去的，想找個逃命的地方，疲於奔命卻無路可逃。有幾次我看見它跑到門口，拼命地朝門上跳，大概是想跳上去，從門上開的那個小窗子逃生。但它還太小，哪裏跳得那麼

高，每次都重重的又從門半腰摔下來。小老鼠終於跳不動，也跑不動了，它躺在地上裝死。我於是穿好褲子來收拾我的獵物——其實並不想傷害這隻小老鼠，是想留下它跟我做伴。

我用臉盆蓋住小老鼠防止它開溜，晚飯時又留了點飯菜，塞進臉盆裏喂它。我想時間長了把它喂熟了，說不定能養家。只要這隻小耗子願意跟我同甘共苦，每天讓它分享一口口糧也心甘情願。不過這也可能是我的一廂情願，誰知道這個小耗子又是怎麼想的呢？一直到晚上快上床睡覺了，盆子裏面都沒有動靜，也不知道小老鼠是一直在裝死，還是真的已經累死了，明天再說吧。可剛睡下不久，就聽見盆子裏有了聲音，但不是在吃我塞進去的飯菜，而是在刨地板。小老鼠的一口利牙還真利害，刨得地板嘩嘩嘩的響。怪不得常言說「老鼠生來會打洞」，老鼠想越獄那真是得心應手成功率極高的。可惜呀我沒有老鼠這種天生的好本事，想拜師學藝，一時半點也難得和鼠輩們溝通。也罷，逃命求生既是人類也是鼠類共同的本能，小老鼠也想媽媽的，何必難為它。我就起身先去牆角把鞋子拔了，然後把臉盆拿開，讓小老鼠逃回了洞裏。

唉，小老鼠是自由了，可是我呢？我哪一天才能回家見我的母親呢？我還不如一隻小老鼠喲。當然，我也不是完全不如一隻老鼠，我比老鼠強的地方，是我還能識文斷字。其他地方據科學家研究，老鼠並不比人類遜色多少。老鼠的DNA結構據說和我們人類就只差那麼一點點，智商快要趕上人類了，所以千萬不可小看。僅僅從保持對鼠類的那點優勢出發，我無論處境如何惡劣，讀書的能力絕不能喪失，否則說不定有一天會退化到連無名鼠輩都不如的地步，豈不慘了。我還是抓緊時間努力讀書罷！可是這個地方可讀的書實在太少了。

我有時想，如果有兩種徒刑讓我選擇：一是關我十年但不給書讀，一是關我二十年但有大量的書讀，我想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本來這兩年裏看守所在讀書方面對我還是比較關照的，可現在我讀書的範圍又大大被限制了，所長不知為什麼突然在閱讀方面卡起我來。當然後來我知道了，是因為所長在我姐姐面前屢屢碰了軟釘子，所以給我穿穿小鞋，也是做給我姐姐看的。但當時實在是不曉得我哪個地方得罪了所長，突然《紅樓夢》不讓看了，《辭源》也收走了，連魯

迅的書都不讓讀，英語方面的書更不用說。我幾年裏做的大量的讀書筆記，包括十幾萬字的《辭源》摘錄、魯迅著作摘抄、手抄的上千首唐詩宋詞，以及大量英譯漢和漢譯英的練習，也都被搜了個一乾二淨，美其名曰要拿去檢查。記得有回家裏給我送了本解放前出的英文版的《天方夜譚》和五十年代出的英文版雜誌《人民中國》，有位幹部也是扣下不給，說是要檢查內容。結果又說看不懂，只發現《人民中國》裏有劉少奇接見外賓的照片，所以也不是什麼好書，都給退了回去。這回把我摘錄的東西拿去檢查還不是見鬼，檢查得出什麼名堂？後來放我時我向所長要求發還搜走的那些筆記，所長回答說全都燒掉了。嗚呼！我何言哉。

再說我那時成天讀的書忽然全給拿走了，只留下《毛澤東選集》和一套《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四卷本) 和《列寧選集》(四卷本) 還准許讀，我一時真的如遭當頭棒喝。想來想去也還是無法可想，只得承認現實。心想不讓讀別的書也罷，馬列的書總還是准許讀的，那就讀馬列好了。我寫信回家，讓姐姐把她單位圖書館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從第一卷開始，一本一本的借來給我看，還有列寧全集，也一本一本的借來看。我打算乾脆系統地學一遍馬列，爭取把他們的著作通讀一遍，力求弄清楚究竟什麼是真馬列，什麼是假馬列。我相信現在有很多東西都絕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不是說有的社會主義是假社會主義，屁股上蓋有封建主義的印記麼？我就要看看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的屁股後，是不是也蓋有這樣的印記？我還想研究一下我們現在這種據說已經徹底的消滅了剝削的制度，究竟還存不存在新的形式的剝削和新生的剝削階級？

在認真地讀過馬克思有關政治經濟學方面的著作，特別是仔細地讀過《資本論》第一卷後，我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雖然名義上不存在人對人的剝削，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實際情況是有一部分分享有特權的人，利用手中掌握的那部分權力，通過對公共財產即國庫(或國有企業、集體企業資產)的某種程度上的無償佔有或者說是掠奪，而對廣大群眾即財富的生產者進行了剝削。相反，在資本主義國家，資本家事實上並不像教科書中說的完全是不勞而獲，無償佔有了無產階級在生產中創造的全部「剩餘價值」。

第一，資本家作為大生產的管理者，其本人就是財富創造者中的一員，而且是從事一種高級的複雜勞動，並非只是憑藉手中的資本對工人進行剝削。

第二，資本家所佔有的資本，在實際上並非全部屬於他個人及其家屬所有。除了用稅收的方式將其中一部分還之於民外，它的絕大部分事實上也社會化了。資本必須用於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部分財富用於社會福利事業。資本家真正用於自身消費的，僅僅佔財富的極小部分。

而且對於資本家而言，還存在一個因各種因素隨時面臨破產的風險，而「社會主義國家」中的特權階級，卻不承擔任何這方面的風險。對剝削及剝削階級的這種認識，是我學習馬克思著作的一大收穫，只是我當時概念中的特權階級，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官僚主義者階級，或文革中所謂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我在讀馬克思的著作時，還特別注意馬克思關於法方面的文章，尤其是有關罪與罰及監禁制度方面的論述。我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中讀到一篇文章，文章對一本名叫「巴黎的秘密」的小說進行了批評。馬克思說到書中一個被關進單人牢房的綽號叫「校長」的罪犯時指出：「校長」正確的描述了一個與外界隔絕的人的情況。一個人，如果對於他感性世界變成了赤裸裸的觀念，那麼他就會反過來把赤裸裸的觀念變成感性的實物，他想像中的幻影成了有形的實體，在他的心靈中形成了一種可以觸摸的、可以感覺到的幻影的世界。這就是一切虔誠的夢幻的秘密，也就是瘋顛的共同的表現形式。

讀了馬克思這段話，老實說我是大吃了一驚。因為我近一段時間愈來愈有意識地把白天當成黑夜，把黑夜當成白天；把現實視作夢境，而把夢境視作現實。我希望白天的現實其實只是一場夢，而晚上夢境中出現的一切卻是我現實中的生活。明知這是不可能的，但我卻情願用這種辦法來麻醉自己。我常常幻想有一天我醒來時，發現牢獄生活不過是一場噩夢。我仍然是做夢前的那個二十多歲的大學生，我的面前仍然是燦爛的陽光、是錦繡的前程。我仍然在和同學們一起上學、一起娛樂、一起鍛煉；我每個禮拜六還是照常回家，吃母親做的飯菜，和家人共享天倫之樂。而在夢裏，我常常就回到了學校、見到

了同學，和他們一道坐在教室裏上課；我有時也回到了家裏，見到了父母甚至鄰居。但所有這些總是恍恍惚惚的，若即若離，混混沌沌。而且不管是同學還是父母，從來沒有一個人同我說過話，都對我很隔膜。不管我怎樣拉扯他們、央求他們，都只是冷冷地看著我，好像不認識我一樣。我很孤獨和難受，常常就哭醒過來。

而醒來後子身一人，倍覺淒冷，覺得倒不如回到夢中去的好。也因為白天裏思慮過度，晚上不入睡則已，一旦入睡必然馬上墜入夢境。很多年裏，我夜間很少有睡著的時候，通常一晚上能睡著一兩個小時就不錯了。睡還是沒睡著，只聽外面小東門鐘樓報點的鐘聲就行了。十點、十一點、十二點，然後是一點、兩點，都聽得清清楚楚，也就是說，我一直沒睡著。如果沒有聽見敲三點，那就是說我兩點到四點之間是睡著了的。如果四點也沒有聽見敲，我的睡眠時間就超過了一個鐘頭。倘若五點也未聽見敲，我的睡眠時間就在兩三小時左右了。但這樣能睡著兩小時以上的美事很少有，一般能夠甜甜的睡上一個鐘頭而不是通宵不眠，我就感到非常滿足。

除了聽打鐘之外，判斷自己睡沒睡著的另一個辦法，就是看晚上做夢沒有？做夢就是睡著了，沒做夢就是沒睡著；什麼時候做夢了，什麼時候就睡著了；夢做了多久，就睡著了多久，一個夢沒有，就是一晚上都沒睡著。多年來都是這樣，很少有過例外。夢成為我睡眠中形影相隨的忠實夥伴，從來沒有背叛過我。

後來夢做得多了，做夢的本事愈來愈高，我漸漸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對做夢進行控制。晚上合上眼，慢慢的腦子裏恍惚起來，靈魂似乎掙扎著要脫離自己的身體，眼前開始出現幻影。這個時候我的思維有部分仍然是處於半清醒的狀況，我知道我馬上就要做夢了，我能感覺到這個，我也盼望立即進入夢境。我現在要做的，就是盡量讓夢按照我的意願去發展：我想回家，多半就能回到家裏；我想回學校，也多半能夠如願以償。

不過我最多的時候是希望在夢裏能見到小劉，而做夢時我總是能夠一入夢鄉便隱隱約約地看到她，但是不知為什麼我卻永遠無法接近她。有好幾次小劉就在我面前背著我站著，我喊她，她回頭朝我嫣然一笑卻走開了。我追過去，卻總是追不上，我的兩條腿老是灌了鉛似

的邁不開。夢裏既不能如願以償，夢醒時只能是淚流滿面。儘管如此，我還是渴望再次進入睡眠重溫舊夢，我只能在夢裏追求我在現實中被剝奪了的屬於正常人的生活，而在夢裏我多少還能體驗到一點殘缺的人生的快樂。我甚至希望過永遠就停留在夢境裏不再醒來，因為醒來後除了痛苦還是痛苦，醒來後永遠是無路可走，我醒來做什麼？

但是看了馬克思說的那些話，我開始警覺了：如果一個人的生活，在這個人的眼裏已經只是一連串的夢境，而真正的夢境對他來說倒成了他希望中的實際生活，到了夢幻與現實不大分得清楚之時，按照馬克思的分析，這個人就離瘋顛已經不遠了。我不知道我的那幾個不幸的同伴究竟是怎樣發了瘋的，是不是都是在經過這種將夢幻當做現實的階段後，才徹底地走向了精神錯亂？反正我相信馬克思的話有道理，也許我目前的精神狀況就已經不太正常。從來都只聽說做夢是下意識的，人睡著了，不知不覺中才做夢，從來都不曾聽誰說過半睡半醒的知道自己就要做夢，而且還想做什麼夢就做什麼夢。做夢又不是後來人們玩電腦遊戲，滑鼠指向哪裏，遊戲就跳到那裏，完全由自己的腦袋來控制。做夢是無意識的，一個人能做夢做到隨心所欲，恐怕不是一件好事。夢做到這種地步，大概已經接近精神不正常，這太危險。我必須懸崖勒馬，從夢中回到現實。

我只能用潛心閱讀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的辦法，來維護我頭腦的清醒。而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也還真的是一服醒腦的良藥，不但幫助我克服了一段時間裏思想上的空虛，而且使我在馬克思主義ABC方面得到一次真正的啟蒙，懂得了許多過去總是懵懵懂懂似懂非懂的東西。我非常欣賞馬克思說過的一句話——我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我相信在我們這個自稱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國家，這些年來奉行的並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政治舞臺上跳來跳去的，恐怕多數不是龍的傳人，而是一些「跳蚤」。德國詩人歌德不是寫過一首詩就叫「跳蚤歌」麼，諷刺「跳蚤當了大官了」如何如何，就是挖苦的這種竊據政壇高位的政治跳蚤。問題是這種跳蚤後來是愈來愈多了，上上下下都在跳（儘管忠字舞是不大聽見有誰跳了）。但是到了七六年天安門廣場事件※32爆發時，跳蚤們已經是最後一跳了。當局對天安門

廣場上的革命群眾的血腥鎮壓，標誌著文革十年來，神州大地上演出的種種倒行逆施天怨人怒的醜劇，已經演到了最後一幕。

對於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這個「四五運動」，我們在牢房裏所知道的情況，自然只能來源於官方的報紙和廣播。當時對這個事件的起因與內幕雖然不清楚，但是當局動用武裝力量血洗天安門廣場的舉動，已經足以使我感到震驚。類似的事情不是沒有過，一九三六年北京的段其瑞執政府，就曾經用同樣的手段，對付過北京女子師範大學請願的學生。魯迅先生特地為此寫下了那篇著名的悼文《紀念劉和珍君》。然而我實在無法想像四十年後的北京城，毛主席共產黨治下的新中國的首都，而且是在天安門廣場，正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下面，在一百多年來為著新中國的誕生而前仆後繼、英勇犧牲的革命先烈的在天之靈面前，由革命人民的「偉大領袖」本人親自批准，對人民群眾進行暴力鎮壓。

當然，據報紙說「利用清明節，蓄意製造政治事件」的，只是「極少數別有用心的壞人」，鎮壓和逮捕的也僅僅是一小撮「反革命暴徒」。但據我切身的體驗，官方的輿論宣傳是信不得的，常常需要從反面去理會才對。魯迅先生早就說過了：稱「人民」為「反動分子」，是黨國的拿手戲。雖然如今的「黨國」不再是國民黨的黨國，但「拿手戲」卻似乎是一脈相傳了下來。所以為了出師有名，按報紙上的說法，鎮壓和逮捕的當然只是「極少數」和「一小撮」壞人和暴徒。但讓當局難以自圓其說的，是這「極少數」壞人和暴徒，竟要出動上萬的民兵和軍警來對付，這「壞人」和「暴徒」的能量也實在太強大了吧。

天安門廣場事件發生後，當局為了證明廣場上那「一小撮」鬧事者的「反動」，在報紙上選登了好些鬧事者張貼在廣場周圍的「反動」詩詞。印象比較深的是一首五言詩：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以及緊隨在這首詩後的一段話：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始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了，我們信仰馬列主義。如此「大逆不道」的言語，竟然公開出現在天安門廣場並廣為傳播，表明世道與十年前文革開始時已完全不一樣了。經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折騰，人民群眾已經覺醒，開始敢於喊出與最高當局完全不同的聲音。我覺得這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不管當局如何

對這個事件定性，它實際上標誌著個人迷信的時代已經終結，中國確實已不再是過去的中國。

一九七六年是我們中國人所謂的「龍年」，但這個「龍年」給「龍的傳人」並沒有帶來「浩蕩龍恩」。除了天安門廣場上的血雨腥風之外，七月份河北唐山發生了少有的特大地震，接著又有四川松潘、平武大地震。就在這接二連三的天災人禍之中，朱德委員長、周恩來總理和毛澤東主席相繼去世。中國黨政軍三巨頭都在同一年中先後死去，也夠玄乎了，龍年不經意中竟成了中國政界中三條巨龍的「凶年」。而兩次大地震中死亡的數十萬老百姓，彷彿是在為他們幾位巨頭「殉葬」。天意乎？這老天爺也太殘忍了，竟當真拿無數生靈作人俑。難怪老子要罵「天地不仁，以萬物作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作芻狗」，這天地怎麼就和「聖人」一樣冷酷無情呢？說到底老百姓並沒有罪呀！

天災人禍一起降臨到我們中國人的頭上，不能不說是我們中國人的曠世大劫難。毛澤東逝世時，全國舉哀，幾十萬老百姓死於地震之中，有誰來為他們舉哀？這也罷了，尤其令人無法理解的是，當地震發生破壞巨大死傷無數震驚全球之時，我們國家當時的政府竟拒絕其他國家提供救援，致使許多在地震後的廢墟下苦苦掙扎的受難者，因得不到先進技術的援救而失去了生還的機會。與此同時，一座耗費巨大的毛主席紀念堂開始在天安門廣場建造，毛的遺體將安放於其中「供中國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世世代代瞻仰」。

當我在牢房裏從報上得知這個消息時，首先想到的是文革中看到的一個資料。據資料吐露，建國之初在毛澤東的提議下，黨和國家的高級領導幹部們曾有一個協定，協定內容是領導幹部們死後遺體不保留、不棺葬，一律火葬。除少林寺和尚出身的許世友外，幾乎所有的中央領導都在協定上簽了名的，其中當然也包括毛澤東主席本人。現在周恩來、朱德都實踐了生前的承諾，周恩來甚至連骨灰都不要求保留，可是偉大領袖本人卻食言而肥，為自己死後建造宏偉的紀念堂來永遠保存自己的遺體。

當然，偉大領袖已經停止了思想，他也許並不曾有過永遠保存遺體的指示，但是他親手選定的接班人是這樣做了。這位接班人要麼就是在主席生前接有為主席建造紀念堂的密旨，那麼就是毛本人踐踏了

那紙協定而為接班人所認可；要麼就是這位接班人違背毛的意願自作主張，二者必居其一。而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他都不是個好的接班人。但是很奇怪，這位接班人卻被捧為繼偉大領袖之後的「英明領袖」。對這位「英明領袖」，據說偉大領袖生前有個手諭，謂之「你辦事，我放心」。現在英明領袖搞了一個地方供其躺在裏面高枕無憂，他自然是一百個放心了。從報紙和廣播中知道，這位令偉大領袖放心的接班人叫華國鋒，曾經當過湖南省委書記和公安部長，是直接參與對四五天安門事件「平暴」的有功之臣。

毛主席的逝世無疑是中國政治舞臺上的一次「特大地震」，而這個政治地震發生的時間，就我個人而言還真不是時候。這一年的八月，與我同案的張志揚已經出獄。據我後來得知，七四年三月起，案子就已交給省高等法院審理。省高法接手案子後，已陸續釋放了田國漢、干毅，並許可周凝淳保外就醫（在高法接手之前，周嶽森已被釋放回華工）。據說釋放張志揚後，下一個準備釋放的就是我，時間就定在九月底國慶日之前。可毛主席正好九月份逝世，毛一死，中國一時間像塌了天似的，釋放我的事也就擱置下來。而這一擱就擱了整整又是三年。這三年中，張志揚已經在中國的哲學界嶄露頭角。他的研究馬克思的《巴黎手稿》的論文，引起了國內外哲學和美學界的注目，並以此作為他文字生涯的開端。而我們其他人則還在監獄裏作苦海沉浮，包括那位曾預言「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正是毛身邊最危險的敵人的童丹。

童丹和張志揚一樣，在哲學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詣。據周凝淳說，最初童還是張進入哲學之門的引路人。但是張志揚在獄中有機會深研了一部《西方美學史》和一部《西方文論選》，作了三十多本讀書筆記，並且將這批筆記帶出了監獄。而童丹卻沒有這種機會，在獄中無法獲得研究學問必需的書籍，以致三年之後童出獄時，在哲學這個領域只能望「揚」興歎。

我在哲學這些領域自然都是門外漢，我其實只對文學興趣強烈。文革中不幸捲進了政治，而實際上我對政治又只一知半解。如《紅樓夢》上說的，「小孩兒家說話口沒遮攔」，不自覺中開罪於權貴，惹下天大的災禍。結果不但主席生前我要遭殃，就連主席去世也要在時間上

剛好卡在我即將獲釋之前。可見古人說得對：「獲罪於君，無可逃也」，偉大領袖是萬萬得罪不起的，得罪了他生前死後都要讓你有罪受！所以儘管明知黨的高級領導幹部有過死後不留遺體、不棺葬的約定，華國鋒還是將偉大領袖裝進水晶棺材，塞滿防腐劑供人永遠瞻仰。華國鋒這樣做，既是不辜負主席生前對他說的那句「你辦事，我放心」的話，大概也有用「死諸葛嚇走生司馬」的用意。

華國鋒眼中的生司馬，想來就是四五天安門事件後，被廢黜軟禁在家的鄧小平。無論是從能力、資歷還是人望等方面講，華都難望鄧之項背於萬一。華只能拉大旗作虎皮，抬出毛澤東來維護自己的威信。另外毛的遺孀江青等人也在虎視眈眈，覬覦著毛死後空出的位置，對華的領袖地位構成直接的威脅。但既是毛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威風還是有的，他在黨內元老葉劍英、李先念等人的支持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舉粉碎了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33。從「第一夫人」變為「毛的遺孀」，繼而淪為「階下囚」，江青的這個三步曲意味著中國歷史進程開始出現重大改變。華國鋒在這個歷史的轉折關頭發揮了作用，應當說是功不可沒。

我在獄中消息閉塞，直到十月中旬，才從報紙和廣播裏知道「四人幫」被粉碎的新聞。記得那天晚上，就聽見監獄外面在遊行，喊「打倒王洪文！打倒江青！打倒張春橋！打倒姚文元！」的口號。在這四個打倒後面還有一個打倒，但聽不清楚，好像是打倒什麼「食人番」——也不知道黨內幾時竟出了這麼一個怪物？第二天看報才知道，是打倒王江張姚「四人幫」——黨內揪出這個「四人幫」是福是禍，以我那時的孤陋寡聞是無法作出判斷的。只是毛的遺孀突然被捕使我頗為吃驚，一時確有「改朝換代」之感。

其實對於江青我從未有過好印象。江青仗著毛夫人的身份有恃無恐，到處招搖，讓人反感。我早就在私人場合對同學說過，江青稱不上文化革命的旗手。進看守所時還偷偷寫過詩，曰「待到大澤東逝去，江上何處見峰青？」現果不其然一語成讖。四人幫中的「狗頭軍師」張春橋，也是我們曾經公開批判過的對象。不管當時批他的角度對不對，反正我們對他的陰陽怪氣從來都沒有過好感。這個手上沾有上海「紅革會」學生鮮血的劊子手，無論他爬得多高，我們怎麼看都像是個「奸

臣」。後來報上陸續公佈了「四人幫」在文革中犯下的大量罪行，這夥人果然是罪大惡極，死有餘辜。

不久「四人幫」在各地的黨羽紛紛落網，我們武漢也抓了幾個人。被抓的夏邦銀、朱鴻霞、胡厚民、張立國，都是我十分熟悉的。我也不知道他們是怎樣淪為「四人幫」的爪牙的，恐怕也是時勢使之然罷。以他們文革中的地位以及日益膨脹的權力欲，「不歸墨、則歸楊」，想不投靠中央的某派勢力也難。據我所知張立國作為武漢的「新派」首領，與夏朱胡一直爭權奪利，矛盾很深。在鬥爭策略方面張和「鋼派」頭頭也有分歧，與掌實權的上層領導的關係據說倒不錯，怎麼也和夏朱胡一起給抓了起來？這在當時對我來說是個謎。出獄後才知道，上面本來是不打算抓他的，可原「百萬雄師」的人心有不甘，擅自抄了他的家，結果抄出他寫給江青的一封效忠信，還有針對省裏一些老幹部的告密材料。張立國於是成了搞兩面三刀的「反革命兩面派」，被定為賣身投靠四人幫的壞頭頭給抓了起來。

對於張立國被抓，老實說我倒是有點幸災樂禍。想當年你張立國不是投靠「曾劉首長」，對我落井下石，將我這個同齡同校同年級的校友推進火坑麼？你這個用同窗的血染紅自己頭上的官翎的新貴，也曾想到過有一天會和我一樣坐監獄麼？從「省革委會副主任」的顯赫地位，一下子墜落為「無產階級專政」的階下囚，那滋味想必是格外特別的。實在話，我倒是非常想那天有機會和張立國同同號子，和他切磋切磋坐牢的感受。

不過想是這樣想，要在牢裏會張立國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他們的案子也該是屬於中央直接抓的專案，大概有專門的地方關押他們吧。我最關心的其實還是自己這個案子。我這個案子還是毛在世時定的，多少年了遲遲不決拖成了懸案。現在英明領袖華國鋒上了台，我們這個懸案該是解決的時候了。我想文革十年積壓的冤假錯案大概多得足以汗牛而充棟，華國鋒倘真是個「英明領袖」，就該快刀斬亂麻，大刀闊斧地清理積案，糾錯平冤。古人有言：「大小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華主席倘能如此，則可謂「忠之屬也」，倒或許能稱得上「英明」二字。可究竟如何，還須拭目以待。

那時全國上下都只管宣傳華主席如何是當之無愧的黨的最高領

袖，鋪天蓋地一片歌功頌德聲。據說山西一個叫交城的地方是華的故鄉，華在交城一帶當過武裝大隊的政委，於是廣播裏便唱出「交城的山來交城的水，交城出了個華政委」這種肉麻的歌來。可惜中國人信奉天無二日，否則只怕會唱「太陽升，東方紅，交城出了個華國鋒」。有一個歌劇是寫十五歲的革命小英雄劉胡蘭，面對閻錫山部隊的屠刀英勇不屈壯烈犧牲的事蹟，「四人幫」垮臺後復排公演。我在牢裏聽過轉播，但聽見劇中的劉胡蘭在臨刑之前唱道：遙望西山，彷彿望見了領導人民鬧翻身的華政委。乍一聽差點令我噴飯，不過仔細一想，反正劉胡蘭犧牲已經四十年，編劇本的人愛怎麼編就怎麼編罷。不是提倡革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針嗎，讓胡蘭子在舞臺上「彷彿望見了華政委」，也無可厚非。不過我還是懷疑據說只有初中文化的「英明領袖」，是否擔得起「偉大領袖」那副巨肩扛過的革命重擔？他有沒有那個本事我自然不知道，但他至少文化程度太淺，當個遊擊大隊的政委也許還馬馬虎虎，要當中國這樣一個快快大國的領袖，似乎還差一點。

舉個例來說吧，華國鋒有次視察大慶，中央廣播電臺當晚播放了他視察時的現場講話錄音。話不多，卻暴露出這位「英明領袖」的文化底蘊不足。華當時對大慶的職工們發表講話說：外國人做得到的，我們中國人也做得到；外國人做不到的，我們中國人也要做到，而且做得更好！我一聽就覺得此話差矣：外國人做不到的，我們中國人也要做到，這就比外國人強了，怎麼又冒出個「而且做得更好」出來了呢？比誰「做得更好」呢？所以「英明領袖」這段講話雖然很長我們中國人的志氣，從語法的角度來分析，卻是個可供小學生改錯的病句。

當然，偉大如毛澤東那樣的領袖，到了晚年也不免說些不通的話。比如關於黨組織的那段著名的「最高指示」即「黨組織應是由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進行鬥爭的先鋒隊組織」這句話，其實就是個典型的病句，病在「能」字之前多了個「應」。但毛是寫文章的大師，有深厚的文字功底，晚年有點糊塗，說話偶爾冒出點把語病，只能算是語誤，不必苛責。華並不老，說些不大通的句子，只能怪他語文尚未過關。

粉碎四人幫後不久，按照中央的部署，各地都抓了許多「小四人

幫」或稱「四人幫分子」，監獄裏一時人滿為患。我住的號子，也臨時加了一個剛收監的犯人。但此人卻並非造反派的「壞頭頭」，倒是個原屬「百萬雄獅」的鐵杆老保。這位姓王的保保因保皇有功，又是黨員，早已被提拔為武昌區政府的科頭。抓「四人幫分子」時，竟把他這種正在走紅的保保也抓進來了，其中必有緣由。但此人城府頗深，一段時間閉口不提他的案情，我想方設法掏了幾次，都沒有從他嘴裏掏出他肚子裏的牛黃狗寶。

那天廣播華國鋒的講話，這個保保也和我一起聽了的。他聽我說華國鋒的講話有毛病，馬上反駁說不可能。他說華主席是毛主席親自選定的接班人，水準難道還沒有你高？我說這無關什麼水準高不高，而只是一句話通不通的問題，我只不過就事論事。保保堅持說華主席的話沒有什麼不通，我就問他華說的「做得更好」是比誰更好？他說是比外國人做得更好。我說外國人根本就沒有做過的事，怎麼說得上我們比他們做得更好呢？他又說是比我們自己以前做過的做得更好，我說以前我們不曾做過的事情，也不能說現在比過去做得更好，但是如果說「而且將會做得越來越好」倒是可以的。

保保辯不過我，就說我只會鑽牛角尖，咬著雞巴乾爭。他還說我喜歡自作聰明，難怪要坐這麼多年的牢。說我喜歡自作聰明，倒是一針見血，我就是這種臭脾氣。粉碎「四人幫」以後，也就是七七年夏天，家裏給我送了期新出版的《人民文學》，讀後，我就曾對趙樸初先生關於董老的一句詩的解釋提出過質疑。用個鉛筆頭寫在一封家信的背面，請家裏人贍清了寄往刊登過趙文的《人民文學》編輯部。用鉛筆寫的文章的底稿還在，如下：

《人民文學》編輯部：

貴刊七七年第一期發表了董老「九十初度」七律一首，並有趙樸初同志的一篇解釋。趙文深入淺出、明白易懂，對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深入領會董詩精神極有助益。但細讀董老原詩，感到趙注尚有個別地方值得斟酌。董老詩中「徹底革新兼革面，隨人治水與治河」兩句，說的是改造主觀世界和改造客觀世界兩件事，趙注對頭一句的解釋是用無產階級思想徹底的改

造自己的世界觀，這不錯；後一句趙解釋為「山河隨人的意志重新安排」則不確。我認為詩中的「隨人」並非指山河「隨人的意志」，而是指詩的作者決心跟隨偉大領袖毛主席，和廣大人民群眾一道投身於治山治水改造中國的革命實踐。趙注顯然把董老詩中這層重要思想忽略了。上述意見不知可供參考否？

一青年讀者，七七年七月十六日於獄中

信寄回家後，也不知家裏人是否贍清轉寄給了《人民文學》編輯部，反正我這篇質疑趙注的短文就是寄去了，大約也是沒有人理會的。所謂人微言輕，更何況我又注明是寫於獄中，誰會認可一個在押犯人在獄中對權威的質疑呢？其實我也並不指望《人民文學》會發表我這篇短文，我不過是手癢罷了。正如毛澤東五七年回答魯迅倘活到今天會怎樣這個問題時說的，「關在牢裏還是要寫」，這就叫積習難改。實際上粉碎四人幫之前，批林批鄧鬧得最凶時，我看到《人民日報》上一篇署名「梁效」的文章，將古代一個叫盜蹠的強盜神侃海吹，說成是中國古代奴隸起義的傑出領袖，甚至與古羅馬奴隸起義的英雄斯巴達克相提並論，覺得簡直是信口開河。好歹我在獄中這些年來，也讀過一點中國的古代史。這個被梁效吹得神乎其神的盜蹠，其實不過是見於先秦諸子文章中的一個寓言人物，司馬遷在《史記》中甚至提都沒有提過，更遑論什麼奴隸起義的傑出領袖了。我當下就用鉛筆頭寫了篇駁斥梁效對待歷史胡編亂造的文章。文章寫好後我交給幹部，問能不能幫我寄給《人民日報》，幹部說看看再說。拿去後便泥牛入海無消息，讓我眼巴巴空等了一陣。對郭沫若寫的那本《李白與杜甫》，我也頗有微詞。郭在書中抑杜揚李倒也罷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由他說去。可郭沫若為證明其說所使用的那種強詞奪理的考證手段，卻端的叫人噁心，實在不像是文壇耆宿的做法。

回想文革剛開始時，郭沫若曾在一次講話中說，拿今天的標準來衡量，他以前寫的東西，嚴格的講都沒有一點價值，應該全部燒掉。其實他以前寫的一些詩歌劇本和文章，倒是頗有價值的，統統燒掉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像七二年重版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是一篇好文章，文章的最後總結說，「大凡一位開國的雄略之主，在統一固定

了之後，便要屠戮功臣……自成的大順朝即使成功了，他的代表農民利益的運動遲早也會變質，而他也必然會做到漢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說是斷無例外。」我在獄中讀到家裏送來的這本書時，覺得無論於古於今，郭沫若這篇文章都極具針對性，是以史為鑒的一篇佳作。連毛澤東在《學習和時局》一文中都特別介紹過的這篇文章，難道也要燒掉嗎？倒是像《李白與杜甫》這種趨時附勢的應景文章早點燒掉才好。

且不說我好與權威頂牛所以要挨整，像保保這麼謹小慎微的人，怎麼也會坐起牢來呢？我便趁機問他。只聽他長歎一聲說，英雄難過美人關，都是一個色字惹的禍。原來這位保保，和我剛進監獄那年同過號子的那個姓汪的小混混是一路貨色。只可笑這些人玩弄女性玩裁了，卻偏偏好意思自稱英雄。那天晚上，這位「英雄」終於對我和盤托出他是怎樣因女人栽的跟頭，讓我這「童子仔」大開了一回眼界。

這位保保本來不過是武昌一家街道福利工廠的會計，小時候得過小兒麻痹症，是個跛子。文革中參加了「百萬雄獅」組織，當了個小頭目，手下有一大堆跛子、駝子、聾子、瞎子。這些殘疾人「身殘志不殘」，打起架來向來不要命的，在對造反派的武鬥中自然大顯身手。「七二〇」後保保被定為「百萬雄獅」的壞頭頭，吃了不少苦頭。後來揭批「北決揚」、「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造反派一個個倒了瓦，翻身得解放的保保苦大仇深，文革中又指揮手下武鬥有功，結果當上了區委的人事勞動科的科長。官雖不算大，卻是個管勞動人事的實權人物。他也很會用權，利用一些人有求於他的機會，為自己撈了不少好處。所謂飽暖思淫欲，保保開始把目光盯向漂亮女人。而有求於他的人中正不乏漂亮的的女人，其中一個據說特別漂亮的女人，一來二往勾搭成奸成了他的姘頭。

「那不是一般的漂亮，那硬是叫妖精。」保保提起那個「妖精」女人兩眼就發直。「真的是個妖精變的哪，她那天一來找我，我一眼就被她迷得神魂顛倒了。我屋裏頭那個瞎明閉眼的婆娘跟這個女的比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給她倒洗腳水都不配。唉呀，你是有見過那個妖精，長的那個樣子吶，要幾迷人就幾迷人。那個鴨蛋臉嫩的，豆腐皮一樣；那個嘴巴櫻桃似的，那雙眼睛會放電。還有那個腰身、那個屁

股、那雙膀子……不說了，樣樣都迷死人。這輩子玩上這麼個女人，坐牢都不冤枉、不冤枉。」

「這麼妖精個女人，怎麼就甘心被你個跛子玩呢？」我有點疑惑地問他。

「她哪裏會甘心情願呢，她是看上我手裏的權嘛。她老家是漢川，五親六眷一大堆，都是求我幫忙，弄成了武漢的戶口，還個個都給安排了份工作。本來也有得麼事，只怪這個女的太貪，幫了她這多忙還不滿足，還成天纏到我要這要那。又是皮大衣，又是金首飾，我這點薪水哪裏夠她用。沒得辦法了只好挪點公款，挪的回數多了，哪有不穿包的？碰上單位查賬，查出紕漏來了，那些當過造反派的對頭哪裏肯鬆著眼（湖北方言：放過，原諒的意思），就給送進來了。」保保說完又長歎一口氣說，總而言之都是害在這個妖精身上。我說那是你自己找的，你不挪用公款給那個女的買東西，未必就會死不成？他說不給她買她就不跟他上床，他又捨不下她，只好要麼事買麼事，被個女人牽到鼻子團團轉，一直轉到牢房裏才不轉了。

他還說他還是划不來。他說曉得有幾多當官的玩女人，有的還玩了一個又一個。人家都屁事冇得，就他倒楣。說來說去，只怪他官當得小了一點。官大一點的話，隨麼錢不花，都有女人自己往他床上爬。他後來在我面前也沒有什麼顧忌，說了好多官場的醞釀事。自然，他說的那些雞巴屌的事好多都是「老革命幹部」做的，「新革命幹部」不管是老造還是老保，膽子都小些，還不敢像老的那樣肆無忌憚。

「你見過我們百萬雄師的一號頭頭俞文彬冇有？」有一天保保突然想起來說，「原來還不就是個小單位的武裝部的頭頭。如今曉得有幾威風！有次我們百萬雄師的頭頭們聚會，我也去了。忽然聽見有人一聲吆喝俞司令到！就像電影『戰上海』裏叫湯司令到一樣，就見一群人擁著俞文彬走進來。俞邊走邊向我們大家頻頻揮手，像個大將軍似的，要幾派頭有幾派頭。倘是你們造反派掌了權，那還不是該你們神氣。什麼是歷史？一個階級勝利了，一個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你不服氣也得服氣。」

我反駁說，歷史並不是像你說的這樣。文革中的兩派，就工人這一群體而言，都是屬於工人階級，不存在什麼「一個階級勝利一個階級

消滅的問題」。不管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裏面的絕大多數都是好人，也都混雜有少數壞人，以文革中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來作為是否提拔重用的標準是沒有道理的。就像你這種人，一當上官就用手裏的權力搞腐化，你能說是個好人？以派劃線，實質上就是以我劃線，誰保過自己就用誰，烏龜王八蛋也用，哪還不是任人唯親？就像你們的俞司令，文革中指揮武鬥殺人無數，手上是有鮮血的。他如今神氣是神氣了，多半是會青雲直上，但他究竟是英雄還是狗熊，得慢慢看。因為我從你剛才說的俞司令的威風中，看出此人是小人得志。《紅樓夢》裏有一句「子係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大凡得志便猖狂的人必非善類。我們不妨走著瞧！

出獄後聽知情人說，這位俞文彬後來果然一路官運亨通，一直當到外經委主任，後來又外派香港，補了個外經委駐港代表的肥缺。學者們常常辯論，文革後除了原先舊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最終在利益上得到了補償外，有沒有新產生的受益者呢？其實答案是明擺的，像俞文彬這類保守派的頭頭，就是文革的新受益者。這些人由於保老一輩的既得利益者即所謂當權派有功，而受到當權派豐厚的回報，通過文革後的財權再分配而從中分得一杯羹。文革結束後，幾乎所有的保守派頭目，不分良莠都提拔進入各級領導崗位這一事實證明了這一點。這種以派劃線作為提拔幹部的標準，顯然後患無窮。如果對後來黨內層出不窮的腐化分子的歷史進行追溯，往往可以發現這些人的全部政治資本，就是文革中「保皇」有功。

就拿這位俞文彬來說吧，其人在外經委主任的位置上口碑甚差，外派香港之後更是貪欲膨脹，瘋狂斂財。最後在得知將被勒令回國接受「雙規」之時叛逃，終成為民族的敗類。據說當初一手提拔他的一位老領導聞訊後氣得大罵，搖著頭說什麼保守派、造反派，沒有一個好東西！老領導此言差矣！文革中不管是保守派還是造反派，都是人民中的一分子。造反派中混有壞人，保守派中也混有壞人，但兩派中的絕大多數都是好的，並非「洪桐縣裏無好人」。群眾之所以人為的分成了所謂「勢不兩立」的兩派，歸根結底是毛主席的那條錯誤路線從中作祟。其實兩派之間並沒有根本的厲害衝突，不存在哪一派叫對哪一派叫錯的問題。

文革後來被全盤否定，照理說就更不存在誰對誰錯了，可是文革中的保守派卻在事實上被當成了一條並不存在的「正確路線」的代表，其頭頭一律被當作「先進分子」加以培養和重用。而文革中參加過造反派的那部分群眾，哪怕當時還是在校讀書的學生，無論本身如何優秀，也不能得到組織的信任而在政治上予以排斥。這種幹部路線和組織路線在排斥一大批優秀人才的同時，重用了一大批低素質的庸才。從這些平庸之輩中，我們不難找到許多像俞文彬這樣的腐敗分子。那位老領導有什麼好歎息的呢？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腐敗分子是你們自己的幹部路線造成的啊。

叫人尤其看不懂的是，當時湖北省有的領導人，在知道了俞文彬的叛逃行徑後，竟說什麼俞雖然犯了經濟上的錯誤，但是過去在政治上立場一直是堅定的，是和黨中央保持一致的。我實在不明白這些領導人嘴裏的「政治立場」，究竟是什麼「立場」？和黨中央保持的「一致」，究竟一致在哪裏？莫非他所謂的「立場」和「一致」，就是像俞文彬那樣搞腐敗麼？

且回到當時，和我同號子的那位保保，自然是不會同意我譏諷他們的俞司令是小人得志，他眼中的俞司令是他們老保中的大英雄。「成者為王敗為寇，」保保說，「朱元璋倘若敗在陳友諒手下，他就只有撿起打狗棍去討飯。他打贏了，當了皇帝，就是真命天子，就該他坐在金鑾殿上享福。你們造反派輸了，就該倒楣，就該挨整。你們搞打砸搶就是犯罪，就該坐牢，就該槍斃！我們百萬雄師搞打砸搶就是革命行動，是保衛無產階級專政。哪怕武鬥中打死人也是打的反革命，是好人打壞人，不但無罪還有功。什麼叫辯證法？這就叫辯證法！你們這種光會讀死書的書呆子哪裏搞得懂？」

保保還說，現在英明領袖華主席當政了，老幹部翻了身，老保也要大翻身。要專你們造反派的政！你們造反派的頭頭要抓一批、殺一批，殺關管一個都不能漏。新政權開初都是要開殺戒的！你曉得建國之初搞鎮反殺了多少人，每天一車一車的拉出去殺，殺得血流成河。你魯禮安雖然抓得早，恐怕也得作點準備。你搞的『北決揚』是中央點名的反革命地下組織，你又是個老造反派，只怕這回要跟你算總賬。」

我聽他說得殺氣騰騰的，也還真有點心驚膽戰。但還是反駁說，

沒那麼可怕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有責任他要負大部分。下面響應號召造反的，只要不是「四人幫」的死黨，總不會不分青紅皂白統統殺關管吧，否則豈不是打擊一大片？群眾當初起來造反，以為是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又不是要老蔣回來，說到底又有什麼罪？至於我這個「北決揚」的案子，本來就是林彪死黨搞的個假案。現在華主席既然是英明領袖，就該實事求是替我們平反冤獄，有哪門子總賬要算？

保保說，你們「北決揚」案是當時毛主席黨中央定的，報上最近一直在強調要按毛主席的過去的方針辦，所以你這個案子恐怕是沒有人敢替你翻的。我就和他抬杆，說案子是假的，遲早總會翻過來的。他賭咒說要能翻過來，他情願把他的姓倒過來寫。可是他的那個姓正著也好倒著也好都是個「王」字，所以他即使賭輸了，也於他毫髮無損。而我卻是輸不起的，我若輸了就是沉冤一世，我真的很為自己的命運擔憂。

保保和我同了幾個月的號子就服刑去了，大概是賴有「老保」這個護身符，聽說只從輕判了三年。多年後每當在報上讀到黨內腐敗分子被雙規或判刑的消息，我總是不禁會想到二十多年前與我同過號子的這個腐敗分子的老前輩。他想必會為黨內腐敗分子綿綿不絕而寬慰自己「後繼有人」，只是和動輒幾百萬、幾千萬甚至上萬萬的貪污，幾十個甚至上百個的搞女人的「後現代腐敗分子」比起來，他是自慚形穢或自歎不如呢，還是覺得自己點把點的腐敗就判刑太冤枉了呢？誰知道！反正他當年是「木匠造枷——自作自受」。

不過當時我自然顧不上去管他判得是重是輕，我關心的是「四人幫」垮臺後，形勢究竟會如何發展？因為這關係到我們這個案子將如何處理，關係到我們這些人的出路與前途。那些時外頭不但批四人幫，而且繼續批鄧，繼續鼓吹要「按過去的方針辦」，也就是按毛主席過去的那套路線方針政策辦。七七年二月，中央兩報一刊發表重要社論《學好文件抓好綱》，提出了「兩個凡是」的觀點，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看了這篇社論，我不覺倒吸了一口冷氣，這麼說豈不是凡是毛在世時點過頭的案子，不管是不是冤假錯案，都仍然不准翻燒餅麼？新的中

央領導班子似乎還是準備穿新鞋、走老路，除了剷除「四人幫」這夥威脅到他們權力的政治對頭外，並不打算布舊圖新，跟上世界歷史潮流。毛澤東選的接班人看來真的不怎麼樣，只會外甥打燈籠——照舊，蕭規曹隨，一點開創性的東西都沒有。唉，有道是河裏無魚蝦為貴，這麼大個中國，難道竟真的沒有一個在毛去世後能扭轉乾坤的英雄麼？

我很為我們國家的前途擔憂，為自己的前途擔憂。特別是有一次專案組來人找我談話後，我的憂慮就更加重了。來人要我不要心存僥倖，以為外頭的局勢變了會有什麼想頭。來人說「四人幫」一夥最大的罪行，就是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歪曲篡改毛澤東思想，而我的主要問題也正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歪曲篡改毛澤東思想。所以莫看我進來得早，好像和「四人幫」搭不上界，實質上我和「四人幫」是一丘之貉。話既然要這樣說，我有什麼辦法？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只有任人宰割的份，還敢反抗不成？

記得還是這個人，在林彪垮臺後也曾找我談過幾次話。他總是要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心存僥倖，以為林彪垮了臺我們的案子就有可能翻燒餅了。他再三強調我們的問題是黨中央定的案，是毛主席點了頭的，永遠也休想翻案！有一次他還要我向一個人學習，學他在毛主席面前保證過「永不翻案」。什麼「永不翻案」？我才不信哩。不翻案是沒有翻案的條件，火候還未到。一旦有了條件時機成熟了，你看他不翻案才怪！

事實上那位打倒、復出；再打倒、再復出，第三次又被打倒的老人，如今又第三次要復出了。報上已經能見到他的名字，在政壇上他又開始活躍。毛已經不在了，如來佛的手掌再也罩不住他了，他到現在了還「永不翻案」麼？騎驢看唱本，走著瞧好了。這個打不倒的老漢的案遲早是要翻的，七六年清明節天安門事件的案恐怕也是要翻的，薄一波、安子文他們那個「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案終歸也是要翻的。等這些毛澤東親自定的大案、要案都翻過來了，我們的案子也就有翻過來的希望！我相信最黑暗的時候已經過去了，我沒有理由悲觀。

號子裏晚上睡覺有個規矩，就是屋子裏的電燈是要通宵達旦的亮著的。亮著燈睡覺對人身體健康的損害已有定論，但看守所方面為了

便於夜裏監視犯人（據說主要是防止犯人夜間自殺），哪裏還管它有沒有損什麼健康。對此我們這些犯人也可以理解，開燈睡覺畢竟是為了我們犯人的安全嘛。不過我本來就有失眠的毛病，雪亮的燈光下就更加難得入睡了。可監規又是不可能改變的，我就想了個辦法，睡覺時把號子裏寫材料的小桌子放在鋪的一邊，但不會遮擋「班長」從門窗外觀察我的視線，然後再把一把芭蕉扇的扇柄用本書壓在桌子的一角，讓扇面伸出的角度正好能擋住屋頂上的那盞燈，恰好在我的臉部形成一小塊「燈下黑」。這樣既不影響「班長」監督我，也讓我多少能睡得安穩點。多少年來都是這樣睡的，也沒有誰制止我這樣做，「班長」們與我一直彼此相安無事。

但是自我「控訴」了那個用槍頭捅我的小當兵的後，這種相安無事的狀況就被打破了，有幾個「班長」格外愛找我的茬。且不說輪到我放風時，有幾個「班長」常常會突然向我圍過來，嘴裏罵罵咧咧地朝我身上揮幾記老拳，就是在晚上睡覺時我用芭蕉扇遮燈光這件事上，他們也要對我刁難。輪到他們夜晚值班時，就不准我用芭蕉扇遮燈光。他們說既然怕燈照眼睛，就乾脆不要來這個地方坐牢，既然是坐牢就不要怕燈照。對於他們的一套歪理，我如何辯得過？只得把扇子撤了，頂著燈照睡覺。「班長」的話其實並不錯，既然是坐牢，就講究不了那麼多，唯一盼望的，是黑夜早點過去。夜是這樣的長，什麼時候才能天亮呢？我期盼著。

夜如何其？夜未央；夜如何其？夜未艾。這是《詩經》裏的句子。但天終歸是要亮的，於是詩人最後吟詠道「夜如何其？夜嚮晨。」是的，夜色總要散去的，牢房裏頭頂上的燈光也將熄滅。在黎明到來之前，我仍在做我的夢。我夢見正踏上回家的路。回家的路好長啊，走了十年了還沒能夠走到頭。但我還得不停地走，因為我苦命的母親一直在家裏等待著我。哪怕年復一年地從春走到夏，從秋走到冬，從青絲少年一直走到滿頭的白髮，我也一定要回到我的家，回到母親的身邊。

夢中的路很長，趁夢還未醒的時候，我得抓緊時間趕路。



## 第二十四章

# 黎明的脚步聲

耶穌對他的門徒說：趁著有光的時候趕快行路吧！

可我的光在哪裏呢？而況即便有了光，夢醒了我還是無路可走。

然而，有一次在夢裏，我彷彿聽見有聲音說：醒醒吧！只要再走一步，你就會得到自由。

這不是浮士德對他的葛麗卿說的話嗎？但他不也沒有能救她脫離牢獄的苦海麼？

我又聽見另一個聲音說：明天早上，太陽升起的時候，我就要被槍斃了。因此，如果我要履行把一切都告訴你的諾言，現在就得履行了。這不是雷瓦士·牛虻臨刑前對瓊瑪說過的話嗎？他現在要告訴我什麼呢？

是了，他要告訴我，就在我還在獄中做回家的夢時，牆外的世界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岩漿聚能於地下，雷霆蓄勢於空中；山洪懸於千仞之峰將奔瀉，地火藏於萬丈之淵將噴發。古老的山嶽正在分崩離析，舊時代的屏障已經搖搖欲墜。

正如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所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七七年五月鄧小平再次復出後，中國的政治舞臺就愈來愈熱鬧了。鄧小平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恢復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職務，成為僅次於華國鋒的第二號人物。不久，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上提出要「撥亂反正」※34，十一月份的《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的一篇本報評

論員文章中，提出平反冤假錯案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看到這些文章，我感覺到我的案子有了希望。我每天都非常注意地讀報，細心捕捉報上有關平反冤假錯案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話。而最讓人高興的是，七八年四月三日，我終於十年來第一次被准許會見我的家人。

記得那天很冷，上午八九點了，我正偎在被子裏靠牆坐著，讀馬克思的《資本論》。忽然聽見開門鎖的聲音，我以為是要我放風，跳起來拿上毛巾臉盆準備出去。進來的是季幹部，他擺擺手，讓我把臉盆放下，說有件事要講一下。他說我來看守所已有上十年了，一直沒有和家裏人見過面。我一聽眼睛頓時一亮，今天有戲！且聽他下面怎麼講。季幹部接著說，你一直都想見見家裏人，你家裏人也有同樣的要求想見見你。所裏從革命人道主義出發，經請示省革委會領導批准，決定安排你和家裏人見一次面。

我一聽高興極了，連稱謝謝，又忙問幾時能安排我們見面？季幹部說，已經安排好了，現在你的父母親和姐姐就在大門口的會客室裏等你，你換身乾淨整潔點的衣服準備會客。同時，季幹部給我「約法三章」：第一，不可講自己的案情；第二，不可講監獄裏的事情；第三，不可打聽其他案犯的情況。季幹部說，這些目前都屬於國家機密，如果你觸及了，我們會馬上警告，若再不聽，立即取消會見。

季幹部說會見時間為三十分鐘，可以說說自己在這裏思想改造方面的進步，也可以問問家裏人的情況，問問其他親戚朋友的近況也可以，但注意不要涉及到與案子有關係的人。季幹部還特別囑咐我與父母見面時盡量克制自己的感情，說多年沒有見到親人，突然見了面難免會傷感，這也屬人之常情。但盡量不要哭，哭狠了只會叫你父母心裏難受。而且一哭起來搞得不可收拾，都只顧哭去了，什麼話也談不成，而時間只有半個小時，你自己要掌握好。

我說，季幹部你小看我了，我見到父母絕對不會哭，一滴眼淚都不會流，你信不信？季幹部說，大話莫要說早了，高玉澤這個人你應該聽說過吧？我說高玉澤不是新華農的革委會主任嗎？還是團中央委員、全國團代會的代表，報上經常見到他名字的新聞人物嘛，怎麼會不知道。季幹部說高玉澤現在什麼都不是了，他犯了生活作風方面的錯誤，關在我們這裏已經有好幾個月。上個月所裏讓他和他老婆孩子

見了一面，會見時他和老婆抱頭痛哭，哭得天昏地暗，半個鐘頭裏幾乎什麼話都有說成。人家這還只不過是兩三個月有見面，你和家裏人是上十年有見面，誰知道見了面會是麼情況？我提醒你注意盡量克制，是為了你們一家人好，你也用不著充好漢。

我說我不是充什麼好漢，是我和高玉澤情況不一樣。這樣說時我心裏想，高玉澤當然要哭了，他正仕途看好、青雲直上之時，卻為「生活作風」問題斷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面對老婆他焉能不悔？焉能不哭？而我坐的是十年冤獄，我悔什麼？分隔多年父母都健在，能見上一面是高興的事，要盡量讓他們喜歡。要讓他們看到自己的兒子是個頂天立地的漢子，並沒有被苦難壓倒。我知道父母喜歡我是這樣的精神面貌，這才是他們的好兒子。倘哭哭泣泣作小兒狀，那才真的會傷老人的心呢。於是，我提起精神，興致勃勃地跟著季幹部去會客室。

走出放風場，穿過一道鐵門，前面是一條通向看守所大門的長長通道，老遠就看見姐姐站在會客室的門外邊，正在朝通道的這一頭張望。姐姐顯然也同時看見了我，就聽見她對會客室裏的人連說「來了，來了！黃毛來了！」很快就看見父親母親都從會客室裏站出來，臉上都是歡欣之色。我走近父母，抓住他們已經伸出的雙手，喊一聲「爸爸！媽媽！」眼淚在我眼眶裏打轉，但我不讓眼淚流出來。我一手拉著父親的手；一手拉著母親的手，和他們一起進了會客室。父母一左一右，挨著我在一張長凳上坐下。我挺直腰板坐著，不敢直面母親的眼睛，我怕我會受不了她慈愛的目光，我怕我會忍不住嚎啕大哭起來。

母親緊緊地挨著我，一隻手抓牢我的手，好像生怕我會從她身邊飛走，另一隻手輕輕地撫摸著我的臉。母親的眼睛則一直都放在我的身上，從上到下，又從下到上，總是看不夠。這一切和十年前母親在鐵山與我最後一次見面的情景多麼相似啊，但母親已經顯得有些蒼老了。母親的眼角已經有了皺紋，母親的頭上已經出現許多白髮。我不知道這十年來母親是怎樣熬過來的，不知道她為我的問題在大會小會上挨過多少批鬥，受過多少唾罵；不知道她頂著我這個「反革命」的母親的惡名，是怎樣在周圍人歧視的目光中，走過漫長的歲月；我也不知道生性剛烈的母親因為始終堅持自己的兒子不是反革命，吃過多少

苦頭。我只知道母親還是我的母親，只知道母親這十年中無時無刻不在惦念著我，盼望我早日回到她的身邊。

但母親再也不會像當年在鐵山那樣，同綁架關押我的人據理力爭了；她再不會像當年當著綁匪的面，也敢鼓勵我對的要堅持，錯的要改正，要「堅持真理」了。她現在面對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機構，是看守所、是監獄。她只能小心地問我這上十年來在這裏過得怎麼樣？身體有沒有病？要我好好服從幹部的管教，爭取早日回家和家裏人團聚。一直站在我對面的姐姐插嘴說，媽媽這多年來每年的除夕全家一起吃年飯時，都在飯桌上多留了一副碗筷。媽媽總是盼著正吃年飯時你從牢裏放回來了，總在做這個夢。我說媽媽放心，現在都在落實政策，清理積案，我的問題早就搞得清清楚楚了，政府會實事求是地處理的。我又問母親，家家是不是不在了？母親說，你怎麼曉得家家不在了？我說，我在信裏問過好幾次家家的情況，家裏回我的信卻從來都不提到家家，我就知道我再也見不到家家了。

姐姐說，家家前年是冤枉死的。有一陣肚子莫名其妙地疼，到醫院檢查，說是肚子裏長了瘤子要動手術。可等醫生打開家家的腹腔後，什麼瘤子也找不到，一直在肚子上開了足有尺把長的口子，還是什麼都沒有發現，只好又把口子縫上。家家已經是七十多歲的人，就這樣活活痛死在病床上。家家死前老念叨著要見你一面。我們找過看守所，看守所請示上面，上面不批准，他們也沒有辦法。

姐姐說這回媽媽患尿道結石，石頭有黃豆大了，發作起來叫人痛得死去活來，只好開刀。協和醫院裏床位都聯繫好了，過幾天就要上手術臺。媽媽擔心手術又出意外，堅決要求見兒子一面。還好，這回看守所把我們的要求報上去，上頭還批准了，這樣才有今天這半個小時的見面機會。多虧了這裏的幹部幫忙，真得感謝季幹部和這裏的各位領導。姐姐一面說，一面連連向守在門口的季幹部鞠躬表示謝意。季幹部只是稍稍點點頭，說應該感謝政府、感謝政府。他邊說邊看看手腕上的表，提醒我們時間不多了，還有什麼要說的抓緊點說。

母親就告訴我，她組織學生繪製的「夏夜星圖」，去年底被市裏評為青少年科技成果二等獎，獎了三十五塊錢和一枝金筆。筆她留了，錢捐給了學校。還說父親也被評為單位的先進工作者，姐姐也在所裏

評了先進。聽母親說一家人現在都工作得很好，我心裏真是高興。

母親又對我講了些親戚家的情況，但我對這些心不在焉，我心裏憋了好多年的一件心事，得趕緊對母親說出來。我向母親打聽小劉的情況，問她有沒有小劉的消息？母親臉色頓時沉下來，說我剛出事時，小劉天天到我家裏來陪她，還總是見小劉偷偷掉眼淚。但自從曾劉宣佈我是反革命後，小劉就再也沒有來過我家，聽說後來也上山下鄉去了，十年來再也沒有過她的消息。我聽了也無話可說，只是仍然心有不甘。我對母親說，要是能打聽到小劉的下落的話，告訴小劉我這些年來一直在想她。要是她還未成家，希望她能等我出來。

正說著，季幹部走過來說時間已經到了，他讓我家裏人把隨身帶來的東西交給我。坐在母親旁邊一直一言不發的父親，這時從地上拿起一個網兜遞給我，囑咐說水果要削皮吃。我點點頭表示答應，肚子裏卻在苦笑，心想這牢房裏哪來的削水果的刀子呢？我站起身來，最後再看了看略顯衰老的父母和丰采依舊的姐姐，向他們深深地鞠了個躬，然後提上網兜轉身跟著季幹部返回號子。走了一會，我忍不住回頭望了一下，母親父親和姐姐都還站在會客室的門外，望著我的背影沒有離去。我鼻子一酸，眼睛發濕，禁不住想起朱自清的那篇《背影》——那是一個年邁的父親送別兒子離去時，留給兒子的一個蹣跚佝僂的背影。而我此刻留給父母的，卻是令他們心酸的一個不肖之子的背影，我可憐的父母喲。

回到號子裏，季幹部沒有馬上離開，他睜大眼睛，把我從頭到腳仔細地打量了一番，好像是頭一次見到我似的，然後搖搖頭說：「看不出，還真看不出！你還真的一點都有哭，你母親也一點都有哭，我原先估計你們一家人這多年沒見過面，一見面會抱頭大哭一場。唉，你們這家人還確實不簡單！不簡單！」他一邊搖頭，一邊背著手走出了號子。

後來聽做雜役的小彭說，那個和老婆一見面就抱頭痛哭的「團中央委員」高玉澤，本來已在一個地方掛了地委專員的頭銜，又娶了老婆，正所謂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春風得意得了得。不料高吃著碗裏瞧著鍋裏，又看上了地委的一個打字員，並與之勾搭成姦，而打字員的丈夫是部隊的現役軍人，告了他個破壞軍婚。省裏有人本來還

想保他，但沒有保得住，高玉澤只好坐監獄。不過上頭對他還真算照顧，坐牢才幾個月，就讓他家裏人來探了好幾次監，每次探監還能送東西給他吃。嗨！和這個高玉澤相比，我坐牢十年，才因為母親要開刀得見父母一面。怎麼同是坐牢，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有如此的不同待遇，這人世間的公平究竟在哪裏？算了，不說這個了，還是清點一下家裏這回都給我送了些什麼好東西來吃。

打開沉甸甸的網兜一看，裏面是一堆蘋果，一包水果糖，外加兩聽水果罐頭，我頓時大失所望。我以為好不容易有次機會，家裏會給我送些像鹽蛋、皮蛋、香腸和豬肉罐頭之類的好東西給我補充營養，卻不料送來的盡是些「水貨」。家裏人大概以為我在看守所營養不錯，就差點水果換胃口，他們哪裏知道我需要的是能填飽肚子的東西。

說到吃的，就不能不提七七年的春節，大概是慶祝粉碎「四人幫」的勝利吧，看守所春節期間破天荒給每個在押的犯人發了些雜糖、葵瓜子和花生。花生是我從小就最愛吃的一種副食，近十年沒有沾過了，可我一天只嘗幾顆，打算節省著多吃些時。當時與我同號子的那個保保剛進看守所，胃口很好，對吃的東西饑得不得了。他只一兩天的功夫，就把發給他的所有的東西都一掃而空。吃完了自己的，他就只好看著我一個人吃，特別是對我那袋花生，他眼珠子盯得直直的連彎都不轉一下。

我知道他嘴饑，也知道他在這裏是受特殊關照的，他家裏可以給他送複合維生素片。我忽然靈機一動，問他是不是還想吃花生？他也不怕我好笑，就直點頭。我說那好辦，拿我這袋花生來換你那瓶維生素如何？他一聽二話不說，從枕頭邊拿出那瓶平素碰都不讓我碰的維生素，就朝我遞過來，隨即接過我手裏的花生，一次「以物易物」的交易就此完成。他吃我的花生米以飽他的口福，我吃他的維生素以補充身體所必需的營養，我們兩個各得其所。說實在話，我也想吃花生，但捨不得花生我就得不到對我身體更有益處的維生素。正所謂「魚我所欲也，熊掌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總得作出最有利的選擇。

然而也正如孟子所言：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也，在看守所裏基本的飲食還是有保證的，我最感難受的還是對性的饑渴，特別是想小劉

都快想瘋了。無奈朝思暮想，不可得也，怎不叫人輾轉反側，夜不能寐。好不容易有機會向家裏人打聽她的下落了，又一無所獲，家裏人連她現在在哪裏都不知道。我想，小劉也有二十六七歲了，多半早已嫁了人。我家裏人就算是找到她了，又能怎麼樣？她在外面哪裏會一直等我出獄。要真願意等我，她也不會十年時間不來我家裏看看我的父母，打聽打聽我的消息。雖然這樣想，我心裏還是放不下她，仍是魂牽夢繞，刻骨銘心地思念她。我甚至設想，將來倘有一天真的平了反，我與小劉見上面了，也只能相對無言，空留一腔惆悵。

唉！癡想這些有什麼用，要想平反談何容易？我這個案子當年畢竟是欽點大案，現在的辦案人員有膽量在這個拖了十年的棘手問題上撥亂反正，實事求是地斷案嗎？連中央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這樣的冤案尚且未平反，又怎麼輪得到我們這些小人物身上？不過又一想，十年的時間都熬過來了，再等一等又何妨。何況現在的形勢與粉碎「四人幫」前已大不一樣，現在報上不但講實事求是，而且圍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觀點正在展開討論※35。如果承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就是在實際上否認了毛澤東的話句句是真理，就是在暗示毛主席的指示正確與否，也需要經過實踐這個試金石的檢驗。如此一來，那種凡是反對過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反革命的論點，凡是毛點過頭的東西就一律不能推翻的論調，也自然會站不住腳了。看來這個關於「真理檢驗標準」的討論，將會導致理論上的一大突破。

其實，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這本來是屬於基本常識ABC之內的東西：實踐當然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舍此難道還有另外的標準嗎？無論是誰說過的話都得經過實踐的檢驗，哪怕是偉大領袖的指示也沒有例外。可是許多年來這些馬克思主義的最基本的東西都被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卻弄出些「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之類的與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的東西，還自稱是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真是羞死了！如今撥亂反正，正是撥開這類流行多年，謬種誤傳的反馬克思主義的糟粕。因此，我對未來很有信心！

我那時自然不可能知道，中央圍繞這個關於真理標準的問題，正在進行尖銳的鬥爭。一場空前激烈的大論戰，正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理屈詞窮、黔驥技窮的「凡是派」困獸猶鬥，正要孤注一擲。為了殺雞

嚇猴，「英明領袖」以「護旗」為名，在給「實踐派」戴上「砍旗」的帽子的同時，向全國各地秘密下達了對文革中的「惡攻」分子，不但要關一批，而且要殺一批的指令。一向以保守著稱的湖北省委，如果說對關於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回應，必然落在全國大多數兄弟省之後，那麼執行「英明領袖」的指令，卻勢必一馬當先。九月份的一天，我們關在武昌看守所的幾個人，分別用車押到了漢口寶豐路第二監獄，準備從那裏再押上將在武漢劇院召開的公判大會。在這之前，並沒有對我們進行過任何形式的正式的法庭調查，更沒有給我們任何庭上答辯的機會，就準備「公判」，一切都是「暗箱操作」。我們全被蒙在鼓裏，就像一群被塞在簍子裏，只能嘎嘎叫喚的可憐的鴨子，什麼都不知道就將被拖進屠宰場了。

我們回到了寶豐路監獄，但不是關在以前住過的那棟樓裏，而是分別和其他一些犯人關在一起。我關的那間牢房很大，足有二十多平米，一間屋子裏一共二十多個人，順溜睡一個大通鋪。號子的一個角落有一個解手用的茅坑，茅坑有蓋，上方還有水龍頭，可以隨時沖廁所，還可以供犯人洗滌。看來漢口這邊的衛生條件比武昌那邊強多了，起碼屋內不放馬桶，號子裏就不會成天臭氣熏天。牢房裏有水龍頭還有一大好處，就是可以充當樓上樓下的公用電話。因為上下的水龍頭之間都有水管相通，一方用嘴對著龍頭說話，另一方把耳朵貼著龍頭，就可以聽見對方的聲音了，反之亦然。至於同一層的相鄰的號子與號子之間的聯絡就更容易了，坐在通鋪上靠著窗子，就可以和隔壁號子靠窗子坐著的人自由自在地談話。這樣整個牢房的上下左右之間，都可以用接力的方式傳遞資訊，形成一個四通八達的通訊網。

比方我剛進號子才幾分鐘，關於我從武昌轉過來了的「新聞」，就傳遍了整個監獄。在這裏每天都能聽到許多這類「新聞聯播」，都是些什麼人進來了，什麼人放了，或什麼人判刑了等等。有一次的新聞比較特別，是傳女監一個女犯給她關在男監的朋友的問候。那個女犯大概只簡單地表達了一下她對那個男人的思念之情，一路傳下來你添一棵蔥，我加一滴醋，把話加工得愈來愈葷，到了他男朋友的耳朵裏時，簡直就差不多變成了半本《肉蒲團》。

總之，這個地方非常熱鬧，人氣旺盛，不像武昌那邊，一天到晚

死氣沉沉鴉雀無聲，活像口棺材。漢口這邊的伙食也比武昌那邊好一些，肉倒不經常吃，但平素吃的青菜裏有油水。一個明顯的證據，就是我一來這裏大便就變通暢了，而且解出的大便形狀和成色都很好，不像在武昌時解出來的那樣，盡是一粒粒黑乎乎的羊疙瘩。

漢口這邊打牙祭除四大節日之外，並沒有什麼固定的日子，但凡有死刑犯被拉出去槍斃時，那天中午看守所全體犯人必定可以開開葷，正所謂「死刑犯難受之日，其他犯開葷之時」。而漢口這邊關的人多，十天半月有人拖出去槍斃正常得很，所以關在這裏的犯人是頗有口福的。但罪惡大的犯人，一見加餐就難免心驚肉跳，擔心下一次是不是會輪到自己？所以這種加餐方式，對某些犯人是可以起到威懾作用的。

在漢口這邊，男女犯人都必須幹活，關在號子裏糊火柴盒。每個人每天都要達到規定的最低數量，達不到的要加班，晚飯後繼續做活，完成定量了才准許睡覺。每週週末召開一次大會，全體犯人分號子列隊參加，管教幹部在會上對表現好的——即遵守監規且盒子糊得多的犯人，進行表揚和獎勵，通常是發些牙膏毛巾衛生紙之類的日用品；對表現壞的進行處罰，對嚴重違反監規的當場戴上腳鐐手銬。這個週末大會給了男女犯人見面的機會，不知道犯人們是否借此機會互相眉目傳情暗送秋波，因為我們這些在押的「北決揚」案的案犯，是不能參加這種週末大會的。像我所在的號子，每次開會時就留下我一人獨自糊火柴盒。

我手比較笨，一天下來腰酸背痛人都累垮了，還糊不滿規定的八百個火柴盒，通常只能糊最多五百來個。監工的幹部罵我笨得像頭豬，說像我這樣做活，連三餐飯的飯錢都賺不來，難怪毛主席說數知識份子最沒用。他指示號子裏的糊火柴狀元——一個年齡只有十六七歲的小偷做我的師傅。這個小偷手腳伶俐，動作極快，練過滾開的水裏用兩個指頭夾分子錢的絕活。一天糊上兩千個火柴盒，對他來說不過小菜一碟，毛巾牙膏這類獎品攢了一大堆。在「師傅」的指點下，我的速度提高很快，一天可以糊到六百多將近七百個盒子，自己感到很滿意了。但幹部說離最低定額還差得遠，而且有許多是廢品要返工，命令我晚上加班。我以眼睛近視燈光下做不了活為由拒絕加班，幹部也無可奈何。

不久，我的「師傅」因「表現突出」開釋出獄，只見他把鋪蓋行李一捲，就和我們拜拜。不料不到一刻鐘的工夫，這位樑上君子又抱著行李捲土重來。問他怎麼回事，原來在辦出獄手續時，行李卷被幹部打開檢查，發現裏面藏了一大摞糊火柴盒的方塊紙。他交代說因為這種紙的大小，正好捲一根煙，就想帶些出去捲煙用。幹部說他賊心不死，還得關起來改造些時，於是就又回到號子來了。看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這句老話，真是說得一點不錯。我的「師傅」因為偷雞不著蝕把米，垂頭喪氣了好幾天。

我在這個地方糊火柴盒大約糊了大半個月，突然又被帶回武昌這邊的看守所。一會兒弄過去，一會兒又弄回來，像要把戲似的，也不知道上頭是不是吃飽了沒事幹？回來後沒幾天，幹部讓外勞的雜役小彭進我房間給我剃頭。小彭剃頭時突然問我，判得很重吧？我一驚，奇怪他怎麼會這樣問我，就故意反問他怎麼曉得我判得很重？小彭說，前幾天聽幹部們議論，說你判了無期，他們還說沒想到關了十年了還會判這麼重。小彭還問我知不知道會發往哪裏勞改？要想去條件好點的離武漢又近點的地方，聽說也是要托人疏通關係的，他要我趕快要家裏去找人。小彭真是個好人，很為我著想，可我怎麼半點都不知道我被判「無期」了呢？真是莫名其妙！難道判了刑都不向當事人宣佈麼？世界上哪有這等荒唐事？其中必有蹊蹺。

我便告訴小彭，我只是在漢口那邊的看守所呆了十幾天，就又轉回來了，並沒有判刑的事。他聽我這樣說也很意外，想了想謹慎地說可能是他聽錯了。我知道他是不會聽錯的，判我「無期」必有來由：起先把我們一行人弄到漢口，肯定是為宣判作準備，多半是事情突然發生了變化，我們才又被拉回來。而不宣判主要有兩種可能：要麼是判無期上頭還嫌不夠，發回去考慮判死刑；要麼是上頭認為判無期太重了，發回去從輕判處。此外，也不排斥第三種可能，就是案子突然有了重大轉機，將作為冤假錯案來處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這種可能性還是有的，但也不能抱太大的指望。不管怎樣，主動權不在我手裏，我只能靜觀其變，等候有關方面發落。當然，我希望事情能向好的方面發展，唯願我家家的在天之靈保祐我逢凶化吉吧！

這是九月底的事，半個月後，《人民日報》報導了新上任的中共湖

北省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對「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表態。據後來某傳記作者說，九月底陳丕顯來武漢擔任省委第一書記後，曾請北京的幾位秀才來武漢，向領導幹部作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報告。湖北那幫信奉「兩個凡是」的「老凡」們，聽了報告後議論紛紛說：「陳書記怎麼從北京請來幾個右派作報告？」看來，我的無期就是這些「老凡」們給判的。連中央的理論秀才，在湖北的「老凡」們的眼裏都是右派，我這個「反革命」還不該判個無期嗎？

再後來，我在報上看見了陳丕顯露面的照片，覺得好面熟，過細想了想，是在漢口那邊的看守所見過。有天號門上的小窗被打開，有人喊我到窗前說話。窗外是一位六十多歲的長者，很和氣地問我多大年紀、被關了幾年了？入獄前在哪個大學念書、學的什麼專業？然後說我還年輕，將來還會有機會用自己學過的知識為人民服務。他講了幾句話便離開了，後面跟了一群人。我當時就懷疑這位長者是個有級別的領導，卻沒料到竟是剛調來湖北擔任省委第一書記的陳丕顯。看來，正是在陳丕顯來看守所視察前後，我們的命運有了轉機，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有了希望，我們這批人估計有救了。那就耐心地等待吧，恐怕就是幾個月中的事，坐了上十年的牢，總算要熬到頭了！

想是這樣想，可直到七九年夏天，解決問題的影子還是一點都沒有，好不叫人失望。而這段時間，正是全國各地大規模清理文革積案、對文革和歷次運動中的冤假錯案進行甄別平反的高潮期。對於清理積案過程中遇到的一些棘手的疑難問題，《人民日報》曾發表署名文章，傳達中央有關精神指出：凡已經定性為人民內部矛盾的，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已經肯定屬於敵我矛盾的，按敵我矛盾處理，但也要給當事人出路；如暫時還不能辨別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還是屬於敵我矛盾的，先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以後辨別清楚了，該按哪類矛盾處理再按哪類矛盾處理。文章說，這樣做的好處，是避免將案件長期積壓而使無辜者繼續受到損害，有利於最大限度地調動一切可能調動的積極因素。

看到中央的這個精神，我便向省委領導和專案組寫了一封信，指出有關方面在案子早就審查得清清楚楚的情況下，至今仍不對我們的案子作出處理是完全沒有道理的。按照中央有關精神，我的問題如果

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應及時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如果是屬於敵我矛盾，就應按敵我矛盾處理；如果至今仍無法對我的問題的性質作出判斷，那麼按照中央精神，應當先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以後弄清了是什麼性質的矛盾再按什麼性質處理。我指出對於我們的案子，無論按照哪種情況來對待，都沒有繼續拖下去的理由。

看守所的幹部把我的這封信送上去，上頭見了我的信會怎麼想我自然不可能知道，多少總該有所觸動，總不至於還是「泥牛入海無消息」吧，我還是只能耐心地等。從漢口那邊轉回來後，我繼續系統地研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揭露資產階級國家的司法制度和監獄制度的文章，尤其讀得認真。以我的親身體會，文革中我國的司法制度和監獄制度，還遠不如資產階級國家一百多年前實行的制度，其無序性和野蠻性大大超過了後者當時的情況。馬克思在他的書中引黑格爾的話說：「人權不是天賦的，而是歷史地產生的」，而在我們國家的歷史上，恰恰從未產生過現代意義上的人權。經過文革十年浩劫，現在應當是尊重人的權利的時候了。

的確，是時候了。我在獄中非常高興地看到，國家正在著手民主和法制方面的建設，報上開始用大量的篇幅展開有關民主和法制的討論，發表了許多有真知灼見的文章。健全法制的呼聲愈來愈強烈，國家終於將當前最迫切需要的「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制定，提到了議事日程。

我特別關注報上有關制定兩法的討論，比如在司法實踐中是實行「無罪推定」還是「有罪推定」，對各種罪行特別是「反革命罪」應如何界定，公民在法律面前是否應當一律平等。還有關於對被告進行審判的審判程式，被告在接受審判時享有的權利，如進行辯護和請律師為自己辯護的權利，在法庭上作最後陳述的權利等等。這類問題的討論，常常使我激動不已，坐了十年牢，總算等到我們中國也將有法可依了。按照報上關於刑事訴訟法的討論，對被告在偵查中的羈押期限，以及檢察院接到案件後作出決定是提起公訴還是予以釋放，都應有嚴格的時間限制。而我到現在已經整整被羈押了十一年，有關當局面對即將通過的刑事訴訟法，再也不能沒完沒了地將我們長期羈押了。

法制建設方面的工作進行得比我想像的要快，七月七日，各報一

起登出了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簽署的第五號和第六號委員長令。委員長令稱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於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將從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起施行。各報同時還登載了已通過的《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全部文本。我對兩法讀了一遍又一遍，第二天又請看守所的幹部幫我買來兩法的單行本，字斟句酌地對這兩部法律進行了學習和研究。

在充分領會了兩法的精神和對兩法所有條文都爛熟於心後，我開始著手準備一旦接受法庭審時，該如何為自己辯護。當時距離兩法實施僅有半年，若半年之內我們的案子還得不到處理，那就意味著我們將上法庭與「公訴人」進行面對面的較量。到那時就是考驗我們的辯論能力決定我們命運的時候了，我必須作好充分的準備，迎接那一天的到來。用了差不多一個禮拜時間，我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針對法庭辯論時公訴方可能對我作出的各種指控，進行了極其認真的準備。對方可能說些什麼，我該如何進行辯駁，一點一滴，不敢稍有疏忽。除了把《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學深學透外，我還特別對馬克思的著作中涉及法庭辯論的文章進行了研究。馬克思本人最初就是學法學的，法學知識極為豐富，辯論技巧極其嫋熟，我從他的書中受益匪淺。最後，我還精心準備了一篇在法庭辯論之後作最後陳述時用的演講詞——「歷史是最後的審判官」。內容如下：

尊敬的法官先生（或審判長和審判員先生）：

剛才我已就我的案子與公訴人進行了辯論，關於罪與非罪的問題已經辯論得十分清楚了。用馬克思引用過的話說，即使證據像草莓一樣便宜，公訴人也拿不出一個來，證明我在文革中的言論和行為，是「以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為目的」，就是說，無法證明我犯有「反革命罪」。而當初我正是因所謂的「反革命罪」被逮捕入獄的。

你們知道，十年前定我以「反革命罪」的根據，是據說我畫了一張「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反動漫畫」。但是這個證據在我被捕之後已經得到了澄清，也就是說當初立案的根據已

不復存在。但是當時把持湖北黨政軍大權的林彪死黨卻包藏禍心，羅織罪名，一手製造了轟動國內外的「反革命地下組織案」，致使我遭到長期監禁。不錯，案子是中央定的，而中央是根據林彪死黨上報的材料，斷定「北決揚」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假借名義、暗中操縱的大雜燴」，並且指名道姓，將「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王盛榮、國民黨反動將領干毅、老國民黨特務周嶽森」定為這個「反革命地下組織」的黑後臺。但剛才的法庭辯論證明，林彪死黨上報的材料全係誣陷不實之辭。如果說它能證明什麼的話，它不過證明我們正是林彪那套「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的理論的受害者。事實上前幾年鄧小平復出時，上述所謂「黑後臺」均已先後釋放，謊言早就不攻自破。拿十年前一份缺乏事實根據的中央文件出來，能說明什麼問題呢？事實勝於雄辯，在事實面前那份中央文件毫無價值。

在「組織反革命地下組織」的罪名明顯無法成立後，你們又指控我在文革中犯有「散佈反動輿論」的罪行。但事實證明這個罪名也同樣是站不住腳的。所謂「散佈反動輿論」，主要是說我在文革中鼓吹過「重建黨、重建國家、重建軍隊」即所謂「三重建」。罪名是夠大的了，但證據呢？剛才在法庭辯論中，我已經一一駁斥了你們所舉的那些「證據」，本來用不著重複。但我還是想就所謂「重建軍隊」的問題說幾句，讓法庭看一看對我的指控是如何的荒謬。

你們知道，在這個問題上對我進行指控的根據，是據說在我寫的日記裏，發現有「根絕常備軍」的內容。但是第一，這是我的私人日記，按照法律規定，私人日記中的話不能成為定罪的依據；第二，這句話不是我說的，是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的觀點。第三，我在日記中認為「馬克思的這一論述在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中得到了解決」。除非認為毛主席提出的「五七指示」就是要根絕解放軍，怎麼能給我這段日記安上「反動」的罪名。

說到「重新建軍」，究竟建什麼軍？決派武裝嗎？這的確曾

經是林彪死黨煽動「革命群眾」到處控訴過的一支武裝，好像那段時間湖北地區發生的所有的武鬥都是「決派武裝」幹的。可是這世界上哪裏真有這麼一支血債累累的武裝力量呢？沒有！武漢沒有，湖北沒有，全中國乃至全世界我敢保證都沒有。至於月球上有沒有，老實說我不知道，因為那時阿波羅太空船還沒有造出來，無法上月球上去尋找。但至少在這個小小環球上，是可以肯定找不到什麼「決派武裝」的。所謂「決派武裝」，是林彪死黨一手編造出來的。不是有所謂「撒豆成兵」的神話嗎？有些人連豆都無須撒，撒謊就行了，撒謊成兵！

必須指出的是，長期以來一些辦案人員唯上唯書，無視事實真相，明知我們這個案子是一樁冤案，卻助紂為虐，為虎作倀，必欲置我於死地，使我在獄中遭受單身監禁這種被恩格斯稱之為「野蠻得無以復加的刑罰」達十年之久。現在這些專案人員都躲到哪裏去了呢？你們不是因為辦案有功，一個個都加官進爵、飛黃騰達了嗎？怎麼竟不敢面對法庭上神聖的國徽來與我對質呢？我知道在新公佈的法律面前你們腿軟了、你們心虛了，因為你們十年來做的都是違背正義、違背真理、違背良知的見不得人的事。你們當年追隨林彪死黨迫害過無數的無辜群眾，深夜捫心，難道你們就沒有一點羞愧！

我很清楚，粉碎「四人幫」後，儘管民主和法制得到重視，儘管有了法律和政策可依，儘管我能夠用法律和事實證明我的無罪，但是我仍然可能被人弄權枉法判定為有罪。只是為了維護某些大人物的面子，為了維護所謂的威信，我的案子就有可能不能秉公斷處。對此我已經作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

但是即使這樣，某些人又能把這樁冤案維持多久呢？

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大論戰，正在全國範圍內如火如荼地進行，頑固派們正在節節敗退。

在「撥亂反正、實事求是」的旗幟下，無數文革中製造的冤假錯案正在得到平反糾正。。

一個崇尚個人迷信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一個思想解放的新時代正在大步向我們走來。

思想理論戰線的勇士們，已經在奮力清掃三十年未曾清掃過的「奧吉亞斯的牛圈」。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還我們這椿案件真面目的日子終究會到來。

歷史，只有歷史，如馬克思所說，才是最後的審判官。

法官先生，在事實與法律面前，在中央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必須執行依法辦事、獨立審判的方針面前，你們現在其實就應該排除人為因素的干擾，對我們這個案子作出公正的判決。歷史在注視著你們，人類的良知在注視著你們，無數雙善良的眼睛在注視著你們，你們頭頂上莊嚴的國徽也在注視著你們，你們還猶豫什麼呢？實事求是地平反冤假錯案，難道不正是你們肩負的神聖責任嗎？是用行動證明你們無愧於新時代的人民法官的光榮稱號的時候了。

至於對我提起公訴的檢察官先生，我不想多說什麼，因為你們不過是在奉命行事。我不知道你們是否讀過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的劇本《威尼斯商人》？莎士比亞在這個劇本中塑造了一個冷酷無情的猶太商人夏洛克的形象。這個猶太人為了債務人欠他的一筆錢，執意要割掉債務人身上的一磅肉，不過他這個狠毒的企圖，最後被那個女扮男裝的律師鮑細霞援用法律挫敗了。夏洛克悻悻地問道：法律是這樣寫的嗎？鮑細霞回答他說：你可以自己查去。

剛才在法庭辯論中，我在事實的基礎上引用《刑法》上有關條款，證明了我的無罪。至於法律上是不是這樣寫的，檢察官先生，你可以自己去查查它了。

我就此結束我的最後陳述。謝謝法官先生。

寫好上面這篇辯護辭，我久久無法平靜。半年以後，我便將在法庭上與我未曾謀面的對手決一雌雄，這實在令我熱血沸騰。我身體內那股蟄伏多年的岩漿從沉睡中蘇醒，開始蠢蠢欲動。我渴望戰鬥！我敢斷定，一旦投入戰鬥，我的法庭辯護和這篇最後陳述，必定會將對手打個措手不及。他們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我在經受十年單監的摧殘

後，還能在最後關頭給他們有力的一擊。有道是「十年磨一劍」，我用十年時間磨礪出的這把劍，將在法庭上顯露鋒芒。所有強加在我身上的誣陷不實之辭，我將以法律與事實作武器，把它們一一粉碎。

在等待開庭審判的日子裏，我一心一意地為即將到來的「出庭」作準備。牢房裏很靜心，以前在大學的圖書館裏上晚自習，也沒有這般安靜。然而有天晚上，這種安靜突然被一種響聲打破。仔細聽了聽，是隔壁新來不久的一個犯人在對著牆壁撞頭，砰砰！砰砰！頭撞牆撞得挺凶。我正納悶是誰想不開了，要拿自己的腦殼出氣呢？就聽見有班長在門外干預了，大聲呵斥這個犯人不准撞頭。但是犯人很固執，仍砰砰地撞頭不止。班長無法，於是叫來了季幹部。季幹部來到門外，隔著小窗子聽了聽，便喊那個犯人過來。過了一會，只聽見季幹部說，你這是撞的什麼頭？一點頭皮都沒有撞破嘛！要用點勁撞。去，用勁撞！那個犯人聽季幹部這麼挖苦他，倒不再尋死了，卻「哇」地一聲大哭起來。一邊哭一邊大呼冤枉，嗚嗚嗚地說他和夏朱胡有區別，不應該算是「四人幫」的死黨……

我一聽那聲音怎麼這麼耳熟？嗨，原來隔壁關的是張立國那小子呢，真是冤家路窄！十多年前正是他把我送進監獄的，如今卻在這監獄裏與我成了一牆之隔的「街坊」。歷史真的會捉弄人啊，正應了《紅樓夢》裏那句唱詞：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榮辱浮沉變化如此之大，難怪張立國想不通要撞牆了。張立國後來被判刑十多年，刑滿出獄後倒是有所悔悟，見到我時向我道歉說，他對我們是有罪的。張立國能夠這樣想，也還算是良知未泯。他既然已經為他文革中的問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我也就沒有必要再和他計較太多的個人恩怨。

外面的形勢發展很快。這年的十一月十四日，中共北京市委宣佈為參加過「天安門事件」的革命群眾平反。十六日《人民日報》就平反一事發表了題為「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評論員文章，而十六號這一天正好是我三十二歲的生日。從一九六八年七月被捕入獄，我在牢房裏被關押了十一年又四個月了。再過一個半月，就是《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正式生效之日，該是我走上法庭行使法律賦予我的辯護權利的時候了。我等候這一天差不多等了十二年。十二年哪，人生能有幾個十二年？！

十一月二十號，姐姐給我送了些過冬的衣服來，但還差條棉褲，說等棉褲上市後再買了送來。我寫回條說我這裏還有條舊衛生褲湊合穿，等元旦後我寫信回家時再送棉褲來。十二月十八日，具有劃時代歷史意義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京召開。會上確立了鄧小平的領導地位，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會後發表的《公報》說，「會議高度評價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認為這對於促進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公報》並且指出，「只有堅決地平反假案、糾正錯案、昭雪冤案，才能夠鞏固黨和人民的團結，維護黨和毛澤東同志的崇高威望。」就在這次會議期間，「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得到了徹底的平反。

轉眼就到了年底，一場大雪下過，雪後初晴，滿世界一片晶瑩潔白，亮得晃人眼睛。冬天的太陽很柔和，照在身上暖洋洋的非常舒服。放風場上有幾隻小麻雀跳來跳去在雪地上覓食，讓我回憶起童年時外祖母教我牽著條細繩子用根小棍支著竹篩子捕麻雀的快樂時光。有天看守所的幹部忽然派我出號子搞了幾天外勞，和另外一些犯人一起為旁邊一個工地搬磚頭。據說監獄裏要在這地方蓋一座醫院，看守所的一些年輕力壯的犯人正好派上用場。其實外勞在看守所裏算是份「美差」，外勞時不但人在外頭比較自由，能曬曬太陽聊聊天，飯也能夠吃飽，收工後還有熱水洗澡，所以犯人們都巴不得有外勞的機會。

我因為一直是隔離式的單獨監禁，從未有過外勞的機會，想不到現在機會倒來了。這也從某個側面說明我的境遇有所好轉，總之是個好兆頭。不過。我被監禁多年後體質變得非常虛弱，勞動時感到力不從心。搬磚頭一般都是用一種專門的鐵夾子一次夾四塊磚，要夾牢這四塊磚，對別的犯人來說似乎是輕而易舉的事，可是我勉強夾著磚頭搬了幾回磚，手腕就酸得再也握不住那個鐵夾子了。我只好用兩隻手來抓牢那個夾子，很狼狽的樣子。就是這樣，我也累得氣喘吁吁，精疲力竭。管外勞的是小王管教，大概看不下去我那副熊樣，讓我乾脆不要用夾子了，就用手搬，一次能搬幾塊就搬幾塊。我便一手一塊慢吞吞地搬，幹部也不管我是不是在「磨洋工」，讓其他犯人好不羨煞。

就這樣搬磚頭搬了兩天，磚頭沒有搬多少，飯倒是吃得飽飽的，還洗了兩次熱水澡，好不快活。

到第三天午飯後來工地幹了一陣子，忽然看見有幾個幹部模樣的人脅下來夾著公事包從外面進來，一直走進看守所那棟樓。過了一會兒，張所長從樓裏出來了，直朝我走來。我手裏還拿著磚，心裏卻砰砰地跳起來，難道決定我命運的時刻就這樣來臨了麼？果然，張所長來到我跟前要我把手裏的磚頭放下，跟他去預審室。我放下磚頭，拍拍手，又拍拍身上的灰，就跟著張所長走。旁邊和我一起幹活的犯人都不約而同地停了手中的活，齊刷刷地目送我離開。他們都知道我這個在牢裏關了十多年的的大學生是個有名的「大政治犯」，兩天前突然調我出來外勞，大家就都說我多半快要放了。

不錯，正是如此。去辦公室的路上，張所長神神秘秘地告訴我，法院來了人，馬上就會放我出去。他要我盡量控制情緒，不要一聽到要釋放了激動過度出問題。其實剛才外面進來的幾個夾公事包的人從我旁邊走過時，我便下意識地感覺到這幾個人來這裏與我有關。果不其然，正是法院審我案子的法官。可是案子怎麼這樣簡單地就了結了呢？法庭審判呢？庭上辯論和最後陳述呢？我知道我這些日子所做的準備工作全都白做了。有關方面搶在《刑法》和《刑訴法》生效的前幾天釋放我，也就是用合法的手段，剝奪了我在法庭上當眾為自己辯護的權利。我的對手和我較量了十一年多，始終不敢與我在陽光下公開作一次公正的決鬥。這些人何其狡猾、何其虛弱，又何其膽怯也！但我對此實在無可奈何。

到了樓裏，張所長把我領進一間預審室，那三個法院的人正在裏面坐著等我。來人自我介紹是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審判員，今天是特來向我宣佈對我的判決的。他們很客氣地讓我先坐下，在問了我的姓名、籍貫、年齡、以及捕前是哪個學校的學生等等問題之後，其中一人扭過頭和旁邊的同事輕輕說了句什麼，便要求全體起立，拿起桌子上的一張紙宣讀說：湖北省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市發(79)刑初字第25號。

該判決書稱我係「因反革命一案於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逮捕」，經審查查明，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違抗毛主席指示，分裂群

眾，破壞團結，另立山頭，炮製決派宣言，煽惑農民脫離黨的領導」，還有什麼「寫了浠水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為反革命分子王仁舟搞的所謂巴河一司大唱讚歌，支持王仁舟帶領受蒙蔽的農民來武漢鬧事，破壞了工農業生產，破壞了城鄉社會秩序。」

判決書最後宣佈說：

綜上所述，本院認為魯禮安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分裂群眾，破壞團結，製造散佈反動輿論，危害了黨，危害了人民。現考慮上述問題是在林彪、四人幫的極左路線的影響下出現的，可不以反革命論處。但其支持反革命分子王仁舟帶著受蒙蔽的農民來漢鬧事，在破壞團結，破壞工農業生產和城鄉社會秩序上是有罪的。現本著對過去從寬的精神，特判決如下：免予魯禮安刑事處分。

如不服判決，被告人可在接到本判決書的次日起，十天內向本院寫出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判決書很短，總共不到七百個字，判決書的結尾也沒有簽署審判長、審判員和書記員的名字。就是這樣一張小三十二開的紙張，一個所謂「破壞團結、破壞社會秩序」的罪名，一個「免予刑事處分」的判決，草草了結了我這個歷時十一年半，耗費了國家無數人力物力財力，將眾多受株連者長期關押致使其中多人精神失常，並殃及數十萬無辜群眾的「欽定大案」！我還激動興奮得起來嗎？此時此刻，面對判決，我實在是百感交集，啼笑皆非。

審判員將判決書的正本交給了我，讓我再仔細看看。我便過細地看了兩遍，覺得判決書中定我「有罪」實無道理。判我有罪的根據是說我文革初期，曾寫大字報支持王仁舟帶領受蒙蔽的農民群眾來漢鬧事，但是當時支持王仁舟的組織和個人多得很，怎麼人家都在這個問題上沒有罪，偏偏我一個學生就有罪？何況在當時開展「四大」的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這類大字報根本不可能算是犯罪。倘若這都算是犯罪，我敢說文革中很少有人不是罪犯。

按照《刑法》第九條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本法施行以前的行為，如果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退一步講，即使用新公佈的法律來衡量，我在文革初期寫的那張大字報也仍然構不成犯罪。《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條規定「擾亂社會秩序情節嚴重……對首要分子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而在王仁舟率眾鬧事的事件中，我既非首要分子，亦非骨幹分子，甚至連脅從分子都稱不上。我不過是在當時以一學生的身份，寫過一篇大字報表明過自己的態度而已，《刑法》中哪裏有一條規定這種情況也是有罪呢？

審判員問我還有什麼話說沒有？我便將我對判決書的上述想法告訴他們。他們互相看了看，也不表態，只是說有不服的地方准許在十天之內上訴。我說上訴到省院有什麼用？還不是打回來「維持原判」，要就上訴到最高人民法院。法院的人說不能越級上訴的，中院一審的案子只能上訴到高院，由高院一審的案子才能上訴到最高法院。我說不對，這裏面有問題，我的案子不應當由你們市中院管轄，應當由省高院管，由省高院來審判。法院的人馬著個臉問我為什麼？我說《刑事訴訟法》第十六條規定，全省性的重大刑事案件，由高級人民法院進行一審。我們這個案子當初是由中央定的全省性的大案，起碼也得由省高院審判。

審判員一時沒詞了，面面相覷有點尷尬。倒是一起來的那個書記員機靈，搬出刑法第十八條說，上級人民法院在認為必要的時候，也可以把自己管轄的第一審刑事案件交由下級人民法院審判嘛。刑法上確實有這樣一條規定，法院搬出來當擋箭牌我也無話可講。那兩個審判員就趕忙符合說是呀是呀，由哪一級來審要看需要嘛。他們怕我還會節外生枝搞得他們下不了臺，就說他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要上訴出獄後盡可以上，反正有十天的時間。說完就夾起皮包溜之大吉，把我一個人丟在預審室裏。

過了一會兒，季幹部進來讓我去他們辦公室，張所長幾個幹部都在那裏。他們請我在沙發上坐下，又給我倒茶，又問我抽不抽煙。我自然是不抽煙的，也討厭滿屋的煙味。張所長對我說我今天就可以回家了，本來想派輛車送我，不巧車被樓上七處的人用了，只好通知我

家裏人來接。他邊說邊撥桌上的電話，電話撥通後他說找魯禮平。不一會就聽見他說魯禮平同志嗎？我是看守所。魯禮安同志馬上就要出獄了，請你來接接他。接著就聽見電話那頭連聲答應好好。張所長在電話裏稱我為「同志」，倒使我感到非常意外。十多年來我在看守所裏看守和幹部都只叫我的囚號，很少叫我的名字，「同志」二字自然更是久違了。現在突然聽見人家叫我同志，還真有點不習慣。

張所長放下電話，說我姐姐很快就會來接我出去，又很關心似的囑咐我出去後先把身體好生補補，別的事情暫時少考慮，政府會妥善安排的。他隨後沒話找話說，說我知道要釋放了卻顯得很平靜，真還挺沉得住氣的。季幹部就說，這算什麼，去年安排他和他父母見面時，見了面連眼淚都沒有掉一滴，那才是真的沒有見過呢！張所長又說，要感謝黨和政府的寬大處理，文革中閩下那麼大的禍都沒判你的刑，一風吹了，算你有點狗屎運。他還說，前幾年放周嶽森時也是在這個辦公室裏，周嶽森當時激動得熱淚盈眶，跳起來高喊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我聽所長這麼講，倒是想起魯迅先生說過的中國人的一種國民性。他說，在我們中國，老百姓無緣無故被官府抓進衙門裏挨了板子，挨完打後還要向官老爺磕頭說，謝老爺不殺頭的恩典。不過這種事我是做不來的，本來就抓錯了，早該放人的，有什麼恩典好謝？

快到下午五點鐘時，姐姐來了，姐姐當然是對看守所的幹部們千謝萬謝，說了一大堆類似謝老爺不殺之恩的好聽話。所長給我開了張釋放證明，說出去後要憑這個到派出所上戶口的。把釋放證明遞給我收好後，所長要我姐姐馬上就帶我出獄，行李可以暫時放在看守所，過兩天來拿都行，人是一分鐘都不能留。呵，什麼好地方，誰還想留在這裏不成？我就推姐姐說，那我們快走，一分鐘快到了。大家都哄笑起來。我這才知道，這些在我們犯人面前成天繡著臉的幹部竟然還會笑！於是就和幹部們道別，所長和季幹部一直把我們送到看守所的大門口。

出了大門，就再也見不到埋葬了我的全部青春歲月的那棟兩層樓的灰色建築了，能看到的只是上面拉有電網的一堵高牆。這堵將我與自由隔絕了十多年的高牆，那牆上的每一塊磚頭——借用《古拉格群

島》的作者索爾仁尼琴的話說——「都是用謊言的灰漿粘結在一起的」。然而歷史的風雨終於沖刷掉了謊言的灰漿，高牆最終還是轟然倒塌。而這些年來儘管身陷囹圄，命如螻蟻，但我到底沒有被黑暗歲月摧垮。我既然能夠咬著牙挺過來，我就是勝利者，身後的監獄之門，便是我的凱旋門。

沿著積雪未化的人行道走到司門口，上長江大橋，乘10路公汽過江。車子裏擠滿了人，我站在車窗旁，貪婪地朝外看沿途的景色和人流。感覺中這些年城市裏的高樓大廈多了，再就是女同胞都打扮得很漂亮，衣著格外豔麗，成了街道兩邊流動的風景。想文革中不分男女都是綠軍衣或灰制服，一個個綠蛤蟆灰狗子似的千篇一律。女同胞莫說花衣服、高跟鞋不能穿，連辮子長一點的都要給強迫剪掉。現在好了，人們想穿什麼就穿什麼，那個扼殺個性禁錮美麗的時代終於一去不再復返。

車到航空路站時，我和姐姐下了車。在回家的路上，姐姐告訴我，她四點多鐘在單位一接到看守所的電話，馬上就給正在學校上班的母親掛了電話，母親現在應該已在家裏準備晚飯等我們了。姐姐還說，她給遠在陽邏船廠的父親也掛了電話，父親說馬上請假連夜搭夜班的輪船趕回來。很快就到了我們家住的外貿宿舍，一上樓，哇，可熱鬧了！樓上的鄰居全擠在我家裏，同我母親一起等我進門哩！有家姓鄧的生過五個女娃，我被抓走時她們中間最大的也不過上十歲，最小的才是個奶娃。可現在她們都長大了，兩個當大姐二姐的更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鄧家問我還認不認得出她們幾個誰是誰？我一一指出無誤，鄰居都誇我記性真好。我當時指著她們中的老四笑道：「你十年前還只是丁點點大，成天纏著我要把你抱起來轉圈子呢。」四姑娘一聽，頓時臉飛紅了，我也意識到話說岔了，人家如今都是個大姑娘了，說話怎麼不想想呢？不過誰也不在意我的唐突，都搶著向我問這問那，獄中的生活啦、勞不勞動啦、生過病沒有啦，還爭著看我的耳朵那年在鐵山究竟割過沒有？大家像是鑒賞出土文物似的，將我細細地「鑒賞」一番後，才心滿意足地離開。

吃過晚飯後，母親給我講了一年前政府準備判我無期徒刑的驚心動魄的一幕。

母親說，當時誰也沒有料到會突然判我無期的，因為七六年十月就聽說打算放我，看守所都通知我們家裏隨時準備接人。可是剛好碰上毛主席逝世，放人的事就暫時擱了下來。接著又是粉碎「四人幫」，就更是顧不著放人的事了。儘管一拖再拖，但總以為遲早是要放的。直到去年九月，有天幾個親戚突然晚上摸到我家裏來看我母親——也就是他們的姨媽。親戚們這些年來揪空子偷偷來我家走走也是常有的事，但這天的氣氛卻不大對頭。幾個人低著頭都是心事重重，欲言又止。母親是個急性子，就問他們究竟出了什麼事？他們還是不說，卻七嘴八舌說起我的壞話，罵我當初如何不聽大人的話才惹下大禍，害得父母十年來不得安生，也害了姐姐不好找對象，國也出不成等等。親戚們罵我是個孽子，是害人蟲，害了一家人，勸我母親把我忘掉，只當是沒有生我這個兒子的……罵著罵著，親戚們自己就哭了起來。

母親見狀大駭，急忙問親戚們究竟怎麼了，黃毛是不是被槍斃了？親戚這才說槍斃倒沒槍斃，判了無期。原來親戚中有熟人在一座監獄的勞改工廠當廠長，這個廠是搞印刷的，一星期前接到緊急任務，趕印五萬份省法院的通告。這個熟人一看通告是判決一批犯人，頭一個判無期徒刑的就是魯禮安。通告加班加點地印刷完後，他趕緊溜出來找到親戚說了這件事。

母親聽了倒沉得住氣，反過來安慰親戚不要難過，說只要不是死刑就行。我黃毛沒有犯判無期的罪，只要人活著，說不定哪一天案還能翻過來呢，現在最重要的是要想法子替黃毛找個條件好點的地方服刑。親戚們說重刑犯很多送大君山勞改，做吹玻璃的活，苦得很，萬萬不能去的。沙洋農場條件好一點，判無期的想去那裏得托關係。母親就委託他們幫忙找關係。母親還準備找找看守所的頭兒，看能不能就留在看守所做雜役。母親又叫我姐姐第二天就去陽邏，把我判了無期的事當面通知我父親。

姐姐去到陽邏後，先還擔心老實巴交少言寡語的父親聽了這個消息會受不了，卻沒想到父親比母親還想得開，說結果早就在他預料中了。說上十年都不處理，就料到不會輕易放過黃毛的。現在好了，總算有個結果，不用再提心吊膽了，到勞改隊總比關在看守所裏強。父親還去買了些葷菜來和姐姐一起吃飯。吃飯時父親叮囑姐姐，回家後

找一幅全家四口人過去的合影照，要掛起來。父親說我們都要好好地活著，要多活些年，只要身體不出毛病，總有一天能夠等到黃毛出獄，全家終究還是能夠團聚的。

後來姐姐從她單位一位黨支部書記那裏，打聽到一些內部消息。那位書記的老公是省衛生廳的廳長，對她說過這件事。她對姐姐說，開始是要判死刑的，但公安廳裏多數人認為你弟弟被捕前只是個二十來歲的學生，雖說寫過一些錯誤的文章，但是在文革初期受極左思潮影響下寫的，而且沒有搞過武鬥，和四人幫也沒有關係，判死刑恐怕不妥。這樣上面才勉強同意改為無期。你弟弟差點命就沒有了，好險啊！這位書記還說，連他老頭子都看不過，說一個學生，不過幾篇文章，憑什麼關了十幾年還要如此重判？完全是報復！報復！據說湖北也是按照華國鋒對有「惡攻」行為的罪犯要關一批、殺一批的指示辦事的，只是沒想到湖北的「老凡」們會把我這個關了十年的「死老虎」拿出來開刀。

聽母親說，連看守所的幹部也都一點沒有想到我會突然判「無期」，幹部們一直都認為我遲早是要放的。78年恢復高考後，有的幹部甚至向我家裏人借我文革前考大學時用過的複習資料，給他們的子女複習用。後來一見風雲突變，趕緊把複習資料又退還回來，生怕沾了火星。當然，也只是說資料用不著了，並沒有說是因為我要判「無期」的緣故。但我父母心裏有數，也怪不得人家不給面子。後來公判大會取消了，我母親倒不依不饒了，當面問看守所的幹部說，我兒子不是要判「無期」嗎？怎麼又不不判啦？幹部們則矢口否認，說根本沒有那回事。還反問我母親聽誰說你兒子要判「無期」呀？幾時宣判過呀？

倒也是。既然通告都印好了，那怎麼又沒有宣判呢？我問母親。母親說是呀，所以後面還有戲。原定九月二十號那天是要開公判大會的。主會場就設在武漢劇院，分會場設在新華路體育場，全市各個單位工廠學校都要組織大家收聽大會實況轉播。父母親和姐姐單位也通知他們要在單位收聽廣播，但那天一家人哪裏都沒去，躲在家裏避風。母親娘屋裏有個親戚是賣煤油燈罩的，自告奮勇挑了副賣燈罩的擔子，前往武漢劇院門口打探消息。一上午過去了，家裏人忐忑不安中等來了消息：宣判大會不開了，往後延。

據打探消息的親戚說，他站在劇院馬路對面望動靜，只見九點鐘左右，就有一輛又一輛的大客車開進武漢劇院的大門。可不到半個小時，車子又一輛接一輛地開了出來，接著有人出來在劇院的大門口的牆上貼了張東西。他大著膽子過馬路去看，貼的是省高級法院的一張通知，說公判大會因故臨時取消，開會日期將另行通知。到下午，母親學校一些與母親要好的同事也到家裏來了，告訴母親公判大會突然取消，情況怕是有變化。有個老師認為是我接到判決書後不服，上訴了，所以要重新審理。母親說不可能，省裏既然把通告都印好了，公判會的日期也定好了，就是木已成舟，不存在重新審理的問題。唯一的可能是中央來了尚方寶劍，要省裏刀下留人。結果果然被母親言中，確實是公判大會正準備召開時，省裏接到北京打來的電話，指示公判大會取消，案子要重新處理。

後來，姐姐從單位那位黨支部書記那裏打聽到事情的原委。原來省裏把對我們的判決情況上報中央備案後，按照以往經驗，以為鐵板釘釘，不會再有變故。遂大印判決通告，稱「經英明領袖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批准……」云云。豈料當時中央管政法的，不是華國鋒一夥的「凡是派」。這位管政法的領導人接到報告後調閱了案卷，認為當年對北決揚一案的處理有問題，遂將此案報中央政治局討論，結果否定了六九年中央「九二七」指示對武漢「北決揚」的定性。於是，有關方面通過正在北京開會的陳丕顯，向湖北省委轉達了中央的意見。

陳丕顯的電話打給湖北主管政法的負責人時，公判大會已經一切部署就緒，正準備到寶豐路監獄提我們一行押往主會場，結果便出現了上述戲劇性的一幕。(聽說有些單位不等判決大會召開，迫不及待就把判決通告先貼出來了，搞得狼狽不堪，下不了臺。)如果不是通過有關真理標準的討論，確立了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派在中央的領導地位，「實事求是，撥亂反正」的方針得以貫徹，我這樣由中央定過性的「鐵案」如何能翻過來？真的是不可想像！我是大難不死，絕處逢生啊！

出獄的那天晚上，我和母親和姐姐有談不完的話。母親說，家家在世時天天都在叨念我怎麼還不放出來？家家每天都向上帝祈禱，祈求上帝垂憐她這個虔誠的基督徒，保祐我能夠平安回來。辭世前家家

什麼都不想，只是想見我一面，家家是帶著永遠的遺憾走的。我聽了心裏好難受，心想這兩天得讓家裏人帶我去墓地看看家家，告訴她老人家黃毛我終於回了。我們還談了許多別的，談到傷心處都淚流滿面。正像杜甫詩中說的：感歎亦噓唏，相對如夢寐。一家人坐在一起說著十年來的生離死別，真有隔世之感。

夜深了，母親擺了張折疊床，讓我就在她的床邊睡。我躺在折疊床上，母親親自給我蓋好被褥，我感到溫暖極了。在獄中的那些年裏，我也常常夢見回家，夢見母親，我害怕我又是在做夢。我忍不住問母親，我是在做夢嗎？母親說不是做夢，你是真的回家了，明天一早你還能見到爸爸。我用手指狠狠掐了一下胳膊，還真的疼，可見我真的是回來了。明天我就去扁擔山給家家掃墓，然後去看一場電影，晚上還要去馮天艾家看看馮氏，他該去醫院治治病了。再以後呢？我想去小劉家，打聽一下小劉的下落，最好能夠想辦法見見她。還有，「免於刑事處分」畢竟還是屬於有罪判決，我究竟要不要上訴呢……我左思右想，久久難以入睡。

夜愈來愈深沉，牆上的掛鐘已經敲響十二點。此刻，父親應該正坐在從陽邏開出的小火輪裏，明天一早就能到家。明天……，不，子夜都已經過了，應該是新的一天了，正是黎明女神從夜深處悄然啟程的時候。

睡意一陣一陣地襲來，朦朧朧朧中，我似乎聽見冥冥中有聲音說：「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這不是耶穌基督在「山中聖訓」中說過的話嗎？我沉浸在一種從未有過的愉悦和安寧中，漸漸墜入了夢鄉。

在睡夢裏，我又一次飛了起來，但枷鎖已經解除，翅膀不再沉重。我飛得愈來愈快，愈來愈高。我迎著黎明的曙光飛去。

這是一次自由的飛翔。



# 走出「失憶」的叢林 —— 後記

出獄之後，不知有多少人問過我，從21歲到33歲，正是一個人一生中最寶貴的青春年華，那十多年的單身監禁生活，你是怎樣過來的？我只能說是一天一天硬著頭皮熬過來的。事實也的確如此。至於那一天天是怎樣「熬」的，就遠非三言兩語能說清楚。近十年來，我在每天夜深人靜的時候，蕩起沉重的「記憶之舟」，讓思緒重新回到那噩夢般的日子，在歷史長河裏仔細打撈沉澱已久的往事。於是便有了這部「獄中籲天錄」，可以回答關心我的朋友們的提問了；同時也是以此告慰我那被埋葬在黑暗深淵裏的青春——倘若青春有靈的話。

這本回憶錄，既然是回憶「文革」的事，我當然希望它首先能在國內出版。然而事與願違，由於這本書的內容——如國內一位出版社的編輯所言——「太傷痕、太尖銳，是最純粹的文革作品，正落在禁區之內」，故暫時絕無在國內出版之可能。我對此也無話可說。文革中那十多年非人的經歷，創巨痛深，刻骨銘心，如何能粉飾得「不傷痕」、打磨得「不尖銳」、偷換為「陽光燦爛的日子」呢？即便這本書因不合時宜而只能「投諸荒野」，也由它去吧，真實是紀實作品的生命，一旦真實缺位，回憶錄豈不成了「演義錄」？

遺憾的是，如今「演義」式的「回憶錄」太多，特別是一些「名流聞人」，回憶起文革往事來，更是熱衷於弄虛作假、文過飾非，千方百計地為自己塗脂抹粉。更多的國人則是有意無意「封閉」了對那段曠世劫難的回憶，大家彷彿全都患上了「失憶」、「失語」症。這不能不說是我們整個民族的悲哀。

一個如此「健忘」的民族恐怕是有危險的。須知有人正在遺忘的廢墟上種植謊言的種子，這些謊言的種子不多年後會長成成片的森林。到那時，人們將不再知道那場浩劫的真相，不再知道權力者的罪惡，不再知道民族的苦難和悲慟，「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那麼誰能保證歷史悲劇有一天不會重演？

為了對歷史負責，對子孫負責，必須拒絕遺忘！而要讓我們這個缺乏懺悔意識的民族走出「健忘」的黑暗叢林，談何容易。但總得有人站出來，為後人留下一點「信史」，得有一批有血性、有勇氣、有責任感、有憂患意識的人，來共同做這件事。就像高爾基筆下的那位丹柯一樣，不惜從胸膛裏掏出自己的心臟作為火把，來點亮記憶的光芒。果能如此，就不能說我們民族沒有走出「失憶」叢林的希望。

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給了我這本「回憶錄」出版的機會，使得文革中一段塵封數拾年的歷史得見天日。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的王紹光教授，不但不遺餘力促成本書的出版，而且在百忙之中承擔了審編本書的工作。在這本書的寫作和修改過程中，我還充分利用了王紹光教授對武漢地區文革史的研究成果，對此我永遠懷著深切的感謝。我還要特別感謝華中科技大學文學院的周文復教授，是他無償地奉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對這本書逐段逐句、逐字逐標點地進行了多次勘誤正謬。此外，廣州美院李正天教授為本書題寫了書名，作家方方女士、老教授姜弘先生抽出寶貴的時間為本書作序，朋友艾曉明博士、孫彥章先生、李經純先生和辦公室同事王德發先生、秘書曾嶸小姐、于淑珍小姐等，都為本書的寫作提供過無私的幫助，在此一併表示感謝。

我還要提到二十多年來與我患難與共、相濡以沫的妻子。她在我出獄後不顧世俗眼光的冷視和鄙夷，衝破巨大的阻力毅然和我結合。這麼多年來，如果沒有她對我生活上無微不至的照顧和精神上始終如一的支撐，我要完成這本書的寫作幾乎是不可能的。

最後，我要把這本書奉獻給我年邁的母親。文革中她因我而受盡磨難，但願這本書的出版，能撫平她老人家心中的塊壘和傷痕。

2004年12月於杭州

## 附錄一：

# 武漢地區紅衛兵運動大事記

1966年

6月1日，新華社全文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矛頭直指北大黨委和北京市委，在全國人民的思想上引起巨大的震驚，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6月2日，武漢地質學院、武漢測繪學院均出現批評校方的大字報。

6月9日，武漢二中出現矛頭指向黨支部的大字報，引起官方密切注視。

6月8—11日，省委和市委「工作組」進駐各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代替學校黨組織行使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

6月13日，省委宣佈揪出以武漢大學校長李達為首的「武大三家村」。

6月中旬至7月下旬，工作組在學生中抓「右派」、抓「遊魚」，與部分受壓制的學生的矛盾逐步激化。

8月2日，市委決定逐步撤出派駐各單位的「文化革命工作組」。

8月下旬，在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文化革命小組召集舉行的群眾活動中，開始出現佩戴袖章的紅衛兵。這些紅衛兵走上街頭「破四舊」的「革命行動」，受到省市委和各級政府的支持。

8月中下旬，省委主要領導人到各大專院校作巡迴演講，承認工作組前段時間犯了「方向性路線性錯誤」，呼籲各校轉入「鬥批改」的軌道。

8月19日，武漢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成立。至25日，全市23所大專院校和80%的中學先後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或「臨時委員會」。

8月24日，武漢大學生「紅代會」成立；26日，武漢中學生「紅代會」成立。

8月下旬，第一批北京學生南下串聯到達武漢。部分南下學生公開提出「炮打張體學，火燒省市委」的口號，並將標語刷遍武漢三鎮。

8月底，各校學生開始被安排分期分批前往北京串聯。

8月30日，在省委授意下，一張署名湖北大學全體革命師生的向全市人民的《緊急呼籲》信公開發表。呼籲信指責北京南下學生是「一股逆流」，號召全市群眾與之進行堅決的鬥爭。

9月2日，部分南下串聯學生因要求與省委主要領導人座談未果，在省委所在地靜坐抗議。次日，人數增加到200人，並進行了絕食。

9月4日，中共湖北省委在武昌體育場舉行大會，歡迎北京和其他省市「革命師生」來武漢「支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但省委主要領導人在會上又宣佈「只支持左派，不支援右派」，目標直指主張「炮打湖北省委」的那部分南下的北京紅衛兵。

9月6日，北京師範大學女附中紅衛兵宋要武、華小康等五人，發表「在武漢致北京、武漢革命同學的公開信」，反對炮打湖北省委，對北京南下串聯學生中「一小撮反革命、混蛋、王八蛋」發出「嚴正警告」。這封「公開信」被大量印刷成傳單，隨湖北省委黨報《湖北日報》發送到千家萬戶，產生極大的影響。

9月11日，受官方影響的「武漢地區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成立。

9月15日，省委主要領導人在一次會議上「代表三千萬湖北人民控訴」「南下一小撮」串聯學生。全市掀起「大抓一小撮」的高潮。

9月底10月初，在華中工學院和湖北大學相繼出現了不受官方控制的少數派紅衛兵組織「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紅色造反團」和「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紅八月戰鬥隊」。

10月上旬至中旬，各個大中學校相繼出現少數派學生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組織。在武漢大中學校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

10月26日，「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武漢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即「二司」)，

後來又稱「鋼二司」成立。幾乎在同一時間裏，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新華工紅色造反司令部」(即「紅司新華工」)和「新湖大」相繼成立。

11月4日，武漢地區東方紅紅衛兵司令部「(即「三司」或「紅三司」)成立。該組織因持「同意二司的觀點，不同意二司的做法」宗旨，被認為是折衷主義的產物。

11月4日，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新華農」總部成立。該組織與先期成立的「新華工」、「新湖大」並稱「三新」。

11月9日，「二司」等造反派學生佔領省委機關報《湖北日報》大樓，一周後迫令其停刊。

11月10，武漢地區「毛澤東思想工人戰鬥隊總部」(即「工總」或「鋼工總」)成立。

11月14日，省委發佈《公告》，對前段時間的「錯誤」進行檢討。

11月中旬，受官方影響的「武漢地區革命職工聯合會」成立。

11月20日，省委就《湖北日報》辦報方針方面的「錯誤」進行檢討。

12月8日，「工人造反總司令部」(即「工造總司」)成立。

12月12日，武鋼「九一三兵團」成立。

12月下旬，「職工聯合會」、「大專院校紅衛兵」及「中等學校紅衛兵」等組織相繼解體。

12月29日，在造反派的壓力下，武漢市委所屬《武漢晚報》被迫停刊。

1967年

1月，「二司」的紅衛兵會同「工總」和「九一三兵團」組織群眾集會，對原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和中共湖北省委代理第一書記、省長張體學連續進行批鬥。「二司」和「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會同「工總」、「九一三」和「工造總司」等41個群眾造反組織，對省市委省市政府展開「奪權」鬥爭。

1月21日，「工總」、「二司」等和原《武漢晚報》的造反派，出版《長江日報》「新生號」。

1月22日，造反派一舉接管了《湖北日報》、省、市人民廣播電臺和武漢電視臺。

1月26日，造反派向省委聯合「奪權」。奪權過程中「工總」、「二司」等與「工造」、「新華工」等發生衝突。同一天「工造」單方面宣佈向市委「奪權」，但「工總」等拒絕承認。

1月26日，以原「職工聯合會」中民兵為基礎的准軍事組織「紅武兵」成立。

2月1日，武漢部隊成立「支左指揮部」，介於地方文化大革命。

2月8日，「工總」「九一三」和「二司」等12個造反組織，在《長江日報》上聯合發表由「二司」的雷志茂執筆起草的《關於武漢地區當前局勢的聲明》(即「二八聲明」)，指責「工造總司」、「新華工」、「新湖大」等的「右傾機會主義」。武漢各群眾組織以支持或反對「二八聲明」為線，分為「香花派」和「毒草派」，並由此形成造反派中「鋼派」「新派」兩大陣營。

2月13日，《湖北日報》發表社論，批判「二八聲明」。

2月18日，武漢軍區發佈《二·一八聲明》，譴責「二八聲明」。軍區的這一聲明得到「新華工」等「毒草派」的擁護。

2月27日，「工總」各級負責人前往軍區「請罪」。同日，湖北省軍區成立以「支左」為主要任務的「抓革命、促生產辦公室」；3月6日，武漢市人武部成立「抓革命、促生產辦公室」。

3月17日，武漢軍區和公安機關逮捕「工總」頭頭和骨幹分子486人。隨即又宣佈解散「工總」。「二司」亦受到嚴厲的批評。

3月21日，軍區發佈《三·二一通告》，宣佈「工總」十大罪狀。

3月下旬，武漢部隊向武大、華工、湖大等高等院校派遣「軍訓團」，半個月後又撤出。

4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正確對待革命小將」。

4月6日，「新華工敢死隊」貼出《向武漢部隊支左辦公室中的一小撮混蛋挑戰》的大字報。

4月11日—14日，「新一中」造反派學生舉行絕食行動，矛頭指向市人武部「支左辦」。

4月上旬，「二司」和「新華工」等紅衛兵造反組織展開反「二月逆流」的鬥爭，提出「揪武老譚」（即武漢地區的譚震林），矛頭直指武漢軍區領導。其後「二司」學生提出「為工總徹底翻案」的口號。

4月13日，武漢部隊根據中央軍委《十條命令》，釋放「工總」絕大部分被捕人員。「工總」的一些基層組織開始恢復活動。

4月18日，「紅三司」中部分學生因不滿於頭頭的「機會主義路線」，另行成立「三司革聯」。

5月6日，「二司」、「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和「三司革聯」、「中學紅聯」等學生組織，聯合成立了「武漢地區大中學校革命造反聯合指揮部」，以統一行動。

5月13—19日，市公安學校的造反派學生為抗議在一次和公安局保守派的衝突中受到對方的毆打，在公安局大樓前舉行絕食。這一抗議行動迅速擴大為全市性的規模，參加「絕食行動」的人數超過4萬。

5月16日，以「紅武兵」為骨幹力量的武漢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百萬雄師聯絡站」（即「百萬雄師」）成立。

5月21日，武漢市區內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間發生第一次全市性武鬥。

5月27日，市二十中學發生武鬥，武鬥中造反派學生死一人。學生們抬屍上街遊行，從此武鬥開始升級。

6月4日，軍區發佈《六四公告》，重申「工總」不能恢復組織。

6月15日，漢口循禮門一帶發生武鬥。6月17日，漢口六渡橋發生兩派組織的大規模武鬥。

6月24日，漢陽軋鋼廠、漢口友誼街、武昌河運學校、武漢水運學院等處連續發生大規模武鬥。造反派所控制的地盤逐漸喪失。

6月26日，中共中央辦公廳致電武漢軍區，要求立即制止武鬥。從6月26日到7月15日這20天的時間裏，武鬥沒有發生。

7月14日，周總理陪同毛澤東主席抵漢。謝富治、王力等以「中央代表團」的名義同時來漢，解決武漢問題。

7月15日，「新華工」舉行遊行示威。隊伍在經過漢口武聖路電車公司門前時，遭「百萬雄師」襲擊，傷亡慘重。

7月16–18日，王力、謝富治等先後在華工、湖大和水院接見造反派，公開表態支持「三鋼」、「三新」等造反派組織，指「百萬雄師」為保守組織，並指責武漢軍區「支左的大方向是錯的」，要為「工總」平反。

7月20日，「七二〇事件」爆發，王力、謝富治被圍困。連續三天，「百萬雄師」出動數百萬人武裝遊行示威。這一事件被中央定性為一次「嚴重的政治事件」。

7月26日，武漢軍區發表《公開信》，檢討支左工作犯了「方向路線錯誤」。

7月27日，中央軍委決定，撤銷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政委鍾漢華的職務。任命曾思玉、劉豐為武漢軍區負責人。

7月29日，「百萬雄師」聯絡站發表公告，宣佈解散組織。

8月，「工總」、「二司」、「新華工」等造反組織衝擊進駐各級軍事機關，並搶奪武器裝備。

8月17日，武漢警備區成立。

8–10月，「鋼新」兩派之間在大聯合中的權力分配問題上矛盾逐步加劇。期間在中央和軍區的干預下，兩派就聯合的問題進行過多次談判。

9月7日，由「新華工敢死隊」編輯的《揚子江評論》出版第一期。

11月7日，由「新華工」原敢死隊幾名學生發起組織的「北斗星學會」成立。學會散發的宣言中提出要對文化大革命進行研究和總結，「為未來的鬥爭準備彈藥和武器」。

12月4日，武漢軍區指「北斗星學會」為「稀奇古怪的組織」，予以取締。

12月上旬，原「北斗星學會」部分成員另行組織「決心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並於12月10日發表《決派宣言》。

### 1968年

1月15日，武漢地區「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大中學校代表大會」(即「紅代會」)成立。由原「二司」、「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和「三司革聯」的負責人組成該組織的領導班子。

1月18日，武漢地區工代會開幕。

1月20日，武漢市革命委員會成立。

2月5日，湖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曾思玉任主任，劉豐等8人任副主任。副主任中包括原「工總」頭頭朱鴻霞、原「二司」頭頭楊道遠和原「新華工」頭頭張立國等群眾組織負責人。

從3月下旬開始，開展「三反一粉碎」運動，一直持續到5月。

5月，「三鋼」、「三新」和「三司革聯」均大規模搶奪軍用器械。約有八萬支槍被搶。「鋼新」兩派之間並不時發生武鬥。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組」電令各造反派組織立即停止搶槍。

6-7月，武漢「鋼」「新」兩派之間武鬥嚴重，雙方均有傷亡。

8月27日，武漢地區第一支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武漢鋼鐵學院。此後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陸續進駐各大中學校領導「清理階級隊伍」和「鬥、批、改」。

9月9日，湖北省革委會召開擴大會議，會上通過決議，要求撤銷所有群眾組織，實現「歸口大聯合」。遵照這一決議，武漢各群眾組織在9月20日之前紛紛宣佈解散。

11月25日，武漢地區文革中首批1萬多名知識青年奔赴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至年底前，全市所有的初高中生均下放農村。此後各大專院校學生也陸續下放到部隊或地方的農場接受「再教育」。



## 附錄二：重要名詞解釋

### 1、《五一六通知》

指1966年5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由毛澤東主席親自主持製定的一個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的文件。通知明確提出「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指出文化革命的目的，就是對這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進行批判。

### 2、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文革初期中央曾作出決定，派工作組領導各地基層單位的運動。由於毛澤東批評工作組「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壓制革命群眾」，工作組不久便撤出各基層單位並受到造反派群眾的批判。對工作組的批判逐步上升為對各地直至中央領導人的衝擊。

### 3、「三家村」和《三家村札記》、《燕山夜話》

「三家村」係指文革初期被錯誤地打成「反黨小集團」的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市委書記鄧拓和市委統戰部長廖沫沙三人。他們合寫的一本雜文集《三家村札記》，以及鄧拓六十年代初期陸續發表的《燕山夜話》，被認為是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而受到批判。

### 4、《海瑞罷官》

京劇劇本，吳晗寫於1960年，後被說成是「刮翻案風」而受到批判。毛澤東1965年在一次談話中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使得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帶上了更濃厚的政治色彩，並迅速發展到史學界、文藝界和哲學界，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 5、四清運動

又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指從1962年冬起至文化大革命開始前在城鄉廣泛開展的一場「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的運動。

## 6、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文革初期(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在康生授意下，炮製的一張針對北大黨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報。大字報得到毛澤東的支持，被稱為「20世紀60年代北京人民公社宣言」，「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6月1日經新華社全文廣播後，成為點燃文化革命烈火的導火線。

## 7、武大「三家村」

文革初期武漢大學的校長李達、黨委書記朱劭天和副校長何定華三人，被認為組成了一個武大內的「三家村」。武漢大學內大約有五分之一的員工受此案牽連，校黨委13名常委中就有9人被打成「黑幫分子」。這一錯案後來得到了平反。

## 8、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文革初期對「反革命黑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動學術權威」以及歷史上的「地富反壞右分子」的一場大規模的手段極其酷烈的清掃行動。行動中被打傷打殘、打死，被迫自殺者不計其數。

## 9、《炮打司令部》

指毛澤東1966年8月5日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寫的一張大字報。大字報指出中央有些領導同志「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發人深省的嗎？」矛頭直指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

## 10、《十六條》

即1966年8月初在北京舉行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這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綱領

性文件規定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指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 11、紅衛兵

文革初期最早出現在北京清華附中的一個主要由幹部子女組成的青少年造反組織。由於得到毛澤東的公開支持，這種組織形式在1966年的8-9月迅速發展到全國各地的大中學校，成為文化大革命中「炮打司令部」、「造修正主義反」的一支重要力量。

### 12、血統論

一種以出身來界定一個人的政治立場的反動理論，文革前一年已經開始在北京部分學生中流傳。文革開始後「血統論」更是盛行一時，其宣導者炮製了一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在群眾中進行鼓吹。這一「理論」從一出籠便受到群眾強烈的抵制。

### 13、一月革命

指1967年1月在上海發生的造反派群眾組織向上海市委市政府「奪權」的事件。這一「奪權」行動受到張春橋和姚文元的支持，並得到毛澤東主席的肯定，在全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引起連鎖反應。從而形成1967年春全國範圍內的「奪權」高潮。

### 14、二月逆流

1967年2月前後，中央政治局和軍委中的一些老一輩的領導人，在不同的會議上對文化革命中出現的左傾錯誤，提出了激烈的批評，史稱「二月逆流」。在毛澤東的支持和中央文革領導小組一些人的唆使下，社會上掀起「反擊復辟資本主義逆流」的浪潮。林彪事件後，「二月逆流」事件得到平反。

### 15、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

指1937年薄一波、安子文、劉瀾濤等六十一名共產黨員，執行黨組織

指示，在國民黨山西反省院「自首出獄」一案。這一已經中央下過結論的案子文革中被重新提出來審查，薄一波等人被打成「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受到殘酷迫害。粉碎「四人幫」後，此案得到了平反。

### 16、「三鋼」、「三新」

「三鋼」係指文革中武漢地區的「鋼工總」、「鋼九一三兵團」和「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鋼二司」。「三新」指「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三鋼」、「三新」同為造反派組織，但在鬥爭策略和具體做法上存在分歧。

### 17、「百萬雄師」

全稱「武漢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百萬雄師聯絡站」，成立於1967年5月。其班底以文革初期武漢一個叫「職工聯合會」的官辦組織為基礎，其成員包括「紅武兵」「公檢法」等，並有部分部隊官兵參加。

### 18、文攻武衛

文化革命進行到第二年時，隨著不同派別的群眾組織之間的鬥爭的逐步激化，開始出現了「武鬥」即使用武器進行「武裝鬥爭」的情況。「文攻武衛」的口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這個口號曾經得到當時的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江青的支持。

### 19、七二〇事件

1967年7月中旬，武漢一個叫「百萬雄師」的群眾組織，為反對中央工作小組將其定性為「保守派」組織而發動的一次大規模的抗議行動。從7月20日至22日連續幾天內「百萬雄師」出動數十萬人上街武裝遊行示威，企圖迫使中央對武漢問題重新表態。這一事件當時被中央定性為一次嚴重的政治事件。粉碎「四人幫」後，「七二〇事件」得到平反。

### 20、「楊余傅」事件

指1968年3月楊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三位軍隊領導人被林彪和江青誣指為「反黨集團」而遭逮捕的事件。製造這一事件的目的，是為了打擊軍隊中與林彪不一致的那部分異己力量。

## 21、三反一粉碎運動

指1968年3月由上而下發動的一場對所謂「右傾翻案風」的鬥爭。鬥爭的口號是「反右傾、反翻案、反復辟，粉碎右傾翻案風」。其目的是要借這個反「右傾」的運動，鞏固在全國剛建立不久的各級政權機構，但實際結果是加劇了群眾組織中各個對立的派別之間的鬥爭。

## 22、公安六條

指1967年初以中共中央、國務院名義發佈的「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其中有關「反革命行為」的界定，為文革中的所謂「惡攻」罪名提供了依據。

## 23、清理階級隊伍運動

指從1968年10月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的一場清理、打擊階級異己分子的運動。這個運動以清理階級成分較為複雜的造反派群眾組織中的成員為重點，旁及其他「牛鬼蛇神」。

## 24、珍寶島事件

指發生在1969年3月蘇聯軍隊兩次武裝侵犯我國領土——黑龍江省珍寶島的嚴重事件。這一發生在中蘇邊境的嚴重流血事件，對隨後召開的「九大」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準備打仗」成為「九大」的指導思想之一。

## 25、全國山河一片紅

指1967年「一月革命」後至1968年9月，全國除臺灣外各省市自治區外，相繼成立了由革命幹部、軍隊幹部和群眾代表三結合組成的「革命委員會」，當時稱為「全國山河一片紅」。

## 26、六廠二校經驗

指文革中北京市針織總廠等六個廠礦企業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兩所學校，在「支左」的8341部隊的領導下總結的一套「對敵鬥爭的經驗」。這些左傾路線指導下總結出來的「經驗」被推向全國，為全國範圍內的階級鬥爭擴大化樹立了「樣板」。

### 27、一九五七年漢陽事件

1957年夏天湖北漢陽一中的部分學生，因升學率問題與政府主管教育的部門發生衝突，被政府定性為「反革命暴亂事件」。該校有三名中年教師其中包括一名副校長被指為事件的幕後指使者而遭槍決。這一事件直到80年代中期才得到平反昭雪。

### 28、九二七指示

即中共中央1969年9月27日發出的(1969)67號文件。這個文件將武漢地區「北決揚」定性為由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幕後操縱的「反革命地下組織」予以取締，從而導致一場涉及數十萬群眾的大清查，造成極嚴重的後果。後根據湖北省鄂文1979第70號文件所轉發的湖北省高法的復查意見，「北決揚」既不存在「反動綱領」，也不存在「幕後操縱」，「不能定為反革命地下組織」。全部在押涉案人員在長期監禁後終得釋放。

### 29、清查「五一六」

「五一六」原指北京一度出現的一個將矛頭指向周總理的名叫「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的小組織。林彪、江青等人為了打擊異己，將對「五一六」的清查無限擴大化，使數以百萬計的幹部和群眾無辜受到牽連。

### 30、九一三事件

1970年林彪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企圖爭奪國家主席職位失敗後，與毛澤東的矛盾激化。林彪在謀殺毛澤東的陰謀敗露後，於1971年9月13日乘機倉皇出逃，途中摔死在蒙古國境內的溫都爾漢。

### 31、五七幹校

文革期間在「精簡下放」的名義下，把大批幹部、教師、科學、文藝工作者和工程技術人員等，送到所謂「五七幹校」勞動，接受所謂「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使許多國家急需的有用人才的精力和時間埋沒在繁重的體力勞動中，造成廣大知識份子的又一次磨難。

### 32、天安門廣場事件

又稱「四五運動」。指1976年清明前後全國範圍內掀起的一場有眾多群眾自發參加的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運動。運動的矛頭同時指向了現代的「迷信和神權」。4月5日，在天安門廣場參加悼念周總理活動的群眾遭到武裝人員的血腥鎮壓。粉碎「四人幫」後，這一事件得到平反並受到高度的評價。

### 33、「四人幫」反黨集團

指以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等四人為首的以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為目的的宗派小集團。毛澤東逝世後，「四人幫」被粉碎，其重要成員均被逮捕並受到審判。

### 34、撥亂反正

指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鄧小平同志的領導下，對文革中「左」的路線和理論的系統清算。在政治、經濟、文化、外交各個方面正本清源，促進和發展了安定團結的局面。

### 35、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

指粉碎「四人幫」後，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衝破「兩個凡是」教條的禁令，於1978年5至6月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的一場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討論中提出並確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觀點，在政治和思想理論方面均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 附錄三：書中有關人物索引

(按姓氏筆劃)

王仁舟：湖北浠水農民。文革前係北京外國語學院學生，因「政治思想問題」被開除學籍。文革開始後在其家鄉組織農民造反組織「巴河一司」，1968年初被武漢軍區定為「壞頭頭」遭逮捕，後病死於獄中。

王任重：(1917–1992) 原湖北省省委第一書記，文革初期調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1966年11月即初被打倒。粉碎「四人幫」後得到平反，曾先後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全國政協副主席。

白樺：詩人、劇作家，曾任武漢部隊勝利文工團創作員。1957年曾被打為「右派」，文革中屢遭磨難。文革後在詩歌、戲劇創作方面著述甚豐，被海外視為國內文化界「不同政見者」。

朱鴻霞：武漢重型機床廠工人，文革中為造反派群眾組織「工總」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曾任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職。粉碎「四人幫」後被定為「四人幫分子」而遭逮捕，判刑15年。出獄後經商，於1996年病逝。

吳炎金：武漢無線電元件廠工人，文革中為造反派群眾組織「工造總司」主要負責人之一，曾任武漢市革委會副主任職。粉碎「四人幫」後遭逮捕並判刑。

李達：(1890–1966) 著名的教育家、哲學家。1921年參加過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是我國傳播馬克思主義者的先驅者之一。曾任武漢大學校長，文革開始後被打成「武大三家村」的「黑掌櫃」而遭迫害致死，文革後得平反昭雪。

胡厚民：武昌造船廠工人，文革前為中共預備黨員。文革中為「工總」主要負責人之一，曾任湖北省革委會常委職。粉碎「四人幫」後被定為「四人幫分子」遭逮捕，判刑20年。服刑期將滿前病死於獄中。

夏邦銀：漢陽軋鋼廠工人，文革前為中共正式黨員。文革中為「工總」

主要負責人之一，曾任湖北省革委會常委職，並當選為黨的「九大」和「十大」代表，「九大」「十大」上並當選為中央委員。粉碎「四人幫」後被定為「四人幫分子」遭逮捕，判刑13年。已病逝。

**張立國**：武漢華中工學院學生，文革中為「新華工」主要負責人之一，曾任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職。粉碎「四人幫」後被定為「四人幫分子」遭逮捕，判刑13年。出獄後經商。

**張體學**：(1915—1973)原湖北省代理省委第一書記，省委第一書記。文革中任湖北省省委書記、省革委會副主任職。

**陳再道**：(1909—1993)原武漢軍區司令員。因被指與「七二〇事件」有關被撤銷一切職務。粉碎「四人幫」後得到平反。

**陶鑄**：(1908—1969)原中共中央委員、中南局第一書記。八屆十一中全會後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時還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1967年1月被突然打倒，並被迫害致死。

**曾思玉**：(1911— )原為山東軍區負責人。「七二〇事件」後調至武漢軍區任司令員，並擔任湖北省革委會主任職。「九一三事件」後被指為上了林彪的「賊船」，後調濟南軍區。

**楊道遠**：武漢測繪學院學生，文革前為中共預備黨員。文革中為「二司」主要負責人之一，曾任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中央「九二七指示」下達後即以「策劃、指揮打砸搶的壞頭頭」的罪名被拘禁並巡迴批鬥。到1978年底正式被捕，判刑13年。出獄後經商。

**劉豐**：(1915— )原武漢軍區空軍部隊副司令員。因「七二〇事件」中保護王力、謝富治有功，被破格提拔為武漢軍區政委，並任湖北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職。「九一三事件」後被揭發係林彪死黨而遭廢黜。

**聶年生**：武漢華中工學院學生，文革中為「新華工」主要負責人之一，曾任武漢市革委會常委。粉碎「四人幫」後曾受到審查，已病逝。

## 附錄四：「北決揚」涉案人員索引

(按姓氏筆劃)

干毅：原華工機械系教授。文革中被打成「北決揚」的後臺、「國民黨反動將領」而遭長期監禁。1976年出獄，後平反。

王盛榮：老紅軍，曾留學蘇聯。文革中被打為「反革命地下組織北決揚」的後臺，遭長期監禁。文革結束後於1978年釋放，後得到平反。

甘勇：文革前係武鋼合同工，文革中因贊成「北決揚」的觀點被指為「北決揚」骨幹分子，未經任何手續即遭非法監禁長達十年。在獄中精神失常。1979年底出獄，不久便死於車禍。

田國漢：文革前係武昌某國營印刷廠老工人，黨員。文革中為「工總」宣傳部負責人。因曾為《揚評》提供印刷方面的條件被牽連進「北決揚」一案，遭長期監禁至精神失常。1974年出獄，晚景淒涼。

周凝淳：文革前為某手工業管理局業餘學校代課教師，文革中被牽連進「北決揚」案遭長期監禁，在獄中精神失常，至今未能痊癒。

周嶽森：原華工附中校長，中共黨員，解放前曾為黨的地下學運工作過。文革中被打成「北決揚」的後臺、「國民黨老牌特務」而遭監禁。1973年出獄，後平反，並擔任華工教務處副教務長。已病逝。

馬業成：黃石鐵山工人。文革中因贊成「北決揚」觀點被指為「北決揚」骨幹分子，未經任何手續即遭非法監禁長達十年。1979年底出獄，仍回原單位工作，已退休。

張志揚：原武鋼某業餘學校教師，文革中被牽連進「北決揚」案遭長期監禁。1976年出獄，後得到平反。現為海南大學美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有多種著述在國內外出版。

郭仲藩：原武漢大學經濟系62級學生。《揚評》主要撰稿人。曾因《揚評》問題受到批判，留校勞動多年，直至1974年才分配到一所煤炭子弟

中學任教。現任湖北師範學院教授，黃石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曾當選為九屆人大代表。在經濟學方面著述頗豐。

**童丹**：文革前為小學代課教師，文革中被牽連進「北決揚」一案，未經任何手續即遭非法監禁長達十年。1979年底出獄，分配到一刻字社工作，一年後即病退，靠極微薄之退休金維持生活。20年來筆耕不綴，創作有十四行詩一萬首，但未有機會發表。

**馮天艾**：原華中工學院無線電系63級學生。文革中為「新華工敢死隊」和「北斗星學會」負責人之一。在魯禮安被捕後，接替魯主編《揚子江評論》，為《揚評》主要撰稿人。因「北決揚」一案被監禁十年。在獄中精神失常。1979年底出獄，經治療病已痊癒，後因腦溢血導致偏癱。

**楊秀林**：原武漢大學歷史系61級學生。《揚評》主要撰稿人。因「北決揚」一案曾遭監禁。後分配至湖北羅田一中學任教。現為湖北師範學院歷史系副教授。

**蔡萬寶**：文革前為武漢無機鹽廠工人。文革中為「工造總司」成員。後參加「決派」，為負責人之一。「九二七指示」後被捕，監禁期間曾因病一度保外就醫。1979年底出獄。曾開過工廠，對法律尤有興趣，曾在各種刑民案件中多次出庭充當原告或被告的代理人或辯護人。

**魯禮安**：原華中工學院船舶工程系65級學生，文革中為「新華工敢死隊」、「北斗星學會」和「決派」負責人之一，曾主編《揚子江評論》。因「北決揚」一案遭長期監禁。出獄後先後做過小學代課教師、倉庫管理員、職工教育教師。現供職於一家香港公司國內辦事處。

**嚴琳**：工人，文革中為隸屬於「工造總司」的「鐵軍」負責人。後因贊成「北決揚」觀點被指為「北決揚」的「打手」，遭長期監禁。1979年底出獄，曾一度經商，現生活潦倒。



這是關於文革中「異端」命運的一篇真實的歷史記錄。作者在書中以毫不掩飾的筆觸，極其坦誠地記錄了自己文革之初響應號召奮起「造反」時的狂熱、愚忠和迷惘；狂熱後的反思，反思中對真理的探索，以及隨後蒙冤入獄所受的苦難，和在失去自由的漫長歲月裏，是如何抵禦黑暗、戰勝孤獨，經受住了單人牢房這種被恩格斯稱為「野蠻得無以復加的刑罰」長達十一年摧殘的心路歷程。

在國人似乎普遍患上了「失憶症」或「失語症」的今天，《仰天長嘯》這部堪稱那一特殊時期活化石的作品的「出土」，不但可以幫助讀者對那一時期狂熱的政治、畸形的法制、惡劣的人權狀況和大牆裏的監獄內幕有一個深刻的審視，而且為文革研究者提供了一個了解「紅衛兵運動」和紅衛兵的心態軌跡，以及文革中極左思想與「異端」思潮衍變過程的有價值的原始文本。

---

作者魯禮安，湖北武漢人，1946年11月生，原華中工學院（現華中科技大學）船舶系65級學生，文革初期為武漢地區紅衛兵中最有影響的「筆桿」。1968年7月因莫須有的「惡攻」罪名被捕入獄，後又因涉及「北決揚反革命地下組織」案，被投入單人牢房長期關押。1979年底，「北決揚」被認定不能定為反革命地下組織（中共湖北省委鄂文1979第70號檔），作者因而獲釋。出獄後，作者用近十年時間寫出這本「獄中癲天錄」，使一段塵封數十年的文革「秘史」得見天日。

校讀者王紹光，1954年生於湖北武漢，1982年獲北京大學法學學士學位，之後到美國康乃爾大學繼續深造，先後獲得政治學碩士和博士學位，曾任教於武漢市堤角中學和美國耶魯大學，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授，其涉及中國文化大革命研究的相關著作有《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等。

---

「魯禮安不加矯飾地把當年那種無限崇拜、無限忠誠照原樣再現了出來……他給了我們一塊『文革』的活化石。」——姜弘（武漢市江漢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

「『活著，記憶著，懺悔著，控訴著』是魯禮安的這部厚厚的回憶錄的主題所在……他參與、見證並記載了歷史——我相信，還會有更多的證人勇敢地站出來。」

——余杰（青年學者，自由撰稿人）



中文大學出版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www.chineseupress.com

ISBN 962-996-250-0



9 789629 962500